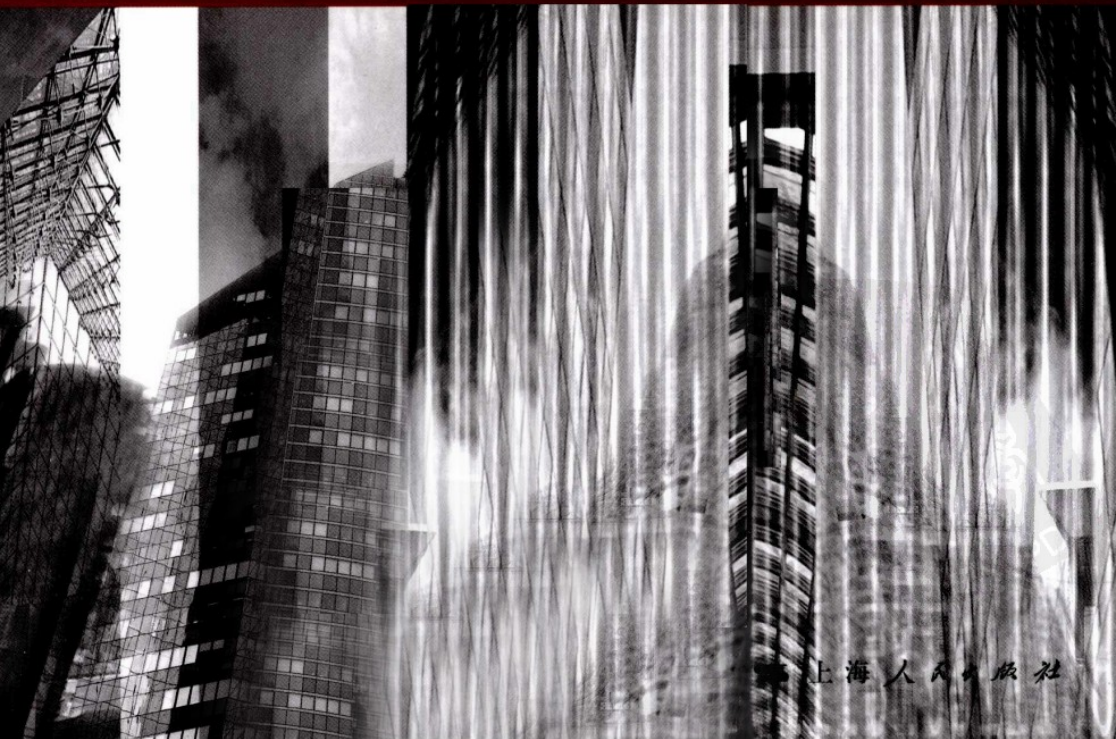


都市文化研究译丛

[美] 戴维·哈维 著

胡大平 译

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纪出版

“一如戴维·哈维以前的作品，这本思想丰富、论点密集的书，将被城市与环境研究领域的学者广泛阅读与讨论。”

——P·黑利，《环境与规划B辑：规划与设计》杂志

“即使被那些更具实践性或者政策导向的书籍环伺，本书依旧配得上广泛的读者群。这是一个内容丰富且具创造力的文本，面对的是当今最大的社会与政治问题。”

——艾伦·科克伦，英国开放大学城市研究教授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对地理学学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是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

——戴维·史密斯，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地理学教授

上架建议：人文地理学

ISBN 978-7-208-09569-4



9 787208 095694 >

定价 58.00元

易文网: www.ewen.cc

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

[美] 戴维·哈维 著
胡大平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美)哈维(Harvey, D.)
著;胡大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都市文化研究译丛)

书名原文:Justice, Nature &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ISBN 978-7-208-09569-4

I. ①正… II. ①哈… ②胡… III. ①政治地理学-
研究 IV. ①K90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5560号

责任编辑 吴书勇
封面装帧 陈楠

·都市文化研究译丛·
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

[美]戴维·哈维 著
胡大平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34.25 插页 4 字数 486,000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9569-4/B·844

定价 58.00元



出版说明

都市文化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前沿学科，主要研究现代都市文化的缘起、变化和发展的规律。它与文化研究、都市研究、社会学、地理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紧密相关。都市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也与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我们期待着这门学科在中国生根、发展，能以中国经验为基础，放眼世界，取得新的突破，并积极参与到中国的都市文化建设中去。为达到此目的，大规模地译介国外的都市文化研究成果，不仅是必需的，而且也是很紧迫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科的自主和创新，必定要建立在全面了解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自 2002 年成立后，策划了大型的“都市文化研究译丛”，译丛不仅包括一批都市文化研究、文化理论的经典著作，也包括显示出最新发展动向的近作，我们注重在理论方法上有重要启示意义的名家名著，也注重对某种现象作实证性研究的学术专著，同时计划译介一些概论性的著作。总之，只要是对中国的都市文化研究有参考价值作品，都在我们译介的范围内。我们吁请海内外的学者、专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吁请更多的翻译家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

2007 年 3 月

目录

导论/1

第一部分 导向

第一章 战斗的特殊主义和全球抱负/21

第二章 辩证法/54

第三章 莱布尼茨的奇想/79

第四章 话语的辩证法/88

第五章 历史行动和社会变革的地点/110

第二部分 环境的本质

第二部分前言/133

第六章 对自然的统治及其不满/136

第七章 评价自然/170

第八章 社会和环境变迁的辩证法/200

第三部分 空间、时间和地方

第三部分前言/235

第九章 空间和时间的社会建构/238

第十章 时空之流/282

第十一章 从空间到地方，再回看/334

第四部分 正义、差异和政治学

第四部分前言/379

第十二章 阶级关系、社会正义和差异的政治地理学/385

第十三章 正义的环境/421

第十四章 可能的城市世界/462

参考文献/502

索引/518

译后记/535

导 论

最近几年，我经常参加有关“全球化”的研讨会。最为有趣的是 1994 年 11 月在杜克大学召开的那次。来自不同国家、学科和行业的人士济济一堂。那也是一次令人愉快的机会，听听来自韩国、中国、印度、俄罗斯以及埃及等国学者、活动家和艺术家代表的声音，以打发冗长乏味的有关“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词越来越被愤世嫉俗地称为“全球胡扯”（globaloney）]的争论——这种争论在欧美大学中经常发生。不过，大会气氛往往都很紧张，很难达成什么最终成果。这种状况说明，像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解构那样的吹毛求疵的思潮侵袭了整个世界。

在北卡罗来纳州达拉谟的奥姆尼宾馆的经历使那次会议值得回忆。许多家庭——非常与众不同的家庭——也住在那家宾馆里。男人们穿着较为宽松的套装、运动夹克或法兰绒服装，往往打着大领带。孩子们表现得十分得体，男孩子通常穿着运动夹克或法兰绒服装，女孩子们则大多穿着镶边的正装。妇女呢，她们都穿着长及脚跟的正装，极为特别的是，全都留着长发，唯一允许的离经叛道行为是把长发挽成圆髻。这绝不是 Levi's、Calvin Klein 或者 Benetton 等这些名牌的样式（尽管可能是 Laura Ashely 设计的），也不是常见的牛仔风格。他们每个人都那么友好，与那些在衣饰上显然不同的人打招呼，问候别人“你好”或者“午安”。

我很好奇地关注这群人，不久就发现，这是东南地区福音会圣灵降临节传教士会议。我饶有兴趣地留了下来。参加了一次晚会，学到了

很多东西。例如，我忍不住把圣灵降临节教徒会议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热心、快乐和活力与全球化会议上的焦虑和竞争的紧张作一对比。尽管白种男性教士（在此不考虑根据性别和种族标准对计划所做的平衡）主宰着集会，但显然与校园听众充满怀疑和怨恨的消极情绪不同，在这里，热心听众参与的水平程度都很高。对于圣灵降临节教徒来说，集会追求的是情感和激情融合，而不是知识上的一致，这个目标很清晰。我不知道全球化会议是否有类似的清晰目标。要给这个问题找一个明确或合乎逻辑的答案是很费劲的。

那天晚上，主持仪式的传教士做了如下祈祷：“四天来，我们最终理解使我们团结如一人那种基本信仰。”基本信仰！我不知道，如果在全球化会议上谈论基本信仰，那将会发生什么事。解构主义者将带着冷冰冰的严谨继续干自己的事，相对主义者可能报以冷冷的讥笑，批判理论家们会擦擦他们的手说“这简直不可能”，而后现代主义者则大叫“整个一只恐龙！太落后了”。我自己也同意，应该仔细审查和质疑全部基本信仰。但让我困惑的是那种想法：当一个以坚定而强大的基本信仰武装起来的政治组织对抗一群怀疑主义者，而后者唯一的基本信仰是怀疑所有的基本信仰，那么预测赢家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使我想到下述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批判分析的任务不是证明基本信仰（或真理）的不可能性，而是为基本信仰寻找一个更加令人鼓舞和充分的基础，它使得解释和政治行动充满意义、具有创造性并成为可能。

本书试图为理解时空、地方和环境（自然）定义提供一套有效的基本概念。当然，这种寻求基本概念的批判性研究并非微不足道或者容易的事。它只是要求为研究建立一种形而上学基础。但是，在今天的学术界，把任何东西说成是“形而上的”，都是危险的事。因为，这意味着渴望我们身外（或内部）的某种神秘东西，借助于它们，我们使混乱的影像之流、转瞬即逝的表象、被扭曲的定位以及各种各样的知识碎片成为稳定的秩序，在其中，我们获得自身的集体存在。但是，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恰恰是从从事这种批判研究的，它承认激情、情感、理性以及理智之间的相互影响，而不是把它们割裂开来。那种平衡并不总是

容易达到。例如，如果圣灵降临节教徒处在过高的情感状态以及对某种极为严格的目标的激情和欲望的集体氛围之中，那么我们学者则一定会错误地过度迷恋理智的和高度学科化(disciplined, 在这个词的肯定和否定双重意义上说)品质，这是我们自己个人主义的、职业规定的、碎片化的且往往自以为是的事业之品质。充其量来说，形而上学不过是寻求一般原则来理解而不是压制物理、生物和社会生活的显著复杂性。这种探究绝非易事，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经常发现自己渴望圣灵降临节教徒信仰、客观主义信念或者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那种简朴性。

随着遇见圣灵降临节教徒的那个夜晚慢慢地过去，我也认识到，那种场合存在着极为特殊的政治目标。这就是种族主义。据说，基督之血将洗尽所有种族差别的符号。教会把其内部的种族歧视为自身权力扩张的障碍，并且在特殊场合，一个又一个教士都在劝诫白人团体以快乐、谦卑和理解来包容其黑人同胞。因此，一个在美国南方传统语境中可能对种族融合抱有敌意的人，最终不仅(至少表面上)热忱地接受了他当面的黑人同胞，而且接受了主和教会眼中的种族平等观念。种族主义行为是破坏性的、堕落性的和令人沮丧的，我现在正好支持几乎所有在美国缓和这种行为的事情。当然，对我来说，在那点上，圣灵降临节教徒一个晚上的说教所带来的成果似乎比二十多年里我自己的大学对那些肯定行动观念所做出的动听的口头承诺要大得多。不过，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显然，罪恶仍在某些地方存在着，而且，把犹太人当成背信弃义的人和杀害基督的凶手来加以谴责，这些行为仍然在圣灵降临节教徒的活动中弥漫着。这使我怀疑：机会政治在多大程度上也被这种企图所主宰——清除那些或隐或现地支持法兰肯的“伊斯兰国家”的非洲裔美国人。

离开会场的路上，我不仅碰到成群结队的传教士，他们热情洋溢地宣讲自己曾是怎样罪恶深重的罪人以及重新发现主的道路是如何惊奇，而且路过成排的货摊，它们推销各种各样的商品，从宗教纪念币、书籍到T恤衫。一件特殊的T恤吸引了我，我忍不住买下。这件T恤由

“义服，以基督为中心的公司”（*Righteous Wear, a Jesus Christ Centered Company*）生产，它以醒目的颜色印着：

GET RIGHT

OR

GET LEFT

我想，解构主义者可能会对那句口号大加攻击。口号来自《传道书》（10：2）和《马太福音》（25：33—34）。在宾馆里，我方便地得到吉迪恩版权的《圣经》。去房间的路上，我找到了两处引文。《传道书》只是说：“智慧的人心居右，愚昧的人心居左。”我并不介意这种说法，因为成为政治左派以来，我自己早就认识到，试图改变世界确实有点傻气。不过，《马太福音》的那一段就非常令人不解了。^①像牧羊人把绵羊和山羊分开那样，上帝把人区分为不同的民族。被安置在右边的绵羊得到了王国，而被安置在左边的山羊则被诅咒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上帝不是一个左派同情者，但他施以这样绝对的诅咒似乎有点过分了。今天，这已成为一个笑谈。

那么，为什么偏偏是山羊被诅咒呢？上帝给出的理由是：

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马太福音》25：42—43）

山羊抗议道，他们并未曾见上帝饥渴、露体、生病和进监。上帝指出在他们的周围每天都会有这样的人，并且说：“这些事你们既不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

现在，这些都碰巧成为相当老套的和传统的——甚至我敢说——也

^① 《马太福音》25：33—34 的内容是：“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译者注。

是“基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的价值。那么，这些东西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全球化会议几乎不关注这些问题呢？而且，宗教“右派”现在怎么会把这些说成是他们的事？在最后一点上，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挑衅性想法。如果上帝存在于空间某处，那么看起来在他左边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右边！这就和一个远非微不足道的问题联系起来：莱布尼茨——我将经常援引他的观点（特别是第十章）——反对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并以神学为根据主张相对的时空观。那种神学认为，由于认为上帝好像存在于时空中（而非时空的创造者和主人），绝对理论削弱了上帝的权力。在莱布尼茨看来，谈论上帝的左边或右边，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遍布宇宙的无所不在的力量，而非坐在某处时空俯视万物变化的人。

看起来是17世纪不可思议的神学论战，却在当代产生了巨大反响。当前，为艺术、政治学、人文研究、文学和社会理论等领域提供“认知地图”^①已经成为一种潮流（随便举几本书，如《图绘西方左派》，《图绘意识形态》或《定位文化》等），在其中，各种政治团体、立场、观点和运动的相对位置问题已经成为评价和判断的主要标准。但讨论不幸地回避了如下问题：认知图绘活动需要一张地图，而各种地图一般来说都是总体化的，通常是二维的、笛卡尔式的和非辩证的，借助它们提出的问题则可能良莠不分。例如，（像欧拉和高斯那样的）数学家很久以前就证明，把地球表面精确地绘制在一张纸的平面上而不发生扭曲，这是不可能的。地图投影（包括其拓扑学类型）的历史表明，制图系统的无限可能性也包含了下述可能：依据某种特定的投影方式，可以把左转化成右，或者把它们两者取消了。这并不是说地图是无用的——问题远非如此（而且，我在本书中将经常借助地图）。但是，制图比喻包含（且有时候模糊）了再现问题，这个问题是在不假思索地选择某一而不是其他特定的投影（projection）（我故意同时在数学和精神分析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术语）时产生的。在我看来，左/右（激进/反动、

^① “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这个术语出自美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詹姆逊，哈维在这里列举的几本书，多出于20世纪90年代英国 VERSO 出版社与《新左派评论》杂志社合作出版的“图绘”（MAPPING）读本系列。——译者注。

进步/保守、革命/反革命)的修辞在今天就没有多大用途,因为这些术语被赋予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意义(经常依据不加说明的配置地图)。在下文中,如果我一般地诉诸二元的“亲”或“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那出于提出更清晰的讨论术语的愿望,即便这样做,我也会立即承认,那种二元区分是相当混乱的。

但是,通过那种(神学的或其他种类的)神秘主义观点来逃避上帝的最后审判,这几乎没有什么意义。我反思的问题是,在表面上具有“激进”和“左派”导向的有关全球化会议(包括我自己)怎样有利于衣食住行老病死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广泛地追求社会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根本政治目标。在我看来,揭示形而上学的基础和基本信仰是不够的,尽管它们可用于孤立地理解抽象术语或者有关时间、空间、地方和环境(自然)的具体政治学。诸如此类的研究应该同时追求解决衣食住行老病死问题的政治承诺。因此,关注社会正义(以及理解那些有关争议术语的基本信仰并使之切实可行)需要面对如下问题:如何理解基本的地理学概念。

“公正的地理差异的公正生产”问题是全部争论的交点。需要批判地理解生态、文化、经济和社会条件上的差异是如何生产出来的(特别地,通过那些我们大体上能够改变和控制的人类活动),也需要批判地评价这样生产出来的差异之正义或非正义性质。像多数社会主义者那样,我也会依赖平等原则,但这并非简单地意味着抹去各种地理差异(甚至假设在一个包含尼泊尔、尼加拉瓜、芬兰、意大利、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世界上想抹去那种差异也是可能的)。实际上,平等原则很可能必然包容某种有益的地理差异的增殖(这直接导致解释怎样才算“有益”的问题)。不平衡的地理发展是最值得大力研究和关注的概念。进一步说,任何称职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者都必定承认,在研究“什么是/不是正义”这个问题时,完全不同的社会生态环境暗示着完全不同的回答方法。因此,我采纳的基本论点(我认为在今天多数人将愉快地接受的论点)是,空间和生态差异不仅被“社会—生态和政治—经济的过程”所构造,而且由它们构成。这带来了进一步难题,这种过程由可

能用来评价和改变它本身的各种不同的社会正义标准所构成。我的基本目标是提供一套稳定的概念工具，来探究这些关系的公正性，并且探明正义的含义如何反过来得以历史地和地理地构建。同时，我也认为这项工作是沿着马克思主义传统为一种令人信服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寻求基本原则。

在此，我预先列出本书各章中将展开的一般性主题。

一 辩证法难题

首先，我提出一种辩证的和相关的方^①。辩证法的本质常常被误解，此外，存在着许多值得我们重视的辩证法形式。因此，建立某些初步的辩证法原则(第二章)，作为理论和概念实践指南，这是明智的(如我解释的那样)。当然，对一些人来说，“辩证法”这个词听起来就没有什么前途，或者过于深奥难懂；而对另一些人，比如说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那些人，辩证阐述现在则是老生常谈。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在社会科学中，对这种思想方式的抵制比过去更强大(即使撇开政治含义不说，不仅在实际的实践而且在解释和意义方面，它同样挑战统计学方法和数学模型程序的标准应用)。在这个问题上，我与文学理论的立场相同，强烈反对大部分社会理论、物理学、生物学和工程学，这些学科轻松地且常常不假思索地把理论建立在实证主义的或简单的经验主义思维和工作模式之上。我奉劝这些领域的同仁们，辩证方法能够加深对社会—生态过程的理解，而无须完全拒绝或抛弃由其他手段得出的结论。我将特别提供一种强调关系和总体性的辩证方法，来反对那些孤立的因果链以及无数孤立的且有时矛盾的假设，这些假设只是在微不足道的统计学意义上才具有正确性。因此，辩证法家的部分工作

^① relational 是一个关键词，亦被译为“关系的”。它表明哈维是从关系入手来推进空间理解的，这个特征不只是强调“相对性”，而是把相对性归于事物之间的复杂关联。——译者注

就是，翻译和转化不同研究结构积累起来的知识体系，并揭示这种转化和翻译如何表现出新的且往往有趣的洞察力。然而，仍然存在着一一些对这个过程的限制，产生一些不是不可能就是很难翻译的难题和问题残余。很明显，在诸如空间、时间和自然这些基本概念上，存在着根本性的理解困难。我多半集中于这些主题，所以由辩证论证和实践产生的差异始终非常显著。

二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难题

尽管辩证法在社会、物理、生物和工程科学中相对较弱，但它在某些人文科学部门中却是常见的思维模式，特别是在文学理论的哲学化浪潮中以及在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德里达和许多其他人的广泛影响下，它变得十分强大。例如，因为一些有趣的原因，我所采纳的关系辩证法在女性主义理论中获得了巨大进展。据弗里德曼(Friedman, 1995)说，“关系位置的文化叙事”使女性主义者能够跨越她称为“拒绝、谴责和忏悔书写”的那种边界，这些“书写”依赖简单的二元论以及往往本质主义的范畴(如，妇女/好：男人/坏)。在关系框架中，“身份随着不断变化的语境而转变，取决于参照点”，所以不存在本质或绝对。“身份是各种流动的地点，人们可以根据形式和功能之有利位置来做出不同的理解”。我坚决支持这种思维方式。不过，我的论证也因此在各种对立的潮流中小心地穿梭(或许，想到了那些福音会教士的简单二元论的力量)。

把万物都还原为洪流和潮流(fluxes and flows)，随后对全部形式和位置之短暂性的强调便有自身的限制。如果全部固定的东西总是瞬间就烟消云散，那么做成什么事都是很困难的，甚至做出什么决定也都很难。面对这种困难，回到简单的基本信仰(不管它们是右派对家庭的崇拜，还是左派对“抵抗”的崇拜)，以及抛弃无法控制的以过程为基础的论证，都是很强的诱惑。我认为，这种诱惑在根本上是错误的。不

过，尽管我接受这种一般论点，即在理解世界时，应该给予过程、洪流、潮流本体论的优先地位，我也希望主张，这正是我们应该仔细关注我称为“永恒”之物的原因，那种“永恒”之物包围着我们，并且我们也构造它们来帮助充实自己的生活并赋予其意义。进一步来讲，万物——甚至包括，如怀特海所言，克里奥帕特拉之针和斯芬克斯——都可以还原为流，尽管这一观点在形式上是正确的，但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我们却被各种各样的物、制度、话语，甚至被那种对相对的永恒和力量的信仰所囚禁，拒不承认那些显而易见的性质将是很愚蠢的。我相信，人类无法看到归根结底，所以很少有人是在著名的“归根结底”意义上^①主张“所有永久和永恒都瓦解了”。在此，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基石”过去习惯于强调，辩证论证不能被理解为外在于具体的物质条件，我们在其中发现自己；并且在严格的“具体”字面含义上（至少与人类行动的时空有关），那些具体的条件常常是持久不变的，以至于我们必须承认它们的永恒性、意义和力量。

所有这些都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例如，在《马克思的幽灵》这部热衷于流的著作中，德里达非常奇特的幻想不知何故被视为完全激进的和革命的。使这一点成为可能的手段是把“辩证法”同历史—地理条件的全部确切意义以及具体的和组织化的政治学之根基割裂开来。这样，德里达就能够想象一种“无形态、无称号、无名字……无政党、无国家、无民族共同体的新国际”。如伊格尔顿评论的那样，这是“后结构主义的最终幻想：一种没有枯燥体系或乏味‘正统’作为自身反对立场的反对立场；一种任何话语都不能表达的不同意见；一种在实现行动中背叛自身的诺言；一种永远激动不已的朝向救世主的开放性，那个救世主最好不要作为某种确定的东西降临，以免让我们失望”（Eagleton, 1995:37）。

为了以任何有意义的和确定的道路来改变世界，我们需要不仅理解

^① 指恩格斯以“归根结底”概括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这个著名的例子。——译者注

而且创造永恒——组织、制度、学说、计划、形式化了的结构，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且，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与那种已经成为纯粹唯心主义的关系辩证法类型有很大的不同。我试图在人类行动得以展开的具体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中为政治寻求一种更加坚固的基础。因此，我反对一种正在出现的趋势，它建立在辩证的和关系思维方式之上，产生了可以被称为“新唯心主义”的东西，它认为，思想和话语是塑造社会—生态和政治经济变迁之历史地理的根本原因。

9 三 理论化难题

在今天，人们广泛地谈论“理论化”或“修正理论”的实践。这也是我所关心的事，不过，我还得赶紧补充一点，“理论化”和“理论”这些术语的含义并不总是容易理解的。当然，当我采取一种辩证的（相关的）、历史—地理的和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理解知识时，这些术语就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并且，创立理论的规则与解释理论框架的规则（比如用一种分析的或实证主义的方法）在此也完全不同。使用不同工具创立的知识和理论并非完全不能相互兼容。不过，它们之间却不能直接同化。我的一般看法是，一种辩证的、历史—地理的和唯物主义的理论，因其以某种方法处理了总体性、特殊性、运动和不变性，所以维持了在其框架内包容其他形式理论框架的前景，有些时候原有框架的整体性仅受最小损失（尽管在其他一些情景中，损失将是实质性的）。在此，我并不关心对那种论点正当性的证明。但是，这里有一个思考方法，它对其后论题是如此重要，值得预先讨论。

把空间探讨引入大多数（辩证的或非辩证的）社会理论之中，在如何说明和运用理论这个问题上，常常会引起巨大的混乱。（诸如马克思和韦伯提供的那些）社会理论的元叙事通常集中于时间变迁过程，而保持空间的恒定性。如果空间通常打破了公认的理论以及占统治地位的元叙事，那么不管出于何种理由试图打破它们的人都能够借助于某种空间

性十分容易地做到这一点。我想，这说明了空间比喻为什么会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著述中突然火爆（福柯的著作在这一点上极为清晰）。

但是，在此，我也发现自己处于某种奇特的位置。因为，一方面，尽管我欢迎那种空间兴趣的高涨（再次强调，文学中的这种兴趣要胜于社会理论）以及某些文本和论点的扩散，它们纠缠于空间性所表示的一切事物，但是另一方面，使用这样一个概念工具又会在本质上反对元理论，这绝非我的意图。我所关心的是，毋宁说，以这样一种方式来重建马克思的元理论，以便把一种对时空性（以及社会—生态问题）的理解整合进其框架之中。这使我在写作的时候反对那些空间性和空间比喻的用法，它们的唯一目标在于获得不可调和的差异、不可通约性、特殊性以及不可还原的个体主义，使它们坚不可摧。

我的立场绝非论证空间性使理论处于不可能之境地。我的目标是重构理论，使空间（以及“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基本要素整合其中。完成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是，特别地，把“空间的生产”，或者更一般地，把“自然的生产”所意味的东西加以理论化。这个计划并非没有困难（如本书某些论证的长度和复杂性所表明的那样）。但是，我想，对于“理论应该怎样解释”以及“一种‘元理论’应该是怎样的”这些问题，我们最终将达成一种与众不同的理解。我相信，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辩证的和历史的地理的唯物主义的—般理论是可能的。

10

四 价值问题和正义的本质

处在社会变迁的洪流和潮流之中，人们会求助于某种永恒的价值，以此鼓舞集体的或训练有素的社会行动。这已不是什么新思想。公元2世纪末某个时候，马可·奥里利乌斯皇帝在多瑙河沿岸某个潮湿而疟疾肆虐的地区扎营，徒劳地抵抗威胁着罗马帝国疆界和永恒性的那些野蛮部落。在其《沉思集》中，他写道：

一个东西急急地诞生,而另一个则匆匆地消失。甚至在一个东西产生过程中,它的某些部分就已经死亡。流变永不停息地更新着宇宙的结构……在这个不知疲倦的河流中,哪里存在着什么牢靠的立脚点,对人来说又有什么东西可以评价从他身边飞逝的万物呢?

在今天,对这个问题产生同感并不困难。但是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不是尽管而是因为日常生活政治经济体制的显著不安全性和反复无常特征,并且在强调(甚至假设)流之反复无常的那些激进的人文艺术学科中也存在着类似偏见。正因为(文化中的)永恒假设或(宗教中的)终极真理假设给各种激进思想难以接受的价值提供了稳定性,所以在“价值”领域,保守的或宗教的思想具有最强大的吸引力。但是,只要有有关什么是重要的或不重的判断在知识上是可以分析的,更不必说在政治上是可以为之奋斗的,那么,离开某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就不可能产生充满意义的政治行动(以及,就此而言,甚至充满意义的分析)。

当然,在某些研究中,“事实”和“价值”之间的区别被看得极为神圣。例如,允许价值进入科学的客观研究领域,经常被视为对全部证据和结果的玷污,并因此使它们可疑和无用。在辩证的/关系的视野中,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分离是不可能实现的(除非通过阴谋诡计,或者在某些极为有限的领域中。在这些领域中,人们合理地接受这个观念,即价值是或可能被视为恒定的)。如我们所见,在某些科学领域

11 中,这种必然融合事实和价值的辩证的/关系的观点已经开始复兴,例如,在“如何解释量子理论”这个问题上的广泛争论。

在我看来,用对“评价过程”的理解来代替僵化的“价值”观念,可以解决这些难题。一旦过程的作用方式得到理解,我们也就能更好地理解“永恒”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在某些特殊的地方和时刻得以建构,从而形成大多数人都心甘情愿地赞成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价值。因此,在下文中,我会一直关注评价过程,它们如何发挥作用,以及某些相对持久的价值在什么程度上可能或已经成为多种形式的社会生态行动

的支点。例如，读者们无疑也会注意到那种“永久性的复归”——重新把金钱视为影响评价过程的占统治地位的符号。最初，我考虑用一章来专门讨论金钱问题。但在最后，我认为，金钱几乎遍及社会生态、个人和集体生活的各个方面，让这个问题以相同的方式渗透在各章中，这样做更合适。众所周知，金钱评价过程同时也是定义空间、时间、环境和地点的过程，我将努力在细节上揭示那种联系。

但是金钱并非理解评价过程的唯一方式。围绕家庭、性别、宗教、民族、种族身份、人道主义以及各种各样道德和正义观念而产生的相对稳定的价值结构，它们表明了非常不同甚至有时对立的评价过程。这些不同的过程如何能够统一起来，就其实质来说，这个问题是研究的主要课题（而且也存在着许多的困惑，就如前述圣灵降临节教徒通过“以基督为中心的公司”出售“义服”这个例子所表明的那样）。例如，可以用金钱力量来支持其他评价过程。不过，这会同时破坏它们并与之冲突。在下文中，我们将时不时地关注这些冲突。如果我最终集中于作为中心点的“社会正义”这个价值，也仅仅部分地因为个人的历史原因（它使我能够重游自己第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社会正义与城市》——的领域，那本书是在二十多年前写成的）。我也确信，这是反资本主义斗争能够坚持的最好的评价地形（无论这种斗争是一种较弱的改良主义斗争，如英国工党的“布莱尔主义”，还是更加革命的斗争，如环境正义运动）。

因此，虽然如劳伦斯·德雷尔的老掉牙的评论所说的那样——“生活由永远的选择和永久性保留的判断所组成”，但一种政治运动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不必保留自己的判断。我相信，圣灵降临节教徒集会和全球化会议之间的核心差异在于，前者没有自己的保留判断，尽管在许多思想和实践的知识模式中，发现和表达这些判断是真正重要的事。像斯芬克斯一样，所有的价值最终都将消逝，而且在飞逝的变迁之流中长期保持某种特殊的核心价值非常困难。但是，如果一定要创造解放性变革，那么，除了阐明并坚持那些价值，我们别无选择。此外，价值内在于社会空间过程，改变前者的斗争同时也就是改变后者的斗争

(反之亦然)。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把人类想象最大限度地运用到探索社会生态的和政治经济的进步变革中去。

五 可能性的政治学

辩证的/关系的方法，其毒害之一是，它打开了那些被其他方法排斥的所有各种可能性。最初，它发生在思想和话语领域，也因此成为全部乌托邦和幻想的源泉(德里达最近提到过的那种幻想)。但是，我同样认为，把这些可能性的意义置于大量约束条件之中，这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也很重要。那些约束条件因为我们嵌在自然、时空、地点和某种特殊的社会—生态秩序(资本主义)之中而产生，这种嵌入性调节着日常生活的物质条件。

这并非遥不可及或神秘莫测的问题。正如圣灵降临节教士通过在人间建造上帝之城的宗教信仰正在成为一种政治力量，我们同样发现大量由某种乌托邦幻想所激励的亲资本主义政治运动。我以《纽约时报》对有关“赛伯空间与美国梦”会议的报道(1995年8月23日)为例。《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尔温·托夫勒是那次重要代表之一。他主张，以信息为基础的“第三次浪潮”革命正在代替“第二次浪潮”的工业主义，并且这个“第三次浪潮”正在形成一种“新文明，它具有与众不同的世界观，具有独特的处理时间、空间、逻辑和因果关系的方式”。这本身是一个有趣的主题；不过，如果托夫勒是对的，塑造历史地理差异的过程和规则也就要经历一场变革了。现在这一切真的发生了，以至于托夫勒被广泛地视为“后工业”和“乌托邦”思想家。他在政治上也具有影响力：纽特·金里奇，美国众议院的共和党领袖，也把他作为“精神导师”之一，并且编造出一套革命的花言巧语，说什么调节的和福利的国家制度结构的瓦解是解放之不可避免的序幕。带来解放的“第三次浪潮”力量据说现在正被日趋式微的“第二次浪潮”工业资本主义之制度、实践和羸弱权力所围困。《纽约时

报》持续不断地报道，一种新的力量联盟（同时来自左与右的政治派系）正组织起来“利用最聪明的高技术人才以及他们的集体智慧来帮助金里奇先生，重塑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图景，为信息革命做准备”。现在，许多人相信，那种在赛伯空间中创造“虚拟”现实的能力正在催生一场遍及政治经济、社会关系、身份探索、语言世界以及艺术领域的解放性革命。此外，金里奇先生想知道是否有可能给每一个美国儿童分配一台微机以解决全部社会和经济问题，《巴尔的摩太阳报》的专栏记者也主张，废弃的市中心公共住房计划中的长期性结构失业和人类才能限制，这些问题的出口便是企业可能接入互联网的人口。

在所有论证中，包含着不止一种经常受到批评的，和某些人所说的，相当“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把当前的“生产力”（技术）从社会经济和政治桎梏（政治管制）中解放出来，而使市场自由大行其道，如果这种论证行得通，那便万事大吉。我怀疑，许多革命力量以及建立在这种乌托邦之上的霸权的亲资本主义的广泛要求，都来自这种庸俗马克思主义论述的表面上吸引人的质朴性（尤其是用诸如撒切尔和金里奇那些人的直率和轻信来表述的时候）。

这种“右翼乌托邦理想”与政治权力和实践之间的联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即使它完全不是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甚至在右派内部），它亦是一种对抗反资本主义阵营的有力的亲资本主义武器。那些反资本主义阵营，以平等、正义、道德或仅仅是通俗易懂的政治经济和生态常识的名义，试图抑制、管制或取消所有明显的暴行，有充分理由说，资本主义在这些暴行上是臭名昭著的。这种联系同时突出了反资本主义政治的困难。由于不能展开自己的乌托邦想象（尽管存在着大量零星的想象），反资本主义政治无力鼓舞和动员一种全球层面的大众运动。那不符合《共产党宣言》，但如我认为的那样，马克思应该是认识到下述问题的第一个人：我们不能用旧有的特殊诗意来描绘自己的未来蓝图，不管它仍然具有何种吸引力。虽然把德里达和托夫勒放在同一意义上讨论可能是一种冒犯，但他们两人确实都提供了乌托邦想象，只不过后者部分地借助于其质朴、率真以及表面上存在的客观根据，表明自己在改

造世界方面成效卓著。

14 人所皆知，马克思憎恶乌托邦思想。因此，把他拖进这样一种争论似乎是奇怪的。不过，他确实提出了某种乌托邦理想，并十分急切地使之与其他乌托邦理想区别开来。当他在《资本论》中写道，“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前者“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他为人类的想象力同时发挥建设性的和关键的作用打开了一个创造性空间。当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道，特别是在“内容”（革命变革的过程）胜于“辞藻”（表达正在发生事件的能力）这样的情境中，每一种革命都不得不创造自己的诗情，因此他指明了革命想象力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这给我们提出了如下问题：我们想共同创造什么样的建筑（在这个术语最广泛的可能意义上）来适应于我们在其中生活的社会—生态世界？不提出这个问题就是逃避最至关重要的任务：正视人类活动的全部形式。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努力寻找基本概念来沉思我们在空间、时间、自然和地点中的嵌入性(embeddedness)。

下文中，在那些特别困难和复杂的主题上，我尽可能地写得清晰而简洁。但是(如马克思所言)我们不能在自己创造的历史或地理条件下写作。正如前面提到的全球化会议所表明的那样，那些被泛泛地称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思考和写作方式，它们急剧扩散的影响使得在今天(特别是在学术界)寻求通俗表达特别困难。然而，近三十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的那些高度专门化和个性化的语言，常常包含了某些十分重要的东西。因此，我发现，只要适当考虑那些值得同样严肃审查的严肃论证，自己也经常被迫(有时具有很好的效果)采纳这些语言和术语。在某些情况下，吸收某些专门化的语言，使之作为自己文本中表达特别而重要观点的专门模式，这也是有用的。部分因为这个原因，我决定用一整章来讨论“话语”这个主题，以便澄清自己的话语策略，同时试图准确地定位急剧扩散的陈述方式在社会生态和政治经济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尤其是在发展相关性时空

理论的第八章中，除了以极高层次的抽象来处理形而上学问题，我没有其他选择。基本概念并不容易产生，并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版序言中评论的那样，已经出现的困难并不容易克服。他进一步说：

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我希望，这些攀登山路的人都能够像我一样发现光辉的顶点。

15

并非所有的历史和地理条件都会抑制新的思考方式的产生。我应该感谢使我完成自己工作的那些特别有利的条件。首先是大学生活的巨大便利，以及合作教学课程，那使人们能够向那些在不同领域工作的特别优秀的人学习。我要感谢 G. A. Cohen、Andrew Glyn、Neil Hertz、Bill Leslie、Kristie McClure、Emily Martin、Erica Schoenberger、Erik Swyngedouw、Katherine Verdery、Gavin Williams 以及 Reds Wolman，他们提供了一种对话机会。大学生活另一个同样难得的事情就是可以与许多特别有才华的研究生们共事，他们不懈地努力使我接受一些要不然我可能会深深抵触的事情。当我不能够接纳他们所说的每一件事情时，他们无疑会因为挫折而沮丧，但我的工作却由于他们的作用而得到无限加强。这里我所包括的有牛津大学的 Clive Barnett、Maarten Hajer、Argyro Loukaki、Andrew Merrifield、Adrian Passmore 和 Mike Samers，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 Felicity Callard、Lisa Kim Davis 和 Melissa Wright。这几年来，我一直能够在各种研讨会、会议和研习班中发表观点，对此我表示感谢，他们中有很多人在这些场合中以坚决而又公正的问题和批评回应我。这里提供的一些材料同样也已经在一些书里和杂志里出版过（部分或全部），我所得到的许多编辑意见也很有益。与 BBC 的 Sallie Davies 就一系列广播规划的合作也被证明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经历。我的一些亲密的同事和朋友经常会在各种时候查看我进行中的工作并发表意见，我想要感谢

Kevin Archer、Patrick Bond、Mike Johns、Vicente Navarro、Ric Pfeffer、Bertell Ollman、Erica Schoenberger、Erik Swyngedouw 和 Dick Walker。我特别要感谢 Neil Smith，当进展不顺利，最终完成的前景很暗淡时，他以耐心的鼓励挽救了整个计划；还有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的 John Davey，感谢他对这个研究计划的耐心、鼓励和强烈兴趣。这么好的同事和朋友无疑确保我工作的顺利进行。最后，我要把所有的爱献给 Haydee 和 Delfina，有了她们我才可能探索各种思考和感受的方式，这些方式比我曾经希望获得的要显得无比丰富。

第一部分 导 向



TWENTY YEARS ON?

AMERICAN TOURIST. "PARDON, ME, SIR, BUT CAN YOU PUT ME WISE TO THE NAME OF THIS THRIVING INDUSTRIAL BURG?"

Mr. PUNCH. "I REGRET TO SAY, SIR, THAT THIS IS OXFORD."

[A Trust has been formed to protect the beauties of Oxford and its environs, and has appealed for a sum of £250,000 to purchase the land required for this purpose. Donations should be sent to the account of the Oxford Preservation Trust, Barclay's Bank, High Street, Oxford.]

第一章

战斗的特殊主义和全球抱负

一 地方的战斗性和研究计划的政治学

1988年，定居牛津不久，我便卷入一个探讨该市罗孚汽车厂命运的研究计划。牛津被想象为一个由最高梦想和雄伟大学组成的城市，对外乡人尤为如此。不过，晚至1973年，大学还不到3000名雇员，与之相比，位于牛津东部考利的汽车工厂则雇佣了27000名左右的工人。20世纪初，在这个老式城市社会结构中，莫里斯汽车厂的建设对地方政治和经济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里，社会主义意识的形成几乎精确地经历了《共产党宣言》描述三个阶段。多年以后，工人稳定地在工厂及其附属装配地点的内部和周围集结起来，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利益并且创建了组织（主要是工会）来捍卫和增进这些利益。20世纪30年代、60年代以及70年代早期，汽车厂多次成为某些影响英国劳资关系未来的最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中心。工人运动同时以地方工党形式创造了一种有力的政治手段，1980年以后，地方工党最终获得了对地方议会的持续控制权。但是，到1988年，合理化改革和裁员使工人减少到10000名左右；到1993年则至少5000以下（与之相反，大学雇员在那时则达到7000左右）。最终关闭工厂的威胁不再遥远。

1993年下半年，我与特里莎·哈特尔编辑出版了《工厂和城市：牛津考利汽车厂工人的故事》一书，具体描述了那里的情况。1988年在

20 那里发生了抗议关闭工厂的运动，为支持这个运动，我们展开研究工作，那本书就是最终成果。那时，英国宇航公司(BAe)通过一项秘密的私有化交易从撒切尔政府手中得到了罗孚汽车公司。它立即宣布关闭部分工厂并进行合理化改革，因此，资产剥离甚至彻底关闭的前景就迫在眉睫了。牛津的土地价值是很高的，而且拥有雄厚流动资金的BAe在1989年兼并了一个擅长建造商业区的资产管理公司(阿灵顿公司)。人们担心，为了把牛津的土地空出来从事获利更大的项目，生产将会转移到伯明翰的隆布里奇，或者更坏，移至斯温顿某个不承认工会的新开发区(在那里，本田公司已经同罗孚汽车公司签订了一个合作项目)。那些新项目几乎不会给这个数千人的社区带来任何就业机会，而他们已经在汽车厂服务了许多年。随后发生的BAe把罗孚汽车公司出售给宝马(BMW)的事件(同时阿灵顿公司保有那块空地)表明那些担心并非空穴来风。

讨论抗议关闭工厂运动的最初会议吸引了来自各方的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研究小组，评估正在发生的事件以及BAe进行任何生产转移可能对全体工人以及牛津经济产生的影响。牛津汽车产业研究计划(OMIRP)就这样形成了，并且我同意担任主席。不久之后，工厂的工会领导撤回了对运动和研究的支持，并且市议会的多数工党成员也跟着这么做。因此研究就留给牛津理工学院(现在是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少数独立研究者，他们受助于来自工厂的持不同意见的工人代表和来自考利的前工厂工人。

因为个人原因，我并不热心于运动，最初在研究上也没有花很多精力。我只是帮助宣传其成果并为研究计划调动各种资源，工会领导和多数地方工党成员积极地阻止该计划——围绕工厂的未来和选址问题，他们与BAe正在进行“慎重谈判”，在此过程中不希望有任何“捣乱”。碰巧，OMIRP印制了一份宣传手册——《考利工作》，此时，BAe正在进行新一轮合理化改革，计划将削减一半工人和腾出一半土地用以再开发。工厂的历史、抗议斗争的故事以及后来发生的动态在那本书中都有详细的描述。

特里莎·哈特尔，OMIRP 的协调人，在 1989 年接受了圣彼得学院的一个研究职位，她把考利的历史、失败的抗议运动以及抵抗公司资本专制行动之动员工作的政治难题综合起来出了一本书。这本书推动并形成了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工作小组。每一位撰稿人就他们最熟悉的主题写一章(或数章)内容。每一章写好后都由其他人审读和评论，反复几轮直至达成最后的结论。部分为了使这本书对预期的出版商产生更大的吸引力，我同意与特里莎·哈特尔共同主编这本书。这意味着，除了承担一章的写作，我还得花大量时间与哈特尔一道来编辑，为确保它有完整的覆盖面而设计一些新的章节，在保持各部分内容独立性的情况下也使它们成为一个整体。

21

这本书是一份吸引人的档案。它把完全不同的立场——从不知名的来自工厂的工人代表，到在牛津东部工作或者长期生活在那里的人，以及学者、计划者和独立左派——集中在一起。各章的语言也完全不一样。源自工厂经验的激进声音与学者们的抽象判断形成对比，例如，来自社区的看法不同于来自生产线的视角。在前言中，我们强调，完全不同的立场和风格正是本书独特魅力所在。

在初期，撰稿人之间政治视角和解释的巨大差异就十分明显。起先，大家都把差异拿出来磋商；为了与整本书的其他部分保持统一，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越过差异的雷区。这样，困难就在做结论的时候产生了。我建议做两种结论，一个由哈特尔做，另一个由我来做，以便读者更好地把握政治差异并让他们自己来判断。不过，这个建议被拒绝了。因此，我根据许多研究成员提出的不同观点起草了一个结论。那个结论草案成功地引爆了几乎每一种在写作过程中拿出来协商的地雷。事态变得极端紧张和困难，有时我和哈特尔之间也产生很深的对立，整个小组围绕我们两个人产生了两极分化。

在激烈的争论过程中，我记得在圣彼得学院的一次午餐会上，哈特尔挑衅性地要我解释自己的立场。她非常清楚自己站在哪一边。他们都同战斗中的工厂工人代表站在一起，那些工人不仅在最骇人听闻的条件下劳动，而且每日里都在努力从反动工会领导手中夺回控制权，从而

为社会主义争取更好的基础。与之相比，她把我看成一个自由漂浮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并不会对任何人产生特别的忠诚。那么，我究竟站在哪一边呢？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问题，并且自那以后我不得不严肃地考虑它。当时，我争辩道，尽管对那些仍然被工厂雇佣的工人的忠诚是重要的，但是在牛津东部还有许多人，他们丢掉了工作或者没有希望找到工作（例如，异化的和不满的青年人，他们中就有人玩飙车，使整个社区被当作罪犯对待，并受到警察的压迫），他们也应该得到平等机会。我一直注意到哈特尔把我对社区政治的关注当成类似于以怀疑主义眼光看待工厂政治的那种力量。我进一步认为，当围绕工厂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团结已经明显地衰落，甚至面临消失的威胁时，在这种条件下，就应该探讨社会主义在牛津的未来。这意味着，必须把各种力量广泛地联合起来，既支持工厂工人，又长久地坚持社会主义事业。我也认为，为了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运动发动不起来，我们应该和过去的事件保持一种批判性距离，做不到这一点才是背叛。哈特尔拒绝支持那些听起来像是对运动战略进行批评的言论，同样拒斥那种不把工厂车间发生的争取权力的斗争作为自己基础的视角。

所有各种其他问题也使我们分成不同的派别。例如，日益恶化的工作条件使人们很难毫不含糊地赞同这种立场：即使因为缺乏合理的替代选择使捍卫短期工作势在必行，也要长期维持那些实际上是“狗屎的工作”。在此，问题不是使短期行动屈从于长期幻想，而是认识到，当短期的迫切要求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目标时，坚持一种长期道路是如何困难。我同时注意到英国以及整个欧洲汽车产业的那种难以置信的生产能力过剩。必须在某个地方采取某种行动，必须发现某种方法来保护工人的一般利益，同时又不会陷入反动的“新现实主义”政治，从而破坏官方的工会政治。但是，在阐明那种一般原则时，应该跨越什么样的空间呢？英国？欧洲？世界？在调整汽车产业生产能力问题上，我至少赞同欧洲范围的视角，但是在受到压力时，我发现要证明停留在那个规模上的合理性也很困难。同样也存在着必须考虑的重要的

生态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源自工厂本身（例如，油漆工厂就是臭名昭著的污染源），而且来自生产的本质。使罗孚汽车工厂暴富并因而使得生态恶化，这完全不能成为长期的社会主义目标。如果有机会，牛津北部传统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也很有可能会利用生态问题来彻底地摆脱汽车工业。我认为，即便这一点很明显，也不能回避生态问题。时间范围和阶级利益难题需要公开辩论而不是掩盖。更进一步说，尽管我决不是为 BAe 的骇人行为进行辩护，但我确实认为有必要指出：在 1992 年最初几个月里，公司损失了三分之一股市价值，并且在 1990 年的地产崩溃后，它在地产市场上捞上一把的希望也落空了。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对公司行为（例如 BAe 公司把转向地产投机作为一种替代性生产方案）进行新形式的公共或社区控制，从而避免合理化改革^①的痛苦历史（诸如罗孚公司 20 世纪 70 年代在英国莱兰地区所进行的那种灾难性的合理化改革和工作结构调整）。

我认为，在结论中，不讨论所有这些问题，那才是对社会主义观念的背叛。需要立即补充说明的是，这并非因为我相信它们能够被解决，而是因为它们打开了一个内含在这本书材料之中的讨论地形。这种结论将保持一种开放的选择自由，帮助读者在一种广泛的可能性地形中思考积极的选择，同时也恰当地注意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但是，即使哈特尔部分同意这些观点的长期意义，她也认为讨论它们将弱化当前的直接斗争——维持在考利的工作和阻止它们向斯温顿不承认工会的新开发区转移。在她看来，只有当工人和进步工会代表在工厂中重新获得力量和权力，才可能关注我所提的这些问题。

23

问题非常清楚了，我是在不同层次上使用不同抽象概念来操作的。但是，运动、研究和那本书的动力都不是来自我。它源自工厂战斗性工会传统的奇特力量。这种传统具有自己的国际主义理解和普遍真理的假设，尽管这也可能陷入这种情形：由于相当狭隘的托洛茨基式修辞，它面临着自己的困境并相当僵化，这种困难与我和哈特尔视角之间

^① 原文为 nationalization，显然是 rationalization 之误。——译者注

的更为根本的冲突差不多。不过，把问题描述成宗派主义也是不对的。因为纯粹基于工厂来看问题与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政治视角之间总是存在着对立。我不会放弃自己的信念：不假思索地把源自工厂的总体社会变革的预期模式向外拓展，这种政治在根本上是有缺陷的。对战斗的考利工厂工会代表来说是对的和好的东西，对城市也是如此，进一步推而广之，对全社会也是如此，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如果社会主义一定要打破其地方限制，并且作为一种可用的生产和社会关系模式成为有效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那么必须考虑其他层次和种类的抽象观念。但是，对于那些长年在一个地方以一种特殊方式生活和劳动的人来说，要说服他们采纳一种由多种抽象概念指导的政治学，同样存在着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应该运用何种层次和什么样的抽象概念呢？忠于某种抽象概念而不是具体的人，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其他一些问题隐含在这些问题之中。是什么构成了知识优先的主张？我们又如何借助于完全不同的物质条件下基于极为不同的抽象水平得以构造的不同知识来判断、理解、裁决和协商呢？

二 雷蒙德·威廉斯和抽象政治学

24 这些问题使雷蒙德·威廉斯深深着迷，不时地在他的著作中出现，因为一些不久便会明了的原因，这些问题在他的小说中比文化理论中得到更好的阐述。必须说明的是，在此，我的目标不是把威廉斯塑造成某种道德楷模。实际上，我接受这种批评意见，即他越是接近于被称为“文化整体论”的立场——这种立场认为，文化必须被理解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而社会实践则必须被解释成“持续的社会物质过程之不可分割要素”——他也就越靠近有关社会秩序的有机论观点；由某种“感觉结构”塑造成一种“总体的生活方式”的“社区”，对于局外人来说必然是排他性的，并且在某些方面对局中人也是压迫性的。

萨义德(Said, 1989)和吉尔罗(Gilroy, 1987)的批评性介入有力地指出了局外人问题的困难,后者指控威廉斯与都市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共谋,因为他所处的那种“感觉结构”与工人阶级对大英帝国的支持直接联系在一起。纯粹的有机论观点使得调查文化构型中的多重压迫和统治力量同样地困难。威廉斯对性别问题的关注远远不够,一般来说,这一点是得到公认的,例如,他感觉自己的小说比理论作品更严格地处理了诸如此类的问题。罗曼(Roman, 1993)同情地和建设性地批评威廉斯在某些时候似乎陷入了混乱,威廉斯同时基于女性主义和在种族上更加敏感的视角既创造了机会又带来了危险,这种混乱是很典型的。或者,如霍尔评论的那样,威廉斯抱着“活生生的经验”不放,这导致他接受了一种相当“经验主义的经验观念”(Hall, 1989:62),就好像把日常经验作为理论构造的直接基础不成问题似的。威廉斯在这一点上的沉默甚至使某些人得出了我相信是错误的结论,如斯内德克就认为,除了赋予葛兰西霸权观念一点点新的和稍微有点不同的生机外,威廉斯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论贡献(Snedeker, 1993)。然而,如斯内德克承认的那样,在此存在着一个不能否认的矛盾:尽管威廉斯存在各种各样的缺点,但“因为对女性主义的、第三世界的和工人运动的反霸权的强调,他在当代文化研究中的影响仍然十分强大”(Snedeker, 1993: 113)。

对威廉斯在政治和文化上采取的有争议立场,我并不准备捍卫或者系统地批评[参阅伊格尔顿(Eagleton, 1989)编辑的文集,进一步讨论参阅德沃金和罗曼(Dworkin and Roman, 1993)相关著作]。但是,我要指出他的著作的两个极为重要的特点,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那么多的最尖锐批评者会发现自己经常绕到他的阐述中去。第一点涉及他用来阐明自己概念的辩证方法。请看下面叙述:

多数描述和分析,通常以过去式来说明文化和社会。这种把经验直接地和规则地转化成已经完成产品的做法,是认识人类文化活动的最大障碍。在自觉历史中——在其中,人们最终能够根据某些假设把许多活动理解为已经完成——那些可以作为进程

加以辩护的东西，习惯上不仅设想成不断变化着的过去实体，而且被设想成当代生活，在其中，通过这种进程模式，我们仍然主动地卷入其中的关系、制度和形式被转换成已经成形的整体而不是正在形成和能成形的过程。因此，分析总是聚焦于这些已经产生的制度、形式和经验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今天，就如在那种已经产生的过去之中，只有固定的清晰的形式存在，并且在定义上，活生生的当下总是模糊不清。（Williams, 1977:128—129）

威廉斯并没有摆脱创造陌生概念的倾向，例如把“已经成形的整体”看作高于“正在形成和成形的过程”的概念。不过，在这一段文字中，他确实表明一种很强的辩证解读偏好，把过程放到比物优先的地位上，因此，任何有机论的观念，如共同体，必然会因为对维持它的复杂之流和过程的认识而淡化。在此，威廉斯绘制了一张理论可能性的地形图，在其中，持续地挑战了把人与人之间关系还原成概念之间关系的做法，就如同，通过聚焦于创造、维持和瓦解过程，我们能够保持对各种关系、制度和形式的生动理解。

第二点是，政治行动“嵌入”[当代社会学家（如 Granovetter, 1985）喜欢这么用]人类学家所称“私密文化”（Lomnitz-Adler, 1991）的方式既能产生力量又是成问题的。但同样可以得出结论，不理解政治和理论为什么嵌入其中，不理解社会生活为什么成为私密的，我们也不能理解自己求助的抽象。在此，对威廉斯的某些陈述进行研究是十分有益的，因为他在自己的全部著作中既运用了又系统地质疑了嵌入性和私密文化观念。在下文，我将特别关注威廉斯把环境、空间和地方作为框架概念的方式，那些框架概念帮助定义了这些观念的可能意义。

三 小说是环境史

用你的手指慢慢地靠近长满青苔的沙岩。由于这种石头和草地，由

于这种红土,这个地方得到人们的认可,被人们反反复复地改良。它的产生不同寻常,但所有这些都是突然出现的。(*People of the Black Mountains*, Vol. 1, p. 2)

威廉斯最后一部未完成小说的开头部分就这样结束了。故事发生在公元前 23 000 年,跨越了多个巨大的环境和社会变迁时期。例如,第二个故事被安排在公元前 16 000 年冰河期一个包围黑山的巨大冰域的边界上。接下来的一幕发生于农耕、书面语言开始形成,物质和社会环境在人类活动作用下发生变迁的其他关键时期。这样一种虚构的描述深深扎根于跨越许多学科的研究所确定的物质现实,对较早时期的重建极大地依赖考古学、古生物学和环境史(第二卷结尾部分提供的资源列表实际上非常广泛),而较后时期更多地依据经济、社会和文化史学家的著作。一幕一幕过去了,在那块土地上跋涉和奋斗的人被想象成生活。

26

英国最杰出的社会思想家之一,在其最后创作的虚构作品中,为什么会去写黑山的社会和环境史?

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可能存在于威廉斯的一贯立场,他认为社会存在物不可能逃避他们在自然世界的嵌入性,一种政治行动的观念不可能在最后不提供包含那种事实的抽象观念。“自然”是威廉斯的一个关键词——或许是“语言中最复杂的一个词”(Williams, 1983b:219),因为这个词“包含着大量的,虽然常常被忽视的人类历史观念和经验……当其他的观念和经验变化时,它既复杂难懂又不断变化”(Williams, 1980:67)。因此,研究环境史以及不断变化的自然概念,就为探寻和理解社会和文化变迁提供了一种优越的和有力的方式。威廉斯把社会和环境辩证地解释成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无论如何,对环境那一面的仔细考察一定会使某些可能被忽视的特点突显出来。他的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始终要保证,劳作(或者他在其他地方称为“生计”)——被宽泛地理解为同时创造生命和文化的活动——是基本过程,在其中,人类同自然世界的关系以及对这种关系的理解得以建立。“当我们说及人们把自己的劳动浇灌到土地之中,我们就处在一种人与自然的新关

系的整体世界之中，并且把自然史与社会史割裂开来的做法也就变得问题重重了”（Williams, 1980:76）。特殊的社会关系总是与把劳动注入土地的新方式联系在一起，这样一种辩证的创造性见解并非威廉斯独有。例如，它回应了马克思恩格斯如下观点，“只要人类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因为“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Marx, 1967: 27 173）。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 1983:13—14），当代创造与众的历史之不同环境形式运动的老前辈，也提出相似的观点：

动态地和变化地看待环境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把它视为一种容易产生矛盾的过程，一种生态学的历史就开始了。而且，它假设两者之间的互动是辩证的。环境或许最初赋予一个人在特定时刻有效选择的范围，但是接下来，文化重新塑造环境以回应那些选择。重新塑造的环境为文化再生产提供新的可能性，因此建立了一种新的相互决定的循环。必须同时根据**社会关系和生态关系**的变迁来分析人们创造和再创造他们生计的变迁。

但是，黑山的环境史并非只是在地方进化的东西。小说记录了移民和殖民浪潮，这种浪潮把黑山历史置于一种空间性的母体之中，那是由在欧洲及其之外涌动的流和运动建构的。独特性，或者威廉斯所称“地方的甜蜜”，在一个地方设计并建立起来的时候，是受到外在干预和影响的。作为复杂的社会和环境变迁过程之不可分割要素，地方、空间和环境这三个主题在这本与众不同的小说中紧紧地交织在一起。

为什么选择小说作为揭示这些主题的工具？他为什么不直接写一部环境史，或者充分发掘自己利用的那些丰富的原始材料？我想，这两个理由。

当小说中的核心角色反省自己的知识和见解时，第一个理由就清晰地展开了。在《黑山人民》（*People of the Black Mountains*, Vol. 1, pp.10—12）中，格林——通过他，过去的声音和故事历史地呈现出

来——就反省过那个地方的学科知识：

但是，在这些学科中建立起来的各种研究具有它们自己的缺点……它们会把那些正在研究的东西还原成一种内在的程序；最起码，还原成一种封闭经验的材料。如果要认真地考察生活和地方，则完全需要一种对生活 and 地方的强大情感。聚苯乙烯模式及其文本的和理论的等价物与它们重构和模拟实体的不同……在图书馆的书和地图中，或者在山谷的房子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历史，基于共同的证据和理性的研究，这一历史可以在任何地方翻译出来。然而，他只是不得不向群山继续前进，追寻一种不同的精神来坚持己见：倔强的土著和本地居民，奔向一种更广泛的共同之流的彼岸，在那里，触觉和呼吸代替了记录和分析；不是作为叙事的历史而是作为生活的故事。

在威廉斯的小说中，这是一个常见的主题（它预示着历史科学从叙事向故事形式转移）。在《边远的乡村》中（*Border Country*, p. 10），马太·普雷斯就是差不多的例子。像威廉斯一样，他是来自威尔士乡村一个铁路信号员的儿子，上过剑桥大学，但在小说中成了伦敦教授经济史的大学讲师。在研究 19 世纪威尔士人口迁移时陷入了困境。资料很全面，但总感到有缺失： 28

我所学到的技术具有冰块那样的可靠性和精确性，如果保持特定温度的话。但是，我实际上并不能保持一种温度：箱子的门大开着。这完全不是从格林玛威到伦敦的人口迁移，而是一种实质性变化，当他们离开自己的村子时，就像一定要这样似的。分析这个问题的办法不只是超出了我的学科知识。它们存在其他某个地方，我能**感觉到但抓不住，能够触及但不能掌握**。（黑体字引者所加）

这里含义足够清晰，并且使威廉斯本人的著作充满力量。关注活生生的民众生活，小说形式使他能够运用其他手段不能处理和掌握的方法来描述这些生活的日常品质。因此，一方面威廉斯坚持他的小说不能同文化理论分割开来，另一方面他也坦率地承认，他发现自己用小说比理论著作更容易揭示某些主题(Williams, 1989a:319)。

但是，在选择小说形式的背后，还有另一个理由。他试图强调揭示下述观念的方法，即在特定条件下做出的个人的和特殊的选择正是历史—地理变迁的本质。许多分析性思维方式常常受困于封闭性，但小说却并非同样如此。总是存在着选择和可能性、永远无法克服的张力和差异、感觉结构的微妙转换，所有这些必定改变辩论和政治行动的条件，即使在最困难和紧迫情况下亦是如此。威廉斯十分赞赏布莱希特的戏剧。他说，布莱希特发现了“制定真正替代方案的方法：并非如传统戏剧那样用不同的人物来体现不同的选择，而是用同一个人来体现，这个人时而用这种方式时而用另一种方式来生活，最终让我们自己做出评判”(Williams, 1961:157)。这意味着“不存在强制性解决方案——张力在那里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等待我们的思考。”威廉斯创造的全部重要角色都生活在这种张力中。黑山人民的故事也正是如此。从政治上来说，威廉斯借此能够提醒我们注意这些人的在场方式，他们依靠自己的选择和生活方式而“全都历史地在场”。他的目标是通过赞美过去的生存力量和能力而在今天获得力量。不过，还存在着其他的问题：

29

我父亲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和铁路工人，他死后，我处在一种危机之中。我无法向人们恰当地解释这种危机，或许我在小说《边远的乡村》中部分地解释了，这是一种价值观失败的感觉。或许这是一种不合情理的反应。确实，他死了，他死得太早，但人总是要死的。不过，到最后，不把他看成是一个牺牲品是难的。我想，正是这种经验使我回到自己正在写的历史小说，《黑山人民》讲述了威尔士某个地方的很长时期的历史运动。这一历史记录

了失败、侵略、牺牲和压迫……。当我们看到降临到那些人——他们是我的祖先——身上的事，几乎都不能相信……失败反反复复地发生，因此我通过小说努力去揭示一切东西能够保留下来的根本条件。它不是简单的具有爱国心的答案：我们是威尔士人，我们仍然在这里生存。它是无限的弹性，甚至是狡计，凭借这些东西，人们设法在极度不利的条件中生存下来，还有**令人震惊的多样性信仰，他们以此表现自己的自主性。一种克服多种不同形式的压迫而维持自己的价值感……一种根深蒂固的和不可毁灭的，然而同时是变化着的共同生活可能性的体现。**（Williams, 1989a:321—322）[黑体字引者所加]

威廉斯赞美的那种嵌入性是人类的能力，人作为社会存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实践中，把共同价值的**可能性永恒地扎根于令人震惊的多样性信仰之中，并不断地培育这种可能性。**无论如何，维持这种共同价值至关重要地依赖某种在特殊地方建立的人与人之间关系。

四 空间和地方的辩证法

那么，人们在黑山创造了什么东西呢？“被接受、创造和再创造的”正是**地方**。但是，对于威廉斯来说，“地方”意味着什么呢？这不是他的关键词之一（尽管“共同体”在其著作中通常被赋予受地方限制的内涵）。然而：

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必须以“**地方**”为中心。人们牢记的论点是，无产阶级没有祖国，不占有把它与有产阶级区分出来的那些要素。但是，因为国际经济的爆炸性增长和老式共同体非工业化的破坏性后果，地方已经成为联合过程的至关重要的因

素——对无产阶级或许比占有资本的阶级更重要。当资本流动时,地方的重要性就更清晰地显现出来。(Williams, 1989a:242)

30 就这一情况来说,工人阶级政治行动首要地嵌入在“地方”。无论如何,在他的小说中,地方的意义变得特别清晰。创造和瓦解地方的过程——与已经成形的实际地点的实体相比,这又是一个辩证的观念——是行动的积极要素。但是,地方的构造不可能从变化中的空间关系样态中抽象出来。这个原则在《黑山人民》中反复重申,它也深刻地体现了对《乡村和城市》那难以置信的丰富的文学分析之中。在《边远的乡村》的罢工情节中,它甚至更加生动:那些分布在铁路沿线——货物和信息便是沿着这些铁路流动的——的威尔士乡村,它们的政治意识由于南威尔士矿工罢工而改变,只是在最后被来自伦敦方面的决定背叛了。在一篇论述1926年总罢工的文章中(Williams, 1989a: 105—106),威廉斯清晰地表明《边远的乡村》的那些情节只是在与他父亲很长的谈话后才形成的。因此他这样来反思问题的结构:

乡村车站的这些人都是产业工人和工团主义者,他们是一个属于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小团体。他们所有人,像我父亲那样,仍然保持着与农业生活的亲密联系……同时,正是因为铁路以及电报和电话,他们才成为现代产业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由于铁路,从城市、工厂、港口和煤矿开来的火车经过这里;电报和电话对于信号工特别重要,这些信号工通过它们在广泛的社会网络范围内同其他信号工建立联系,在工作之余同他们实际上可能永远不会相遇的人交谈,通过声音、观点和故事,他们相互之间都很了解。

罢工情节说明了某种特殊的東西在那个地方是如何形成的——在这个例子中,这种特殊的東西是阶级意识和对真正的替代方案的可能性(这个词总是潜伏在威廉斯全部讨论的边缘)的理解。这种可能性是通过将某种源自外部的动力内化到特殊的地方和共同体而实现的。外部动力如

何转化成地方性的“感觉结构”便是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虚构的格林马威和真实的潘地所发生的十分特别的事情(他提到,罢工把共同进步的前景提升到“一种异常实际的逼真性程度”——《边远的乡村》,第153页)使社会主义具有意义,因此也使得其来自远方的背叛悲剧具有特殊的破坏性。

但是在此存在着一股逆流。罢工失败后,摩根·普罗梭,一个充满活力的领导,开始经商,并最终成为山谷里最大的商人,只是在最后被公司资本收买了。摩根说:

实际上,这个地方完了。从现在开始,重要的不再是田地、山川,而是道路。不再有村庄,作为一个地方独立存在的村庄。只有一个你经过的名称,沿路而筑的房子。那就是你将生活、思考的地方。在一个路边。”(*Border Country*, p.242)

尽管摩根总是表示,如果发现另一种真正的共同改良方案,他愿意放弃自己的商业道路,但他却无情地推行那种观点,即唯一的选择是,要么在地方“定居”并接受可能发生的一切,要么把那些能够从外部力量获得的东西内部化,并将之运用于特殊的、个人的或受制于地方的利益。

在《为马诺特而战》中,这种资本主义价值在地方的内在化甚至更为明显。彼得·欧文,一位激进社会生态学家,他被委派去调研在威尔士马诺特乡村河域附近建立一个新城镇可能有什么影响,他说:“实际的历史隐藏在那些嗜血中心的背后:伯明翰—杜塞尔多夫轴心,在伦敦、布罗塞尔、巴黎和罗马都有办公室。”一位叫吉文的当地居民抱怨道:“总让我产生分裂的是这种来自外部的金钱。”(*The Fight for Manod*, p.140)当土地公司秘密交易传闻大白天下的时候,我们看到无情的资本主义如何深深地腐蚀了那个地方的每一个人:

公司。接着是距离,马诺特乡间小道之间距离的日常显著

性,吉文、艾弗、特里弗、葛西印以及其他人的全部直接问题:从他们到这个公司花名册之间的距离,但同时关系是那样地固定,那样地不可更改。交易正好发生在他们身上,不只是源自外部的力量,而且是他们正与之斗争的力量,他们现在成了这些力量的一部分。然而,这仍然是一种对他们漠不关心的力量,自顾自地运转。(*The Fight for Manod* , p.153)

对于马太来说,接下来发生的是更加痛苦的现实:

如同这些农民正在马诺特所为,追求那些似乎是我们自身利益的东西,并非反对[这个过程]而是成为它的一个部分;是它在当地的再生产。

所有这些都尖锐地提出了与空间密切相联的政治身份难题,正是在那种范围中,政治思想和行动才是可能的:

“这是汤姆·莫尔里格,”彼得说。“他生活在拉尼德洛伊斯或者欧洲,我不记得到底是哪儿。”汤姆·莫尔里格笑了……

“他下不了决心,”彼得说,“要么宣布凯尔特人民的直接联邦,具有名誉上的巴斯克成员资格,要么简单地接管欧洲,建立他们在小山中虚构出来的这种新社群社会主义。”

“随便哪一种,”莫尔里格说,“或者第三种可能性:让我们的一个人加入区议会。”(*The Fight for Manod* , p.133)

交流的幽默隐藏着一种难以置信的张力。这里证明,在马诺特发生的外部力量的内部化至关重要地依赖一个农民在区议会有权了解在其他地方制定的计划。一种辩证的方法定义了对空间中地方的忠诚,不可能脱离这种特别的辩证方法来决定政治行动(以及小说中的行动)的相关地

方和范围。在这种忠诚中，对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过程进行抵制以及与之共谋，我们将总是在这两者之间发现特殊的张力。

五 社会主义政治学的地方

威廉斯试图把“地方”更直接地融入社会主义理论中。在此关键词是他所称的“战斗的特殊主义”。因为它抓住了有关社会主义历史和前景的某种非常重要的东西，我将对此予以特别关注。威廉斯(Williams, 1989a; 249; 115)的反思如下：

工人阶级自我组织唯一的和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它试图把特殊斗争和一般斗争以非常特别的方式联系起来。作为一种运动，它已经开始实现那个乍一看很特别的主张：捍卫和增进特殊利益——把它们适当地集合起来——事实上就是一般利益。

由一个地方积极的团结经验塑造出来的理想最终一般化和普遍化为对全体都有益的新社会形式的运行模式。这是威廉斯用“战斗的特殊主义”所表明观点，并且他将之视为在英国深深地扎根的进步社会主义历史之中的东西，同时也是“威尔士历史的最有意义的部分”。概括这种观点并不困难，即使威廉斯并不情愿放弃作为自己思想之根本基础的实际地方的特殊性和专一性。毕竟，法国大革命提出了“人权”学说；国际工人运动提出了为了全人类利益向社会主义的全球转型；美国的民权运动阐述了一种普遍的种族公平的政治学；当代女性主义和生态运动的某些派别提议将其战斗的特殊主义作为广泛的社会重构的基础，那种重构对我们全体都有利，要不然就是拯救我们大家。

威廉斯似乎建议，如果不是全部形式，那也是许多形式的政治战斗都扎根于战斗的特殊主义(比如我在考利所遇到的那种争论)。但是困难在于：

因为它开始是地方的和积极的,并且假设自己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地从地方的和共同体的经验向更普遍的经验扩展,所以它总是对那些阻挡自己前进的相当系统的障碍重视不够。(Williams, 1989a:115)

- 33 只有通过抽象观念,它们能够正视直接的地方经验不能理解的过程,我们才能理解这种障碍。困难正在于此。从实际的团结——这种团结被视为在情感的和可知的共同体中组织起来的社会生活样态——转向一套具有普遍目标的更加抽象的观念,这种转移包含了从一种依附于地方的抽象层次向另一种有能力穿越空间的抽象层次的运动。在那种运动中,必定会丧失某些东西。威廉斯沮丧地写道:“否定政治学、差别政治学和抽象分析政治学必然会流行。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它们现在甚至对于理解正在发生的事都是必需的。”甚至语言也开始变化,从诸如矿区中的“我们的共同体”和“我们的人民”向大城市中的“组织化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和“大众”这些词的转变。在大城市里,抽象观念受到最激烈的辩论。(Loyalties, 293)

从一个概念世界、抽象层次向另一个转换,可能威胁到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这些目标和价值为在特殊地方形成的战斗的特殊主义提供了基础:

这是我最悲哀的发现:我自己身上……也产生了那种最要命的帝国主义形式。也就是说,你的思想的某些部分被一种观念系统、感觉系统所支配,这些系统确实源自权力中心。正是在你自己的意识中,正是在被压迫和被剥夺的共同体中,存在着那种统治中心的思维和感觉的再生产要素。……如果否定的政治学是唯一的政治学,那么它就是一种思维模式的最终胜利,对于我来说,那种思维模式似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终产物。无论具有什么样的政治标签,它都是一种思维模式,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

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或概念之间的关系。(Williams, 1989a:117)

不同层次和种类的抽象之间的张力——个体为了理解他们与世界的关系而必然诉诸的那种张力——在他的小说中特别生动，常常被内化到主角的冲突情感之中。在《边远的乡村》中，马太在更大的世界中叫他父亲取的名字，但是在格林玛威，他总是被称为威尔。这种身份的双重性——他到底是马太还是威尔呢？——贯穿于整部小说。陷入那种双重性中，就几乎不可能发现用来说话的语言：

他习惯于那种分离状态：始终抽象的和一般化的语言支撑着他。那种分离在另一方面也是真实的。他感到，在这所房子里，既是一个孩子又是一个陌生人。他不能以其中一种身份来说话；根本就不能真正地作为自己来说话，而只能根据这种状态所提供的条件来说话。(Border Country, p. 83)

那种张力甚至通过对熟悉景象的回忆而流露出来：

34

把它的景象记在心里是一回事儿，就像他所做的，在任何地方，没有一天不是这样，只要闭上眼睛就重新看到它，他的唯一景色。但是，站在那里观察现实就是另一回事了。它至少很美；土地的每一个细节都比得上它过去的活力。它不是静止不动的图像。它不再是一处风景或景色，而是人们正在利用的山谷。观看的时候，他认出那些消逝的东西。人们利用了山谷的景色，但是忘了它的成果。游客看到了美：一个他生活、工作和交友的地方。远远地，他闭上眼睛，他过去一直这样看山谷，但是像一个游客、一本旅游指南那样看它：这个他已经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山谷。(Border Country, p. 75)

对于威廉斯来讲，“游客的凝视”和地方的生动生活之间的区别是至关重要的。生动的生活和依附它的价值感深嵌于环境之中，而环境是由工作、游戏和更广泛的文化实践所积极地塑造和完成的。在《边远的乡村》的环境氛围和《黑山人民》的更清晰的环境史之间存在着很深的连续性。只是在前一本小说的结尾，马太/威尔能够集合起来，以协调不同的感觉结构和知识，前者产生于主张自己在黑山自由发展的意识，后者通过“聚苯乙烯模式以及它们的理论等价物”而获得：

现在好像放逐结束了。不是回家，而是感觉到放逐的结束。因为距离被确定了，那就是问题所在。通过确定距离，我们回家了。（*Border Country*, p. 351）

同一种双重性在威廉斯的小说中反复重现。不同抽象层次之间的斗争，对地方特殊性的与众不同的理解和在更广泛领域中融入这些理解所必须的抽象之间的斗争，以及把战斗的特殊主义转化成在资本主义世界舞台上的更加实质性东西的权利，所有这些要素都成为了矛盾和张力的中轴，这使小说的故事情节更加有力。《忠诚》至关重要地开启了这种张力，较之他的理论著作，威廉斯在这本小说中更加深刻地考察了政治困境。

六 忠诚问题

《忠诚》的故事开始于1936年威尔士矿工与剑桥大学学生在威尔士一个农场召开的会议，这个会议旨在探讨西班牙反法西斯主义斗争道路。在会上，极具艺术才华的威尔士女孩内斯塔与上层阶级出身的剑桥大学学生诺曼产生了短暂的激情。他们明显不同的地位，既是自然方面的又是社会结构方面的，就直接作为问题出现了。她坚持认为，丹尼卡普尔这个地方养育了自己；而他则宽厚地认为，那因此一定是个

好地方，不过另一方面又劝她不要固守那儿。她在那里度过自己的余生——妇女总是嵌在一个养育她而她要继续养育的特定地方，而那个男人，则回到了国际政治密谋和科学研究，那是更加世界主义、国际主义和表面上无根的世界。虽然两个人在邂逅之后便再也没有重遇，但小说还是以格温这个人物延续了他们之间的张力，格温是处在不同阶级和性别位置上的两个人的非婚生子，其中一个受地方的严格束缚，另一个则在空间上具有更广泛的活动范围，他们结合的基础是那种主要由共产党定义的所谓共同政治。就像《边远的乡村》中的马太·普雷斯，格温把张力内在化了：他生长在内斯塔的故乡，最后去剑桥做研究。这部分由于诺曼妹妹的坚持，她在培养同格温的家族联系方面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而诺曼则极大地忽视了那种联系。

束缚于地方的政治源自威尔士阶级联合和性别关系的经验，这与学者和党的领导人提出的抽象观念完全不同。应当注意，这种差异并非乡土观念与普遍主义之间的差异。矿工伯特最终娶了格温的母亲，并因此成为他的实际父亲，他同工人和学生一道参加了西班牙的战斗。有个在剑桥大学同诺曼很熟的学生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伯特得到了他的双筒望远镜（一种象征性的视界？），他在临终之际把它交给了格温。伯特同样也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宣传为“反法西斯主义的最后战争”），并且在诺曼底负重伤，这使他永久性地破相——伯特为国际主义奉献的记号永久性地烙在了身体上。

诺曼，格温的亲生父亲，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他以不同的方式忠于党和事业。诺曼或许是以伯吉斯、麦克林、费尔比以及伯伦特为原型的（他们是剑桥小组成员，该组织是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的代理人），作为一个有造诣的科学家，他担任着向共产党国家传授科学知识的任务。在冷战世界里，当良心指示另一条道路时，是否维持在一个时代具有意义的忠诚，这个问题便使他痛苦，陷入长久的精神折磨之中，并产生了内在的精神创伤。有趣的是，威廉斯并没有责备诺曼，尽管伯特临终前的痛苦判断有力地谴责了这些“阶级逃兵”——“他们利用我们……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应该自己干。”格温重复了这个判

断——诺曼和他的同类是最糟糕的，“因为他们背叛了应该成为选择的東西：他们自己的工人阶级政党，他们的社会主义”。

但是，格温与诺曼最终的愤怒对峙，类似于他妈妈内斯塔对他的那种异乎寻常的爆怒。当时，她把两张珍藏的素描肖像给他看，一张是金发优雅的年轻诺曼，另一张是已经去世的伯特，伯特的素描像是战后回来画的，那张像“比任何人像都要恐怖，那张已经被损害的脸好像仍正被撕裂着”。格温被深深地打动，但他唯一能够说的却是后一张肖像“很美”：

她愤怒地盯着他。她的脸和身体似乎因为突然的痛苦而扭曲了。他不知所措，因为他甚至从没有看到过她平时发过怒。她总是如此自制、恬静和讨人喜欢，看起来总是比她实际年龄更年轻，冷静和略微有点孤僻。

“它不美！”她咆哮道，以一种骇人的声调。

“妈妈，求你啦，我不是那个意思，”格温争辩道。

“你懂什么？”她尖叫道。“你懂个屁！你还乳臭未干呢。”

“妈妈，我的意思是——”

“它不美！”她再度大哭。“它很丑。它毁了！它是被撕裂的人肉！”

“是的。是这样的。不过，事实，你看事实是——”

“它是丑的，它是丑的！”她尖叫着，完全失去了理智。（*Loyalties*, 347—348）

威廉斯所言的感性、“感觉结构”的激烈冲突说明了一切。在此，难题不仅仅是社会主义政治的世界观得以建构的那种抽象层次，而且是依附于不同抽象层次的非常不同的感觉结构的层次。正因为伯特的肖像能够以一种基本真理捕获和表现毁容的可怕，格温获得了将之视为艺术品和美好事物的那种距离。然而，对于内斯塔来说，它不是具有重要

意义的再现，而是正在被再现的东西；它带来的绝对痛苦始终是根本的和基本的。

因此，对任何批判性距离的研究所带来的困难，我们现在看得更清楚了。例如，在《边远的乡村》中，马太/威尔喜欢爬附近的那个叫做凯斯翠的山，从高处欣赏风景。看着养育他的地方成为一个“小点”，他知道它：

不只是一个地方，而且包括人。然而，从这儿看，好像没有人生活在那里，没有人曾经生活在那里。可是，静一来，它便成了他自己的记忆。……虽然山有抽象和净化的魔力，但最终他不能留在这里：他必须回到他生活的地方。

然后：

37

在下山途中，幻象渐渐消隐，日常身份又回来了。他脑海中的声音渐止，日常声音重新响起。就像老布莱克利，用他的拐杖点着草地，问他：你要读什么，威尔？书，先生？恰恰不是。历史，先生。凯斯翠的历史，你坐在那里看着记忆流逝，越过整个山谷。那就是它的意义：去看，去解释，去澄明。风儿吹眯你的眼睛，留在你那里的就这么多，它决定着你的所见和观看方式。除了看，什么也别做。你将发现，你正在看的恰恰是自己。（*Border country*, pp. 291—293）

但是，在此，并不只是不同再现运行于其上的那种抽象的层次才是至关重要的。由不同认识方式决定的抽象种类也很重要。威廉斯的论证中存在着两极化。在一个相当不同的文本中（Ingold, 1993:41），英格尔德描述了世界景象的对立，一方面是包围我们的球体，另一方面是我们立于其上才能凝视的地球：

与全球相比,地方并非有限的或狭窄的理解视野,地方依赖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解模式而不是对世界分别进行孤立和中立的观察,那个模式建立在积极而感性的与环境斗争基础之上。在地方视角中,世界是以一个特定地点为中心的球体……从这种经验的中心出发,在探求知识或理解的时候,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会不断深化。

伯特和内斯塔似乎总是从他们的中心地点——丹尼卡普尔——向外延伸,然而,诺曼在履行其政治义务过程中总是试图以一种更加超然的方式来理解世界。格温把这两种视角都内化了,并因此处于思想和感觉的冲突之中。然而,威廉斯似乎在说,较之那两种抽象,我们不可能离开那种必然依附它们的冲突性再现模式。威廉斯试图定义两种对立视角之间互补的甚至辩证的关系,虽然我认为他明显站在自己感觉最适宜的那一边。他反复地强调,我们绝不应该忘记被压迫人民现实生活经验的残酷丑陋性。我们不应该在生活之外把那些活生生的现实美化或理论化为痛苦或愤怒的感觉。这样做会减轻甚至丧失对非正义和剥削的直率愤怒,这种愤怒激励着人们为社会变迁进行斗争。例如,应该用内斯塔的愤怒来对待“真就是美”这种俗套话。

38 因此,忠诚问题由阐发政治问题的那种抽象概念的层次和种类同时来定义。作为一种情感和情绪性政治力量,忠诚总是附属于某种确定的感觉结构。威廉斯全部小说中个性最丰富的那些角色,正是把冲突性忠诚内化到完全不同感觉结构之中的人——《忠诚》中的格温、《边远的乡村》中的马太·普雷斯以及《第二代》中的欧文·普雷斯。威廉斯借助小说来揭示这种张力也并不意外。布莱希特式战略随处可见,这暗示着,张力永远不仅不可能解决,而且我们绝不应该指望它们得到解决。永久性地保持它们的开放性,完成进步社会变迁所必需的创造性思维和实践也就获得了首要源泉。

这生动地说明了许多人都必须认识到的一个难题。不仅在威廉斯这样从英国国立学校到剑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身上,而且更为直接地在

考利计划的竞争性政治中，我都认识到这一点。那我忠诚什么呢？威廉斯的警告是有益的。当我们从一个抽象层次或认识论向另一个层次转换的时候，不仅在思想中而且在行动上，背叛的可能性都赫然存在。考利汽车厂持不同意见的工人代表或许会不友好地指责我是“阶级的逃兵”，就如《忠诚》中的伯特一样的口吻。有意思的是，哈特在结论中插入了不少来自工厂工人代表的强硬词句：“背叛是一个过程，不是一种个人行动，并且它并非总是有意的。”尽管评论并不直接针对我，但明显地却是根据我们的讨论做出的。

不过，背叛是一个复杂且痛苦的说法。让我们回到《忠诚》(Loyalties, 317—319)这部小说。下面是诺曼的好友在格温面前为他进行的辩护：

“背叛自己的组织，这种真正的背叛是存在的。但是，只要看看敌友的变化，阶级敌人和盟友在国际和国内的变化，你就会认识到，这种可定义的量是如何地不断变化的。在阶级中存在着背叛国家的人，在国家中存在着背叛阶级的人。比起我们来，生活在忠诚相对稳定的时代中的人们是多么幸运啊。”

“不只是在时代中，也在地方中，”格温说。

无论如何。诺曼从事的是具有完全不同参考领域的科学研究。这必然导致：

高度专门化领域中的动态冲突。至关重要的是，通过不平衡，防止其达到那种格外危险的阶段：凭借自身逻辑，超越民族和阶级，超越我们所知的全部忠诚。或许，在最后，除了对人类的简单忠诚。

当然，考利案例并没有涉及这样的时刻。在《忠诚》的结尾有一个实现那种联系的次要办法。诺曼被允许不失尊严地退休，他买进了大批

39

木材储备起来以图发展。面对格温对他的谴责，说他在阶级上背叛了“共同生存的道德”，那种道德为诸如丹尼卡普尔这样的地方的战斗特殊主义提供了基础，诺曼辩解道：

你辜负了你所说的我的阶级，除此而外，你实际上正在滥用知识和理性。附带说一下，此时，对我们来说，社会就是形成各种主张。因此，对社会主义来说，既有好的主张也有错误的观念。幸运的是，我们已经开始纠正它们，这就是能做的一切。在理性和科学上，我们此刻的责任不是所谓社会主义，而是保护和拯救地球。然而，在你所称的乡村伙伴中，这样重要的东西还没有影子。实际上，那正是他们所欠缺的东西，也是他们的无能，然而，你却要我去那样做。因为无知、短视和偏见在我们的乡村同伴中存在，我就应该忠于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的乡村同伴正参与对地球的破坏，我就应该默许和纵容这种行为？因为传统的顾虑，我就应该这样做；因为说同一种语言、居住在同样的危岛上，我就一定要继承共同的无能、共同的无知？实际上，你倡议的又是何种道德呢？

格温的回答相当尖锐：

你过去怎样看待共产主义，你现在怎样看待自然，只不过是投你所好东西。对其他人来说，每一信仰都是真实的，这个事实只不过让你来欺骗他们。（*Loyalties*, 364）

当然，《忠诚》中的争吵并没有结束。我认为威廉斯主张争吵永远不会结束。在一种规模、一个地方形成的忠诚和特定感觉结构，不可能轻易地保持，也不会轻易地转化成使社会主义在其他地方或整体上成为切实可行运动所需要的那种忠诚。在转化行动中，会丢掉某些重要的

东西，留下一种具有永远不可克服之张力的痛苦残余。

七 忠诚、身份和政治义务

承认这一点将产生令人不悦的政治反思。让我来完整地描述一番。英国社会主义事业一直受到战斗的特殊主义所激励，威廉斯描述了它在威尔士的存在，我也在考利直接遇到了。我相信，无数历史证据可以支持那种论点。最近出版的《在阿巴拉契亚的抵抗》(Fisher, 1993)敏锐地记录了美国的情况。但是，这种战斗的特殊主义——如英国工党曾经做到的那样，即使它们能够集成成一项国家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深刻的保守性，因为它们依赖固定的社会关系和共同体团结模式，即忠诚，它是在某种压迫的和不被注意的工业秩序中形成的。虽然所有权可能变化(例如，通过国有化)，但是矿山和生产线却必须保持不变，因为它们是深嵌于特殊地方和共同体的社会关系状态和阶级团结机制的物质基础。因为不可能轻易地彻底改变，也不能抛弃旧有的生活和工作模式，社会主义政治便产生了自己的保守性——它必须首先让煤矿开业，并不惜代价让生产线保持运转(经历20世纪60和70年代英国连续几届工党政府产业政策的混乱)。在考利，是应该继续维持汽车厂中那种不断增加的压迫性工作，还是在某种相当不同的以及生态上更加敏感的生产体系中努力争取不同的、更好的、更健康的、更满意的工作？在一种软弱且没有替代方案的时刻，考利的斗争必然聚焦于前一个目标，但我明显地感到，即使从长远来看并在最佳条件中，斗争也总是为了那些车间人，为了那些强烈地充满着与工厂工作紧密相联的“战斗的特殊主义”的工人。

还有另一种描述方式。在某地以某种方式发挥作用的那种压迫性工业秩序中形成的政治和社会身份，在那种秩序崩溃和彻底变化之后，它们是否会继续存在？我更喜欢的直接答案是“不”(并且我认为有大量的证据可以支持这一结论)。如果情况是那样的话，那么保持这些政

40

治身份和忠诚不变便一定会使产生它们的压迫条件的万世永存。因此，工人运动或许会使产生它们的压迫条件永恒化，或者回到这种状况，就如同那些在男性暴力条件下已经获得自我感的妇女会反反复复地重新回头与那些施暴的男性共同生活。

在此，那种相似性是具有教育意义的。如许多女性主义者充分证明的，以及许多妇女表明的那样，打破既定模式、摆脱依赖性是不可能的。工人运动同样既能保持一种革命冲动，又在变化了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中获得新的政治身份。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需要大量的细致工作。威廉斯在讨论生态问题时清晰地认识到了这种困难：

41 简单地对南威尔士的矿工们说，他们面临的是生态灾难，这是没用的。他们已经知道这一点。他们生活在其中。他们已经生活在其中多少代了。他们在自己的肺上记录了这一点……但是你不可能仅仅对那些在生活和交往方面依赖某种生产的人说，这一切已经变了。你不可能只是说：摆脱有害的产业，跳出危险的产业，让我们做得更好。大事小事都得协商、通过公平的协商来解决，那才会稳稳当当地前进。（Williams, 1989a:220）

在协商之路上，最终有一种担心：社会主义政党和政府将只是成功地破坏为它自己提供土壤的那种社会的和政治的身份与认同（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欧相当多的证据能够支持这种主张）。可以证明，社会主义总是在否定它自身政治认同的物质条件。但是，恰好，资本主义在过去 20 年里又偶然地排除了传统意义上为社会主义政治提供基础的“战斗的特殊主义”——矿山关闭了，生产线削减或关闭了，船厂不复存在了。因此，我们或者采取哈特尔对我说的那种立场——牛津社会主义的未来取决于在迂回考利的汽车工厂里争取工作机会的斗争（一种我不接受的观点），或者我们不得不在新旧两种“战斗的特殊主义”形式之间寻求新的结合，从而为一种相当不同的社会主义政治观点提供基础。无论如何困难且面临什么问题，除了后一条道路，我看没有其

他选择。这并不必然抛弃那些“新社会运动”的阶级政治，但是需要探究那些能够重构并更新阶级政治联盟的不同形式。实际一点讲，牛津的阶级政治可能在考利工厂完全关闭之后继续存在，但只是其提供一种新的基础条件下。

所有这一切还存在另一个维度，它与空间规模与时间范围有关。在前一个问题上，尼尔·史密斯最近指出，在学习协调和连接社会理论和政治行动的不同空间规模时，我们干了一件蠢事。他强调当代社会主义建构的核心混乱源自“对规模问题的广泛失语”：

地理规模理论——更准确地说，地理规模生产理论——非常不发达。实际上，不存在有关地理规模的社会理论，更不要说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了。然而，它在我们物质生活的整体地理构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Neil Smith, 1992:72—73）

作为一种社会体系，资本主义不仅已经控制了谈判，而且经常通过它的阶级斗争形式积极地操纵这种规模困境。这特别符合它对不平衡的部门和地理发展的偏爱，以至于推行在不同规模上定义的地方之间的分裂式竞争。但是，“地方”在何处开始，又在何处结束呢？是否存在着这样一种规模，在其边界之外，“战斗的特殊主义”不可能获得稳固的基础，更别说维持？对社会主义政治来说，难题在于发现回答这些问题的方法，当然不是给出一劳永逸的答案，而是定义在不同种类与层次的抽象之间进行交换和翻译的模式。

42

八 关于结论

我最后让哈特尔为《工厂与城市》写了结论。毕竟，那本书主要是她努力的结果。结论读起来很古怪。孤立地聚焦于重新掌握工厂控制权的斗争，这种宽泛的“工人主义”主张由于生产能力过剩、共同体

事务以及环境等问题的提出而在各处都得到了改善。因为它没有能够识别任何生产性的内部化张力，结果是奇特的。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在此有一个机会，不是结束争论，而是运用材料对事件本身进行反思并从中学习，从而打开讨论和辩论的领域。我忍不住把《工厂与城市》与斯蒂芬·费歇尔《在阿巴拉契亚的抵抗》中提出的更有思想性的结论进行比较，那本书是一个文集，它记录了阿巴拉契亚发生的斗争和冲突事件，从整合各种主张这个角度来说，这两本书有很多相似之处。这种比较主要聚焦于那种张力：一方面是以阶级和工厂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另一方面是新大众社群主义视角。

我认为，我们的失败有助于解释威廉斯为什么诉诸小说来揭示困境。在文化和政治经济研究中，我们似乎经常被迫寻求的那种封闭性，能够更容易地以小说的形式进行经常反思，一旦“距离得到测量”就可能达及某种和谐状态，就如在马太·普雷斯身上发生的那样。在那本有关考利故事的书中，二元结论保持了问题和选择的开放性，保持了生动的张力，同时突显了不同层次和种类的抽象问题。

综上所述，在完成那本有关考利故事的著作后，再读威廉斯《第二代》，我相当震惊。这本小说在1964年出版，差不多以那个时候的
43 天津为背景。它围绕那两方面之间的张力展开，一方面是以大学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在汽车厂内部竞争的政治。开始的段落为解决一个分裂城市中的社会主义政治难题做好了准备：

今天，如果站在**城市公路的中间**，你可以看两个方向：西边是教堂和高校的尖顶与塔楼；东边是汽车厂的工地和工棚。你看到两个不同的世界，但是在它们之间却不存在边界；只有单一城市的运动和交通。（*Second Generation*, p.9）

凯特·欧文，工党的一个地方组织者，也是某个工厂工会领导人之妻，她一直在那种冲突中难以抉择：一方面是对家庭和社区的忠诚，另一方面则是性自由，它的诱惑力来自以大学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之中阶级界线

的另外一边。彼得·欧文，她的儿子，同样深陷这种苦恼。他正在牛津的某个大学里攻读工业社会学博士学位，而同时在考利发生的工厂暴力斗争正在耗尽他父亲的身心。威廉斯在其他地方展开的全部主题——关于可能获得并掌握的有争议的知识——在此都丰富地发展了，包括“感觉结构”之中阶级和性别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们深嵌于不同地方形成的社会主义政治。

在有关考利计划的那本书中提出的许多实质性问题，实际上都在《第二代》中出现了，尽管并没有答案。如果我读《第二代》不是在介入考利研究之后而是之前，我的理解或许会不一样。一方面，我会坚持保持结论开放性的布莱希特战略。但是另一方面，我会更关注威廉斯的指示：大事小事都得协商、通过公平的协商来解决，那才会稳稳当当地前进。(Williams, 1989a:220)

九 评估和可能性

“空间”、“地方”和“环境”这三个词包含了地理学家们的大部分工作。多年来，在地理学上围绕它们的含义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在激进杂志《对立面》上面)，例如，忠诚和地方如何以及为什么就重要，如何恰当地考虑地方和空间的关系。(例如，参阅 Agnew and Duncan, 1989; Cooke, 1989, 1990; Massey, 1991; Pred, 1984; Smith, 1987; Swyngedouw, 1989, 1992a)并且，在争论过程中，抽象的层次和规模问题被反反复复地提及(参阅下列著作: Cox and Mair, 1989; Cooke, 1989; Duncan and Savage, 1989; Horvath and Gibson, 1984; Merrifield, 1993; Swyngedouw, 1992b; Smith, 1990, 1992)。但是地理学家并非唯一处理诸如此类事情的人。最近几年，给地方、空间和自然赋予含义已经成为社会、文化和文学理论辩论的至关重要事情(例如，参阅 Carter et al. 1993)，——当然，地理学家们参与了这些争论。(参阅 Bird et al., 1993; Gregory and Urry, 1985; Keith and Pile,

44

1993)一方面是似乎突然浮现的全球资本主义文化,另一方面是以特定地方为基础的各种保守的同时也具有潜在进步性的“战斗的特殊主义”,再加上重申一种表面上严重的全球环境恶化的威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部分地推动了这些关注和兴趣。但是,这些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威廉斯推动的文化研究传统的急剧膨胀所引起的,它强调感觉结构、价值、嵌入性、差异、反霸权话语的特殊性以及对立群体构造的社会关系。

威廉斯大量地涉及空间、地方和环境问题,并且显而易见,他也困扰于让这些问题在文化理论和社会主义观点中发挥作用的方式。空间、地方和环境的变化既不是中立的也不是无辜的,它们同人类的统治和控制实践相关。实际上,它们是根本性的框架结果——在其中充满着多种可能性——它决定着生命赖以生存的条件(常常是压迫性的)。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不可能总是让这些问题悬在那里。而且,如果不是不可克服的张力,那么这些斗争就必须把某种反思性加以内化,从而关注各种层次和种类的抽象。它们必然包含这些抽象,将之作为自己实践的有用工具的有机组成部分。

威廉斯主要在他的小说中关注和重视空间、地方和环境,这一事实无论如何暗示着,在把这三个概念工具引入文化理论的核心时,他有点犹豫不决,如果不是完全不情愿的话。然而,结论并非不可能把空间、地方和环境并入社会和文化理论,而是理论化实践必须向这种结合所需要的可能性及其困境开放。通过这种方式来理解威廉斯,并且将其小说和批判的文化理论视为互补,我们就能确定一个理论化的领域,这个领域远比许多重要的当代文化理论家们所想象的要丰富许多。理论绝非纯粹抽象那回事。理论实践必须被构造为持续的辩证关系,一边是活的生命的“战斗的特殊主义”,另一边则是为获得表述全球抱负所需要的足够的批评性距离和客观公正态度而进行的斗争。把威廉斯的著作视为一个整体,这种提问方式足以普遍地实现自身的目标。它指明了下列做法至关重要的意义:建构一种对空间、地方和环境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理解,并且将这种理解作为文化和社会理论的彻底基础。

这种规划的风险是很高的。如果找不到将之嵌入空间、地方和环境之物质性的方法，我们就不可能用理论来干预日常政治实践的世界。这种嵌入不可能通过狭隘的比喻性的和唯心主义的暗示来实现(例如，当福柯求助“异托邦”这个空间概念，将之作为一种激进行动的领域，这种情况就在他的著作中发生了)。在下列章节中，我希望提供一种唯物主义框架，来分析空间、地方和环境并将之整合到社会过程理论以及实际政治的研究中。

45

第二章

辩证法

46 雷蒙德·威廉斯采取虚构的“可能世界”来处理复杂的地方、空间和环境问题。对他的文化理论来说，这是必然而非偶然的特点吗？在本章，我试图揭示这种运动决非必然。我希望表明，饱含辩证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能够把空间、地方和环境（自然）主题整合进社会和文学理论。大多数文学和社会理论在过去都没有严肃地采纳这种计划，而且多数涉及和求助时空、地方束缚和环境隐喻的做法也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例如阿尔都塞的“知识大陆”，詹姆逊的“认知图绘”，福柯的“异托邦”，以及一系列冠以“想象的地理学”、“文学空间”等名称的研究）。如史密斯和卡兹指出的那样，把空间、地方和环境（自然）作为一种方便的比喻来使用，以及将之作为历史地理现实整合进社会和文学理论，好像是两种不同的做法（Smith and Katz, 1993）。我亦希望表明，这样一种理论规划不仅会改变理论地形，而且会打开政治可能性地形。

这条道路的第一步是寻求辩证的基础。当然，威廉斯深受辩证思维方式的影响。让我们再一次考察这一段落：

多数描述和分析，通常以过去式来说明文化和社会。这种把经验直接地和规则地转化成已经完成产品的做法，是认识人类文化活动的最大障碍。在自觉历史中——在其中，人们最终能够根据某些假设把许多活动理解为已经完成——那些可以作为进程加以辩护的东西，习惯上不仅设想成不断变化着的过去实体，而且被设想成当代生活，在其中，通过这种进程模式，我们仍然主动

地卷入其中的关系、制度和形式被转换成已经成形的整体而不是正在形成和能成形的过程。因此,分析总是聚焦于这些已经产生的制度、形式和经验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今天,就如在那种已经产生的过去之中,只有固定的清晰的形式存在,并且在定义上,活生生的当下总是模糊不清。(Williams, 1977:128—129)

不过,在处理地方、时空和环境问题时,威廉斯并没有或者可能没有在其文化理论中直接运用这种思考模式。就这种问题来说,他并非唯一的一个。在地理学和社会科学中,辩证推理技巧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所以缺乏对地方、空间和环境问题的辩证研究并不令人惊奇。不过,在文学理论中,辩证思维方式在最近几年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这部分地归功于下列思想家影响力的复苏: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阿尔都塞、福柯、利科、德里达和许多其他受惠于欧洲哲学传统的思想家。当文学理论向社会理论渗透的时候,一个剧烈冲突的舞台就形成了,一方面是广泛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另一方面是现象学、解释学和辩证法传统。因此,很可能对辩证地建构的论证进行非辩证的解读。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结果却是广泛的曲解。例如,在地理学最近的历史中,邓肯和李(Duncan and Ley, 1982)对辩证著作的笛卡儿式和实证主义的解读就对辩证法的一般理解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可能是故意的)。所以,我认为,重要的是,尽可能简单地设计辩证法的一般原理,揭示其认识论和本体论基础并通过例证演示其对社会、地理和文学理论的界面上的可能作用方式。

需要首先指明,存在着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它们要么是非辩证的,要么敌视辩证法(如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全部辩证思维传统也绝非马克思主义一家(虽然其起源至少可以追溯至古希腊,但受到莱布尼茨、黑格尔、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极大影响)。此外,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对辩证法的理解也存在着分歧,如由怀特海、大卫·波姆及许多当代生态学家(如奈斯和卡普拉)提出的“过程哲学”和“有机论”路线,这些思想与马克思的辩证法具有某种亲缘关

系。比较一下上述威廉斯的引文和下列怀特海的段落(Whitehead, 1985:90):

自然是进化过程的结构。实在是过程。问红色是否真的,这是没有意义的。红色是现实化过程的因素。

48 或者波姆的下列段落(Bohm, 1983:48):

把现实理解成过程,这是一种相当古老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赫拉克利特,他说万物皆流……我认为有关过程观念的本质是由陈述方式给定的:不仅每样事物都变化着,而且全都是流。也即是说,尽管所有物体、事件、实体、条件、结构等都是能从过程中抽象出来的形式,但事情(*what is*)就是生成过程本身。

接下来比较一下奥尔曼(Ollman, 1993:11)对马克思立场的说明:

通过以“过程”和“关系”的观念代替有关“物”的常识观点——过程包含着自身的历史和可能的未来,而关系则包含着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与其他关系的联系——辩证法重构着我们有关现实的思考,它把现实解释成具有历史并与他物具有外部联系的某种东西。

在下文中,为了说明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有更广泛的参考框架,我有时会采取与上述相似的思考方式。因此,当我试图站在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时,我将适当地注意作为整体的辩证法的丰富性。

一 辩证法原理

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马克思都绝不会去制定辩证法原理。因此,

理解他的唯一途径是追随其实践。这表明，把辩证法还原成一系列“原理”或许会弄巧成拙。辩证法不是物而是过程，此外，它是这种过程，在其中，心和物之间、思想和行动之间、意识与物质之间、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笛卡儿式二元分裂都不再有立足点。例如，辩证法是有关现实本质的本体论陈述还是理解自然的方便的认识论，围绕诸如此类问题长期存在着争论，但从上述立场来看，这种争论就如心物之间笛卡儿式分裂一样是虚假的。然而，争论本身并非没有意义。奥尔曼指出，围绕何物构成“辩证的论证模式”的争论，就是围绕如何对我们日常生活所遭遇之现象进行抽象而展开的争论。制定辩证法原理就是为进一步研究打开话题，为如何进行那些抽象提供初步的讨论。当然，在马克思之前，有黑格尔的逻辑和方法作为先例，如果不对此进行仔细研究，他就既不能达到《资本论》体现出来的辩证实践，获得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世界的概念性抽象工具，也不能清晰地阐明自己的政治战略和实践。

49

制定“辩证论证的原理”就像回到作为马克思主义先驱的黑格尔。“回去”是必要的，但只是前进到行动地带的一种手段，如马克思示范的那样，原理本身在那个地形上消失在理论和政治实践之流中。在此，我并非重提黑格尔的特殊表述，而是试图尽我所能简单地概述辩证法的某些基本主题，它们不仅蕴含在马克思的实践中，而且能够从最近几年反思辩证法的理论家那里提取出来。

辩证法的原理可以用如下 11 个命题来概述：

1. 辩证思维强调对过程、洪流、潮流、关系的理解优先于对要素、物、结构和组织化系统的分析。上述引文已经相当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这种观点包含一个深刻的本体论原则，要素、物、结构和系统并不外在于或优先于创造、维持和破坏它们的过程、流和关系。例如，在我们当前世界里，资本（商品和货币）以及人员之流产生、维持或者破坏着诸如工厂、邻里和城市这些被理解为物的地方。在认识论上，探究过程通常颠倒这种强调：通过观察在我们看来首先是自明之物的属性，或者观察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最终理解过程。我们通常通过研

究诸如工厂、邻里和城市这些既存实体之间的关系来调查货物、资金和人员之流。同样地，牛顿并没有从重力开始，而是从苹果、他的脑袋、地球和月亮开始。不过，这种方法实际上仅仅让我们比较在同一时刻处于不同位置的实体之间关系的状态（一种称为“静态比较”的褊狭方法）。以此为基础，我们或许会推断出导致状态改变的与过程有关的某些东西，但是实体自身是不会变化的，这种观念很快使我们处于一种因果的和机械的思维方式之中。然而，辩证推理主张，当其达及对世界的抽象、概念和理论说明时，这种认识论状态便会发生颠倒。这便把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通常研究的自明的物之世界转化成为表现为物的更为扑朔迷离的关系和流的世界。例如，让我们来看看“资本”的定义。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那里，它通过被定义为某种价值的生产性资产（一系列物），从其中能够产生一种服务之流。但在马克思的定义中，资本被建构为既是价值的循环过程（流），又是包含在这些流中的资产股本（类似商品、货币和生产机器的“物”）。至于工人，他们深陷于那种过程（作为生产的输入和最终产品的消费者），所以他们亦成为“资本”的“附属物”和特殊表现（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可变资本”）。“货币”类似地呈现出各种“似物”的形式，但是那些“物”（如硬币或者计算机屏幕上的条目）只有根据使它们有效的社会生产和交换过程来理解才具有意义。脱离支持它的持续性作用的过程，货币将毫无意义。

这种思维方式比我们通常认识到的更加普遍。例如，量子理论面对的是同一实体（如电子），但它“在一种环境下表现为波，而在另一种环境下表现为粒子”（Bohm and Peat, 1987:40）。因为物质（类似于物的物质）和能量（流）是可以交换的，所以我们不能把任何一方优先作为排他性的研究焦点，否则会陷入严重的误解和谬见。因此，电子同时表现为“物”和“流”。然而，物理学家却花了许多年时间才认识到这两种概念并非不可兼容或相互排斥。只有克服这种障碍，现代量子理论才可能开始成熟。同样地，社会科学家经历了许多困难才抛弃了奥尔曼所称的“常识观点”——洛克、休谟和其他人建立的哲学体系，这

种观点认为，“一方面是物，另一方面是关系，任何一方都不能包含在另一方中”（Ollman, 1993:34）。

2. 要素或“物”（如我所称）产生于在特定领域发生作用的流、过程和关系，该领域构成有结构的系统或整体。结构化系统以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单个物，它们的辩证概念完全建立在对过程和关系理解之上，借助这些过程和关系，物和结构化系统才得以构造。这个观点在直觉上并非自明的，因为我们总是处在“物”的包围之中，这些物似乎具有永久的和固定的特点，很难想象它们是流动的。因此，我们不能轻视怀特海（Whitehead, 1985:137）所言“永恒”之物的意义——我们每天会遇到无数的“实际上不灭的物体”，离开它们，物质和生物生命可能不再如我们现在所知的那样存在。但是，他进一步指出，甚至如埃及金字塔那样的长久而坚固的东西也是由处于运动中的物质所组成的。辩证法迫使我们总是去追问自己所遭遇的每一件“物”和“事件”：它是由何种过程构造的，又是如何得以维持的？

3. 在辩证思想看来，由于它们是由多种过程建构的，许多研究者视为不可还原的并因此不言而喻的“物”和系统是一种内在的矛盾。对社会理论来讲，我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个体的。对于某些严格的研究来说，这种假设完全是合理的。但进一步研究表明，我是由各种过程创造的一个相当矛盾和成问题的“物”。我的身体包含了诸如心、肺、肝脏和消化系统等多种维持生命的器官，“这些器官的功能差不多是自动的，并且由下述事实决定，即身体……处于内在的自我重构的永恒过程之中”（Ingold, 1986:18）。使那种内在的自我重构持续进行的新陈代谢过程需要与环境 and 不断变化的过程进行交换，后者对于维持身体的个体性是必需的。如果过程变了，身体不能相应地变化，结果就是死亡。我的社会性（例如，语言和符号技能的获得）同样是通过我获得某种存在于社会过程之中的能力而创建的。这些能力的持续性重建（例如，有关智力和符号技巧）是这样一种过程，它如我的生命一样持久（我们都知道，“身手敏捷”或“反应迟钝”是什么意思）。以这种方式来描述物质并非是把“物”（或系统）看成一种外在过程的被动产物（我

51

当然不会以那种方式来看待自己)。生命系统之不平凡的东西是它们获得弥漫的(并且常常是高熵)能量或信息流的方式,以及将其集合到复杂然而秩序良好的(低熵)形式中的方式。此外,人类个体具有一种以创造性的而不是被动的方式来获得和重组能量与信息流的不平凡能力。但是,他们这样做决非挑战那个本体论假设,即“物”和系统从过程之中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如威廉斯小说中的地方)。

4. “物”总是被假定为“在每一水平上都是内在地异质的(即矛盾的)”(Levins and Lewontin, 1985:272)。这是从前面两个命题中推论出来的,不过值得清晰地阐明。在此,讨论四个主要观点:

52 A. 任何“物”都可以分解成为其他“物”的集合,这些“物”之间相互保持着某种关系。例如,一个城市可以被视为同其他城市联系在一起“物”,但是,它同样可以被分解成邻里或地区,后者亦可依次被分解成人、住房、学校、工厂等等这些可以无限(*ad infinitum*)分解的东西。无限这个条款十分重要,因为它表示,对于任何有关世界如何运行的理论重建来说,不存在不可还原的“物”之基石。由此断定,在同一分析水平(如城市)上看起来是系统的东西成了另一水平(如世界城市的全球网络)的组成部分。这种观点在当代量子物理学中已经变得十分重要,该理论认为,根本性原则是“无论我们说一个物或结构是什么,它都不是”,因为“总是存在着比我们所说更多的或者不同的东西”(Bohm and Peat, 1987:141—142)。如莱文斯和莱温廷(Levins and Lewontin, 1985:278)。所言,“不存在根基”,因为经验表明,“所有预设的不可分解的‘基本单位’迄今为止都变成可以分解的了,并且分解打开了新的研究和实践领域”。研究“每种层次的组织而无须研究基本单位”,这是合法的。在解构的辩证法中得到认真探讨的另一种含义是,所有固定和僵化的范畴都是可以分解的。人文科学中的批评实践今天已经广泛地或许过度受到下列研究兴趣的影响,即:在社会语言和再现实践之流和冲突领域使固定的范畴丧失确定的意义。

B. 如果所有的“物”都由于构造它们的复杂过程(或关系)而是异质的,那么我们理解物之质与量属性的唯一方式就是理解内在于它们的

过程与关系。奥尔曼在建构关于内部关系的论证时已经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点(Ollman, 1976)。不过,在今天,这些论证是由许多生态学著作提出的(参阅 Echersley, 1992:49—55; Naess, 1989:79; Zimmerman, 1988)。我们能够理解“物”之(矛盾的)质和量属性的唯一方式是理解构造它们的和内在于它们的过程和关系。除了通过内在于我的新陈代谢的、社会的和其他的过程,否则就不能理解作为个体的我。无论如何,这暗示着,我必然使异质性以及一系列关联在一起的矛盾内在化。在此,我们是根据奥尔曼使用这个术语的意义来理解矛盾的,它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内在关联的过程的统一,那些过程同时相互支持和破坏对方”(Ollman, 1990:49)。这是怀特海在如下段落中刻画的情感,他喜欢“事件”这个词总是胜于物,因为它捕获了相关的动态:

内部关系概念需要本体概念,作为行动,把各种关系综合进它外存在特点。因为它本身是多种关系的统一,事件是它所是之物。(Whitehead, 1985:155)

[在此也比较一下,莫里斯·威尔金(Maurice Wilkins, 1987)对微生物学以及其他科学和创造活动领域中有关补充原则作用的讨论]

C. 然而,这种论点有一个限制。作为一个个体,实际上我并没有把宇宙万物都内在化,而是通过与那些在相对有限的领域(我的生态系统、经济和文化等)内发挥作用的过程之间的关系(代谢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等),主要吸收那些与我直接相关的东西。无论如何,这个系统并不存在着固定的或先验的边界。我的相关环境开始和终结的地方本身就是与我相关的生态、经济和其他过程的功能。此外,相关性依赖于我自己的活动(拿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来讲,与我的呼吸相关的大气,依赖于我是否整天待在户内、在乡下做一次远足或者飞往洛杉矶)。

D. 因此,在提出概念、抽象和理论的时候,给空间、时间、规模和环境设置边界就成了主要的战略性考虑因素。这些边界的任何实质

性变化都将彻底地改变概念、抽象和理论的本质，这是常见的情况。在地理学中，我们常常会遇到由生态关联的不同规模所致的以悖论形式出现的难题。在下文中，我们将频繁地遇到这种规模难题。

5. 空间和时间既不是绝对的也不外在于过程，而是偶然的并包含在过程之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空间和时间(以及时空)，它们包含在物理、生物和社会等不同过程之中。这些过程全都生产——用列斐伏尔的术语——自己的时空形式。过程并不在时间和空间中发挥作用，而是积极地建构它们，并且通过这种方式为它们的发展定义出与众不同的规模。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将是本书第三部分讨论的主题。

6. 部分和整体相互构成对方。“部分创造了整体，同时整体创造部分”(Levins and Lewontin, 1985)。这是吉登斯在有关构成理论著作中提倡的原则(行动创造了结构，同时结构创造了行动)，并且这当然也是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则。说部分和整体相互构造对方，不只是说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反馈循环。在获得那些存在于与我相关的生态和经济系统中的力量的过程中，甚至在我将它们投射回去以重构或改变这些力量源出的系统之前，我就在自己内部积极地重构或改变它们。我们来看看一些并非微不足道的例子：我吸气，根据所获氧气重构自己，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我改变了自己体内空气的化学性质；我呼气，从而改变我周围的空气，或者通过听读而接受各种观点和思想。因此，我获得了一种自我感，但在那一过程中重新表述和改变了话语，并且在把它们投回到社会中时改变了社会世界。还原主义的实践“通常忽视了这种关系，把部分孤立起来，作为预先存在的并因此组成整体的单元”，某些整体论的实践则相反。

54

7. 部分和整体的相互交叉状态必然导致“主体与客体以及原因与结果之间的互换性”(Levins and Lewontin, 1985:274)。例如，我们必须把个体理解成社会变迁过程的主体和客体，同样必须把有机体看作既是进化的主体又是进化的客体。原因和结果的可逆性使特定模式(即使用反馈循环来描述)不再适用。正由于它在持续过程之流中的嵌入性以及流的再现，辩证法有限地诉诸因果观点，并因此将之视为一种特殊

的有限情形。例如，因果观点必然依赖绝对而非相对的时空概念。如怀特海证明的那样，“作为过程的自然”或时间之流逝，可能并不存在着对它的“解释”。“所能够做的就是运用推测性说明(它们)的语言”。(Whitehead, 1920:50)

8. 改造行为——“创造性”——源自矛盾(矛盾使双方都依赖内在化了的“物”之异质性)和更明显的系统内部异质性。如奥尔曼、莱文斯和莱温廷强调的那样，异质性不仅意味着多元性，“部分和过程作为对立面相互对抗，取决于它们所从属的整体”(Levins and Lewontin, 1985: 278)。创造性张力和改造行为产生于这些对抗，产生于由过程之流构成的它们自身。用黑格尔的话说，生成(becoming)源自存在和不存在之间的对立。或者用怀特海的话来说，“过程原理”表明“存在由生成构造”(Whitehead, 1969:28)。在辩证法视野中，相反的力量由过程产生，并反过来成为进一步的改造活动样态的特殊节点。物质和非物质、正负电荷、排斥和吸引、生与死、精神和物质、男与女、资本和劳动等等，都是构造性对立面，一系列改造活动围绕着它们而凝结，那些活动既再生产了对立面又重构了物理、生物和社会世界。

9. “变化是所有系统和系统所有方面的特点”(Levins and Lewontin, 1985:275)。这或许是所有辩证法原理的最重要一点，也是奥尔曼最看重的一点(Ollman, 1990, 1993)。其含义是，变化和不稳定是常态，“物”或系统之稳定性外观是必须要解释的东西。用奥尔曼的话来说，“假定变化总是事物本质的一部分，那么(我们)研究的问题只(能)是(物或系统)如何、何时以及变成什么东西，以及它们为什么有时看起来没有变化”(Ollman, 1990: 34)。莱文斯和莱温廷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辩证观点主张，持存和均衡并非物之自然状态而是需要解释的问题，必须在对立力量的行动中研究这一点。对立力量得以平衡以及作为整体的系统得以稳定均衡的那些条件相当特别。它

们需要同时满足许多数学关系,以及系统变量,后者往往表现为系统参数的不平衡。

怀特海说(Whitehead, 1969:33),自然总是与对新奇性的长期探索有关。因为改造行动——我在此主要指创造性的而非日常的行动——源自矛盾,所以可以断定能够在物理、生物和社会世界中随时随地发现它(参阅本书第五章)。然而,这并非暗示某些持续过程的全部要素都像改造行为的创造点那样重要。理论和经验研究的任务是识别深植于连续流中的独特的“环节”和“形式”(即物),它们能够产生彻底的变化,或者相反,在那里,能建构“看护”或其他机制,从而使“物”或系统(如一个人、一座城市、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国家)获得身份、完整性和相对稳定的性质。如直觉上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生活其中的物理世界看起来是由怀特海所言的“永恒”——相对稳定的物质和物之构型——所构造的,那么这种永恒如何得以维持同时又被整合进动态的过程世界,这个问题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分析主题。再一次强调的是,这种张力是矛盾的焦点(Whitehead, 1969:241—248)。怀特海写道:“为描绘多样性现实,如果我们曾经孤立地解释静止和流动的对立,那么静止之物和流动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在解释的每一个步骤之中都包含了矛盾。”(Whitehead, 1969:408)我们必须以这种方式广泛地解释社会、生物以及物理系统中的“行动”问题。

10. 辩证研究自身是一个过程,它创造出诸如概念、抽象、理论以及制度化的知识结构等这样的永恒,它们又必然被持续的研究过程支持或破坏。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暗示着某种关系,这种关系不是根据观察研究对象的“旁观者”(研究者)来解释的,而是两个积极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两个主体中的每一个都必然根据把它们联系起来的过程使对方内在化。海森堡论证说,观察世界必然干预世界,解构主义者差不多以同样的方式主张文本解读是其生产的根本。马克思同样强调,只有改造世界才能改造我们自身;离开同时改造世界和自身的活动,是不可能理解世界的。因此,不可能假设形式的辩证逻辑是自然的本体

论性质：这样会把一种特殊的精神逻辑作为高于物质的精神行动添加到世界之上。精神和物质行为的辩证统一(马克思表述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可能被削弱或暂时异化,但绝不可能打破。

11. 探究“可能世界”是辩证思维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观念回到了被17世纪科学广泛拒斥的亚里士多德观念,即“一个自然存在的生成是其潜能实现的持续过程”(Leclerc, 1986:21)。马克思辩证思维的根本主题是探究各种潜能:变化、自我实现、建构新的集体认同和社会秩序,以及新的总体性(如社会生态系统)等潜能。同样,布克金证明,教育(对可能性的探究)而不是演绎(分解已知的真理含义)或归纳(发现调节既成现实的一般法则)是辩证实践的中心主题,也是知识建构的首要目标。区位理论家奥古斯特·卢施公开提出,我们的任务“并非解释不幸现实,而是改进它”,并且强调科学“像建筑学而不是建筑史,创造高于描述”(August Losch, 1954),他就是在运用创造性科学的辩证意义(尽管是黑格尔式的),将之作为对在空间上有序更合理的和更公正的世界的探究。正是在这种意义中,我们才能理解他的(臭名昭著的)如此主张:“如果模型不符合现实,那么错误在于现实。”

因此,辩证研究必须把伦理、道德和政治选择(价值)的创建整合进它自身的过程中去,并把由此产生的建构性知识视为在具有某种目标的权力作用下的话语。价值和目标(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反思思想之“目的论的”和“乌托邦的”要素)不是作为普遍的抽象从外面强加的,而是通过活生生的过程(包括知识探究)获得的,那些过程与探究各种潜能(我们自身以及居于其中的世界的潜能)的实践形式和权力作用密不可分。社会生态过程和权力作用如何产生新的可能性,最近几年兴起的“绿色价值理论”为研究这类问题提供了一个精彩例子。当然,研究可能性一直是威廉斯著作的中心。他反复指出:“通过以不同方式压抑各种形式而获得的价值感……(是)共同生活可能性的根深蒂固的和不可破坏的,然而也是不断变化着的体现”(Williams, 1989a: 321—322)。考虑到辩证的约定规则,对这些可能性的研究则包含在社会实

57

践(包括研究过程)之中,而不是在其之前或之后阐明的。因此,它绝非在不同的中立知识的运用之间做出选择,而总是一种对存在于每种辩证论证中心的各种可能性的深入研究。

二 辩证的概念、抽象和理论

世界在本质上是辩证的,或者,辩证法只是一种用以再现物理、生物和社会过程某些特点的方便假设或逻辑,围绕这个问题存在着长期的争论。我把前一种观点称为辩证论证的强论证,它由恩格斯大力提倡,特别是在其《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尽管马克思没有留下有关这一主题的一般主张,但他确实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过程本质上是辩证的。这种强论证已经招致相当大的批评,部分因为它与目的论、突创论和内在论教条联系在一起,这些教条以其进化论含义来看几乎就是决定论的。这种争论的意义部分地依赖辩证法首先是如何描述的。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仅仅当成正、反、合公式,尤其将其视为共时性运动,这种相当机械的做法当然暗示着相当简单的目的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必然产生无阶级的社会主义)。例如,恩格斯把黑格尔制定的逻辑学的和唯心主义的辩证论证观念视为真正辩证的东西,并将之作为他自己的模式。因此,尽管恩格斯反复强调自然和社会世界本质上是辩证的,事实上他把黑格尔有关辩证法的特殊逻辑和精神观念强加到自然和社会世界之上了。另一方面,虽然马克思是从黑格尔开始的,但他对黑格尔的观点进行了彻底的唯物主义改造(比较 Bhaskar, 1989:第七章)。结果把作为一种逻辑的辩证法溶解到论证和实践之流中。在此,我用来说明辩证法的方式,即聚焦于过程、物和系统之间的关系,避免了恩格斯带来的许多难题,并把有关辩证法的抽象讨论作为一套过程原则。这似乎符合马克思的实践。因此,以这种方式来阐述辩证法时,没有理由抛弃那种强论证。至少,在自然和社会世界中,过程构造物和系统,对于这种观点来说,证据与任何其他选择的假

设一样充分。

然而，存在着一个尖锐的认识论难题：如何把那些由某种辩证立场指导的研究计划带来的大量似乎不可比较的信息加以呈现、系统化、抽象和理论化。上文阐明的辩证研究原理（伴随着规模、视角、导向等诸如此类方面的多种变化，同时使矛盾、对立和每种层次上的异质性内在化），应该在我们的概念和思想中生成一种永久性的运动状态。但是，这种灵活性和开放性具有消极影响，除了一整套华而不实的、游移不定的概念和发现，它几乎不生产什么东西（当前大多数文学理论炫耀自己非常擅长于创造的诸如此类的东西）。因为不熟悉辩证思维，辩证概念表面上的难以捉摸就引起了许多怀疑、急躁和不信任。如果像帕雷托论证的那样（在奥尔曼重视的段落中），马克思的术语像蝙蝠同时具有兽与鸟的特征，那么就有可能产生很大的随意性。如奥尔曼指出的那样，对现象多样性和相关性的理解，其目标是识别极少的基本过程，这些过程使现象形成统一性同时又使它们区分开来。这也正是怀特海关注的焦点。在这一意义上，辩证法就是要寻求一条通往某种本体论安全或还原主义的道路——不是把什么东西都还原为“物”而是还原为普通的生成过程和关系。例如，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想象资本循环的共同过程，它创造了无限多样的自然城市风景和社会形式。

这种有关过程（而不是物和系统）之经济原则和普遍有效性的承诺在多个领域都是一样的，大卫·波姆有关量子理论的著作及其所具有的物理、生物、社会和美学形式的意义（参阅 Bohm, 1983; Hiley and Peat, 1987; Bohm and Peat, 1987），威尔金（Wilkin, 1987）对诸如物理、分子生物学、心理学、音乐和视觉艺术等多个领域之对立面统一和互补性原理的探究，莱文斯和莱温廷有关辩证生物学的研究，以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等等。从中得到的最为有趣的发现之一或许便是，单一过程能够引发高度多样化的、极度复杂的以及往往不可预见的后果。在空间分析中也存在一些先例。例如，在探究既规范又实证的人类活动地理区位理论时，奥古斯特·卢施就是从一套非常简单的生成原理出发的，即垄断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个体行动者的利益最大化。从这些

原理出发，他创造了显著的空间复杂性的景观样态(顺便一提，有许多地理学家误解了他的著作，将之视为对几何样态的研究，而实际上它涉及的是那些能够从一套简单的生成原理创造出来的地理样态的多样性)。有关不规则分形、混沌理论的研究表明，即使较大复杂性的生成秩序也能够从一套简单的过程规则中发展出来。此外，波姆和皮特证明(Bohm and Peat, 1987: 157)，这样一种生成秩序的整体观念“并非只限于数学而是潜在地关联全部经验领域”。他们将之应用于绘画、音乐作曲和小说创作：

在所有这些活动中，至关重要的是，在某种意义上，艺术家们总是从观点的生成性资源开始的，并且不断使作品呈现为确定的形式。在这一点上，他或他的思想类似于科学所特有的思想。从那种越来越具体的自由行动中，它从一个点上产生。

以这种方式运用生成原理时，波姆和皮特采纳了辩证的人类创造性观点，把艺术和科学统一在某种对立物的互补性之中。这样做，他们接近阿多诺(很明显，他们并不知晓这一点)，后者把艺术作品解释成一种“辩证意象”，将之理解成“历史过程的结晶”以及“社会条件在其中呈现自身的客观星群”[转引自威廉斯(1977: 103)]。

这并不意味着基本的生成过程容易确定和说明。实际上，考虑到我们必须总是从“物”和系统的本质出发这个认识论难题，那么我们所遇的那些“物”和系统的巨大复杂性则使之特别困难。此外，不同过程相互交织和相互纠缠——例如，资本循环和生态过程便交织在一起——从而创造了环境变革的复杂形式；这就需要重新考虑过程观点，或者设法描述不同过程可能和实际相互交织的方式。无论如何，我在此概述的过程优先性，这一点暗示着，文艺复兴以来作为西方科学典型特征的那种对秩序的探究，它本身已经发生一种转换，从探究物以及物之间的分门别类关系转换到寻求产生不同类型秩序(也即是说，具有一定量和质属性的物和系统)的生成原理。

三 同其他思想体系的关系

辩证思维(我现在只关注其精神和再现方面)是理解和再现人的状况和人生活其中的世界的多种可能模式之一。即使仅仅因为我们把生活体验为过程(而不是“物”或者多种“物”和它们之间关系的混合物),因为我们不得不经常处理维持这个过程的难题,甚至在创造包围我们的许多“物”时,辩证思维在直观上也是吸引人的。此外,我们所有的人都敏锐地知道,致力于维持、发展或解放我们所创造的“物”(如住宅、机器、货币和技能等)的过程,这意味着什么。学者们无疑也将认识到,我们的学习与我们所写的东西是非常不同的,而且写下来的东西常常反过来作为一种固定的“物”的力量、一种异在的力量困扰我们,那种力量能够统治我们的生活甚至不管我们如何努力去超越它。但是,把特定的认识论或本体论假设当成生成知识的基础,直觉诉求从没有为之提供唯一的、甚至主要的理由。实际上,许多西方科学的成就都是建立在反直观思维方式的结构性上的。

主要的相反思想体系是由笛卡儿式理性提供的,这种理性融入经典物理学之中,也因此成为许多自然科学、工程学、医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的理论基础。莱文斯和莱温廷(Levins and Lewontin, 1985:269)根据“四个在创造知识的过程中留下印记的本体论承诺”对这种模式进行了分类。这四个承诺是:

存在着一些自然的单元或部分,任何整体都是它们组成的。

这些单元在它们自身之中是同质的,至少就它们影响自身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整体来说。

部分在本体论上先于整体;也就是说,部分以孤立的方式存在,它们结合起来就成为整体。部分具有内在的属性,它们孤立地拥有这些属性并且把这些属性传给整体。在最简单的情形中,

整体只是部分之和；在比较复杂的情形中，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创造出整体的附加属性。

原因与结果是分离的，原因是主体的属性，而结果是客体的属性。尽管原因可能回应来自结果的信息（所谓“反馈循环”），然而，什么是起原因作用的主体，什么是由原因引起的客体，这一点是不含糊的（这种区分迷恋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统计数字）。

61 这种笛卡儿式观点广泛地传播，它也具有某种直观的吸引力。我们遭遇“物”（如个人）和系统（如交通和通讯网络），这些东西似乎具有稳定和自明的存在，所以看起来有充分的理由依据它们的类别和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来建立知识。然而，从辩证法的观点看，这是一种狭隘的和片面的看待事物的方式。在我看来，莱文斯和莱温廷正确地把笛卡儿的观点描绘成一种“异化的”推理形式，因为它描绘的是这样一种世界：“部分同整体分离，并且物化为物自身，原因与结果相分离，主体与客体相分离”。怀特海（Whitehead, 1969: 8—9）在拒斥笛卡儿时采取了稍微不同然而同样有趣的方针。他论证，笛卡儿割裂心物之间关系，这种做法在根本上是前后不一致的，因为没有理由证明这种区分。因此，尽管笛卡儿体系“明显地说出了某些正确的东西……但它的观点过于抽象而不能洞悉物的本质”。更糟糕的是，这种割裂把“一种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奇特混合物”引入自然科学的方法，以至于“其流行的思想论调在其自身的边界内是热情洋溢的理性主义，而在边界之外则是武断的非理性主义”。马克思表达了类似的异议，他指出：“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①

一般而言，马克思激烈地批评“常识”观点，说它只要“看到差别

^① 此处译文取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0页。——译者注

就看不到整体，而看到整体就看不到差别”，并且它“如此偷偷摸摸地使差别僵化”以至于不能提出新观点，更不要说提出对世界如何运行的新的洞见了。〔转引自奥尔曼(1990: 44)〕毫无疑问，他同样严厉地批评了主宰着当代经济学和社会学的那种原子论的和因果的推理，以及在当代政治哲学等学科中十分普遍的方法论个人主义。

但是，把笛卡儿的和辩证法的概念看成在各个方面都不相容，如卡普拉(Capra, 1982)以及某种程度上莱文斯和莱温廷(Levins and Lewontin, 1985)所做的那样，也是不对的。只要再从互补性角度来考察，他们就能为新观点提供丰富的资源。在理论物理学中，19世纪被视为完全不可通约的命题——“物质在其本质上是由粒子组成的，或者是由波组成的”——最终在量子理论中被看作是一个整体。在此，也存在着一个有利于常识解读的直观例子。当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时，我们都知道他的意思，但是我们也承认人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同一条河流的岸上。过程总是在创造和维持“物”和系统，把对“物”和系统理解为那一情况的某种特例，它们就是真实的和稳定的。因此，无论如何我们都能在这一点上坚持辩证观点优越性的主张，然而，逆命题似乎并不有效。除了比较静力学、因果反馈循环或者表明由实验决定的和机械指定的变化率(以微积分来表示)的线性关系，笛卡儿式思维在处理变化和过程时并不如意。人类学家安东尼·利兹(Anthony Leeds, 1994:32)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转换了视角，从而作出了更大成就，他说：

62

在早些年，我视社会……为位置、角色、状态、群体、制度等等组成的结构，所有这些都依赖文化……形成轮廓。我把过程视为“力量”、运动、联系、压力，在由个体集合而成的组织的地点或节点上和其中发生……虽然对于我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正确的，但同样似乎是一种静态的观点，它更关注社会秩序而不是社会生成……因为它似乎并非自然的属性……这些地点确实存在，但仅仅把它们视为自明的似乎并不合理；更确切地说，我们必

须找到说明它们外观和形式的方法。生成问题越来越……使我把社会视为持续的过程,结构或秩序以上述地点的形式在其中凝结而成。……

奥尔曼(Ollman, 1990:32)特别强调了完全相同的观点:

从当前社会科学的流行观点来看,物存在且变化着。这两点在逻辑上是有差别的。历史是发生在物身上的那些事;并不是它们本质的部分。因此就产生了研究主体变化的困难,这是从一开始就被从主体中排除的。

另一方面,马克思“把每一种历史形式抽象为流动,并且因此重视其短暂本质不亚于其瞬间存在”。

四 辩证法的应用——马克思的资本概念

在这一节中,我更详细地考察马克思对辩证思维的特殊运用。我的目标并非证明他正确与否,而是要例证他如何运用辩证思维把资本主义理解成由资本循环过程所规定和限制的社会系统。《资本论》的语言直接表明马克思坚持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在任何时候,过程地位都优先于物和系统。前面引用的那段话说明,他打算把“每一种历史的社会形式抽象为流动”以便重视“其短暂的本质不亚于其瞬间存在”。
63 这种过程而非“物”或系统的优先性承诺得到了再清晰不过的说明。因此,资本被直接概念化为一种过程或关系而不是“物”。在其最简单体现中,它被视为一种流,在一个“环节”上表现为货币“形式”,在另一环节上则表现为商品“形式”或者生产行为的“形式”。马克思写道:“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交替采取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作为剩余价值同

作为原价值的自身分出来，自行增殖着……因此，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货币，从而也就成了资本。”^①这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通常采纳的那种过程定义，在后者那里，资本被视为具有某种质和量属性的不成问题的（即无矛盾的）股票资产（物），当人类行动创造出它们的时候，它们体现了作为原因的力量（例如，资本投资造成失业）。马克思并不认为不存在诸如股票资产这样的东西，但他的观点是，不理解它们嵌入其中的过程，特别是它们产生、重构、维持、贬值和破坏的过程，我们就不能理解那些资产是什么，它们值多少或者如何使用。当马克思说“资本做”或“资本创造”的时候，他不是论证一种叫做资本的物具有因果力量，而是论证被理解为整体的资本循环过程是重大社会变迁的关键，并且因此我们不得不认为它体现了一种有力地影响社会生活的生成性原则。

我们可以考察下列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一段落来加以理解这个论点：

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异。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积聚，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

^① 此处译文取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6—177页。——译者注

要决定着生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①

64 不熟悉辩证思维方式的人会相当合理地认为，这种陈述是含混的，不然就是不可信的同义反复（含混性部分源自如下事实：这是马克思为自己研究提供指南的笔记，而不是为打消公众的怀疑而写的确定文本）。但如果回到我对辩证思维的最初说明，那么马克思所言就变得足够清晰。社会生活的再生产被视为在规定总体性或整体的边界内运行的持续过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同时在其他社会中），我们是在内部区分这种过程的，以便包含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不同的“环节”。当仔细观察任何一个环节时，我们就发现，脱离作为整体的过程，我们不可能理解它们，过程贯穿着所有的环节。因此，生产必须使源自消费、交换和分配的冲动和压力内在化。不过，仅仅从这些条件来思考生产仍然是“片面的”。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生产把来自自身的影响内在化了（即它在内部是异质性的和矛盾的——这是马克思为什么说生产是同自身“相对立的”的原因），并且，就作为整体的过程来讲，创造和改造力量潜在地隐含在它的领域之中。不过，潜力大概也存在于其他地方。如果我们在宽泛意义上把生产理解成任何改造活动（不管它在何处发生），那么很明显，我们通过定义也就断言生产对其他环节的“决定作用”。但马克思同时主张，最大杠杆的支点、最大改造能力的支点，以及在归根结底意义上，那些对作为整体的系统发挥“决定性的”改造作用的“环节”，它们存在于而非外在于生产领域。因此，其他领域的改造活动内化到生产环节之中时，它们才同作为整体的过程相关。

如果以笛卡儿式眼光来阅读马克思的这一段落，我们或许会认为，马克思说生产是一种独立的实体，它是消费、交换和分配等领域变化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41页。——译者注

原因。但这正是马克思不会说的东西。他不可能这样说，正是因为，根据他的概念，生产把与所有其他环节的关系都内在化了(反之亦然)。然而，他指出(我并不关心这是否正确)整个过程的那个改造环节存在于生产环节之中，并且，如果我们要理解过程(这里指的是资本循环)得以重构、改变和加强的创造性机制，这正是我们需要加以注意的地方。简言之，存在于资本循环过程中的力量，如何以这种方式在生产环节之上形成的：改变它形成的系统而不是一种短暂的和内在不稳定的要素？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问题。它基本上无异于这样来问：任一个体如何把某种存在于他们环境之中的力量内在化，创造性地改变它们并因此改变历史过程或进化过程？

65

实际上，只有对在生产本身这个环节上把资本生产出来的内在化过程进行详细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才有可能回答这个问题。毫无疑问，马克思的意思是：正是对劳动过程的塑形之火的占用，对各种创造性可能性和劳动力(例如，精神力量和合作能力)的占用，才使得资本在世界上“存在”。但是，在生产环节上把这些劳动力内在化为资本的力量需要把劳动力转换成资本的附属物，不仅仅在生产中而且在所有精神、社会和物质的活动中。随着资本主义力量对生产的殖民化以及把劳动力内化到资本自身的形象中，由哈拉维(Haraway, 1990)非常著名的有关主体的宣言而广泛传播的“电子人”形象进入了历史舞台。

当然，存在着各种赞成或反对马克思(或者更广泛地，辩证法)的观点。例如，有可能存在着应该被融入图式的其他“要素”(如再生产和所有那些必须的东西)；或者，马克思强调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意义，将之视为改造社会关系以及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出发点，这种观点过于武断。但我在此要强调，对马克思(以及那些追随其辩证方法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至少应该识别他正在做的以及怎样做的，而不是轻率地通过笛卡儿、实证主义或分析的透镜来解读或误解他。

为了说明问题，让我们假设，马克思通过抽象正确地把握了资本循环的一般过程。因此，重要的是观察这样一种理论表述如何：(a)得到详细说明和具体说明；以及(b)将其作为一种“解释性”工具加以

运用。

就(a)来说,我们发现,关于资本一般的循环过程,通过承认不同过程附属于不同种类的资本,如工业、货币(金融)、商业、土地,甚至国家资本(借贷和税收),马克思建立了越来越特殊的论证形式。差异也可以根据资本的物质形式(无论它是固定的、大规模的、嵌在土地上的等)以及不同的组织形式(联合股份公司、小型商业、农业土地的占有条件等)来详细说明。不确定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动态是不平衡发展、内在化的矛盾以及不稳定的主要原因。通过分解成越来越特殊然而相互重叠的循环条件,资本一般的循环过程发生变化。现在,不得不把资本一般看成异质的而非无差别的统一,并且往往作为内在矛盾的某种东西。这些内部差异的发现特别重要地依赖对物质环境的历史、地理和理论的研究(这是必须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看成同某种唯物主义概念密切相连的原因)。例如,金融家(“金融资本”)与工业利益集团(“工业资本”)之间常常令人忧虑的关系阶段性地爆发危机,极大地影响整个资本循环系统。

然而,以这种方式详细地说明这个理论,并非要提出大量的外部偶然性。仅仅以公司或者民族国家形式为例,它们的组织不是干扰纯粹的资本循环过程的外部事件。在每一种情形中,我们都试图把社会形式(特殊类型的实体或组织形式,比如公司或政府)理解为源自循环过程并支配着资本循环的一个特殊“要素”。由于内在于它的力量和它完成的改造(社会以及物质)的创造性,那种实体(例如,公司)具有强烈的影响。但是,它的存在深嵌于持续的过程之流,它是过程的一部分,就像其他任何实体一样,它把矛盾内在化,因此是异质性的,并且由于支持、重构或发展它的那些复杂过程,它内在地不稳定。我认为,无论是公司还是民族国家的最近历史都证明了这种状态。顺便一提,针对在基因突变和环境适应的情况下有机体在进化中的中介作用,莱温廷(Lewontin, 1992)提出一种相似的解释:通过它们的生产性行为,有机体改造它们随后要适应的环境,同样地,公司积极地改造它们必然迫不得已要适应的社会和经济环境。

只要世界总是变化的，加上辩证法家和其他人(特别是笛卡儿主义者)创造的创造性的思想和行动，那么详细说明、进一步描述和更好地阐述某种理论的过程便是持续不断的，并且永远不会结束。与辩证法家们面对的其他任何过程一样，理论化过程也是持续不断和变化的，也是异质的和矛盾的。总是“说的越多，要做的就更多”，有无数的理论干预点需要检验和实施。辩证思维过程及其在人类事务中的应用也是生产、维持和发展的。我自己著作的目标(如《资本的界限》)在某种程度上是(辩证地)确认理论的延伸，并且更好地说明它在时空中的作用。不过，我也试图更好地定义某种资本主义过程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领域及其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改变社会生活轨迹的机会。

67

作为一种解释工具，理论并不作为简单的事件(事物状态)预言者而起作用。必须将之视为一套生成和改造的原理，它嵌在持续的过程之中，由于内在化的异质性和矛盾，这些原理揭示了创造某种新的然而总是短暂的事物状态的可能性。在此，我们也遭遇一种主要的误解根源。根据资本循环来解释现象，当然并不意味着，其中全部现象一定或就是相同的。可能会出现有限的和相当特殊的情形，并且情况确实如此，如曼德尔布洛特等人通过分形方法指出的那样，嵌在循环过程中的生成和改造原理会创造许多社会生活的形态和形式(如商品、资本主义的城市、消费习俗等)。然而，对差异的生产来说，仍存在着一个根本的统一性，并给那些能够生成的差异的本质设置了界限。例如，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不可能从资本主义生成原理中产生出来。

唯物主义研究的目标不是以某种实证主义的或形式的意义来检验资本循环是否存在(我们知道它存在)，而是揭示它以什么形式运行、在什么领域中发生作用(在什么边界内)、具有何种影响，以及存在着何种改造的可能性。例如，我们能不能说明，通常被称为“文化生产”的东西是否存在于其范围之内。例如，在通过人工环境进行的资本循环中，或者空间的生产中，是否存在需要我们重新思考过程的情况？我们能够通过国家机器及其功能来追踪资本循环吗？而这又对国家权力的界限和潜力概念将产生何种影响？如果资本循环在某个部门(如保健和教育)受到

限制，或者如果它在某个从前限制它的地区突然被释放(如前苏联集团)，那又如何？资本循环以何种方式促进社会变迁朝何种方向发展？在哪些方面可以将这种变化视为稳定的而不是内在不稳定的过程？

在资本循环的情形中(它自身是马克思研究的一个具有松散边界的领域)，问题是揭示生成和改造原理如何发挥作用、它的作用形式和范围。这必然需要一种特殊的唯物主义研究策略。例如，把民族国家视为同质性实体，而根据一套经济指标来检验其行为和作用，这只具有有限的价值。辩证思维原理指出，研究的焦点应该是民族国家如何将权力内在化(或失去对这些权力的控制)，它在何种意义上是异质的和内在矛盾的，这些内在化的张力又以何种方式引发某种导致新行为形式的创造性或自我破坏，以及，最终，这样的行为如何改造社会生活？

从这一视角看，人们令人遗憾地误信了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和现实上“宣告”的责任。这并非主张，所有这种马克思主义研究都不犯错误。生成原理可能被扭曲，作用范围可能是想象出来的而不是现实的，对实际过程的唯物主义研究就像任何其他研究一样，容易迷失在细枝末节上。当然，马克思主义者试图通过构造生成原理和理论来改变世界。但这并非意味着，研究结果总是合适的，或者它们绝不会混乱或有害。较之其他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更不可能逃脱波姆和皮特(Bohm and Peat, 1987:57)描绘的那种困境：

我们不可能强制推行自己喜欢和希望实现的世界观。不可能以一种完全武断的方式来维持理解和行为的循环，除非我们串通起来压制自己不喜欢看到的東西，同时又不惜任何代价试图保持我们在自己的世界图景中最想要的东西。非常清楚，持有这样一种对现实的错误理解最终必将付出代价。

公正地说，在马克思主义中，许多人已经为这种错误幻觉付出了代价。但是另一方面，任何一种其他思想过程也不能宣称自己不犯错误。

第三章

莱布尼茨的奇想

在本书大部分论证中，我都把“内部关系”作为辩证法的根本观念加以应用。为避免引起混乱和实质性错误，我现在就做一点澄清。对于奥尔曼来说，辩证法在本质上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由此可能错误地推断(虽然奥尔曼当然不会这样做)，内部关系的观念同样如此。在下面几章中，我将借助于莱布尼茨提出一种相关性时空观(他是内部关系思维的先驱，奥尔曼承认他的影响)，在此简要地梳理一下他的有关内部关系的特殊观点。当然，这面临着不小的困难，因为莱布尼茨一般被视为在政治上非常保守的理论家，亦是马克思所反对的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的奠基者。[1]

在《单子论》这本接近其生命终点的著作中，莱布尼茨提出一种建立在单子概念上的形而上学，单子把存在的一切都内在化了。每一个单子都反映宇宙：“对应”法则内在地把每一单子指派成宇宙的镜子。莱布尼茨在两个方面限定这种对应法则。首先，每一个单子都对宇宙保持一种与众不同的位置和看法，因此其镜像突出某种最近而不是其他的区域和前景。其次，单子在镜像的质上各不相同，某些清晰一点而另一些则模糊一点。

不过，如果我是一个单子，并且把万物都内在化了，那我在理解宇宙时要做的所有事情就是注视内在自我。确实，我的位置和视角以及反映能力的敏锐性将限制我的学习。但是，如莱布尼茨实际上做的那样，坚持下列立场仍然是合理的，即“我是万物的尺度”，并且对自己内在状况的深入反思是获得全部宇宙知识所必需的。为了鉴别，我把

这种观点称为“莱布尼茨的奇想”。它提出了某些特别重要的问题以及可能性，我有理由在后面的章节反复回到这一点。

让我首先来谈谈与莱布尼茨表达这一主题相关的条件。近来大多数对莱布尼茨的介绍都只强调其著作和形而上学。我不得不回到迈耶尔 1948 年初出版的一本书（英译本出版于 1952 年），在其中，他试图把莱布尼茨形而上学原理的来源与他所处世界的环境编织在一起。那个世界充满了斗争和争论、宗教战争和暴力、瘟疫和灾祸、政治阴谋和混乱的分裂，以及各种令人不安的发现（地理发现、科学发现等等）。莱布尼茨深深地卷入了那个世界的政治，试图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案、建立乌托邦的和谐、成功地获得理性的结局、把上帝完善性观念与显而易见的日常生活不完善以及当时发生在科学（特别是牛顿的著作）和哲学（特别是笛卡儿）中的惊人进步协调起来。他同时也是当代地缘政治斗争和实践的积极参与者。迈耶尔试图理解莱布尼茨的观念如何从他对世界的经验中产生出来的。最重要的是，他把《单子论》中的主题解释成一个失败时刻的记录：

在其晚年，莱布尼茨完全相信，他已经解决个体和宇宙之间关系难题……单子论反思的**最终目标**是完全退回到孤立的自我；从莱布尼茨经历角度说，直到他的生命终点，自由和承诺突然产生致命的冲突，它们才不再以稳定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把他自己的个体性本质提升为普遍法则，在莱布尼茨自我意识主张中存在着其批判和思辨哲学之间的差别；并且，哲学家变得与世界其余部分老死不相往来。他逃避当前情景的喧闹和混乱的冲突，以便倾听自己内心独白那清晰的、类似数学的声音；因为只有此刻，他才能发现他的单子论体系的两个基本原则：“无矛盾的真理”和“充足理由”。（Meyer, 1952:9）

71 在当代理论运动中，迈耶尔评论并非不具有相关性和说服力。我将简要地举出两个例子。首先，请想一想，在有关自我—他者关系

的讨论中，当德里达研究“欧洲主体”（也是莱布尼茨特别关心的一个实体）如何通过建构一个“他者”——殖民主体——在内部建构自身时，他诉诸某种与莱布尼茨式奇想类似的东西。在有关被殖民的他者如何能够说话这个难题的有趣评论中，斯皮伐克抨击“第一世界的知识伪装成缺席的非陈述者，它使被压迫者代表他们自己讲话”，她赞同性地引用了德里达的战略：

使思想或思维主体透明或不可见似乎是……通过同化而掩盖对**他者**的无情承认。正是出于这种谨慎，德里达并没有借助“让他者代表他们自己说话”，而是诉诸对“真正他者”的“呼吁”或“呼唤”… [那个他者]“使在我们之中作为他者之声的内在声音精神错乱”。（Spivak, 1988:294）

这种姿态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他者”能够被代表的唯一方式是使在发现自我的过程中被我内在化的声音“精神错乱”，那么“我即他者”这个等式必定很快就像“朕即国家”这个命题那样深植人心。正是在这里，迈耶尔感到存在于莱布尼茨战略的致命矛盾：

莱布尼茨主张，观察事物的本质无非是观察我们自身精神的本质……由全新的理智精神所鼓舞的知性个体性，成为所有人类存在的尺度。在这种个人至上的绝对主义教条——它在本质上与路易十四的政治绝对主义教条一样——中，真正共同体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莱布尼茨有关人的主权精神的概念最终同他自己的宽容观念相抵触。全体人民仅仅是“单子的集合”，具有美学意义的“世界和谐”概念不再能够填充个人、国家或民族之间的鸿沟。

第二个例子来自深度生态学家，他们不仅频繁地诉诸辩证法，而且诉诸一种内部关系哲学，回应了莱布尼茨的奇想。阿恩·奈斯，深度

生态学运动的创始人，是斯宾诺莎的追随者，他很显然把这种哲学用到了极致。在深度生态学中，成为使内在声音——作为我们内心大他者的“自然”之声——“精神错乱”（挪用德里达的术语）的媒介，变成了自我（那种被理解为超越自我本位的“自我”的东西）的任务（参阅本书72 第七章）。根据“对应法则”，通过自我训练，我们能够使自己对自然的理解更加清晰和充满希望：通过把单子自我设立为万物的尺度，我们把外部世界内在化了，并由此理解它。

在此，我并非试图完全怀疑莱布尼茨的奇想。这种战略在整个历史中已经获得极大的重要性，并且也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它不仅陷入困扰着莱布尼茨的那种致命矛盾（这不就是德里达回到马克思的原因？），而且也引起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内在独白”（德里达特别擅长制造的那种）的杂音，那些人都非常明显地退出了“有关当前场景的嘈杂而混乱的辩论”，退回到一个孤立的自我，因此切断了自由与政治义务之间的任何联系。

无论如何，莱布尼茨的奇想正是那种形式的哲学唯心主义的基础，通过与黑格尔的对话，马克思拒斥了它。虽然怀特海承认自己极大地受益于莱布尼茨（Whitehead, 1983:193—194），但他也公开表达了许多类似的反驳。他指出，莱布尼茨拥有：

两个与众不同的观点。一个是，最终的真实实体是一种组织行为，把各种组成要素融合成一个整体，所以整体就是现实。另一个观点是，最终的真正实体是支持属性的物质。第一个观点有赖于承认把所有现实联系起来的内部关系。后者则同这种关系的现实相矛盾。把这两种观点结合起来，他的单子因此就是无窗户的：它们的激情仅仅通过上帝安排的前定和谐来反映宇宙。（Whitehead, 1985:193—194）

因此，内在化过程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可能并不存在“具体的内部关系现实”：上帝（或者黑格尔后来称为“精神”的东西）承担着使整体系统

运行的万应之神(Deus ex machina)的功能。

尽管莱布尼茨或许为“德国哲学的伟大成就”提供了基石，但他也留下了一些棘手的难题：如何在实际事务中运用内部关系的学说。困难主要来自若干方面。首先，是奥尔曼已经讨论的问题(Ollman, 1976, 参阅附录 A)，如果万物皆流，那我们如何在根本上谈论任何特殊或者个体呢？如果个性化、个体或者斯特劳森所称特殊(Strawson, 1965)的认同取决于时空位置，那么时空定义基础的转移——本书第十章将证明，这种转移实际上是相关性观点的必然意味——就改变了个体、特殊以及实体(诸如“物”和“身体”)得以认识和理解的基础。组成世界的那些基本要素或个体，它们的概念因此就永远成为一个问题。例如，斯特劳森宣称：“不包含时空实体的那些系统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包含特殊的系统”(Strawson, 1965:119)。在研究特殊和实体如何建立时，他使用了莱布尼茨的论证，将其作为陪衬来构造他视为对现象个性化具有更大连贯性和包容性的方法。莱布尼茨的单子很像实体，它最终为反驳斯特劳森的异议提供了简单工具，但是作为怀特海正确地提出的那些理由的一般性论据，它们并不令人满意。在此，奥尔曼、怀特海、波姆等不同作者提供的方案是：倘若我们认识到那些物和实体是如何构造、维持并最终融入流之中的，以及全部实体如何彼此相关地被定义的，则根本不存在什么特殊的障碍阻止人们把物和实体看作是“永恒”，甚或相对自主的实体。

73

怀特海对此敏锐地补充了两条异议(Whitehead, 1985:203)。他指出：

内部关系问题带来的难题是解释特殊真理如何可能。只要存在着内部关系，万物都必定依赖他物。但是如果事实如此，那么我们就不能认识任何事物，除非我们同样地知道其他的事物。因此，显而易见，我们必然需要了解一切。这种想象的必然性明显是错误的。因此，解释内部关系如何存在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因为我们承认有限真理。

在第十二章，我们将再次遇到这个难题，在那里我采纳了身份政治学的某些前提。如果我把存在着的万物(包括每一种“他性”)都内在化了，那我必定就要代表每一人，这等于根本上什么也没说。同样严肃的是，“内部关系学说不可能把‘变化’视为任何实际实体的属性”(Whitehead, 1969:74)。如果所有单子都把世上万物内在化了，那么，除了它们自身的内在意志，还有什么力量使它动起来呢？换句话说来说，说流和变化无处不在，也就是说，它同样不会特别地存在于任何一个地方。

这些或许都是相当不可思议和深奥的问题，让我通过回到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来说明它的更实际的和政治经济的重要性。我们来回忆一下这个论点，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是过程(价值流)的独立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把其他条件内在化了，然而在某种意义上生产环节却根本的。

74 对此，通常马克思主义解读是，我们只有使生产环节革命化来改变(或研究)整个世界，因为所有其他环节都在那里被内在化了。但是，这完全是借历史唯物主义之名把有关内部关系的唯心主义观点搬到马克思主义之中的做法。从这一立场出发，某些批判家发动的对“原教旨主义的”和“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形式的批判——在那些形式中，生产被当成唯一有重大意义的范畴——就具有了某种正当性。这种观点的莱布尼茨主义(和唯心主义)特征会把“生产”看成封闭的(“无窗户的”)环节——尽管它的特点是由“对应法则”决定，通过这种法则，其他东西都被内化到它之中——而不是在持续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之流中的开放环节。但是，如果不把内部关系观点置于单子实体世界(它看起来是“永恒”)之中，而是把它看成政治经济再生产全部过程之中不同“要素”(事件、物和实体)的持续变化和内部化，那情况将完全不同。

回到马克思的论述，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都是社会过程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环节，它们每一个都是其他环节的内在化结果。波姆(Bohm, 1983: 297)对莱布尼茨提出过类似的批评，揭示了波姆所称的“隐蔽秩序”如何为理解在生成的整体性之中相互联系意识和物质提供了一种共同的基础：

我们主张……基本要素是这样一种**环节**，像意识环节那样，它不可能正好与时空测量联系在一起，而是掩盖了在定义上有点模糊的区域，这个区域在空间中扩展并在时间中延续。一个环节的广延和绵延既可能非常小又可能非常大……对意识来说，每一个环节都具有某种秩序。此外，它亦包含所有其他环节，尽管是以自己的方式。所以，每一个环节的全部内容必然间接地表明它自己在整体中与所有其他环节之间的关系：它“占有”包含在它之中的全部其他环节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观点与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很相似，每一个单子都以自己的方式“反映”整体，某些非常详细而其他的单子则相当模糊。不同的是，莱布尼茨的单子具有永恒的存在，然而我们的基本要素却只是环节，因此并不具有永恒特征。怀特海的“实际场合”观念更接近此处提出的这种主张，它们之间主要差别在于，我们使用隐蔽秩序来表达环节的属性和关系，而怀特海则以相当不同的方式来这么做。

显而易见，对如何理解内部关系，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我自己的偏爱（并且，这也是在我先前著作中清晰地表现出来的一贯特点）是，在过程中研究“环节”，而不是采取单子论的视角，比如说，把生产看成唯一考虑的环节。正是为了把内在化过程理解成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我们必须把消费、交换和分配看成具有自身重要性的环节。马克思有力地证明，要解释资本主义如何运行和社会主义如何可能实现，生产比其他环节更重要，但是无论如何这都不能证明忽视其他环节是正当的——实际上，要在生产中把特别的和渴求的变化形式内在化，研究这些其他环节（如消费）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方式（最明显的例子是，消费者的联合抵制影响生产行为）。奥尔曼没有能够清晰地做出这种区分（虽然我怀疑他是否同意我的观点），从而未解决保守主义和唯心主义内部关系学说的可能性问题，也没有解决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纯粹“生产主义”理解问题。

75

这仍然留下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在一个从内部关系来理解的世界中，变化是从何处开始的？为什么能够把某些变革的行动者（如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看作比其他的更为根本？这或许是需要回答的最重要的问题，并且也将是后面章节主要关注的问题。此刻，需要说明的是，对内部关系学说的批判性评估把这些问题假设为至关重要的形而上学和政治问题。在《单子论》中，莱布尼茨的特殊解决方案是建立在政治实践失败之上的，那种失败使下述选择成为一个具有特别吸引力的主张，即退回到与外部世界保持广泛一致的没有窗户的理智的单子世界（他的研究）。几乎并不令人吃惊，近二十年来左派的政治失败也产生了一个向无窗户的莱布尼茨式内部关系世界的撤退，就德鲁兹的例子来说，相似的撤退成为一个相当有吸引力的选择。（Deleuze, 1993）它在多个方面受到了计算机技术的推动[如海姆(Heim, 1991)指出的那样，这是莱布尼茨的另一项发明，他不仅发明了第一台计算机，而且与之相随发明了二进制算法——一种普遍的微积分，它“汇集了所有的人类文化，将每一种自然语言都集成一种单一的共享性数据库”]。锁定在计算机屏幕上的单子个体的图像——这个屏幕通过调制解调器在赛伯空间中与巨大的通讯世界联系在一起——在多个方面是莱布尼茨梦想的实现(重复)。海姆写道，“单子没有窗户，但是它们具有终端”，在赛伯世界中，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形而上学”成为赛伯空间之逻辑和“爱欲本体论”的基础。把对这种新空间的深入探索视为一种激进的和革命的行动的形式，这样的人现在有很多。在第十章，我将回到这个题目上来。

如我所称，“新的激进唯心主义”极大地依赖这样一种撤退。在本质上，纯粹的内部关系学说无力阻止其发生，除了将之深深地置入政治承诺之中[或者，如巴斯卡所言，置入“解放的价值论”之中，参阅Bhaskar(1993)]，这种承诺曾经赋予马克思的辩证法及其历史唯物主义巨大的力量。否则的话，就如它在莱布尼茨那里的最终结果一样，割裂自由与政治承诺之间的关系会成为当代辩证法著作的一种致命矛盾。因聚焦于变化，辩证法强烈要求至少成为研究的重要模式之一。但

是，如巴斯卡所言(Bhaskar, 1993)，那种传统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张力，如下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尽可能清晰地关注辩证法发挥作用的方式以及在研究中如何运用辩证法原理。因此，辩证地把不同的思想模式(如果你愿意，可以将之视为元辩证法)看作尽管对抗然而却是互补的，而不是看作相互排斥和无关的，这样能够带来某些创造性洞察力。这是一个希腊人充分理解了的古老原则。赫拉克利特说，“最好的和谐诞生于差异”，并且“不和谐是全部生成的法则。”马克思同样主张，“单向度”的再现总是有限的和成问题的，而最好方法总是“以使之着火的方法来摩擦概念之木”。以正确方法进行较少的“摩擦”，或许就能够绘制出创造性方法之图，从而思考社会—地理和环境的变化，并把时空、地方和环境(自然)置于社会和文学理论框架的方式。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试图运用这样一种论证模式来研究可能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我将把辩证法作为一系列抽象原理融入论证和理论实践之流。

注 释：

[1] 对于那些对地理学思想史感兴趣的人来说，值得一提的是，奥尔森和我都同样被奥尔曼论“异化”的著作所打动，该著作强调内部关系，初版于1972年。不过，奥尔森后来采纳了语言学和唯心主义导向，这一点无论如何与我采取的历史—地理的唯物主义立场都不一样。或许因为同样的原因，巴斯卡(Bhaskar, 1993)在一本包含着惊人困难和张力的著作中展开了自己的辩证现实主义观点，他注意到自己和奥尔曼的著作之间具有某种交叉点，尽管他批评奥尔曼倾向于把辩证法理解成纯粹的认识论而不是一种有力的本体论立场。把这种争论挑出来并非易事，然而它们对于理解内部关系观念如何同辩证论证联系在一起却是十分重要的。

第四章

话语的辩证法

77 写作是一种话语形式。一个人从事写作，便受其规则限制。我们用话语来说服自己和别人，从而理解(以及往往改变)自己认为重要的主题。最近，反思话语的本质和作用、探究它们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揭示它们内在的界限以及它们的表现能力，已经成为有深远意义的潮流。这种反思自身受到话语规则的限制。

通过话语反思我们所思与所为，以及在话语上反思话语的本质，这种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为批判性反思打开了创造性的可能性。但是，它也带来循环论证的危险。它可能把我们带进迷宫，在其中，不断增长的话语反思交织在一起，以至于不再可能洞悉实质性问题。

最近，关于嵌在特殊话语之中的“主体位置”或“立场”亦有很多有益的讨论。人们开始注意隐蔽的位置性和权力游戏，它们隐藏于甚至在表面上最无害和在道德上中立的话语中。在今天，提出任何“真理”或者甚至“相关性”和“政治学”主张而不提供这些主张的原始根据(包括“主体位置”声明)，是很困难的。这种义务性的原始姿态不仅为有用的批判性反思而且也为许多人的自我放纵打开了闸门。如白乐晴——韩国反对派作家联盟的杰出成员——最近指出，在谈论自己时候，他通常感到窘迫不安，但在访问美国时却发现一种十分体面的方式：这便是“展现一个人的主体位置”。

我所关心的是检视“话语”这个术语，试图定位它相对于社会生活非话语方面的角色、能力和力量，包括可能进入主体位置定义的东西。

78 这个步骤对于广泛的论证是必要的，因为我需要理解其后将要采纳的基

本术语——诸如环境、自然、时空、地方和正义等关键词——的话语构造对它们假定要提到的非话语现实如何发生作用。为实现这个目标，我设计了一种“辩证的认知图”来再现社会过程之流，然后用它来确定话语可能涉及的东西，并更好地理解社会和文学理论涉及的内容。需要强调的是，我不会试图去设计某种有关社会过程的元理论——对此，地图不太可靠。我的目标要小得多：制作一张初始地图来评估不同理论结构(包括我自己的)所固有的形式、力量、创新可能性以及界限，等等。

一 基本框架

我将定义六种特殊的社会过程“环节”(表 4.1)。这些基本记号可以描述社会和文学理论中发生的大多数事。它们也为随后的实质性研究提供一种基础。我使用“环节”这个术语，意在尽可能避免把过程行为先验地晶化成“永恒”——物、实体、具有清晰边界的领域以及系统。下列“环节”的排序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

(1) 语言/话语环节可以大致地定义为我们谈论、书写和再现世界时利用的那种编码方法的大量排列。

(2) 话语是权力的表现。权力环节本身既是内在地异质的又是复杂的，但是权力关系(政治的、经济的、符号的以及武力的，等等)和压力在社会过程之内是根本的，并且因此有关他们如何运行的概念对于理解社会过程亦是至关重要的。

表 4.1 社会过程认知图的“环节”

权力	话语/语言	信仰/价值/欲望
社会关系	物质实践	制度/仪式

79 (3) 世界是怎样的(本体论)、如何更好地理解世界(认识论)以及我/我们希望如何在世界上“存在”，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有自己的信仰、价值和欲望。我把这种复杂的内部世界指定为**思想、幻想和欲望(想象)**环节。需要指出，我在用这些术语时几乎词不达意，并且它们之间的分离也可能会形成误导(例如，含蓄的身心二元论不可能轻易地证明是正当的)。

(4) **制度大厦**环节泛指个人之间的政治和社会关系在一种相对稳定的基础上的组织化。在此，我们承认，人类思想和欲望能够变得清晰而具体，像文化仪式(如宗教仪式、权威仪式和服从仪式)，或者更明显地，像表面上永恒的社会制度(如法律、国家、政治、科学、教育、宗教、学术、职业、军队和市场那样)。

(5) **物质实践**环节聚集于人类生活的物质嵌入性。物质实践是感觉和经验的纽结——肉体在世界中存在的点——关于世界的全部原始知识最终都源于此。但是，物质实践也说明并体现了物质世界中的人类欲望，不仅通过自我和身体存在的繁衍，而且通过改造周围环境的方式。包括每一个方面，从生存和工作场所的微观技术，到人工形式和人造的城市环境、农业景观和全球改良的生态系统。

(6) **社会关系**环节描述了人类卷入其中的各种社会性形式，以及由这种社会性引起的多少具有稳定性的社会关系秩序安排。它聚焦于人类相互联系的方式——“社会联系的模式”——如他们过自己的生活、共同生产和交往等等。协作结构，劳动分工和阶级、种族、年龄、性别等社会等级，或者能够进入物质和符号行动以及社会权力的具有细微差异的个人或集体，都是包含在这个环节中的问题。

在此，我把一系列行动还原为社会生活的六个基本环节。如我想象的那样，社会过程流入、贯穿并包含着所有这些环节，并且每个个体的行为都同时包含所有这些环节。尽管这种高度图式化(非常笛卡儿化)的说明具有直接清晰性的优点，但它也容易因为粗陋的形式而导致极端的错误。所以，我以第二章概述的辩证思维方式来做一些说明。

80 1. 我在此运用的分析是**辩证的**。每一个环节都被建构为其他环节

在社会和物质生活之流中的**内部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话语把在其他环节上发生的一切都内在化了（因此，我们相信德里达有关“文本之外无物”的基本陈述，或者福柯“话语即权力”的基本观点）。话语表达人类思想、幻想和欲望。它们也在制度上依据于、在物质上受制于、在经验上植根于社会和权力关系的表现形式。因为同样的原因，话语的效果充满并浸透了社会过程中的所有其他环节（例如，影响信仰、实践，并被它们影响）。

但是，使话语凌驾于其他环节之上则是不恰当的、误导的，甚至危险的。在运用内部关系理论时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回避“单子唯心主义”的陷阱和“莱布尼茨式奇想”的错误。当认为对一个“环节”的研究就足够理解社会过程的总体性时，错误就产生了。我们反反复复发现这类口误，把一个正确的辩证主张——如“文本之外无物”——转换成错误的主张——如“任何事物都可以通过文本得到理解”（或者，更糟糕的是“万物皆文本，且只能那样来理解”），以及同样错误的实践，比如说，把解构文本作为一种特权的（有时是唯一的）理解方式。

2. 内部关系通过从一种环节向另一种环节的**转化**而得以形成。但是转化，比如说，从渴求的东西向说、做和制度化的东西转化，充满了危险和困难。某种东西，有时是大量的东西，丢失了。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是相当困难的，但转化，比如说，从作为物质力量的权力向作为话语的权力的转化，常常是一种难以捉摸的事。不同环节之间总是存在着鸿沟，以致漏失、含糊性和无意识的后果必然发生。霸权话语能够通过压迫性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得以维持（诸如前苏联的例子），而无须彻底地侵入坚定不移的信仰、幻想和欲望，这些东西有关种族、民族和性别差异或者上帝、民族和超自然的存在。另一方面，某种政治话语的权力（如撒切尔主义、庇隆主义、法西斯主义和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宗教权利）或许源自那种追逐政治经济权力的离奇能力，既动员并敏锐地促进某种坚定不移的信仰、幻想、担心和欲望来反对其他人，又利用这种动员来维持和促进某种权力关系的构型。因此，虽然每一环节都来自所有其他环节的力量内在化了，但内在化总是这些

81 结果的转换或者变形，而不是精确的复制或完善的模仿。这导致一个问题：如何解释“对应法则”？这一法则的作用贯穿每一环节，对于我们理解社会过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3. 每一种环节主要通过来自所有其他环节的各种各样的冲突结果把异质性内在化(阿尔都塞试图通过运用“过度决定”这个术语来捕获的观点)。例如，权力关系并非同质的。我们不可能先验地知道自己是否应该诉诸权力之与经济相对的权威维度、与以阶级为基础相对的以性别为基础的维度、与原始物质相对的象征的维度(仅仅举几个已经在用的范畴)。同样，围绕信仰、欲望和价值的争论在任何地方都是明显的，它往往使以乌托邦欲望形式存在的不同幻想世界陷入竞争，并使它们以严格的内在创伤或痛苦的外部辩论/政治冲突形式相互对立。信仰的异质性以及欲求和评价的不一致会出现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产生大量的内在混乱和道德折磨。种族主义、精英主义和性别主义甚至在那些献身于反对它们的人身上以令人吃惊的方式表现出来，同样，致力于改变权力关系的新的物质的社会实践因为侧重点的微妙变化而发生分裂，例如，侧重点的选择会在新的物质实践和劳动分工之中恢复旧有权力关系。

4. 迄今为止，我把“环节”之间关系解释成“流”和不受阻碍地从一个环节向所有其他环节流动的开放“过程”。但是“流”常常具体表现为“物”、“元素”以及可以孤立的“领域”或“系统”，它们在社会过程中表现为相对的永恒(而且有时甚至获得了有限的因果力量)。自由流动过程的物化总是在我们身边的社会和物质世界中创造着实际的“永恒”。物质景观(如城市)；社会制度——看起来几乎不可能根据它们得以建构的固定方式来改变它们；劳动分工——它们通过工厂设施和机器获得了如此这般的惯例化和组织化，以至于看起来不可能不重复；社会地构造的话语——它们牢固地限制和规范着行为(例如，本书第三部分概述的那些时空话语)；甚至那些被广泛地接受和物化的话语——它们自身成了好像不可改变的知识景观的一部分，这些都是例子。

“物”如何在过程中结晶的，这个难题困扰着阿多诺。柯勒斯写道：

对于阿多诺来说,世界完全是相对的。每一个物都是它同其他物的关系的“结晶”。然而,“结晶”这个术语在此与“关系”一样重要。相对的世界并非一个纯粹流动与和谐的世界,而是这样一个世界:物在其中结晶成高密度的、无限特殊的并常常非常顽固的实体,它们抵制着自己诞生于其中的周围世界。人们可能说,对于阿多诺来讲,达及对自由的对话式理解,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同时承认这种相对性和顽固性。(Coles, 1993:232)

82

这不是说,永恒、权力结构以及话语的刚性与构造它们的流动过程没有关系或只有较弱的联系。无论如何,我都要强调,分析应该面对如下问题:这种永恒如何能够产生,流动的内部关系如何能够转换成社会因果关系,以及对其他环节发生作用的力量的内部化如何可能限制或破坏与它们相联的社会因果关系。民族国家成功地把广泛的欲望、信仰、话语、社会关系以及制度的和物质的实践都内在化了,并因此成为具有因果力量的实体,正因为这一点,作为人类历史之中相对较晚产生的集中权力,民族国家才具有这种永恒的外观。民族国家作为原因力量发挥作用,否定这一点将是愚蠢的。但是,正如苏联情况所充分证明的,说那些因果力量是永远既定的,不受社会过程产生实体的机制的制约,也同样的愚蠢。

所以,尽管我在此显然并不主张一种因果的或循环的模式(例如,这样一种模式认为,那些掌权的人创建了塑造信仰、幻想和欲望的话语,以便规范制度建设的实践,那种建设为物质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提供了舞台,它们反过来建构了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最终反过来又确保权力的永存),但我确实承认,或许会产生这样一种情形,在其中,一种因果(并且循环的)逻辑好像在起作用。毫无疑问,它正是那些掌权的人的梦想(有时是幻想),从而问题能够或者实际以这种循环的因果方式来调节。正因为似乎不可能摆脱这种循环,所以,从反抗运动的立场来看,这些情形往往令人绝望地困难。因此,即使基本争论关注内部关系而不是因果性,但从这种内部关系的辩证系统中产生的因果结构

(永恒)也可能并且常常实际地结晶,从而不仅给分析而且给社会过程的运行带来难题。在评估社会和文学理论的时候,必须密切关注这种从自由流动过程向结晶化的因果图式的语言转向。

83 5. 话语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人们之间围绕某种行动或信仰路线进行沟通性说服或讨论的环节。沟通行动具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作用范围,这两者都取决于社会地构造的和以技术为中介的穿越时空的沟通能力。话语之中的游戏特别复杂,所以如福柯证明的那样,无法把话语环节同权力操作区分开来。但是,这正是内在化的含义:话语环节是权力的形式,它是信仰和欲望构型的模式,它自身是一种制度,一种社会关联的模式,一种物质实践,一种根本的经验环节。无论话语如何抽象以及看起来如何超验,但它们绝非纯粹的、孤立或隔绝于社会生活的其他环节。它们也绝非隔绝和独立于那些设计话语的人。人类(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是话语的载体。另一方面,尽管是人类制造的,但话语却具有这样令人尴尬的习性:它们对个体如何思维和行动产生一定的影响。就像在社会过程的许多其他方面,在这一方面,人类为自己创造的物和系统所困。这不是贬低那个无法逃避的事实——话语总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联。不过,它的确提出一个棘手问题:当下社会关联是何种性质的。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是,调查语言与话语的关系以及两者同社会存在相关的决定性权力。

二 语言(话语)环节

“语言”和“话语”这两个词常常混同。尽管它们明显地重叠,但我认为,把语言视为更根本的,视为一种重要的原材料,这样做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有益的。作为再现世界的有限(有时确实如此)方式的特殊话语就是从那种原材料中产生的。

围绕语言力量的争论在 20 世纪经历了曲折的过程。首先,人们提出了各种重要的区分,从而产生了不同的语言定义。例如,最著名的

便是索绪尔关于“语言”（作为内部关系、语法规则和词汇位置结构的语言）和“言语”（普通的、日常的言说）的区分。一些人认为，语言虽然被人们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但却是客观和固定的可能性结构（或许在遗传上编码的）；另一些人则认为，语言要么是主观的，要么是广泛历史性的构造。至于语言的变迁是否导致或追随物质实践、制度形式、社会和权力关系、信仰等方面的变迁，围绕这个问题，持后一见解的人产生了广泛的分歧。这与语言及其假定所指之物之间关系的争论有关——在这个问题上，反映论（认为词仅仅模仿它们描述的现实）与构造主义观点（认为我们对“真实”的理解是通过词来构造的）相对。还有各种各样的中间立场和综合的辩证陈述，它们把这些简单的二元论联系起来。

我不可能解决这些争论（我想任何人都不能），但是我采取的立场在其后的分析中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如果时空、自然、环境、地方和正义概念在不同的社会形式和文化构型之间及其内部都是不同的（如我在后面证明的那样），那么我就需要某种方式来解释语言和意义中的差异是如何形成的，从而理解特殊意义的存在及其永久性必定具有何种重要性。

让我们来研究一下沃尔夫—萨皮尔假说。这个假说源自对土著美洲人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它认为，在对“同一种”现实进行感知、理解和行动时，本土美洲人与欧洲人完全不同。例如，从本土美洲人的观点看，空间和时间具有相当不同且不可同化的意义（这种观点在下文讨论中将被采纳）。这使萨皮尔主张，“不存在两种语言，能够相似到足以再现同一个社会现实”，因此，“不同社会存在于其中的世界是不同的世界，而不是贴着不同标签的同一个世界”。

如果把这种观点太当一回事，就会导致某种语言学的决定论，把语言差异看作源自对现实并因此对行为、实践和信仰的不同感知、理解和构造。隐含的意思是非常相对的（每种文化都具有自身不可通约的感觉结构和对世界的理解），同时，它们是强烈的反欧洲中心主义的（认为并不存在唯一的再现和理解世界的优先模式——例如，科学模式）。不

过，沃尔夫的观点有些细微不同。

沃尔夫认为，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词与物的关系通常依据不同方式得到表达——最著名的例子是，爱斯基摩人用许多不同的词来描述我们一般和简单地称为“雪”的东西，他们因此以欧洲人因语言的贫乏而所不知的方式来理解世界并照之行事。但是，沃尔夫对语法结构而不是词更有兴趣，这同我的论点高度相关。例如，在欧洲人那里，时间是通过一个复杂的过去时在语法上构造的，而那种时态在许多本土美洲人的语言中是不存在的。我们只要过学习语法就能学习有关时间的基本观念，而无须特别地注意它。同样重要的是名词(物)和动词(过程)之间的语法差异。沃尔夫使用了“fire(火)”的例子，在本土美洲人的语言中，它通常被作为一个动词(过程)而不是一个名词(物)。但是，在大多数欧洲语言中，“火”是一个名词，并且，我们因此倾向将其视为“物”而不是一个“过程”。沃尔夫的这个例子是很有用的，它清楚地揭示了强调过程的辩证说明如何仅仅通过一种语言媒介就很容易几乎不被察觉地翻译成物之间的关系。但是正如这个例子说明的那样，不存在“决定性的”东西。我可能并且确实赞成把辩证过程论证(例如，有关资本的论证)转化成物—之间的一因果—关系论证。就像我们能够学习大量术语来描述雪那样，避开语言所玩的那些诡计，这是可能的。在此重要的是，注意语言差异和语言界限的意义，同时承认一个似乎不能反驳的定理：在理解世界以及在其中交流时，语言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此这般的语言差异为什么会存在？在此，回答爱斯基摩人具有多种“雪”的名称的原因绝对是可能的，因为它们再生产的社会和物质实践需要它，就好像，我们现在亦使用多种名称来描述不同的合金，而在过去“钢”这个一般术语就足够了。

不过，不能轻易地忽视支配社会生活的语言力量。海德格尔指出，“人好像他自己是语言的塑造者和主人那样行动，然而事实上语言仍然是人的主人”(Heidegger, 1971:146)。许多评论者和理论家几乎与他同时提出这个判断。最近几年，帕尔默称作“沉沦于话语”在当代社会和文学理论中越来越具有支配性地位。帕尔默指出，我们最终

成为虚假前提/承诺的牺牲品：

语言，被广泛地视为意义系统，它彻底地超越了词而包括所有交流方式的符号和结构(从说出来的到下意识的)，它是社会生活嵌入其中的根基。因此，语言构造了存在：它安排了阶级和性别关系，永远关心特殊的等级；它是一个舞台，意识在上面创造它的历史入口，政治在上面得以铭写。并且，作为自己的主人，语言是非指示性的，不可能将其起点和意义还原为“某种原始的前现实”。(Palmer, 1990:3)

帕尔默强烈地拒斥这种转向。他说：“在当前对语言的固恋中，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时常因为对话语的唯一主义理解及其影响而被牺牲了。”(Palmer, 1990:5)因此，丢掉的是“问题的核心：在制度的相互作用中，如何使用文本和解释？它们如何制造和参与了权力和秩序关系？”(Palmer, 1990:45)帕尔默并不认为语言(话语)环节在社会过程中是中立的或消极的，而是主张当它占据一种霸权的和决定性位置时，就会产生严重的理解失败。

社会过程中的语言位置是政治争论的敏感话题。让我们来看由卡梅伦所清晰概述过的例子，围绕作为压迫妇女工具的语言的作用，女权主义内部发生了激烈争论(参阅 Cameron, 1992)。在这个光谱的末端，有一些人，如戴勒·斯宾德，把语言视为完全“人造的”，它编码了男性的观点，意义之父权制象征秩序，它完全规定了女性现实，以至于将男人与女人都囚禁在性别语言的“铁笼”中。政治上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一种替代语言，编码女性的意义——定义自主、自我决定和妇女解放。在此困难在于，如果语言中的意义完全是自指的，那么就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逃避甚至识别难题。因此，某些最具创造性的女性主义理论文献都来自对下述问题的探讨，即如何能够仅仅通过诉诸某种语言环节和幻象与欲望的“精神分析”环节和/或身体实践的环节之间的关系来瓦解“语言的牢笼”，即显而易见的占统治地位之父权制象征秩

86

序。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仔细研究了身体在男根占绝对优势地位的象征秩序中嵌入或社会化的关系环节，正因为这一点，某些有影响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伊蕾加莱和克里斯蒂娃是最突出的——才能利用（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改写）拉康的理论（Cameron, 1992:119, 169）。但是，如卡梅伦进一步主张的那样，这并不能孤立于社会过程中的其他环节来解释：

尽管语言是社会性地生产出来的思想手段，但它并非社会性地得以控制的。通过国家制度，包括大众媒体和新闻及广告业的垄断性私人企业，对语言发展及其使用的控制得到不断加强……符号学家有时并没有意识到阶级或其他少数派控制语言的可能性和现实。

脱离它与其他社会过程环节之间的关系，从任何立场（包括女性主义视角）来探讨语言的作用，都是不可能的。如卡梅伦总结的那样：

虽然语言的确是世界上被压迫人民的一个政治问题，但，坚持不懈地考量把压迫完全或者主要地归咎于语言的政治学，这样做是明智的。毕竟，对于权势者来说，推荐这种说法也是有充分理由的：穷人、黑人和女人说话者处于不利地位是因为他（她）们是穷人、黑人和女人，那种政治学使人们忽视了这个事实……如果语言脱离了社会关系语境，把它视为问题本身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那么它将在总体上失去与斗争的联系。（Cameron, 1992:220）

任何对语言（以及话语）环节的探讨，只要试图将其孤立在社会过程的其他环节之外，都注定是缺乏远见的。并且，我将把这一点作为以历史唯物主义名义提出的那种论证的中心。例如，帕尔默认为：

在文本物质性和话语重要性的理解上,历史唯物主义可以没有任何困难地调各这两者……它可以接受话语在建构社会存在中的重要作用,就如它可能重视语言在劳动政治学和革命改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一样。把话语和唯物主义之间的对立教条地理解成一种解释性选择反对另一种的对立,正是在这一点上,话语要求承认语言、书写和文本之总体化的话语决定性,把自身提升为一种无所不包的权威,既无处不在,又不在任何地方。

不过,帕尔默施了一点值得进一步关注的小计。他写道:“诚然,在这个过程中,‘文本’经常被如此广泛地视为实际上包括了万事万物,从词到制度,再到权威的社会关系。”例如,在地理学中,我们发现,城市、景观、身体以及文化构形在今天都被只解释为文本。甚至制度、权力、社会关系以及物质实践,概言之,差不多整个城市生活都被一种总体化姿态还原成文本,因为这些还原行为大都采取了反总体化修辞,它既奇特又令人吃惊。文本(话语)把存在着的万物都内在化了,并且用解构策略对实际文本(历史、地理和小说)以及语言环节在其中具有明显重要性的广泛现象(如电影、绘画、雕塑、建筑、纪念碑、景观、服饰代码,甚至诸如宗教仪式、政治典礼和大众狂欢节等一系列事件)施加影响,以此来表现有意义的事物,这样说是一回事——为了不引起误解,我将在下文重新提到这一点。不过,主张整个世界只是一个需要解读和解构的文本,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鲍德里亚之流所犯的致命错误,是把生命过程还原成某种在电影屏幕上发生的事,除此而外什么也不是(在最近一本著作中,他奇怪地声称,海湾战争并没有“真实地”发生)。亨利·列斐伏尔抨击了这种总体的还原主义的姿态(他甚至把鲍德里亚的早期著作描述为“同虚无主义的有意调情”):

符号学提出了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当把由文学文本建立起来的代码运用到空间——比如说,城市空间——时,可以轻易地证明,我们仍然停留在纯粹的描述水平上。任何把这些代码

作为解释社会空间的工具的企图都必定把空间本身还原成一种信息的状态,把占据空间还原为一种解读状况。这同时回避了历史和实践……在**被解读**之前,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它被生产出来并不是为了被解读和把握,而是为了让有血有肉且生活于自己城市背景中的人们**居住的**。(黑体字原文所有)(Henri Lefebvre, 1991:7, 72, 143)

- 88 我的立场接近雷蒙德·威廉斯定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立场建立在沃洛希诺夫的开创性作品上。^①威廉斯写道:“语言的定义,无论含蓄还是直白,总是在世中的人类定义。”威廉斯主张,语言是由那种生存方式“构成的”,但这并非是在任何一种单向的决定论意义上讲的,从而不至于说物质实践决定语言,或者相反。他主张,语言是“人类自我创造之不可分解的环节”(Raymond Williams, 1977, p.29)。同样,必须把它理解成一种历史—地理的创造物。尽管需要一个形式结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其可能是什么已经谈论了很多),但是在最后的分析中,语言永远不可能被当成某种孤立于更广泛的历史地理变迁之流的自主之物。“因此必须把语言看成一种永久性的创造和再创造:一种动态的在场和持续不断的再生成过程”(Raymond Williams, 1977, p.31)。有用的符号是:

持续不断的社会过程的生动证据,个体都在其中诞生和塑造,但是他们也因此在持续过程中积极地作用于它……因此我们发现的不是一种物化的“语言”和“社会”,而是一种活跃的社会语言。这种语言也不只是“物质现实”的一种“反映”或“表现”。勿宁说,我们所拥有的是通过语言所把握的现实,作为一种实践意识,它由包括生产活动在内的全部社会活动所浸透并且反过来浸

^① 沃洛希诺夫是巴赫金的笔名,巴赫金以此笔名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等重要著作。——译者注

透所有的社会活动……语言是这种活跃和变化的经验的表达，是在世界中的动态和接合性的社会在场。(Raymond Williams, 1977, pp. 37—38)

在此，语言把社会过程的所有环节都内在化了，这种含义非常强烈，但威廉斯并没有使那种内在化成为游戏规则。在这里，他追随沃洛希诺夫，后者主张：

词语—符号是积极的、历史变化的、不断改变的交流环节，而非固定的、中立的、非指示性的、任意的单位，它的意义由语调和语境传达，而语调和语境自身总是阶级、社会集团、个体以及话语之间冲突和斗争的产物。(Palmer, 1990, p. 23)

三 话语的内部异质性

让我借助话语环节来阐明“内化在每一环节中的异质性”的含义。

话语形式有很多，从科学、医学和职业的专家话语，到那些依附于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劳动制度或劳动分工的特殊的劳动话语，直到那些更加一般的有关社会、自我和自然的话语，包括那些戏仿、幽默以及宗教、邻里和政治身份的话语。这些话语总是易于相互渗透，而且在正常的状态，我们常常发现自己不经意地就从一种话语模式转到了另一种。研究表明，这种转换意味着各式各样的口误、含混和不连贯。不过，这种口误并非仅仅在我们同儿童、父母、老师、医生、警察、加油站服务员或老板发生话语交流时才发生。就应该起作用的话语规则而言，口误同样明显地发生在似乎相对稳定的那种背景中。科学家突然诉诸来自性别经验的比喻，以编码他们对所谓客观事实的理解，律师转用文学故事来证实他们的案件，哲学家用市场语言来证实他们的形而上学主张。我将在第七章和第十三章中特别地指出，这样的口误在环境

89

争论中是特别明显的，其中，有关自然的冲突性比喻大量存在，头脑冷静的科学家会突然滑到诸如“我们如何正在耗尽时间”的比喻性市场语言(当人们读到斯蒂芬·霍金有关那种商品的“简史”时所产生的一种古怪念头)，热情地忙碌于自然事务的浪漫主义者，以及深度生态学家会突然援引拉乌洛克的该亚模型、量子力学或者混沌理论的数学话语，好像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完全一样的。

因此，就不难理解争论如何总被内化进话语环节。反霸权和持不同政见的话语(例如，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生态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性别主题都是当代学院先锋的最爱)向霸权形式发出挑战，而正是由于这些争论，社会变迁才得以发生。互文性分析能够说明话语效果如何穿越多个表面上独立的话语领域而规划出一个复杂的“轨迹”，有时预示了分裂性结果。而在其他一些情形中则对普遍深入的意识形态提供隐蔽的支持。如第七章将证明的那样，所谓中立的科学话语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和男性中心意识形态提供了沉默但强大的支持。

但是话语环节内部发生的激烈斗争未必不加改变地转移到其他的环节之中。女权主义者或许会有效地改变学术圈中(或者，更可能的是，在诸如历史和人文研究这样的有限领域中，其他更为广泛的科学领域则并未触及)有关妇女、性别和性的话语，但不会重要地影响那些根深蒂固的幻想、欲望、信仰和物质性社会实践(例如，儿童教育和家政)，或者权力关系的基础。如果内涵和联想建立在同一意义构型上，那么仅仅改变词就没有什么影响。在美国，“nigger”(黑鬼)这个词依次变成“negro”(黑人)、“black”(黑人)和“African-American”(非裔美国人)，但种族偏见并没有改变。这并不意味着改变话语的斗争是多余的，只不过诸如此类的斗争对在别处发生的变迁承担着一种必要而非充分环节的功能。

话语环节内部发生的异质性的内在化创造了大量的传播混乱和启迪的机会。在社会生活之流中，话语能够迷惑、隐藏和歪曲同其他“环节”的关系。在此我不是单独讨论“弥天大谎”的技术，因为存在着

各种手段，话语可能藉此限制或制约着想象力(有时是无意的)，以至于阻止对那些严重问题的讨论。阶级话语或许掩盖了严重的性别和种族问题，反之亦然。受到攻击时，我们可能会通过故意破坏话语来保卫自己，将之作为一种增强力量的手段。在处理“拜物教”问题时，马克思主要便是与这种困难作斗争。不过，流动的社会过程的客观化和物化，人与人之间关系转化成概念之间的关系，如威廉斯非常中肯地阐述的那样，也可以发挥作用。这种混淆而不是启发的话语用法，主要地与这样的驱动力相关联，即通过阻止问题的认识或阐述来捍卫某种既有权力的立场(实践、信仰和制度)或者某种抵抗空间。例如，在美国最近发生的有关卫生保健的争论中，反反复复的民意测验表明了一种信念，即普遍的覆盖范围是适宜的，歧视病人和体弱者的行为是不公正的，必须采取某种措施来遏制医疗成本。困难在于定义能够符合那种信念的制度和实践，然而在此，那些拥有巨大政治经济权力的人——保险公司、医院、医生，等等——能够发动话语攻势，把问题搞得如此混乱，以至于不能采取任何行动。话语斗争阻碍着变化——把话语当成一种不作为的工具来用——而非促进变化。

福柯所称“彻底的多元主义”和话语的异质性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如果不同的话语在根本上是联系在一起，那么它们如何彼此关联？是否存在着一种足够普遍的语言，使任何一种公共政治学成为可能？福柯正确地抨击了某种“时代精神”的观念，认为它们太过简单。他说明了不同制度的权力基础如何产生了适合于它们自己环境和规训目标的非常不同的话语。但是对差异的认同并不否定同一性的可能性，带来了这个问题：何种同一性、何种共同语言在差异中间是可能的。在下文，我将因为各种原因而回到这个问题，比如说，如果“自然”的意义和“环境”的意义在话语上的差异是不可能协调的，那么就不可能存在有关环境的公共政治学，使我们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成为任何一种话语的结果：不管它是什么，只要它在特定时空中是霸权话语。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在话语上反思社会和文学理论中的各 91

种有效的理论话语的权力和价值？本章开始提出的社会过程的“辩证图”能够促进那种操作，现在我来更详细地考察那张地图。

四 社会理论的一般特点

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这个著名的小册子中，沃洛希诺夫在结尾部分实际上粗略地提到了我在本章开始概括的那个六点图式的所有方面：

如果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明身份，哪怕内部言语，个性也既不会赋予自身，也不会被赋予别人；……语言能够阐述内在个性及其意识，能够创造、区分和深化它们，而不是相反。语言中个性的形成，说实在的，与其说表现在语言的抽象形式中，还不如说体现在语言的意识形态主题方面。从自己内在的主观内容角度看，个性就是语言的主题，而且这个主题在比较固定的语言结构范畴里得到发展和变化。因此，**不是言词成为内在个性的表现，而是内在个性成为被表现的或被驱入内部的言词。**言词表现了社会交往，表现了物质个体和生产者之间相互的社会作用。这种全面物质交往的条件决定和制约着在任何特定时代和环境中内在个性能够获得的主题和结构……内在个性伴随着语言而形成，在言词的具体而全面的意义上，是其最重要的和最深刻的主题之一。语言的形成同时也就是社会交往形成的环节，这一环节与交往及其物质基础是不可分割的。物质基础决定着社会的分化，决定了它的社会政治秩序；物质基础有等级地组织社会并配置其中相互作用的人们；这些也都决定着言语交往的地点、时间、条件、形式和方式，同样也制约着语言发展中个人表述在任何特定时期的变迁，它的不可渗透性程度，它感受不同方面分化的程度，它的观念

和言语的个性化的特点。(Volosinove pp.152—153)

在此处，沃洛希诺夫定位了语言(话语)在某种“决定的方向性”之中的作用。在这种情形中，方向性通过语言从社会和物质实践向个性和信仰运动，使主体的其他部分不连贯的内在生活地广泛回应外部社会力量 and 物质活动。这是一个极好的范例，它演示了流动的辩证阐述(沃洛希诺夫通常所致力的那种)如何常常通过语言自身的技巧蜕变成更简化的因果图式。但是，它也直接地面临着决定问题。社会变迁的支点在何处呢？内部关系哲学回避了这个问题。

92

在社会理论的历史中，围绕真正的社会变迁支点所在存在着长期争论，争论常常被还原成因果结构研究。然而，把流动的、辩证的和动态的陈述不假思考地具体化成因果图式，这可能会在批评家及其追随者那里产生严重误解。在有关身体的解放政治学的探索中，据说福柯集中于话语和权力的结合点，将之视为社会变迁的首要原因。尽管德里达强调(在我看来是正确的)文本把一切都内在化了，但他(或至少他的许多追随者)似乎主张文本的解构(在狭义上)在本质上是革命的。韦伯被认为聚焦于信仰(主要是宗教)与制度建设之间的关系，而马克思通常被解读成，至少在著名的“归根结底”意义上，把其他的一切都当成物质实践(生产力)的派生物。在每一种情形中，一个环节被转换成某种赋予了独立因果力量的实体。

确实，每一个卓越的理论家都倾向诉诸一种特殊的“永恒”(环节)结构，把各种“环节”之间的关系固定下来，从而使社会获得结构化秩序。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使这种或那种环节具有优先地位，成为社会变迁的核心。这样一种结构化的系统似乎把社会过程囚禁在再生产的循环因果关系的铁笼之中(如马克思的“资本的逻辑”、韦伯的“官僚制的一技术的合理性”，或者斯潘德的“语言的牢笼”)。因此，这种系统如何通过循环的和积累的因果把自身永恒化，如何迫于自身内在矛盾(马克思)或者由于某种唯意志论的爆发或边缘的腐蚀而得以打破它，这些都典型地反映了社会变迁的困境。在每一种情况中，我们都

可以合理地提出这个问题：能够改造结构并且把社会过程从既有永恒性中解放出来的力量(权力的地点)在何处呢？

我们能够为这些因果关系见解找到大量的文本证据，不过，它们必定会使人们对大多数重要的理论家的复杂论证产生严重误解。更加辩证的思想同时打开了一种完全不同水平的理论化。例如，在马克思那里，许多论点都恰好关注动态和流动的过程如何历史地转化成“结构的永恒性”，如那些刻写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积累逻辑学之中的东西。在寻找社会变迁地点的时候，马克思清晰地主张：正是在话语和信仰领域，我们开始意识到政治问题并“以斗争的方式解决它们”。

93 此外，这种“以斗争解决”必然使制度建设(工会、政党、国家权力、宣传和规范霸权话语的霸权制度，等等)成为通往变革性物质实践和社会关系的道路的根本环节。对政治经济权力替代形式的探索在马克思的思想和实践中具有重要作用。无论在其全部重要著作中，马克思都自由地在各个环节之间穿梭。生产和再生产的物质实践的“归根结底作用”，可以说，既是出发点又是成就的测量点——在这个点上，我们可以切实地判断出什么东西已经实现了(这非常像货币，通过各种变体，如货币、商品和生产，承担着资本主义循环是否完成的测量功能)。物质实践占据着重要位置，因为马克思相信，对于全部人类知识以及对在世界中“存在”之意义的理解来说，与世界的感性互动具有优先地位的基础。并非只有马克思才拥有这种信念，例如，它为大部分西方科学提供了根基。物质实践是测量点，恰恰是因为，只有根据与世界的感性互动，我们才能够重塑在世界中“存在”的当下意义。

但是，这是否暗示着，物质实践环节是唯一的充满意义的社会变迁的地点？这似乎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难道他不是同恩格斯一道清晰地论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念：

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

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①

在这一段落中,内在的张力是非常明显的。从物质基础出发的单线因果图式,作为一个起点最后被转换成不同“环节”在总体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括号中强调的)。由于这种总体性,语言环节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便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的:

只有现在,在我们考察了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还有“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精神”从开始就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② 94

在《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描绘了想象与作为政治行动至关重要环节的语言之间的关系: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

^① 此处译文取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译者注

^② 此处译文取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译者注

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就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新语言翻译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①

当马克思探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拜物教观念,并试图代之以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学语言时,这种对语言的专注就成为其著作的持久主题。通过解构商品和利润的货币化语言,并创造一种强调剥削的替代性语言,马克思明显地希望使用语言和命名的力量来达到政治目的。他的目标是使我们关注资本主义矛盾和破坏性逻辑,同时理解,它的政治经济权力是自我复制的,不仅通过生产—分配—消费的社会物质实践,而且通过它的意识形态(话语)和制度(国家机器以及学习、法律和宗教制度等)的霸权力量。不仅在他的理论著作(如《资本论》)中,而且在其公开的政治评论中,马克思都在不同“环节”之间自由穿梭。物质实践并非唯一的变迁杠杆,但是它们是这样一种环节,所有其他的作用和力量(包括物质实践内部的作用和力量)都必须聚集在其上,以便变迁成为(经验和物质的)现实而不会仍然是一种想象和虚构。因此,与那些

95 试图寻求因果结构的解读相比,非机械的和辩证的解读表明了一种相当不同的对马克思论点的理解。

^① 此处译文取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译者注

同样，当把福柯还原成一种因果图式时，他便容易被误解。乍看起来，在他的物的图式中，福柯确实似乎把话语的决定性力量描述成一种占优先地位的环节。但是更一般的论证似乎是，“权力”是通过话语的灌输和以制度为基础的社会实践——这些实践主要是作为对身体产生作用的规训力量而组织的——来发挥作用的。话语通过权力、社会实践和制度之间的关系而形成，它把它们的形式和来自社会过程其他环节的力量都内在化了。话语环节获得了表面上自主的对社会生活的规训权力，以至于忘记了正是过程构成并支持着它。话语的功能是创造“真理”，那些“真理”事实上是话语中的“真理的效果”，而不是它们声称的普遍真理。在福柯看来，这种“真理的效果”特别有害，因为它们源自作为权力化身发挥作用的制度（收容所、医院和监狱）。他的主要目标是破坏这些“真理的效果”，并且揭示话语中的真理如何总是社会过程其他环节的一种内在化结果。这一观点的吸引力在于它从一种环节向另一种环节运动的方式，这种方式揭示了每一种环节把其他环节的结果内在化的机制。在其历史研究中，因为要重新揭示欲望的基本真理在根本上是不可能的，尽管福柯偏爱（或许出受拉康影响）知识“考古学”，但在其著作中并不缺乏对欲望/信仰/价值环节的讨论。像马克思一样，他承认，我们总是被囚禁在物的效果的世界中，不过他把物质性观念扩大从而把过去的话语也包括进来。因此，虽然有无数段落可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福柯的“话语决定论”倾向，它宣称我们永远被对我们有利的话语所囚禁，但他做出论证的段落也总是包含着很多模棱两可的暗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下列特质体现出来的：他不仅在话语环节自身的内部坚持一种彻底多元主义的、内在化的异质性，而且诉诸某种实际上与任何决定论逻辑根本无关的要素。

第五章

历史行动和社会变革的地点

96 诸如福柯和马克思提出的那种占统治地位的反人本主义理论，它们如何说明社会变革的方向和形式？在社会过程的某处必定存在某种行动，它们能够打破社会理论通常描绘的压迫性社会秩序之表面自主的再生产。

一 论残余和边缘

多数社会理论和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分支采取了断然的反人本主义论调，它们常常主张“主体”（个人）好像很少或根本就不具有外在于塑造主体的那种社会地和历史地构造的内部关系体系的自主性。尽管不同理论家对社会变迁的方向和样态或许有不同的基本解释，但把个体囚禁在社会化过程中的总体意识都很强。面对这种情形，理论家们频繁地受到他们自己论证逻辑的压力，被迫认同我称为在社会过程某些环节存在的“残余”或“剩余”，这些东西不知何故逃出了统治逻辑、规训机构、历史的重负、语言牢笼的提问方式，等等。例如，威廉斯是这样来叙述格林思想的，当他在威尔士山漫步的时候：

在他图书馆的图书和地图中，或者在山谷的屋子里，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历史，在学术共同体中，这一历史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得到解释。然而，他不得不继续前上山去寻找一种不同的思想来表达自己的：这种思想具有顽固的本土性和地方性，然而却建立在

一种更加开阔的共同之流基础上,在其中,感觉和气度替代了记录和分析;它不是叙述的历史而是活生生的故事。

威廉斯几乎不是典型的反人本主义者。但是他对决定的关注,特别是对历史地构造起来的语言权力的关注,使他处于人本主义和反人本主义传统的边界之上(这似乎一直是他偏爱的位置)。不过,在这一段落(在他作品中存在着许多类似的段落)中,重要的是这种强烈主张:在某一环节(这里指语言)的主导形式中存在着不能被捕捉的东西。这种“东西”“顽固地”抵制着任何关系决定的结构逻辑对它的同化。阿多诺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根据柯勒斯的说法,对于阿多诺来说,魔力和神话:

往往会打开一个空间,它远比因为对非同一性的承认而直接给定的空间要深远,它超出了我们当前掌握的范围。当神话承认自我和世界都可以进入的超验性剩余的时候,世界就不再是一种压迫自我的不变力量,而自我对世界的把握不再具有那种不变的和无尽的牢笼特征。(Coles, 1993:232)

或许,最生动的例子是福柯,其坚定的反人本主义几乎不容置疑,但是他把身体愉悦定位成剩余而公开的抵抗地点,同时他又描述了那些“独特方式”的政治史,“借助这种方式,各种各样相继的权力/知识体制在各自技术和实践中把身体规训为一个对象”(Fraser, 1989:61)。结果身体成为社会秩序中进行竞争的首要地点,也暗示着,在身体政治中总是存在着某种残余物,它处在应用于它的控制体制之外,无论那些体制如何总体化和严厉。特别选择身体作为抵抗地点,这在极大程度上源自福柯本人的偏见,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其观点的多数影响源自对下述观点的广泛共鸣,即应该抵抗对身体的压迫,身体政治是革命行动之所在。

拿另一个例子来说,通过诉诸符号学领域,克里斯蒂娃以象征性父

亲秩序(男根)来论证自己的道路,那种秩序属于儿童时期的前俄狄普斯的母性导向阶段。那一阶段是无性别的,并且正因为这一原因,它是与那种对象征秩序的表面挑战相反的真正挑战的唯一基础。尽管由于其母性功能,妇女在理解这一领域时具有优越性,但那一领域并非对男性是封闭的(他们也具有一个前俄狄普斯阶段)。这种符号学要素的轨迹作为对象征秩序的一种永久性秘密挑战而长期存在。例如,克里斯蒂娃在马拉梅和兰波的诗歌,以及女权主义理论本身之中都发现了它们。她主张,真正的革命意识正是从这种符号学领域产生的。

98 另一方面,现象学家往往去寻找不确定存在的经验要素之要素。尽管海德格尔把语言视为我们的主人,但是他称为“在场”——占有世界某些方面使之进入人的存在——的经验环节却是那种剩余的潜在地点,这些剩余可能成为一种在世中存在的替代性方式的源泉,以其他方式处在威胁着要统治个体的生活世界的技术—科学—经济理性之外。

然而,这种方法存在着一个难题。潜藏的疑虑是,实际讨论的是:如何逃避特殊理论结构权力的方式,而不是与在实际历史地理情境中发生的社会变迁过程相关的东西。反人本主义理论家们似乎通过发现存在于他们自己决定体系之外的某个便利的“自由”角落,而从他们创造的困境中发掘自己。因此,存在着一些区分两种不同马克思主义——束缚在资本逻辑中的马克思主义和唯意志论革命行动的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古尔德纳的解读是最清晰的)。如果这是事实,那么一个严肃的问题就产生了:变革地点(在马克思看来,存在于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行动之中)是真实地存在,还仅仅是一种依赖理论论证的必然虚构?在后面,我将为反驳这种解释提供理由,但是定位行动问题如此普遍深入,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涉及全部基础。而且,诉诸某种要素中的“残余”或“剩余”也很不幸地习惯于把自己作为社会系统变革行动的唯一原因和唯一地点。让我用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1. 拉康的残余

第一个例子来自社会性之流中全部“环节”中最困难的,即有关人

类信仰、欲望、幻想、恐惧、梦和价值等领域的环节。弗洛伊德以来，这已经成为精神分析的主要领域。精神分析对欲望及其实现/否定/压抑的理解现在常常作为一种不可还原的“自由”要素占据着优先地位，因此成为“真正的”变革地点。

我们来看一看齐泽克对共产主义垮台之后东欧民族主义意外复兴的拉康式分析。齐泽克认为，拉康的基本主题是：

我们称为“现实”的东西是……在排斥某种创伤性**真实**基础上而产生的。当拉康说，幻象是现实的最终支撑时，这正是他想说的东西：当某种“象征性极乐”的幻象框架隔离了对**真实**之深渊的观察时，“现实”稳定了自身。幻象远非梦一样的蛛网，阻止我们“把现实看成它实际上的情况”，它构成我们称为现实的东西：最通常的身体“现实”是通过幻象的蛛网曲折地构成的。换句话说，我们为接近“现实”付出了代价：某种东西——创伤的**真实**——必定被“压抑了”。(Zizek, 1993:118)

99

这引出了两个直接结论。首先，“现实”总是由幻象构成的，即某种**真实**的东西被体验为“现实”，它必须“适合我们幻想空间的预定坐标”(Zizek, 1993:43)。其次，离开它的幻象支撑，话语行为是无意义的(Zizek, 1993:213)。齐泽克强调，幻象建构了一个“硬核”，抵制向话语行动的象征秩序的还原，或者向任何所谓“客观的”现实属性的还原。在一个回应威廉斯的段落中，齐泽克说，“**真实**是一个剩余，一个硬核，它抵制任何塑模、模拟或隐喻化的过程”。

这里的问题涉及社会过程三个“环节”——经验现实、话语现实以及支持它们的幻想信仰——之间的显著差异。齐泽克通过追踪这些差异来观察民族意识形态——一个被称为民族的实体之构型——是如何发生的：

一种只要主体相信(在他者的信仰中)便“存在”的实体,其悖

论性存在是意识形态原因特有的模式：在此，“正常的”因果秩序被颠倒了，因为原因自身正是由其结果（它鼓励的意识形态实践）生产出来的。重要的是，正是在这个点上，拉康与“话语唯心主义”之间的差别最强烈地浮现了：拉康并没有把（民族等）原因还原为话语实践的述行结果。纯粹的话语结果并不具有足够的“物质”来获得原因所特有的吸引力——而且必须要补充拉康式奇特的“物质”术语，从而使原因获得其实际的本体论的坚固性，精神分析承认的唯一物质当然是快感（如拉康在《再来一次》中的清晰说明）。只要它的特别快感在一种社会实践中持续地被物质化，并且通过构成这种实践的民族神话加以传播，一个民族便会存在。因此，以一种“解构主义的”模式来强调民族不是一种生物学的或超历史的事实，而是一种偶然的话语构造和文本实践的过度决定的结果，这会令人产生误解。这样一种强调，忽视了某种真实的残余，非话语的快感内核，它必须为民族作为话语实体——结果获得自己本体论的坚固性而在场。

该段落包含着多种意义。首先，被理解为仪式化“实体”（或永恒）的民族“制度”，它的构造是如何与那种使话语和幻想/信仰/欲望之间特殊关系物质化的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的。这至少涉及表 4.1 所描述的四种“环节”。不过，社会关系（阶级和性别等级，横向差别，劳动分工）被忽略了，人口也被视为同质的，尽管其显然不是。对这种假设的弱证明依赖下列主张，即民族有关其他主体信仰中的主体信仰。安德森把民族解释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这种类似引人注目。同样地，这种论证忽略了权力，不过，齐泽克的观点是，正是在革命的时刻，在 1989 年，权力（在精神分析中被理解为“主人能指”）似乎被解除了（即使，如齐泽克很快承认的那样，它“实际上”并没有被解除）；他试图回答的问题是，“消失的主人能指”之空洞的空间最后如何被民族主义填满的。这些都是吸引人的问题。

论证的最后一步是困难开始的地方。在精神分析的“环节”中识别出一种“负隅反抗的”残余是一回事，但是否认任何此类其他环节（如话语或物质实践）的权力则是另一回事。因此，在此基础上就可以把建立在“快感”之上的东欧民族主义的复活进行还原主义的精神分析，认定它是人类幻想和欲望的表现。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过程“环节”中内在化的各种力量成了社会决定的地点。齐泽克的论点主要是作为其他理论化的替代方案而提出的，它看起来是一种逃避手段，而没有令人信服地分析民族主义政治——它的制度和实践，它的话语和权力关系，它的社会关系，以及它的“幻想空间”——如何实际地扎根于日常生活这一问题。

2. 来自边缘的声音

最近几次政治争论的最不值得称道的特点之一是激进政治学浪漫地转向“来自边缘的声音”，似乎这种“声音”更加本真、更少腐败，因此更加革命。这种新的动向认为，有一些人，他们是彻底的“他者”，彻底地处在占统治地位的决定体系之外，在循环和积累的因果性铁笼的边缘，他们并且也只有他们才能看穿愚弄我们其余人的拜物教，和实现彻底的变革。

这种出于政治救赎而向边缘化的“他者”的浪漫转向部分源自传统运动（如工人运动）没能促进彻底的变革。今天，有人认为，工人阶级的幻想空间如此彻底地被资本主义万物商品化所叠加的想象所占据，工人阶级政治文化的话语领域如此被无情剥削的大众媒体所统治，而且潜在的政治抵抗制度如此地官僚化、受惠于并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的利益，以至于工人阶级（即使还存在的话）仅仅是资本主义积累在其文化、政治和主体性上附加的东西。因此，这种论调继续强调，它成为革命行动当事人的能力已经大打折扣，如果说，还没有完全丧失的话。因此，（必须）寻找其他的历史变迁当事人。尽管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但却不能武断地拒绝它。

101

不过，浪漫地转向来自边缘的声音，将其作为中心地带政治救赎的

手段，却有另外的理由。例如，齐泽克主张，基督教传统——这种传统相信，目标的真正高贵性以某种方式隶属于总体堕落（如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状况——假设，只有那些贫困的、边缘的以及被压迫的人才能够超越他们的国家，告诉我们平凡的真理并将我们带往福地。人们认为真正的高贵性只能在堕落中存在，“超越”便是一个有效术语。因此，人们最终痛苦而绝望地发现，那些贫困的、边缘的和被压迫的人常常缺乏那种偶然见到的非凡的和令人感动的高贵性，并且他们常常并不渴望一个根本不同的社会秩序，而是渴望那种能够让他们分享特权的的社会秩序。人们常常以为，边缘化的“他者”的运动比中心地带的政治激进主义具有更高水平的道德目标和政治承诺。

但是还有更多的可靠理由来认识对待边缘问题，将之视为逃离占统治地位话语的地点。雷蒙德·威廉斯（参阅本书第一章）积极地将其“边界”位置当成一种基本资源，以此挑战占统治地位的观念。米切尔说：

人们会觉得，威廉斯实际上总是生活在边界上，他自己比喻的“边远乡村”之中，这使得他能够非常有效地深入观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内部。可以说，他能够同时从**这里**和**那里**来观察他的两个世界，对于他来说，这绝非两种景观或地方；事实上，它们是“有人”的景观、活生生的世界和真正的共同体，在其中，人们分享社会和文化，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成就和绝望、危机和成功、神话和信仰、“十分丰富的生活”。从那种具有优先地位的“边远乡村”经验出发，威廉斯……构思一种多面世界观，这使他发现人们之间的重要关系，这种观点并非自然地“给定的”，而是必须自觉地追求并且通过顽强的，甚至有害的探索和努力揭示出来。首先，这些关系必须是活生生的并且能够感觉到的；其次，必须由公正的和中立的观察者描述出来。（Di Michele, 1993:27）

在此发挥作用的是运用“立场”(威廉斯往往也求助于这个术语)和位置(地点)来创造批判性空间的至关重要的能力(属于同普遍化的政治进行对话的战斗特殊主义的主题),从这个空间来挑战霸权话语,甚至包括那些关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话语,如第一章所述,它们致力于解放边缘化的和被剥夺了权力的工人阶级。但是,威廉斯为自己定义的边远空间在其生活、工作和思想中具有相当复杂的功能。它部分地是一种实际的避难的物质空间(不是记录在记忆中就是在日常积极经验中),部分地存在于主流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之外。这种经验领域支撑着统治和霸权话语的语言之外的“比喻性”抵抗地点。这种位置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抵抗地点,这是某种无所不包且确定的理论所达不到的(外在于外部决定力量的一种独特的“感觉结构”)。这是绝不会被夺走的反霸权政治学的最后避难所,绝不会被驯服的残余之地(与福柯诉诸人类身体的方式非常相像)。这是替代性话语、政治学和想象能够从中诞生的空间。

102

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 1990)采取了相似的论证路线。在一篇有关“选择边缘作为彻底开放性的空间”的尖锐文章中,胡克斯回溯了她的历程,“从一个南方黑人小镇开始”,战胜家庭和共同体的压迫(“妈妈和爸爸盛气凌人地压制着我……黑人共同体的审查制度”),到上大学,在这一历程中,自始至终都要被迫与“各种压迫我说话的努力”作斗争。一路上,她不得不正视语言的压迫:

当我读到爱德丽安·莱希的这句话,“这是压迫者的语言,然而我需要它来同你谈话”,我还只是一个慢慢地变为妇女的小女孩。这种使我能够读上研究生、写博士论文、应付求职面试的语言,充满了压迫的气息。语言亦是斗争的地点……我敢用同一种语言对被压迫者和压迫者说话吗?我敢用一种超越统治边界的语言,即一种不再约束、束缚或者控制你的语言——对你说话吗?

她学会了穿越边界,并且竭力反对“由种族、性和阶级统治造成的”压

迫。这是一段充满痛苦的经历。“发出声音”必然会造成“个人对地方、身份和欲望的强烈情感变化”：

我们所到之处，到处都存在着压制、拉拢和破坏我们声音的压力。当然，通常我们都不在那里。我们绝不会“到达”或者“不能停留”。退到我们诞生的那些空间，我们绝望地自杀、堕入虚无主义、陷入贫困毒品之中，落入能够命名的每一种垂死的后现代模式中。然而，当我们将少数人呆在那种“他者”空间时，我们常常太隔绝、太孤独。我们也会死在那里。我们中那些活着的人，“成功”的人——热切地坚持我们不想失去的“田园”生活的外表，然而同时又试图寻求新的知识和经验——创造了彻底开放的空间。离开这样的空间，我们将无法生存下去……。对我来说，这种彻底开放的空间是一种边缘，即一种意义深远的边缘。

103 正是从这种边缘的空间——“一个具有创造性和力量的地点”——出发，贝尔·胡克斯创造了一种激进干预：

这种边缘性[是]反霸权话语生产的中心地区，我们不只是在语言中而且在既存的习俗和生活方式中发现那种话语。同样地，我不是在谈论人们希望丢弃——当进入中心而放弃或抛弃——的那种边缘性，而是谈论人们驻留甚至依靠的那种边缘性，因为它增进了人们的抵抗能力。它给我们提供激进视角的可能性，人们以那种视角观察和创造，想象替代的新世界。

但是，何种新世界呢？抵抗什么呢？种族、性别和阶级压迫？货币化的经济和商品化的文化？数不清的垂死的后现代死亡方式？重叠和异化的生活方式？霸权话语（包括那些宣布解放黑人和妇女的霸权话语）？答案无疑是上述所有内容。对威廉斯来说，对语言的密切关注

同为人处世的方式强有力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体验社会关系、运用权力的方式。语言(话语)是一个斗争的场所。但是，脱离火热生活和统治权力关系的历史地理而发动的话语斗争是无意义的。贝尔·胡克斯强调：“这不是一种神秘的边缘性观点。它来自活生生的经验”。边缘不只是一种比喻，而且是一种具有真实基础的想象。从那个地点出发，人们可以有力地谴责那些在中心地带形成的所谓的解放性话语：

我在等待他们不再谈论“他者”，甚至不再描述能够谈论差异如何重要……这种有关“他者”的论调往往也是一种面具，一种掩盖差异的压迫性言说……[它]消灭、擦除：“在我能够比你更好地谈论你自己的时候，没有必要听你的声音。只要告诉我你的痛苦。我想知道你的故事。然后我将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讲给你听。我会以这种方式把故事讲给你听，它已是我自己的故事。重写你，我就重写了我自己。我仍然是一个作者，一个权威。我仍然是殖民者，是说话的主体，现在你处于我谈论的中心。”

面对如此这般的殖民话语，不难想象，像斯皮伐克那样，贝尔·胡克斯更喜欢德里达诉诸的莱布尼茨式奇想——“使某人内心的他者声音发狂”。但是，在此，贝尔·胡克斯通过诉诸一种(物质实践的、仪式的、社会的和权力关系的)经验之结以话语挑战霸权，在那种经验之结中，梦想和欲望在某种统治话语允许的外部找到了表达方式：

停。我们把你们当成解放者来欢迎。这个“我们(we)”是边缘中的“我们(us)”，是居住在边缘空间中的“我们(we)”，边缘空间不是一个统治的地点，而是一个抵抗的地点。进入那个空间……

这种在边缘中动员和构造的效果，它们在话语中的内部化便是使语言成

为斗争地点的那种东西。立场、位置和地点的观念在此非常强大：

我不得不离开那个自己称为家的空间，跨越边界流浪，然而我也需要回到那里……实际上，“家”的真正意义随着非殖民化和激进化的经验而发生变化。有时，家不是任何一个地方。有时，人们只知道极端的疏离与异化。那时，家不再只是一个地方。它是一个位置。它使各种各样的且不断变化的视角成为可能，并增进了这些视角。它是这样一个地方，在其中，我们发现观察现实和差异领域的新方法。

需要阐明在这个段落中发生的转换。是否存在着从人们可能称为“家”的真实“空间”（一种安全的但在某种意义上限制性的环境，在其中，成长和生成都有严格的限制）向比喻的“空间”的运动，后一空间对不同的生成开放，也对在全世界涌动的多种力量开放？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比喻性空间又是如何构成的呢？存在着两种危险。首先是以彻底开放性的名义滑进莱布尼茨式奇想，把那种比喻性地点转换成一个据说满足于自身的无窗空间，因为它把来自外部的结果内在化了（参阅德鲁兹（Deleuze, 1993）对莱布尼茨的探讨）。其次，不知不觉地接受由碎片化和不可解决之差异组成的后现代世界，成为一个似乎在定义上彻底开放的万物汇集的纯粹点。贝尔·胡克斯似乎朝那个方向前进：“人们正视并接受分散和碎片化，视之为新世界秩序的组成部分，它更加彻底地表明了我们所在之处，我们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是一种不需要忘却的秩序。”

对齐泽克和贝尔·胡克斯做这两点扼要的考察，主要目的在于检视以某种方式外在于或超越霸权统治规则的“残余”或“剩余”观念是如何建立的。一旦得到确定，那种剩余便被用以识别能够改变历史地理变迁之霸权方向的力量、抵抗和组织化力量的地点。最近几年，人们越来越多地把这种抵抗统治实践由以开始的自由点定位在“边缘”。来自边缘的声音——在这一点上，贝尔·胡克斯选择的定位是象征性

的——成为需要我们将其作为重大社会变革征兆加以密切关注的当务之急。那么，形成变革方向的行动点位于何处呢？为什么论证又越来越多地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援引空间性？

二 变革地点

105

第一个问题——行动之地在何处？——最简单的答案是：到处都是。这并非如其乍看起来那样无用的答案。从辩证的/基于过程的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来推理，必须解释的不是变迁本身，而是压制变迁和/或赋予其方向的力量。在社会过程中，任何环节都不缺乏改造行动能力——一种新的想象；一种同其他话语特别结合而产生的新话语；新的仪式或制度构型；新的社会关联方式；新的物质实践以及身体经验；源自其内在矛盾的新政治权力关系。每一环节都充满了变革潜力。因为劳动分工在不同环节间不平衡地分配，所以，有特殊技能的个人在一些领域，比如说，话语或政治制度领域，总是有能力运用某种变行动。不过，这也引起如下几个有趣的问题：

(1) 如何控制或规训所有这些不同的潜力或可能性来创造我们每天在称为社会的实体中遇到的永恒循环因果结构及系统？历史地和地理地获得的社会秩序，它们的稳定性如何由社会过程的流动性或流凝结而成？历史唯物主义确实提出了这个问题。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例如，他详细地考察货币是怎样从交换中产生的，资本是怎样从货币的循环中产生的。马克思并没有完成那种分析，倒是其他一些人沿着他的足迹更详尽地揭示了资本起源的细节。

(2) “对应法则”如何在不同要素间建立，以担保一种既定秩序的稳定性的稳定性？即使容易被一种令人误解的机械的和因果的解释所影响，马克思的一般论证在这点上也特别有力。话语、想象、权力、社会关系、制度和物质实践在资本主义总体性中必须成为有差别的东西，不

是将其理解为物，而要将其理解为一个变化中的社会过程，这一过程贯穿社会过程的全部环节。马克思的出发点是物质实践以及日常生活和劳动的经验世界。但是，他进一步深入研究了那些有助于保持社会秩序稳定的全部环节之间的必然关系（在此，稳定并不意味着永恒不变。因为，只有通过变革，尽管只是局部变革，资本主义才能再生产出自身）。

106 (3) 在这一过程中，是否存在内部矛盾，至于这些环节之间和环节之内的张力变成变革的支点？马克思确实认为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内部情形。这样的矛盾自动地把资本主义变成各种冲突力量的内部战场，由于绝不能精确地预言这些力量的权力平衡，这使得历史变革的轨迹悬而未决。劳资之间的阶级矛盾、资本过度积累/贬值而产生的危机趋势（再加上全球资本主义瓦解成敌对的地缘集团），为保护企业家创造性和进取心而保护言论和研究的自由，同时需要压制不同政见者的声音……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的任务便是确定主要矛盾在特殊的历史地理情境中的所在之处，以及它们可能如何相互联结。例如，在《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观察到这种情况：某些矛盾变得突出但最终却被其他矛盾掩盖——1847—1848年的过度积累/贬值危机揭示了主要的劳资矛盾，但结果却因国家压迫变成资产阶级合法性、合理性和制度的内部化危机。

(4) 马克思不相信社会过程之全部决定过程之外存在“剩余”或“残余”观念。由于矛盾，所以在系统内部存在着无数的支点，持不同政见的集团或个人可以利用这些支点沿着这条或那条道路来改变社会变迁的方向。也总是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历史唯物主义试图理解那些薄弱环节是如何形成的，它们在过去如何被用以塑造社会系统的当前状态，社会再生产中的那些薄弱环节现在可能存在何处，以及何种当事人出于何种社会目标来利用它们。

(5) 那么，社会变革的当代事人是谁，他们又在何方呢？再一次地，最简单的答案是任何人，任何地方。生活、行动和交谈着的每一个人都牵扯其中。这正是威廉斯的观点，他认为，通过个人的使用，

语言不断地发生着重构。但是，为什么某些个人和集团最终会认为社会秩序是不公正的压迫并需要彻底改变呢？这是一个更加特定的问题。他们如何在个体和集体层次上进行动员以影响变迁的轨迹呢？这些是更困难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目标是试图理解个体和集团如何最终理解他们自己及其现实，并根据这些理解来采取行动。在这其中，存在着许多幸运的和偶然的東西，这是因为存在着全部当事人自己卷入其中的矛盾，以及随之产生的他们理解自身和现实的方式的异质性。结果使得政治经济变革成为一种不可预见（且远不是机械的）的事件。

例如，相关的大众运动表明，历史变迁之舞容易受到年迈独裁者的性幻想和空想所左右。即使大众运动发挥作用，那些被视为首要矛盾的决定作用也总是任何人都可以争取到的。政治必须同时处理社会过程的所有环节，在话语、制度、社会关系、权力政治学、想象和物质实践之中建立自己的反一致性，并在它们之间建立对应规则。考虑到这些环节之间的运动以及我在前面提到的转换困难，对于这些关系来说，也就不存在什么可以自动预言的东西。因此，与工人的想象打交道，与处理生活和劳动的经验世界一样重要。斗争绝不会孤立地定位自身，或者甚至把自己主要定位在社会过程的一个环节上。

所有这些听起来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肯定极大地不同，在某些方面也确实如此。然而，在我看来，以真正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方式来观察变迁的行动和地点，这是唯一可能的方式。因此，问题仍然是如何把这些观点同某种更加明显的马克思思想——特别对革命性阶级斗争的奉献——结合起来，尽管在表面上，马克思主义同这些观点是如此地不兼容。

马克思的难题不是解释变化，因为变化极少以标准和稳定的方式发生。马克思的一般难题也不在于解释特殊集团、利益和权力如何“把握时机”，如何在一场生死斗争中使社会过程的这个或那个方面转化成对他们自己有利或不利（例如，1818—1852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感兴趣的是**革命**。他努力理解那种构造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安排的

总体性如何变化；简言之，如何推翻资本主义。不过，那也意味着理解作为一种秩序安排的资本主义如何通过变化(技术、管理和话语)和各种形式的斗争(战争、民权运动、殖民对抗、种族冲突等)来保存自己。这就直接汇集到唯一最重要的问题上：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安排的结构来创造一种被称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替代社会，充要条件是什么？我认为，马克思的结论非常简单，并且毋庸置疑地正确：跨越资本主义的唯一道路在于劳动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相关利益集团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贯穿于社会过程的全部环节。

108 所以，对于马克思来说，问题不在于什么人将成为历史的当事人，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但是，一种集体当事人如何才能团结起来成为完成这种革命任务的战无不胜的政治力量呢？行动问题根据政治义务来定义。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献身于那种而非其他政治呢？答案相当简单。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中得到加强的永恒结构和内部化关系对无数大众特别有破坏性；它是不道德和不公正的，同时它也是对人类的生命威胁，是对和否定人类潜能的嘲弄。尽管在这种回答中夹杂着一点点浪漫主义(特别是对人类潜能的呼唤)，但没有这种替代性想象，在繁荣之中的人类贫困、贫穷和堕落现实就不会不能忍受。^①

当然，也存在着各种各样反对马克思的观点。阶级对立绝不会完全把自己构造成一致性力量，即使它已获得一点点权力，也不能彻底地改变事情。即使存在着反资本主义的阶级对抗在其中成为惯例的历史阶段和地理位置，现在实际上也消失了。最重要的是，一门心思搞阶级就排除了那种对以性别、性偏好、生活方式、种族、种性或者宗教身份以及联盟关系、地理区域、文化构型等等为基础的其他历史压迫进行研究。纠缠在一起的种族、性别、地理和阶级问题产生了各种复杂性，同时阐述几种压迫势在必行。在许多这样的情境中，所有这些反抗都具有某种真理性。

^① 原文意思相反，但从逻辑上看，原文可能存在笔误。——译者注

但是，也必须考虑相反的抱怨：有些人拒绝马克思的政治承诺以及必然属于这种承诺的阶级行动，他们实际上重新回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人类贫困、堕落和否定的描述，并且作为历史当事人同特定永恒的再生产串通一气，这些永恒是资本主义从其他开放、流动和动态的社会过程创造出来的。

坦率地讲，马克思政治承诺的力量使许多人感到紧张。福柯也许说出了很多人的意见，他写道：

这项在我们的极限上开展的工作，一方面必须打开一个新的历史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使其自身接受现实的检验，当前现实的检验，两者都抓住了变化在其中是可能的和可欲的那些地点，同时确定了这种变化应该采取的精确形式。这意味着，我们自己的历史本体论必须抛弃声称是全球的或彻底的全部计划。事实上，我们在经验中认识到，主张逃离当前现实系统以便建立另一个全新的社会、思维方式、文化和世界观，这只是向最危险传统的复归（Foucault, 1984:46）。

这种警告是有益的，值得认真对待。但是，抛弃声称是全球或彻底的全部计划，这一点却是极为有害的。这导致福柯偏爱那种“总是局部的和地方的”计划，但另一方面也希望这些计划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实现一般原则。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回到近似于威廉斯的“战斗的特殊主义”观点，以及我在前面提出的第二个普遍问题：人们在今天为什么如此频繁地诉诸“局部和地方”——空间性（不是以这种姿态就是以那种姿态）——将之视为能够对社会变迁轨迹产生实际影响的残余力量的地点？

109

三 通向一种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

最近几年，人们提出了这样一种与众不同但却相当普及的主张：

“空间”规定了差异、他性、没有管束、不可预见、意外等等领域，因此也规定作用地点和解放政治支点。空间为全部有关社会过程的元理论规定了不可驯服的残余。这些非常强烈的主张值得我们批判性详察。它们预示了这个问题，如何理解有关行动和社会决定问题的差异地理学和理论化的空间性。例如，诺尔-塞替纳(Knorr-Cetina, 1994)指出，社会学中的某种运动“暗示着同启蒙运动思想的决裂”，“否定了许多同现代联系在一起的特有特点”。这些运动聚焦于微观分析：

通过诸如民族志、话语分析或视觉方法等手段对社会事件进行详细描述……最重要的是，微观分析已经揭示、强调并描述了现代生活的地方本质；整个微观分析都依赖概念的地方化，通过这样一些术语来集中体现，如民族志中的“地方秩序”和“指示性”，象征互动学派的“情境”、“背景”、“舞台”比喻，现象学中的意义“领域”和“情境性”，等等。整个微观分析革命是一场**经验的空间化革命**，而不是有关小事情的革命。

从相当不同的方向可以产生同样的情感。当福柯坚持，辩证法是“一种通过把总是开放的和冒险的冲突现实还原成黑格尔框架以达到逃避目的的手段”，他运用这样一种辩证法，它不会“在事件之间做出区别”，不会“对它们从属的网络和等级进行区分”(Foucault, 1984: 56)。因此，诉诸空间的特殊性(网络、等级和联系)，就能够很容易地避免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目的论。这同那种传播得相当广泛的观点相一致，罗斯把这种观点归于费尔巴哈，即时间是“辩证法家的优先范畴，因为它排除并压制空间包容和协调的地方”(Ross, 1988: 8)。在地理学中，我们也会发现这种观点的鼓吹者。例如，塞伊(Sayer, 1985)主张，时间是必然王国(并因此是社会理论抽象的真正优先领域)，而空间则是偶然王国(并因此是特殊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地理研究的真正优先领域)。

让我来阐明自己的观点。说“空间”在社会决定或者理论化之

外，甚至更过分，强调它以某种方式处于辩证法之外，我坚决反对这种主张。我也不接受——至少不需要很多条件——政治等价物，即“边缘空间”是彻底开放性和革命可能性的所在之处这种观点。这并不是说，解放了的空间是不可能建构的，不可能在真实的或比喻的意义上把空间的社会建构用作革命政治战略的要素。特别强调的是，它也不意味着，“来自边缘的声音”不值得倾听，或与反资本主义统治的政治斗争无关。事实上，如我将在下文试图表明的那样，政治战略的空间化（地理政治学）对于任何形式的解放政治学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要挑战那种向所谓空间性的不确定性的转向，认为空间是自由的要素、抵抗的场所，因此是社会变迁的发源地。我在下文（第三部分）将证明，以这样的术语来思考是对空间自身如何通过社会过程得以建构这个问题的根本误解。

我的观点部分源自经验。我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进入学院地理学的，当时，对地方唯一性的信仰在想象上使这门学科排除在“理论之外”。这种例外论主张是20世纪60年代激烈争论的内容，我随后耗费了自己学院生涯的大部分时间试图拒斥那个假设，并且揭示诸如空间、地方和环境这些主题可能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理解的方式。除了改变政治承诺，我在知识上向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转向主要源自它是揭示诸如此类问题的最好方法。我因此对下述现象感到惊奇：那么多的当代学者，匆匆忙忙地逃离他们视为囚笼的元理论的禁锢，却又试图回到一种例外论风格的论证。在20世纪50年代的地理学中，这种风格的论证产生了一种愚蠢、冷漠、碎片化的、落后的和非生产性的工作作风，在其中，理论假设和偏见（在20世纪50年代的学院地理学中，这些假设和偏见与帝国主义以及把世界视为资本积累领域的那种理解直接联系在一起）隐藏在例外论主张的后面。当然，有理由证明，现今已经获得成功的理论诡辩造成了这种阴沉的工作风格。但是，即使斯皮伐克那样有见识的评论者也担心过快地从元理论撤退的政治含义：

无论一种经济分析看起来如何简化，法国知识分子还是忘记

111 了,整个过度决定的事业都是为了一种动态的经济情境,这种情境需要无情地破坏利益、动机(欲望)和(知识的)权力。他们为此自担了风险。今天,那种错位已经被看成一种激进发现,它使我们把经济(描述性地划分“阶级”的生存条件)看成过时的分析方法,运用这种错位可能会延续它的作用,并且无意中有助于维护“新的霸权关系的平衡”。(Spivak, 1988:280)

但是,对空间偶然性的普遍信仰,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原因。首先,空间性的插入,甚至更加特殊的作为物质和社会过程产物的动态和流动的空间性构造观点的插入,典型地破坏了许多社会理论。想一想新古典经济学的例子,在其中,理论至关重要地依赖于对竞争条件下均衡价值形成机制的揭示。考普曼斯和贝克曼揭示的是,甚至在一种相对简单的空间区位/部署难题上,均衡也不可能形成。这种“悖论”(它对考普曼斯获得诺贝尔奖具有重要作用)从未解决,这使得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将自己的论证建立在流沙之上。同样的问题存在于某些阶级分析(它无意中发现了诸如邻里、网络、社群、城市和民族的空间化)、大多数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例如,罗默和赖特的理论)、黑格尔辩证法的各种版本(包括其最近在福山之“历史的终结”论调中以某种篡改形式的复活)以及某些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之中,它们设计出了自己的理论图式,就好像空间秩序安排和变化着的空间生产似乎并不重要。

许多社会理论忽视了空间(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们假设了一种稳定不变的实体和永恒的空间结构)。当空间性被重新引入时,这些理论所提出或推论出来的假设将会瓦解。因此,把空间性作为一种釜底抽薪的工具来攻击这些理论既是正确的又有好处。但是,认为不存在空间生产的理论,或者对任何一般的或元理论的研究都必须抛弃,这种推论也明显是错的。

但是,如何才能构造一种有关空间性的理论话语,如何才能使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更加明显的地理属性?后面的章节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些问题。在此,我只是对“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话语必须涉及的问题

做一些初步的评论。

(1) 建构任何种类的知识，“绘制空间”的话语行为都是先决条件。离开对情境、区位和位置在其中发生的空间的绘制，任何有关“情境性”、“区位”和“位置性”的谈论都是无意义的。而且，不管空间绘制是比喻的还是真实的，这都同样正确。

112

(2) 绘制是一种具体体现权力的话语行为。以一种而不是其他方式绘制世界的权力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政治斗争工具。因此，围绕绘制的权力斗争(同样，无论这些地图是所谓“真实的”还是比喻的空间)是话语生产的基本环节。

(3) 社会关系总是空间的，并且存在于某种生产出来的空间性框架中。换句话说，无论在哪个方面，社会关系都是某种绘制的地图，无论是象征的、比喻的，还是物质的。组织社会关系需要一种绘制行动，以便人们知道他们的位置。革命行动需要对社会关系和当事人进行重新绘制，那些当事人不再承认他们先前被分配的位置。此由得出的结论是，空间关系(以及那些空间关系的话语)的生产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改变一种就是改变另一种。

(4) 物质实践改造着作为全部空间知识来源的经验空间。这些变革性的物质实践部分地与话语地图和计划一致(并且因此是社会关系和权力的表现)，但它们也是象征意义、神话和欲望的表现。通过物质实践创造出来的空间性(如果它们是生活、交往、工作、象征活动和仪式以及享乐的框架)也构成物质框架，在其中，社会关系、权力结构和话语实践得以展开。

(5) 制度是生产出来的多少具有持久性空间。在最显见的意义上，它们是领土化——控制和监禁的领地、管辖的地形、组织和管理的领域。但是，它们亦带来了象征空间的组织化(纪念碑、圣地、围墙、大门、房屋的内部空间)和符号体系的空间控制，这些东西支撑和指导着各种形式的制度实践和忠诚。对象征空间秩序的干预以及学习解读制度化景观的语言学，这是权力作用于个体的结果，这种结果在保障社会秩序方面具有主要的作用。

113 (6) 想象(思想、幻想和欲望)是各种可能的空间世界的肥沃资源,那些世界能够预示——尽管没有条理——形形色色的话语、权力关系、社会关系、制度结构和物质实践。在研究社会过程及其结果的替代性绘制时,空间性想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这一点上,许多社会和文学理论的结构常常是借助某种想象对不同的和难以处理的过程和事件的秘密图绘。秘密常常谨慎地遮蔽了存在于制度永恒性之后的权力和社会关系假设。因此,把这些想象转化成话语,这个环节是关键性的,不是因为其决定性意义,而是因为正是在那种关系环节上,对制度、权力和社会关系的好恶最明显地表达出来了。

对处理空间性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普遍倾向进行这种图式概述还有许多未尽之处。在下文,我将尽力充实该图式,不仅在空间方面,而且在诸如时间、地方和环境等同类术语方面。不过,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一种形式的话语,并且它在社会过程中也具有自己的位置性。它以一种完全有别于传统社会和文学理论的方式帮助我们理解世界。但是,如马克思很早之前就指出的那样,我们的任务不仅是理解世界而且是改造它。但是,把它改造成什么呢?在此,政治承诺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因此,像马克思那样,如果我相信我们必须面对的基本矛盾是资本的破坏性逻辑,那么就必须把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视为与那种政治目标有关的一种话语环节。但是,如我开头评论的那样,写一本书就是在话语领域做出承诺,并且不可避免地受它的规则和界限的制约。话语和语言或许是至关重要的斗争地点,但它们不是唯一的或者甚至必然就是最重要的斗争地点。在写一本书的过程中,我便局限于其中。然而,运用话语来反思自己建构的话语的本质,这种批判性能力能够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这就是本书余下部分要讨论的内容。

第二部分 环境的本质



第二部分前言

1970年“地球日”，《财富》杂志出了专辑。该刊祝贺把环境问题作为一个“非阶级问题”提出来，而且，在一篇特约社论中，尼克松总统强调，下一代将完全依照他们继承的环境质量来评判我们。“地球日”当天，我参加巴尔的摩市的一个校园集会，听了几个鼓舞人心的演讲。这些演讲大多数是由白人中产阶级激进派做的，抨击人们不关注空气、水、食物的质量，悲叹以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世界，这个世界正在产生各种各样的资源耗竭和环境恶化。第二天，我去左岸爵士乐俱乐部，这是巴尔的摩市非洲裔美国家庭经常光顾的大众场所。乐师们在演奏间隙交替地插入对环境恶化状况的评论。他们谈到失业、破落的住宅、种族歧视、衰败的城市等问题，最后说主要的环境问题是尼克松总统，这使氛围达到高峰，使整个俱乐部爆发阵阵欢呼。

我一直认为，“环境问题”对不同的人必然具有不同的意味，总的来说，成了无所不包的问题。商业领袖担心政治和法律环境，政治家们关心经济环境，城市居民注重社会环境，罪犯无疑会留心法律的执行环境，污染者盯着管制环境。这么一个简单的词，如此众多的用法，这证明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它在根本上缺乏连贯性。然而，就如“自然”这个词，它“包含了，尽管常常被人忽视，异常丰富的人类历史……与其他观念和经验变化一样，既复杂又不断变化”（Williams, 1980:67）。“环境”这个词也一样，多种用法是有益的。它“被忽视的”方面带来了特别的难题。拉夫乔伊评论道：

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的含混性，纯粹的词具有作为一种历史力量独立行动的能力。一个术语、一种状态、一个公式，它们获得流行或接受，是因为它的一种意义或者思想，这暗示着，它们与流行的信仰、价值水平以及某一年龄的趣味具有相同的性质。这些术语、状态或公式，可能会有助于我们改变信仰、价值和趣味，因为其他的意义或者暗示的含义——并没有被使用它们的人清晰地区分出来——渐渐地成为含意的主要因素。“自然”这个词，几乎不用说，是最与众不同的例子。(Lovejoy, 1964:7—14)

当代，关于“自然”和“环境”这些词的战场成为政治冲突的前沿，就是因为包围它们的“不完全清楚的假设，或者或多或少无意识的心理习惯”。当然，主要在意识形态和话语领域，“我们才意识到政治实质并且以斗争方式解决它们”。

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下列原因而起，诸如“自然”和“环境”这样的词传达了很容易吸引特殊主义政治学的共性和普遍性。毕竟，“环境”指的是周围的一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某种存在物周围存在的一切，与其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状态相关。就如把环境定义成他们自身的周围条件，存在物的“情境性”及其内部条件和需要对环境的定义也很重要，尽管相关性的标准也可能极大地改变。就在罗德尼·金的判决出来之后，一个站在诺曼底和非格罗两个街道拐角处的洛杉矶警官，他几乎不会去想臭氧层漏洞问题，而在南极洲低地研究那种漏洞变化的科学家则会深思洛杉矶的叛乱，前一情境比后一情境更常见。条件、需要、欲望和情境极少长时间保持稳定，从而使得固定的环境问题的定义变得没有实际意义。

我们都生活在一种“环境”之中，因此，对“环境问题”可能是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虽然如此，最近几年还是出现了一种粗略的公约，把“环境问题”限定在可能意义的一种特殊子集之中，主要聚焦于人类活动和福利与其他一些问题之间的关系上，这些问题包括：(1)支撑人类生活的生物群落或生态系统的条件或“健康”；(2)空气、

水、土壤和景观的特殊质量；(3)人类活动“自然资源基础”的数量和质量，包括可再生与可耗竭的资源。但是，甚至温和的生态中心的解释都相当严格地质疑这种公约对“自然”与“文化”的隐性区分。随即，“环境主义者”和“生态主义者”之间的政治/哲学划分在政治上产生了争论，前者对环境采取一种外部的且常常是管理的立场，后者则把人类活动看作是在自然中的嵌入(并因此以情感、美学以及工具的术语来解释人类健康观念。参阅 Dobson, 1990)。无论如何，公众越来越承认，大部分我们称为“自然”的东西，至少就地表生态及大气来说，都已经被人类活动极大地改变了。(Marsh, 1965; Thomas, 1956; Goudie, 1986; Turner et al., 1990)因此，城市的人造环境和乡村边远地区的人为改良环境，这两者之间的区分是长时间存在的城乡之间的意识形态区分的特别表现，除此之外，还显得很任意(Williams, 1973)。然而，我们忽视那种区分的意识形态权力是危险的，因为它借助于生态学的花言巧语强化了一种普遍深入的反城市偏见。

在下文中，我将试图建立一种理论立场来理解一般所称的“环境问题”。藉此，我希望把这些问题与社会变迁以及“自然”和“环境”的评价方式联系起来。我努力表明，全部有关“环境”的提议都必然是社会变迁的提议，针对它们的行动总是需要用某种评价体制的“自然”来做具体的例证。最后，通过把环境和社会变迁整合到一种辩证的和历史—地理的思维框架之中，我希望推导出一种建议性的方法来面对这样一种困境：环境难题的社会定义常常是看似矛盾并相互排斥的。

第六章

对自然的统治及其不满

一 问题

120 我们先来看两段话：

因为我们将土地视为属于自己的商品，所以就滥用它。当我们
将土地视为我们所属的共同体时，或许就会带着爱和尊敬来使用
它。（Aldo Leopold, *The Sand County Almanac*）

凡是在货币本身不是共同体的地方，货币必然使共同体瓦
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前提是：劳动直接生产交换价值，
从而生产货币；而货币也直接购买劳动，只要后者在交换中让渡
自己的活动……所以，货币同时直接是**现实的共同体**，因为它是一
切人赖以生存的一般实体；同时又是一切人的共同产物。^①

从马克思的视角来看，利奥波德提出的土地伦理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一个无望的追求，在这个社会中，货币共同体压倒了一切。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必然需要建构一种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替代模式。有趣的

^① 此段译文取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178页。——译者注

是，那种论点的清晰性和自明性并没有在生态/环境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政治之间建立某种友好关系；这两者基本上仍然是相互对立的，上述两段引文表明了原因。利奥波德在狭隘的经济限制之外定义了一个思考和行动的领域；他的观点非常明显是一种以生态为中心的思维方式。按照利奥波德的定义，工人阶级政治及其彻底改变政治经济过程的任务似乎使问题永恒化了而不是解决它，因为它充其量只是提供了一种工具的和管理的眼光来对待自然。而在最坏的情况下，社会主义追求的是“普罗米修斯式”计划，在其中，对自然的“统治”不仅被假定为可能的而且是值得的。

121

在下文中，我将尽力考察是否存在什么办法来沟通这种对抗，并将之变成一种创造性而不是破坏性张力。是否能够创造一种进步的生态政治，它不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乞求某种居高临下的理解、支配甚至统治？对于进步的社会主义政治来说，是否或应该存在一个地方来实现与众不同的“生态”视角？如果存在，那它将在何处？再及，我们如何克服这种表面上的僵局，在其中，为了从阶级压迫中解放出来而进行的斗争似乎与那种把人类从与自然的纯粹工具关系中解放出来的斗争如此对立着？

二 对自然的统治

当代生态学思想常常把这类问题以及许多当代环境难题的根源追溯到启蒙运动的自大和错误导向，归因于其下述观念：自然是供利用的，并且对自然的统治是切实可行的计划。这种观点迫切需要详细审查。

赞成对自然进行支配、“统治”、控制或者“教化”的哲学观点，虽然它们或许在基督的统治教义中具有意识形态根基(White, 1967)，但在17和18世纪才盛行。弗兰西斯·培根热情洋溢地提出这些观点，笛卡儿则在《方法谈》一个著名的段落中提出，最好不要通过思辨哲学来追求“所有人的福利”，而应通过获得“对生活有益的知识”，

从而“使我们成为支配自然界的主人翁”。这种观点隐含在现代科学特别是工具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价值之中，它们都着眼于人类对“自然”世界的利用。马克思说，笛卡儿和培根“用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眼光来看问题”。动物不再如它们在中世纪那样被视为人的助手，而被理解为机器。这“预示了生产形式的改变和人类对自然的实际统治，是思想方式改变的结果”。尽管马克思的判断有点俗套，但我认为这很重要：把统治观念的表达视为一整套思想、信仰、感性、态度和实践的一部分，它们在17和18世纪西欧社会的政治经济中获得了支配地位(Cassier, 1968; Leiss, 1974; Merchant, 1983)。

122 “统治自然”这个主题的特殊作用能够在启蒙之人类解放和自我实现这对孪生观念中得到最好的理解。解放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从物质欲望和需求的、身体的、生物的以及社会的不安全感开始，经由个人受国家、王朝或阶级特权和权力的各种各样压迫，到从迷信、错误意识、组织化的宗教以及各种各样臆断的非理性信仰中解放出来。自我实现甚至是一种更为含糊的主张，但是它确实要求释放人类个别地获得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它也要求打开全新的个体发展图景，无论通过生产、消费、艺术、科学和文化成果，还是政治或法律。它亦伴随着泰勒所称的“现代文化之大众主体转化，一种新形式的灵性，借助它，我们最终把自己视为具有内在深度的存在物”(Taylor, 1994:29)。“我们内部的自然之声”成为行动和理解的重要组成部分。坦率地说，当这种大众主体转向与任何一种内部关系哲学结合起来的时候，它便造成了严重的危险——它产生了最坏形式的“莱布尼茨式奇想”。不过，它亦推动了虽然危险但是有用的“我”与“它”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为现代科学研究“在自然中”发挥作用的过程提供了基础。那种分离是解开自然奥秘从而推动解放和自我实现的关键。

解放(常常是一种集体计划)和自我实现(多半是个人化的)是一对不可分离但常常矛盾的孪生目标。因为统治自然的主题从属于这两者，它也使矛盾内在化了。这一点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变得清晰可见。最初，人们把公共领域的解放当成自我实现的前提，同时把个体解放视

为集体解放目标的适当手段。并且假设理性总是能够把两者统一起来。但是，

整个 18 世纪就是在这种意义上理解理性的，即不是把它看作知识、原理和真理的容器，而是把它视为一种能力，一种力量，这种能力和力量只有通过它的作用和结果才能充分理解。理性的性质和力量，仅从结果是无法充分衡量的，只有根据功用才能看清。理性最重要的功用，是它有结合和分解的能力。它分解一切简单的事实，分解所有简单的经验材料，分解人们根据启示、传统和权威所相信的一切；不把所有这一切分解为最简单的成分，不把关于这些事物的信念和见解分解为最终因果，它是决不罢休的。分解之后就开工建设。理性不能在这一堆支离破碎的废墟前停步；它不得不从中建起一座新的大厦，一个真正的整体。^①

这种**创造性破坏过程**“既怀疑又确信，既破坏又建设”（卡西尔语）的结果绝对不同于当代对它的描述。不过，启蒙思想确实同样相信：自然的奥秘——包括人的本质——必然会大白天下；知识——以及自我认识——不仅可以使人类更加舒适自在，而且亦可打开人类历史之自觉政治选择的领域。而且，由批判思维产生的启蒙，“不仅有模仿的功能，而且具有塑造生活本身的力量和使命”^②。福柯主张，正是这种批判态度而不是任何教条原则体系，仍然如此强烈地使我们承担着启蒙实践的义务。但是，如何揭示自然和人性的奥秘，启蒙往往也持有一种特殊的看法。在某些关键性方面，它脱离了 17 世纪宏大的演绎体系，在笛卡儿、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的著作中表现出来的那种体系，而把牛顿（以及洛克）视为指南。研究起点是现象的经验——观察，而处理以这种方式获得的数据的方法则是分析，目标是揭示那种深植于事实之中

123

^① 卡西尔：《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 页。——译者注

^② 卡西尔：《启蒙哲学》，序言，第 4 页。——译者注

而不依赖任何超验解释(诸如莱布尼茨假设的作为上帝智慧表现的普遍和谐)的普遍原理和法则。只有通过发现自然的“真正法则”，我们才能学会以有利于我们物种的方式“自然而然地与自然相处”。

这些启蒙原理至今一直有力地塑造着对自然世界的态度。然而，它们曾经并且将继续充斥着自身特殊的“非理性”。已经融入我们理解世界方式之中的假设，它们自身并不服从理性或归纳的证据。我们已经探讨过(本书第二章)笛卡儿的理性——它在某些方面仍然为启蒙思想提供依据——如何在某种水平上陷入了严重的矛盾。在下文(本书第十章)，我将继续研究牛顿的绝对时空概念如何同样会带来无根据的先验概念。牛顿及其追随者假定，存在着统治物质世界的普遍法则，有待揭示它们并给予恰当的逻辑/数学表达。休谟揭示了其中的超验假设，并且以典型的启蒙方式使牛顿的数学经验主义分崩离析，转而构造自己的怀疑论经验主义。休谟亦以某种方式重写了笛卡儿的心—物二元论，克里考特在今天就是依据这种方式建立了生态伦理的基础。当18世纪慢慢过去时，吸引牛顿的机械体系与对生物有机体及其历史的研究之间的概念张力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它们以某种方式预示着有机论哲学家(如怀特海等人)和机械体系哲学家之间的当代冲突。把自然科学方法应用到社会研究的做法引发了持续至今的各种争论。

124 实际上，启蒙思想具有显著的异质性。例如，维柯和卢梭支持解放和自我实现的一般观点，但与笛卡儿、洛克、伏尔泰以及百科全书派哲学家们在追求什么以及采取何种道路的问题上完全不同。双方都彻底怀疑科学知识有能力来理解自然意义(维柯主张，这些东西外在于我们，并且因此不可能理解，反之，我们能够理解社会是因为我们创造了它)。尽管解放和自我实现这对孪生目标或许需要所有反对阶级和具有革命思想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广泛支持，但其确切意义却因地方和人群的差异而显著不同。事实上，启蒙思想充斥着种族、性别、地理和阶级方面的偏见。不过，除了这些明显非常有害的盲点，这样完全不同的偏爱手段(以及它们在社会实践中的最终嵌入)，无论是对偏爱对象的定义还是对实际主张的发展道路来说，都具有强大的意义。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由洛克、休谟和亚当·斯密开创而由李嘉图和穆勒进一步发展的启蒙运动产物，它把市场自由及其看不见的手——推动技术变迁并把科学动员成生产技术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看成一种工具，它把从需求和需要中解放出来的不断增长的社会生产力与通过市场选择而自我实现的个人能力结合起来。这并非暗示，任何生产或消费都将如此，因为不只是这一传统中那些边缘思想家才极度相信并希望，通过品味的提高、休闲的陶冶、价值的培育、行为的教化将实现消费选择的自由，从而使社会达到迄今为止仍未知晓的文明程度（甚至在凯恩斯之后，这仍然是一种狂热的信仰）。这种免于国家额外干预、贵族和王朝特权的自由，是自由修辞的非常有力要素。然而，对于被放逐的农民和工人阶级——他们都涌入整个欧洲的中心城市——以及妇女和被殖民者来说，它仍然要么沉默，要么陷入困境。当然，从今天支配着经济改革的私有化计划和自由市场之花言巧语来看（例如，在苏联曾经发生的那种情况），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仍然在理论和实践上困扰着我们。让市场放任自流，解放和自我实现将随后而至，这是主要资本主义权力和制度（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哲学。

然而，这往往会导致高度的工具主义自然观，把自然看成是资本财产的组成部分——供人类开采的资源。18世纪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副作用是，把统治自然看作解放和自我实现的必要条件。为了按照人的意图来控制自然，为市场交换而开采它，甚至根据人的设计来教化它（并出售它的质量），因而就需要复杂的自然知识。但是，统治命题绝非故意包含对自然世界的破坏和掠夺。除非在这样一种丰裕的条件下，即放任的和不加抵制的消耗产生了理性意义，否则的话，需要采取审慎的态度把自然财富作为一种形式的资本加以保护和增加。如果存在破坏和损耗，那么它也是一种无关紧要的无限丰裕的征兆。当它产生重要影响时，价格系统会进行调整以显示需要加以注意的匮乏状况。如果存在着公然的掠夺，那么错误在于掠夺成性的无情商人和农业资本主义——它们在这一期间开始盛行起来——的轻率行为，而不在于启蒙思想自身。

125

无论如何，启蒙思想家采纳了比自由主义理论家们所说的更为广泛的方案。其中有一些是那样地不合情理和相互对立，以至于我们不知道是否应该将其视为严格意义上启蒙整体的一部分。它们包括由萨德侯爵以及像巴贝夫那样的雅各宾派革命家提出来的特殊的自我实现和解放观点。不过，如果在这种混乱的可能性中存在着其他吸引人的东西，那便是社群主义传统，这种传统一直并将继续把解放和自我实现看成一种集体的而不是个体的事情。各种各样的社群主义者、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原始共产主义者以及大量的平民道德理论家，他们至少具有如下共同点：无论是全体还是部分，自由市场都不可能为他们提供适当的解放和自我实现手段，必须发现政治经济组织的替代形式——一种真正的公共领域或某种“道德经济”——来实现启蒙的诺言。从这一角度看，甚至有可能把诸如奈斯这样的深度生态学家在今天特别重视的（以及利奥波德含蓄地表达的）自我实现教条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启蒙冲动，它被投射到包含人类生活深嵌于其中的整个生态系统的共同体概念之中（参阅本书第七章）。

126 19世纪马克思版本的启蒙计划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启蒙计划完全相反，然而它亦与多数社群主义的教条也不一致。当然，如他的对手一样，马克思也深切关注解放和自我实现问题，并在此意义上完全赞同启蒙运动的目标。在《资本论》中，他指出，自由市场、看不见的手必然在交换领域释放平等，而在生产领域中压迫和剥削工人阶级，因此，就实现启蒙目标来说，这是一种具有致命缺陷的机制。工人阶级解放具有自己的前提，对市场作用进行最低限度的社会和政治控制，并且如果可能的话，彻底改变生产以及话语和制度领域的权力关系。马克思主张，自我解放应该完全与个体的自私和贪婪分离开来，应该被视为在集体的或以共产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中通过同他人的关系来实现的自我实现计划。从一般的社会需求中的解放通常肯定会使马克思接受这样的观点，即统治自然是人类解放的必要前提，并且在这一点上，他对自然环境条件也采取了流行的工具主义的、神人同形同性论的和控制的态度。他写道，自由王国存在于：

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一,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①

但是,如格伦德曼(Grundmann, 1991b)最近指出的那样,这一段话的确切意义稍微有点含糊,部分原因在于马克思描述社会和自然世界之间互动的那种特别辩证的方式,也因为马克思的自我实现政治学强烈地依赖对非异化关系的重新获得,不仅人类之间的伙伴关系,而且对自然的创造性和感性的经验,资本主义工业使它们陌生和迟钝。正是那些条件使得“最无愧于”我们人类本性与自然的关系仍然晦暗不明。面对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组织时怎样塑造这种关系,这给马克思的理论提出了一整套的实际难题。

必须找到某种方式来完成解放和自我实现的目标,同时又不放弃启蒙观点,即现代科学、工业和技术为人类从自然界中解放出来提供了工具,这种界限把人类禁锢在一种永恒的需求、生活机会的不安全感以及满足的缺乏状态之中,而那些东西是创造性力量的必要基础。这是我在下文要重新讨论的重大难题。这里,我只是表明,马克思无论如何不会反对整个启蒙目标,包括一种特殊的支配自然的观点,但他确实广泛而强烈地反对当时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理论家用以解释那些目标及其实现手段的方式。当马克思把支配、科学以及逐步解放生产力等观念联系起来以实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目标的时候,他确实与众不同。对马克思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以如下方式来发展自然持续生产所需要的自觉力量:打破阶级特权和压迫,把个体的创造性力量解放出来,从而通过自然的生产来生产他们自身。

如果自由主义和马克思都把统治自然的观点——虽然两者的理解具

127

^① 此处译文取自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6—927页。——译者注

有明显冲突——作为自己解放规划的基础，那么，作为两种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发挥重要作用的政治思潮，它们至少具有共同的基础。然而，反对统治观点的意见一直就存在，并且主要的反对路线早已在启蒙内部就很明确。首先，完全可以说，“自然法”最终表明人类是自然的囚徒，而不是它的主人。这一路线为马尔萨斯反对启蒙有关完美的“人”的乌托邦理想提供了基础。不过，还有许多其他的方式来揭示“自然法”对启蒙乐观主义产生了令人困惑的后果。

(1) 在著名的《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把某种近似于科学的方法应用于社会的比较研究。他揭示出支撑人类历史表面混乱和纷繁复杂的统治形式的根本原因。他把土地和气候作为基本原因之一。他写道：“精神和激情在不同的气候中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法就必须对应于激情的差异和精神的差异。”这种差异地理学的环境基础并没有使他陷入纯粹的环境决定论，因为好政府的任务是使法律和道德秩序适应主导的物质环境(Cassirer, 1968:214; Glacken, 1967, 572—581)。但是，这意味着，法律和统治制度必须根据环境的限制而变化，这因此打开了环境对人类行动影响的问题，也打开了以环境差异为根据的文化和道德相对主义的潘多拉之盒。沿着这一道路，卢梭承认，法律“应该承认地方性文化环境条件”，尽管这明显地挑战了任何有关支配自然的简单或随意的观念，但它也为后来以环境为根据的种族差异理论和环境决定的文化优越性理论提供了基础。卢梭也主张，“专制适合于炎热的气候，野蛮适合于寒冷，而良好的政府则适合于气候温和地区”(转引自 Glacken, 1967:592)。

(2) 如果启蒙运动通过对世界进行科学的“去魅”来反对奴役(如马克思·韦伯后来所言)，那么就存在一个探寻“返魅”的直接反应。同自然世界失去联系的感觉——与自然疏远——在阶级体系范围内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反应。同生产手段——土地——的分离引起了广泛的抗议运动(18世纪英国的掘地派和平等派是经典例子)。世界各地农业社会中一直可以发现相似的运动，这表明了人们强烈地抵抗那种观念，即自由市场和现代科学的穿透力是解放和自我实现的唯一工具。那些拥

有更为传统观念的上层阶级愈来愈寻求韦伯所称的“从科学理智主义中得到救赎，以便返回人类本性以及普遍的自然”。“浪漫主义的反动”在18世纪就生根了——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及《新爱洛伊斯》开辟了道路。卢梭发出的“我们内心的自然之声”，当它与“大众主体转向”联系起来的时候，便对理解自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后果，并由此使得统治意识形态与解放和自我实现政治产生冲突。这孕育了一种传统，具体体现在诸如华兹华斯、席勒和梭罗等后来者身上，这种传统在当前，特别是在深度生态学运动中具有强大的影响。

(3) 即使没有此类清晰的抗议运动，启蒙思想家也不得不清醒地面对这些问题：“自然的人性化”可能意味着什么，最新发现的科学和理性研究的力量以及自主道德判断的力量将产生何种后果。这个问题成为美学理论的当务之急，它也是启蒙思想的产儿。鲍姆加登在很大程度上凭借莱布尼茨而在德国率先开辟了道路，夏夫兹伯里伯爵在英国也推动了一个类似的计划。结果是开始定义“文化”和“与自然的关系”，对于老一辈人来说，这是非常不寻常的。自然的改变——例如，通过培植景观而产生的自然人性化——成为一种优先的手段，不仅可以重新获得似乎在其他地方失去的东西，而且可以为人类定义未来。在那种未来中，只有通过解放人类的感觉使之达及崇高和超验的存在经验，自我实现才能完成。但是，如果感觉的解放通过美学而成为启蒙规划至关重要的方面，那么结果就不只是伊格尔顿所称的“通过感觉生活而发生的大规模的抽象理性内投”，而且产生了对理性自身起源的内部对立：

当年鲍姆加登从理性中分离出了美学这个次要的话语，如今理性却似乎被美学话语吞没了。理性和感性不可能相互复制对
方的内在结构，最后二者完全对立起来。^①

^① 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译者注

所以尽管鲍姆加登的抱负是在理性王国中理解诗歌、艺术和景观，但这样一个计划却公然蔑视在科学中具有重要作用的还原技术。把红色对我们感官产生的影响还原成它的纯粹物理概念，就如同把景观的意义还原成对它的地理要素的描绘，都会丧失美学经验追求的本质。因此，必须在表象和直接效果层次上，以及最为重要的，在总体性层次上来维持美学。如果不诉诸某种类类似于莱布尼茨式奇想的东西，美学知识是很难达及的。结果就是要改变支配自然的观念：

正是鲍姆加登说了这样一句富有意义而又恰当的话：理性统治所有低级的能力，但是这种统治决不能堕落为专制。不应使主体失去其本性，主体也不应放弃其特殊的品质；相反，要从这两个方面去理解和保护主体。^①

(4) 最后，存在着人的本质的自然(the nature of the human nature)这一问题，自我实现对此意味深长。甚至在其起源上，启蒙思想就陷入了所谓的“自然的善”和“人”的“完美性”问题之中，而且那些敢于过分简单化地沿着那条道路走的启蒙思想家遇到了一片反对声音。例如卢梭(Rousseau, 1973:60)，尽管他承认自我改善的巨大力量，将其视为一种双重美德，源自“(人的)发现及其错误、他的罪恶和他的善行，但最后他还是使自己成为一个支配自己和自然的暴君”。他认为，太多的自由就像太多的好酒，实在太容易：

败坏那些生理上不宜的人的健康或使他们沉醉。人民一旦习惯于某种主人，就再也不能脱离他。倘若他们企图打破束缚，那就反而会更远地离开自由；因为他们常常会把与自由相对立的

^① 卡西尔：《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2—343页。——译者注

那种放荡不羁当作自由,结果他们的革命,差不多总是使他们落到只有加重他们桎梏的那些煽惑家们的手里。^①

这时,他说话的口吻越来越像那个时代的保守主义政治评论家。当然,这是一种恐惧,这种恐惧曾使埃德蒙·伯克强烈地反对法国革命。保守派往往认为,人类固有的下贱和罪恶只能用最严格的制度管理来加以制约,缺乏这样的管理,全部社会和文明都将崩溃。因此,问题在于想方设法从固有罪恶中创造善,亚当·斯密正是这么做的,他天才地建议(似乎很合理),卑劣的贪欲能够创造一个社会系统,它对自由市场中的所有人都有好处,在自由市场中,“看不见的手”以利益导向在总体上支配社会。如果(这或许是马克思的主要贡献)人性本身是可塑的、可变的,并且因此是有待形成的不稳定的性质组合,那又怎样呢?因此,自我实现和解放的目标就不能被视为建立在对人类欲望、需求、能力和力量的本质主义解读基础上的一种稳定的轨迹。去掉这种本质主义的解读,整个“本质异化(与自然的疏远)”的观念都是可疑的。

130

从所有这些方面看,启蒙思想揭示了它自身内部的矛盾,并且提出了那些贯穿于当代环境争论的那些问题。福柯正确地指出,我们应该:

拒绝可能以简单化的和权威的形式交替出现的所有东西;或者你接受启蒙,那你就仍然留在理性主义的传统里……或者你批评启蒙,那你就设法摆脱这些理性原则(这一点可能被看作……好的或坏的)。我们不可能通过引入“辩证的”细微差异,同时却又试图确定启蒙运动中可能具有的好坏因素,来摆脱这种威胁。(Foucault, 1984:43)

对像启蒙运动创造的那种人类想象力的自由话语游戏,可能没有一个历

^① 参阅卢梭:《论人类不等的起源与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2页。——译者注

史阶段对此关注过，也没有在地理学中引起关注。固然，许多话语与现存政治经济实践几乎没有联系，不过那种分离并非是不可能的。与社会学一样，自然科学也意味着它所揭示的不仅仅是已经存在的东西，而且是将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如果假定思想“不再模仿而是追逐塑造生活的权力和目标”，那么对可能世界和人类可能性之极限的探索就变成所有话语的应有之责。所有这些话在导致美国和法国革命的政治学之众声喧哗中都发挥了自已的作用，这一点是无疑的。

131 不过，正是在另一个并非完全无关的方面，启蒙思想开始为自已的话语运用发现了一个更加实际的基础。当市场关系和货币化加强它们的控制时，创造与市场交换相伴的自由主义理论启蒙思想的那个方面就开始严重削弱政治权力和制度形式。主要受到洛克的激发，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不断地谋求国家政策和政治学（特别是在货币和外贸方面）、财富生产以及当时政治经济学家视为首要财富源泉——金银、劳动和土地是首选——的恰当评估等方面的和谐。这意味着，对自然的统治以及对人类本质的统治（特别是在劳动力形象中）开始归入市场逻辑。18世纪政治经济学的特色如下：它把人类对解放、进步和自我实现的想象组成话语形式，与不断普及的市场交换物质实践保持着一致，从而能够改变政治权力的运用和制度构造。而且，它同时掩盖了社会关系以及随后而至的对劳动者的统治，把与自然关系这个宇宙问题纳入为了人类福利进行稀缺资源恰当配置的技术话语。

三 政治经济学、环境和萨加尔的梦想

与环境有关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因此在最近世界历史中成为霸权。在那一历史中，正是资本循环使得环境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复杂的辩证法——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其中，我们通过改造世界来改造自己——彻底地简化成一种相当简单的单向事件，即使是考虑到了美学判断、浪漫反应、自然旅行、素食主义、动物权利运动、

通过保留荒地和栖息地而对自然的货币化保护，这些东西掩盖着对自然的粗野的商业利用，赋予它一个有责任和可敬的外表。占统治地位的实践支配着利益驱动的环境条件的改造和研究自然的方式，这种方式认为自然是一种以商业(货币)标准科学地评估、使用和评价的被动财富。

当然，在今天，直接鼓吹战胜自然已经不再时髦。但是，我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需要，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便是日常实践的全部东西，不管我们是否承认它，不论资本循环何时在土地上被释放出来。这也是乌托邦幻想的焦点。例如，19世纪30年代，圣西门学派就主张把世界资本联合起来对地球进行合理开采从而消灭人对人的剥削：对“外部自然”的开发“从此以后成为人的物质活动的唯一目标(转引自 Leiss, 1974:82)”。随后发生的那种辩证法的彻底简化——我们借此通过创造世界而创造我们自身——并没有如某些时候被认为的那样把资本主义对待自然的方式还原成一种缺乏想象力的或冷酷的事件，在其中，冰冷的计算驱逐了世俗的激情。实际上，有迹象表明，正是释放全部人类激情的货币力量赋予资本主义非凡的力量来对待和统治自然。如席美尔注意到的那样，“货币扩大了我们对抗生理驱力活跃其中的那个圆圈的直径”，并且常常达到这种程度，货币溶解成“对它的纯粹欲望”(Simmel, 1978:251)。这便是萨加尔的例子。此人是左拉《金钱》这部小说中19世纪的反英雄，当他建立自己的宇宙银行来为累范特改造计划进行融资的时候，他便是如此来看待问题：

132

“你瞧，”萨加尔喊道……“在那没有人烟的平原上，在这些荒凉的山峦中，我们的铁路线将从那里穿过，你将看见一种复兴，是的！田园会开垦出来，道路和运河会开辟出来，新的城市会从地上出现，生命力会复苏，一如我们将新的血液输入贫血的血管中时，生命力将重现于病人的身体上一样……是的，金钱就会造就这种奇迹。”(Zola, 1991)①

① 译文参考了《金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译者注

在此，左拉的话是有教育意义的。用血液循环来比喻货币循环，血液循环和性欲的生理学比喻的作用如此强烈，以至于这似乎越来越不是比喻，而是一种深层的连续统一体的表现：

希望你了解这一点，投机、赌是中心的转轮，在我们那样巨大的事业中，也可以说就是心脏。是的！它需要血来养它，它从细小的渠道把血吸进来，积在一起，然后像河流一样把它分送到各方面去，建成一条巨大的金钱的川流，这就是伟大事业的生命。

投机事业，可以说是生命的一种引诱力；这是教人斗争、教人生活的一种永恒的欲望。不投机，我亲爱的朋友，那我们就不能经营商业……就像爱一样。在爱欲中同样有很多肮脏的东西，人们只是想到使他们自己得到满足；但是，没有爱情就没有生命，世界也早已完结了。

萨加尔的幻想，他对生活的爱，征服了他身边所有的人。甚至卡洛琳女士，她是实际执行萨加尔计划（并且最后将被这些计划所毁）的工程师的谨慎的妹妹，也被萨加尔及其幻想所吸引。她非常了解累范特，对那片土地的荒凉和不和谐状态感到震惊：

133

于是她生气了，她要问：把自然的杰作，这样一个圣地，一种绝妙的美，听其如此败坏，是允许的么？这地方有着各种气候，有燥热的平原，有温和的山腰，有常年积雪的高山之巅。一想到科学与投机事业，能以它们的万能宝杖击一下这睡梦中的古老土地而使之惊醒，她对人生的爱，她活跃的希望，就使她兴奋起来。……她看见重新站起来的正是这些。前进是无可抗拒的，社会的推动力是向着幸福的顶点猛扑的；人们需要行动，需要前进，但不一定会正确地知道要往何处去，……改造自己房屋的密集人群也可以搅动地球，不断的劳动会争取到新的享受，也十倍地增加了人类的权

力；地球一天比一天地更属于人类，金钱帮助科学造成了进步。

那个公式——“货币，资助科学，产生进步”——一直位于资本主义文化及其环境改造之普罗米修斯式历史地理学的中心。左拉并没有发明什么：整部小说都建立在皮埃尔兄弟业绩的基础上，这两位非凡的金融资本家，他们接受了圣西门思想原则的教育，把那种乌托邦想象转化成一种金融垄断、投机和建设的实践政治学，这种政治学支配着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直到他们由于罗斯恰尔德（左拉小说中“冷血的犹太人”甘德曼的原型）的反对在1867年破产。

四 法兰克福学派对统治的批判

尽管存在着大量的反对启蒙运动核心观念的思潮（浪漫主义、有机论、达尔文生物学、尼采的哲学等等），但是我们认为，支配自然的意识形态所遭受的迎面痛击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与众不同的思路随后由某些女权主义，特别是生态女权主义团体，以及生态学运动中各种各样的思想家们延续下来（尽管以不同的形式）。即使今天许多人都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析失败了，但它还是开启了一种仍然具有影响的富有生命力的道路。

其他人已经对法兰克福学派进行过充分的研究和评估（Jay, 1973; Leiss, 1974; Eckersley, 1992）。它试图用在它看来“人与自然内外”之间的更大冲突来替代马克思主义对作为历史动力的阶级斗争的强调。他们认为，“这种冲突的起源要追溯到资本主义之前，并且实际上，它的延续、增强似乎在资本主义终结之后才有可能”（Jay, 1973:256）。启蒙运动被视为那种冲突历史的关键时刻，一种信仰、实践和话语重新表述的时刻，在其中，支配自然和成为自然的主人已经成为主要的观念。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辩证地分析了不断变化的“人与自然”之间斗争条件的后果。他们分析的时候，分享了启蒙

的解放和自我实现目标，他们清楚地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目标会被为了实现它们而设计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转换和实践所挫败（“否定”是他们更喜欢的术语）？考虑到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崛起，这是一个紧迫的政治难题而不是种抽象的利害关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运输系统的不断精致化和增强使得那种利害关系异常活跃。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决定不把这种否定的政治学看作启蒙原则的反常或背叛，而是将其视为启蒙思想和实践所内含的矛盾的特殊产物。

在论证的时候，他们诉诸一种特殊形式的内部关系理论。笛卡儿把自然解释成“他者”，并因此使自然具体化为一种与思想世界完全分离的物——一个纯粹的外部他者。尽管笛卡儿自己仍然强烈地依赖宗教意义，但结果却似乎使得自然本身没有意义似的。由于被剥夺了任何自主的生命力，自然容易根据人类的意志没有节制地被操纵。如海德格尔后来抱怨的那样，自然成为人类掠夺的“巨大的加油站”。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见，这种分析所忽略的是内部关系的辩证法，在其中，自然“既是某种外在于人类的东西又是一种内部现实”（Jay, 1973: 267）。霍克海默(Horkheimer, 1947:94)论证道，对外部“他者”的统治可能会变得内部化，引起“统治原则的辩证颠覆，人类借此使自身成为为他所征服的同一自然的工具”。对外部自然的奴役需要并产生了一种对内部自然的压迫性统治。更糟糕的是：

对自然的控制不可避免地转变为对人的控制。这样便产生了恶性循环，把科学和技术束缚在日益增长的控制和日益增长的冲突的致命辩证法中。主宰自然的诱人前景——社会和平、物质充盈——仍未实现。真正的危险，即控制所带来的破坏将转到控制工具本身(科学和技术)，是不能低估的。科学和技术作为螺旋式上升的对内部和外部自然的控制的主要因素，它们受非理性动力支配，这种非理性动力会毁掉它们本身文明合理性的成果。^①

^① 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译文有调整。——译者注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称的“自然的反抗”（作为“长久被压抑的本能需求的猛烈爆发”的被压抑物回归和反叛宣言）并非必然就是一种积极的变化力量。结果可能是“禁锢而不解放自然”，法西斯主义——“理性和自然的一种邪恶综合”——被视为一种特殊的产物。

征服自然的目的在于生命安全及其增强，这对于个体和类都是一样的。但是当前追求这些目标所运用的手段却包含着潜在的破坏性，它们在生存斗争中被充分利用，这将导致迄今为止付出如此巨大痛苦代价才获得的全部利益都化为乌有。（Leiss, 1974:163—164）

在此，我的目的不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就进行任何深层的详细分析、批判或捍卫。我认为，从他们对统治自然的批判中为环境—生态政治学提取某些关键问题非常重要：

（1）科学研究作为一种解放力量的作用被质疑。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并没有抛弃科学（虽然他们确实提出了一种相当有说服力的方法来理解为什么在生态运动中会有如此众多的人——尤其是自然浪漫主义者——抛弃了科学）。他们认为批判研究的核心任务是：改革科学本身；试图重新捕获人类意义和目标；把“返魅”于世界的努力（有时被描绘成克服“与自然疏远”）内在化进科学本身，这种努力与作为启蒙思想中的“他者”而嵌入到自然创造物中的“去魅”相对。他们反对实证主义以及通常以牛顿/笛卡儿术语来解释的科学方法，开启了建设一种替代性科学的可能性。

（2）这个问题同对理性/非理性的探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法兰克福学派挑战了工具理性的霸权，并且寻求一种替代性理性，这种理性有能力赋予生活一种深刻的意义，有能力恢复人类与外部自然之间敏感而开放的辩证关系，而不会向浪漫主义愤怒、宗教意识形态、自然崇拜和邪恶神话之盲目力量屈服。当然，如何做到这一点仍然是一个未决的问题。

(3) 为回答这个问题，法兰克福学派决定仔细审查美学传统。但是，阿多诺问，奥斯威辛之后，什么样的美学是可能的呢？那个问题同样受到了考验，而答案则是五花八门。解放感官的生命从而鼓励回到那些被工具理性和启蒙理性压抑的东西，那总是好的。但假如结果是法西斯主义，那又如何呢？如果它是一种动态的却又完全平庸的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在其中世上每一种拜物教都拿出来出售，那又如何呢？亨利·福特以及奥斯威辛之后，何种美学是可能的呢？阿多诺的答案是在美学领域建构一种传奇的精英主义和纯粹主义。艺术的纯粹性是反对占有和堕落的唯一保证。但这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高贵而无用的姿态，那无论如何都会使对自然的美学欣赏过分接近于传统资产阶级的趣味，并在某些方面强化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不得不指出的是，面对他置身其中的政治世界的“嘈杂的混乱”和令人痛苦的环境，阿多诺退缩到他自己的莱布尼茨式奇想。不过，即使法兰克福学派最令人尊敬的美学分析之美学姿态存在着缺点，但它所提出的什么样美学和以什么人名义的问题也都是生态/环境辩论之经久不衰的主题。

(4) 如果不转向精神分析立场和人类压抑、欲望和需求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没有一个能够回答。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对抗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联系起来了，其结果有时是积极的但多数时候是令人困惑的。但是，在此，在理解诸如性驱动力和压抑、女性渴望和男性欲望（简言之，我们理解为“人类本性”的每一种东西）如何成为支持某种与自然关系观点的组成部分（包括通过萨加尔幻想表达出来的）时，法兰克福学派也开启了一种不会简单地消失的讨论地形。一般来说，这个一直努力着要实现的“自我”是谁，并且，在因此产生的无数斗争中，到底哪一种是解放性质的，又以何种方式进行？

(5) 虽然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分离问题，并试图通过内部关系辩证法重新将两边整合在一起，但他们不过是证实而非破坏了“人/自然”这个简单的二分法。在生态学圈子里，说他们绝没有摆脱上述那种分离的神人同形论，并且因此不可能接近真正生态中心的立场，这是对他们的标准批评（参阅 Eckersley, 1992, 第五章）。他们在

批评笛卡儿的时候又重复了他。但这是一个比许多生态学思想家当前所认识到的更加普遍的难题。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辩证形式论(黑格尔主义)最终妨碍了其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力量,并因而说明了应用内部关系哲学的界限,但是必须正视这样的问题:这种分析的二元形式(与那种把生态中心作为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的做法相反)如何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是有效的。“人一自然”二分法没有固定的边界,并且,如哈拉维反复强调的那样,现代科学、技术和我们日常实践一直都在突破这种二分法,这确实是事实(Haraway, 1990, 1991),但我们最终只能囿于自己的话语,向自己特别地属于的那部分生态世界诉说,试图使之信服。甚至对于最狂热的生态中心分析家来说,这也是真实的。

137

(6) 法兰克福学派揭示出,对作为“他者”的自然的统治和对于“各种他者”的统治,这两者之间的内部关系是一种经久不息的利害关系。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在女权主义政治学中,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主题。对自然(通常被解释为一名女性)的统治在本质上同对妇女的统治联系在一起,这个论题已经被生态女权主义转换成一种政治学(如 Shiva, 1989),这种政治学依据如下观念:环境的培育取决于重新把女性原则作为人类事务最重要原则。那种政治学继续强调,只有那样,贪婪,比如说萨加尔支配和占有世界的性驱力的贪婪,才能够被抵消。然而,把自然描绘成女性,并不允许一种有关统治和压迫的压制性男性政治学。如索柏(Soper, 1995)描述的那样,它也与一种相当复杂的男性情感联系在一起,这种情感具有多样化的形式,从渴望完全占有(强奸)到父权制的仁慈和俄狄普斯式犯罪感,再到渴望回到大地母亲的子宫式舒适。因此,尽管可以在培根的高度性别化和压迫性比喻中找出大量的证据来说明对自然的统治和对妇女的统治之间的联系,也尽管可以在殖民文学(特别是有关地理发现的殖民文学)中发现大量例子来证明对自然的统治等于对“土著”(通常被描述为非常“自然的”存在物)的统治,但是把这种态度直接等同于所有形式的男性欲望,这种做法是可疑的。不过,大量证据有说服力地证明,某些雄性与某些统治、奴役以及控制内部和外部“自然”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实践联系在一起。

但是，对自然的统治和对他者的统治之间的这种联系还有更多的维度。任何种类的“改造自然”计划都具有分布性后果，许多此类明显不公正研究都是激烈冲突的根源。当前，在环境正义运动和名为“穷人的环境保护主义”运动的多国组织中，这些都成为斗争的焦点(参阅本书第十三章)。这并不是法兰克福学派明确考查的主题，但总是隐含在他们的批判分析中。这些冲突，其中的一些发生了奇特的转变。当大规模的生态破坏通过现代工业技术——这些技术带着对自然统治的全部印记——的崩溃降临到贫困人口——诸如印度博帕尔人——身上的时候，问题非常明确。当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呼吁发展中国家建立自然保护区，并坚决要求迁出长期居住在那里的本地人时，在任何意义上，他们都与世界银行或者启蒙运动一样都持有那种严肃而严酷的统治自然的观点。因此，有可能完全回避统治/支配/控制主题吗？不然，是否可能不将问题转变成对他者的统治/支配/控制？这个问题绝没有远离生态政治的核心。

法兰克福学派道路的失败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问题的丰富性。尽管它开启了“被压迫的自然”的研究领域，但它却假设了“本能的冲动”(一种完全本质主义的观点)，就这一点来说要在正遭受批判的研究技术之外发现独立的证据是十分困难的。尽管它使人们觉察到反抗统治自然(以及人性)的工具理性——包括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管理的技术——的潜力，反抗同质化的工具理性和市场商品化所导致的生活世界的全球化和殖民化过程的潜力，但是，这种反抗如何开辟生产性和解放性方向而不是自我破坏的虚无主义，它对此几乎没有提出什么见解。

在所有这些问题中，存在着两类对我自己研究特别重要的特殊困难。第一个涉及内部关系哲学的界限和力量。法兰克福学派成员诉诸这种思想模式的程度各有不同，在这一点上，阿多诺的著作特别强有力——如我们所见，他的《否定辩证法》对作为启发性工具的内部关系的力量做出了特别敏锐的分析。不过，怀特海对那种分析模式提出了中肯的批评，这种模式强调“每一样东西都与其他东西相关”，从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说。当哈贝马斯说“否定的辩证法毫无用处”，他实际上陷入了同样的模式。实际上，运用内部关系辩证法的内在固有危

险恰恰是，每样事物都反映着其他事物，以至于不存在彻底变化的空间和允许逃出统治过程的支点，那些统治过程彻底占据了信仰、话语、制度、权力结构、物质实践和社会关系。

第二个就是行动问题。由于不再把工人阶级当作当代历史当事人，法兰克福学派在寻求替代性的行动地点时就存在着困难。固然，有几个人发现了某种替代——马尔库塞信任(由爱欲武装起来的)青年造反派，哈贝马斯在新社会运动中致力于建构一种交往行动的伦理学。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多数成员都没有确定任何内在一致的或有意义的社会变革行动，即还没有完全陷入和堕落成统治自然、自我和他人机制的行动。在此，一个更加开放的贯穿社会过程多种环节的内部关系概念(如第四章概述的那种)同样会有助于开启分析的辩证形式，使之成为一种更具历史性而较少纯粹逻辑的模式。

139

正是因为这两个基本原因，“悲观主义”名声牢牢地纠缠着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不过，在当代西方主要思潮中，悲观主义的论调更加强而有力，这些论调无论如何不需要迁就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或内部关系。因为，在我们同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如果曾经存在一种悲观主义的理由，那么它无疑应由马尔萨斯和他的教条来负责。

五 生态匮乏和自然的极限：马尔萨斯传统

作为对启蒙乐观主义的直接矫正，马尔萨斯和新马尔萨斯派在18世纪末最早表达了有关生态匮乏和自然极限的观点，这种观点作为一种永恒的挽歌在占统治地位的西方亲资本主义传统的进步人道主义思潮中早已经咏唱了。两性之间的激情(自我实现的论点)带来人口增长，超出地球提供食物的自然能力，结果使得从贫穷、战争和灾难中的解放必然受挫。自我实现的驱力自动地阻碍任何从物质欲望中解放出来的希望。但是，如格拉肯表明的那样(Glacken, 1967)，生态匮乏的论点有一个很长的史前史，包括一系列启蒙思想家，他们全都面临着周期性饥

荒和致命流行病这些明显的事实。尽管多数人希望通过控制自然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也有许多人认识到，首先必须要弄清楚自然的极限。那一论点不断地被重提，并且周期性地占据优势，现在甚至在某些马克思主义思潮中亦是如此，这都证明了对生态匮乏的持久性抱怨。

本顿主张，“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视为一种理解人类本性和历史的生态学方法，这不是对它的歪曲”（Benton, 1989:55）。他断言，困难在于，在马克思的成熟作品中，在一般性承诺和马克思有关劳动过程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之间存在着脱节。我想指出，有一种更为辩证的对马克思的解读，它消除了大部分脱节。在那种解读中，劳动过程是一种“塑形之火”，它不断地改变着其他过程，同时创造和消灭各种特殊的“物”。因此，不仅揭示马克思的规划与某些当代生态思想之间的异同成为一种可能，而且我们还可以建构更为适当的语言，以此

140 来反思社会生态活动和规划的本质。

在此，危险是常常无意识地接受那种排斥激进批评的概念。如我将在后面章节表明的那样，最普遍和最难克服的障碍便是坚持把“自然”和“社会”作为各自独立的实体割裂开来。令人吃惊的是，甚至最深刻的和最生态中心的生态学家也在某种层次上接受了这种区分（或者，更糟糕的是，直接诉诸这种二分而把社会描述成一个种在地球上肆意生长的“毒瘤”）。坚持事先把难题分解成自由流动的社会—生态过程，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称为“社会”的特殊类型的“永恒”在实践上和话语上没有意义，或者，为进行分析而分离出特殊永恒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但我确实主张，激进批评发现了那种方式，通过它，这种实体（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才得以从社会—生态过程中产生。

为了令人信服地阐明这种观点，我将分析“自然的极限”和“生态匮乏”观念（以及同源术语“人口过剩”）在当前争论中所扮演的角色。在生态思想中，自然极限问题常常处于讨论的前沿。例如，李创造了一种叙事，在这种叙事中，人类行为规则似乎源自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生态系统固有的持续力量（Lee, 1989）。违背这两条原则的任何情况都是难以持续的，并因此注定会产生生态灾难。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在这

两条自然法则的界限中生活。当然，此处的困难在于，不仅在解释人类社会组织的变化历史时，而且甚至在解释生活本身的起源时，这两条原则根本就没有用。坚持认为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生态动力学法则是所有人类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这是一回事，不过，把这些定律或法则看作是理解人类历史的充分条件，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了。后一种观点暗示，整个人类历史是一种违反自然法的不可持续的运动。这是一种大而空的主张。

本顿强调，甚至对此观念一贯怀有敌意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应该清晰地认识到人类潜能的“自然极限”（Benton, 1989, 1992），佩罗曼更加大胆地主张，对马克思著作的仔细研究表明，他比自己有意承认的更像一个马尔萨斯分子（Perelman, 1993）。这是一个相当严肃的观点，证明回到马尔萨斯自己著作中的起点是合理的。

人们有时会忘记，马尔萨斯在1798年写的《人口原理》，是一本反对葛德文和孔多塞乌托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小册子，也是对体现在启蒙思想以及法国大革命中的那种社会进步希望的矫正。在导论中，马尔萨斯制定了自己的研究原则。他指出，这种原则应该决定诸如人的完美性那样重要主题的话语：

141

某个著述家或许会对我说，他认为人类最终将变成鸵鸟。我无法适当地反驳他。不过，凡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同意他的看法，除非他能证明人类的脖子在逐渐变长，嘴唇在逐渐变硬，愈来愈往前突，腿和脚的形状每天在变化，头发开始变成毛管。在能证明人类有可能发生如此奇异变化以前，说他们变成鸵鸟会如何幸福，说他们能跑得飞得如何快，说他们将蔑视一切小里小气的奢侈品，而只采集生活必需品，因而每个人的劳动将减轻，每个人将享有充裕的闲暇，那肯定是白费时间，白费唇舌。^①

^①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页。——译者注

马尔萨斯在此采用了两种战术。一是主张有关未来可能社会秩序的全部讨论都服从于对既定现实的怀疑论的经验研究。另一种是自由地穿梭于社会—生态分界线以使用后者作为工具来对抗前者。然而,《人口原理》第一版被先验普遍原则的演绎强有力地歪曲了。那个原则主张,食物对于人的生存是必要的,两性之间的激情是必需的和永恒的。他把这两个基本原理置于资源有限性的世界语境中,并推论出著名的“自然法”:人口增长(几何序列)对生存手段(代数扩张)的压力不可避免地产生贫穷、疾病、饥荒、战争以及“人口过剩”的普遍趋势。在后来的各种版本中,马尔萨斯试图以尽可能多的经验证据来丰富演绎的经验基础和提高其科学声望。他亦进一步详细阐明了预防性措施(如推迟结婚),通过这些措施,人口同生活资料保持平衡,而无须产生饥荒、疾病和战争的暴力。马尔萨斯观点后来在这一主题上的发展因为太众所周知而无需在此重复,例如,在新马尔萨斯主义的“修正”中,不言而喻,据说技术变迁和社会适应能够在人口增长(社会)和“自然”资源有效性之间的根本竞赛中创造一种动态的平衡。然而,马尔萨斯论证的阶级特点往往被遗忘。因为这一特别有害的方面仍然纠缠着我们,所以应该仔细研究。

142 马尔萨斯(Malthus, 1970:101)认识到“不幸”必然会在某处降临,并且认为,积极阻止饥荒、疾病和贫穷的人必然是下层阶级。他们的悲惨境地是自然法的结果,这一法则“绝对不受任何人类控制”而发挥作用。因此,他们的不幸被解释成“一种非人类灵性所能影响的深层罪恶”(Malthus, 1970:101)。在此基础上,马尔萨斯“勉强”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给穷人提供福利只会增加更多的人类不幸,因为把最低层阶级从积极阻止行动中解放出来只会导致他们人数的成倍增加、他们生活水平的逐渐下降、工作动机的消退以及创造财富的雇佣工人的减少。“通常不被视为最有价值的那个社会阶级”,他们日益增长的生活水平“减少了不然将属于那些更加勤劳和可敬的成员应享的份额,并且因此迫使更多的人产生依赖性”(Malthus, 1970:97)。从这一点出发,马尔萨斯认为:

应该形成一种风气,把没有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看作是一种耻辱,尽管这对个人来说似乎很残酷。对于促进全人类的幸福来说,这种刺激似乎是绝对必需的,任何削弱这种刺激的企图,不论其用意多么好,总是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我深信,英国的教区法促进了粮价的上涨和劳动实际价格的下跌,从而使只拥有劳动的那个阶级陷入了更为贫困的境地。而且我认为,教区法大大助长了穷人的那种漫不经心和大手大脚的习气,这恰于小商人和小农场主的谨慎小心、克勤克俭的脾性形成了鲜明对照。说得粗俗一点,穷苦的劳动者常常现挣现吃,吃了这顿不管下顿。他们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如何满足现时的欲望上,而很少考虑未来。即便有机会储蓄,也难得存下钱来,满足眼前需要后的余款,一般都用来喝酒了。因而可以说,英国的济贫法削弱了普通人储蓄的能力与意志,从而削弱了人们节俭勤勉度日,追求幸福的一个最强烈的动机。^①

这种论调听起来实在太熟悉了。用福利代替济贫法,用毒品代替酒馆,用十几岁就生育代替节俭的缺失,在此我们发现老一套喋喋不休的抱怨,这种抱怨在最近二十多年里越来越支配着英国和美国下层阶级社会福利政策的争论。

但是,这必定被马尔萨斯对上层阶级——主要是那些工业和地产利益集团,他们的作用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有着更细致的分析——的态度抵消。在此,他承认持续的资本积累很难说明。资本家储蓄、投资生产、出售产品获得利润、把利润用来再投资,从而开始新一轮的积累循环。但是,如果资本家要获得利润,并且用于储蓄而不是消费的话,他们就必须把产品卖出去。如果资本家储蓄过大,并且资本积累率增长过快,那么在生存问题出现之前,资本家早就会发现,缺少对增加产量的有效需求,扩张就会受到阻碍。因此,“同对产品的有效需

143

^①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34页。——译者注

求相比，资本和人口同时都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出现过剩”（Malthus, 1968:402）。马尔萨斯解决这种有效需求难题（这对于凯恩斯在1930年代重新阐述的资本主义危机来说，也是重要的难题）的方案是恰当地运用那些处在生产过程之外的非生产性阶级——地主、官员等——的消费能力。马尔萨斯煞费苦心地向自己不是在为土地贵族的显赫消费进行直接的辩解。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是解释清楚那种保持资本积累的稳定性有效需求的来源。

财富制造需求，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需求制造财富，这更加正确。每一目标相互影响，但是秩序的优先性和重要性，则与刺激工业的需求相一致。在把未开化的且人口稀少的国家转变为开化的且人口稠密的国家时，所有困难中最大的困难在于以最佳计算的需求激励他们，鼓励他们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对外贸易所赋予的最大好处之一，以及它为什么看起来总是财富进程中几乎不可缺少的因素，在于它往往会激励新的需求，形成新的品味，并为工业供应鲜活的动机。即使是文明和进步的国家也经不起错失任何一个这样的动机。（Malthus, 1968:403）

有效需求，位于社会的非生产性阶级中并受到需求创造和外贸的激励（在这一点上，当代围绕 GATT 和 NAFTA 的争论是一个例证），对于激励资本积累和扩大就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或许可以论证，如果上层阶级不能尽可能地消费或者存在着任何外贸限制，劳动者将会失业（再次用当代例子来说，美国通过把花钱的权力重新分配有钱人，通过全力消费以及主张开放的世界贸易，它帮了世界一个忙）。

这种有效需求理论与人口理论不大吻合。它似乎不合逻辑地（如果不是完全令人厌恶的话）主张，以控制人口对资源压力的名义对社会最底层阶级的消费权力进行遏制，同时却通过有效需求理论主张上层阶级应该尽可能多地消费。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种丑恶行径现在十分猖獗，我们看到把上层阶级的“消费信心”以及对借贷消费的热衷描

述成维持资本积累的基础，而下层社会各种形式的福利却被大量削减，因为这些东西被视为对增长的有害消耗。在国际范围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告诫其余的国家，他们的人口增长如何构成对资源的压力，同时又劝诱他们自己的上层阶级沉溺于无节制的奢侈消费之中，将之作为对“可持续”增长的必要贡献，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矛盾。

与许多当代分析家不一样，马尔萨斯至少意识到了这种矛盾。为解决那个矛盾，他证明，上层阶级的人口并没有按照自然法增长，而是出于对生活水平下降的担心而产生了审慎习惯，自觉地控制自己的人口数量。只有下层阶级陷入了永恒的自然法，以致盲目地繁衍。这样，人口法则实际分裂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穷人法则，另一部分是富人的法则。然而，马尔萨斯也不得不解释，劳动阶级不断增长的消费能力为什么不能产生有效的需求。这样一种可能性被作为不合理的東西而轻易地忽视了，因为“没有人只是为了那些为其工作的人的需求而运用资本”（Malthus, 1968:404），这就以另一种方式宣称，利润必然源自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但是，如果生产是由资本家来控制的，那么下列情况是不是同样不可能：“作为生产的巨大激励，私有财产法则自身极大地限制了生产从而使实际生产远远地落后于生产力的水平”（Malthus, 1970:245）？他以一个有保留的“yes”来回答这个问题，很快就发现一个合乎道德的基本原理：

导致整个劳动阶级工资不充分的供求状况，无论是由不良的社会结构和财富的不适当分配事先造成的，还是土地相对枯竭必然造成的，它同人口的急剧增长率或者必然存在的对人口增长的抑制几乎没有关系。劳动者感觉到的困难程度相同，而且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它必然会产生几乎相同的结果。

因此在自然匮乏毁灭地球之前，有产阶级通过制造人为的稀缺而对劳动者有利。财产利益集团对有效需求的控制阻止了灾难降临到人类身

145 上，阻止了资源的过早耗尽，并“保证艺术和科学进步所必需的一部分人的休闲”——一种“最明显地对社会有益”的现象。这就是为少数精英准备的启蒙规划，而其余每一个人都命中注定生活在自然法之中。人类具有一种可怕的习惯，否认一部分人具有人的权利。这正是那种习惯的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

古典政治经济学常常把自然的稀缺性和边际利润递减作为危机和永久性贫困的根本原因。例如，李嘉图就采纳了马尔萨斯有关人口爆炸和生态匮乏的论调，把资本主义条件下利润率倾向下降的规律归结为土地(或者所有资源)的利润逐步下降到那种程度，以至于不断增长的稀缺资源的租金将吸收全部的利润。这促使马克思评论道，当面对危机时，李嘉图所能够做的全部事情便是求助于有机化学。当然，马克思并不接受生态匮乏的论点。贫困和福利缺乏以及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必须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动力来解释，而不是以资源的稀缺性或所谓人口的“自然法”来解释。马克思最终提出一种彻底的解释，他认为下层阶级的贫困、失业、不幸和疾病是放任自由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与人口增长率无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着一个特殊的人口过剩法则，这便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动力，维持产业储备军的需要，存在着相对过剩的人口。

然而，马克思同时认识到，天然资源在财富(wealth，一个完全不同于价值的概念)生产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他通过一个高度性别化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点：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Marx, 1967: 50)。他也主张，自然的“代谢作用”是人类劳动普遍和永恒的条件(Marx, 1967:50)^①，并且，这种代谢作用无论由于什么原因(他认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大量抱怨的理由)被破坏都可能招致灾难。而且，我们只能借助自然自身的法则同自然和睦相处。如果不推定马克思极大地尊重自然品质以及自然和人类固有的关系的一辩证的可能性，就几乎不能

^① 在《资本论》的标准英文中，马克思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material exchange between man and Nature)是自然必然性，哈维以生态学的语言将之改为“自然的代谢作用”(the “metabolism” with nature)。——译者注

理解这一点。此外，他十分详细地讨论了马尔萨斯，这表明他认为存在着许多情形，在其中，人口动态与特定生产方式的再生产保持着积极或消极的关系。他认为，资本主义需要不断增长的人口作为资本积累的真实基础(Harvey, 1982:161)。可以在不同的时代和地方发现生产同人口之间“非常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关系”。甚至人口过剩范畴有时也是合理的：

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在一个社会生产阶段上可能是过剩人口的情况，在另一个阶段上却不是这样，……因此，在一定生产基础上产生的过剩人口，也和当时适度人口一样，都是被决定了的。过剩人口和人口加在一起，便是一定生产基础可能产生的人口。^① 146

马克思主义传统后来特别热衷反驳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生态稀缺性论点。它有时会引申出毫无理由的含义，认为主张所有形式的人口过剩和生态稀缺论都只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辩护术的产物。甚至更糟糕，人们有时候会认为，社会能够支配自然并根据人的需要彻底改造它，并主张全部自然的人性化原则上都是没有问题的计划(尽管会充满技术和经济上的困难)。斯大林不仅接管了简单化的“统治”自然的语言，而且在其著名的对李森科的支持中表现出一种对自然世界的傲慢态度，这甚至令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感到震惊。只是在贝加尔湖出现类似于伊利湖那样的生态灾难时，人们才提出这个严肃问题：社会主义必定内含有生态视角。

如格伦德曼抱怨的那样，马克思有时会认为，当“生产力导向一种不断增加的不确定性、风险和不可控性以及生产过程中不必要的压迫”时，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一种不断增长的支配自然的力量。这并非暗

^① 此处译文取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7—609页。——译者注

示对自然环境的关注同普罗米修斯式观点是不相容的。实际上，“人类中心主义和对自然的奴役，非但没有引起生态难题，反而是处理这些难题的出发点”。不过，马克思预期“科学和技术将创造一个容易理解和可以操控的世界”，同时预期“只有资本主义关系才会妨碍”我们与自然的代谢关系之间合理调节。他的这些预期必然受到质疑。这意味着对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某些假设的挑战。

正是在这个语境中，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回到了生态稀缺性和自然极限的论点，承认其比马克思(或者多数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更加根本的意义。不幸的是，本顿、佩罗曼和奥康纳(Benton, 1989, 1992; Perelman, 1993; O'connor, 1988)等人向那种观点的回归姿态看起来常常是向资本主义论点的悲哀投降。当然，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会在任何情况下支持马尔萨斯使用(后来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持续使用)的具有恶劣影响的阶级区分。但是，“自然极限”的普遍性和对“自然法”——满足人类欲望能力的固有限制——更深的依赖，现在已经越来越被视为人类生存的不证自明的限制条件。那么，对这类难题的辩证的一关系的阐述会是什么样的呢？

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自然资源”这个关键术语。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将之作为受到“限制的”东西来谈论，我们又以什么样的方式合理地说他们是“稀缺的”？真希望对整个经济学——它通常把自身定义成“稀缺资源的配置科学”——来说，这些关键术语的定义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因此，我要提供一种相关性的定义，把“自然资源”定义成“对那些自然要素和过程进行文化的、技术的和经济的估价，从而使人类在特殊的物质实践中用以实现社会目的和目标”。我们可以依据这种定义依次揭示这些术语的意义。“估价”指的是一种知识状态和话语上的理解与沟通能力，它们随着历史和地理条件的不同而变化。资本主义自身的漫长历史就表明，技术的和经济的估价会迅速改变，文化维度的增加甚至使得那种定义呈现更大的流动性和易变性。社会目的和目标可以有很大的变化，这取决于不同的人，他们在解答何种人类欲望，以及如何使之制度化、在话语上表达出来并在政治上组织起来。

自然要素和过程也发生变化，不仅仅因为变化总是在发生（与人类所作所为无关），而且因为物质实践总是改造性行动，人类通过各种模式的操作参与其中，并产生了各种各样有意和无意的后果。“自然”就是永恒的变化状态。宣称一种生态稀缺性状态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不具备意志、才智和能力来改变自己的知识状况、社会目标、文化模式、技术合成物或经济形式，而且我们也无力根据人类需要改变自己的物质实践或“自然”。说稀缺性存在于自然，而且自然极限是存在的，这就忽视了稀缺性是如何社会地产生的，以及“极限”是自然（包括人类社会）内部的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某种由外部强加的必然性。

即使资本主义的短期历史也确实地证明，资源并非一成不变的，所有资源都是动态的和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在特定状态中正遭遇它自己造成的生态稀缺和人口过剩状况，这只不过是一种说法。请马克思原谅，实际上，可以有力地证明，作为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必然总是那样做，所以，把这种特殊的环境转化成一种普遍的限制就是完全取消了政治的一生态的立场。至少在这一点上，本顿正确地指出：

需要做的就是承认，每一种形式的社会/经济生活都有自己的特殊语境条件、物质资源、能源以及由自然调节的无意识后果（各种形式的“浪费”、“污染”等），与其保持着一种特殊的相互关系模式和动态。任何形式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生态问题……都必须作为这种自然/社会接合的特殊结构的结果从理论上加以说明。（Benton, 1989:77）

然而，当代环境争论中使用的许多术语都无意识地融入了资本主义的价值。想一想在当前许多讨论中最受欢迎的术语——“可持续性”。尽管那个术语对不同的人来说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参阅 Redclift, 1987），但要赞成“不可持续的实践”却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一术语通过赋予它们在生态上敏感的氛围而积极地强化了政策和政治学。这个术语用法的一般要点（特别是它通过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布

伦特兰报告所做的宣传)使之依赖这样的背景:经由一套特殊的生态计划维持一系列特殊的社会关系。讽刺那种观点并不难:

想象一种高度简化的生态—经济的情境(沿着拉夫洛克讨论盖亚的《维菊世界》的思路),在其中,纽约城有两类物种,国际银行家和蟑螂。生态系统完全是共生性的,因为银行家生产了大量的废纸(现在是纽约的主要物质输出),而那是蟑螂最喜欢的食物。国际银行家们是濒临灭绝的物种,因此“可持续性”便依据为保证他们继续运转而对地球的使用来定义(如,在马拉维组织“可持续的”农业以改善他们偿还债务的能力)。

尽管有点牵强附会,但这个模式还是能够说明问题的。因为它表明为什么正是国际金融(通过世界银行)在今天对生态的可持性如此地感兴趣,以及他们怎样关注这个问题。在此,生态和社会计划的两元性(参阅本书第八章)被有趣地扭曲了,因为即使如生态学家们论证的那样,债务偿还真的是许多生态难题的根本,那也正是债务拖欠的威胁迫使国际金融认识到存在着这样的生态难题。那么,显而易见的是,所有围绕生态稀缺、自然极限、人口过剩和可持续性的争论,都是关于保存一种特殊社会秩序的争论,而不是关于保护自然本身的争论。

有关环境、人口和资源的观念并非中立的。它们都有政治上的起源和后果。例如,一旦绝对极限的内涵最终包围资源、稀缺性和生存等这些概念,那么人口就会被套上一种绝对的极限。并且,诸如人口过剩这样一个术语的政治含义就可能具有破坏性。在某些地方,某种人是多余的,而那些闲人又不多。我是多余的吗?当然不是。你是多余的吗?当然不是。那么,谁是多余的呢?当然!一定是他们。并且,如果真的没有足够的地方可呆,那么正是那些对社会贡献如此之少的人,他们应该首当其冲地成为累赘,这才是正确和适当的。如果有人告诉我们,根据技能、能力和才能,我们之中的某些人有能力“给人类带来更大的利益”,那么,为了全人类,为了文明,保护和保存我

们自己正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无论何时，一种人口过剩的理论获得了胜利，被统治阶级就总是会遭遇某种物质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压迫。当然，用法兰克福学派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完全可以预见的后果。不过，不同的是，在此我们直接通过阶级分析达到了对同样结果的理解。

六 结论

有关与自然关系的西方话语频繁地在两极之间摇摆，一极是丰饶的乐观主义和胜利主义，另一极则是完全的悲观主义，不仅仅对我们逃脱自然强加的极限之魔掌的能力悲观，而且担心人不能成为自然必然性之外的自主存在物。我认为，这是西方思想传统中长期的和深层的困境，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西方思想正从这种摇摆中走出来，也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摇摆正在转变成一种知识的螺旋式上升。拒绝谈论统治、“有效理解”和科学理性，就像接受某种启蒙思想家比较盲目的假设一样愚蠢。无论喜欢与否，我们都是启蒙传统的继承者，唯一有意义的问题是我们对它的解释和利用。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积极贡献在于它的乌托邦理想、它的信仰——在某地，以某种方式可能存在着“没有暴政的统治”、某种不只是纯粹工具的理性，以及一种更高秩序的科学，它超出我们当代建构的秩序。它不会屈服于阶级力量和权力（在此，它对法西斯主义可以理解的着迷，法西斯主义伴随着其对倒退的黑格尔辩证法的承诺），这种力量和权力保持着思想的摇摆，有利于阶级特权和权力日常地并因此短期地保持。简言之，对于资本主义利益集团来说，没有什么比不受约束的技术乐观主义和进步教条更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这种乐观主义和进步教条不可避免地与预言厄运的马尔萨斯主义纠缠在一起，正如它们一贯所为，当事情变糟时，人们便可以方便地责备这种学说。

第七章

评价自然

150 人类评价自然世界的历史漫长而复杂。在今天，围绕这个问题的各式各样的争论吸引着许多社会部门(它们也成为多数生态思想关注的焦点)，形成一种潜在的话语杠杆，人们借助它来平衡我在第六章中抱怨过的由资本主义强加的、在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之间的摇摆。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部分地依赖与占统治地位的评价模式的妥协，那种模式实际上由资本主义发展创造，并通过启蒙政治经济制度而在话语上发展起来。

一 货币以及对自然的评价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18世纪思想的产物——把自然说成“资源”，并且把决定稀缺资源的合理分配作为自己的理论任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它诉诸市场理论、效用最大化目标以及货币的重要性，把货币作为衡量人类欲望、使用价值和各种“自然”要素和过程之异质性的共同手段。有四种支持对“自然”进行货币评价的观点：

(1) 在日常实践中，货币是所有人都用来评价环境不同方面的手段。每当买卖商品时，我们就会处理一系列货币和商品的跨空间交易，藉此，用以生产、消费和交换的自然资源，或具有重大意义的环境特征，便被赋予货币价值。

(2) 货币是我们目前所拥有的唯一充分理解的和普遍的价值准绳。

我们都使用这个准绳，并且对其意谓都有很好的(某种类型的)实践和知识理解。它帮助我们同其他人交流自己的需要(want)、需求(need)、欲望(desire)以及选择、偏好和价值，包括那些我们特别地归因于“自然”的东西。对不同生态规划(从建造水坝到保护野生动物或生物多样性的措施)进行比较取决于定义一个共同的标准(含蓄的或公认的)，从而评价一种规划是否比其他规划更合理。目前还没有设计出令人满意的或普遍同意的替代货币的方案，以便基于一种合理基础做出可比较的决定。如马克思所言，货币是平等派和昔尼克派，它把极度多样性化的使用价值、人的欲望、需求以及主体意义的生态系统世界还原成每个人都可理解的共同的客观的标准。

(3) 特定社会中的货币是社会权力的基本(尽管绝不是唯一的)形式。因此，它是实现、释放甚至解放人类欲望的手段。作为一种纯粹的物，它的中立性和普遍性能够以无数方式运用于不同目标，其好坏视具体情况而定。货币形式本身天生就缺乏道德判断，这能够把个体从直接的压迫性社会限制中解放出来(尽管这样做是好是坏还有待争论)。这就产生了下列有力的论点，即市场是到目前为止的最好制度，是为了实现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和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约束这一人类欲望而设计的。

(4) 以货币的措词来发表意见总是以一种社会权力拥有者能够领会和理解的语言来说话。谋求有关环境问题的行动常常要求我们不仅用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普遍措词(如货币)来陈述难题，而且要求我们采纳一种能够说服那些当权者的表达方式。“生态现代化”话语(参阅第十三章)恰好试图通过有利可图的企业来回应环境问题。环境经济学也是一种把环境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的有益和实用的工具。在此，我引用奥顿在佐治亚州争取湿地保护合法化斗争为例，他强调湿地对于国家经济具有某种看似有理然而相当武断的货币价值。这成功地说服了立法机关相对较早地阐明了广泛的湿地保护的合法性。这之前，他的行动一直得不到人们的关注(参阅 Gosselink et al., 1974)。大量类似的例子(例如，撒切尔在 1988 年突然转向寻求绿色政治的支持)充分证明，能

够用原始的金钱术语来清晰地阐明环境问题，这具有政治影响。

152 到底怎么做呢？困难产生了。例如，皮尔斯(Pearce et al., 1989)等人坚持认为，无论是人类生产的(道路、田野和工厂等)还是“自然”给定的(矿产、水资源等)总资产的价值必须在代际之间保持不变，藉此，他们试图实施布伦特兰报告(Brundtland Report, 1987)下述获得广泛认同的观念，即“可持续”发展意味着当前行动不应该危及未来一代满足他们需求的能力。但是，这种资产如何量化呢？它不能由不可比的物质术语(如实际的和潜在的使用价值)来衡量，更别说那些表示内在品质的术语了，因此，货币价值(交换价值)提供了唯一共同的(普遍的)准绳。

伴随这种程序的困难有许多。

(1) 例如，何为货币？由于其自身是无生命的和静止的，它就得靠社会过程来获得作为价值尺度的品质。马克思指出，推动货币产生的社会交换过程表明货币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代表，价格是“价值的货币名称”。但过程是矛盾的，因此货币总是并不可信和并不可靠的社会劳动价值代表。货币贬值、通货膨胀、投机狂潮等，所有这些都说明货币在作为价值代表时总是高度地不稳定。我们说，货币“只值它买的东西”，甚至我们谈论“货币的价值”，这意味着我们把用于交换的其他万物所固有的社会特性赋予被指定为货币的东西。更进一步讲，货币具有多种表现形式——金、银、符号、记号、硬币和纸币，等等。我们应该使用美元、英镑、日元、克鲁赛罗(巴西的货币单位)和德国马克吗？这些货币的可信度取决于支撑它们的国家信誉和实力。此外，存在过这样的历史情形，正式货币非常没有信誉，以至于巧克力、烟草或其他有形商品变成了通货形式。用这些术语来评价“自然”的价值或不断流动的“环境商品和服务”就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难题，它们只能通过下述方法而得到部分解决，即精确地计算“不变价”和“价格缩减指数”，并试图在一个货币极度波动的世界中计算不变汇率。

(2) 把绝非专制的货币价值分配给并不依赖市场价格的资产，这是

很困难的，那种市场价格实际上是由他们提供的一连串的商品和服务所实现的。如斯拉法很早之前就指出的那样，这使得经济评价成为一种同义反复，在其中，已经形成的价格成为我们判断资产货币价值——其独立价值正是我们试图要确定的——的唯一指针。市场价格的迅速变化同样暗示着资产价值的迅速变化。最近几年人工环境中大规模的固定资本贬值(空闲工厂、仓库等)，更不用说周期性地产市场的崩溃，都说明了依赖市场行为和条件来评价资产具有极度的不稳定性。这个原则同样适用“自然”资产的评价(想一想在1973—1975年油荒期间和1980年过剩期间得克萨斯油田的价值)。不管评价“自然资产”的方法多么精细(甚至假设能够在自然价值和人造价值之间作出区分)，计算都必然依赖武断的假设。把以这种货币手段计算出来的不变的固定资本(既有人工建造的，又有自然产生的)代代相传下去的企图与那些假设一样武断。

(3) 货币价格依赖特殊的物，并且假设了私有产权能够得以建立和推断的可交换实体。这意味着，我们想象这些实体就好像能够把它们从其所属的生态系统中抽离出来。比如说，我们想象着不依赖鱼儿得以存活的水来评价它们。根据这种逻辑，只要把它各个部分同整体之间的关系解释成一种原子论的关系，把它们汇总起来，我们就能够得到整个生态系统的货币价值。如果我们以有机的、生态系统的和辩证的观点来理解环境(Norgaard, 1985, 同时参见第二章)，而不是将之视为一部具有可替代部件的笛卡儿式机器，那么追求货币评价的行为就会终止。实际上，追求货币评价会使我们陷入彻底的笛卡儿—牛顿—洛克式的以及在某种意义上“反生态的”本体论错误。如果我们以深度生态学的方式把世界解释成“万物参与其中并且不能与之割裂的各种关系的网络或领域”(Naess, 1989:49)，那么对物进行货币评价就会变得不可能。

(4) 货币评价假想了某种时间和空间结构。时间结构通过贴现程序来定义，在这种程序中，当前价值根据未来利益的贴现来计算。并不存在什么严格地一致同意的贴现规则，而且环境文献也充满了对有关

环境性质的贴现行为的批评和辩护。实际利率的波动以及利率的任意性——如公共项目的利率——使得评价特别困难。此外，只有全部资产都是可以交换的，从而使得未来价值——比如说，海洋和大气中能源量状态的未来自来价值——的贴现完全难以置信，这种评价才有意义。属于不同生态过程的多重的并常常非线性的时间观同样提出了深层次难题。例如，尽管有可能发现人类的时间偏好(或者说，至少可以做出合理的假设)，但在生态系统中发挥作用的多样化时间常常是根本不同的种类。麦克艾伏(McEvoy, 1988:222)引证了加利福尼亚水域沙丁鱼群(非线性)繁衍周期的例子——个别沙丁鱼“存活得足够长，使得每一代至少都能在一年中健康地繁殖”，由此它们适应了“生态的波动”。当捕捞“夺走它大量的自然缓冲”时，那个种类也就突然消失了。当然，与风险和不确定性有关的明智政策和实践也许避免了这种后果，但问题仍然是，由这种生态行为所定义的暂时性与我们在经济计算中特别运用的那种线性的、进步和牛顿式的时间概念是对立的。昆虫、动物和鱼类数量的“自然波动”是异质的，有时是灾难性的，而且使这样一种无法预计的时间性与市场和资本积累的时间性保持一致——即使在稳定的资本有效性条件下——往往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假设可以实现某种评价，可关于当前权利还是后代待遇的那种深刻的道德问题仍然存在。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绿色价值理论”(Goodin, 1992)与市场中的贴现行为深深地对抗着。深度生态学家奈斯(Naess, 1989:127)写道：“对未来的关注应该延伸到无限远。”这种不负责任言论——激进生态主义者的绝佳典型——的困难在于，它使我们陷入近乎禁欲的无趣生活之中。在这点上，可持续发展的花言巧语指引公共政策超越市场可能的时间性，而关注财富创造可能性的代际转移的时间(De-Shalit, 1995)。

(5) 财产安排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在不同的条件下，比方说，强有力的湿地保护和土地使用控制，它们看起来差别很大。当代大多数环境政策的任务是设计一种调节框架，以此吸引和劝说那些握有私人财产权的人以环保方式来使用自己的财产，或许甚至关注比市场贴现率规

定的更长远的时间视野。尽管这种理论的、法律的和政治的难题或许是一种挑战，但它仍然假定环境具有一种清晰的结构，足以建立某种有关社会环境商品和个人化财产权之间关系的成本—收益论证。简言之，诉诸货币评价注定使我们陷入这样一种世界观，即把生态系统看作一种“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只能通过某种任意选择的和强制性价格结构或调节制度而内化到人的行动中。这正是使哈丁(Hardin, 1968)阐明“公地悲剧”这个主题的思维方式，在那种悲剧中，某种公共资源的使用者总是寻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并由于过度使用而最终破坏那种资源。尽管那个比喻表面上很有说服力，但在下列两种情况下就失效了：当个人效用最大化行为这个假设不恰当时；当内部和外部的僵化二分不复存在时，正如在生态系统和社会中发生的那样，在其中，我们现在相当傲慢地称为“尊重自然”的东西已经内化到习俗、宗教信仰、禁忌等等之中了(McCay and Acheson, 1987)。

(6) 鉴于这些难题，人们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货币评价天生就是反生态的，把思维和行动局限在工具论的环境管理之中。虽然环境经济学的观点(同时在理论和实践中)是要扩大资源/环境评价逻辑，设法把货币价值加在其他无法估价的资产上，但它不能摆脱自身制度的和本体论的假设(或许是错误的)，它们规定了安排和评价世界的方式。 155

(7) 作为一种形式的社会力量，货币具有某种不对称性——拥有货币的人能够用它来强迫不服从他们的人。与其完全一致，统治自然的计划必然会导致统治人的计划，社会关系中的这种权力不对称不可避免地同环境关系中的不平等联系在一起(Leiss, 1974)。例如，过度的环境恶化和成本会环境公害形式对那些最无助的个人，甚至国家产生伤害性影响。在美国许多大城市，臭氧浓度对穷人和“有色人种”的影响是不均衡的，工厂中有毒物的影响也呈现出阶级差异。从这一点出发，就要求把环境正义和社会正义问题结合起来，这使许多人主张，后一问题的解决是改善前一问题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参阅本书第十三章)。

(8) 最后，货币几乎不能作为一种恰当手段来再现人类需求、欲望、激情和价值的力量和复杂性，即便它能够把欲望从社会限制中解放

出来。“我们发现货币在实质上多少有点像卖淫”，席美尔(Simmel, 1978:377)如是说，马克思(Marx, 1973)也同样这么认为。弗洛伊德走得更远，他也像我们习惯做法那样，把货币说成某种肮脏的和不清的东西(“不义之财”、“卑鄙的富人”是常见的说法)。他写道：“人类所知最珍贵的东西与最无用的东西之间的比较有可能……带来把金钱视为粪土的特别见解”，把金子视为某种变形了的粪便，把资产阶级交换关系视为升华了的肛门仪式，他的这种表述震撼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他的朋友弗伦茨写道，货币“只是被弄得闪闪发光的没有气味的干巴巴的粪便”(Borneman, 1976:86)。弗洛伊德和弗伦茨认为，按照一个人终生所挣的贴现价值来衡量他的生活或者用货币来评价“自然”(例如，卷毛熊和斑点猫头鹰的命运)，这种做法在道德上或伦理上是可疑的或完全令人讨厌的。我们没有必要像他们一样那么极端，这是隐含在要求解放的货币力量下面的消极东西。

156 从最后一种观点看，资本主义被一种重要的道德困境所纠缠：货币排挤了所有其他形式的想象物(宗教、传统宗教权威，等等)，占据了它们的位置，这种新的神圣之物要么没有明显的形象，因为它无色、无味，并且对它应当要代表的社会劳动漠不关心，要么就表示下流、肮脏、污秽和出卖灵魂，如果它映射任何形象的话。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心造成一种道德真空，即一种没有色彩的价值自我形象，不能为与个体相对的集体社会身份提供牢靠的立足点。它不能提供那个术语通常意义上的社会联系形象或共同体形象(即使它是马克思所指的真正共同体)，也不能作为中心价值系统来阐明集体意义上的人类希望和渴望。货币是我们为了日常再生产和实现个人欲望、要求和需求之目的而必然会渴求的东西。在这一意义上，货币实际上确实成了共同体，但只是一种清空了任何特殊道德激情或者人类意义的共同体，即使它以狂热的方式吸引着人类的激情。

在这一点上，那些只是因为深刻关注环境恶化而批判货币评价的人，他们将面临一个困境：要么避开日常经济实践和政治权力的语言而用一种边缘语言来说话，要么用据说不恰当的或者在根本上异化的语言

(也就是货币的语言)来表达那些深刻而不能用货币衡量的价值。更深的困境是,尽管货币本身缺乏道德意义,但它是某种媒介,人类借助它来调停和衡量自己的欲望和激情。当左拉借卡罗琳之口说出下列话时,他把握了问题的实质:

金钱是滋养着明天人性的麦堆。没有投机就不可能有生机勃勃的和硕果累累的事业,这比没有性欲就没有孩子还要厉害。它用这种过分的激情、这种下贱颓废麻木的生活确保生活的继续……金钱,这个罪犯和坏蛋,是所有形式的社会成长的温床。它是维持那种伟大的公共事业的肥料,这些事业把全球不同的人团结到一起,它也安慰世人。……所有的善都来自恶。

虽然左拉小说的最终道德在于,接受那个命题会带来投机闹剧和个人悲剧。正如马克斯·韦伯那样的理论家所严正警告的那样,认为善只从善中产生而恶只能导致恶,那是一种极为恶劣的错误。金钱或许是极度不恰当的、没有灵魂的,并且是“万恶之源”,但并不必然由此就推论出,社会的以及更广泛的生态不幸都源自私有财产、个人主义和货币评价在其中发挥作用的¹⁵⁷市场协作。另一方面,充足的证据同样表明卡普所称私人企业的社会代价的那种无限制的后果,从而进一步表明亚当·斯密那个命题同样是一种幻觉。该命题说,社会的善从市场行为之“看不见的手”的必然的恶中自动地产生。马克思(Marx, 1967: 474—475)指出,由于放任自流,资本主义进步“是一种艺术方面的进步,不仅仅是掠夺劳动者的艺术,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术”。

因此,结论比多数人希望接受的要含糊许多。首先,我们始终与货币所中介的商品交换打交道(这个命题对于任何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同样显著地有效),逃避货币评价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其次,以货币表示的环境资产的价值,尽管充满问题和极度不完善,但它并非一种彻头彻尾的恶。无论如何,判断它们的好坏就假设了其他评价模式的存在,我们可以依据那些模式来比较和批判性地评判货币评价。那么,

如何以其他方式来评价自然呢？

二 自然天生就有价值吗？

在资产阶级生活中，抵制作作为一种表示价值方式的金钱或者寻求对其进行替代，由来已久。宗教、共同体、家庭、民族等都是人们喜欢的候选对象，但是我在此要讨论的是一种特殊替代方案，它把价值视为自然内生的——因为浪漫主义、美学、环保主义和生态主义内部都拥有那种强大的伦理要素。这一观点亦并非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至少在它的某种传统之中）。当马克思^①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金钱“剥夺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本身价值”，而且“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蔑视和实际上的贬低”，他非常接近于认可这种观点：金钱已经破坏了先前的和可能再生的自然固有价值。

把价值理解成自然固有属性，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它提供了直接意义上的本体论担保和永恒性。自然界为人类建造普遍的和永恒的价值大厦提供了丰富的、多样性的和永恒的选择，从而引导着人类的行动，并且赋予其他短暂的和零星的生命以意义（Goodin, 1992:40）。利奥波德写道（Leopold, 1968:223—224）：

对我来说，离开对土地的爱、尊敬和赞扬以及对其价值的高度重视，还能够与土地保持一种伦理关系，这是不可想象的。提到价值，我当然是指远比经济价值更广泛的东西；我指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所以，当一件东西趋向于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性、稳定性和美的时候，它才是对的。反之，它则是错的。

^① 此处译文取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8—449页。——译者注

但是，我们如何知道“完整性、稳定性和美”是自然固有的属性呢？而且这么说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把我们带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价值存在于自然，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知道它们是什么？理解这种价值的方法五花八门。直觉、神秘主义、沉思冥想、宗教启示、形而上学、个人内省都曾经并且继续是理解的方法。至少在表面上，这些理解模式完全不同于科学研究。然而，我将证明，它们之间必定会有共同性。揭示自然内在价值的各种方法都深深地依赖人类的特殊能力和特殊的人类中心说的干预（有时甚至依赖幻想家的神秘干预）。通过表达某种强烈的情感，如爱、关心、抚育、责任、完整和美，等等，他们不可避免地以一种突出的人性化方式来表达这样的“自然”价值，因此产生了显著不同的有关内在价值的人类话语。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种自然价值的“人性化”既是可欲的，本质上又是崇高的，反映了在“伟大的存在链”之中我们所处位置的特性(Lovejoy, 1964)。“人性就是意识到自身的自然”，这是无政府主义地理学家雷克勒斯的格言，它清晰地表明，至少在把自然的内在价值转换成人性化术语的时候，认知主体发挥了一种创造性的作用。但是如果像英格尔德(Ingold, 1986:104)说的那样，“物质的自然界不能那样来理解，更不要说面对它和占有它了，除非通过在某种程度上从中解放的一种意识”，那我们怎样才能确信，人类是代表所有内在于自然的那些价值的合适代理人呢？

因此，发现内在价值的能力取决于人类主体的能力，他们被赋予了意识、反思和实践能力，从而成为那些价值的中立的中介者。如在宗教教义中那样，这往往导致对人类实践的严格控制，以确保人类意识对自然界的开放性。这个以人类为中心的干预的问题同样在科学研究中存在。但作为一个认知主体，科学家此时也扮演一个中立的中介角色，在最严格的方法和实践指导下（甚至某些时候让佛教徒都感到羞愧），试图精确地揭示、理解和表现自然运行的过程。如果价值内在于自然，那么依靠自身客观程序的科学就应该提供一种合理的中立方法来揭示它们。因此，长期以来，观察自然和探寻基本的道德原则与价

值，这两者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如何证明这种行动是中立的，这就成了重要的争论主题。下文探讨的三个例子有助于了解这个困难的实质。

159 1. 精子和卵子的寓言

在过去数年里，女性主义作品揭示出性别隐喻在科学研究中的广泛运用。结果往往是，把有关性别关系的社会观点写入对自然界的科学再现中，并且因此使得那些社会构造看起来似乎是“天然的”。例如，莫岑特(Merchant, 1983)强调了培根用实验方法来理解自然(在本质上是一个有待探究的女性身体与通过诱导和强制来控制、驯化的女性精神)时便依据了性别化的比喻(受到莎士比亚《驯悍记》的启发)。无论如何，这不是孤立的或单个的例子。在一篇评论“玩具熊父权制”(藏于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充满睿智的论文中，哈拉维(Haraway, 1989)指出，“颓废——城市、文明和机器的威胁——存在于优生政治学和生物标本剥制术中。博物馆完成了其在城市世界中保存、保护和制造永恒的目标，在20世纪，这个城市世界似乎陷入了混乱和崩溃的边缘”。那篇文章反对这种杂乱无章的社会世界，将之视为一个可视的展览技术，已部分地被用作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工具，一种有关(建立在等级制、父权制、阶级和家庭基础之上)自然秩序的真正有机论的感觉，那种自然秩序应该是任何社会秩序稳定性的基础。这种做法显然运用了并将继续运用灵长类动物学，将之作为制造或鼓吹某种种族、阶级和性别关系的工具。

马丁(Martin, 1991)在有关人类繁衍的医药和生物学文本中描述了精子和卵子寓言，这个例子具有特殊的启发意义。该寓言不仅把女性的生育过程(特别是月经期间)说成是相对于男性无限的精子生产能力的一种浪费，而且根据卵子被逮着、捕获和抓到这种被动性，把实际的生育过程说成是一种奖赏，积极的、充满活力的和蓬勃向前的精子在经历一次千辛万苦的旅程之后有权得到这种奖赏。精子似乎奇怪地成为一个寻宝的探险家，或者一个为生意而拼搏的企业家(参照左拉所描绘的

那种金融投机家的形象)。然而,人类繁殖的科学研究中运用的那种比喻在根本上是一种误导;精子绝非如假设的那样是定向的、充满活力的和勇敢的(就其自身来说,它被证明是相当冷漠和无目标的),并且卵子被证明在生育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是,研究者抛弃他们的性别偏见需要时间,并且他们会把卵子等同于挑逗性的荡妇,她们作为一个“贪得无厌的母亲”用一张精致的蛛网来诱惑、诱捕和欺骗男性(精子)。马丁(Martin, 1991:498)暗示,“新的数据不会让科学家们放弃他们描绘精子和卵子时的性别偏见。相反,科学家才开始以不同的但是很具破坏性的方式来描述卵子和精子”。非常清楚,对于自然的内在价值这个问题,我们不可能通过这种调查研究得出什么结论。

160

2. 达尔文的比喻

在第二个例子中,我们来考察达尔文《物种起源》中那些相互并列和对立的复杂比喻。首先是有关畜牧业的比喻(由于自己的农场经历,达尔文对此具有丰富的知识)。如扬(Young, 1985)指出的那样,这个比喻采纳畜牧业中不言自明的人工选择程序,将其置于自然背景之中,提出了这样一个直接的难题:谁是自然选择的有意识的行动者。其次是马尔萨斯的比喻,达尔文明白地承认这对于他的理论来说是根本性的。于是,有关竞争和适者生存的企业家价值在达尔文的著作中就作为“自然”价值出现了,这成为社会达尔主义者后来依赖的东西,并且被当成“常识”运用到今天。然而,通过对俄国接受达尔文思想过程的详细考察,托迪斯(Todes, 1989)揭示出,俄国人几乎普遍地拒绝接受马尔萨斯比喻的有效性,并且把同一物种内的斗争和竞争也贬为进化机制:

这种统一的民族风格源自俄罗斯民族生活的基本条件——它的阶级结构、政治传统以及土地和气候的性质。俄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缺乏一种充满活力的赞成自由放任政策的资产阶级,地主和农民占据了主导地位。主要政治倾向,君主制和社会主义倾向

的民粹主义，它们共同分享了一种崇尚合作的社会风气，而且都厌恶与马尔萨斯和英国广泛地联系在一起竞争性的个人主义。俄国幅员辽阔，人口稀少，流动性很强，气候也恶劣。很难想象一种与马尔萨斯观点不那么一致的背景，在马尔萨斯看来，由于有限空间和资源条件下的物种数量压力，有机体常常被迫相互争斗……这种反马尔萨斯和非马尔萨斯影响的结合使达尔文的比喻丧失了常识力量和解释力。(Todes, 1989:168)

虽然马克思十分赞赏达尔文，但他并非没有领会后者作品的比喻性质。他(Marx and Engels, 1965:128)写信给恩格斯说：“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

161 假如达尔文(以及华莱士)并没有如那个时代多数英国人那样震惊于热带环境特别丰饶的物产，并且转而思考亚寒带地区，如果他们充分了解我们今天称为“农民的道德经济”景象，那么他们肯定也会如俄国进化论的政治信仰那样轻视竞争机制。他们或许会转而强调合作和互助。克鲁泡特金持有的是互助理论，他将互助视为自然和社会进化的有效力量。当他从俄国来到伦敦时，便被人们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幻想家予以拒绝(尽管他拥有不平常的科学文凭)，那个时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氛围便是如此强大。

不过，在达尔文的论证中，还有一个发挥作用的有趣比喻，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比喻与生存竞争和斗争比喻正好相反。这个比喻与物种在环境方面的多样化有关。在此，这个有影响力的比喻似乎就是在工厂体系中不断扩大的劳动分工和日益增长的生产循环，达尔文的妻子爱玛是实业家约西亚·韦奇伍德的女儿，所以他对此亦具有丰富的知识。物种不断地专门化和多样化成为非竞争性环境，这一点改善了故事的结局，否则的话最终肯定是一个物种统治所有其他物种。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以社会为根据的比喻和科学研究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人们极难从这些科学发现中提炼出任何不受社会影响的有关自

然本身价值的信息。因此,各种政治运动把达尔文的有影响力的科学观点当作自己特殊政治计划的“自然”基础来运用,这并不令人惊奇(参阅 Gerratana, 1973)。其他一些人,如阿里及其芝加哥大学的生态学家同事,在两次大战期间,把他们有关动物生态学的科学成果用作支持,甚至鼓吹社群主义、和平主义和合作观点的工具,对此我们也不会感到奇怪(Mitman, 1992)。

3. 领土规则

阿德烈、洛伦兹和莫里斯的动物行为学认为,动物的领地关系到对局部资源进行排他性控制,由此进一步推论出,社会系统必然把为领地控制权而进行的斗争(从微观规模的私有财产和地方性“势力范围”的战争到民族国家间的地缘斗争)作为自身基础。人们认为领土的排他性和竞争性斗争是自然而然的。这个问题对第十一章有关地方和社区的讨论相当重要,在此简要地评论一下其有效性是有好处的。仔细考察了狩猎者和采集者领地行为的广泛的人类学证据之后,英格尔德(Ingold, 1986:43)认为,领地极少是竞争或排他性的。它:

162

提供了一种传递人群和资源信息的互惠交往模式,这对于所有成员都是有利的。由于同样的理由,它无论如何都与某一社会集团通过积极防御来维持对资源的垄断无关……它是一个在生态情境中实现广泛而又普遍范围内的合作的手段(利用零散分布的动植物群),这就防止了各个合作单元之间在采集活动中经常性的面对面相遇。非常简单,它防止互不知道对方位置的相邻群体穿过同一片土地,从而影响他们各自的成效……**领地划分或许同集体利用自然完全谐调一致。**(Ingold, 1986:43)

按照这种观点,领土界定既表现为同一物种不同成员之间的竞争,又表现为他们的相互合作。实际上,竞争与合作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在某种条件下,竞争能够成为合作,反之亦然。英格尔德指出,排他性

领土状态只是一种稳定的和排他的财产权功能，这样的权利是社会的产物而非自然所固有的。当然，这也是卢梭(Rousseau, 1973:84)在许多年之前就理解的观点：

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并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假如有人拔掉木桩或者填平沟壕，并向他的同类大声疾呼：“不要听信这个骗子的话，如果你们忘记土地的果实是大家所有的，土地是不属于任何人的，那你们就要遭殃了！”这个人该会使人类免去多少罪行、战争和杀害，免去多少苦难和恐怖啊！

三 比喻的本质

对于我来说，从这三个例子得出一些结论是必然的。如果价值内在于自然，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特别方法弄清楚不依赖那些比喻的价值是什么、各种特殊的科学研究方法正是通过比喻来理解价值的。甚至我们使用的名称都背离了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工蜂”不理解《共产党宣言》，这种说法并不比“螳螂”去教堂好到哪里；然而术语有助于163 接纳完全不同的社会权力关系和实践(Bookchin, 1990a)。诸如“自私的基因”和“瞎眼钟表匠”这样的语言同样生动地描述了科学论证的社会对象，这一类主题的最固执的通俗作家道金斯(Dawkins, 1989)完全无意识地使用了芝加哥黑帮生存条件的比喻，把它作为一种便利的比喻来解释基因选择的基本逻辑。有趣的是，当卢梭(Rousseau, 1973:65)指出“那些依据自然状态进行推论的人，他们所犯的大错总是把它塞进在社会状态中形成的观念里”时，他早就识破了这种诡计(虽然他按照自己的特色积极地使用这类比喻)。例如，生态主义者试图阐明均衡、植物轮种、顶极植被等概念是自然世界的特性，他们反映了人类精确并中立地描述生态过程或使之理论化，也反映了人类对永恒和安全的研

究。并且，同自然保持和谐的观点不是人类的欲望，而是自然强加的必然性，这一观点同样暗含着这样的思想：自然的的就是和谐的，而不是冲突和矛盾的，冲突和矛盾很快都被视为人为的、“混乱”的后果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在科学中，就像在诗歌中一样，我们常常无意识地把自己对金钱之外的价值的渴望强加给自然。

但是，价值选择在于我们而非自然。简言之，在对自然世界的研究中，我们只能看到那些充满价值的比喻使我们能看到的那些价值。和谐和均衡；美丽、完整和稳定；合作和互助；丑陋和暴力；等级和秩序；竞争和生存斗争；混乱和不可预见的动态变化；原子论式因果性；辩证法和互补原则；混沌和无序；分形和奇异吸引子；所有这些都可能被看作“自然价值”，不是因为它们被武断地强加给自然，而是因为无论研究方法如何无情、质朴和严格地“客观”，解释框架都是以比喻而非证据给定的。例如，从当代生育和细胞生物学我们会知道，世界必然以等级方式形成命令和控制的秩序系统，这个系统看起来多少有点像福特制工厂系统；同时，从当代免疫学看，世界是一个流动的交流系统，具有分散的命令—控制—智能网络，该网络看起来更像当代弹性工业和商业组织的模式(Martin, 1992)。

因此，当人们主张“自然教导”时，通常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如威廉斯评论的那样，“根据说话者的通常意图，是有选择的”(Williams, 1980:70)。在此，解决方案不可能是追求一种没有比喻的科学研究。它们的运用(如类似的模式运用)存在于全部知识生产的基础上。它是人类想象力由此得以动员从而获得对自然和社会世界理解的首要手段。离开想象力，就如同人们的生活离开了呼吸。如奥瑟曼在其有关宇宙数学理解史的书中精彩展示的那样(Osserman, 1995)，要充分再现各种复杂的物理过程，那种想象特性是根本的。麦克斯·布莱克反思道：“或许每一种科学都必须从比喻开始，而以代数学结束。或许没有比喻就根本不会有什么代数学。”(Max Black, 1962:242)波姆和皮特同样认为，“比喻性理解”对“全部科学都是根本的”，无论是拓展既存思想，还是穿透“仍然未知的现实领域，在某种意义上，那些领域内含

164

在比喻中” (Bohm and Peat, 1987:35—41)。如果这个观点对诸如物理学和生物学这样的知识部门是有效的,一般说来,它们的特点是某种科学方法的“纯粹性”,那么,如廷帕纳罗和威廉斯赞同的那样 (Timpanaro, 1970. Williams, 1978),它甚至会容忍竞争性的、常常是武断的和有偏见的精神分析结论。后一领域特别为那些术语所困扰,它们具有双重特征,“因为它们被内在地视为从经验证据得出的‘结论’,但同时又以多种话语形式极快地传播,并往往依赖以更加‘规范’的语言模式以及社会历史经验中的语言发展而建立的概念”(Williams, 1978:14)。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比喻只是人类想象的产物,它们是纯粹的,并且不受物质实践、权力关系等影响。因此,库恩主张,全部比喻理论都假设了一套字面意义的理论,并且认为,“除非在其成员都已事先采纳了其字面用法的共同体中”,否则像比喻之类的修辞将是不可想象的 (Kuhn, 1988:12)。字面意义并非直接源自某种被称为“现实”的东西,依照“现实”这个术语通常给定的意义,它完全是思想之外的东西。但是,比喻确实从社会和物质实践以及世界经验中获得力量。

因此,我们只能批判地反思比喻在使用过程中的辩证属性(内在化),并在人类为某种特殊的“自然化的”价值搜集科学和其他证据时加以细察。于是,我们发现,自然在想象上所固有的价值是比喻的特性,是人类想象力内在化并影响社会过程其他环节的多种结果的特性,是最显著的物质社会实践的属性。卡普拉指出:“除非同时谈论我们自己,否则我们绝不能谈论自然。” (Capra, 1975:77)

四 深度生态学,自我实现和莱布尼茨式奇想

生态学思想并非不承认卡普拉创造的那种联系,但在其基础上恢复
165 某种内在和固有价值观念的企图也很多。例如,克里考特就承认,任何客观的且独立于评价意识的内在价值的概念都是站不住脚的。不过,他主张,某种被称为内在价值的东西天生就有根据。为了支持其

论点，他又回到了被达尔文修正的休谟。休谟主张，你投射到对象上的价值并非武断的，而是因为“你的本质的结构”而自发地产生的。克里考特从达尔文那里获得了这样的观点，即“人性的情感结构符合自然选择的标准”，因此认为：

某些情感是在社会环境中自然地选择出来的，环境决定并促进其在社会范围和复杂性之中的发展。然而，尽管社会情感是由自然选择所固定下来的，但它们在结果上却是开放的。这是因为，决定它们对象的文化不是一个狭小的空间。因此，那些具有价值的东西，无论是工具性的还是固有的，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由休谟称为“理性”的东西决定的，或许最好称为“文化表象”。通过把植物、动物、土地和水描述成我们最大限度地拓展的“生物群落”的“伙伴”，利奥波德巧妙地利用了我们开放的社会和道德情感。因此，对于那些在生态上见多识广的人来说，非人的自然实体先天地具有价值——是一个大家庭或社会的公认成员。作为整体的自然亦内在地具有价值——它是我们作为成员或公民所属的大家庭或社会。（Cillicott, 1989:182）

在此，“伦理的生物化”发挥着作用，并且，如克里考特承认的那样，这使我们不自在地接近于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

[道德]像本能一样进化。如果那种理解是正确的，那么科学或许就能够考察人类价值的起源和意义，全部伦理主张和多数政治活动正是源自这些价值。……[道德]存在于大脑深处的情感中枢，最有可能在边缘系统之中，它是大量复杂排列的神经元和激素分泌细胞，刚好位于大脑皮层的“思维”中枢之下。（Wilson, 1978:5—6）

威尔逊继续研究他称为“生物本能假设”的东西，这个假设主张：

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类持续不断地并密切地与自然相互作用，这使现代人充满了深层的、基于遗传的情感需求，与生命世界的其余部分亲密交往。满足这种需求……对于人类福祉的重要性或许同形成亲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一样大。（Stevens, 1991:C1; Wilson and Kellert, 1993）

166 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人，如罗斯，他们强烈且正确地质疑“以‘基因’方法观察世界的整个观念，这个世界正迅速成为第二自然”，并且挑战“在处理那些在起源和发展上都主要是社会性问题时不断增长的对‘自然’权威的依赖”（Ross, 1993）。他对威尔逊提出异议部分依赖还原主义观念：全部人类行为（包括态度和行为）仅凭基因信息就可以进行重构。但是以一种形式代替另一种形式的还原主义，显然也是错误的。比如说，拒绝全部人类行为的物质和生物条件，认为它们是不相关的，而赞同人类历史、经济和文化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胜利主义思维方式。这是在第八章要直接讨论的问题。在此，我的观点依据这样一个异议：投射到自然（以及因此以我们基因编码的思想）之上的比喻和样式都正好源自人类社会制度，这些制度因此通过生物学研究而“自然化”。

如果价值话语通过语言、制度、社会关系等中介力量而得以建立和交流，那么似乎没有什么方法把任何外部自然所固有的东西归于它们。为摆脱这种困难，克里考特从达尔文生物学转移到量子理论。他采取了一种在现代环境哲学中十分常见的行动：在表面上相似的生物学路线和当代物理学之间建立某种积极的联系。他主张，量子理论必须抛弃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笛卡儿式区分，并且由于某种版本的笛卡儿式二元论支持着休谟甚至利奥波德的思想路线，所以需要内在性论据进行彻底的重新概念化。如果在量子理论中武断地区分心与物、事实与价值、意识和物质是没有理由的，那么，物理学和伦理学则“同样都是自

然的描绘”。如齐默尔曼正确地论证的那样(Zimmerman, 1988:10), 这一结论容易招致争论, 因为至少存在着六种不同的对量子物理学的解释(Bell, 1989), 并且绝非所有的解释都反对笛卡儿[例如, 洛克伍德(Lockwood, 1989)从量子理论内部积极地捍卫笛卡儿的观点]。但是:

克里考特主张,量子物理学把世界看成内在相关的宇宙“网”。有关“我”(I)的二元论观点则存在于一个皮袋的内部,并且因此与任何其他的东西分离开,这种观念已经被当代物理学(和生态学)的见解所破坏。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物理学和生态学认为,世界就是我的身体:我和世界相互渗透。由于我们历来都假设“我”(I)内在地同全部自然相关,因此我们也能够合理地认为自然也内在地具有价值。(Zimmerman, 1988:4)

克里考特自己认为:

因为自然是充分展开和扩散开来的自我,并且自我、互补性 167
聚集在一个网络或生活之交叉点、“结”上,或者聚集在四维时空连续统中的世界分界之一的轨迹上,所以在自我内在地具有价值这种意义上,自然内在地具有价值。(Cillicott, 1989:174)

这完全复兴了我前述的“莱布尼茨式奇想”: (单子的)自我把自然价值内在化了。但是,我们能够或者应该通过何种“自我”概念来解释自己与我们称为“自然”的“他者”之间的关系呢? 这是克里考特提出的问题,并且正是该问题完全吸引了深度生态学的注意力。

奈斯,深度生态学的领军人物,他坚持一种相关的答案:“人并非环境之中的一个物,而是时空中没有规定边界的相关系统中的一个接合点”(Naese, 1989:79)。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定义,与我的全部论证都有重要关系。首先,它注意到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内部关系的辩证概

念(参阅本书第二章),并且特别融合了这种观点,即整体和部分是内在相关的(Naese, 1989:59)。它也挑战了传统的时空观点(参阅本书第九、十章)。实际上,奈斯主张的是,个体不可能被解释为一个有界限的实体,一种给予他或他自己的盒子,而更像一个点(这在几何学中被定为某种没有维度的东西),这个点由汇聚在同一个接合点上各种影响和关系的无数向量所形成。关系主义:

容易破坏对那些可能与其环境相隔绝的有机体或个体的信任。说及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就会引起一种错误的联想:**有机体即是相互作用**。有机体和环境并非两回事——一只老鼠走进绝对真空,它将不再是一只老鼠。有机体预示了环境。同样,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从而他或她是整个领域中的一个相关的接合点。认同过程是这样—一个过程,在其中,规定接合点的各种关系扩大开来而包含越来越多的东西。“自我”朝“自我”发展。(Naese, 1989:56)

因此,摆脱“某种物之状态概念”,并把我们自己从“分析思想之强烈的原子论和机械论倾向”中解放出来,这便成为通过一种**自我实现**过程来重新定义内在价值的至关重要的步骤。福克斯是这样解释的:

168 描述和表现深度生态学的适当话语框架在根本上需要的并非非人世界的价值,而是自然以及自我的可能性。或者说,在更大的物之图式中,“我们是谁”这个问题能够并且应该成为这种框架。(转引自 Naese, 1989:19)

“应该”这个词暗示着,价值规范相关地诞生于我们作为其中一员的更大的生物群落,但是,我们借以发现价值规范的手段在根本上依赖人的“自我实现”能力[与更狭隘的“自我实现”(ego fulfillment)意义或者

资产阶级社会理解的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不同]。在此,“深度生态学”文本悄悄地诉诸“人类本质”或“人类潜能”观念(或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仍然有待实现的“类存在物”),由于与“自然”的分离,人类在根本上异在于(无论是现实地还是潜在地)这些“本质”或“潜能”。因此,希望恢复那种失去的联系(那种联系被现代技术、商品生产、对自然的普罗米修斯式或功利主义的理解、货币流的“共同体”等诸如此类东西切断了)是对“自我实现”进行直觉、沉思和现象学研究的根源。奈斯主张,如果价值是“社会地和经济地锚定的”,那么哲学的任务就是挑战那些异化的工具价值。通过“精心构造一种哲学体系”,我们可以达到一种“全面的价值澄清和清理”,从而鼓舞那种能够实现“对我们全部文明进行实质性重新定位”的集体运动(Naese, 1989:45)。

这种哲学体系依靠个体在理解那些属于自然的价值时对莱布尼茨式奇想的应用。奈斯呼吁我们努力提升自己概念理解的敏锐性,同时向那些把我们绑定在自然世界之中的无数过程之流开放。这样得到的话语坚决反对那种环境管理的话语(因此是“深度”和“肤浅”生态学之间的区别),甚至反对环境伦理学(在狭义上,被理解为把以人类为基础的伦理体系扩展到动物世界)。它憎恶一切货币评价和市场话语,并从根本上反对政治权力的霸权形式以及全部以市场为基础的和以社会主义形式组织起来的社会统治机构。在这种意义上,它完全是革命的,但是它认为那种集体革命是通过在根本上源自自我实现过程的不断变化的个体实践领域来实现的。如我们所见,它确实表示要面向抵抗社群和实际组织的社群形式,将其作为定义全新生态实践战略的一个要素。

对深度生态学进行各种哲学的、形而上学的和宗教的“澄清”都是可能的。奈斯诉诸斯宾诺莎,但是诸如海德格尔那样的人也给这种思维方式提供了相当大的支持(Steiner, 1992:136; Foltz, 1995)。海德格尔主张,必须把自然看作“承受者,它开花结果、在岩石和水流中展

险。拯救的真实含义是把某物释放到它自己的在场中”（Heidegger, 1971）。“地球优先”这个口号（例如，“让河流自由！”），尽管它们直接源自威廉·阿比的复杂性格（他对莱布尼茨式自负的自我牺牲——无意识地——是傲慢而直率的），但类似在哲学上可尊敬的海德格尔口号。海德格尔的关键概念是“在场”，它的意思是把外部世界的“本真”品质内在化进自我（这又是一个非常莱布尼茨化的策略）。这要求以学习如何适当地和情感地在大地上栖居为先决条件。如果我们要揭示与自然共栖的艺术，那么，无论如何，我们得学会建造、栖居和解放地方。“地方”问题将在第十一章中讨论，在此就不进一步探讨了，而只是评论一下深度生态学思想如何回应海德格尔对奈斯所称“归属的地理感”或“在家的地理感”的探讨。此处提出的关系是积极而非消极的：

“仅仅观察”自然是一种十分特别的行为。通过在环境中做事、生活、思考和行动，才会有对它的体验。（Naese, 1989:63）

正因为地方是我们能够实现归属的地理感之所在，建设地方的行为在此对于任何自我实现的过程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奈斯主张，在生态学问题上，“地方社群是政治协商的出发点”（Naese, 1989:63）。这使我们脱离纯粹的个人领域——许多极深地依赖莱布尼茨式奇想的深度生态学家，他们在脱离这一领域时似乎存在着困难——走向自我实现计划的社会性。

五 道德共同体和环境价值

奈斯和海德格尔的观点对应于北美争取生态区伦理的运动，在这种运动中，利奥波德建议我们扩大共同体的边界以“包含土地、水源、植物和动物，或者总的来说：大地”，这种建议在字面上被视为一种在地

方与自然共生的计划。受缚于地方的环境身份的理想很强烈，并且产生了如何在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大地上栖居的原则。伯格和达斯曼强调，这意味着：

在一个被过去的开采所破坏和伤害的地区中，要学会在地方生存。它涉及，通过知晓在某个地方的内部及周围产生影响的那些特殊生态关系而成为那里的本地人。它意味着理解活动和发展社会行为，这些将丰富那个地方的生活，恢复它的生命支持系统，并且在其中建立一种在生态上和社会上可持续的生存形式。简单地说，它涉及充分活跃于一个地方的内外。它涉及申请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成员而不再是它的开发者。（转引自 Alexander, 1990:163）

170

因此，作为一种文化运动，生物区域主义：

赞美一个地方特殊的、唯一的且常常不可描述的特点。它通过传达地方感觉的视觉艺术、音乐、戏剧以及象征来赞美这些特点。（Mills, 转引自 Alexander, 1990）

在此，我们达及了古丁所称的**绿色价值理论**的核心（Goodin, 1992: chapter 2）。它是这样一种情感和主张，提供了一种“统一的道德想象”，这种想象以各种方式贯穿于几乎全部生态的和绿色的政治思维。如我们不久将看到的，它拥有激进的、自由主义的和相当保守的表现形式。并且由于它的道德共同体强烈地依赖于地方经验，它常常指导环境政治学去保护并增进特定地方的既有品质。

但是，道德共同体的观念同样被证明是有问题的。我们可以看一看，它是如何在沙勾夫的著作中起作用的（Sagoff, 1988）。尽管个人常常表现为追求自己目标的纯粹利己主义的及原子式地构成的经济人，但

他主张，他们不仅会而且往往确实在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作为与环境问题密切相关的“道德共同体”的成员而行动(由此立法保护濒危物种)。从美国的例子中，他得出如下结论：

社会调控在最根本意义上与一个民族的特性有关——例如，一个在历史上致力于欣赏和保护巨大自然遗产，并将之完整地传递给后代的民族。这不是我们想要什么的问题，也不是我们信仰什么的问题，而是我们是什么的问题。没有什么理论方法来回答这样的问题，答案与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命运以及我们作为人民的自我理解有关。(Sagoff, 1988:17)

在此，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首先，这是由福克斯(参照前述)提出的有关“自我实现”主题的强烈的社群主义形式。其次，谈论一个民族特性的构造与谈论环境一样有许多话要说。并且，我们马上会发现特殊的绿色价值之道德说教和政治含义所存在的困难。因为他们不可避免地牵涉某种特殊“道德共同体”的构造，这种共同体会轻易成为民族主义的、排他的，甚至在某种情况下极端法西斯主义的，就如它们可能是民主的、非中心的和无政府主义的那样。例如，布拉姆威尔(Bramwell, 1989)指出，纳粹不仅通过海德格尔(他的角色更具象征性而非真实性)而且通过独特的法西斯主义传统的建设，同德国浪漫主义、“血与土”主题等诸如此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顺便一提的是，纳粹实施了广泛而常常具有创造性的保护和绿化计划(参阅 Ferry, 1995:chapter 5)。即使布拉姆威尔过于夸大其辞，但人们并不难发现对特殊环境的独特态度如何有力地卷人民族主义感或社群主义身份感的建立。沙勾夫在使用 America 来指 United states 时，他缺乏敏锐性，在其对民族与环境对抗的描述中，他也倾向于削减大陆的土著人口并忽视阶级、性别和种族结构，这种麻木包含了许多同样令人困惑的排他。

因此，环境政治学执着于向后代人传递一种建立在某种环境特性之上的民族感。用另一种方式来讲，缺乏环境意象和身份支持的民族主

义是一种最靠不住的构型。如果森林是德国民族的象征,那么凋零的森林便是对民族同一性的威胁。这种联想在鼓舞当前德国绿色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也给运动带来一个巨大的困难,因为它揭示了当代生态敏感性得以产生的传统同样促使纳粹成为第一个“对国家有责任的激进环境主义者”(Bramwell, 1989:11; Ferry, 1995:91—107)。因此,甚至像斯普雷特纳克那样的生态激进主义者也被迫承认,“绿色政治的精神维度在联邦德国是一个受到极端指责的和成问题的领域”(Spretnak, 1985:232)。

当然,谴责纳粹主义的环境主义暴行是相对容易的,因此我把这一困难转向一个更加令人尊敬的领域,即奥尔多·利奥波德的领域。在阐述其大地伦理观时,利奥波德敏锐地注意到与边界的遭遇在创造美国民族特性和政治同一性中应该发挥的作用。如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主张的那样,边界的关闭彻底改变了民主在美国得以形成的条件,并因此对那些民主边界传统的连续产生了威胁。利奥波德强调对荒地的保护,甚至是对本真的狩猎精神的保护,这种强调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只能依据荒地概念对美国文化特性和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这个背景来理解(Nash, 1989)。

在此,重要的不是把全部有关“道德共同体”、生物区域主义或局限于地方的思维(如民族主义和想象的共同体)视为必然的排外或新纳粹。威廉斯(参阅第一章)在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加入了这样一种思维要素。在他的小说中,全部环境比喻的竞争性地形、局限于地方的观念以及当代资本主义对这两者的破坏都成了有意义的论据,论证了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根源及其产生的问题。因此,任务就是努力把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环境接合起来,这些东西把那些有关与“自然”特殊关系的局限于地方的情感转化成为排他性的和有时完全是新纳粹的导向。布拉姆威尔重提纳粹背景就很有意义(尽管它本身作为“反对市场自由主义的新权威主义”而表现出对绿色运动的保守敌意),因为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反动的而不是进步的轨迹到什么程度或许会最终牵涉到绿色价值理论。无论如何,由道德共同体引出来的环境价值对共

172

同体政治学要解决的问题，差不多与它对环境问题要表达的一样多，这一点很快就变得明显了。从这一立场来看，以社群为基础(如果不是社群主义的话)的运动的显著繁荣，作为一种解决环境难题并获得更为生态的生活方式的工具(参阅 Rajan, 1993)，它应该受到欢迎，同时亦应受到深刻的批判性考察。出于同样的原因，以“环境伦理”名义出现的巨大的家庭手工业思维也应受到批判性和欣赏性考察，因为它提出调节“我们”与自然关系的普遍道德原则的方法，尽管这些方法尽可能轻率并完全地掩盖了它通常从中获得许多灵感力量的战斗的特殊主义踪迹。

六 自然的语言

让我们来考察阐述生态问题和价值问题通常所使用的各种语言：科学的、诗歌的、神话的、道德和伦理的、经济的和工具的、情感的和感情的。有些人主张，为更好地再现和解决生态难题，需要跨学科语言，而这些语言的存在就是难题的基本部分。不过，试图用一种单一的和同质性语言来表述我们试图要谈论的全部“自然”问题，以及我们同自然的关系，这也是一件非常勉强的事。两种立场都只能创造一种有限的情境。

“自然”话语的异质性是生态争论的不可避免的，且具有建设性和创造性的特点，必须承认这一点。只要不把它理解为嵌入与世隔绝的共同体中的碎片化的、分离的思考和行动方式，而是理解为内在化的异质性、差异的运用，它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类和非人类世界中、在与“他者”的相互作用中真切地感受到的东西。这在通过社会行动而在自然中得到证实的“价值”多样性上特别明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些价值主要(并且必然)是工具性和功利性的，依赖于货币计算和市场。但是，一种直觉意义上的内在的自然价值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这样的观点：“自我实现”(无论是在狭义的、自我本位的或“深层”的意义上)并非外在于自我与自然的亲密关

系。对道德价值和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创造了社群政治学，并且把环境问题完全纳入文化政治学的框架。它同时把环境问题纳入官僚意见以及调节的/法律的/管理的制度话语的范围。我们将发现，我先前描述的全部价值形式都在话语上发挥着作用，而且它们全都吸收了实际政治、社会关系和物质实践的明显影响。

然而，这种折衷主义遍布危险。许多话语乱糟糟地挤在一起，谁也不服谁，以至于在差异中鉴别统一性很困难。对权力关系嵌入不同话语的方式进行仔细分析，我们也会发现，巨大的概念混乱和话语噪音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远非无辜的。因此，对它们进行批判性考察并非微不足道的政治任务。

我得指出，“环境”的定义是如此令人困惑，以至于清晰地表明我们用这个词究竟表示什么很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除非我们首先定义被包围的主体位置，并且理解主体开始或预计的行动路线。“自然”概念——尽管由于威廉斯所概述的理由而无比重要——体现了类似的困难。索柏这样写道：

对我们来说，自然指的是自然和生物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有关自然和人类不同生存模式的形而上学问题；是环境和它的各种非人的生命形式。自然既与人和文化有所区别，也与那种概念不同，借助这个概念，我们提出有关人类自身行为和文化构型的多少有点自然的或人为的特性的问题，有关存在和人类本质特性的问题，有关自然和文化在个体及其社会环境的构型中的各自作用问题。自然也承载着十分复杂且矛盾的象征性负担；它是非常矛盾的意识形态主题；并且人们一直通过极为不同的方式来再现它。(Soper, 1995:2)

然而，一旦这些陈述与某种行动关联起来进行语境化、定位和评估，那么“矛盾的意识形态”或许就不如它们看起来的那样矛盾。当我们把有关“自然”和“自然的”话语看成社会过程的环节，它们就不那么令

人困惑了。在那些社会过程中，社会权力的冲突形式出于特殊目的而努力获得对制度、社会关系和物质实践的控制。这并不必然暗示，统治的权力结构只推广一种话语而压抑另一种话语（尽管依附于公司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的占统治地位的功利主义与普罗米修斯主义——被实用主义的马尔萨斯主义所修正——几乎毋庸置疑）。毋宁说，它表明一种情境，在这种情境中，因为相当不同的政治的和实质性的目标，不同的自然概念在冲突的社会行动之全过程中被唤起。

但是这也意味着，有关自然的话语把来自社会过程的所有其他环节的一整套矛盾冲动和冲突观念都内在化了。从这一点出发，对自然话语的讨论有许多东西要揭示，但愿最终能够揭示：在高度抽象、普遍化和往往激烈的道德争论中，话语本身如何隐藏着具体的政治议程。

如我将在第八章论证的那样，如果全部社会—政治规划都是生态规划，反之亦然，那么，某种“自然”和“环境”概念就在我们所言和所行中无所不在。此外，如果概念、话语以及理论能够发挥作用，当它们作为塑造历史的“物质力量”在社会—生态实践和行动中内在化时（Lovejoy, 1964; Ollman, 1976:23—24），那么当前发动的围绕“自然”和“环境”概念的斗争就具有无比的重要性（如我将在第十三章中更具体地证明的那样）。对我们与自然关系的全部批判性考察同时也就是对社会的批判性考察。统治集团以难以置信的热情试图包容、塑造、迷惑并搞混当代有关自然和环境的争论[通常体现在“生态现代化”（参阅第十一章），“可持续性”、“绿色消费主义”，或者作为一种文化景观的“自然”的商品化和销售中]，这一点证明了那种联系的严肃性。

这实际上意味着，占统治地位的权力系统能够提出并保护一种霸权话语，这是一套对资本积累来说充分有效又合理的环境管理和资源配置的话语（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依据那种话语创建了政策、制度和物质实践）。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它们也会努力在话语上以及制度上操纵话语的异质性（甚至那些完全相反的话语）。例如，现在，复杂而微妙的话语战略正好吸收和付出不同的想象力，这些想象力典型地使许多激进生态思想根深蒂固。资产阶级制度具有很长的实施“压迫性宽容”

的历史，当前围绕目标、价值和需要而进行的环境/生态争论看起来越来越像一种卓越的个案研究，说明了一种有限的差异表达如何能够正好在霸权地和集中地控制的制度和物质实践过程中发挥着持续性作用，这种控制对资本主义社会和权力关系的永恒存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批判性反思和话语干预的任务必定直接面对下列问题：如何发现一种使激进生态学真正激进的语言。

第八章

社会和环境变迁的辩证法

一 政治价值和环境生态问题

176 在着手研究环境—生态辩论时，比较有趣的方法之一并非去考察那些不能回避的环境和价值问题，而是它们论及的政治—经济组织所说的事实。这样，如果我们当前的生态戏剧将有一个幸福的而非悲剧的结局，那么我们就要求助于一系列感人的替代性社会形式，它们在表面上对解决即将发生的问题是“必要的”。此外，还得特别表明一些需要打倒的各种罪犯和恶棍。帕尔克指出，“环境主义者”不仅“几乎占据了从右派到左派的传统意识形态光谱的每一个位置”，而且，也能够适应多种政治立场，尽管他们同时主张超越通常意义上的政治(Paehlke, 1989:194)。“自然及其法则的权威”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抬出来，或者用以证明现成社会条件的合理性，或者“成为解决环境难题的新社会的基石”(Grundman, 1991b:114)。威廉斯指出，生态学和环境主义的论证，往往成问题的“是不同的社会观念”(Williams, 1980:70)。

在此，部分难题在于，正因为多元性和一般性，环境—生态的论据会被大量运用于环境主义者和生态主义者肯定会反对的地方。它们的修辞被许多特殊目标所动员，从奥迪汽车、牙膏和据说“自然的”口味(某些食物)、“自然的”外表(主要是针对女性)的广告，到更加特殊的在“可持续发展”或“自然保护”方面的社会控制和投资目标。但是

事情的另一面是，生态主义者以及某种程度上更具管理信念的环境主义者，他们往往会在自己的论证中留下许多漏洞，用如此之多的征兆性沉默、含糊和摇摆把自己的文本弄得一团糟，以至于要精确地详述他们的社会—政治计划都几乎不可能，即使他们的目标可能不亚于一场非暴力革命，“推翻我们全部污染的、掠夺的和物质主义的工业社会，取而代之使人同地球能够和睦共处的全新经济和社会秩序”（Porritt and Winner, 转引自 Dobson, 1990:7）。

在下文中，我的意图并非提供某种严格的澄清，或者实际上对任何特殊类型的政治进行批判性评估（它们全都很容易遭到严肃的反对），而是阐明环境—生态观点容易造成的难以置信的政治多元性。

1. 极权主义

俄弗尔斯写道：“不管其特殊形式是什么，可持续社会的政治似乎很可能把我们从自由主义推向极权主义”，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个人主义、自由和民主的黄金时代差不多结束了。”（Ophuls, 1977:161）面对不断增长的匮乏，海尔布隆纳同样主张，只存在着一种解决办法：一种将“调和‘宗教’导向和‘武力’原则”的社会秩序“或许使我们反感”，“但我想它最有希望带来下一代必须要承担的意义深远且充满痛苦的适应”（Heibroner, 1974:161）。尽管他们的个人立场都是公开的自由主义（海尔布隆纳是社会民主主义），但两位作者都勉强承认某种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将之视为对自然资源极限的“现实”反应，也承认这种极限将不可避免地迫使我们做出痛苦适应。就生态运动中强烈的马尔萨斯主义那一翼来说，加雷特·哈丁可能是最重要的代表，他诉诸的极权主义方案明显是“公地悲剧”唯一可能的政治解决办法。大多数这种类型的文本都假设，资源匮乏（以及随之产生的增长极限）和人口压力是环境—生态问题的核心。因为这些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是最重要的问题，这种类型的辩论也因此在那时达到高峰。不过，最近几年里，“对环境危机的极权主义解决办法已经被运动抛弃了”（Dobson, 1990:26）。但是，在生态政治学的某些派别中，几乎总是存在着一种

极权主义的狂热。

2. 公司的或国家的管理主义

178 一种较弱的极权主义解决办法是，在一个拥有强大调控和官僚权力的行政国家中应用科学—技术理性的技术，那种权力同“大”科学和大公司资本联系在一起。在此，最重要的观点是，多数生态问题(如酸雨、臭氧层漏洞、全球变暖、食物链中的杀虫剂等)必然是由科学定义的，并且问题的解决方案同样取决于对科学专长和公司技术技能的动员，那些专长和技能深深地嵌在政治经济决策理性(由国家引导的)过程中。“生态现代化”(Hajer, 1992; Weale, 1992; chapter 3)就是这种政治学的意识形态口号。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调控(国家以及全球规模)在此将被解释成为可持续未来进行既理性又有效的资源管理。例如，公司资本的某些部门，特别是通过提供对地球健康进行监视所必须的技术而持续获益的那些部门，它们发现全球管理意象或者“地球医学”非常诱人(参阅本书第十三章)。

3. 多元自由主义

不可能以全能全知的方法来定义恰当的环境—生态政策以及解决环境问题争论的特殊价值，正因为这一点，民主权利和自由(特别是关于言论和舆论的)有时被认为是生态政治必需的。在一个多种压力集团(诸如绿色和平组织)活跃其中的社会中，为环境—生态问题进行开放的和不断的协商，被看作是保证环境问题总是处于议程中的唯一方法。不论何人想要代表“自然”说话或谈论它，都可以围绕树和猫头鹰的权利进行争论，并且也创造出各种制度(如环境后果声明和环境法)使这种争论成为可能。寻找环境问题共识并因此最有效地保护环境，多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复杂谈判和权力运作才是最好方法。不过，在关注自然价值以及对待生态变化方式的多元主义政治中，共识最多只是其激烈争论的暂时环节。

4. 保守主义

在某些生态学文献中，审慎和尊重传统的原则发挥着重要作用。人类经过千百年最终适应自然环境，而这未必不会遭到破坏。保存和保护既有景观和习俗——有时通过明显地诉诸美学判断而得到支持——给保守派提供了框架[例如，参阅 Collingwood, 1960]。但是，这种论证也具有极端的狂热。它们强烈地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发展)，在国际背景中，它们也会强烈地反帝国主义。人们认为，传统在任何地方都应该受到保护，所以过度现代化总是受到质疑。于是，相当多的同情就被施予那些处于商品化和交换关系包围之中的土著居民。所有这些都具有浪漫主义特征，但它也能产生对既定环境进行高度保护的坚定的地方政治。问题不在于不干预环境，而在于保护社会和环境互动的传统模式，那是因为这些模式一直都在发挥作用，至少对于某些集团(通常是但并不总是精英集团)如此。对这样一些集团的政治权力和价值的保护在此当然也就与环境探讨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了。

179

5. 道德共同体

我们已经考察过引用“道德共同体”观念时所出现的那些复杂问题。在与社会关系模式有关的道德责任和与“自然权利”有关的行为方式问题上，许多“共同体”都发展出某种大致的共识(Nash, 1989)。尽管由于共同体的内部异质性或者因为社会变迁的压力，这些道德规则常常处于争论之中，例如，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规则(在“环境伦理学”中越来越多地表达)，但它们能够在塑造共同体团结(如民族主义情感)和获得主权努力中成为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这是一种空间，就环境问题进行道德辩论的**真正**空间，它把社群主义政治学和聚焦于公民道德理想的价值接合起来。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同社群主义的公民道德理想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6. 生态社会主义

尽管在社会主义领域中明确存在这样一种趋势：认为环境主义是中

180 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问题，并以极大的怀疑来看待零增长和限制消费的提议[参阅 Benton(1989:52)，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综述]。但是在足够多的领域里存在着足够多的共通之处，从而使社会主义成为切实可行的政治计划(尽管在社会主义运动主流中，它仍然是一个较小的趋势)。某些环境问题，诸如职业保健和安全，是工人广泛关注的主题，然而许多生态组织认为，环境问题可能要“追溯到这一资本主义规则：生产技术选择仅仅受追求市场份额利润最大化的私人利益控制”(Commoner, 1990:219)。海拉和莱文斯主张：“如果要生态健全，我们就必须为社会主义而斗争。”(Haila and Levins, 1992:251)这意味着对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社会控制、对资本主义的“为积累而积累和为生产而生产”的控制，是许多环境问题的根本，并且承认“人类的未来不可能建立在少数人快乐和多数人痛苦这种格局之上”(Haila and Levins, 1992:227)。这就把环境问题牢牢地置于社会主义轨道之上。因此，那些承认生态危机的社会主义者(参阅 O'Conner, 1988; Foster, 1994)主张，社会主义的第二条道路是可行的，这一道路突出了生产的社会组织与生产(生态)条件之间的矛盾，而不是阶级矛盾。因此，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便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彻底地、永久地和公正地解决环境问题。

7. 生态女权主义

没有哪一个领域比女权主义运动对天性—教养问题进行过更彻底的辩论，在生态女权主义中，我们发现多种有关如何把环境—生态问题同女权主义政治学联系起来观点(参阅 Plumwood, 1993; 以及 Shiva, 1989 非常不同的表述)。例如，在激进生态女权主义中，自然的贬值和恶化被视为类似于父权制中的妇女贬值和恶化。一种政治反应的方式是，通过仪式、象征和养儿育女的伦理来赞美而非否定女性与自然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另一种不同的论证方法抵制此类论点所内含的本质主义，并定义一种“女权主义的环境主义”，在其中，“女性和环境的联系可以被视为由特定的生产、再生产和分配的性别和阶级(等级/种

族)组织所构成”(Agarwal, 1992:119)。在这两个等式中,女权主义与生态学一样地显著,如果不是更显著的话,并且生态问题的解决方案被视为依赖对某种女权主义原则的接受。

8. 非中心化的社群主义

多布森主张,大多数当代生态运动在原则上都会回避极权主义的解决方案,而“赞成一种完全共享的社会形式,在其中讨论,并在政治和社会问题最广泛的可能范围内寻求和形成清晰的共识”(Dobson, 1990:25)。他们的政治学一般来说从那种“模仿无政府路线的自力更生社群”中汲取灵感(O’Roirdan, 1981:307),而且像布克金、戈德斯密斯那样的作家以及其他许多人(包括德国绿党)都试图清晰地阐明在这种自力更生社群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形式,由于它们的规模,这些社群会“更亲近”自然。平等主义、非等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广泛的地方授权和参与决策通常被描述为政治规范(Dauncey, 1988)。因此,非中心化和社群授权,加上某种程度的生物区域主义,被视为解决与自然的异化关系以及社会关系异化的唯一有效方案。 181

我在此所概述的各种立场绝不是相互排斥的,人们可以发现各种思想路线之间的相互征用。世界银行对“可持续性”的关注(既在生态上又在金融上)收编了生态女权主义的观点,从而使妇女处于发展计划的最前沿。同样,非中心化的绿色政治试图从高度中心化的全球环境管理科学中征用调查结果,甚至人员。

必须以更广泛和更复杂的特别申诉来补充我在此概述的各种生态政治学,在那种申诉中,人们出于各种非常特殊的社会目标求助于环境—生态问题。例如,渴望得到资助和关注的科学家们,或许会制造环境问题,这些问题既反映了环境问题,又反映了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状况。例如,罗伯特·梅(Robert May, 1992),一位皇家学会的研究教授,在著述讨论采取措施保护生态多样性的明显紧迫性时,他关注问题重要性的定义方式或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同样重视对分类学的资助

不足(相对于物理学而言)。尽管一方面科学上的无知明显地阻碍对相关问题或解决方案的正确认识,但是对更多资助的永恒需要有时却理所当然会引起怀疑。

杰克斯和怀特提供了另一个更为阴险的例子。这两位受到高度尊敬的土壤科学家深切地关注美洲的土壤侵蚀。他们在写于1939年的著作中主张:

在一种封建类型的社会中,本地农民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他们欧洲领主的土地。在当前非洲发展的状况中,这种类型的社会似乎最普遍地适合于土壤的需要。除非经过斗争,否则不可能期望非洲接受封建制度;在英国的非洲殖民地,这将意味着放弃大有希望的间接统治实验,在任何地方,这都将意味着否认本地人通过劳动而获得某些自由和实质性发展的机会。但是,这将使人们承担对土地的责任,他们已经成为土地侵蚀的首要原因,而且他们有办法和能力来控制土地的侵蚀。在最终的土地利益上履行职责,不受本地人对抗困扰自我利益将确保这一点。当前,对本地人的人道主义顾虑阻止着欧洲人赢得可获得的支配土地的地位。人性或许是更高的理想,但是土地需要将是压倒一切的理想,如果白人不愿意或黑人不可能采取这种立场,那植物将这样做:通过侵蚀过程,最终把白人赶出那片土地。(Jacks and Whyte, 1939:261—262)

182

这一段话既直率又令人吃惊,它表明,各种各样的限制如何以环境名义被强加到“他者”权利之上,同时又把各种权利(以及义务)赋予那些据说拥有知识和高技术的人,让他们来控制这个难题。尽管在今天极少有人敢如此嚣张,但是,在世界银行的论证中,甚至像《布伦特兰报告》这样表面进步的文件,仍然存在着这种思维方式的强烈气息。以地球健康、可持续性或阻止环境恶化的名义控制他人资源,这种做法绝

不会在西方全球环境管理目标中消失。在发展中国家，正是对潜力的关注激发了大量对任何形式的来自西方的环境主义的抵抗。

每当环境—生态问题被转化为纯美学问题时，都会产生类似的问题。例如，1970年聚焦于环境问题的《财富》专辑，就包含着为美国商业中心再开发的强烈辩护，这种再开发所沿用的就是我们今天称为“后现代”的路线，它把环境质量（通常描述为用户友好型的以及青山绿水的空间）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威尔逊所称的当代整个“自然的文化”是一种完全人工的且强制推销的风格，它通过商业占用来损害环境质量。

愤世嫉俗的评论家或许会忍不住断定：有关环境问题的讨论只不过是一种偷梁换柱的方法，它借助自然强加的必然性权威召唤出一种生态危机或者合法方案的幽灵，通过这种方式引入特殊的社会和政治计划。无论如何，我还是想得出某种较宽泛的结论：全部生态计划（以及争论）都同时是政治—经济的计划（和争论），反之亦然。社会—政治争论绝不能在生态上保持中立，生态争论在社会上更是如此。如果我们要更好地把握理解环境/生态问题的方法，那就绝对有必要更仔细地观察生态学和政治学相互联系的方式。

二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和社会—生态计划的政治—经济学

有关社会—生态变迁的历史地理记录可谓汗牛充栋。这些记录非常清晰地表明了社会—政治和生态计划相互纠缠在一起的方式，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彼此不分。来自考古学（参阅 Butzer, 1982）、人类学 183（Bennett, 1976; Ellen, 1982; Ingold, 1986）、地理学（Thomas, 1956; Goudie, 1986; Turner et al., 1990）以及最近历史学（参考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杂志 1990 年的相关辩论）的资料档案实际上很广泛。然而，当代多数有关环境—生态问题的辩论，就其对多学科和“深度”的表面偏爱来讲，好像这些材料要么根本就不存在，要么即便存在，也

只是支持特殊主张的道听途说的证据。辩论仍然停留在纯粹的话语层面，而且不能将自身与我们所了解的物质实践的历史—地理结合起来。系统性工作相对来说极少，既有工作(如 Butzer, 1982)往往偏离它应该所处的中心。当前，马克思主义之中——例如，在本顿(Benton, 1989, 1992)和格伦德曼(Grundmann, 1991a, b)之间——的辩论也在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理学抽象层次上进行。

困难部分地源自话语辩论中把“自然”范畴均质化(以及聚焦于其作为一个统一范畴的社会意义和构造)，尽管应该从内部广泛而多样地将其视为一个空前的差异领域。有关“语言”(参阅本书第三章)的正式辩论以非常一致的方式忽视了多重语言的作用，因此有关社会/自然关系的一般辩论也就忘记了难以置信的生态多样性。所以，应该像通常关注自然的相关意义那样来关注差异生产。那么，所有这些差异都源自何处呢？

一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调查充分地表明，社会竭力地为自身创造出生态条件和环境生境，这些条件和环境不只是有利于它们自己的生存，而且亦是它们特殊社会关系的“本质”表现和例证。因为没有—个社会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而不遭遇某种无意识的生态后果，所以社会和生态变迁之间的矛盾就可能很成问题，甚至时不时地使社会的处于生存危险之中。后一种观点早在1864年就已经由研究环境变迁之历史—地理学的杰出先驱——乔治·珀金斯·马什——提出来了。当马什认识到区分人为和非人为的变迁常常是极其困难的时候，他认为“人类确实极大地改变了地球表面形式”，其方式决不总是对自身利益有害的。然而，我们长久以来一直忘记，地球只是供我们“使用的，而不是消费的，更不是挥霍浪费的”。人类干预的实际后果是，“自然的和谐最终成为了不和谐”，因为，“与那些偶然的和意外的结果相比，人为的变迁显得黯然失色”。恩格斯以某种含蓄的方式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

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①

这暗示着一种绝对的必要性,即必须始终严肃地考虑社会和生态变迁的双重性(参阅第六章引用的克罗农的“辩证的”视角),或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Marx and Engels, 1975:55),认识到只有当“人同自然的关系被排除在历史之外”,才会“产生自然和历史之间的对立”。

把那种关系重新置入历史之中将会揭示出许多东西。例如,克罗农(Cronon, 1983)就揭示了作为印第安人万余年占有和利用森林活动产物的新英格兰环境(通过焚烧来改良利于物种多样性的森林优势条件)如何被殖民者误解为不开化的、原始的、肥沃的和未被土著人充分利用的。欧洲治理制度和财产权的引入(加上欧洲人对财富积累的独特渴望)产生了巨大的生态转型,土著人口被剥夺了他们特殊生活方式的生态基础。那种生活方式和构造它的社会秩序(以及印第安人自身)灭绝了,这种灭绝既是军事或政治事件,又是生态事件。这种灭绝部分地与新的疾病(特别是天花)传播有关,但在那块土地上发生的变化同样使得维持一种游牧的和高度流动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土著模式不再可能。

因此,巩固某种特殊的社会关系,道路之一便是生态改造,为维持这种改造,需要那些特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沃斯特(Worster, 1985a)华而不实的美国西部设计方案无疑存在着夸大其词——该方案是魏特夫式的,坚持大规模水利工程与专制政府形式之间的关系,不过,他的基

^① 此处译文取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384页。——译者注

185 本论点确实是正确的。一旦为美国西部所设计的那种社群主义的、非中心的、“生物区域的”、有限江河流域的定居系统之原初计划——这是地质学家约翰·威斯利·鲍威尔在 19 世纪末拟定的——被由大公司利益集团控制的议会所拒绝(鲍威尔在这一过程中完全被轻视了),那些利益集团就试图通过建造大坝、各种各样巨型水利工程和极大地改造西部生态系统来确保它们自己的再生产。这样一种宏大的生态工程的维持最终至关重要地依赖于创造和维持集中的国家权力和某种阶级关系(例如,大规模农业综合企业和一个被压迫的失去耕地的农业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固定)。随后发生的推翻杰弗逊式农业民主理想从那以后就在加利福尼亚那样的州中产生了激烈的矛盾(例如,参阅 Gottlieb, 1988 或者波兰斯基的电影《唐人街》)。但是,存在着另一种暗示(显然在克罗农的著作中是缺失的),社会关系矛盾必然会使土地承担社会矛盾,并且使之内化到生态系统工程自身之中。不仅仅富人占据了有利的居住环境,而穷人则往往在有毒害的地区内工作和生活(参阅本书第十三章),而且每一个改造生态系统的计划都具有其社会关系的意味。相反地,以纯粹生态名义——例如,所谓“绿色革命”——建设的那些工程也具有各种个别的和社会的后果(在绿色革命的例子中,土地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产生了失去土地的农业无产阶级)。

所以,人工生态系统往往例证并反映着创造它们的社会系统,尽管它们并非以无矛盾的(即稳定的)方式来例证和反映。较之各种环境—生态辩论,我们更应该重视这个简单的原则。它是列温廷主张的原则,但在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中都同样地被忘记了:

我们不能将进化看作某种预先确定的环境“难题”的“解决方案”,因为正是物种自身的生命活动同时决定了难题和解决方案……作为一个物种在其个体一生和进化过程中,有机体不是**适应**环境,而是**构筑**环境。它们不只是自然规律的**客体**,改变自己以适应必然性,而且是活跃的**主体**,根据自然法则改造自然。(Lewontin, 1982:162)

这就是说，把巴基斯坦和美国西部区别开来的不是被称为“自然环境条件”的差异(尽管它们看起来很重要)，而是贯穿于社会过程(包含了它的全部环节)的各种斗争的历史地理学，借由这些斗争，环境得以改造。这意味着，为了“重新亲近自然”，我们不可能不付代价就能抛弃巨大的既存生态系统结构，比方说，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如此构筑出来的生态系统是“第二自然”的一种改写形式，这种“第二自然”不可能在恶化或毁灭的时候不产生生态灾难，不仅对于生产它的社会秩序，而且对于所有依赖它的物种和形式都是如此。因此，正确地管理已经建立起来的环境(在此，包括它们向某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和生态形式的长期转化)，可能需要生态学家和社会主义者都同样会大加谴责的过渡性政治制度、权力关系等级和治理系统。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根本意义上，在纽约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自然的，甚至在过渡时期维持这种生态系统也必须与生产它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形式达成无法避免的妥协。

186

把纽约称为一个“人造的生态系统”，或许听起来有点古怪。但是人类行为不可能被看成外在于生态系统规划的东西。这样看待纽约并不比试图脱离蜜蜂来研究授粉，或者排除海狸来研究美国东北部前殖民时期的生态系统更讲得通。特别奇怪的是，许多其他就业的生态学家把大规模的城市化转型排除在自己的视野之外，然而同时又在原则上坚持，在一个生态世界里，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毕竟，城市化的漫长历史只是最近世界历史中发生的全部环境变迁过程的最重大方面之一。在19世纪，那一过程就显现出爆炸性发展，创造了一系列前所未闻的全球生态条件。环境问题也浮出水面，这是我们城市化行动所创造的生态关系所特有的。把城市的历史地理学排除在全部环境历史地理学的核心之外，我们将为这种话语习惯付出沉重的代价(参阅本书第十四章)。高特莱伯正确地坚持，我们必须把环境分析“从一种有关自然环境保护或管理的辩论转移到对社会运动的讨论，以回应过去百年的城市和工业力量”(Gottlieb, 1993)。人造的城市化世界的环境，它们的特性和特殊困难，易于新疾病产生及传播的新结构，在可持续性

(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问题上的异常困难,等等,都必须受到我们的高度重视,较之许多当务之急——如荒地、边缘农民运动、风景保护等——它们更是急中之急。

187 像其他有机体一样,人类是“根据自然法则改造自然的活跃主体”,并且总是处在适应他们自己创造的生态系统过程之中。因此,说到社会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就好像它们是两个相互作用的独立系统,这在根本上是错误的。一个贴着“社会”标签同另一个贴着“环境”标签的盒子相互作用,以这种方式来描绘我们周围的世界,这种典型做法不仅几乎不具有直觉意义(试图在你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划出两个盒子的边界),而且它亦几乎不具有根本性的理论或历史理由。例如,必须把货币流和商品的运动看作当代生态系统(特别是既定的城市化)的根本,这不仅因为动植物种类从一种环境向另一种环境的既往地理变换(参阅 Crosby, 1986),而且因为这些流塑造了且继续塑造着一种协调性网络,这一网络使当代生态栖息地以它们自己的特殊方式进行再生产和发生变化。假如明天这些货币流中断了,那么世界生态系统将会发生极大的崩溃。当流发生变化并改变自己的特点——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地理发展总是这样——那么嵌入任何社会—生态系统之中的创造性冲动也将随之以被迫的、矛盾的或者有益的方式发生变化。克罗农把芝加哥视为北美各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交换以及其中变革性影响发生的地点(Cronon, 1991),这种研究就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证。实际上,它把斯密基于通过商品交换和资本积累而进行“自然的生产”这个主题(Smith, 1990)转化和拓展成为一种详细的历史—地理的叙事。“环境的或生态的运动”这个范畴或许因此就是一种用词不当,特别是当其运用到土著人民对生态变化的抵制上时。如许多西方学者假设的那样,这种抵制或许并非基于某种深层的内在需要——保护一种与众不同的和非异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者完整无缺地保存祖先的宝贵象征;而是基于一种更清晰的认识——从外部强加的生态转型(如在新英格兰殖民地发生的那样,或者最近在亚马逊河橡胶业中发生的那种情况)会破坏本土的生产方式。例如,在其对喜马拉雅山脉发生的反对商业伐木和

高技术森林生产管理的契普科“抱树”运动的研究中，古哈指出(与希瓦众所周知的解释相反)：“第三世界发生的这场最著名的‘环境’运动被它的参与者看作首先是一场捍卫森林传统权利的农民运动，其次，才是一场‘环境’或‘女权主义’运动。”(Guha, 1989:xii)然而，一种“同质化的城市—工业文化”正在生成其自身生态和文化矛盾与危机的独特形式，在这一意义上，正是根据其生态实践，契普科“代表着对现代社会的生态和文化危机的最具创新的反应”(Guha, 1989:196)。

然而，土著群体(包括那些在生态女权主义作品中受到极大重视的农妇)也可能对自己的生态实践完全不凭感情用事。它主要是一种西方建构，受到对现代工业的浪漫主义反动的强烈影响，这使许多人认为，他们总是比我们要“更亲近自然”，而且以后还会如此(在我看来，甚至古哈也落入了这个陷阱)。面对这种常常同“对自然的亲近”相联系的生态脆弱性，土著群体能够令人吃惊地快速改变自己的实践和自然观。而且，即使拥有各种强烈地尊重自然精神的文化传统和象征姿态，他们也可能从事广泛而深入的生态系统变革，这些变革削弱了他们以一种既定生产方式生存下去的能力。中国人或许具有对生态敏感的传统，如道家、佛教和儒学(在推动西方“生态意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思想传统)，但是中国的砍伐森林、土壤恶化、河流侵蚀和洪水的历史地理不只是少数环境事件，这些事件按照现代标准来看应该是很大的灾难。考古学证据同样表明，冰河期晚期狩猎群体的捕杀使得许多动物灭绝了，然而必须把火看作是曾经发生的生态变革的意义最为深远的工具之一，它使得许多小群体能够对生态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Sauer, 1956)

在此，重要的不是论证人类行为影响生态并非什么新鲜事，而是评估在空前迅速和巨大的当代社会—生态转型中到底什么东西是新的，哪些东西又被不适当地强调了。不过，这种历史—地理的研究也正确地考察了那些通常由生态学家所提出的主张：从前，“每个地方的人都知道如何与自然世界和谐共处”(Goldsmith, 1992:xvii)。并且，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布克金同样可疑的主张，即“一个相对自足的社群——它

显然依赖于环境而获得生活手段——将会对维持它的有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产生一种新的尊重”（Bookchin, 1990a:97）。当代许多有关“生态意识”的修辞过多地注意土著群体说了什么，而没有看他们做了什么。例如，我们不能从路德·斯坦丁·拜尔的下述论断中推断出北美土著人的实践在生态上优于我们。拜尔说：

我们属于土地，土地也属于我们。我们热爱飞禽走兽，它们在这块土地上同我们一起成长。它们与我们生活在同一蓝天下，同饮一江水。我们都是自然的一员。相信这一点，在我们的心中就会存在一种伟大的和平，一种对全部生物、生长着的事物的充分的友爱。（转引自 Boothand Jacobs, 1990:27）

189 如果要从这种论调中推论出“更好和更和谐的生态实践”，结果便是：要么相信存在着确保生态上结果“正确”的某种外部精神指南，要么相信另一点，即在土著的或前资本主义的判断和实践中，在通常被各种无意识后果所困扰的动态行动领域中，存在着非凡的全能者。“对资源过度开采的可能性完全与人们亲近自然并据此产生的观察和行动的观点一致”（Haila and Levins, 1992:195）。此外，“比较研究已经表明，所有那些结合了增强策略的高级文明都具有暂时的稳定性，它们的发展轨迹可以被视为不断加速的能源开采轨迹，从而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结构都最大限度地拓展，具有稳定的或衰退的绝对热量生产力和投入/产出比”（Butzer, 1982:320）。如巴特泽进一步主张的那样，每一个社会都具有自身在生态方面的困难，我们要从对它们的研究中学习许多东西。

所以，土著的或前资本主义的实践并非必然就比我们好或者坏，只是因为此种群体拥有尊重自然的话语，而不是现代那种统治或奴役自然的“普罗米修斯式”态度（Leiss, 1974）。在反驳本顿（Benton, 1989; 1992）时，格伦德曼（Grundmann, 1991a）认为，“奴役自然”的主题并不一定导致破坏性结果，很容易导致爱、关怀和培养行为。这一论点

无疑是正确的。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这正是主张对自然世界进行“没有暴政的统治”的美学传统的意图。此外，不加批评地接受“生态意识”主张，只能在政治上产生误导。在开始我们上面引述的那种思想之前，路德·斯坦丁·拜尔提出一个真正的政治论据，即“提顿人声称这片大平原土地是他们自己的”。土著美国人确实有强大理由主张土地的权利，把地形风貌用作传承他们历史身份感的记忆，但是，正如我们前面论证的那样，创造一种与土地优先关系的“生态意识”修辞来支持它们，这是一种既老套又危险的行为。

对历史—地理学记录的研究揭示了为什么诸如“自然”和“环境”这样的词包含了“如此丰富的人类历史”（Williams, 1980: 67）。在日常生活实践以及意识形态、再现、美学等领域中，社会的和生态的计划如此纠缠在一起，以至于每种社会的（包括文学的和艺术的）计划亦是一种有关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计划，反之亦然。确实，对于那些在历史唯物主义传统中进行研究的人来说，这样一种主张应该不会太难以接受。毕竟，马克思主张，只有通过改造周围的世界，我们才能知道自己是谁，是做什么的（甚至我们的物种潜能），从而把社会和生态变迁的辩证法置于人类史的中心。不过，是否有什么方法能创造一种足够普遍的语言来控制那种辩证的进化运动？

三 迈向一种进化的观点

190

我们迫切地需要一种比当前所拥有的更加统一的社会科学和生物/物理科学的语言，履行对自然的共同责任。当然，科学的统一性问题已经提出多次了——特别是马克思。但是，每当援引生物学基础的时候，在社会理论方面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熟悉的例子如，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纳粹主义，在社会生物学争论中产生的深刻的社会对抗性，以及特别是运用到种族范畴上的优生学运动的黑暗历史等等）。社会科学在这一方面的反应常常是放弃对社会计划和行动进行生态学方面

的检视，好像这些东西并不重要，或者好像它们必须被解释为某种“外在于”研究的东西。我试图证明，这并不能令人满意，必须设法创造一种共同的语言，要不就得创造在不同话语领域进行翻译的工具。然而，这是一个危险的领域——对于有机论者或整体主义者而不是对于辩证思维来说，它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并且如果要获得成功，它可能需要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同时进行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的深层转向。

但是，这个领域不能没有如何研究这个难题的思想。所以，我要提出一种辩证的和相关的图式来考虑如何理解社会—环境变迁的辩证法。这个极简单的图式把进化过程分成四个不同的方面：

- (1) 生存竞争和斗争(等级和同质性的生产)。
- (2) 环境小生境的适应和多样化(多样性的生产)。
- (3) 协作、合作和互助(社会形式的生产)。
- (4) 环境改造(自然的生产)。

我试图把这些视为相关的范畴而不是相互排斥的过程，并因此坚持认为，每一范畴都把其他范畴的结果内在化了。所以，当社会—生态学家们证明合作(“互惠利他主义”是他们偏爱的术语)在某种意义上是竞争的适应形式时，他们是正确的。困难在于，他们使竞争要素成为塑造所有其他要素的要素(总是一种假定使资本主义“自然化”的意识形态斗争的便利姿态)，并运用适应性把协作吸收进竞争性框架中。这最好地例证了第四章中分析过的那个习惯，即几乎不知不觉地把要素间的内部关系转化成等级制的因果结构。但是，从相关的观点来看，竞争能够很容易地被视为一种合作形式。在第七章中讨论的领地例子便是一个明证。不过，个体与个体之间激烈的竞争产生了一种被称为“社会”的合作性社会结果，这不也是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根本宗旨吗？物种和活动对特殊小环境的适应和多样化也是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形式，结果就是以那种使合作形式多样化而不是单一化的方式改造环境。物种或许会多样化，进一步创造更加多样的合适环境。一个更加多样化的自然的生产反过来生产了更大的物种多样性。

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无论它实际上是多么无力地被灌输，无

论其内容是多么意识形态的，我们还是姑且用它来提醒其他一些重要事情。因为，在那种理论中，并非只是竞争才事关重大，而且特殊的竞争模式以及确保唯有一种竞争的规则和规范——在自由发挥作用的市场中尊重财产权和契约自由——才更加重要。从这一角度来看，在社会—生物学中暗示的标准因果秩序安排似乎被颠倒了，因为，只有通过协作的和合作的社会结构(无论如何强制)，生存竞争和斗争才得以组织起来产生自己的作用。但是，在此重要的不是改变因果秩序安排并因此使社会(合作模式)以某种方式包含自然(竞争、适应和环境变革)。更恰当地讲，竞争总是以重要的方式被内化到竞争之中的合作、适应和环境变革的结果所调控。从这些方面来思考将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特殊的环境变革(诸如美国西部巨大的水利计划)如何影响了竞争模式(既是社会内部的，同时也是物种之间的)和合作/适应模式。因此，加州大型农业综合企业与威斯康星州的乳制品生产者相比，其资本主义竞争意味着相当不同的东西，因为环境变革的形式在两个地方是完全不同的。

我不会进一步详细说明这种观点，但很明显存在着不同的竞争、适应、合作和环境变革模式。从第二章到第四章中提出的相关的/辩证的理论来看，全部过程的每一个方面都把大量的异质性内化到自身之中，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这种异质性是矛盾、紧张、冲突的来源，它触发了为稳定性、霸权和控制而进行的激烈斗争。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方式因此可以被解释成这些不同形态之特别的调节性的整体。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转变必然引起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形态的变革，当然，包括被生产出来的自然的本质。

我在此提出的是一种描述根本性的物理和生物条件及过程的方式，192这些条件和过程贯穿全部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计划，从而创造了实际的历史地理，并没有使那物理的和生物的因素成为人类历史地理平庸的和被动的背景。不过，我的目标是指出这些矛盾和过程，从而能理解人类集体活动有可能通过这些根本性因素在协商过程中创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理发展理论所设想的那种显著不同后果。例如，考虑到生物进化过程的四个“环节”，那么任何形式的有机体(特别是人类)都能够

以多种方式对竞争、适应、合作和环境变革环节发挥作用并产生某种完全不同的后果(诸如相当不同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在1868年致库格曼的一封信中指出,“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①。因此,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有机体(再次强调,任何种类)以动态的和相互作用的方式对这些完全不同的可能性发挥作用的方式。这样做就要求设法破坏“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人为裂隙,使之容易被穿透,甚至取消它。

尽管在此我的语言是高度抽象的和一般的,但我并不觉得,启动这种思维风格、进一步区分它、获得某种自然和社会相互涉透的方式,而不会重新落入社会生物学之典型的还原主义陷阱,这样做很困难。许多迹象表明,这未必就是一种孤立的观察问题的方式。例如,当卡伦(Callon, 1986)分析圣布里优克海湾地区发展贝类养殖的困难时,他将扇贝视为整个过程中的积极的行动者,因此就违背了通常的约定,该约定表示行动者问题仅限于社会领域内。这样,他打开了那种流动之路,在其中,竞争、协作(联盟形式)、适应和环境变革全都作为社会—环境变迁之更普遍过程的部分而相互碰撞。贝特森同样指出了不同的方式,在其中,所有物种(包括人类)都可能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随后的进化(Bateson, 1988)。动物做出积极的选择,并且通过自己的行为改变它们的后代必须要应付的物理的和社会的条件。它们也根据变化了的条件改变自己的行为,并通过迁移使自己面临新的条件,这些条件为演化带来了不同的可能性。列温廷同样赞成对整个过程的理解,在过程中,有机体“不只是自然规律的客体,改变自己以适应必然性,而且是活跃的主体,根据自然法则改造自然”(Lewontin, 1982:162)。通过诸如此类的努力,社会和自然世界之间不稳定的边界将一定会被消除,实际上必须如此。分析表明,如福斯在其女权主义中的本质主义讨论中有力地证明的那样,承认生物决定论和社会建构主义之间的区分本身

^① 此处译文取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页。——译者注

就是完全应该抛弃的错误建构，我们或许会摆脱对“生物决定论”的担心(Fuss, 1989)。实际地和实质性地消除这种社会和科学实践边界，哈拉维已经做出了些示范性工作(Haraway, 1995)。但是她也密切关注那种边界如何严格地在我们的思想、学科和课程中得以管制，并且就何种公司和国家权力构型从那种管制中获益最多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想法。正是通过批判地理解权力关系如何渗透到政治—生态争论之中，我们才能对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可能是什么这个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

四 迈向一种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学

为通往环境—生态政治的社会主义道路定义恰当的基础，这被证明是特别困难的问题。部分原因在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运动从资本主义手中接过了强大的生产主义伦理和宽泛的工具主义方法来理解所谓独特的自然世界，并且在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基础上追求社会关系的变革。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同那种相当自负的统治自然的观点剥离开来，被证明十分困难。此外，马克思主义同多数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一样都普遍地厌恶那种观点，即“自然”能够控制、决定甚或限制任何形式的人类努力。这样，它要么完全回避对任何根本性的自然观的定义，要么诉诸一种过于简化的修辞——“自然的人化”，这种修辞得到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支持，后者总是通过诉诸一系列认识论的/本体论的原则来理解那个难题。当马克思主义者很罕见地把生存之生物的和物理的物质条件视为其唯物主义基础时，他们要么陷入某种形式的环境决定论(如魏特夫的例子, Wittfogel, 1953)，要么滑入一种有害的唯物主义的悲观主义(Timpanaro, 1970; Benton, 1989)。结果在马克思主义中产生了两个极端——“唯物主义的胜利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悲观主义”(Williams, 1978:9)，这两极令人不快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习惯：形势好，就洋洋得意；情况不妙，就变成马尔萨斯派。

194 因此，尽管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存在着大量关于自然问题的原则性作品，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开始，经过施米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到史密斯在《不平衡的发展》中对“自然的生产”观点所进行的探究，以及最近，格伦德曼在《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中的研究，但与蓬勃发展的生态运动的修辞和政治相抗衡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武器库并不丰富。它要么拒绝环境—生态政治，将其视为资产阶级的消遣（实际上，多数确实也是），要么向环境—生态修辞作部分让步，试图在与阶级斗争传统完全不同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重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许多表述中，重要的企图是同时兼顾两者，但没有产生任何特别恰当的结果。

让我们来看看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一本书，这本书由在马克思主义方面信誉很高的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标题是《易受伤害的星球：环境史的经济视野》。福斯特有力地论证，“地球的危机并非自然的危机而是社会的危机”。他进一步论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为积累而进行的积累和共产主义世界为生产而进行的生产如何对世界环境产生了灾难性影响，从而使当代生态危机成为可能。在他的分析中，不少地方都有很强的说服力，但也存在两个重大的缺点。

首先，有关生态危机的假设，即地球总是“易受伤害的”，或者我们实际上破坏了地球，以否定形式重复了那些渴望统治地球的人的自负主张。潜台词是，地球有点脆弱，我们需要成为保健式管理者，或者是照顾它使它康复的保健医生。这使福斯特做出了特别自负的结论：“基于人类和地球的共同利益，如果我们要阻止制度化贪婪对地球造成的无可挽回的掠夺，那么对整个地球进行有意识的和集体性的组织就成为必然。”基于此，至关重要的就是要理解，我们破坏地球在物质上是可能的，我们能做的最坏事情就是改造自己的环境，以至于使自己物种的生活更不舒服，而不是更舒服。同时我们也认识到自己的所为对其他物种产生（既积极又消极的）的后果。而且，至关重要的是，把“环境问题”分解成不同规模上存在的切实难题，从臭氧、气候变暖和生物多样性等全球问题，到土地减少、沙漠化、森林消失等地区性问题，再

到饮用水质量、可呼吸空气和地下室氡等更加地方化的问题。在政治上，有关生态灭绝即将来临的千禧年和天启的预言长期以来一直是可疑的。它并非左派政治学的充分基础，而非常容易受到西蒙(Simon, 1981)很早就提出而当前由伊斯特布罗克(Easterbrook, 1995)主张的那种论证的攻击。这种论证认为，生活条件(可由预期寿命来衡量)现在比过去要好得多，环境主义者主张的世界末日设想是牵强、不可能的。此外，如福斯特的结论非常清楚地表明的那样，没有什么东西不可能广泛地与公司资本主义的利害关系相一致，从而使星球管理按照他们的利益合法化。不过，当全部环境—生态论点的阶级内容屈从于生态危机的天启论观点时，这正是所发生的事情。

第二个缺点(它同第一个有着极大的联系)在于对四个生态规律的说明和解释[主要源自巴里·考摩纳(Barry Commoner, 1990)，他长期致力于进步左派和生态问题的研究]。它们是“(1)万物都同他物相联系，(2)万物皆有归处，(3)自然最知晓，(4)万物皆有出处”。第一条是个重要的常识，如果不承认某些事物比其他事物之间联系得更紧密，那它则没有多大意义。生态分析的任务就是尝试识别无意识的结果(长期的和短期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并揭示行为的主要效果。缺乏这样的理解，就无从说起支持或反对这条规律基础上环境变更的特定形式。第二条规律恰当地显示出，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频繁的污染问题，除了不停地把它们移来移去(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如何处理其住宅问题所做的评论。参见本书第十三章)。第四条规律恰当地指出了预防原则(根据热力学定律)，即人类可使用的能量真的会耗尽(虽然决不会被毁灭)。第三条规律是真正问题所在。因为说“自然最知晓”就是假设自然能够“知道”某事。这样，就像我在第六章中所指出的，这条原理要么融入(又是过于自信)这种观念中，即某人不知怎么处于特权地位知道自然知道什么，要么融入这种保守主义观点中，即我们的环境改造应该尽可能地受到限制(得到许多生态学者支持的警告：“轻轻地踩在地球的表面”)。所以，福斯特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考摩纳的论点，即“在自然系统中，任何重大的人为变化对那个系统都可能是有害

的”。对此，我想以“希望如此”来回敬。不过，对于社会的和其他形式的生命来说，变化到底有益还是有害，以及这种变化对于社会关系、个体的生活机会、生态存在物等等具有何种意义，这些问题都悬而未决。

196 福斯特利用这些规律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彻底的和令人信服的谴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市场而非自然才最为知道，唯一最重要的联系是现金纽带，只要脱离资本的循环，一种东西无论怎样变化都不重要；商品在本质上被视为一件免费礼物。所有这些都相当真实，并且福斯特很好地解释了这些后果可能具有怎样的破坏性。但是，当这些相同的生态规律被应用于社会主义时，困难便产生了。我希望真的是社会主义者而非自然最知晓。实际上，加入社会主义事业（与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公司资本主义和星球管理相反）的唯一有说服力的理由正在于，社会主义者最知晓如何进行环境—生态改造，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长期目标：丰衣足食、为每个人提供合理的生活机会、为人类多样性发展开辟道路。

但是，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学不可能回避这个至关重要的分析观点：今天多数环境都主要取决于资本主义的行为、制度和权力结构。当代环境的可持续性主要取决于保持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说并非赞同继续进行资本主义体系的环境改造，而是承认社会主义的任务在于通盘考虑生态—社会改造的双重性，把它当作一个条理分明的计划之组成部分，而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情况。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我们可以共同希望生产自己的环境历史，但只有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中进行，这种条件经由资本循环、剩余价值榨取、货币化交换和商品循环的漫长历史地理学传给我们。

因此，一方面，可持续性、生态匮乏和人口过剩等概念都同资本逻辑深深地纠缠在一起，我们绝不能由于接受资本逻辑而限制自己选择。另一方面，我们不可能回避改造资本主义生态体系这个难题，在这个体系中，货币循环和剩余价值的榨取已经成为主要的生态变量。因此，任务是定义一种特殊的生态社会主义规划，并为之奋斗，把我们从资本

主义通过其非常明确的生态规划而生产出来的特殊社会压迫和矛盾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暗示了这种困境：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①

于是，人们禁不住按照恩格斯指明的道路来试图为生态以及社会的困境找到有效解决的办法，只是做得还不够：

197

经过长期的、往往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研究，我们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也就有可能去控制和调节这些影响。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②

我说做得还不够，是因为它远没有解决与生态社会主义者可能采取的实际方向有关的大量困境。在此，马克思主义者和各种生态主义者之间

① 此处译文取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页。——译者注

② 此处译文取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译者注

的辩论提出了许多问题。迄今为止，争论主要集中在清楚表述多种固定的立场，但是还有其他更加辩证的方法来解读它，甚至可能“使各种概念之木摩擦起火”。本着那种精神，我将以五个关键领域来结束本章讨论，在这些领域中，这样的“摩擦”可能会有助于生态社会主义概念政治学起火。

1. 异化、自我实现和发展的美学

“自我实现”的理想广泛存在于生态学文献。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接近马克思通过研究人类的创造力来关心人类解放和自我发展，特别是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大纲)》中相关的讨论。然而，马克思主义传统一如既往地关注贫困和匮乏，生产力的解放最终成为通往更广泛的人类自我实现目标之主导的且在某种程度上唯一的手段。这样，它就成为目标本身。

对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主义”进行生态学批判在此是有益的，因为它迫使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审查异化问题(参阅 Meszaros, 1970; Ollman, 1970)。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私有财产、阶级关系、雇佣劳动以及市场交换拜物教把我们与“自然”以及他人的感性和直接的联系中分离开来，使我们产生异化(除了在劳动分工的阶级等级中获得的局部和部分意义)。但是，如果“人靠自然生活”，那么“自然就是他的身体，如果要活下来，他就得在一种持续的相互交换中维持这个身体”。对我们来说，这个身体的健康是根本性的。“尊重”自然就是尊重我们自己。与自然打交道，并通过劳动改造它，就是改造我们自己。这构成马克思主题的一个方面。但是，与自然的直接的感性联系的异化是意识形式的一个基本要素，因此它也是通往解放和自我实现道路的一个步骤(参阅 Ingold, 1986)。不过，在此存在着一个悖论。这种永无止境的意识异化使对解放的知识形式(如科学)进行反思和建构成为可能；但它亦提出如下难题，即如何返回到意识使我们疏远的东西。因此，面对当代劳动分工和技术—社会组织，如何恢复与自然的非异化关系(以及非异化的社会关系形式)就成为把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学家们不可避

免地联系起来的一个部分。

浪漫主义传统的世俗形式在其倾向上具有很深的美学特征，它认为从物质上解放我们独占自然的感性能力会付出高昂的代价。特别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人们已经开始把批判建立在禁欲基础上，反对在大众消费(包括旅游产业和有组织的对“自然”的消费)支持下发展起来的生活质量，并寻求完全不同的非物质价值。宗教观点和世俗观点看起来非常不同，但它们却都共同认为，亲近上帝或亲近自我(因此也是自我的实现)依赖于某种对自然态度的建构。受浪漫主义和美学关怀影响，青年马克思十分赞同这种立场，并且有证据表明他从未抛弃过这种赞同，尽管在其晚期作品中，这种赞同变得非常含蓄。

这些情感极度分裂的地方也正是可能实现复归的地方。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就如许多生态学家指出的那样，没有回头路可走，既不能回到一种同自然的直接关系(或者一种只是以面对面关系建造的世界)，也不能回到那种劳动有限分工的非科学理解的前资本主义或公有制世界。唯一道路是，通过政治的、文化的和知识的手段来“超越”诸如科学知识、组织效率、技术理性、货币和商品交换等中介，同时承认它们的重要性。必须坚持不懈地探索建立在异化之上的现代社会的解放潜能。但是，就如惯常那样，不能把它当成目标自身，因为那将把异化当成终结目标。生态学家和早期马克思关注的是，从现代资本主义造成的那种同自然(以及他人)的异化中向“更高形式”的复归，这一点必须成为生态社会主义计划的根本目标。追求有意义的工作和娱乐(例如，确保“技术的胜利”不是由“个性丧失”所带来的)成为中心问题，劳工运动藉此能够果断地处理同自然、他人和自身异化这些生态辩论的问题。通过更加敏感的科学、更加敏感的社会关系和物质实践以及有意义的劳动过程向感性世界的“返魅”，这种观点提供了比具有本质主义寓意的异化论语言还要好的语言。不过，在此我们仍要面对另一个难题：如果自然的返魅已是一种消费主义项目，是我们自然经验的商品化和迪斯尼化的根本目标，那么，我们到底以何种方式才能够区分出“本真的”和“异化的”(商品化和“迪斯尼化”)自然世界的返魅？

199

这并非否定现象学方法在揭示更加亲密和直接的人与自然，或者人与人之间关系潜能上的相关性和力量（通常特别强调一种亲密的地方知识，参阅第十一章）。甚至在海德格尔那里暗含的感觉之深度和强度也并非不相关的，它们远非对适当的诗学语言、再现和象征体系的探寻。毕竟，萨特的存在主义在海德格尔那里得到的启示与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一样多。不过把这种思维模式假定为政治（在这种情况下，它变成了内省的、排他的，甚至新法西斯主义的思维模式）的唯一基础，就会产生危险，尽管探寻世界之存在和直接经验的二元性之间的统一性确实是马克思的意图。揭示那种二元性必须成为生态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这意味着在纯粹的工具性（中介性）和存在性（直接性）之间存在一种令人不快然而有益的价值二元性。

2. 社会关系和生态计划

揭示我们的“物种潜能”和“自我实现”能力，需要考虑生态计划与发起、实现和管理它们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例如，如果要成功地控制核力量，就需要高度集中的和非民主的权力关系，再加上分等级的命令和控制结构。因此，在反对核力量时，既要集中关注它所带来的生态难题——健康和长期的危险核废料；又要集中于它所暗示的社会关系。同样，在苏联实施的许多生态计划，它们在本质上需要一种社会关系，在根本上与建设一种以平等和民主为基础的新社会之理论计划并不相符。这种批判是容易的部分。因为，如果我们把等式倒过来，并且宣称唯一的生态计划是那些与非等级的、非中心的、高度民主的和彻底平等的社会关系高度一致的计划，那么可能的生态计划之范围将大大缩小，甚至会对许多人构成生命威胁。采取这种立场，肯定不符合公开探索我们物种潜能的要求，而且很可能妨碍我们解决多数人所遭受的物质灾难。

在此，对于那些总是矛盾的情境，除了完全承认张力的本质并积极寻求顺应其后果的政治道路，我们没有什么解决办法。更直接地说，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那些源自某种社会关系的“自然”的后果。例如，

如果我们把——我认为，我们必须这样——当代生态系统看作是由人造城市环境与维持它们的资本和商品的流共同组成的，并且，如果这些生态系统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要求，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切实可行的（与那些灾难性破坏相反）社会和生态改造呢？这绝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并且，从大量生态运动中获得的通常肤浅及简单的答案也是完全不起作用的（参阅本书第十三章）。

3. 技术问题

“技术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Marx, 1967:352）^①但是，把任何技术决定论归之于马克思显然也是错误的（“揭示”不能被解读成“决定”），在把社会关系嵌入生态计划的过程中（反之亦然），技术和技术选择的中心地位意味着必须认真关注这个问题。当格伦德曼指出马克思方法中的某种深层张力，他确实抓住了问题的根本（Grundmann, 1991b）。例如，如果被资本利用的机器，不仅仅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而且剥夺了他们的技能和艺术鉴赏力，同时使他们与自然的关系呈现为一种异化的状态，那么自我实现（无论我们如何坚持计划的集体性质和本真性“返魅”的潜力）可能会因为技术原因而处于危险之中。某些技术甚至违反更好地控制自然这个目标，因为它们把高度的环境风险与最小的社会利益结合在一起。问题甚至变得更加严重。要么（如当前许多生态学家主张的那样）彻底拒绝资本主义强加给我们的技术合成物（特别是它的社会生态计划合成物），要么逐步改造它们使之更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和源自那种关系的思想观念（诸如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围绕“恰当的技术”和“小即是美”，争论就因此产生了，它们不是建设社会主义必要的技术原则或者道路，而是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社会之未来技术组织的疑问（参阅 Commoner，

^① 参阅《资本论》，第1卷，第410页。在《资本论》的标准中译中，technology译成“工艺学”，我们按照哈维的讨论主题，直接译为“技术”。——译者注

201 1990)。因此，如何精选那些最大限度地减轻(而不是加强)对自然代谢关系破坏的技术就是必须解决的社会和政治难题的重要部分。

4. 共性和差异的辩证法

因为时下流行的多数激进生态批评都起源于无政府主义，所以它典型地强调社群、地点、地方、亲近“自然”，特殊性以及非中心性(强烈反对国家权力)，而不是更加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后者更关注无产阶级的普遍性以及推翻作为世界历史统治制度的资本主义。任何生态社会主义计划都必须正视这种对立。在此，我主张一种更具**地理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更具生态敏感性，无论在分析还是变革前景上都提供了许多新东西。反对资本主义统治形式的一般斗争总是由反对资本主义所从事的特殊类型的社会生态计划以及作为其前提的特殊社会关系的**特殊斗争**所组成(如反对喜马拉雅的商业性林木开采和管理，反对加利福尼亚的大型水利工程，反对法国的核动力)。因此，必须随时根据社会—生态计划的本质和规模的变化来阐明社会主义的斗争原则。出于同样原因，社会主义改造的特性决定性地方取决于与特定计划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生态可能性，那些计划看起来差别很大，例如，在尼加拉瓜或者津巴布韦的情况看起来就不同于瑞典的情况，跨国金融也不同于紧邻住宅计划的医疗垃圾场的情况。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需要反思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般假设**。社会主义并非必然采取同质性结构。对我们物种潜能的探究当然也涉及创造性研究和探究多样性和异质性。那些与我们处理异化(和返魅)以及探寻自我实现多种可能性努力步调一致的，在根本上是社会主义未来的一部分。除了冷漠的、商品化的同质性的不平衡地理发展，资本主义不能生产更多的东西，这确实是它的最令人震惊的无能。

集中于地方建设、生态区域主义以及诸如此类问题的激进生态文献提供了某种创造性的东西，部分地为批判资本主义浪费性生产(难道我们真的需要把英国的啤酒运到澳大利亚，或者反过来把澳大利亚的啤酒运到英国?)以及城市设计中的持续性雷同等问题打下了卓越的基础。

芒福德满怀希望地把地区描述成，“如它相应的人造城市，是一个集体的艺术作品”，它既不是“在自然之中发现的现成品，也不只是人类意愿和幻想的创造物”。这种思考方式深嵌于社会主义的生态改造计划之中，它取决于作为各种地方艺术品的“自然的生产”，以及尊重文化、地方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差异的创造。在自由探索自然其他部分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背景中，人类有足够的创造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能力，这是任何生态社会主义计划之生死攸关的组成部分。像伯格那样的生态区域主义者所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栖息于一种‘意识领域’中，这种领域主要由我们居住的地方、我们从事的工作和我们与之分享自己生活的人共同决定”（转引 Alexander, 1990: 170）。而且，绝对有理由去追随他的进一步主张，“人道的和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文化的再创造”应该成为“我们时代‘真正工作’的组成部分”。这样，他回应了雷蒙德·威廉斯和海德格尔提出的那些问题。

但是，在此我们也切中了这样一个要点：生态社会主义源自纯粹的生态区域主义、地方和地方性社群主义政治。难题在于，在这样一种非中心化政治的强烈地方主义之中，存在着不止一点的极权主义、监禁和限制，也存在着一种天真的信仰：（1）尊重人类的多样性与如下信念是兼容的，即所有分权社会都必然“根据民主、独立自主、自由、正义以及其他此类急需之物的（启蒙的）价值”来创建（Sale, 1985），而不是依据奴役、性别压迫，等等（Dobson, 1990: 122）；（2）常常由共同体的自给自足和对外贸限制带来的“贫困”将会克服，以及（3）限制人口迁移，再加上对破坏性“外国人”的排斥，总会以某种方式与个人自由、民主和对“他者”宽容的最大化观念相一致。扬认为，把共同体定义为反对他人，并因此以一种完全排他的、沙文主义的和种族主义方式来阐述社群主义政治，那是一场恶梦。这一有益警告（参阅本书第十二章）并不能轻易地逃脱（Young, 1990a）。例如，戈德斯密斯居高临下地写道，“可以允许某些外来成员居住下来”，但他们将不能“参与社群的管理，除非公民们选举他们作为自己的成员”，这种新法西斯主义性质的排他政治学倾向过于封闭而令人不安。例如，意大利北部右翼伦

巴第联盟的“生态主义”不仅在对待非意大利人的移民，而且在有关从南意大利的迁移问题上都同样拥有这种立场。而且，在这种思维中有一个假设，即生物区域是历史地或自然地形成的，而不是由各种在相当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规模上运行的相互交叉的过程所塑造的。换句话说，他们以一种最不辩证的方式来看待生物区域，将其视为物而不是变化过程的不稳定的产物。因此，这便产生了如下问题：生物区域、地方或者人类社会应该在什么样的规模上得以规定？

我们能够断言，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学必须关注“普遍性”在其中具有双重意义的政治学。扬的法则最好地表达了这一点：“每一个人都参与并共享道德和社会生活，这种意义上的普遍性并非意味着接受普遍观点意义上的普遍性，后者超出了特殊的联系、感觉、义务和欲望。”(Young, 1990a:105)这两种普遍性之间关系的永久性协商，无论跨越性别、种族差异，还是其他社会联系来解读，抑或跨越可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探索的社会—生态计划的多样性来解读，都必然是生态社会主义思维的核心。

5. 时间和空间规模问题

乍一看，规模问题似乎是一个纯技术问题。例如，生态系统(或者社会生态计划)在何处开始又在何处结束？一个小水塘如何不同于全球？在一个规模上发挥作用产生深远影响的过程怎么会与另一规模并不相干？海拉和莱文斯主张：“适当规模的问题在理解社会—自然的相互作用中是根本性的理论挑战之一。”他们(Haila and Levins, 1992: 236)主张，定义时间和空间规模，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方式”：它们是有机体所建构的，所以不同规模在自然中的任何特殊地点同时存在(参阅本书第十章)。就像辩证法所认为的那样(参阅本书第二章)，如果并不存在每一事物都向其还原的基本单位，那么用以考察过程的规模选择就既至关重要又成问题。人类作为生态行为者发挥作用时所处的时空规模是不断变化的，这一事实加剧了困难。例如，克罗农指出，甚至在新英格兰成为殖民地之前，来自欧洲的长距离贸易就把两个在很

大程度上孤立的生态系统相互联系起来，从而使印第安的物质文化商业化，并破坏了他们早期的生态实践。如果我们考察这些由商品和货币流来确定规模的年代，并想想规模在最近的百年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就会立即清楚地发现：源自资本积累、商品交换等实践的规模定义，它们从来就是不稳定的（参阅本书第九、第十章）。

然而，如史密斯所评论的那样，“地理规模生产理论”（我将补充一点，时间的生产亦是如此）“在总体上是发达的”（Simth, 1992: 72）。这似乎意味着，一种嵌套的规模等级（从全球到地方）的生产总是使我们陷入一种如何“在它们之间进行仲裁和翻译”的政治—生态学问题之中。生态辩论正是在这一点上令人难以置信地混乱。一方面，盖亚星球健康关怀行动的专家们在全球层次上思考和行动，而生态区域主义者和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则在地方层次上思考和行动，他们相当错误地假设，无论什么对于地方有益的东西对于大陆或全球也都是有好处的。在这一点上，问题变得具有深刻的政治性和生态性，因为根据社会—生态计划行动和决策并管制它们无意识后果的政治权力也必须在某一规模上得到定义（并且，在当代世界中，主要是过去几百年中创立的民族国家维持着特权位置，尽管它们并没有产生什么必要的政治—生态意义）。这同时也表明了任何生态社会主义计划都必须面对极为具体的东西。一方面，人类实践会持续地变革，重新定义时间和空间的规模，而另一方面人们必须创造出某种政治权力结构以便能够在那些由不同计划给定的不同规模之间进行“仲裁和翻译”。在此，生态社会主义视角看起来对于社会主义者思考如下问题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如何开发人的潜能，我们能够创造出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使之对于任何社会主义计划的生态维度都具有敏感性。

204

五 结语

马克思曾经评论：“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

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①。我在此提及这种劳动旨在努力做出概念性说明，这一工作可能会成为资本主义批评和社会主义建设之政治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要实现这一点，如埃克尔斯里精确地指出的那样，由此类分析所产生的抱负“必须批判性地与人的当前知识联系起来，由此把欲望和分析联系起来从而产生有依据的文化、社会和政治联系”。说到底，那意味着发展各种方法使生态问题概念化，并把它们阐述出来，从而对工人阶级运动和部分妇女与生态主义运动的抱负具有吸引力，同时也对那些非洲裔美国人具有吸引力。那些非洲裔美国人在二十多年前巴尔的摩市左岸爵士俱乐部中非常正确地把他们主要的环境问题定义为尼克松的总统职位问题。

^① 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页。——译者注

第三部分 空间、时间和地方



Need to shift a lot of space quickly?

In background Canary Wharf, 10 million sq. ft. Approx. £4 billion. Foreground Audi 100 2.8E Estate, 50 cubic ft. £23,735.
And, with a 174 bhp V6 engine, we all know which one is going to go faster.

第三部分前言

大量历史地理证据表明，不同的社会（以经济、社会、政治组织和生态环境不同形式为特点）“生产了”完全不同的时空观念。这个主题可以进一步讨论，在各种研究中达成一种表面上的共识，承认时空是社会构造。 207

不过，在这种共识背后隐藏着无数破坏性混乱。例如，时空是由社会关系实践构造并组成的，人们现在几乎习惯把这一观点当作社会科学信条来接受，但实际又常常会滑入一种十分乏味的表述，认为社会关系发生在某种前构造的和静止的时空框架之中。这种游移几乎被忽视，但它因此更加重要，暗示着解释时空性和社会性之间关系的方法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某种根本性错误。例如，是否允许乃至可能把时空作为独立的品质，这一点根本就不清晰。大量仅仅聚焦时间的著作（甚至在今天出现了一本专门的《时间和社会理论》杂志）暗示，把时间和空间割裂开来仍然是流行态度，但很少有人对这种做法的理由或后果进行严肃的探讨。例如，阿维尼的《时间帝国》完全质疑空间的本质，即便构造时间所必须的空间化（例如，全部的日历和钟表）几乎其每一页都存在着（Aveni, 1989）。此外，时空的社会构造是否暗示，它们只是缺乏任何物质基础的社会惯例？如果把时间和空间判定为物质属性，那么，在想象或直觉之外借助何种手段才能建立这些属性呢？其次，凭借一些时空概念来推测（通过小说或幻想）自己是谁（或干什么的）或者可能是谁，以及世界如何运行，我们怎样理解这种明显非唯物主义的比喻用法呢？最后，像当前某些人主张的那样，如果实质用法和比喻用法 208

之间的边界是不相关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与已经构造出来的全部事物一样，当下正在建构的网络空间的虚拟现实既是真实的又是虚构的？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很重要，因为时空是我们思考和行动基本概念。对于理解世界和使之理论化，我们的结论将具有深远的意义。因此，在下文中，我首先对历史学的、地理学的和人类学的文献进行提炼，指明谈论社会构造或时空“生产”的真正意义。然后，在第十章，我将探寻似乎适用于解释历史—地理结论的一般的形而上学基础——时空相关性理论。

时间和空间概念影响着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它们也提供了一种参照体系，借助于这个体系，我们定位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或者用第三章的语言来说，定义自己的“情境性”和“位置性”）。因此，进一步讨论时间和空间而不使用“位置”（place）这个术语，这是不可能的。这反过来会影响我们“安置”（place）事物，特别是思考事物秩序中的“我们的位置”。“位置”这个词也承载着过多的意义。首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词，如环境、地点、位置、场所、邻里、地区、领土等等，它们都是指地方（place）的一般特性。也存在另外一些术语，如城市、乡村、集镇、都市以及国家等，它们指明某类特殊的地方，再者，如家、家庭、“帮会”、社区和民族等，它们具有同样强烈的地方内涵，这使得我们在谈论一个术语时很难不涉及其他术语。“位置”（像空间和时间那样）也具有一种特别广泛的比喻意义。我们谈论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根据对自己位置的认知，或者感觉到我们拥有一个同他人相爱或相互尊重的位置，而把这些观念在精神上内在化。通过把人、事件和物置于他们的“合适”位置，我们表达规范，并试图通过努力确定一个被压迫者能够自由说话的新位置（例如“在边缘”或“在边界上”）而颠覆那些规范。在我们的语言中，位置必定是最多层次和最多用途的关键词之一。

尽管这种极大的意义混乱使得任何有关位置的理论概念都直接令人

怀疑,但我却认为意义的一般性、含混性和多层次性是有利条件。它暗示着某种根本性的统一(或者内在化的过程),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理解它,这种统一性将揭示社会的、政治的和空间的实践长期以来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虽然我主要集中关注位置的区域性和物质特性,但这一术语的散漫性却使得我能够揭示它与其他意义的内在联系。209

例如,我主张,尽管某种空间障碍的瓦解破坏了先前表面上可靠的位置(如“家”和“民族”)的物质的和区域的定义,但正是那种瓦解的事实(“时空压缩”事实或威胁,或者赛伯空间的建造)重新强调了对比喻和心理意义的探究,进一步创造了重新在物质上定义位置的物质实践。例如,对“他者”——他们现在似乎威胁性地在任何地方包围了全球——的畏惧可能导致各种各样的排他性领土行为。揭示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澄清棘手的“他性”和“差异”理论难题,因为以位置为基础的领土同一性,特别当它与种族、种性、性别、宗教和阶级差别合并在一起时,对于进步的政治动员(战斗的特殊主义)和反动的排他政治学来说,都是最具渗透性的基础。当论及“位置的力量”时,人们似乎要么卷入一种直接的拜物教——把力量赋予物;要么便是,谈论某种位置构造的社会过程,这一过程对我们世界的形成是必要的、有意义的和具有政治经济的影响。因此,对于任何一种对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原则的根本理解来说,与时空之社会构造相一致地支持位置概念,就是一个重要的计划。不过,那种根本性的理解既在经验上又在理论上的支持下述观点:只有与本书第二部分中讨论的社会—生态改造过程联系起来,空间—时间—位置^①这个三头政治才能够得到完全正确的评价。

① 在本篇中,place这个术语的中心含义应该是“位置”。但是,在中文语境中,考虑到阅读习惯,我们很难以统一的术语来翻译,从而忠实讨论的原始形式。我们的具体做法是,一方面,从统一性角度,尽可能地选择“地方”来翻译,从而贴近中文语境;另一方面,灵活地运用“位置”、“地方”等,从而体现哈维通过术语“含混性和多层次性”来保持讨论的开放性这一目标。——译者注

第九章

空间和社会的时间建构

全部时间和空间的能量所在之处——所谓创造的心与脑，
就是激活每一种功能的地方；哪一个艺术家不想居住在那里呢？

——保罗·克利

一 社会生活的空间和时间

210 在《宗教生活的基本要素》中，涂尔干指出空间和时间都是社会构造物。人类学家，如哈洛威、列维-斯特劳斯、霍尔，以及晚近的布迪厄、穆恩、休-琼斯、杰尔和莫尔等，他们的著作都支持这种观点：不同的社会创造了性质有所差别的空间和时间概念(Durkheim, 1915; Hallowell, 1955; Levi-Strauss, 1963; Hall, 1966; Bourdieu, 1977; Munn, 1986; Hugh-Jones, 1979; Gell, 1992 and Moore, 1986)。索罗金坚定地把这种观念植入社会学的议程，段义孚、沙克、帕克斯和斯瑞夫特以及卡尔斯坦因等人代表了地理学的进展，古列维奇、勒高夫和布罗代尔等历史学家则相当详细地描述了空间和时间概念的历史变迁(Sorokin, 1937—1941; Yi-Fu Tuan, 1977; Sack, 1980; Parks and Thrift, 1980; Carlstein et al., 1978; Gurevich, 1985; Le Goff, 1980; Braudel, 1974)。当然，文学理论和艺术史家一直信奉时间和空间的相对主义(Ross, 1988)，最新的女权主义者(Spain, 1992)则使其成为论证的重要方面。人们普遍同意，空间和时间是社会构造物。

不过，这个结论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混乱和误解。为此，我从四方面予以澄清。

1. 社会的时间和空间社会构造物并非无缘无故产生，而是各种时间和空间形式塑造的，人类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遭遇它们。例如，日夜、季节、动植物世界的生命周期，以及调节着人类繁衍和身体的生物过程等，便是典型的时间形式。不过，当我们利用能源把黑夜变成白天，当我们利用国际劳动分工在一年四季都生产出新鲜的果蔬，当我们通过基因工程加速鸡和猪的生命周期，当人类预期寿命随着生活水平和医药知识的提高而上升，这些时间都将被修改甚至超越。因此，物质世界的各种时空属性的发现（通过物理学、生态学、生物学和地质学等）是根本性的。就何种特殊过程被用以构造空间和时间来说，那些知识使一种社会选择成为可能。钟摆运动或者放射物衰减速度现在得到利用，然而在其他时代，则可能是地球和恒星的循环运动，或者动物种群的迁徙。说时间和空间是社会构造物，并非否定它们在世界物质性中的最终嵌入：

211

时间在宇宙“之中”；而不是宇宙在时间“之中”。没有宇宙，就没有时间。没有从前，就没有以后。同样，空间在宇宙“之中”；宇宙不在一个空间区域“之中”。宇宙“之外”不存在空间。（Hewitt, 1974:515）

2. 空间和时间概念同样依赖文化的、比喻的和知识的技能。从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早期，“深度时间”教条（在地质学家詹姆斯·哈顿写于1788年的著名表述中，这种观点是“既不存在开端的迹象，也没有终结的希望”）的兴起既受益于对岩石和岩层的观察，也受到了比喻观的极大激发：

内在和外在源泉——由比喻激发的理论源泉和由理论限制的观察源泉——的相互作用标志着所有重大的科学运动。意识

到比喻是几个世纪争论的基础，它们总是解开诸如方向和内在等基本谜语的共同财产，我们就领悟了深度时间的发现。(Gould, 1988:7)

时间和空间或许是“自然之事实”，但就如谈论“自然中的价值”一样，它超出我们自身在语言、信仰系统等等之中的文化嵌入性的范围，我们不可能知道那些事实是什么。

3. 社会的空间和时间构造物，与任何个人和制度皆须回应的全部客观事实一道发挥作用。说某物是在社会中构造的，并非说它在个体意义上是主观的。古列维奇(Gurevich, 1985:14)主张，存在着一些“普遍的概念和表象，它们对于社会整体来说是规范性的，没有它们，就不可能构造什么理论的、哲学的、美学的、政治的或宗教的观点或体系”。诸如空间和时间这样的基本概念一旦被人们接受，它们就会深入人心；“把这些范畴的性质强加到全部社会成员身上”，并非“意味着社会通过要求其成员以这种特殊方式来理解世界并对之做出反应，从而有意识地把这些规范强加在他们身上；无论社会强迫其成员接受这些范畴和形象，还是他们自觉接受和‘吸收’，社会都是无意识的”。例如，在现代社会，尽管时钟时间是一种社会构造物，但我们还是将之作为日常生活的客观事实加以接受。它提供了普遍遵守的标准，不受任何个人的影响，我们依据它组织自己的生活，评估和判断各种社会行为和主观感受。即使我们不遵循它的时候，我们也深知自己反叛的是什么。

4. 客观空间和社会定义深深地扎根于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中。例如，布迪厄(Bourdieu, 1977)揭示，在北非卡拜尔人那里，时间和空间的组织(日历、住宅内部的分割等)如何通过把人与活动分派给不同的地方和时间从而构成社会秩序。与特定时空组织模式一致，群体有序地安排其等级、性别角色和劳动分工。其实质性嵌入的选择最符合时空的社会构造物，这种选择使社会关系(以及机构的和权力的)内在化。例如，在卡拜尔人社会中，妇女的角色是以特定时间中所占

有的空间来定义的。特殊的时空再现(与使用相反)方式通过保障社会秩序而指导着社会实践。休-琼斯在对亚马逊河西北地区时空过程的研究中,通过在空间—时间原则——构造皮诺—巴拉那印第安人的宇宙,并通过婚姻和生育建立社会结构、家庭和父权制群体的基本单元——之间建立联系,她强调:在印第安人宇宙结构中得到表述的空间—时间原则既是“当前经验的想象投射”,又作为“同时控制当前经验和塑造其有机组成部分的投射”发挥作用(Hugh-Jones, 1979)。空间和时间的表象源自社会实践世界,但是又成为这些实践规范的一种调节形式,如我们将看到的,这就是它们如此频繁地处于争论之中的原因。

在下文中,我将利用古列维奇和穆恩的两项研究来梳理有关空间和时间社会构造的某些根本问题和原则。

二 古列维奇和《中世纪文化的范畴》

213

古列维奇(Gurevich, 1985)对比了前基督教、基督教以及现代早期有关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和实践,揭示了它们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以及建立有关“自我”、“他者”、“自然”等价值的模式。他认为,“我们现代的时空范畴与其他历史时期人们理解和体验的时间和空间几乎没有共同性”。在中世纪早期,时间和空间并不被理解为:

中立的坐标,而毋宁是统治着万事万物的神秘而强大的力量。……因此,时间和空间充满价值和情感:时间和空间可以是善或恶,可以对某种行为有利,而对其他行为则是危险的或不利的;存在着神圣的时间、作乐的时间、祭祀的时间,以及重新演绎与“原始时间”再现联系在一起的神话的时间;同样也存在着神圣的空间,神圣的地方或者受特殊力量支配的整体世界……中世纪的人把自己视为所有世界由以创生的那些要素的统一体……在最小的粒子中包含着整体;小宇宙是大宇宙的复制品。

这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如何思考“自我”和“身体”（身份的主要要素）与世界的联系：

人依赖自然环境，且他不能把环境理解为自己能够从外边施加影响的客体，在人这个“小宇宙”和世界那个“大宇宙”之间内在相似性的观念中，我们发现这种依赖性的文化映像。那两个宇宙具有相同的结构，并由同样的要素组成。我们也可以从“宇宙”人的身体形象上发现这一文化映像，那是不完整的身体，不能清楚区别于它所融入的周围世界，易受这个世界影响并将之吸收进自身。（Gurevich, 1985:32）

对空间和时间的理解与自我评价有着密切的联系。“身体和世界之间全部障碍的夷平，以及两者之间转换的流动性”塑造了“中世纪大众文化的以及相应大众想象力的显著特点”。因此，没有什么比使“人成为万物尺度”更加“自然”，因为人们认为“人”与自然不可分离，并把万物内化到自身之中。在此，我们与后来“莱布尼茨奇想”的中世纪起源不期而遇（参阅第三章）。

此外，如果个体或群体（家庭、宗族、社区）与地球之间的区别被看作特别容易穿透和模糊不清，那么人类便会把他们的位置，如农场建筑物，用作“宇宙的模型”（Gurevich, 1985:45—47）。结果就产生了非常接近海德格尔后来特别有力地阐明的“在大地上栖居”的观念。古列维奇谈到前基督教的中世纪时期时说：

居住场所与它的所有者如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以至于离开一方就不可能想象另一方。只有当人们拥有农场，它才反过来“拥有”他，并且把自己的记号刻印在人的个性之上。……斯堪的纳维亚的地形并不只是根据地理坐标绘制的：它充满了情感和宗教意义，并且地理空间同时代表着宗教的一神话的空间。其中一

个非常容易地转化成另一个。(Gurevich, 1985:48—49)

中世纪观察空间和时间的方式是相关的和辩证的，而不是绝对的。空间和时间并不“在经验之外和之前存在；它们只是在经验自身中给定的，它们成为经验之不可分割的部分，也不能把它们从生活之网中分离出来”（Gurevich, 1985:102）。这规定了一种特殊的情境性意义，一种特殊的人类相对于世界的位置性意义。但是：

伴随着从异教信仰向基督教的转变，中世纪人的空间观念经历了一场彻底的结构转型。宇宙空间、社会空间和意识形态空间都被赋予了等级结构。

时空性不可分割地同宗教和道德概念联系在一起，这种实证知识如此充满着圣经的意义，以至于“宗教和伦理价值凌驾于纯粹认知价值之上”。基督教打破了关于时间的循环世界观，代之以一种更具末世论意味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存在着一个开端、顶点和终点，这种时间是“线性的和不可逆的”（Gurevich, 1985:111）。基督教关注“作为戏剧的时间”，在其中，尘世生活和整个历史都被视为善恶之间斗争的战场。这种意识使得内在的自由选择要素成为历史过程之至关重要的方面。然而，这种行动将不可能从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结果是从不同的经验模式（农业的、政治的、教会的和军队的等）中产生了不同的时空观点。但是所有这些根本不同的时空概念都服从于包罗万象的基督教观念。对自我实现和救赎的探寻“被理解为空间中的运动：圣徒将升入天堂；而有罪的人则下地狱”（Gurevich, 1985:74）。因为基督教界之外的空间“丧失了其优点”，所以基督教空间的扩展便成为那种从罪恶力量手中夺取空间的经常性暴力斗争的组成部分。因此，地理空间，即时间戏剧的旋转舞台，便“复杂地扩张和增长”，与此同时存在着“一种对人类心灵内部空间的逐步吞并，揭示了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财富”。所以，我们看到，古列维奇断言，无论时间还是空间，都不被

215

看作“先于物质”的形式；它们都“只不过像其他的上帝造物那样真实”。

三 穆恩的《加瓦的名声》

南希·穆恩在其《加瓦的名声》中研究了一个小珊瑚岛上的人们通过时空实践而形成的价值形态，该岛居民不到 500 人，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北群岛。穆恩把空间、时间和价值这三个概念置于那种关系网络的中心，这种网络充当“一种模板或生成图式……建构了价值得以创造和指示的主体间关系”。她主张，社会文化实践“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中或者通过时间和空间而发生”，而且它们也“构造(创造)它们在其中发生的时空”。因此，行动者“实际地生产了他们自己的时空”(Munn, 1986:121)。

通过社会地创建时空的社会—文化实践，穆恩追踪了有关价值的意义的象征体系的形成。不同的时空形式源自不同的社会实践。这意味着，加瓦人的空间和时间是多维度的和等级的，取决于被观察的各种社会实践的类型。结果产生了“不同事务之不可比较的时空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而不是“由确定的历法框架所定义的同质性时空”。但是，不可比较并不意味着没有联系。加瓦人的活动恰恰把一个时空和价值形态的领域同另一个领域联系在一起。

穆恩从这个角度观察了多种实践。房子和花园形成了一种社会—文化实践和时空构造领域，该领域高度性别化为妇女的领域，并且在建构象征意义和价值时，具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模板。家庭单元之间的关系，主要由不同群体之间的通婚和交换来规定的(在不同的群体中，交换不仅仅是产品和食物的交换，而且也有像独木舟那样的重要礼物的交换)，它形成了另一层次，并且这两个层次共同为建构更为广泛的评价领域提供基础，那种评价则是围绕款待来自另一个岛上的男人，以及受招待的男人回应对方的好客而建构起来的。后一方面拓展了个体时空

关系的范围——“把食物赠给来宾，因为他们的消费被视为开创了一个在时空上不断扩大的过程”，这一过程“使得食物转换成名声”。相反地，因为含蓄的时空收缩，一个人在家庭范围内独自消费被视为消极价值。男性岛民之间的好客关系创造了一种时空世界，这一世界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关系上，这些交往和关系在有限范围内为价值(名声)的意义提供了基础。

然而，库拉贝壳的交换较少受到限制，并且“构成了最广泛的岛屿世界的区域网络”，在这个网络中，男人们能够“同那些他们很少或从未谋面的远方的同时代人”产生联系。贝壳的循环，以及与从属于这些贝壳的名字的循环，使它们从地方性中解放出来，并且“通过它们在另一时空中也可获得”，而使它们成为“谈论的主题”。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时空)价值层次上，通过向其他男人提供款待或接受其他男人的款待，库拉交换建构了一种主体间的时空。然而，无论是在待客还是在库拉交换关系中，所获得的价值——尽管这种价值主要是通过男性活动而获得的——都需要一种强大的女性基础：“在控制和改变时空的男性权力的基础上存在着女性的控制层次，它为过程之男性层次提供了动态基础和前提条件”(Munn, 1986:160)。

穆恩的分析暗示，“借助重要的他者的评价而产生自我，这是价值产生过程所固有的”，并且“在生产超越自身的特定水平的时空扩展时，行动者也生产了自己的价值”(Munn, 1986:15)。因此，“社会文化的时空”是相应的价值尺度，它是从“我称为主体间时空的行为延伸或扩展的相对能力”来刻画的，“那种主体间的时空是自我—他人关系的时空，是在行动和实践过程中并通过它们而形成的”(Munn, 1986:9)。因此，价值就是“一般的和相关的，而不是特殊的和本质性的”(Munn, 1986:8)。加瓦社会是一个整体，从这一立场来看，它的“内在的生存能力”完全取决于“外部他人对它的积极评价”，这种评价取决于“由行为动态所塑造的时空模式”的构成。这是一种极为相关的时空观念。

穆恩的描述带来了几个问题。尽管“由某种特定类型实践所创造

的时空模式也是行动者自身的形式”，但是在直接建构和间接建构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别，前者是通过园艺或者招待行为实现的，后者则是由库拉贝壳交换所产生的。这种差异影响着价值(意义)得以形成或表达的方式。尽管两种建构都生产象征性中介(包括特定的谈话方式——话语——以及象征性的空间再现)，但是诸如库拉交换这样的间接建构更大地取决于时空观念和价值的抽象和一般化。同样，如果要维持它们的话，就需要有关时间—空间和价值的特殊的社会文化话语形式。命名、记忆、语言都卷入了这个过程。

217 这提出了一个难题：如何从一个时空实践(以及相关的话语和象征)领域向另一个领域转换，因为我们并非与完全独立的世界打交道，而是与相互联结在一起的建构打交道，那些建构把我们从花园与房屋带到扩大了库拉贝壳交换的时空中。她认为：“用独木舟来交换贝壳，实现了时空的不同价值水平的转换”(Munn, 1986:150)。当人们从园艺产品向独木舟或库拉贝壳交换发展时，独木舟便似乎成为至关重要的“时空媒介”，它把加瓦交换的内部时空与“岛屿世界之间库拉贝壳和项链的最大限度流通”联系起来。由家庭建造并在不同的通婚群体之间内部进行交换的独木舟，它不仅使得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的旅行得以可能，而且作为礼物，使得一个人能够进入库拉循环本身。

无论如何，一旦得以建立，这些交叉的抽象和话语便会影响和调节社会实践(这一结论也是布迪厄和休-琼斯共有的)。穆恩指出，身体、家庭和再生产的性别关系以及性别角色等等都卷入了围绕空间、时间和价值建立的更广泛的象征体系中。例如，在加瓦的例子中，身体的时空“是一种它所从属的更大时空的浓缩符号”(Munn, 1986:17)，同时，通过招待和库拉交换而创造的主体间时空的扩大则从总体上影响了共同体内部等级和平等的辩证法(Munn, 1986:20)。

如果时空扩展是价值建构的核心所在，那么时空收缩(或者只是不能扩大)实际上就是价值的丧失或“消极的价值”。当加瓦人吃掉自己的食物而不是用来款待他人，他们实际上就破坏了价值。不过，最重要的否定机制是巫术，它被设想为一个隐蔽的世界，“破坏着明显的、

可见的时空秩序，使隐含的、消极的意义具体化，甚至把可传播行为为明显积极的价值潜能颠倒为消极的破坏性价值”（Munn, 1986:13—14）。正是通过巫术，名声被毁灭了，共同体被“丑化”，而个体则会遭受苦难、疾病和死亡。

因此，评价和贬值便在加瓦人的时空实践世界中形成一种二元地和辩证地构造的对立。消极的要素具有重要的社会后果。通过打击那些孤立群体之外或者独自积累（财产）的人，巫术一方面加强了“根本的、平等的社会前提，特别是当这种前提体现在赠予而不是自己保存或消费活动上的时候”。另一方面，巫术也从整体上打击国家组织，使它无法生存，因此激发了集体行动的形式。穆恩最后指出，“这种评价辩证法——实际上，即有关加瓦人自身积极和消极话语的阐述”：

内在于价值生产的转型过程。确实，如果没有这些评价话语，加瓦人便不能为自己创造价值，因为，正是通过它们的作用，加瓦人确定了他们自己的价值或共同体生存能力的一般状态，并使之恢复意识。（Munn, 1986, p.271） 218

四 初步理论反思

那么，从这两项研究中，我们能提炼出何种普遍观点呢？

首先，基于古列维奇的研究，我将强调关系的和辩证的时空观点，这种观点在中世纪很普遍，无论是在异教徒还是基督徒那里。但是基督教把一种等级的和线性的（使空间具有一个时间上终点）观点叠加到那些未开化社会的更加异质的、多样的及地方化的观念之上（并没有完全取消它们，古列维奇认为主要与经济和政治组织的规模差异联系在一起的差异）。穆恩提出同样关系的和辩证的观点，但她为下列问题提供了一种更加老练和详细的说明：在加瓦社会中，不同的时空构造如何取决于不同的领域（典型的是性别化的领域），同时也提供了不同的方法来理

解那些允许从一个领域(例如,主要是妇女领域的家庭内部的生产领域)向另一个领域(诸如限定在男人之间的作为一种时空实践的库拉贝壳的交换)运动的转换实践。在古列维奇那里作为一般原则坚持的时空的最终同一和多样性,在穆恩的描述中便成为通过特殊社会实践联系起来的不同时空性。

其次,由古列维奇的研究出发,我将强调,在前现代中世纪的世界观中,理解时间和空间的方法并非抽象(我们现在熟悉的那种抽象),而是“不可分解的存在的属性,像生活本身那样实际”(Gurevich, 1985: 310)。然而,穆恩并没有以那种形式提出同样主张,空间和时间的具体属性是无所不在的,甚至在象征行为中或在巫术中,实际的时空关系也是看不见的。在论证古列维奇通常假设的时空之间不可分解的联系时,穆恩做得比较好,她反复证明:“因为社会(或社会文化)存在的基本形式在本质上是时空性的,由此可以断定,时空不会从社会文化的分析概念中抽象出来”(Munn, 1986:268)。如果这是一般的和理论上的情况,那么自然的结论便是,所有那些只是集中于空间或时间一方面的研究注定要失败。穆恩明显表示自己忠于这种立场,把时间和空间这一对立概念溶解成时间—空间。

219 再次,这两项研究中,人类身体和自我相对于周围世界的多孔性都值得注意,因为它以非常特殊的方式构造了“自我—他人”关系(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并非意味着,“个体”和“个人主义”并不存在,而是说,个体的存在与现代观念和实践完全不同(并在极大程度上实践那种生存)。人们相信自我把一切存在着的事物都内在化了(本书第三章概括的那种内部关系学说),但因此也存在着相反的主张——因为它把一切都内在化了,所以自我能够成为万物尺度。这种观点回到了普罗塔戈拉和古希腊,它承认个体被视为宇宙的某种非中心的中心,或者如穆恩喜欢的那样来表述:“身体的时空是一种它所从属的更大时空的浓缩符号。”因此,“在某种特定实践类型中形成的时空模式也是行动者自我的形式(以及规定着他们自身的特别的自我—他人关系的形式)”。结果便使“价值意义和主体建构两个难题(更为)明显地交

又在一起”。(Munn, 1986:14, 17)

这种关系性自我观点值得进一步分析。斯特拉森提出了某些进一步的线索：

社会化的、内在控制的西方人必定表现为**教化过程的缩影**，自然资源就借助这个缩影被赋予文化用途。……在此唯一的内在关系是一个人的各个部分“属于”他或她自己的那种方式。其他关系都是从外部产生的。个人属性就这样被外部压力所修改，就如物的属性被修改一样，但他/她的固有身份则保持不变。……因此，外在变化改变或控制着内在属性，但是并不作为实体的确定特性而挑战他们的身份。这种商品隐喻的折射作用暗示着一种人的形象，作为人之原初主人代表着自我。(Strathern, 1988:135)

相反，“美拉尼西亚人则是创造它的行动的活生生的纪念品”(Strathern, 1988:302)。

人是各种关系的客观化形式，它并非有争议的自我生存，而是各种关系的延续或终结。吃并不必然意味着汲取营养；西方的商品观念认为自我就是使自己的存在永久化，以这种观念来看，吃在本质上并不是受益行为。更确切地说，吃使美拉尼西亚人暴露在他/她所处的各种关系的全部危险面前……从社会学方面来说，成长不是营养的一种反映；相反，在成为一个真正的营养容器的过程中，得到营养的人见证了与父亲、母亲、姐妹的丈夫或其他什么正在从事哺育工作的人之间关系的有效性……这样，消费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自我取代问题，而是各种关系的承认和反映……自我作为个体主体存在于他/她改变各种关系的能力之中。

220 自我、个人以及政治身份的相关概念表明了这样一种世界，它不仅类似于辩证论证和内部关系哲学的洞见(本书第二章)，而且类似于深度生态学家的洞见(如第七章中论及的奈斯)。它拒斥了笛卡儿、牛顿和洛克的那种传统世界观，预示了一种关系性时空观念。它也引起西方思想中极为普遍的事实——价值和物——心二元论的消解。我将在后面讨论这种世界观的影响。

然而，除了对性别问题缺乏关注，古列维奇也没有注意自我——他人关系和价值与某些特别的方式的联系，借助于那些特殊方式，时空既在话语领域，又在实践、社会关系、信仰、制度以及政治经济权力领域社会地建构起来。尽管古列维奇主张，全部中世纪文化的范畴都相互纠缠在一起(Gurevich, 1985:290)，但他却离开时空来研究财富、劳动、货币和价值问题。尽管他主张，正是所有这些基本概念共同发挥作用的方式组成了“中世纪人格特点的要素，其世界观以及行动模式的指导方针，成为人类最终了解自己的方式”(Gurevich, 1985:298)，但他把各种复杂的问题碎片化了，使得把它们重新组成一个整体变得困难。穆恩很好地解决了古列维奇研究中的这个难题，我重点说一说她的三个特别要点：

首先，关系具体体现在物中——食物、独木舟、库拉贝壳等，因此产生了马克思提出的那种一般的“商品拜物教”之谜，或者如莫斯(Mauss, 1990:3)在《礼物》中表述的那样：“礼物中究竟有什么力量使得受赠者必须回礼？”在回答礼物关系之谜时，莫斯承认，被赠予之物使“自身拥有灵魂”，并且“馈赠某物给某人就是呈现自我的某个部分”。因此，一个人必须把他自己的重要部分回赠别人：

来自他人的物品不仅是道德的，而且是物质的和精神的，这种本质，连同食物、财物、动产或不动产、女人或她们的孩子、仪式或圣餐，所有的东西都对你产生巫术或宗教的影响。最后，这些被赠予之物并非消极的。它们是活跃的，并且往往具有个体性，它们会努力返回……它的“起源地”，或者生产……等价的替代

品。(Mauss, 1990:3)

结果是创造了“物与个人和团体之间精神纽带的混合物，物在某种程度上与灵魂有关，个人和团体在某种程度上彼此视对方为物”。在此，221与马克思的拜物教思想之间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在拜物教中，市场交换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换成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同时使物具有社会价值。但是，莫斯在解释物相对于人来说为何是积极的这个问题时，仍然存在着某种缺失。

穆恩(Munn, 1986:109)的答案部分地坚持评价过程的时空性，那一过程需要物(食物、独木舟和库拉贝壳)作为中介，可以说这种中介携带着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一个人名声的信息。但是，她也表明，这种发展依赖语言：

当一个试图在库拉中发展的年轻人启程时，他必须不仅发展自己的库拉表达技巧，而且必须倾听有经验的长者的讨论，学习路线的历史、比喻、名称等一切与库拉有关的东西。

有关物的话语，或者更为一般的评价话语，对于评价人和物的时空实践来说都是根本性的。如果没有命名、记忆、话语等东西，构造中介性时空关系世界的整个过程将会崩溃。人、贝壳和岛屿名称的口头流传“是自然产生的库拉时空的指数状况”：

通过把这些有影响的行动(打动另一个人的心灵)重新塑造成一个人名字的运动或流传，名声塑造了由于影响行为而实现的自我的时空扩大。……名字的流传使他们自由，把他们从这些特殊性中分离出来，使他们成为交谈的主题，通过这一点，他们在其他的时间和空间里为人所知。(Munn, 1986:117)

有关物的信息传播和话语构造(但愿是马克思所称“货币的语言”)，

在当时和眼下一样，不仅在时空关系的构造中，而且在人与物两者价值(无论多么地拜物教)的构成中，都成为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物和对象是控制我们的力量，它们似乎具有自己的生命并拥有自己的价值这个事实，完全取决于价值话语包围它们并使之获得象征意义的方式。

在此，重新概述本书第四章提出的一般概念图式是有用的。我在那一章表明，话语内化成信仰，嵌入某种制度框架中的物质实践和社会关系模式之中，并且作为政治经济权力发挥作用。同样，话语把事件、经验、结构和权力关系都内在化了，而不仅仅是反思。它们借助多重转换和转型创建世界，那些转换和转型把它们同这些作为整体的其他行动领域联系起来。如果物看起来具有自己的生命，那因为物质实践领域中的物把政治经济权力的话语效果和时空关系内在化了。只有借助于这些术语，我们才能解开这一复合问题：物怎么会被各种社会关系渗透，如何强有力地发挥作用，以对于看来比任何政治独裁者都要更加冷酷地统治着我们(如货币通常所为)。这或许反过来解释了为什么独裁者缺乏的那种单一的权力正是改变语言基本规则的那种权力。

但是，穆恩的研究成果也揭示了一种评价和贬值的辩证法，这两种行为作为工具控制着不平等，保障着共同体的社会团结。价值的否定同它的生产一样重要。当莫斯评论“疯狂浪费的”夸富宴如何形成时，他指的是一种系统，这种系统否定价值的速度与创造价值的速度一样快。像夸富宴一样，加瓦人的巫术也否定了价值，并因此阻止了财富的集中，从而加强了某种平等主义的民主体制。

因此，所有这些动态都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问题。很明显，穆恩没有说明这个问题，因为她认为加瓦人似乎生活在一种创建主体间时空的自给自足的过程之中。例如，她对加瓦人收益的研究，就好像岛民们完全不受殖民影响似的。

但是这显然不是实际情况，在此，古列维奇有关时空观念从野蛮、基督教向现代早期转换的宽泛观念至少也对潜在变化的广度和深度的提供了更好理解。那么，我们如何思考这些动态呢？

五 外部力量和时空的社会构造

社会变迁和成长，它们从内部变化并适应外来的压力和影响。客观的但又是社会地给予的时空概念必须变化，以适应新的社会再生产之物质实践，以及新的价值分配方式。

这些转换是如何完成的呢？在某些情况下，很容易给出答案。新的时空概念和价值是由主要力量通过征服、帝国扩张或新殖民统治强加的。例如，欧洲在北美的殖民把完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观念强加到土著人头上，并因此永远改变了这些人口再生得以发生的社会框架（参阅 Hallowell, 1955）。在这一点上，克罗农（Cronon, 1983:50）关于殖民对新英格兰印第安人影响的解释是中肯的。冲突在时空性和价值得以建构的不同方式之间产生：

223

尽管印第安村民从一个栖息地向另一个栖息地不断流动，从而花最少的力气得到最大的收获，并因此也减少他们对土地的影响，但是英国人相信并要求永久性居住地……英国人的定居试图代替印第安人的流动；这是印第安人与殖民者在同他们的环境保持互动关系方式上的主要冲突。斗争针对两种不同的生存和利用季节的方式，并且从两种人如何构想财产、财富和地形边界中表现出来。（Cronon, 1983:53）

每一个印第安村落都拥有主权，这规定了一个村子的政治和生态领地，但是这些权利绝非个体的，也不是“永久的”。人们拥有自己双手创造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很少具有“积累意义或排他性使用的意义”，这是因为“多样性和流动性的需求”使他们“无须占有多余的财产”。流动性意味着他们没有对土地的永久性权利。他们只拥有使用权，这种权利并不“包括欧洲人通常与土地所有权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特权：一

个使用者不能(并且也不需要)阻止其他村子的人侵入或在那些土地上收获非农业食物,他们也没有从他人那里收取租金的观念”。印第安人也不“占有任何其他种类的土地:蛤蜊沙滩、鱼塘、果园等,在此使用权观点同样至关重要,因为不同群体的人们对同一片土地具有不同的要求,这取决于他们的使用方式”。财产权,“换句话说,随生态使用而发生变化”(Cronon, 1983:63)。印第安人把土地“出售给”殖民者,在印第安人这边看来,是共享那块土地及其使用的契约,不是把它让渡出去。“照英国人对这些交易的理解,被出售的东西不是不同‘领地’范围的使用权,而是土地本身,是一块抽象的区域,从理论上来说,不管如何使用,它的边界都是固定的”,而且,这些土地“永远地”被让渡了。随着“永久地”让渡的合法边界的抽象而来的是价格的抽象(和租金)、以单一标准衡量的财产价值的尺度。“最重要的是,把土地和财产当成商品拿到市场上买卖,这一点正是英国人在所有权理解上与印第安人的不同”。殖民者的价值体系建立在社会地建构起来的时空母体上,这一母体与印第安共同体的母体完全不一样。

从外部强加的变化同样支配着城市秩序。例如,强迫埃及接受房屋、教室、村庄、营房甚至开罗市本身数学上的理性空间秩序,这是19世纪晚期使埃及进入欧洲资本主义规训框架计划之引人注目的方面。
224 米切尔指出,殖民“不只是指建立一种欧洲势力,而且是传播一种政治秩序,这种秩序把新的空间观点、新的形态或人格以及新的创造真实经验的手段刻写在社会世界之上”(Mitchell, 1991:ix)。

人们并不轻易接受这种强迫。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传播及其相关的主体间时空常常,伴随着激烈的斗争,以使不同的人适应社会,从而进入暗含在工业组织中的时空秩序网络,并尊重以严格的笛卡儿术语说明的对领地和土地权的分隔。尽管大量存在着反对这种强迫的斗争,但是资本主义发展还是把一种时间和空间的定义强加给人们。米切尔从如下方面刻画了它们的特点:

对塑造现代制度特点的空间和功能的精确说明,把这些功能

协调到等级制安排之中，组织监督和监视，把时间纳入日程和计划之中——所有这些都促成了这样一种世界的建构，它似乎不是由复杂的社会实践而是由二元秩序组成的：一方面是个体和他们的活动，另一方面是死气沉沉的结构，这一结构总是独立于个体，先于他们而存在，包含一种框架，并将之赋予他们的生活。这种技术产生了特别的现代性形而上学，在其中，世界似乎分化成个体与机制、实践与制度、社会生活和它的结构，或者物质现实和它的意义之二维形式。（Mitchell, 1991: xii）

如果这种描述是正确的，那么古列维奇和穆恩确定的身体在时空中的渗透性和流动性便被西方的自负所代替，把个人视为绝对时空结构中预先制成的实体。

六 争夺时空的社会建构

在社会秩序中，人们常常围绕时空的公共意义争来争去。这部分因为个人和主体对时钟的绝对权威和地契专制的反抗。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和绘画充满了反抗简单的数学和实物的时空尺度的符号，而同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揭示了高度复杂的且常常混乱的个体和社会再现的世界，它严重地背离了公共实践。因此，个体的时间和空间并不自动地与占统治地位的公共意义保持一致，并且如哈莱文（Hareven, 1982）指出的那样，存在着一些复杂的方式，借助于此，“家庭时间”能够与劳动力的非熟练化和再熟练化的“工业时间”，以及就业循环样态的压力相结合，并被用来抵消这些压力。更有意义的是，时空观点上的阶级、性别、文化、宗教和政治差别常常成为社会冲突的舞台。何为正确的时空以及时空之恰当的客观性质是什么，对这些东西的新规定就产生于这些斗争。下面是这种斗争或协商的几个例子。

225

1. 阶级斗争和时空的定义

在《资本论》论述“工作日”的那一章中^①，马克思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假设了一场对话。前者坚持，一天的公平工作量由一个工人第二天能回来工作所需要的恢复体力时间来衡量，而一天的公平工资则是足够抵付每天再生产成本的金钱。而工人的回答则是：这种计算方法忽视了不间断劳苦所致的寿命减少，而且以整个劳动生涯来计算的话，公平的工作日与工资的标准看起来就大不相同了。马克思认为，从市场交换法则立场来看，两边都没有错，但是不同的阶级视角支配着社会计算的不同时间视野。马克思认为，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因此，围绕工作日、工作周、工作年（带薪休假权利）和工作生涯（退休和养老金的权利）的斗争史就在全部的阶级斗争历史地理中占据了显著的位置(Thompson, 1967; Roediger and Foner, 1989)。马克思指出了资本家是如何根据他们的目的而延长或歪曲时间观念的。

“当国家试图管理童工时，资本主义人类学”规定“儿童时代到10岁，或者至多到11岁就结束了”。当工作日按时间来计时，工场的钟便根据需要走得或快或慢了。当昼夜概念在定义合同的条件中变得重要时，法官就赋予这些术语恰当的意义。尽管设立就餐时间，但机器却依旧转个不停。

这种时间规训至关重要地取决于特殊的监视空间的建构。在这方面，马克思的思想先于福柯，当他引述了18世纪的资产阶级辩护者的论述时：

为了“根除懒惰、放荡和对自由的奢望”，同时也为了鼓励勤勉精神……资本……提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把这些依赖社会慈善事业的工人，一句话，把需要救济的贫民关进“理想的习艺所”。“这种习艺所应当成为恐怖之所”。在这种“恐怖之所”，这种“理想的习艺所”里，“每天”应当劳动“14小时，不过其

^① 参阅《资本论》，第1卷，第8章。——译者注

中包括适当的吃饭时间,因此净剩的劳动时间是整整 12 小时”。……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恐怖之所”在 1770 年还是资本灵魂的梦想,几年以后,它却作为工场手工业工人自身的庞大的“习艺所”矗立起来了。它叫做工厂。但是这一次,理想在现实面前大为逊色。^①

围绕劳动过程中的时空性的斗争是激烈的,并且遍布生产的每一个角落:

这些按照军队方式一律用钟声来指挥劳动的期间、界限和休息的详尽的规定,决不是议会设想出来的。它们是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自然规律从现存的关系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们的制定、被正式承认以及由国家予以公布,是长期阶级斗争的结果。^②

马克思关于“工作日”这一章,被解读为对生产和价值创造的特定模式中时空性创建的一种说明,它极具预见性,催生了后来大量的研究和评论。

2. 性别斗争和时空的定义

“父亲时间”的性别化是第二个例子。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通过一个奇特的习惯根据性别角色对时间作出不同的解释。那个习惯是:把有价的工作时间定义为只是在把劳动直接出售给他人过程中被占有的那部分时间。但是,如福尔曼(Forman, 1989)指出的那样,把女性世界禁锢在自然的循环时间之中,这一漫长历史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把女性排除在父权制的线性时间之外,使女性成为“由男性定义时间的

^① 此处译文取自《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306—307 页。——译者注

^② 此处译文取自《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313 页。——译者注

世界中的陌生人”。在这种情形中，斗争乃是挑战神话、图像和仪式的传统世界，在其中，男性对时间的支配类似于对自然的统治，以及对作为“自然存在物”的女性的统治。这也是克里斯蒂娃(Kristeva, 1986)依据一种女性主体性直接提出来的问题。她指出，那种主体性同循环的时间(重复)和不朽的时间(永恒)联系在一起，而同时却被排除在“具有开端、发展和终结的目的论的”历史和计划的线性时间之外。后一种时间与生产联系在一起，然而，前一种时间则主要地与再生产，“物种生存、生死、身体、性别以及象征”联系在一起。她认为，当呼唤“妇女的姓名和命运时，人们想到的大多是产生和形成人类的空间，而不是时间、生成或历史”(Kristeva, 1986:190)。例如，威廉·布莱克主张，“时间和空间是真正的存在，时间是男人，空间是女人，而她的男性气质死掉了”(转引自 Forman, 1989:4)，此时，他说的是在当代具有巨大影响的普遍的寓言式假设。生育时间(以及它所暗示的全部东西)不能与同男性对死亡和历史的偏见联系起来，在福尔曼看来，这是男性女性之间，以及女权主义运动内部的深层心理学的战场。按照克里斯蒂娃的意见，女权主义生态学分成几种思潮，一种在历史中寻找与男人并列的位置(平等、公民和政治权利，等等)，另一种把女性身份与她们自己独特的时空感区分开来(如生态女权主义所为)，第三种则探寻一种母爱和苦难的位置(以及伴随其而来的时空感)，试图彻底改善占统治地位的主体间时空和价值观念。

社会实践吸收了这种话语上的争论。威格利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案例，他研究了文艺复兴时期阿尔贝蒂的建筑原则和实践。他认为，阿尔贝蒂从色诺芬那里吸取了如下观点：妇女的性欲不可能自我控制，“因为她的流动性欲无止无尽地泛滥并破坏着”她自己以及男性的边界，“不是质疑就是干扰着”后者的身份(注意流动和永恒之间的关系辩证法)。对于男性身份来说，控制和限制妇女是至关重要的：

建筑的作用确切地在于控制性欲。……在色诺芬看来，社会的婚姻制度是在性别的空间分工基础上自然化的……婚姻是建

造房子的理由。一所房子似乎为制度创造空间。但是婚姻已经是空间性的。它不可能被视为外在于房子,后者在其空间之前就是其可能性的条件。(Wigley, 1992:342)

在房子中,在男性的保护下,“通过认识各种物的位置”和支配家庭空间,并因此“把限制她的空间秩序内在化”,妇女认识到她的“自然的”位置。色诺芬主张,这种空间秩序“自身就是美的事物……比任何它所安排的东西都要美”。

在此,存在着两个重要的论点。首先,女性不同的流动的社会身份被她的一种具有边界的空间——家——的介入所限制。其次,空间的秩序安排——被理解为美——比它所安排的东西更重要,这种秩序使高度性别化的社会关系罩上了一道美学光环。

阿尔贝蒂以两种方式拓展了色诺芬的观点。首先,“封闭”和控制全部身体功能,这有助于保证单个身体的边界,创造一种不被渗透的纯粹性和个体性的空间。古列维奇对中世纪自我的研究说明了该问题。其次,性欲在家庭(内部的卧室空间)中的私密化变得重要:

阿尔贝蒂的设计不应理解为早已作为私人之物存在的性欲的私密化。被私密化的身体是在最近被性别化的。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新的身体。新的性别正是在它被私密化的那一刻才产生的。定义和建造房子的全部战略机制都参与了这种性别本身的生产。(Wigley, 1992:346)

228

空间的生产是性别和性别角色的生产。但是,在阿尔贝蒂以及其后作品中,常常由于色诺芬建议的那种美的抽象原则,这一等式被掩饰,并变得含混不清。威格利主张,表象和话语中的这种“掩盖”与一种真正私人的和个人化的男性空间——书房——进入家庭联系在一起。在性别和妇女权力之外的智力空间,它正是一种独立男性身份的空间,从事写作、创作日记和回忆(如佩皮斯的日记)、保护家谱和合法文件,以

及“严肃的”财政事件等活动的。它源自那种空间，即某种“单子的”话语成为可能的空间(莱布尼茨或许研究了这种空间)，它表明对“日常生活之混乱”的远离，它通过那种在封闭、安全和非常私人化的空间中生产出来的文本产生知识和身份。身体的物质性和感知自我的文本性变得可以分离(如笛卡儿著作所示)，并因此持续处于一种相互对立之中。斯通提出，“身体和主体在社会体制中的这些变化极为平稳地服务于资本积累的目标”(Stone, 1991:100)。“私密化的身体和脱离公共空间的主体”，这两者的生产建构了易于操纵的孤立的社会单子。

如果威格利是对的，那么，话语形式(如回忆录、日记和个体的私人思想等)就不能同它们在其中产生(诸如隐秘的书房、私密化的卧室和妇女的起居室等)的被创建的和性别化的空间分割开来。就如同下列问题一样，它们不能同权力和社会关系(诸如性别关系)以及体现在资产阶级家庭内部空间“漂亮的”布置上的制度形式(诸如家庭体制)脱离开来。因此，妇女对限制和控制她们的话语和时空实践的反抗，有机地组成了围绕时空实践所浸透的那些价值而进行的持续斗争。

229 尽管阿尔贝蒂的意见在文艺复兴大部分时期都只是一种构想，但从19世纪以来，它在英国和美国就成为强劲的现实。充分的证据表明，性别权威、征服和剥夺的特殊结合，伴随着19世纪的内部空间和家庭设计的组织而兴起(Blumin, 1989: 179—191; Cott, 1977; Douglas, 1977)。对于某些妇女来说，它是定义另一种家庭空间秩序从而实现完全不同的性别角色观点的斗争(Hayden, 1981)。但是，如马里恩·罗伯茨(Marion Roberts, 1991)很有才华地表明的那样，受阿贝克罗姆比计划的激励，1945年以后的伦敦重组，明确地创立了社会再生产和性别关系的时空原则，将之融入家庭的内部设计和整个城市的空间组织之中：结果使妇女逃离老式的性别角色更加困难，她们成为居家主妇、母亲和家庭空间的总司令。阿尔贝蒂的观点已经成为现实。不过，正因为它的位置是如此地闭塞，也正是从那种诱捕和边缘化的空间出发，贝蒂·弗里丹在其《女性神话》中发动了对“那个无名难题”的强大的女

权主义攻击。

3. 时空定义中的生态学与市场之对抗

想象一场经济学家和地质学家关于矿产资源最优开采的时空视野对话。前者坚持适宜的时间范围应按照利率和市场价格而定，但是后者则主张一种非常不同的时间概念，认为每一代人都有责任给下一代留下足够的资源。任何逻辑方法都不能解决这个争论。它也只能通过力量来解决。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占优势的支配性市场制度以利率来决定时间视野，并且在几乎所有经济计算的领域中(包括抵押方式购房)，情况都是这样。

在此，我们确定了社会冲突的潜能，它完全来自决策结果发挥作用的时间范围。尽管经济学家们通常承认凯恩斯的箴言，即“从长远来看，人都会死的”，而短期则成为进行经济和政治决策的唯一合理的时间范围，但环境主义者却坚持认为必须根据较长的时间范围来认定责任，在那种范围中，所有形式的生命(包括人)都必须得到保护。时间理解上的对立是显而易见的(参阅本书第七章)。如果实践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那么时间范围就不可能是环境主义者坚持的那种。可持续性修辞的目标在于使公共政策考虑市场之外的时间范围。

同样地，空间用法和定义也是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争论的领域。前者倾向于运用较宽的社会行动的空间领域概念，强调地方活动的溢出效果波及各种运用模式，影响着全球变暖、酸雨形成以及全球对资源基础的掠夺。这种空间概念与具体的决策有冲突，这些决策根据由土地价格和利率所规定的时间范围做出，它服从于某一特殊地方的地租最大化目标(参见本书第十三章)。使生态运动同环境管理区别开来的(以及在许多方面使前者与众不同，并且吸引人)正是时间和空间概念的多样性，它以此解决社会再生产和组织问题。

借由空间秩序安排而进行的社会控制的复杂性(以及相反，社会秩序因为空间边界越轨而受到挑战的复杂方式)需要深入分析。例如，象征空间和空间秩序安排的符号学创建了各种必须依据社会条件阅读的文

本。家庭、工厂和城市的内部时空组织是相反的社会力量为争取稳定或打破社会意义而进行的斗争的结果。通过物质建筑来固定空间性，创建了具有稳定结构的空间，这例证了协商的或强加的社会价值(就如全部环境转型形式的情况，参阅本书第八章)。对多余群体——无家可归者、流浪汉、“新时代”旅行者、老年人等——的空间化控制，以及空间的描绘在当代社会中是一种广泛的现象，这一点与中世纪世界一样(Sibley, 1995)。但是，同样的理由，寻求从社会控制中解放出来，这也慢慢地产生了寻求一种“外在于”霸权社会关系和评价空间的欲望、渴望和实践。“边缘上的”空间对于那些试图建立差异的人来说就成为有价值的空间(参阅本书第五章)。那种比喻性渴望常常转化成行动，表现为乌托邦社群、边远土地上的公社和移民的形式。对福柯所称“异托邦”——一种从社会控制中解放出来的空间——的探寻成为生动的证据，证明空间秩序安排对于负载权力的社会过程的实际实践和制度是至关重要的。

罢工、街头示威、巴士底或德黑兰美国大使馆门口的暴动、柏林墙的倒塌、占领工厂或大学行政大楼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反对既定社会秩序的符号。某种新的社会秩序的形成需要一个彻底的时空性的变革。为同过去决裂，法国大革命的胜利者不仅制定了全新的历法(Zerubavel, 1985)，他们也打破了全部的旧的的特权空间，建立了一套与他们革命目标一致的全新的仪式空间(Ozouf, 1988:126—137)。举一个不同的例子，1871年，巴黎公社成员们欣然地把紧迫的保卫巴黎的组织工作放在一边，而立刻摧毁旺多姆柱。这根受憎恨的圆柱象征着长久以来统治他们的外力；它是城市空间组织的象征，藉由欧斯曼所建的林荫大道，把工人阶级驱离市中心，使如此众多的人口“不敢越雷池半步”。欧斯曼在城市网络中置入了全新的空间概念，那是一种合乎以资本主义(特别是金融的)价值和国家监视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秩序的概念。在1871年革命中构想的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的转型，带来了如公社成员大约感到的，伴随着以不同的非等级意象来重建巴黎的内部空间。这种冲动是如此迫切，以至于推倒旺多姆柱的景观成为公社成员

宣布拥有城市空间权的催化剂(Ross, 1988)。公社成员不仅重新占领他们曾经被粗暴地赶走的空间,而且企图以非等级的和公社的意象来重塑城市空间本身的客观社会性质,试图藉此建立另一种社会秩序。后来,重建这根圆柱便是一个反动的信号,就如同为替公社赎罪在蒙马特高地建立圣心大教堂那样。后者(我在其他地方讨论了这个问题,参阅Harvey, 1989c)是反动力量通过设计某种位置,并因此使革命的巴黎“安分守己”而塑造记忆的企图。

这些例子的要点显示了,当社会空间在既定社会构型的轨道内竞争的时候,它如何能够拥有新的定义和意义。这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时空性的社会构造不可能与价值创造分开,或者同样,与话语、权力关系、记忆、制度以及实际的物质实践形式分割开来,借助那些要素,人类社会使自身永久性地存在下去。我们总是能够观察到这些内部联系。

七 时空社会构造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

如果时间和空间既是社会的又是客观的,那么由此可以推断(常常冲突的)社会过程规定了它们的客观化。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如何研究这些过程呢?首先,不能从思想、观念和信仰世界来理解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化(尽管研究这些东西总是有益的),而要从社会再生产物质过程的研究来理解它们。让我举例说明。我常常要刚入门的地理学学生想想他们上一餐来自何处。追溯制作这一餐所使用的每一种材料,就会揭示对整个社会劳动世界的依赖关系,这些劳动在不同的地方,在非常不同的社会关系和生态条件下进行。如果考虑到生产直接消费品过程中间接使用的那些材料,那么这种依赖将进一步拓展。然而,在实际中,即使我们对那些复杂的生产地理和植根于时空体系中的无数社会关系一无所知,我们照样也可以消费自己的食物。当我们上班、去银行、在超市购物、在家里吃住,这些经验的时空性与体现在我们所购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中的那种时空性是非常不同的。从前一种立场看起来合理的

决定未必适合后者。哪一种经验最贴切地捕捉了资本主义的时空性呢？答案是“两者都是”，这是因为这两者同样都是物质地且历史地建构的。正是在这里，现象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获得了统一（如穆恩所提倡的那种），表明“青年”和“老年”马克思之间的持续对话（而不是对立）。但是还有另一种方法来观察这种统一性：正是通过被称为“货币”的那个东西的中介，这两个领域才发生联系。克罗农这样写道：

生活在城市中意味着在一个与地球上每一角落的人和地方都联系在一起的市场中消费商品和服务，当我们消费他们的产品时，那些人或地方是看不到的、未知的和不可想象的。市场培育了具有几乎无法想象的复杂性的交换关系，并因此在它们刚产生的时候就隐藏起来不让我们看见，在现金和商品易手的最后时刻，我们才最终消费自己所买的东西。（Cronon, 1991:378—384）

不断变化的商品流定义了新的时空和价值体系，通过研究这个问题，克罗农建立了自己对19世纪芝加哥发展的整个分析。然而，芝加哥的吊诡之处在于：

市场使城市和乡村联系更加紧密，赋予其共同文化，并在它们之间培育出更为亲密的交流，然而，这同一市场亦取消了它所创造的那种联系。资本的地理生产了一种模糊联系的景观。城市市场越集中，它的腹地越开阔，就越容易忘记买卖之物的最终起源。（Cronon, 1991:340. 黑体为引者所为）

这正是马克思^①发展他最有力的概念之一——商品拜物教——之际面对的状况。他试图用这个术语来捕捉市场掩盖社会的（我们还应该加上，地理的）信息和关系的那种方式。我们不能仅仅通过看商品就能分辨出

① 参阅《资本论》，第1章。——译者注

它是由在意大利合作社工作的快乐的劳动者所生产的，还是由巴基斯坦奴役条件下工作的那些遭受严重剥削的童工生产的，或者由瑞典受到充分的劳动法规和工资协议保护的雇佣工人生产的。超市货架上的葡萄不会说话，我们看不到它们身上的剥削指纹，或者立即说出它们来自何方。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就能揭开披在地理与社会无知之上的面纱，让我们警觉这些问题，就如消费者联合抵制那些在非人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商品那样。但是这样就必须超越市场所显示的东西。这便是马克思的议程：要讲出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而进行的社会再生产的全部故事，就必须穿越市场的拜物教和面纱。

对于克罗农来说，不了解这些“几乎无限的”相互关系，“就是忽视我们对于塑造彼此景观，并改变其范围内人和生物生活的那些方法应承担的道德责任”（Cronon, 1991:384—385）。如果我们认为把早餐送上自己餐桌的“他人”像实际情况那样“很重要”，那么何种主体间时空，并因此何种评价图式正在得以建构，这又如何影响我们的自我感、道德感和政治感？例如，如果我们认为向那些帮助自己把饭菜弄上餐桌的人表示道德关注是正当的，那么这就意味着道德责任（以及价值）扩展到贯穿于市场的全部的复杂的地理和社会性。我们一方面在星期天去教堂，向帮助教区内穷人的基金捐赠大量的钱物，而同时又健忘地到市场上去购买那些在令人惊骇的剥削条件中长出来的葡萄，这一点是讲不通的。我们一方面赞同邻里的高水平环境质量，另一方面又顽固地坚持那种必然暗示着污染其他地方空气的生活水平，这也是讲不通的。时间和空间是如何由维持我们日常生活的那些相当不同的物质过程来规定的，这一点需要了解。

但是这种观念需要进一步的详细审查。穆恩说明了不同领域的不同社会实践是如何定义出不同的时空性的，加瓦社会的时空是多维的和有等级的，这取决于被观察的社会实践的类型。但她同时也表明了表面上不能比较的时空之间的复杂作用，所有社会机制都从一种向另一种时空性转化和转换。这些社会机制取决于由物（食物、独木舟、库拉贝壳等）中介的社会关系。穆恩甚至在说明一个相对同质的不到 500 人的

小岛时也十分复杂而详细。在当代资本主义中也有可能发现一个类似的或者更复杂和异质的时空性。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需要确定从一种时空性向另一种转化和转换的模式，特别注意物的中介作用。

但是，同各种各样复杂地相互交织的时空性——可以在个体的“生活世界”中发现它们(诸如在家庭中遇到的性别化的时空性)——以及被归因于现代性或资本主义的那种抽象的“理性化”的时空性(诸如那些从市场交换讨论中产生的)相比，资本主义中的时空性通常被描述成一种二元结构，这就是米切尔描述它的方式。马克思有关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似乎也具有这种二元性的意味，这也是列斐伏尔、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等一大批作家的一般特点。这种二元性是否适宜？我们可以通过探讨那种“物”——货币——来获得答案，货币具有把这些不同领域联系起来的最大力量。

八 货币的时空性

在当代社会中，货币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最重要的“物”，社会关系投入其中，价值以此得到说明，社会权力并入其中。已经得到部分阐明的是，它具有某种神秘性，作为一个物看起来却具有自己的生命，统治和调节着我们的行为。作为价值最重要的表现形式，货币把某种时空性内在化了——它穿越时空传达价值，同时表现那些通过某种时空性行为而获得的价值。我将提出的主题是，货币及其使用的异质性精确地反映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时空的异质性。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提出这个主题，他指出：“凡是在货币本身不是共同体的地方，货币必然使共同体瓦解”，并且因此“直接和同时地”成为“真正的共同体”。^①但是，他细化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173—177页。——译者注

这个论点，区分出货币的三种作用，而只有最后一种作用才会瓦解“传统”社会。

(1) 作为**财富的体现**，货币具有某种实体的和物质的形式(如金子)。这种货币一般并不用以交换，而是作为财富、地位和声望的象征保留在社会单元之中(如个体、家庭、亲属、社会秩序)。它们可以转换成珠宝、圣物、雕像、象征性人工制品等等，这些东西能够承载社会意义连续体的长期记忆和象征(在家族中——“家族银币”——以及更大的社会单元中)。它们仍然保留在社会单元中，除非作为礼物、贡品、库拉那种仪式化“商业”或“抚恤金”(对所犯罪行的补偿)而交换。主要力量也会独占它们。通过这种货币形式创建的时空通常在空间上是受到限制的，并且持续时间较长。(除非，如古列维奇所言的古代挪威人，尽管货币备受珍视，但还是被投入大海。Gurevich, 1985:218)

(2) 作为**交换媒介**，货币并不停在某处，而总是或多或少地处于循环之中。它可能补充实物交易和礼物结构，甚至包含在其中(Parry and Bloch, 1989)。这种货币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从金子到硬币，从代币到纸币等等。此外，交换的意图完全取决于财富观念——出售特权和购买其他使神满意或进入天堂的办法(在古希腊神话中，渡过冥河去见阎王要花费金子)，同用钱来买东西一样重要。由这种实践定义的时空性部分地取决于意图或使用。例如，中世纪欧洲的宗教贡赋流向罗马，这使得它成为巨大的财富集中地。然而，这种货币也依赖对能指(货币)和所指(财富)之间关系的信任和信念，以及一个人取信他人的能力(参阅 Anderlini and Sabourian, 1992)。因此，信用在货币形成之际就存在了，只不过信用体系是更晚的建构。货币形成一种指示体系，它把一种广泛的特殊实践、话语、信念、制度和政治经济权力内在化了。有时，相对于能指应该指示的东西来说，这个体系存在着成为自由漂浮的，甚至自指的危险——因此产生了特别的货币危机的历史。货币形式中的信用、信任和信仰问题影响着货币中介时空中社会关系的方式(Caffentzis, 1989)。鉴于某种信任的财富代表形式(例如玛丽亚·特里萨元)，参与者之间的价值关系便能够逃脱受到仪式限制的地点和空

间，而成为一个在时空上更具整合性的交换世界的一部分。一枚硬币可以带着它代表的权力漫游，穿过无数匿名之手、无数时代以及广阔的空间——假设在能指和进行指示的人那里都存在的信用、信念和信任成为时空关系建构的一部分。

(3) 作为**社会权力形式**，货币具有另一种与众不同的功能。拥有货币的人能够用它来干各种事，包括控制他人获得社会财富。对物的支配便转化成对人的支配。货币是男人支配女人的手段，领主控制附庸的手段，帝王统治臣民的手段，资本家控制劳动者的手段。但是，这种借由货币力量进行的社会控制形式假定了某种社会秩序安排，在其中，占有财富(不管如何定义)不可能通过其他手段来实现(例如，农民或农奴不可能迁至未开垦的无主之地，女人不可能独立谋生，劳动者被剥夺了成为私有财富的生产工具，等等)。因此，作为社会权力，货币至关重要地依赖自身成为一种控制财富占有的特权手段。尽管货币作为价值的代表可以自由地流通，但是作为社会权力，它却取决于某种领土构型和社会政治体系(简言之，国家机器)，这一体系使得那种特殊的社会权力形式成为霸权，而不是偶然的和分散的力量。

236

马克思确定的三种货币作用并不互相替代。他们全都同时存在(例如，金子仍然作为财富的体现而富有意义)。但是，把货币用作个体化的和排他的社会权力形式，这却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特点。因此，马克思聚焦于这种特殊的用法——资本主义为了生产更多的货币而借助货币的社会权力来控制劳动者。这种分析依赖**财富**(对于任何使用价值的物质支配)和**价值**(通过交换而实现的一般社会劳动的表现形式，它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之间的严格区分。作为劳动价值的表现形式，货币承担着这些价值流通的尺度和媒介功能。(抽象的)**交换价值**不同于货币的(具体的)**使用价值**方面，但将之内化了。只有一部分货币才能被直接用作资本(尽管大多数货币迟早会被带入其轨道)。但是事情不止如此。商人、银行家、地主以及其他各种食利者都能够在相互之间并对直接生产者运用他们的货币权力，共同分享由劳动者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参阅本人对马克思相关论点的解释和评论。 Harvey, 1982, chapter

9—11)。富有的工人支配穷人，男人支配女人，父母亲支配子女，国家控制社会，政党或公司控制国家机器（仅列举一小部分例子）。货币以不同的方式运用于控制全部社会关系。

我们不可能详细地分析货币的每一种运用方式。实际上，齐利策指出，每个人“都发明了非常广泛的流通方法，从家政津贴、零花钱、个人零用钱到礼金、礼券、汇款、小费、精打细算的储蓄、母亲的养老金、食物券等”。他们“把自己的钱化整为零，先是糊口的钱，然后是租金、学费、慈善，以及婚丧、节日和消遣基金”（Zelizer, 1994: 202）。他们如何做这些事往往是斗争的焦点，并且受到家庭结构、文化偏好、习俗、性别和阶级地位的强烈影响。各种“具有专门用途的”钱的创造表明了复杂的社会和时空关系网络，货币正是在其中诞生的，并且它的用途也深嵌其中。例如，在一个家庭中，当钱被专门用于婚、葬、假期、汇款、养老、高等教育或者其他什么事，它总是为某种具体目标而留出的，这些目标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时空性。

很不幸，齐利策忽视了这些不同用途所创造的时空性，而哈利文在其对不同形式的“家庭时间”分析中同样忽视了货币的多种用途。把这两种分析结合起来就能提出一个复杂而统一的图景，从而说明不同领域的社会行动联系在一起的方式。然而，某些流通（例如家庭成员之间交换的承诺）绝不可能逃脱有限的时空范围。迄今为止最有趣的境况是，一个领域的口头“期票”会通过行动在另一个领域中实现，例如，许诺一个小孩子，他会因为打扫房间而获得奖赏，那种奖赏便会以从商店里购买的一只冰淇淋的形式出现。这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例子说明了各种日常实践在一个领域中有效的“流通”为何会持续地转化到其他领域，获得完全不同的时空特性。在此，我们遇到了那些方法的当代形式，运用这些方法，加瓦的不同评价领域便通过实践内在地联系在一起，那种实践把不同空间规模各自独立的时空思路编织成一个内在统一的社会世界。

因为这不是一种容易把握的观点，所以让我用一个例子——所谓“绿色货币”的创造——来详细说明。为应对20世纪80年代范库弗岛

广泛的失业，科特尼镇居民基于一种新的地方货币创建了一种**地方性就业和贸易体系(LETS体系)**，那种货币“不受国际萧条、债务负担、供给难题、盗窃、匮乏以及货币波动等等影响”(Dauncey, 1988:51)。

许多生活在本地的人和希望在一起劳动和交易的人，他们达成协议，同意LETS体系规则，并且建立了自己的账户。然后，每一个人都填写两张表格，一张是“需求”，另一张则是“供给”，都标上了价格(根据通常的市场价格)。最后表格被汇总起来并通知给每一个人。接下来，体系的成员浏览清单，谁拥有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就打电话过去，并开始交易……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物物交换的限制就这样被解除了，现在你可以同作为一个整体的体系中的人们进行交易：物物交换现在是一种集体主张。

在这种情形中，货币被还原成个人交易账户中的正/负记录。这样一种体系必然在空间上受到限制(多恩西认为，在一个地方性地理区域中，不超过5 000人会足以使每个人相互了解)，并且主要取决于对参与者和信息的信任(包括对交易伙伴可靠性的信任)。体系通过地方关系、友谊和个人信托进行自我调节，甚至去帮助建立那些特性而不是如传统货币交换常常发生的那样破坏它们。货币被“某个人以一种自然的、有机的方式”创造出来，“这个人创造了某种具有现实价值的东西，并且把它同其他某个人进行交易”。通过建立个体以及整个共同体的自尊、自主，这种做法激励着个人的、地方的和创造的主动性。最终：

在日常经济中，加入这些贸易模式并不需要对地方社群作出承诺。作为回报，它提供全球市场的自由，这也很重要。LETS体系并不否定全球经济的价值或者全球自由贸易的价值——它只是补充性的，而非替代体系。这只是说，如果地方经济过于依

赖这种贸易,它就会很容易受到变幻莫测的国际贸易风浪的伤害,而且那种过度的全球贸易破坏了共同体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Dauncey, 1988, p.63)

LETS 体系是一个有趣的案例,它说明了一种由个体推动的社会实践创造了某种货币,它体现了与全球市场中体验到的完全不同的时空性。还有好几个著名的历史案例(奥地利的沃格小镇在 1932—1935 年期间使用过自己的货币,到 1991 年,英国经济衰退产生了大约 400 个这样的组织)。

综上所述,在不同时空领域(从家庭到地方性再到全球金融市场)发生的不同评价实践(从以家庭为基础的自我评价到地方性贸易体系,再到世界市场中的位置)只是在某种货币形式的庇护下被固定于一个单一体系。在当代资本主义中存在着类似(尽管要更加精致)穆恩在加瓦发现的连锁的时空体系。虽然每一种具体的货币用法定义了一种特殊的时空性,但它是从某种与时空过程的关系来定义的,这一过程调节着世界市场上抽象的货币性质。如果一定要解决由不同时空性和不同货币之间的联系在当代社会中提出的难题,那就必须考虑用途(常常是地方性的和特殊性的)和交换价值(既是地方性的又是全球性的)之间的这种辩证法。

九 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地理学

就时间和空间来说,建立一种新型的占统治地位的精神观念和物质实践,这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基础。欧洲中世纪以来产生的观点同新的建立价值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特别是货币的产生,它是交换的手段,是与与众不同的、排他性的、用以追求进一步资本积累的社会权力形式。货币成为评价全部交换(与礼物和物物交换完全不同的交换)以及社会劳动的核心媒介。必须把“物”个性化、特殊化并孤立化为各种要素,

239 这是私有财产权买卖得以进行的确凿无疑的基础。通过调整价值在空间上的交易，货币成为测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手段。从商业的观点看，新的评价过程使得笛卡儿—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念更加实际；它们为建立身份(成为个体、物、属性以及诸如民族国家那种领土单元的集体等等)提供了明确的手段。

勒高夫(Le Goff, 1980, 1988)指出，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的转变带来了时空观点的根本性再定义，这就使得根据全新的社会原则来重整世界秩序。小时是13世纪的发明，分与秒则迟至17世纪才成为通用的度量标准(我们现在又发明了毫微秒，甚至更细的分类)。虽然这些度量标准最早源自宗教(揭示了犹太—基督教世界观和资本主义兴起之间的深层联系)，但适当的计时方法的传播，与生产、交换、商业和管理中不断增长的对效率的关注之间有着很深的联系。按照勒高夫的说法，这是一场以城市为基础的“精神结构及其物质表现”的革命，并且它“深受阶级斗争机制的牵连”(Le Goff, 1980:36)。兰德斯证实，城市中的“均等时间宣告了新的文化和经济秩序的胜利”(Landes, 1983:78)。古列维奇同样断言，“我们现代的时空范畴与其他历史时代人们所体验和理解的时空几乎没有一致的地方”。他继续说道，文艺复兴标志着“一种向其他理解世界方式的转变，人类重新认识自身(个体主义，以及作为某种‘排他的’、‘异在于’世界的人类身体观点)的转变”(Gurevich, 1985:28—33)。但是，这场胜利是局部且不协调的，至少直到19世纪中期，西方大部分地区都尚未受到影响。

与记时的历史一样，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制图学的历史主要涉及的亦是根据明确规定的数学原理改进空间测量和再现的方法。在此，贸易和商业、财产和领土权利(封建时代未被承认的那类)等利益在重塑精神结构和物质实践中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地理知识很明显地成为军事和经济权力的至关重要的源泉时，如兰德斯(Landes, 1983:110)揭示的那样，地图与货币之间的关系也就距之不远了。1400年，托勒密地图传入佛罗伦萨，在那里立即被用作描绘地理空间和保存地方信息的手段，如我们今天所知，这乃是地理学知识建构

中的一项根本性突破。此后才有可能在原则上把世界理解为全球性的统一单元。

这种制图学革命的政治意义值得注意。例如,有关时空的“理性的”数学观点是有关政治平等和社会进步的启蒙教义的必要条件。法国大革命国民议会的首要行动之一便是下令系统地制作法国地图,将之作为确保政治代表平等的手段[尽管我再次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像泽鲁巴维尔(Zerrubavel, 1985:82—100)这样的历史社会学家,他们偏爱把注意力集中在作为核心象征的共和国历法上,而不是地产图绘制上]。在民主世界中(考虑到不公正地划分选区的历史),这是再平常不过的宪政议题,以至于民主与制图之间的密切(且常常是竞争性的)联系在今天被视为理所当然。但是想象一下,仅凭世界地图就要规划出一个平等的代表体系!另一方面,笛卡儿网格也不是没有缺点。为了确保少数派利益团体有充分的政治代表,美国国会不得不草拟出奇形怪状的(且在目前引起激烈争论的)选民轮廓图,这是一个最恰当的当代例证。杰斐逊的土地系统的重复性数学网格仍然支配着美国景观,它寻求理性的空间区划,从而促进农业个人主义民主的形成。实际上,这被证明对资本主义的空间占用和投机具有极大的帮助,颠覆了杰斐逊的目标,但这也显示了客观社会空间的特殊定义如何促进了新型社会秩序的兴起。

勒高夫和兰德斯解释了时空概念与资本主义实践的联系。例如,黑格森(Helgerson, 1986)指出了英格兰反对王朝特权的斗争和文艺复兴的制图(由斯皮德、诺顿、卡斯顿以及其他他人制作)之间的密切联系,在那种制图中,个体和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变成霸权性的。新的制图学表现手段允许个人以更符合新的社会和政治关系的定义来观察自身。拿一个晚近的例子来讲,在殖民时期,殖民管理的地图便反映了他们的社会目标,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Stone, 1988)。

无论如何,资本主义是一种革命的生产方式,总是不安地寻找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技术、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产和剥削模式,因此也寻找新的时空客观定义。空间关系和空间再现的周期化重组总是具有非常有力的影响。收费公路、运河、铁路、汽船和电报、无线电和汽车、

241 集装化运输、喷气飞机运输、电视和远程通讯等等，已经改变了时空关系，并促成新的物质实践和新的空间再现模式。测量和区分时间的能力也已经革命化，首先是日益精确的计时器的生产和传播，其次是对生产速度、生产的协调机制(自动化、机械化)以及人、货、信息等运动速度的密切关注。在人类事务中，客观时空的物质基础已经成为快速移动而不是固定的数据点。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运动？因为已经在其他地方详细地探讨了其根源(Harvey, 1982, 1989a)，在此我只是概述主要论点。时间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重要量度，因为社会劳动是价值的尺度，剩余社会劳动时间是利润的源泉。此外，资本周转时间也很重要，因为(生产、流通和资本周转的)加速是单个资本家追逐利润最强有力的竞争手段。在经济危机和特别激烈的竞争时期，周转时间较快的资本家比对手更能存活下来，而结果则是社会时间范围典型地缩短了，工作和生活的强度往往会提高，变化的步伐加快。同样的问题发生在空间经验中。空间障碍的消除和“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斗争对于全部资本积累的动态来说都是根本性的，并且在资本过度积累危机时期更是剧烈。通过向新领域的地理扩张以及建构全新的空间关系来吸收剩余资本(有时是剩余劳动力)可以说是很显著的。如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 1974)敏锐地指出的那样，空间关系以及全球空间体制的建构和重构是资本主义残存到 20 世纪的主要手段之一。

时空的历史地理学之一般特点(与更为详细的地点、时间和方式的描述不同)并非偶然的和任意的，而是内含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运动法则之中。一般趋势是周转时间的加速(生产、交换、消费的世界全都倾向于变得越来越快)和空间视野的收缩。如果用通俗的术语来说，我们会说，托夫勒(Toffler, 1970)的“未来的冲击”似乎遇到了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1966)的“地球村”。时空之客观社会性质上的这种周期性革命并非没有矛盾。例如，为加快其他的周转时间，它必须对较慢的周转时间进行长期且通常成本高昂的固定资产投资(例如电脑硬件)，而且，为了通过时间来消灭空间，它必须生产一种特殊的空间关系(如铁路

网)。因此,时空关系的革命,不仅常常破坏围绕先前时空体系建立起来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实践,而且“创造性地破坏”嵌入在景观中的广泛的物质财富。最近非工业化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我提及的这种过程。

在西方资本主义中发挥作用的多重时空性并不总是一致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当前华尔街的时空世界非常不同于19世纪股票交易所,如果这两者都与法国乡村和苏格兰农场(彼时和此时)的时空世界很不一样,那么就必须将其理解为对由商品生产和资本积累的法则所塑造的普遍聚集的条件特殊反应。此外,情况常常是,当金融市场的时空性超过并混淆生产、消费、城市化等的时空性时,紧张局势就会在资本主义内部产生。

242

十 时空压缩

社会时空之客观性质方面的快速变化既令人困惑又令人不安。1839年的《每季评论》就极好地捕捉到这种不安:

设想我们的铁路,甚至在目前缓慢的旅行速度下,突然在全英国范围内建设起来,那么,只是打个比方,全国的乡村人口就会立刻全都改善,他们的生活就更接近于都市的生活……当距离因此被消灭,我们乡村的面貌可以说在规模上萎缩了,直到它比巨大的城市不再大多少时。(转引自 Schivelbusch, 1978, p.32)

诗人海涅同样地记录了他对巴黎—里昂铁路开通时“极为可怕的预言”:

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我们的观点现在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甚至基本的时空概念都变得摇摆不定。铁路杀死了空间。我觉得好像所有的山林都在向巴黎逼近。即使此刻,我也能闻到

德国欧椴树的气息；北海的拍岸海浪就在我的门前翻滚。（转引自 Schivelbusch, 1978:34）

乔治·艾略特也非常着迷于这种情感，以至于她选择在《激进党人：费利克斯·霍尔特》之中复杂地叙述英国正在变化的社会关系，特别描述了不断变化的时空条件，其中说道：

就像穿过枪管的子弹，后代人可能被大气压力从温彻斯特射到纽卡斯尔；这是我们希望的一种好的结果；但是从乡村一端向另一端缓慢移动的那种老的方式是记忆中更好的事情。枪管旅行绝不会给图画和叙述带来多少东西；它就像感叹词“噢”那样空洞无趣！然而，快乐的外出旅行者，他们整天坐在那种盒子里，也会得到足够的英国生活故事、英国城乡劳动者的故事、大地和天空的外貌，为现代奥德赛漫游增添了一点插曲。

- 243 在当代情境中，德国戏剧导演约翰尼斯·布林格也记下了类似的震撼感受（尽管具有很大的夸张）。在达拉斯和休斯敦旅行时，他感到一种“预料不到的空间崩溃”，在那里“城市躯体（物质的和文化的社区表象）的散裂和瓦解已经达到一种幻觉程度”。他评论道：“地理现实不可避免地走向熔解和混乱，或者所有空间都具有可相互交换特性，或者可见的（静态的）参照点消解为持续的表象之流。”他最后指出，休斯敦之谜“是一个社区之谜：在所有方向上都发生着散裂和爆炸……城市代表着一种投机的无秩序，一种接近矛盾夸张法（全球权力/地方混乱）的肯定的无个性”（Johannes Birringer, 1989:120—138）。

我把时空维度上的这种势不可挡的变迁感称为“时空压缩”，以捕捉海涅的不祥预感和布林格的崩溃之感。这种经验迫使我们调整自己的时空观念，重新思考社会行动的前景。这种重新思考植根于各种政治经济的斗争中。不能进行这种重新思考可能是灾难的预兆。克罗农（Cronon, 1991:105—108, 318—317）给我们讲述了约翰·巴罗斯的生动

故事，后者是 19 世纪 40 年代爱荷华州达文波特的一个成功商人，他精通在农产品贸易中处理交易不确定性的商业方法，在穿越圣路易斯和新奥尔良之间组织不畅的空间时，他与季节性交通不确定性进行斗争。巴罗斯不得不拥有固定资本来贮存大量的且常常是不可预见的商品潮，并拥有现金储备和信用能力来应付收入与花费的急剧波动。但是到 1857 年，他破产了，成为“新经济制度的牺牲品”，被社会抛弃、成为一个痛苦的老人，孤独地等死。打倒他的是迄今为止还无法到达的芝加哥开通了铁路，以及它所强加的新的时空秩序。他写道：“芝加哥和岩岛铁路的开通让我相当困惑。”铁路的来临改变了全部规则。季节性差异、日夜差异以及天气的易变性彻底地改变了，规律性联系以及相当精确的时间表使商人们处在一个非常不同的运营环境中。只拥有很少资本或信用的商人们能够以较低的利润但却快速的资金周转在芝加哥获得商业机会。巴罗斯把大量资本陷在固定投资上，这使得他在 19 世纪 40 年代处于有利的地位，但现在既处在不利的竞争位置，又没有发现一种恰当的应对措施。由铁路带来的时空压缩把他排挤出局，但之所以如此，部分因为“由铁路和芝加哥都市市场所创造的新的结构条件与他所熟悉的经商方式完全不同”；他的“大人物”身份如此陷入了一种确定的时空性，以至于他不可能设计出一种竞争战略来适应相当不同的时空世界。换句话说，他试图以一种完全不符合由铁路的新时空性所强加的新型评价模式的价值体系来做生意。

244

当然，交通网络的变迁能使某些地区（如 19 世纪的芝加哥）比其他地区获得更大利益，这一点很早就观察到了。不过，在克罗农的研究中，令人感兴趣的东西是，商人身份也不得不改变以包容新的时空体制。施恩伯格（Schoenberger, 1996）相当详细地应用了这种一般性论点，他研究了一些美国公司领导人的最近的失败案例，他们不能改变战略以适应变化了的竞争时空条件。在某一时空体制中获得的参与者身份和公司文化，阻碍着为在另一环境中生存而明显要做的事。

但是不断变化的时空秩序安排也是文化、美学和政治激烈争论的焦点。反思这个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时代文化和政治生产领域

中产生的某些混乱。回过头来看看，想一想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被假定为对其的反动)而知名的复杂的文化运动。实际上1848年后，巴黎的写作和艺术再现领域确实发生了一些特殊的事情，从当时在那种空间中发生的政治—经济转型这个背景来观察它们是有益的。当政治经济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首次呈现为一种未曾预见的同时性时，海涅的含糊预言便在1848年变成一种戏剧化和创伤性的经验。在那个年代，遍及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崩溃和政治革命表明，资本主义世界以迄今看来仍不可想象的方式内在地联结在一起。它的速度和同时性都是相当令人不安的，并要求新的再现方式。通过这些方式，互相联结的世界得以再现。简单的叙事结构完全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不管狄更斯在《荒凉的小屋》这样的小说中如何才华横溢地穿越时空)。

波德莱尔(Baudelaire, 1981)接受了这个挑战，他把现代主义难题定义为：在一个以(空间的)碎片、(时间的)瞬间和创造性破坏为特点的世界里探寻普遍真理。福楼拜小说中的复杂句子结构和马奈的绘画技巧定义了某种全新的时空再现模式，使新的思考方式与新的政治和社会行动成为可能。克恩(Kern, 1983)对1914年前不久(在诸如物理、文学、绘画和哲学等领域中，这是一个非凡的实验时代)发生的时空再现革命的研究，强调了时空压缩如何导致了作为新观点源泉的那些经验。245 文化领域里的先锋运动部分反映了新的时空定义，但也部分地试图把这种定义强加到处于急剧转型过程中的西方资本主义之上。

最近以“后现代主义”知名的复杂运动同样地与某种新的时空经验联系在一起，这体现在诸如詹姆逊、伯尔曼和丹尼尔·贝尔(Jameson, 1984; Berman, 1982; Daniel Bell, 1976)等作家的作品中。在其他地方，我把后现代主义与为了回应1973年政治经济危机而产生的新的时空经验联系起来，试图搞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它(Harvey, 1989a)。那时，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被迫进行生产技术、消费习惯以及政治经济实践的重要革命。强大的创新潮流加快并加速了周转时间。决策的时间视野(今天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已经以秒来计)大大地缩短，生活方式的时尚迅速地改变。所有这些都伴随着对时空关系的彻

底重组、对空间障碍的进一步消除，以及新的资本主义发展地理学的出现。这些事件产生了强大的时空压缩意义，影响了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所有方面。为了给创造新事物让路，人们不得不破坏整个景观。当重构——从工业生产技术到市中心的每一种事物——成为主要的关注课题，在这样的时代里，（社群生活、技能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创造性破坏、不断增长的碎片化、瞬间化等等主题已经越来越显著地出现在文化和哲学话语中。通往后现代主义预示的“感觉结构”的转型，与近二十多年中发生的政治经济实践转变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似乎特别折射出交流手段非物质化的方式。例如，能指与所指之间距离的消蚀（一种典型的后现代观点）是在赛伯空间中最显著地实现的，那是一个极大地抛弃了“物质性基石”的世界：

在此，技术上采取的主要步骤是转换，无论如何都更有利了，从依赖惯性和摩擦力的物理传输，转换到有效地克服了阻力和时滞的电子传输。加之电磁学的信息存贮手段……在媒介的非物质化以及征服——如他们所言——时空方面，我们就会看到另一个意义重大和进化的步骤。（Benedikt, 1991:9）

深入研究融入这些文化和政治运动的矛盾，就会发现它们如何深嵌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中。对最近资本周转时间加快和加速的文化反应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这预示着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更为迅速的变化，并随后成为生产和消费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焦点。资本对文化生产领域的渗透特别引人注目，因为影像消费的生命周期，与汽车、冰箱那样的有形东西不一样，它们几乎是即时性的。最近数年来，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被运用到支配、组织和策划所谓“文化的”活动中。随之而来的是对生产可控景观（如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重新强调，那些景观可以很实用地兼作资本积累和社会控制的工具（在一个更加缺乏安全感的时代里，复活古罗马那种“面包与马戏”的政治利益）。

对于空间障碍崩溃的反应也不是没有矛盾。相互关系越是具有全

球性，我们一日三餐的食物和货币流动越是国际化，空间障碍的瓦解越彻底，世界人口就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地依附于作为特殊身份标记的地方、邻里或国家、地区、种族群体或宗教信仰。在剧烈的时空压缩中，这种对可见的和切实的身份标记的寻求非常容易理解。无论资本主义的反应是不是发明传统，将之作为商品生产和消费的另一种项目（重新表现古代仪式和景观，遗产文化的过度繁荣），在一个影像之流加速并且越来越没有固定位置（除非能够把电视和录像屏幕正当地看作一个地点）的世界里，仍然存在着一一种坚持不懈的寻根热望。社会空间朝向我们内爆的感受所引发的预感（从日常新闻到任意的国际恐怖行动，或全球环境难题，都清楚地标示出这种预感）转化成一种身份危机。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个空间/地方？我是世界公民、国家或地方的成员吗？我在赛伯空间里具有自己的虚拟存在吗？对于自我、价值，以及认同地方和社区的能力等等的构造来说，那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克恩(Kern, 1983)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段历史的研究是正确的，那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这就不是第一次了，空间障碍的消除既激起排他性的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意识，又激起对文化和个人政治认同的异质性和多孔性的欢呼。

247 地方和空间之间的明显紧张关系，呼应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内部的张力；它需要一种特别的空间组织形式来消灭空间，需要长期周转的资本来推动其他资本的快速周转。这些张力可以从另一种立场来检验。在今天，多国资本几乎不考虑地理，因为空间障碍的削弱打开了整个世界，将之作为其获利的美味佳肴。但是空间障碍的减弱具有同样有力的相反结果；地方品质之间小规模的和细微的差异（它们的劳动力供给、基础设施和政治接受力，资源、市场环境等等）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多国资本处于一个剥削它们的更有利位置。因为同样的理由，地方越来越关注它们“优良的商业环境”，并且地方之间的发展竞争越来越微妙。社区的形象塑造（比如巴尔的摩市内港那种）开始深嵌于强大的城市间竞争过程(Harvey, 1989b)。对空间支配权，特别是对金融和货币流的控制权，比过去越来越鲜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个阶段

上，对地方之真实和虚构品质的关注同时日益增长。地方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也愈发显著。全球化因此产生了对立运动，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产生了地缘政治反动派和敌对阵营。在全球资本主义中，地缘政治分裂的威胁——在诸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以及日本贸易帝国等地缘政治权力集团之间——绝非空穴来风。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必须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时空历史地理保持一致。地方和空间之间、长期和短期时间视野之间的辩证对立，存在于一个更深的时空维度转变的框架中，这种转变是周转时间加速和通过时间消灭空间这两个资本主义根本需要的产物。我们如何处理时空压缩，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揭示了，时空经验的转变如何在诸如美学和文化再现这样的领域产生新的斗争，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根本过程如何深深地包含在不断转变的时空视野里。时空性的生产既是一般社会过程的构造性和根本性环节，又是创造价值的根本性环节。这个原则跨越了文化限制，适用于完全不同的生产模式和显著不同的社会构型。在今天，需要在理论上说明如何以及为什么必然会出现那种情形。

第十章

时空之流

说自然意义主要是由时间和空间特性决定的，这只不过是一种夸张。

——怀特海

一 空间中的身体

248 人类身体概念(以及全部与其有关的概念——自我、主体性、身份、价值以及社会存在等)取决于时间和空间定义。如果后者是相关的而不是绝对的，那么由此可以推断，身体概念和时空性概念将是互相构成的。从完全不同的方向也可得出同样的结论。如怀特海证明的那样，如果身体的感觉为我们的全部时空经验提供了主要地点，那么也正是通过身体的感觉，我们关于时空的常识观念才得以建立。在《过程与实在》中，怀特海写道：

对当代世界的感觉—感知伴随着对身体的“共与性”的感知。正是这种共与性使得身体成为我们了解周围世界的出发点。在此，我们发现“因果性”的直接知识。……但是，为了避免“当前时刻的唯我论”，我们绝不应只是直接感知表象直接性，[因为]即使这种表象直接性也是从对当下身体的感觉—感知出发的。然而身体只是特别私密的一部分世界，正如笛卡儿所言：“这个身体是我的。”所

以他应该说：“这个实际的世界是我的。”我“成为自我”的过程即是我从对世界的占有中诞生。（Whitehead, 1969:98—99）

至少，在这个出发点上，沉着而保守的怀特海与年轻而反叛的马克思具有共同之处，后者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烈地主张： 249

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此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①

但是，马克思认为有必要说明“人类身体，如何通过它自己的那些延伸——我们称之为社会和技术——不自量力，并毫无结果”（Eagleton, 1990:198），然而怀特海则拥有更加世俗但同样重要的目标，即接受身体可能为科学提供基础的方式。例如，如果身体主要是根据因果性体系中结合成整体的实体来体验世界的，那么因果性作用模式就使（人们）立即确信这样的观点，即空间和时间无疑是可分的，并且两者彼此完全不同；也会增强绝对时间和空间观的可能性。当然，这种时空观很可能被怀特海所称“当代身体的感觉—表象”所修正，借此可以推测，他指的是一种方法，象征秩序、记忆、权力关系等运用以此来定义支撑经验之身体的“共与性”。因此，如果不参照社会实践，如在加瓦发现的对身体、自我和社会存在进行评价的那种实践，就不可能理解身体的“共与性”与时空经验之间的相互构造。在我们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中，通过不同货币形式的循环、货币本身意义的赋予以及身体在万物——从当代科学和媒体到身体美学以及与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联系在一起烦恼——中的“感觉—表象”，这些社会实践牢牢地联系在一起。这些都是难以处理的情况，在此我们必须敢于进入相当困难的

^① 此处译文取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9—90页。——译者注

理论领域。

为达到这个目标，我将首先探讨莱布尼茨和怀特海有关时空相关性观念，把它们作为牛顿绝对时空观以及占统治地位的康德观点的对立面。莱布尼茨强烈反对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著名的克拉克—莱布尼茨通信便是证据），后者通常为贯穿大部分现代资本主义历史的那种身体观提供了基础。如我希望表明的，对时空性的相关理解最好地捕捉了中世纪和前资本主义社会典型的时空思维方式（如古列维奇和穆恩描述的那种）。虽然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绝对（以及最近相对论的）观点相比，相关性观点肯定会黯然失色，但是它绝不会完全消失。在某种意义上，怀特海是比莱布尼茨更坚定和先进的支持者，我们不仅可以在马克思，而且可能在更广泛的其他思想家那里发现它的强大踪迹。二十多年前，我在《社会正义和城市》中提倡相关性观点，从那以后，我一直广泛地坚持这个观点。但是在那时以及到现在的这许多年里，我一直都没有说明这种观点的意义。现在，我相信，对其恰当的探究能够使当代世界中存在物的社会性的讨论生动活泼，且富有启迪意义。

二 莱布尼茨论时间和空间

尽管莱布尼茨是一个已逝的白种欧洲男人，但他占据着一个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时空位置。在时间上，他同现代主义者一样对科学和理性充满激情，但又将其与中世纪有关宇宙如何创造的本体论结合在一起。在地缘政治上，他处于欧洲科学探索和政治—神学争论的中心（参阅本书第三章），然而他也借由自己与耶稣会教士的联系探究了东方的哲学和数学体系，这使得李约瑟认为〔根据曼格罗（Mungello，1977）的说法，可能这并不正确〕，他基于自己对《易经》的研究创造了微积分和二进制数学与模态逻辑（当代计算机语言的基础）。在赋予时空意义的问题上，他正是从这种特殊的位置出发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他的

观点并没有被多数哲学家看重(特别是在罗素对其提出强烈批评之后),不过,当人们承认他在科学、数学和逻辑学中的贡献是当代多方面实践的基础时(例如,他在今天被视为赛伯空间的形而上学家),这些明显迹象表明人们开始严肃地重新对待其形而上学。莱布尼茨是坚定的反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家,简单地采纳他的观点会给马克思主义带来某种困难(参阅本书第三章),不过,根据有关辩证法观点,那些困难并非不可克服。

如本书第三章表明的那样,莱布尼茨是内部关系观点的强大倡导者。在《单子论》中,他这样总结了自己的立场:

一切被创造出来的东西的这种相互联系和适应,由此及彼,直至其他一切,使每一单纯实体具有表达其他事物的联系,因而成为宇宙的一面活生生的而永久的镜子。(Monadology, 1991:24)

正是从这种内部关系出发,他反对牛顿的思想:时空天生就存在,它们是内容中立的容器,并不关心放置在其中的东西是什么。相反,他主张,空间总是视实体或物质而定,不过并不是以相对论所理解的那种方式来决定。当地理学家们使用“相对空间”来表明空间如何根据穿其而过的物质而弯曲或变形时,空间也不是由它们来决定的。他转而发展出一套关系视角,在其中,时间和空间“只是‘在’其中的物”,并“将其存在归功于在物中获得的秩序关系”(Rescher, 1979:84)。对于莱布尼茨来说,在自在和自有意义上,时空不是真实的或物质的,甚至观念的,而是表现为一种“派生的”或“偶然的”(虽然是“有根据的”并完全是物质性的)存在,这个存在完全源自它们包含的实体和过程。那么,如何解释时空呢?他指出:

这有如一座城市,从不同的侧面看上去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说,景象繁复迭出。如同单纯实体的无限繁多,因而出现相应的种种宇宙,然而这无非是唯一宇宙根据每一单子的不同视点而

呈现的景象而已。(Leibniz, 1991:24)

这定义了我所称的第一类时空性：即情境、位置和条件为单一实际的宇宙提供了多样的时空视角。它与第二类观点形成对照，莱布尼茨通过那种观点借助逻辑工具揭示了具有完全不同时空性的多种可能宇宙：

可能存在着无限多的[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其他空间和世界。如果存在于其中的精神拥有与我们没有关系的感觉，那么它们便同我们没有距离(也没有其他的特殊关系)。正如梦的空间世界不同于我们醒时的世界，这样的世界中甚至存在着完全不同的运动法则。(转引自 Rescher, 1979:94)

……不可否认，许多故事，特别是那些称为小说的故事，或许可能被视为可能的，即使它们并没有在上帝选择的那种特殊的宇宙次序中实际发生——除非有人设想，在无限时空中存在着某种诗的领域，在其中，我们能够看到英国的阿瑟王、高卢的阿玛迪斯、德国的狄特里希·冯·贝恩等漫步于地球。我们时代的一个著名哲学家似乎没有摆脱这种观点，因为他清清楚楚地断言存在着某个地方，在那里，物接受它可能拥有的全部形式(笛卡儿，《哲学原理》。第3部分，第47条)。这种意见站不住脚，因为它将会消除全部宇宙之美和全部选择。(转引自 Rescher, 1981:91—92)

- 252 莱布尼茨从技术上论证，像时间一样，无论在何种宇宙(因为所有的宇宙都具有某种时空性)中，空间都只不过是“一种适当形式的关系结构”。特别是：

空间是一种**共存**的秩序：即事物相互的共时状态中的秩序；而时间则是一种**相继**的秩序，即：事物之各种各样不同的相互共

存状态中的秩序,(因为它们相互的)共存当然必须拥有某种“空间”结构。(Rescher, 1979:86—87)

这使我们看到莱布尼茨体系的第一个优点:时间和空间“相互并列,哪一方都不比另一方更根本”。作为实体的秩序原理,它们同样重要,两者都是偶然的。(这反对费尔巴哈的如下观点:时间是辩证法的优先领域;也与塞伊斯最近提出的如下观点相对:时间是必然性王国,而空间则是偶然性王国)

然而,如果空间“是共存实体的秩序,那么每一个世界都具有自己的空间”,“在并不彼此共存的不同世界中存在的不同个体”在空间上是没有联系的,或者“在空间上是无关的——有点像不同人们的梦之世界”(Rescher, 1981:86)。那么,潜在地,“每一种可能的世界都具有自己的空间,就如它们具有自己的法则”。这并非意味任何世界都可以是无空间的,但是却暗示空间的秩序“在不同的世界中必然是不同的,因为不同的世界包含了不同的(且不相容的)实体,而这些实体把这些差异都内在化了。因此,事物之间的差异随后带来了空间之间的差异,正如它带来了不同法则”。我认为这是莱布尼茨理论的第二个优点:它承认“不同空间的多元性,而反对一种具有多个部分或亚空间的单一全能的超级空间”(Rescher, 1981:88—89)。更特别的是:“一个空间通过它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或连接而个体化为一种单一空间,在其中,这些相互关系和相互连接的要素是缺乏的,谈论单一空间的根据是不足的。”

莱布尼茨的推理既是神学的又是形而上学的。实际上,我们遭遇的物理世界只有唯一的空间和时间秩序,所以可能存在的时间和空间多元性对于唯物主义科学来说并非完全令人困惑。只有对《单子论》所阐述的同一现实采取另一种理解视角,不同时空秩序的表象才可能呈现。但是,莱布尼茨关心上帝的创造性和完美性。他认为,牛顿把上帝置于时间和空间中,就好像上帝的行为是前定的,或者甚至好像时空的属性先于上帝。承认多种可能世界(每一个世界都具有自己的运动法

253 则)中的时空多元性,就是承认,我们占据的物理世界是上帝的创造性选择和意志的表现。对莱布尼茨来说,上帝的完美性产生了“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对相当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之可能秩序进行探究是要阐明上帝选择的特殊性质。

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突破,必须伴随着对时间和空间的世俗化思考。怀特海认为上帝观念是莱布尼茨思想的基础,甚至他也认为其有关最好的可能世界的阐述是“为了保全由当代人、先辈和神学家们构造的上帝的的面子而制造出来的一种大胆而新颖的废话”(Whitehead, 1969:61)。然而,如果我们完全从世俗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那么,问题将成为世俗社会选择而不是神的单一意志的实施。我认为,莱布尼茨论证的存在着第三个优点:可以把时间和空间看作内在于社会实践和行动中的秩序安排体系,这种实践和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是“被选择的”(或许“达及”这个词更好),而非给定的。例如,“每一个可能的世界都具有自己的独特空间结构”,而每一个与众不同的社会构型都有自己的独特时空结构和与众不同的运动规律(Rescher, 1981: 93),从前一种观点向后一种观点的过渡是相对较小的一步。情况确实如此,因为正是“事物的差异”(或者,我更喜欢说,社会实践和过程的差异)“随后产生了空间的差异,正如它产生了不同的法则”(Rescher, 1981:88)。

莱布尼茨强调共存空间性和持续时间性的创造性,这开启了别样的论证方法,这些论证方法在其有关多种可能世界的说明中显而易见。梦的空间和世界,甚至小说和诗歌的空间和世界,不同于日常经验的空间和世界,它们可能具有自己的运动规则。但是,在此,我们遭遇一个难题。我们如何知道,这些空间世界是相互分离的,而不是如《单子论》中提出的对同一宇宙的不同观察视角?莱布尼茨的观点是:“在这一意义上,不管是谁问另一个世界或者另一种空间是否存在,就总是在问是否存在着把虚无传达给我们的那种心智。”(转引自 Rescher, 1981:90)如果我们步随莱布尼茨的论证,那么,主张碎片化和分离空间世界的极端后现代主义至关重要地依赖:(1)在感觉体验上完全

不同于我们的居住者；(2)空间世界和时间世界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莱布尼茨假定(主要因为神学原因)，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实际的物质世界是一个和谐秩序的宇宙，多种单子或许以在其中发展出极为不同的视角。在这一点上，莱布尼茨接受单一宇宙的观点，但是他的论证风格产生了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以及令人感兴趣的可能性，特别是鉴于他试图强加一种形而上学的统一性，而不顾政治经济的分裂和政治的混乱(参阅本书第三章)。如果接受我在此提出的转换，放弃单一的创造性上帝这种神学观，并接受有关时空秩序安排的社会选择和创造性，那么，这些不同的社会选择如何实现，以及它们是否嵌入完全分离的感觉世界和不可通约的语言中(与对单一宇宙的多样化视角相对)，这些问题就成为当代围绕后现代与现代主义视角对抗而产生的争论的焦点。

或许，还有另一种表述方式。莱布尼茨在可能的和可共存的世界之间做出了有力的区分。前者包含无限多样的潜在的创造性选择，而后者则把内在于特殊选择中的社会关系限定在所有单子都认识到的共同空间(或共同的宇宙)中所实际发现的共存秩序之中。在共同世界中存在就是根据“相互关联性及其部分之间的联系性”来分享特定的时空性质。把此问题置于本书第九章所论的在时空社会构造上汇集的物质之语境中，必然会带来这样的后果：尽管有关时空秩序安排的社会选择可能是无限的，但是实际社会选择一旦做出，就会使得那种社会世界全部“相互关联和连接的”成员处于公共时空之共同的经验框架之中。当然，这是古列维奇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在此，也产生了另一个困难：如果不同社会构型能够相互从对方中产生，那么就必然存在着某种改变时空框架(以及运动法则)的方法。这反过来暗示，时空的多元性(以及冲突着的运动法则)必然最终共存于一个共同的宇宙中，即使只有一种时间性。由新英格兰殖民早期殖民定居者与印第安部落对土地不同看法体现出来的那种不可通约性，便因此成为不同时空性的社会定义之间冲突的一部分。

在此强调可通约性是重要的。它以一种令人感兴趣的方式预示了哈贝马斯以交往行动理论来处理时空性的那种做法(Habermas, 1987:

322)。他写道，如果理性“在本质上体现于交往行动的语境中”，那么言语行动便把“历史时间和社会空间中的”不同行动者的意图和行动联系起来。不过，尽管总是存在着一种“普遍有效性的先验要素”，它们“破坏了每一个地方特色”，从而“对命题和规范的有效性主张超越了时空，‘抹去了’时空，但是，对这些主张的接受、传播，以及首要地围绕它们的争论绝不可能摆脱特别语境的‘此时此地性’”。在此，与威廉斯对“战斗的特殊主义”困境的分析有令人惊奇的相似性，它在实质上暗示着一种思想的相似性：时空性一旦形成便成为政治行动框架。如我们将在下文(参阅本书第十二章)看到的，存在着与“情境化知识”的强大联系。争论时空性的主导观念，便是争论生产它的过程以及在思想上重新定义另一种可能的存在世界。

在莱布尼茨的理论中，这些争论被取消了。他通过假定上帝对和谐原则的依赖性取消了这种争论。对莱布尼茨观点的世俗化理解，能够并且显然应该无需这样一个假设，而选择一个更加冲突的社会关系模式，融合阶级、性别、殖民和其他斗争形式的观念。因此，即使在一个共同宇宙中，对那种共同性的理解不仅是不同视角，而且是第九章描述的那类矛盾和对立，它们暗示着，我们把多样性的时空秩序安排原则内在化了，并且发现自己常常因采纳哪一种原则这个问题而处于内在的冲突之中(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我从养育活动中内在化的那种时空观点与从作为学者的职业生涯中内在化的那种时空观点是冲突的)。

下面概括一下我的论点的实质。可以这样来解释，实际存在着某种单一的时空框架，且社会变化只能根据我们对同一宇宙的不同看法(现在，我们通常喜欢把它称为“情境”)而产生。尽管这种观点本身似是而非，且充满了对时空中不同人类行为模式的洞见，但它看起来与莱布尼茨提出的那些不同的可能世界——梦和小说世界——的例子并不一致。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另外一些相互之间完全不同的可能世界。这些可能世界并非完全存在于人类经验之外，虽然莱布尼茨可能合理地主张，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描述的世界外在于物质性的感觉世界。莱布尼茨对多种可能的时空世界的研究只是一种逻辑构造。不

过，我们可以将之作为一种工具来进一步研究实际时空秩序安排——这种安排是在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构型之中和之间进行的——的差异。简言之，以莱布尼茨为依据，对关系性时空的世俗的和社会的理解提供了一种有力的理论和逻辑框架，从而能够再现本书第九章讨论过的那种时空构造的多样化社会实践。它亦允许我们根据不同的可能的时空性世界的生产来探索替代性的生产方式。

三 怀特海的时空相关性理论

256

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提出一种时空相关性理论。奇怪的是，尽管他偶然承认自己与莱布尼茨的相似性和差异，但从不详细讨论后者的观点（这可能出于对他的朋友和合作者罗素的尊敬，后者发动了一场反对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的毁灭性攻击，尽管亦从他的数理逻辑中受益匪浅）。差异是重要的。与那些在英国经验论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其他思想家一样，怀特海也致力于对相关观点进行现实主义的而不是逻辑学的理解。因此，他反对莱布尼茨转向纯粹唯心主义的倾向。他还具备在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之后的写作优势。虽然他怀疑爱因斯坦的解释（因此打开了相对性和相关性观点之间的缺口），但他绝不怀疑爱因斯坦的重要性和准确性。怀特海为唯物主义地辩证理解时空性提供了十分强大的形而上学基础，我正致力于寻求那种理解。令人遗憾的是，他对辩证法传统本身缺乏兴趣（例如，他承认黑格尔的重要性，但也坦白地承认自己绝不会读他的东西），这使他拒绝了莱布尼茨提供的某些洞见。

1914年，怀特海发表了一篇题为“相关性空间理论”的论文。他的主要评注者和传记作者维克多·洛威认为论文写得又臭又长，但它在怀特海从早期向后期的过渡中占据了关键的位置。早期是与罗素合作写《数学原理》的怀特海，后期则是对过程和有机论哲学进行详细解释的怀特海。在其中，怀特海主张，我们不应该认为自然身体好像先在

空间中然后才彼此发生作用。身体处在空间中，毋宁说，只是因为它们相互作用，所以空间“只是它们相互作用的某些属性的表现”（Victor Lowe, 1962:178）。因此，时间和空间并非独立的实体，而是源自过程和事件的关系。以怀特海自己的话来说：

根本性的观念秩序首先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物的世界，然后才是空间。空间的基本实体是由那些关系规定的，它的属性是从这些关系的本质推论出来的。

257 对时空性概念的重新定义把怀特海引入一个神秘地带：如何设计一种适宜的语言，来捕捉过程、运动、变迁和流动，而不必抛弃显而易见的常识观念，即我们被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确定属性的物所包围。如菲茨杰拉德评述的，一旦进入这个地带，对怀特海来说下列问题便显而易见的：“在牛顿自然哲学的界限内”，特别是在任何绝对时空观念的界限中，“解释变化”是极为困难的事。“在一个非持续瞬间所发生的变化是非常难以理解的概念。如果不参照过去以及未来，我们如何解释速度呢”？在探寻这个问题答案的过程中，怀特海被迫建构一种全新的时空哲学（Fitzgerald, 1979:74）。

一旦怀特海（Whitehead, 1985:53）相信“自然是个过程”，他便与大多数科学概念处于冲突之中。例如，对“何为自然”这个问题的通常回答是：“以原料或素材或物质——具体选择什么名称无关紧要——等概念来表达，这些东西在时间和空间中，或者，采纳更加现代的观点，在时空中，具有单一位置的属性。”因此，结论是：“一旦你定居下来，无论如何定居，无论你用时空中的一个确定位置表示什么，在说‘就是那儿’、‘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充分地表达了一个特殊的物质身体与时空之间的关系；并且，只要涉及单一位置，就不能再对主体说什么了。”（Whitehead, 1985:61—69）当然，这是著名的机械论自然理论，17世纪以来，科学驻足于此，这主要因为，它在广泛的技术实践中一直发挥着良好的作用。但是，这种有关物质的学说：

是不加批判地把时间和空间作为自然存在的外部条件的结果。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应该对时间和空间是自然要素这个事实进行怀疑。实际上,我的意思是,“无意识的时间和空间假设是自然在其中建立的存在”。(Whitehead, 1920:20)

这就导致怀特海(Whitehead, 1920:153—154)拒绝“时空关系是外部的”这一“通常真正普遍的”学说,并转而根据“事件相关性全都是内部关系这个学说”提出一种理论。他继续说:

内部相关性概念包含对事件的分析,它把事件分成两个因素,一是根本的实质性的个体化行为,另一个则是各个方面的复合体——也就是说,成为特定事件本质的相关性的复合体——它们统一在个体行为中。换句话说,内部关系概念要求作为活动的实体概念,把各种关系综合到其新出现的特点之中。

语言相当特别,需要某种解释。怀特海的意图是批评单一位置的概念。“我将论证,在以我们直接经验所理解的主要自然要素中,不存在任何一种具有这种单一位置特点的要素”。然而并不能由此推断牛顿科学是错误的:“借助于建设性抽象的特殊过程,我们能够得出牛顿的理论阐述”。不过这仅仅是从完全不同的可能性领域得出的抽象,且我们不可能离开“它从中抽象出来的那一领域”来理解它。换句话说,对过程的理解必然领先于或平行于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 258

怀特海的最终目标是用“有机论哲学”代替牛顿的机械论观点,并且在《科学与近代世界》(Whitehead, 1985:80ff)中,他通过重新研究时间和空间状况而开启了实现那个方案的道路。他指出,物既是**独立的**,又是在时间和空间中**绑在一起的**。他把这种特点称为时空之“分离性的”和“包容性的”特点。这样,物是**如何相互分离的和绑在一起的**,这个问题便成为焦点,因为任何时间和空间定义试图解答的都正是这个**如何**。第三个特点是怀特海称为时空之“样态”特点的东西,

在其中，并且只有如此，单一位置的看法才能被定义，因为“空间中的每一事物都接受某种确定的界限”。换句话说，个体化和物、特殊性或事件的定义总是在时空中产生的。但是，哪一种时空呢？只有定义的样态才是有趣的，对怀特海来说，那种样态总是相关性的。结果便消除了作为基础原则的单一位置观点。时间和空间现在被解释为“只是对包容性统一之总体性的抽象，是彼此在对方之中成形的……时空只不过是把集合体组成统一体的体系”^①。因而，“事件”这个词便指“这些时空统一体中的一个”。当然，此处有趣的是把各种成分集合成统一体从而使得时空性得到定义的实际过程。他的论证突出了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与莱布尼茨不一样，怀特海承认时间可以与空间不同。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他认为这种差别仅发生于“抽象过程的某个高级阶段”。但是在有机论哲学的发展中，他最终把差异视为一种产物，产生于把各种成分整合成持续存在的有机形式的整个过程：

正是在这种样态的持续中，时间把自己与空间区分开来……
每一个持久的客体都会在自然中发现并向其要求一个把空间与时间区分开来的原理……空间较之于时间的重要性以及时间较之于空间的重要性随着持续的有机体的发展而发展。（Whitehead, 1985:150）

259 这暗示着，任何有机体的进化，包括社会自身的进化（怀特海并不反对把社会看作某种有机体，尽管他绝不会屈尊去详细说明意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以时间和空间的特殊分离为基础的，就如与资本主义现代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理论广泛主张的那样。至少在今天，我们可以把分离看成是过程的产物。结果便为批判性地研究那些特殊的过程带

^① 此处译文取自怀特海的《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69—70 页。——译者注

来一线光明，这些过程暗示在社会理论本身中存在着这样的分离。

其二，多样性过程在时空方面产生了多样的真正的差异，它们与莱布尼茨的理想性差异相反。怀特海认识到，这是接受或理解整个论证的最大困难之一：

这些不同的测量体系具有自己可以测量的时间差异，它们是令人困惑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对抗我们的常识。这不是我们思考宇宙的通常方式。我们思考必然的时间体系和必然的空间。根据新的理论，存在着无数冲突的时间序列和无数独特的空间。

此外，时间和空间的分离使得时空有可能被不同的时间体系按照许多不同的方式分级：

想到其他存在物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把自然切成时间片断，这乍看起来有点让人震惊……我们全部的几何学只是表现了不同事件与不同时间体系相连的那些方式。（Whitehead, 1922:336）

怀特海全神贯注于有机体的物理学，他附带指出：幸运的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之间的差异相当细微”。要拓宽这一观点来理解这一主张的社会维度，并不困难。不过，通过对在自然中的相互联系过程进行经验主义研究，怀特海使多种时空原则中的存在重新回到现实：

在自然提供的其他时间体系中，将有一种绵延性。它为全部感觉事件的次要部分提供最平均的协同。这种绵延将是整个自然总体，它是感知所设定的终点。因此，感觉事件的特点决定着直接在自然中呈现的时间体系。（Whitehead, 1985:111）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和反思来理解各种各样时空性中的哪一种既在自然中又在运动着的观察者的经验世界中发挥着主要作用。这样，我们最终认识到“协同”的重要性（在此，怀特海“协同”概念与莱布尼茨的“并存性”概念相似）——协同是多种过程共同建构一致的、连贯的然而多面的时空体系的方式。

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在下文中，我将不时地回到这一点，所以在此用第九章的例子来说明“协同”的意义。在那里，我主张，货币具有多种用途，并且每一种用途都可能规定一种不同的时空性。然而，归根结底，货币只是货币，这个术语发挥着一种保护伞的作用，表明了被赋予某些性质的一致而连贯的实体所具有的广泛的、“并存的”和“同步的”用途。某些用途可能同其他用途相矛盾，这一事实绝不会降低货币概念的全面连贯性。

其三，怀特海有力地论述了这个难题：有机体的“永恒性”如何实现，空间性对于有机体存在期间的“永恒性”范围是如何至关重要的。不过，他总是敏锐地注意到那种瓦解过程，它甚至可能把某种表面上永恒的东西当成克利奥帕特拉之针并最终消灭它。实际上，怀特海常常认为，正是对瓦解过程的集中关注使他与先前的过程哲学家们区别开来。在一些引人注目的段落中，怀特海揭示了我称为“时空压缩”现象的有关特点：

在导致其影响时空体系变迁的条件下，某些种类的灵长类动物可能倾向于分化……相应地，在它的时空体系中，一种导致快速变化的不利环境，即一种迫使其急剧加速的环境，会引起微粒子的分化，分解成同振荡周期的光波。（Whitehead, 1985:165—167）

那么，如何总结怀特海的贡献呢？卡西尔（Cassirer, 1943）指出，莱布尼茨反对牛顿的论证，实际上是两种完全不同哲学传统相误解的论证。原因在于，莱布尼茨的逻辑技巧和形而上学信念与牛顿的自然哲学相反。无论如何，怀特海的批评源自牛顿传统自身。就人类能够体

验和描述这些过程来说，它们并不依赖以莱布尼茨方式对可能世界的逻辑揭示，而是依靠对实际自然过程的相关可能性进行研究。怀特海主张，把自然分成事实与价值、心灵和物质、物质和意识是错误的，这时，尽管他确实脱离自然科学之抽象唯物主义传统，但由于他总是把自己的论证维系在人类身体经验的共与性上，从而仍然固守在经验主义的范围之中。结果是，把莱布尼茨提出的可能时空世界的多样性转化成为一种经验难题，即如何阐明在由相互交叉过程所组成的多样化世界中运行的多种时空性。本书第九章已经说明，由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地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等收集起来的材料以各自的方式部分地阐明了怀特海提出的一般难题。由此，似乎可以合理地断定，借由怀特海提出的时空相关性理论，能够为所有不同信息塑造某种理论基础。

261

四 走向一种空间、位置和环境的相关性理论

时空相关性理论能够用来理解空间和地方的辩证法吗？如果可能的话，是否可以将其以某种方式拓展，从而建构一种对空间—位置—环境三元组的辩证理解？人们有理由非常肯定地回答这两个问题。

莱布尼茨探讨了如何达及空间和位置概念。通常，在观察改变位置的实体时，会说一个实体“占据”了另一个“位置”。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推断出，实体通过或穿过的位置具有绝对的性质。因此，空间似乎是所有综合起来的位置。但莱布尼茨的目标表明，这种推论是一种误解，像空间一样，位置并没有“绝对的现实”。他主张，这只是关系。怀特海走得更远，他写道：“我们通过纯粹的‘位置’概念所表达的东西是一个仅仅被视为在空间上与某种可识别实体相关的实体”。因此，位置是一个实体与另一个实体之间关系的场所，并且，正是因为没有一个实体能够孤立地存在，所以它也包含了“他者”。不过，由于“位置概念表明了自然中实体的感知只能与已识别实体之空间关系而揭示”（Whitehead, 1920: 52），所以关系根本不是同等地出

现的。

怀特海的“永恒性”学说牢牢地确定了这个观念。“永恒性”作为一种“广泛联系”的体系源自过程。实体在它们的边界内以及它们创造空间之过程的内在秩序安排中获得相对稳定性，这是暂时的。这些永恒以排他的方式最终占据一块空间(暂时的)，并因此定义一个位置——它们的位置(暂时的)。位置形成过程是在创造空间的过程之流中开辟“永恒性”的过程。但是“永恒性”——不管其看起来多么稳定——并非不灭的：它们总是作为“持续的消亡”而受时间支配。它们由创造、维持和消灭它们的过程而定。

262 有趣的是，怀特海的这种看法与德塞图的最近表述大致相当，后者把位置理解为“即时性位置构型”，这意味着“稳定性的标志”：

当人们思考方向、速度和时间变量时，空间便存在了。因此，空间由运动要素之间相互作用而组成。空间是一种结果，它由给它方向、给它位置并使之具有时间限制的操作所创造。……与位置截然不同，它因此不具备任何有关“恰当”的单义性或稳定性。简言之，空间是一种操作性位置。因此，由城市规划在几何学上定义的街道便转变成由行人定义的空间……(de Certeau, 1984:117)

因而，位置是惰性身体的场所，可以还原为某种永久性事物的“在那里”，与创造空间之运动的不稳定性相反。但是，“当一个意志或权力主体(如一个经营者、企业、城市或科研机构)能够从环境中独立出来时”，便产生了战略性的“力量关系的计算”。就其成为“意志和权力主体”而言，永恒性的形成改变着行动的计算。

当然，倘若我们准备接受怀特海的“永恒”与德塞图的“意志和力量主体”之间的同族关系，那所有这些对于解释时间、空间和位置的相关性理论来说就相当重大的。差别在于，德塞图借助“意志和力量主体”(诸如民族国家)精心构造外部战略和内部秩序(包括监视结构)——这与维持他们自己的永恒性(他们的界线和内部完整性)有很大的关

系——而把永恒性的观点扩展到空间和地方的辩证法领域。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国家作为一个实体从多种交叉的空间过程中历史地诞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诞生于1870年至1925年间)。它们作为一个实体受到环境的限制,同时与其分割开来,并且通过确保它们个性和内部完整性的制度获得某种永恒性。这可以被解释为“空间对时间的胜利”,这种胜利使国家能够在自己的范围中实施各种战略来确保内部纪律和合法性,同时追求外部地缘政治战略。它们也实施那种地缘政治战略(包括监视和通讯的军事技术在空间中的发展),这些战略生产了作为它们追求的战略结果的空间,虽然同时也被这种空间创造过程永久地破坏,使它们首先被构造成永恒(信息流、货币流、资本流、移民潮、文化习性和意识形态的流动,等等)。德塞图指出:“在我们社会之中,当地方稳定性被打破,它就好像不再由具有确定范围的社区来确定,似乎成为脱离轨道的漫游战术……在系统中(引入了)布朗运动。”(de Certeau, 1984: xx)因此,不断变化的国家状态、表面上强有力的永恒性(诸如苏联)的瓦解,非常容易被理解为位置—空间辩证法的不可避免的结果,那种辩证法不仅在根本上破坏政治、经济、科学的所谓“合理性”,而且使位置的战略世界与常常由多种过程确定的多样性空间的任意轨迹处于冲突之中。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能合理地谈论“自由的空间”和“对抗的空间”,甚至赋予福柯的“异托邦”(一种超越和外在于监禁工具的空间)观念以某种实际的意义。

263

因此,这将使整个环境质量和过程成为有待解决的问题。因为,时间、空间和位置是由过程相关地确定的,它们因过程而变,这些过程同时确定和塑造通常称为“环境”的那种东西。如果不同时揭示时间和空间是如何在这种过程之中建构的,我们就不可能谈论“自然”或“环境”世界:

如果把城堡、蓝天和星星看成一种实现了的统一体,它们就不只是它们自身;但从包容统一的观点来看,在时空中,它们就是城堡、蓝天和星星……

各种过程(物理的、生物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的集合(或“包容性统一”)规定了空间、地方和环境。没有一个部分能够离开其他部分而得到解释:

它不是在空间中存在的实体,而是属性。我们在空间中发现的是玫瑰花之红色、茉莉花之香气和大炮的轰鸣声。我们都会告诉牙医自己的牙痛在哪个部位。因此,空间不是实体之间的关系,而是属性之间的关系。(Whitehead, 1920:21)

位置被定义为属性之间关系的场所。如果是这样,那么,在怀特海的几何学和我的地理学中,对任何独立的空间科学的论点都将彻底消失。怀特海认为几何学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同样,我认为那种包含在地理学中的几何化的空间科学是社会环境过程研究的一般分支。确实,认为可以脱离由环境和生态作用引起的过程来考察时空性,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从这种视角看,在地理学传统中可以发现的空间科学和环境问题之间、系统地理学和区域(由位置限定的)地理学之间的传统二分似乎是完全错误的。这正是因为时空、位置和环境都嵌在实质性过程之中,不可能脱离过程包含的时空多样性来考察过程的属性。这对地理学思想的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过,在此我并不详细探讨这个问题。

五 个性化、同一性和差异

究竟为什么这些研究具有重要性呢? 答案既令人吃惊又意义重大。

时间和空间一旦形成,就成为使物、人、关系、过程和事件具有个性并获得同一性的首要手段。对于世界上围绕我们存在的物、事件和关系的定义来说,场所和界限即使不是生死攸关的也是重要的属性。

选择一种秩序安排原则而不是另一种，便是选择特殊的时空框架来描述世界。选择并非中立于我们能够描述的东西。绝对的时空理论总是强迫我们进入一种机械的描述框架，例如，使那些重要世界属性——只有通过相关性观点才能揭示这些属性——隐而不现（如生机论的观点）。选择错误框架便是误认我们周围世界的要素。

然而，时间和空间对于个性化似乎并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大多数对时间的社会（与个体化相对）描述中，许多个人可以占据同一时刻，但是，在没有成为“他人”的那一时刻，没有人能够恰好占据同样的空间。巴赫金指出，如果消除两个人视野和视角的差异，那么这两个人必将“融为一体，完全变成同一个人”（Bakhtin, 1990:23）。因此，作为社会事务认识之源的“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关系总是时空性构造。对于理解（个人的和政治的）同一性的形成，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时空框架中的变迁影响自我—他人的关系（例如，要么完全消灭自我—他人的区别，要么重新定义在赋予自我以价值的过程中谁是或不是重要的他者）。

在一个给定的时空框架中，个性化的力量同命名力量联系在一起；命名则是一种凌驾于人和物之上的力量形式。例如，克罗农指出，新英格兰迁徙的印第安社群如何以这种方式来命名土地，告诉人们“哪是收割植物的地方，哪是采集贝壳的地方，哪是打猎和捕鱼的地方”。此外，在不同的时间里，同一地方可能具有不同的名字。这样命名的目的是“把土地转换成地图，如果仔细地研究，就会发现，这个地图在确切意义上告诉一个村子的居民维持他们生存所需要的信息”（Cronon, 1983:65）。但是，印第安人的命名实践远不止如此：通过命名把故事附加在土地之上，借由这一点，美洲印第安人把他们的历史刻印在景观上。巴索指出，地理特点：

数个世纪中，对于[西部阿帕契部落]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记忆之柱，在其上悬着他们历史的道德教导……阿帕契的景观布满了已命名的场所，在那里时间和空间是融合在一起的，并且通

过历史传说的作用，它们的交汇也“使得人类预期清晰可见”。很明显的是，这种负载个人和社会意义的场所，以重要方式塑造着阿帕契人具有或应该具有的形象。(Basso, 1984:44)

印第安人的这种实践与偷走土地也偷走印第安人身份的殖民者的实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新英格兰，殖民者拥有的是笛卡儿式固定财产权利观和抽象空间边界观，他们“创造了霸道的地名，这些名称或者使人想起他们家乡，或者直接就是它的所有者的名字”。对于印第安人来说，英国人的时空体系及其产生的地名在根本上是无用的，而对于英国人来说，印第安人的地名同样如此。两种社会的和生态的体系之间的冲突是围绕命名的冲突，也是围绕在价值定义中运用的相关时间和空间概念的冲突(参阅 Mignolo, 1994)。

围绕意义和这种再现位置和身份方式的斗争大量存在，最特别的是围绕位置、居民和他们的社会功能得以定位、命名和在话语上再现的那种方式的斗争。如爱德华·萨义德在其《东方学》(Edward Said, 1978)中敏锐地表明，可以通过局外人命名位置和人所强加的意义和联系，能够瓦解、塑造和操纵人们的身份。在此，或许萨义德过于强烈地把命名实践错误地当成纯粹西方的强迫行为(而没有充分承认当地人的抵抗、合谋和自愿行动)，但是他提醒人们注意命名权力是对其他人和物的权力，在这一点上无疑是对的。时至今天，诸如“远东”和“中东”这样的术语还表明一种从白金汉宫(或者，更准确地说，从格林威治子午线)看问题的立场，这种立场实质性地和比喻性地使权力在一个单维的空间网络里中心化。

在某种社会空间结构中分配位置意味着不同的作用、行动能力和权力的获得。对于评价行为和认同行为来说，(以物质方式和比喻方式)使事物获得位置是根本性的。定位(placing)和生产位置(making of place)对于在任何社会秩序中的社会发展、社会控制和获得权力都是基本的。因此，位置建构过程与时间和空间的社会建构内在相关(以第十一章中采取的那些方式)。

所有解释和理论化的形式都依赖于(1)现象和事件的个性化；以及(2)在现象和事件之间建立某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联系。然而，很少有人重视这些关系应该如何构造。由于缺乏重视，它们便成为一种惯例。例如，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时间优先于空间的趋势一直很强大，列斐伏尔以及最近英语世界的地理学家们的批评性试图干预这一点，但也没有能够彻底改变这一局面。例如，爱德华·汤普森正确地主张，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时间现在是一种通货：它不是流逝的而是被花费的”(E. P. Thompson, 1967:21)，但他错误地忽视了马克思的下述主张：只有通过位置的运动，产品才成为商品；只有当社群之间以及跨越空间的交换成为“一种标准的社会行为”时(Marx, 1967: 91)，价值形式才有意义。实际上，可以得出下列合理的论点：在任何社会形态中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不可分割地与其社会关系、劳动关系以及物质世界的时空秩序安排的特点联系在一起。

需要突出强调所有这些隐蔽的政治意义。通过一种特殊的世界时空框架，不同学科建立了不同的研究对象。这种框架是政治性的，这是因为它为研究规定了某种严格的“自我—他人”关系(但愿是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时空性选择并非与社会关系(包括统治关系和权力关系)没有联系，它突出了某些社会关系，或者，同样重要地，忽视了它们(诸如许多妇女生活、性别、被殖民主体的时空性)。因此，接受一种惯常的时空框架等于接受既定的社会关系样态，甚至无须了解它。换句话说，源自某种统治和压迫的社会过程的时空社会构造模式能够反过来嵌入到学科建立自己研究对象的方式中，从而使这些学科与统治过程的永恒化串通一气。

但是存在一种感觉，人们在社会理论和研究中错误地形成了时间优先于空间的惯常偏好。整个论证可以有益地反过来描述。柏格森主张，人类智力“使宇宙空间化了”，而怀特海认为，这样做是因为“空间化是通向通俗哲学的最短路线”(Whitehead, 1969:242)。笛卡儿“给出了这样一种思想体系的几乎完美的例子”，他有效地把空间化的潜在流动性隐藏在虚构的静态范畴、实体和物背后，时间—因果性关系

能够在其中得到检验。空间性并没有被忽视，只不过，特殊的和不变的空间性假设总被嵌在全部思想、理论化和实际研究的基础之中。当威廉斯抱怨我们用以交流的符号的空间固定性特别偏爱共时性分析形式——这种分析把在时间中发生的真实过程还原成“一种派生的或次要的属性”——时，他实际上发现了这个难题。吉多和福格森同样地抱怨，空间“从分析视野中消失了”，却还“在社会科学中作为一种核心的组织原则”发挥作用(Gupta and Ferguson, 1992:7)。正是这种空间因素决定的范畴的固定性，它使对时间中的运动的研究变得重要。人们可能忘记空间是一种易受质疑的分析范畴，但它却作为一个毋庸置疑的范畴无所不在。

这并不是说(参阅第二章)，支配着我们思想的空间化的笛卡儿—康德体系是错误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相当合理的近似值。但是，它们是近似值，所以在某些十分重要的研究和思想领域中潜在地是令人误解的。阐明另一种关系的形而上学，一种空间、位置、时间和环境的辩证法，目的就是打破笛卡儿—康德思想界限的另一种思考方式。在这一点上，如果我认为怀特海最重要，那是因为，他对那个难题做出了最适当的阐述。他这样来反思一首赞美诗的头两行：

求主与我同住；

夕阳西沉。

在此，第一行表达了永恒，“居留”、“我”与“存在”得到呈现。而第二行则把这些永恒性置于不可逃避的流动性之中。最后，我发现这句诗阐明了全部形而上学问题。那些从第一行开始的哲学家们给予我们一种有关“实体”的形而上学；而从第二行开始的哲学家们则发展出“流”的形而上学。但是，实际上，不能以这种方式把两行分开来；我们发现在这两行之间摇摆平衡是大多数哲学家的典型特点……(Whitehead, 1969:241)

相关性理论不仅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如此众多的人发现自己在各种边界上

摇摆，如在空间和位置或者物与流之间，也有助于确定我们正在疑惑什么。

六 社会和文学理论中的相关性空间

可以发现，怀特海提到的“摇摆”遍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理论。在德里达、福柯、哈拉维，或者最谦逊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家的著作中都可以发现这种“摇摆”，那些社会学家，在一种扩大的然而惯常是统计学研究结束后，当他们不能确定研究的范畴是否正确时，或者如果存在着破坏性的反馈结果，那种结果使得研究过程之初看起来有意义的实体最终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们往往不知所措。“摇摆”往往最终倾向于落在分界线的一边，这使得那些实证主义城市社会学家或者城市经济学家阅读德塞图或列斐伏尔有关城市空间生产的论著时往往茫然不解。

268

尽管我集中于莱布尼茨和怀特海的理论，将之作为基本论点，不过，也容易从其他作家那里得到证明，例如，德塞图认为相关性观点具有很强的尽管是隐蔽的存在状态。席美尔在其富有洞察力的《桥与门》一文中便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对我们来说，外部事物的形象具有模糊的维度，因为透过外部性质，任何事物都能被看作既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物质和能量的连续变化把万事万物都带到同其他万事万物的联系中，并使所有个别要素组成了一个宇宙。然而，另一方面，在无情的空间分裂中，物也会消失；物质的任何一个细小组成部分都不可能与其他部分共享空间，而且就空间意义来说，并不存在多样性的真正统一。根据同样的自我排斥概念要求，自然存在似乎在根本上抵制对它们的任何应用。（Simmel, 1994）

席美尔继续讨论诸如筑桥(用怀特海的话来说,把现象联系起来并使之成为一种“包容性统一”)、建屋、造门(切下一部分“空间的连续性和无限性”,并把它们安置到“一种与单个意义一致的特殊统一之中”,因此,“一部分空间集合起来并同整个余下的世界保持分离”)的人类行为如何穿越了分界线,从而作为社会生活的矛盾规定发挥作用。他最后指出:“从它们各自给人的印象的侧重点来看,桥显现了人类如何将自然存在中分离的部分统一起来,而门则显示了人类如何将一体化的连绵不尽的自然存在分离开来”。这正是怀特海的理论。

有趣的是,海德格尔差不多反思了同一个主题。空间接受来自地点的而不是“空间”的存在。他论证道:

在桥诞生之前,地点并非已经在那里存在。在桥矗立之前,沿着河流当然存在着一些被某物占据着的许多点。它们之中的一个结果被证明是地点,就是因为桥。因此,桥首先并不是占据它的地点;毋宁说仅仅因为桥,一个地点才存在。(Heidegger, 1971:154—155)

269 因此,他主张:“筑造行为更接近空间的本质以及‘空间’本质的起源,而非任何几何学和数学。”在此,海德格尔实际上阐明了他自己对时间和空间相关性理论的特殊见解,试图把流和变的世界同永恒的世界联系起来。

事实上,类似相关性观点已经由不同传统——宗教的、生态的,有时是保守的,以及激进的和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的更广泛的思想家所阐明。这种多元性不应该令人吃惊,因为任何诉诸辩证法或内部关系哲学的行为——或明或暗——都会产生时间和空间的相关性观点。此外,最有影响的相关性观点出自莱布尼茨和怀特海(两者都有显著的神学兴趣,带有可观的政治保守主义色彩),这一事实表明,它绝非同激进政治学必然地联系在一起,毋宁说,对内部关系的辩证法哲学的重视激发了激进主义(参阅本书第三章)。相关性观点具有激进潜能;这

对于把任何大规模的解放变迁理论化都是一种必要条件。至于那究竟意味着什么，简要地观察内部关系和有关的时空相关性观点在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著述中发挥作用的方式，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1. 巴赫金

在其早期文本《艺术和责任》中，巴赫金完全依据“我”和“他”的时空关系来阐明价值和意义理论。巴赫金承认个体感觉经验和个体唯一性的首要地位（即要素、物和身体已经存在），但他主张，无论如何。这不应该使我们陷入主观主义。如霍尔奎斯特指出的那样：

承认我们所有人都是唯一的，其首要含义便是那种悖论性的结果：如果想要自我完善的话，我们就注定需要他人。远非赞美唯我论的“我”，巴赫金只是把自我的唯一性设定成他人必然存在的条件。（Holquist, 1990: xxv）

这种对话性的和相关性的自我概念（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必然的辩证法）在时间和空间中发挥作用。如巴赫金在其后期有关“时空体”的著述中进一步澄清的那样，“时间的关系和空间的关系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它们两者在文学中就如在生活之中那样是不可分离的。霍尔奎斯特如此概述了巴赫金的论点：

作为一个在特定时间和空间诞生的身体，作为一个将在同样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消失的身体，我差不多体现了唯一的时空片断。因此，作为体现其他无限时空一般特征的特殊方式，我亦是把特殊价值赋予抽象时空的工具。就其本身来说，时间和空间既没有价值也没有意义，因为价值总是相对于某个人而言的：“严格地说，地理既不知道近也不知道远，既不知道这里也不知道那里……同样地，历史不知过去、现在和将来……当然，历史时间自

身是不可逆的,在其中,所有的关系都是偶然的和相对的(并且可逆的),因为不存在(某种由个体主体情境所提供的)绝对的价值中心。”

个体必然根据他们的情境创造出自己对时间和空间的评价。从这一点出发,巴赫金推断出莱布尼茨早先认识到的那种纯粹“透视”角度。巴赫金写道:

当注视对面另一个人时,我们具体的、实际体验的视野并不一样。因为那样一个时刻,不管我注视的这个人的位置如何,以及与我如何亲近,我总是能看到在他位置上所看不到的东西;他看不到自己身体的许多部位(头、脸和表情),看不到自己背后世界,看不到许多物和关系——在我们的相互关系中,我是能够看到的,而他则看不到。当我们相互注视时,两个不同的世界反映在我们的眼中……为了完全消灭这些差别,必须融为一体,成为同一个人。(Bakhtin, 1981:22—23)

但是,价值不仅取决于“我”与“他”在时空中的关系,而且也根据社会实践和社会/权力关系而改变。因此,这种透视观点依靠社会实践的连续变化,融合成一种更为普遍的时间和空间相关性观点,这些实践通过在“我”和“他”之间创造一种特殊的时空纽带,而赋予其价值。这与穆恩的观点(参阅本书第九章)有点相似,穆恩认为,待客和库拉贝壳交换打开了新的自我—他人关系的时间/空间,价值便通过这种时空实践而产生。巴赫金同样揭示了“价值”、“交换”、“他性”以及各种异化形式的复杂性,马克思曾经对这些东西十分着迷。他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把时间和空间的社会构造带到价值理论的最前沿,而马克思仅仅以间接方式提到这些问题。“每种有价值的东西,每一个受好评的事物都必然在时空中实现它的全部潜能”(Bakhtin, 1981:167)。马克

思和巴赫金都同意，人类“从事意义的生产”，而意义是“价值的表述”（Holquist, 1990: xii）。他们也都同意，“我们必须在社会关系层面上来研究价值和交换的真正意义”。像马克思一样，巴赫金也主张这些过程的物质性。从这一点看，把他同康德时空概念区别开来的就是：他绝非将之视为先验的，“而是将之视为最直接的现实的形式”（Bakhtin, 1981: 85）。这就使巴赫金与怀特海而不是莱布尼茨相一致。不过，巴赫金强调个体性和社会关联的时空条件，并因此走向一种时空相关性观点，这最终深刻地影响了他对语言、身体以及所有再现体系（特别是那些在文学中建立的体系）的理解。他的“时空体”理论——实际上依赖文学文本中时间和空间的不可分离性——完全源自一种相关性观点。

2. 奥尔曼

奥尔曼依据莱布尼茨、斯宾诺莎和黑格尔传统来定位马克思的辩证法，他认为马克思唯物主义地解释了内部关系哲学。奥尔曼的观点大致如下：马克思的全部范畴——诸如资本、劳动、自然、国家、商品和货币——都是关系性的。“这些关系都内在于每一个要素（它们是本体论的关系），因此当一种重要要素发生变化时，要素自身也就改变了；它变成了其他的东西”（Ollman, 1976: 15）。因此，如果不研究它使诸如商品、劳动、性别、身份、货币、资本和国家等各种其他意义内在化的方式，那么要理解像“货币”这样的范畴是不可能的。

在《异化》的两个附录中，对于那些反对内部关系哲学的意见是如何运作的，奥尔曼提出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洞见。例如，他承认斯特劳森反对意见的有效性，后者认为，特殊性、个体等不可能与既定的关系理论相一致，但是他指出后者的著作“从头到尾都只是在断言人们相信世界是由特殊的物（客观的特殊性）所组成的，并且只是把寻找支持这种观点的理由作为自己的任务”（Ollman, 1976: 256—257）。这样，斯特劳森容易受到“一种先验的人类学”的指责，这种人类学假设，世界绝不会（也不可能）以不同于当代常识确定的方式来设想。更重要的

是，奥尔曼重新阐明他的有关内部关系哲学的观点，“特别强调了辩证的同一性概念”：

如果马克思同等地考虑同一性和差异，那么在他思考的顺序中，首先是同一性，然后才是差异。作为他观察世界方式的一部分，马克思把同一性视为当然的。在差异被指明之前，它是整体之相互独立方面之间的关系。这些因为不明确而尚未命名的方面，通过它们相互之间的内部关系而共同包含在同一整体之中。
(Ollman, 1976:266)

272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同一性和差异是相互排斥的，但是内部关系哲学却不仅使我们拥有一个与原子论或形式主义解读完全不同的总体性概念(参阅本书第二章)，而且也使我们“看到包含差异的同一性，反之亦然”，并因此远离斯特劳森的“非此即彼(either/or)”逻辑。在这种图式中，差异是由看待总体性的视角而非某种假定明确定义的、孤立的、作为总体性自身的实体来给定的。当然，这种本体论转换对当代有关同一性和差异的争论具有巨大的意义。各种证据充分说明：只有通过借助这种本体论转换，我们才能建立一种理解资本主义(以及其他社会体系)的真正辩证方法。

奥尔曼承认，他自己的著作本身就是关系视角的，是从一种特定视角建构的，因此不能被解释成对总体性的完整再现。如果“相关性观点既承认存在着多个分析的出发点，又承认多种总体性(结构化的整体)”(Ollman, 1976:266)，那么所有的理论都必须被视为“对同一体系的众多的单方面(单一维度的并因此不完整的)理解”。因此，我们必须学会“以一种与其他解释兼容的方式来解释每一种理论”。多个“窗户”——我们透过它才能看世界——生成了多种理论视角(如莱布尼茨承认的那样)，这些视角并不必然就是相互排斥的。如我在下文表明的，立场理论——哈拉维和哈索克(Haraway, 1991; Hartsock, 1983)提出的那种——具有某种相同的性质。

但是奥尔曼故意不考虑时间和空间的相关性质。鉴于时间和空间概念在斯特劳森对特殊性的研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以及他对相关性观点（并且他把莱布尼茨的观点看作是一种方便的陪衬）为什么必然失败所做的解释，这就显得很奇怪。因此，我们有可能把奥尔曼的理论解读成在康德时空框架中发挥作用的内部关系理论，而对我来说，任何辩证理论的真正精神都在于时空相关性观点。因此，比较一下奥尔曼和列斐伏尔，这将有助于说明问题。

3. 列斐伏尔

在《空间的生产》中，列斐伏尔严格地把自己定位在我们一直分析的那种思想传统中：

一个新的概念，空间生产概念，一开始就出现了；它必须以这样一种使过程清晰显现的方式“发挥作用”或“运行”。不能同这些过程相分离，因为它就是其产物。因此，我们的任务是使这个概念摆脱一切束缚，自由地发挥作用，虽然如此，却没有模仿黑格尔的方式使它自己作为概念具有生命和力量——换句话说，没有使知识成为自主的现实。

273

列斐伏尔直截了当地反对“长期以来作为‘常识’和‘文化’素材的笛卡儿模式（因其广延把物作为思想‘客体’）”。因此，他对斯特劳森祈灵于常识这种做法的回应，几乎没有任何疑问。列斐伏尔欣然接受莱布尼茨的路线：

以其“纯粹性”来构想的空间……如莱布尼茨表明的那样，既没有组成部分也没有形式。它的部分是不可认识的，在这方面，它很像“纯粹的”同一性——因为它的“纯粹的”形式特点，它自身是空洞的。在任何规定可能存在之前，某些内容必须开始生效。

那种内容即是行动，它承认部分，并且在那些得到承认的部分之中，它亦承认秩序，并因此承认时间。否则，差异就得不到**思考**——仅仅**被考虑到**。(Lefebvre, 1991:297)

在其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中，列斐伏尔主张：

商品世界随后引发了某种对空间的态度，某种施于空间的行动，甚至某种空间概念。实际上，所有由黄金这个交换之神凭空建立起来的商品链、循环体系和网络，都具有一种明显的同质性。然而，在商品链中，每一个位置和环节，都被物占据着。……因此，商品空间可以定义为由各种特异性组成的同质性。……按照这种方式理解的空间，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除了其所有组成部分的可交换性，它没有具体的存在，所以抽象的；它在社会上是真实的，并且同样地存在某处，所以又是具体的。这就是空间，它是**同质的然而又被分解成碎片**。(Lefebvre, 1991:341—342)

正是在此处，列斐伏尔最清晰地表达了他对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作为实际体验到的空间”阻止“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

社会政治矛盾都是在空间中产生的。因此，空间矛盾推动了社会关系矛盾的产生。换句话说，空间矛盾“表现”社会政治利益和力量之间的冲突；只有在空间中，这种冲突才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样，它们就成为空间的矛盾。(Lefebvre, 1991:365)

274 列斐伏尔以这种方式一方面承认公共时间和空间的调节性力量和权力，莱布尼茨认为它必然产生于“相互关联和联系”的条件，另一方面也认识到空间内部的斗争转化成了改变空间自身的斗争。换句话说，当社会关系、行为和“行动”在空间内部改变时，它们可能导致空

间意义和测量标准的彻底改变。冲突性社会过程表现为冲突性的时空形式。

七 时空中的身体概念

那么，怀特海在其分析一开始就诉诸的身体的“共与性”，这将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呢？首先，请注意，在莱布尼茨那里，物理的身体概念在根本上与原子论的以及笛卡儿的身体概念是不同的，而这是其时间和空间相关性理论的必然结果。莱克勒克以如下方式描述莱布尼茨的观点：

所有被归于身体属性的特点——广延、稳定性、硬度和不可入性等——根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属性**，而必需当成**关系**来分析。因此并不存在着简单的身体，如原子论者想象的那样；身体必然是一种多元性，身体的特点是作为其组成部分的物理存在之间的关系。在此我们再次看到**关系**的根本性地位。（Leclerc, 1986:32—33）

今天，人们常常假设物理意义上使用的“身体”概念和人类身体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对莱布尼茨来说，无论如何这并非显著的或者不能接受的。马丁认为，莱布尼茨大部分哲学思想，特别是《单子论》的思想，都立足于一种简单的断言，即“我感到自己是真实的存在，因此现实最终意味着像我这样的存在物”（Martin, 1964:174）。在此，莱布尼茨运用了一个经典比喻，该比喻不是把人类身体理解为一束封闭的和受到限制的主体和欲望，或者一束力比多、自我及本我，而是一种和谐体，它的健康完全根据它在微观宇宙中获得的对根本的宇宙和谐之反射性理解的能力来衡量。莱布尼茨不仅把物理身体用作实现他的科学目标的主要比喻，而且接受了中世纪那个命题，即宇宙的宏观世界总是同自我的

微观世界共同存在，即使自我由于位置性而被限制在对宏观宇宙的想象之中。因此，早期物理学的语言如此高度关注“身体”（神圣的、静止的以及其他的），这并非偶然。

但是，如果不同时承认怀特海所称“身体的感性表现”的重要性，我们就不能继续深入。这也是受各种形式变化支配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构造。例如，人们一般认为拉拍雷实现了一场根本性转变，在那一时刻，人类身体从与自然世界的复杂纠合中诞生，从而主张其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独立身份：

“肉体基础”的突起和有孔部分会取消它的定位和限制，并把它同自然的其他部分联系起来……这种观点很流行：夸大肛门期性欲和胃的功能，强调生与死以及变老和返童之间的质变，看重自然的繁殖力和生产力。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崇高的和理想的东西平庸化，成为世俗的和物质的东西。奇形怪状的身体被想象成无个性的、不完善的并与大地纠缠不清的东西，大地生育了它，复又使它消亡。（Gurevich, 1985:53）

这种奇形怪状的身体完全与文艺复兴透视的纯粹线条和清晰性以及高贵形象（诸如，列奥纳多·达芬奇所描绘的著名形象）相差甚远。但是在此，我们开始看到围绕和定义身体意义的不同社会过程之间的冲突故事。巴赫金(Bakhtin, 1984)把奇形怪状的身体形象和拉伯雷的语言与市场的出现联系起来，市场在某种意义上是“外在于”其他社会控制形式的一种根本性制度（它常常在物理上不受城墙的限制）。市场之粗俗的、污秽的、质朴的和唯物主义的語言决定性地影响了整个再现体系以及身体的自我再现。

通过对比，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 1978)提出了一种进化的和发展的身体观点，他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由庄重行为、风度、礼节、服饰代码等支配的教化过程塑造和重新定义了人类的身体。西林以下列方式概述了埃利亚斯有关“新人类身体”的结论：

现代西方社会之教化身体是高度个性化的,因为它与社会和自然环境保持着严格的界限。教化身体还具有理性化的能力,能够高度地控制它的情感,能够监视它自己和其他身体的行动,并能够把那些严格限制的规则内在化,这些规则规定了各种场合的恰当行为。教化身体与中世纪早期的“未教化”身体形成对照,后者与社会和自然环境只保持了较小界限。未教化的身体很少被规范限制,直接表现情感,并且试图不顾他人的幸福而满足身体欲望。

对巴赫金和埃利亚斯的比较暗示着不同的身体被完全不同的社会过程所生产/再现,并且由于身体所处的不同社会过程,阶级、种族、性别差异极大地影响了人类身体。近年来,在许多与人类身体史相关的文学研究中,这种一般性的观点反复出现(例如,参阅斯塔福德的作品以及有关《人类身体史散论》的系列)。当然,这是布迪厄在《区隔》中首要追求的根本论点,在那本书中,他努力地证明阶级区隔如何作为不同形式的物质和文化资本内化至个体身体之中。文明行为以及与其对照的所谓下层阶级的不文明,这种观念在当代有关“下层阶级”城市生活之堕落质量的话语中是一个极其强大的主题。但是,即使人类身体或许是万物尺度,由于内化在身体之中的物质和社会过程的力量以及被赋予身体的变革能力,它也总是一个随时会发生变化的未完成规划。

276

时空的生产不可避免地同身体的生产联系在一起。列斐伏尔抱怨,“随着笛卡儿逻辑的出现,空间进入了绝对王国……空间最终通过容纳它们而统治全部的感觉和身体”(Lefebvre, 1991:1)。列斐伏尔和福柯(特别是在《规训和惩罚》中)在此从事着共同的事业:把感觉和人类身体从人为的时间和空间世界的绝对主义中解放出来,这是他们解放战略的中心。这意味着对机械论和绝对观点的挑战,从那种观点看,“人类身体的共与性”被包含和束缚在当代条件之中。这不是一种全新的规划,如伊格尔顿指出的,它一开始就是整个美学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Eagleton, 1990)。

不过，我们在此遇到一个特殊难题。一方面，回到作为全部经验源泉(包括时间和空间源泉)的身体成为挑战整个抽象网络(科学的、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网络)的手段(在今天越来越具有优先地位)，借助于那些网络，社会关系、权力关系、制度和物质实践得以定义、再现和调节。另一方面，人类身体能脱离不在时空规定的社会过程。回到身体或许证实了那些据说正受到反抗的社会过程的时间和空间。例如，如果工人被转化为资本的附属物(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明的)，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在消费领域(或者，如福柯更喜欢说的那样，由于18世纪以来强有力的规训机构的兴起，身体被改造成温驯的身体)，那么他们的身体又如何能够脱离资本循环或者各种规训他们的机器，而成为万物之尺度呢？或者，套用时髦的说法，如果我们都成为电子人(如哈拉维在其著名宣言中所主张的那样)，那么除了欣然接受那种作为我们身体之延伸的机器以及作为机械之延伸的身体，我们如何能够衡量万物呢？

277

当代对身体的着迷，以及痴迷于向作为所有基本经验场所之身体的回归，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对理论抽象之更真实基础的探究的一部分，那些理论抽象作为纯粹的抽象已经统治得太久了(例如，城市规划理论)。哈拉维声称：“客观性最终与特殊的和特别的体现有关，而肯定与那种承诺超越全部限制和责任的虚假幻觉无关。”(Haraway, 1991:190)但是，困难在于，我们正在回到某种社会地生产出来的身体。成为万物尺度的，到底是哪一种身体呢？它测量什么东西，又如何测量呢？

让我们考察一下伊丽莎白·格罗兹最近的表述，它对回应和解决这些难题都有点用。她的目标是“探究肉体存在和大城市之间的构成性和相互决定的关系”。她把身体定义为：

一系列不确定的、无定形的、不协调的潜能，它们需要社会触发、排序和长期的“管理”，以及由“权力微观技术”来调节。身体成为人的身体、与精神空间和“形状”一致的身体、其表皮限定在精神单元的身体，并因此成为规定经验和主体性界限的身体，用

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这是通过他者(母亲),以及最终**大他者**或**象征秩序**(语言和由规则统治的社会秩序)来完成的。在这种被生产出来的身体之主要结构原则中,有些是被(家庭秩序安排的)性别欲望(他人的欲望)所铭写和编码……(以及)……被一套社会地编码的意义和含义所铭写。(Elizabeth Grosz, 1992)

这种定义(我已经缩写)与相关性的和以过程为基础的自我概念类似,那个概念我们已经在古列维奇、穆恩和斯特劳森甚至奈斯的深度生态学那里遇到。身体从外部测量的东西是它内在化的东西的结果。格罗兹揭示了:

身体在物质上、社会上、性别上、话语上或表象上得以生产的那些方式,以及,身体反过来重新铭写并把自己投射到社会文化环境之上从而使环境既生产又反映身体的兴趣和形式的那种方式。

这是对马克思有关社会和环境变迁辩证法观点的完美理解。“城市”被理解为:

复合的和交互式网络,它常常用大量想象的和真实的、计划的和实际的建筑、地理、市民的和公共的关系以一种非一体化的和实际的方式把完全不同的社会行动、过程和关系联系起来。城市使经济和信息流、权力网络、位移形式、管理、政治组织,个人间的、熟悉的和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以及空间和位置的美学/经济组织整合在一起,从而创造暂时但又不断变化的人造环境或背景。

278

城市也是过程的产物,它是:“一系列根本分裂的体系和内部联系,一

系列完全不同的流、能量、事件或实体，以及空间，这些东西暂时地聚合成一体或处于分散状态。”但正是在这点上，格罗兹出现了口误。她把身体与城市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两种兼容的永恒(实体)之间的关系。没有人尝试过在不同规模的不同过程之间建立协调(兼容)的条件(尽管实际上这种条件最终是可以建立的)。城市“提供了自动地把其他不相关的身体联系起来的秩序和组织”。它“把银行家的富裕生活方式和流浪汉的贫困生活方式联系起来”。它是“身体社会地、性别地和话语地生产出来的条件和环境”。这种令人遗憾的口误把身体和环境过程与不同规模的独特时空性和价值图式之间的密切关系转换成两个完全不同的实体之间的直接关系。像谈论身体那样的“物”一样来谈论城市，这是没有意义的(例如，它的边界非常模糊不清，并且，尽管它通常具有制度，但却没有精神甚或人类具有的那种力量)。存在着规模的混乱，也存在着理解永恒性方式的混乱，这些混乱破坏了对“人类身体及其环境的共同生产”进行潜在的令人感兴趣的分析。城市/身体的相关性共同生产理论提出了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主张，“如果人类身体并不是在文化上事先决定的，那么人造环境就不可能外在于它们生产的身体”，尽管急剧的环境变化可能会产生压力，且某些人造环境对身体健康和幸福也没有什么好处。我将证明，这是相关性观点在其中失控的典型情境。存在着谁比谁更重要的问题，例如，谁的身体生产了城市，以及谁的身体住在其中。如果地主、开发商、银行家、承包人、建筑师、规划师和政府有权生产我们居住其中的城市人造环境，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建造大部分人口以一种不能复归的方式与之相异化的城市景观。关系的内在化并不意味着这些关系的非异化形式，虽然它确实引起了对全部异化理论的质疑。异化理论总是假定一个事先就获得的自我本质，我们违背并且需要返回这个本质(参阅本书第八章)。虽然身体可以把这种过程的结果内化，但它恰恰因为自己的异化而不能独自地衡量、评价和理解它自己通过城市化而进行的生产的动态。

279 把身体理解为“差异游戏”和“异质性内在化”的场所，这种当代(后现代)观点似曾相识，并且造成同样的危险(参阅本书第十二章)。

但必须理解：人类身体是一个战场，各种时空性生产的力量在其中并围绕它永久性地竞争。在对种族化城市空间中打上种族标记的身体进行分析时，戈德堡便持这种观点(Goldberg, 1991:188)，将成为“万物尺度”的身体就是各种创造它的力量的竞争场所。

八 赛伯空间中的身体

这种竞争在“赛伯空间”的“虚拟世界”中非常明显。莱布尼茨：

是基本的哲学引路人之一，他引导我们探究网络空间内部结构。他的逻辑、形而上学以及表征性符号的概念，向我们展示出网络空间隐蔽的内在基础。同时，他的单子论形而上学提醒我们警觉种种悖论，这些悖论有可能会使网络空间的未来居民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Heim, 1991:67—73)

海姆继续评论道，单子可能“没有窗户，但它们的确具有终端”，并因此能够创建自己的对应原则，脱离身体的存在去建造网络、BBS和虚拟社区，成为：

社会原子主义的解药。它们使单子聚集起来。它们起到社会节点的作用，为那些变动不居的单子培育多重可以随意选择的亲和关系。事实上，日常的城市几乎不支持这种亲和关系。(Heim, 1991:67—73)

身体和机器之间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不清：

穿透屏幕涉及从具体观察者之物理的和生物学的空间向赛

伯空间之象征的和比喻的“交感幻觉”的状态转变；空间是强烈的重塑体现欲望的地点。……总而言之，在资产阶级现代性框架中建立的单一的、受限的和得到安全保障的身体正经历着渐进的转换过程：转向赛伯空间社区之重塑的和重新注册的体现……幻觉的虚拟世界的建设者们的话语充斥着想象的身体形象，摆脱了肉体强加的限制。赛伯空间的开发者预见了他们能够忘记身体的一种时间。（Stone, 1991:107—113）

280 赛伯空间使这种乌托邦想象成为可能，即能够生活在摆脱物质限制的“莱布尼茨奇想”之中。“空间的非物质化”——最终由资本主义的空间和时间技术所消灭——自身成为媒介，通过它，最终的上帝诡计得以发挥作用。我们每个人都能像一个小小的神仙在赛伯空间中自由地翱翔。我们每个人都采取多种角色。“社会与自然以及生物与技术之间的边界”具有“充分的渗透性”，而社会空间开始看起来“同时是自然的、人工的并由铭写构造的”。但是，斯通继续问：哪一个人决定何种身体在赛伯空间中被铭写呢？

在阐明赛伯空间系统的过程中，工程师们必须模拟认知和社区，并且因为社区是由身体居住的，他们必须也同时模拟身体……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表达的是自己对身体和社会性的假设，并把这些假设投射到定义赛伯空间系统的符码之上……当前围绕赛伯空间形式和本质进行争论的许多工程师都是一些年轻的计算机专家，这些淘气的男孩大都十八九岁或二十出头，他们着迷于那些在青春期后期的男孩总是会着迷的东西。这些相当朝气的群体将创造在赛伯空间中再现身体的那些符码和描述符。

《时代》杂志封面上的由计算机生成的多种族景象是这种被赋予真实表现形式的梦想的典范。但是，在所有这些虚拟的身体背后，都潜藏着

真正的身体，尽管它们依赖控制台。斯通评论道：“生命是通过身体生存的”，虚拟社区“源于身体，且必将回归身体”。我们也许渴望在嵌入机器的意识中实现莱布尼茨奇想，但是大量迹象显示，人类身体之不可还原的物质性将把我们带回到怀特海的唯物主义—经验主义的表述中。一般认为威廉姆·吉布森在其歹托邦小说《神经漫游者》中杜撰了赛伯空间这个术语，他在这部小说接近尾声的地方虚构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时刻，在这个时刻，小说男主角人凯思通过其他人的眼睛看到了自己。他通过：

莫利的一只好眼睛，发现自己正盯着一个脸色苍白的瘦弱的人，这个人以胎儿一样自由蜷缩姿态漂浮着，大腿之间是赛伯空间平台，闭着的眼睛上方是一束银色的东西。那个人的两颊凹陷，满是短短的黑胡须，脸上淌着油油的汗。他正看着自己。
(William Gibson, 1984:256)

要理解所有这些全新的时空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将需要历史的一地理的唯物主义眼光。

在人类身体上发挥作用的过程正在变化，并且人类身体的细微差别如其同质化那样显著。因此，我们的“万物尺度”自身是不稳定的且相互冲突的。它总是如此。因为如哈拉维在其对有关客观性是以具体的和情境化的知识为基础的研究中评论的那样：

281

女权主义的体现……不是在女性或其他物化身体中的某种固定位置，而是多个领域的结点，多种方向的变形，以及对意义之物质—语言领域中差异的责任……我赞成地点、位置以及情境的政治学和认识论，在那些地方，局部性以及非普遍性是人们做出理性知识主张的条件。这是对人们生活的主张；源自身体——总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的，不断构造和结构化的身体——的观点，与

源自上述的、源自无处的、源自简单性的观点相对。(Haraway, 1991:195)

我们身体的感觉表现如何在医学影响下不断地变化,对这个问题,马丁提供了一种令人感兴趣的个案研究。她主张,我们正见证着“身体知觉和实践方面的戏剧性变化,从适合于福特制大规模生产时代并根据其来构想的身体,转向适合于弹性积累时代并根据其来构想的身体”(Martin, 1992:121)。她指出,用以理解身体的比喻已经发生了转向,从中心化的和在等级上结构化的细胞生物学控制体系(一种福特制类型的概念)向另外一种免疫系统的描述转变,在那种系统中,身体被视为“一种改造过的交流系统,由一种流动的且扩散的命令—控制—智能网络所支配”,特殊性、弹性和快速反应的目标都属于这个网络(一种建立在弹性积累政治经济体系之上的比喻)。但是,在其人类学著作中,马丁还引了另外两则有效的信息。第一个是身体细胞的自我意识观点,就好像它们同意识是分离的(在她的研究中,被一个应答者的陈述所获得的一个分裂空间的主题:“我作为一个有意识的人与内在于我体内的细胞没有联系。”)。第二个是由被调查者所获得的那种感觉:“想象不到之小和想象不到之大接合在同一个形象中,力量存在于细胞之中,个人成为对内在于自身的其他力量进行观察的人。”那个被调查者用莱布尼茨肯定认可的语言说:“当你思考自己身体内部的时候,我则在考虑外部的空间。就好像那些是唯一像这个的物,你知道,它们离你很远。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外部空间像是在那儿,而你的身体则在这里,但这是一样的,是同一回事。”(转引自 Martin, 1992:125)在此,相关性观点似乎是生动的和适当的,而且考虑到这一点大概也是明智的,即随着社会过程不断变化的时间和空间定义如何影响着身体概念以及相应的同一性、特殊性概念,以及,人体在事物的规模上所处的位置。

九 各种制图法

在《第三世界的妇女和女性主义政治学》这部文集的导论中，莫汉蒂提出了一种相关性制图法的观点，用来描绘“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占据的世界的轮廓”。她描述的“斗争的绘图法”描绘了这样一个世界：

它横穿权力和抵抗的交叉线；这是一个只根据对性别、肤色、阶级、性和民族进行破坏性分割才能理解的世界；是一个必须通过重新设置中心的过程来加以改造的世界……因为想当然的中心（美国和欧洲）不再有效了。

莫汉蒂继续提出这个世界将如何绘制的问题：

我们根据哪一种/谁的历史来绘制这幅第三世界妇女进行女权主义斗争的地图呢？……谁生产了被殖民地人民的知识，又是从哪种空间/地方产生的？这种特殊知识生产的政治是什么？这种知识的学科规范是什么？用来定位和绘制第三世界妇女自我和力量的方法是什么？非常清楚，定义和语境问题总是交叠在一起的；实际上，当我们研究更复杂、更细微的提问方式时，当大量相关领域的学者们开始阐述必然相关的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种族以及性别的历史时，我们便在重新绘制和改造概念地图。我们如何想象定义和语境，我们根据何种基础使某些语境比其他的更为显著，以及我们如何理解正在发生的概念制图法的变化——所有这些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Mohanty, 1991）

我完全认同这种情感。但我还是要根据相关性时空理论来反思它。在第三章中，通过贝尔·胡克斯（“边缘的空间”）和雷蒙德·威廉斯（“在边界上”）之例，我们已经初步清晰地提出“立场”（positionality）和“位置”（location）问题。尽管在这两个例子中没有一个给出直截了当的世界地图，但重构其轮廓并不困难。对于威廉斯来说，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把南威尔士矿场的工人阶级世界同大都市（伦敦和剑桥）世界割裂开来。地理上的鸿沟使人联想到威廉斯与之终生斗争的基本的阶级分裂。对于批评者，尤其是来自被殖民世界的批评者来说，这道鸿沟像是帝国和都市高原上的小小皱折。对于胡克斯来讲，相似的鸿沟割裂了美国南部小城镇非洲裔美国人社群与大都市中心，但是她的地图以阶级、种族、性别和性身份的多重分裂为特点。威廉斯应该大致理解那张地图，但这并非其经验世界的地图。胡克斯可能理解威廉斯的地图，但不是理解它的内在意义。他们绘制了两张不同的世界地图，以特殊的方式定位自己与那些地图的关系，并寻求在特殊情境之外定义的政治行动和联盟形式。

最近一些年来，女权主义理论特别强烈地表达了对这个观点的直觉承认。“位置”、“情境”和“立场”都成为流行语，在论证（话语）形式中、在认同研究对象以及解释主客体关系中成为定位各种视角和权力位置的工具。但是，我们正在谈论何种世界地图呢？北美白种女性主义者刚绘制一张世界地图，允许她们有一席之地来挑战白种男性父权制和压迫，有色人种或者后殖民环境中的女性马上就会绘制一张完全不同的压迫地图。在这张图中，北美白种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似乎处于威廉斯的批判者发现的同一座帝国权力高原上。因此，我们面对的正是无数表面上看来并不兼容的世界地图，它们是从时空中特殊身体的“共与性”立场来绘制的。不同的投射（用我在导论中使用的术语来说）创造了完全不同的相关性关系。著名的卡通图“纽约人的世界地图”到处都被复制，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地图碎片、多样性的投射、统一的世界地图的分裂，而那个世界地图曾是文艺复兴以来数学家、地理学家和制图学家如此艰难地努力创造的。这样一来，我们如何理解这一点呢？

我要在前面章节描述过的“回到作为万物尺度的身体”和所有样式的斗争地图的绘制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在此，我认为莱布尼茨是特别有用的，存在着两种需要考虑的可能性。对同一世界的不同看法可能源自不同位置，同样，“同一个城镇从不同的侧面看起来完全不同”。这就是女权主义“立场”理论所实现的部分东西。马克思努力从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视角来创建一种科学时，他试图实现同样的目标。在这种解释中，全部世界地图都是同一世界的再现，但是每一个单子(身体)必然根据自己在那个世界中的位置而拥有自己的视角。根据嵌入特殊位置中的视角，不同的东西才占据优势地位、显得突出或者看起来遥远、不相干等等(让我们再想一想威廉斯与胡克斯之间的不同)。用莱布尼茨的方式来说，某些单子(身体)看世界朦朦胧胧，尽管其他单子会更清醒敏锐。但是，观察同一现实的多种窗户，就像我们可以得到多种理论表述，可能构成一种方法，从多种视角对同一现实进行三角测绘。学习从多种立场观察世界——如果这是可能的话——将因此成为更好地理解世界如何作为一个总体性运行的途径。多种多样的投射(数学的和精神分析的)大体上可以相互转换。那就是哈拉维所设想的方式。她把相对论和总体性作为“许诺通天之眼的上帝诡计”加以拒绝，而主张：

284

主体性的地形学是多维的；因此是一种幻想。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认知自我都是部分的，而绝非完成了的、整体的、简单地存在和保持不变；它总是被构造的，并且被不完美地缝合在一起，因此能够同他人合作，共同地观察而不会主张变成他人。这便是客观性的许诺；科学认知者寻求客观的而不是身份的主观位置；那便是部分联系的承诺。(Haraway, 1991:193)

这种来自不同位置的信息联系起来的技术是所有地图绘制的基本原则：要绘制一张精确的世界地图(再现)，我们至少需要穿越多个测量点的三角测量程序。我们也需要理解地图变化和投射的原理。

但是莱布尼茨也指出一种更加彻底的可能性。时空相关性理论表明：不同过程如何能够定义完全不同的时空性，并因此建立实体、位置和关系之完全不同的同一。对莱布尼茨来说，这只是对可能世界的一种理论探究，并因此只受想象力限制。但对于怀特海（以及巴赫金和列斐伏尔）来说，依据被研究的过程之本质，这些完全不同的时空性及其相关制图法都被认为是真实的。在这种解释中，我们似乎面临着无数不同的且完全无法比较的世界制图法。我们不能把一种投射（地图）转换成另一种。从所有这些多样性之中创制一张具有支配地位的地图景象，这是充满权力的支配行动。这是把单一的话语再现实践强加在多种制图法之上，是压制差异，并建立再现的同质性。这样做是一种典型的霸权话语战略，它产生了这样一种预期结果：抑制想象、塑造物质实践和社会关系及制度，从而产生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或者用福柯（Foucault, 1977）的话来说，占统治地位的规训权力。

285 文艺复兴时代全球地图绘制活动严格地说就是在西方支配下的这样一种实践。“帝国的注视”根据自己的需要、要求和欲望绘制世界，强制推行一张世界地图，从而抑制了差异。如苏哈特论证的那样，结果“剥夺了属下获得知识和身份的权力”（Shohat, 1991）。如我们已经在克罗农对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叙述中看到的，把时空秩序安排叠印在另一个社会之上便破坏了那个社会的再生产条件。因此，无数的抵抗地图——每一张都具有自己的特殊立场——能够被解释成与霸权世界地图（仍然由世界银行和IMF以及主要政府和公司所控制的那种地图）的斗争，但是每一种似乎也都无法同其他相沟通，就如它们无法与霸权地图沟通一样（尽管莫汉蒂的主张相反）。这与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理论在当前的后现代延伸相似，暗示着一个由许多生产者和消费者组成的“解释共同体”的碎片化世界，那些生产者和消费者拥有各种特殊的知识/经验/想象，在特殊的制度语境、特殊的劳动分工和社会关系样态中活动，并且在特殊时刻特殊位置上活动。各种各样碎片化的制图和无法比较的（和不可转换的）投射产生于身体在世界中的独特位置，同样，这些解释共同体之间的不可沟通性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成为碎片化的后现代

敏感性的永久性特点。

怀特海的理论同样告诉我们的是，过程不可能被解释成完全分离的。如果存在着过程之间的“协同”，那么就必定存在着不同时空性和制图法之间的“协同”（可共存性）。一方面，完全不同的绘图法必须得到尊重，因为它们在高度细化的社会生态过程中具有真实的基础；但是另一方面，把它们当成总体上没有联系的东西也是错误的。不管如何建构，空间性依然既统一又分离。理解这些联系（“协同”）是什么，这在政治上至关重要（例如，它为任何意义的战斗的特殊主义提供基础），就如它对社会科学和文学理论的重要性一样。这是一个反反复复爆发的问题。在依据体现和情境来探究客观性的新定义时，哈拉维主张：

地方知识也必须同生产结构保持张力，那种结构把不平等的翻译和交流——物质的和符号的——强加在知识和权力网络之中。网络能够具有系统性属性，甚至具有以中心来结构的全球系统的属性，它们的细微触须深入到时间、空间、意识和世界历史维度。（Haraway, 1991:194）

如果真的如此，那么我们就需要想办法发现和绘制这些系统，在地图中定位情境化知识，发现对于任何形式的政治联盟都必需的协同性。但是，如果不依靠以不同方式情境化的知识来揭示维持任何一种系统存在的过程的本质，我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十 货币/权力范围和抵抗范围

286

系统性的轨迹并不难识别。货币、商品、信息、人造制品、技术、象征体系的流动，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们都对身体的感觉表现产生了影响，都在价值关系的定义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都提供把全球时

间和空间协同起来的共同凝聚力。在那种时空中，各种各样的绘图法（具体化的理解）得到定义。货币亦是集中的社会权力形式，它对自我定义、霸权话语生产、制度运行以及生产和社会关联的物质实践都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

在当代，资本积累提供了一系列主人叙事，围绕它，无数其他的叙事得以定义。缺乏嵌于资本循环之中的货币化、商品化和交换关系，个体、自我、家庭、社区、民族、市民社会和国家都将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不重视这些主人叙事就要自担风险，因为忽视它们便是忽视至关重要的社会过程，情境就是根据这些过程才得以确定的。如席美尔很早就指出的(Simmel, 1978:437—438)，记住这点是有益的：把教学、写作和讨论(例如，有关不同的制图法的讨论)作为职业活动的知识分子，他们作为一个独立阶层的存在依赖充满权力的出身体系和剩余货币的流动，在一个非常复杂的交换制度的庇佑下产生，即观念和息通过“印刷资本主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语)而发生的交换制度。

因此，在持续资本积累条件下规定霸权性时空性形式的那些社会过程提供了一个共同框架——就像墨卡托地图那样——在其中并通过其，其他制图视角才得以表现、沟通和竞争。重视这一框架的某些特点是至关重要的。时空框架完全不是同质性的，而是表现出一种相当大程度的内在化的异质性，有时是本书第九章描述过的那种冲突性碎片。因为这个原因，我偏爱用一“系列”或“整套”的主人叙事，而非单一的“主人叙事”这个术语。成为金融市场和国际货币协调组成部分的时空性与工厂和设备固定资本投资的时空性完全不同，也完全不同于那些长期的和大型的环境改造计划，比如说，开发美国西部的那些计划。资本主义的内部难题在于，在这些完全不同的过程之间建立“协同”或“可共存性”机制。但是，如穆恩对加瓦案例详细分析所表明的，把

287 在不同水平(规模)上存在的不同时空性嵌入到社会过程的不同方面，从而获得某种全面的结构，这完全有可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究竟如何发生，这个问题无比复杂且充满争议，不过，已经形成的整套时空性却非杂乱无章，尽管它是冲突的和动态的。

这种整体并不是固定的，因为资本积累过程通过快速的时空压缩深深地卷入持续的变化以及迅速的时空转型之中(参阅本书第九章)。然而，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全球框架的无法理解的可能性，我们甚至能够记录其他形式的差异。在这种姿态中，可能会丢掉某些东西——为了揭示某种特殊的统治和权力关系的制图法而融入一个霸权的世界地图，这并不比为了抵抗压迫而不得不学习和使用压迫者的语言强多少(参阅本书第五章)。但也会得到某些东西——使迄今为止没有表达和不可表达的差异活跃起来。这种二重性并不会令人吃惊：毕竟，货币有能力把普遍性与所有形式的特殊性统一起来，这些特殊性范围很广，从资产阶级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的纯粹性到社区、家庭和民族等社会实践，如我在第九章论证的那样，这些实践建立在巨大的货币用法多样性的基础之上。同样地，社会地建构的时空性既是统一的又是分裂的。

我们可以想一想，人类自我/身体如何把货币价值内在化的，被生产出来的人类自我/身体又如何将自身(作为物质的和象征的资本)插入货币评价体系 and 资本循环之中的。在本章以及上一章，我已经证明，价值是一种社会地构造的时空关系。但是，货币形式——物——自身变成了时空社会关系的体现，并获得了自己的拜物教力量，把自己的魔力施加在自我/身体之上，甚至比加瓦曾出现过的巫术更具系统性和更加有力。

当奴隶、雇工或地位最低下的农业劳动者把他们能够得到的任何形式的货币转换成财富时，他们就获得家谱和象征，运用货币的力量来长期保存价值，一代接一代地维持身份。有些家族甚至在最必要时也不能卖掉“家族银币”，因为他们不愿意把作为谱系象征的宝贵财富变成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使它们重新开始短命的流通历程。那些最近从中国移民来纽约的“淘金者”，他们基本上都在不规范的血汗工厂里工作，一天工作12个小时，平均每小时2美元不到的报酬，其中许多只有十来岁(尽管法律反对使用童工)，他们服从使人身体精疲力竭的制度，不仅每天疲惫不堪，而且还产生了各种特殊疾病，如爆发性头痛等(Lii, 1995)。当第三世界的妇女发现自己陷于令人不快的紧张之中

时，即运用她们支配的任何稀缺资源为市场进行生产，或者保护传统实践、生态系统以及相关的社会关系，货币和权力的制图学的制定基本上也是为了反抗在时空中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的资本积累的霸权地图。当焦虑不安的银行家、政府官员和财政官员们，以及无数的 CEO 们发现自己陷入一种巨大的基金转移之中时（例如，1995 年几乎破坏了墨西哥经济的那种资金转移），他们也发现自己处在不受他们个人控制的社会过程之中。

让我们回顾一下席美尔的观点：

社会是一个超越了个体的结构，但那并不是抽象的。这样，历史生活就避免了要么是在个体之间，要么就是在抽象的一般原则之间发生的选择。社会是普遍性的，同时它又分明是活生生的。由之产生了独特的意义，交换即是作为事物相对性的经济—历史的实现，是为社会而进行的，交换以其独特性为个体造就了特殊的对象及其意义，它的独特性并不在于抽象领域，而在于生动的相互作用领域，这就是经济价值的实质。（Simmel, 1978:101）

批判性研究作为一种关系的货币，及其通过时空实践而进行的特殊的评价结构，为理解当代身体、身份和政治提供了重要的出发点。货币的社会权力迫使身体进入在特别的评价条件下进行劳动和工作的状态，那种评价条件只不过通过挣钱和花钱使欲望可能实现。但是，在此，理性消费教条（当然是从资本积累角度来观看的理性）也把欲望限制在一个根本没有出口的牢笼之中，不管欲望、活力、能量和想象如何艰难地试图逃出身体的牢笼。然而，身体介入社会生活之际亦有自身的目标和想象（如我们在第六章中揭示的萨加尔的例子），并因此获得改变它的力量，无论这种力量如何微小。我在第五章中已经指出，力量无处不在，而且尽管身体/自我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的改造工作可以被管理、被协调并被压制，但绝不会完全被支配。

金钱、时空性、价值以及身体不可避免地在资本积累的总动态中

相互纠缠在一起。理解其中一种就明白了其他东西，同时它清楚地阐明了情境和位置自身如何成为空间创造物的霸权过程的产物。尽管这并非我们可以参考的唯一社会过程，但要恰当地说明与众不同的情境、位置和地图是如何产生的，彻底理解它却是一个必要条件。

还存在着其他的协同可能性。当马克思恩格斯选择以下列著名口号来结束《共产党宣言》时：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他们所做的正是试图识别一种替代性评价形式，一种替代性的力量和行动的政治学，以及一种由完全不同的社会过程形式定义的完全不同的时空世界。这种声明通过那些痴迷于文学和社会理论的圈子传递出否定的震颤，要不就是剧变的震颤，当然，这也是这些(后)现代时代流行的怯懦的一部分。然而，对某种协同/共存性的替代形式的渴望(尽管最好的形式并非受《共产党宣言》强烈影响的那种)绝不消失。例如，它弥漫于生态运动，且每一种社会运动都反复地发现自己正面对那个难题：如何通过充分广泛的联盟网络来反对权力的霸权形式，从而确保自己的目标。德里达称为“马克思的幽灵”的东西将不会消散。

有趣的是，第一国际早期，在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和无产阶级以及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分裂发生令人不快的影响之前，把欧洲资本空间中的爱尔兰、英格兰、比利时、法国、德国以及瑞士的男女工人团结起来，这个社会主义计划的意义以一种常识的感动和敏锐穿越了无产阶级团结和民族差异的地形，而它们则在后来的国际主义运动(无产阶级运动和其他运动)中丧失了。非常清楚的是，把这种成问题的整体权利概念化，对于定义某种替代性的社会关系的和价值的地图至关重要。

让我们看一看这个图式如何在哈拉维的著作中得到回应和反响的。“女权主义的体现”：

不是在女性或其他物化身体中的某个固定位置,而是多个领域的结点,多种方向的变形,以及对意义之物质—语言领域中差异的责任……不存在单一的女权主义立场,因为我们的地图需要太多的比喻维度来建立我们想象的基础。(Haraway, 1991: 195—196)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290

反对统治团结和合并团结的理论和实践斗争,不仅摧毁了父权制、殖民主义、人道主义、实证主义、本质主义、科学主义以及其他无人惋惜的各种主义的正当性,而且全都要求有机的或自然的立场。我认为,激进的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也破坏了他们的/我们自己的认识论战略,而这是想象各种可能团结的重要步骤。(Haraway, 1991:157)

这些团结定义了何种可能的世界,这些联盟和有效的亲密关系主张什么,又通过何种“对话”和“翻译”(用哈拉维喜欢的两个术语来讲)来进行的呢?

为有效地反对“种族”、“性别”、“性”和“阶级”的统治而在政治上团结起来,我不知道哪个历史时期比现在有更强烈的需要。我也不知道哪个时期比现在更有可能建立某种团结。(Haraway, 1991:157)

资本主义积累或许定义了一种时空实践和评价的霸权体系,并且对身体、想象力和自我产生了无数难以估量的影响。但它并没有耗尽全部的替代可能性。在一个极具表现力的差异世界里揭示制图的类同和统一,这似乎越来越成为时代的关键问题。这是任何辩证的历史地理

唯物主义理论都必须完成的政治使命。但是，正如资本所为，这项使命必须依赖协同的/共存性的时空性整体的建设，与社会的、物质实践的、制度的和权力关系的世界保持着积极关系。

唯物主义的时空相关性理论发挥着关键的政治和科学作用。它不仅使我们彻底挑战通常分析和叙事处理时间和空间问题的反历史的、绝对主义的假设和虚夸——总体化的视野(不知从哪来的观点)，如果你愿意这么说——而且它也使我们抵制“无处不在的观点”，探询关系(协同和共存性)是如何在金钱的、神圣的和其他的身体之间建立的。相关性观点允许时空社会建构过程中的多样性，同时主张，不同的社会过程可能联系在一起，因此它们创造的时空秩序安排和抵抗性制图法也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发现这种联系的本质，学会从政治上在它们之间进行转换，这对于详细研究来说是一个难题。理论上，唯物主义的相关性观点的说服力和潜在力量，看来既是显著的和彻底的，也是辩证地可靠的。

第十一章

从空间到地方，再回看

一 问题

291 吉尔福德位于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霍姆伍德校区的正北，是一个有名的富裕小区。皮德蒙特高原与海岸平原相接处(位于流人大西洋水路上的著名的“瀑布线”，从佐治亚延伸至新英格兰，往西一英里，便是19世纪几个大的棉帆布工厂所在地，那是一个吸引人的地方)，有一块296英亩的地方，坐落于宜人的起伏地形。1907年，几个富裕的巴尔的摩人组成的辛迪加买下了这块地，来阻止土地投机开发。1911年，这块地转手至罗兰公园公司(它是英国剩余资本对美国土地进行开发的一个分支)，根据“可获得的最佳和最现代的城市规划方法”进行开发。基础设施和景观是按弗里德里克·劳·奥姆斯蒂德风格设计的(他儿子的建筑公司承担了规划，并直接采纳了这种核心理念：城市的乡村化是缓解城市生活压力的关键)，最终形成了20世纪20年代多种建筑风格混合而成的建筑物，分散在841块单独的建筑用地上。这些建筑都是开放设计的，多半没有栅栏和围墙，坐落在一些小公园中间的宽大曲折的街道上。但是，附近土地也按照一个严格的和排他性的契约——明显排斥非白种人和犹太人——出售了。20世纪20年代之后，吉尔福德，连同罗兰公园至它的西部，以及霍姆兰德至它的北部(全都由同一家土地公司开发)都成了那个城市中富裕的白种盎格

鲁—萨克逊人和主要的新教徒权贵们僻静的居住中心。

尽管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巴尔的摩市的经济一直受到各种磨难的困扰，但是吉尔福德一直努力保持其最初的特点（甚至在排他性的契约被解除后）。它的与众不同的氛围随着年月而成熟了，它仍然是一种宁静的森林环境，许多巴尔的摩人在春季常来这里欣赏盛开的山茱萸和杜鹃花。由于同它东边不富裕的和不同种族的社区保持严格的界限，这个小区部分保持着它的特点。作为隔离的物质标志和象征，一道坚实的墙阻止了人们从东边进入这个小区的大部分地区；唯一通往东部的路是一条只出不进的小道。

1994 年 8 月 14 日，一个星期天，吉尔福德发生了一起残忍的凶杀案。一对 80 多岁的白人夫妇，两人都是退休在家的著名物理学家，因受棒击而死在床上。凶杀案对于巴尔的摩人来说并不陌生（这个城市的凶杀案几乎每天一件）。不过，在媒体眼中，吉尔福德凶杀案是特别的。主要的地方报纸——《巴尔的摩太阳报》——用整版予以报道，而其他的凶杀案只受微不足道的关注。媒体花大力气渲染，吉尔福德几个月来已发生了三件类似案件，显然需要采取措施来保护这个社区，否则它的生存会面临威胁。长时间以来，吉尔福德社区协会鼓吹的解决方案是把该小区改造成由警卫严格控制出入的封闭社区。

在评论这个建议的时候，《太阳报》求助奥斯卡·纽曼，他在 1972 年出版了《可防御的空间》这本书，在书中，他认为“可防御的空间”一直都是城市安全问题的根本所在。《太阳报》报道，纽曼：

昨天说，他相信吉尔福德可以成为这样一种变化的好的候选地……“我认为，一块地已经指给我们了，在这里，易受犯罪攻击的城市区域将采纳这种哲学。……罪犯发现吉尔福德是个有机可乘的大好地方。你可以在夜里去偷一辆车子或一个屋子，逃出这个地方用这些钱去买毒品。”根据最近报道，在俄亥俄州的代顿市，一个叫做五棵橡树的社区变成了防御型的迷你社区，每个社区只有一个综合的出入口，交通事故下降 67%，暴力犯罪下降一

半。纽曼先生说：“贩毒分子、妓女、抢劫犯以及其他罪犯都不愿意进入只有有限退路的社区。”

《太阳报》继续指出，不过，这个建议“提出了种族和阶级划分问题”。因为提议建立的栅栏，全都在东边，这将把吉尔福德同其他邻里更进一步隔绝开来，那些邻里的居民主要是黑人和低收入人群，富人和白人邻里在西边，而北边保持不动。然而，《太阳报》整个报道的宗旨暗示着，犯罪是非裔美国人和“下层阶级”的习惯。因此，构筑栅栏反对有色人种和低收入人群，尽管令人遗憾，但也许是正当的。构筑栅栏旨在确保可防御的“社区”空间的安全，这样做是合理的。否则的话，那些富有的白种中产阶级人口将会逃离城市。必须确保地方安全，以反对不受控制的空间向量。

五天后，人们被告知，老人的一个孙子——不是流窜入室抢劫之匪——招认了谋杀罪行。这个招认再一次占据《太阳报》的整个头版。不过，这一次，语气完全不同了。报道说，城里几个著名的非洲裔美国人，包括市长，都“松了口气”（甚至有人说“洋洋得意”）：黑人与犯罪之间关系的老掉牙想象（在《太阳报》先前的报道中，“贩毒分子、妓女、抢劫犯以及其他罪犯”如此奇怪地被描述为在吉尔福德街道上闲逛的人）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另一个专家帕特丽夏·费尔南德兹-凯利则代替了奥斯卡·纽曼成为《太阳报》依据的专家，她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员和社会学教授。她在采访中说：

事实上，“犯罪”这个词变成了我们不能提的、不宜说出口的一系列担忧的容器；阶级和种族的容器……[它]变成了一种委婉语。谈论犯罪、盗窃、入室抢劫和谋杀，比提到阶级和种族要容易得多。这很能说明问题。这是真正的奥威尔主义，一种故弄玄虚。它是一种替代性语言，我们在谈论社会问题时不得不用语言。我们不能使用旧有的种族主义语言。我们想出各种在政治上正确的术语来谈论同样的问题。当我们说“犯罪”的时候，我们

实际上在说，我们害怕低收入阶层的黑人。

《太阳报》发表社论，主要是责备警察和城市官员而不是它自己的报道和因不恰当的联想而做出专家选择，社论主张，“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思考“我们”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如何本能地做出反应：“尽管设置路障和警报系统能够改变一个社区的周围环境，但它不能阻止罪恶。”

因此，吉尔福德是何种地方呢？它有一个名称，一种边界，以及与众不同的社会和物质性质。它在城市生活之流中已经获得某种“永恒性”。不仅对于吉尔福德的居民，而且对于整个城市制度（政府、媒体，特别是金融），保护这种永恒性都已经成为一种政治经济计划。并且，它具有话语的象征意义，大大地超过了纯粹场所的意义，因此，如新闻和媒体对凶杀案的反应所表明的那样，在那里发生的事件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吉尔福德显然以特别的方式与巴尔的摩市的斗争、权力和话语制图法相一致。但是，如《太阳报》前后两种不同的报道所表明的那样，不同的地图对它的定位不一样。

在下文中，为了确保诸如“地方”这种术语在时空和环境的一般关系理论背景中具有某种基本的意义，我将多次提到像吉尔福德这个例子。

二 某些关于地方的理论

无论以什么形式出现，与时间和空间一样，地方也是一种社会构造。这是我的基本假设。因此，应该一问的唯一有趣问题是：地方是由何种社会过程构造的。回答该问题的方式有两种。首先是重述时空相关性观点：

实体在它们的边界内以及它们创造空间之过程的内在秩序安排中获得相对稳定性，这是暂时的。这些永恒以排他的方式最终占据一块空间（暂时的），并因此定义一个地方——它们的位置

(暂时的)。地方形成的过程是在创造空间的过程之流中开辟“永恒性”的过程。但是“永恒性”——不管其看起来多么稳定——并非不灭的：它们总是作为“持续的消亡”而受时间支配。它们由创造、维持和消灭它们的过程而定。

因此，可以赋予地方双重意义：(1)仅仅是某种社会过程中建立的时空地图中的一个纯粹的方位(position)或地点(location)，或者(2)在时空构造及其转型中产生的实体或“永恒”。后一论点包括永恒(地方)得以建立的环境改造。意义上的差异是下列两种做法之间的差异，在世界地图的30.03°S和51.10°W坐标那里做一个标记，或者把一个城市称为巴西的阿里格利港。在后一种情形中，被命名的实体表明了在一个特定地点上某种有界限的永恒(无论它是否具有政府、社会组织、人造形式、生态结构等)。在这个和那个地方发挥作用的社会生态过程可能会改变时空秩序安排，从而破坏、加强或侵蚀那些特别的永恒，比如说，阿里格利港已经获得的那种永恒。关于地方，有许多不同的故事可以讲。地方会像巴赫金赋予小说的各种各样的时空体(chronotopes)那样复杂多变(Bakhtin, 1981:84)。小说之“具体整体”(类似于地方)由“时间的和空间指示器”的结合所塑造，所以“可以说，时间密集了，丰富了，变得在艺术上可见了”，与此同时，“空间对时间、情节和历史的运动变得敏感，并对其积极回应”。这就是地方在人类历史地理学中得以构造的方式。

第二种广泛的策略是回到第四章概述的社会过程的认知地图，并且把地方看作“想象的”地点，是“制度化”、“社会关系”的构型、“物质实践”、“权力形式”以及“话语”的环节。完整地说明所有这些方面需要另一本书的篇幅，在本书中，我只想说明所有这些环节如何典型地结合在一起。最终，我把地方理解为整个社会生态过程时空动态之中那些相对的“永恒”所具有的内在、异质的、辩证的和动态的构型。以本章开头例子来说，从社会过程的任一独立环节来理解吉尔福德都是可能的，但最有趣的是，它如何同时把各个环节的结果内在化，

并把它们结合起来。

三 资本主义条件下地方构造的政治经济学

需要思考资本主义通过把实际地方建成地球上相对永恒的物质和社会结构从而进行地理扩张的历史轨迹。或者，换句话说来说，思考一下地方如何在资本循环之流中被建成永恒性的。在其他地方(Harvey, 1982, 1985a, b), 我已经广泛地探讨过该问题, 在此我简要说明一下。

资本主义必然以增长为导向, 在技术上是动态的, 并且容易出现危机。地理扩张是它暂时地和部分地克服资本过度积累危机(闲置的生产力加上失业的劳动力)的方式之一。我称之为资本主义矛盾的“空间定位”。这一过程有两个方面。过剩资本能够在一种既定的空间关系中从一个地方(城市、地区和国家)输出以建设另一个地方(例如, 19世纪末英国的剩余资本输出到巴尔的摩投资土地开发, 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产资本从美国输出到海外)。如第九章中描述的那样, 通过技术和组织的变迁, 空间关系也可能发生革命。这种革命改变了地方之间的关系, 并且影响了地方建构、维持和瓦解的内在化过程(如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城市中最近发生的快速非工业化情况)。

在任何一种情形中, 新的地方网络诞生, 被构造成嵌入大地上的固定资本和矗立在大地上的组织化的社会关系、制度等构型。新的劳动领土分工、人员和劳动力的集中、新的资源开采行为和市场形成了。它们所产生的地理景观不是平衡发展的, 而是有极大差别的。通过不平衡的资本投资的简单逻辑、大量涌现的劳动力的地理分工、不断增长的再生产行为的碎片化, 以及空间上有序的(常常是隔离的)社会区分(如把吉尔福德同它周围环境分隔开来的那种区分)的兴起, “差异”和“他性”在空间中被生产出来。

这一过程中间存在着张力。首先, 它是由空间生产中的阶级斗争以及通过空间生产进行的阶级斗争来表明的。再次, 投机性要素(像所

有资本主义发展形式那样)很强,常常使资本的一个派系与另一个派系处于竞争之中。地方建设的投机项目常常出现问题或者陷入投机骗局之中。查尔斯·狄更斯在《马丁·翟述伟》中运用虚构的新伊甸园的历史,幽默地谴责了那种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过程,靠养老金生活的人们选择阳光灿烂的佛罗里达享受退休生活时,却发现它正陷在沼泽之中。索尔斯坦·凡勃伦认为,整个美国的住宅样式都应该被理解为地产投机中的巨大冒险(Thorsten Veblen, 1976)。这个命题最近在迈克·戴维斯有关洛杉矶的著作中重现(Mike Davis, 1990)。因此,说空间构造是由资本主义空间生产逻辑决定的,并非主张地理形态是事先决定的。投机的成败主要是通过地方之间的空间竞争在事后计算出来的。

其中一个困难源自地方发展中的投机和其他形式资本的地理运动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例如,由当代金融资本的运动而建构的时空体系,它比生产者和投资者还要快得多地在空间中运动,生产者必须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把自己限定在一个空间中,而投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则要承担更长时间的义务。把这些不同的时空体系整合起来,常常就是成问题的(参阅 Merrifield, 1993, 这是一项杰出的个案研究)。那些在地方的物理属性上进行投资的人不得不通过确保地方的永恒性使投资有利可图。为了这个目标,企业联合起来行动。因此,罗根和莫洛齐(Logan and Molotch, 1988)描述的地方性“增长机器”政治学以及地方阶级联盟,它们的重要性上升了,从而促进并维持着地方的经济发展。但是这种状况并不总是成功。地方之间的竞争产生了胜利者和失败者。地方之间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对抗性的。

无论如何,当某一发展阶段(资本主义阶段或前资本主义阶段)所塑造的地理景观成为进一步积累的障碍时,受地方限制的固定性和资本的空间流动性之间的张力便爆发一般性危机。因此,必须围绕新的交通和通讯系统、基础设施、新的生产和消费中心及风格、新的劳动力聚集,以及改进了的社会基础(包括治理体系和对地方的调节),对地方的地理构型进行重塑。当新的地方创造出来的时候,老的地方(如本书第一章描述的考利)不得不贬值、破坏和重新开发。庄严的城市变成了遗

产中心，采矿业社区成为鬼城，旧的工业中心非工业化了，投机性发达市镇或者高尚社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边界或在非工业化社区的灰烬中诞生。因此，资本主义的历史不时地被剧烈的空间重组所打断。

大约 1970 年以来，就已存在着这种巨大的重组浪潮，它在空间之中及其之间造成了相当大的不安全感。结果并非如某些理论家主张的那样，地方在当代世界的重要性减弱了（参阅 Meyrowitz 的《没有地方感》²⁹⁷，它是此类作品的极好例子）。不过，这也不意味着，地方的意义已经在社会生活中发生了变化，而且在某些方面，结果是地方越来越重要而非越来越不重要。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最近十多年来会大量涌现醒目地以“地方”作为标题的著作。尽管在这背后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理由（并且当我们继续下去的时候，它们会越来越清晰），但目前值得直接考虑的内在于资本积累之政治经济学的理由只有四条：

其一，大约 1970 年以来，时空关系被彻底地重构了，并且这改变了地方在资本积累的全球样态中的相对位置。曾经处于安全条件中的城市发现自己变得脆弱了（想一想底特律、谢菲尔德、利物浦以及里尔）；居民们被迫去寻找能够得到再造的地方，以便在新的空间关系网络中生存下去；过去的资本积累（像考利那样）在今天已经任由命运摆布。当实际地方的安全普遍地受到威胁时，我们便担心地方的一般意义，和我们自己地方的特殊意义。

其二，当交通成本很高、通讯困难的时候，由于距离的摩擦作用，地方免于竞争。地方会依赖一种相对高水平的垄断力。但是交通成本的下降使得生产、商业、营销，特别是金融资本比迄今任何时候都要更迅速地在地理上流动。地方固有的垄断权力大大地削弱了。这使得我们能够更加自由地选择地点，继而又使得资本更多地而不是更少地利用地方间在资源质量、数量、成本和便利实施方面的细微差别。例如，在寻找更有利可图的积累的过程中，多国资本对地方性质已经变得越来越敏感。

其三，那些居住于一个地方的人（或在一个地方拥有固定资产的人）开始强烈地意识到，他们正在与其他地方竞争高度流动的资本。物质

的和社会的基础设施、劳动力的性质、社会和政治调节、文化和社会生活(所有这些都是可以建设的),这些方面的特殊结合或多或少对于外部资本都具有吸引力。居民们关心的是它们能够提供的东西,这将在满足他们需求和要求之际带来发展。因此,为了获得或保持资本投资,处于地方中的人们试图把他们的地方同其他地方区分开来,并且越来越具有竞争性(或许是对抗的和相互排斥的)。在这一过程中,出售地方、运用各种广告以及形象包装技巧,都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

其四,最近20年来,吸收过剩资本的有利可图项目越来越难找,相当大部分剩余资本无意中陷入了投机性的地方建设。美国存贷款制度大量不履行义务(3000亿美元,几乎等于第三世界债务的总和),许多世界最大银行(甚至包括日本)由于在房地产开发上的过度投资而地位动摇,这些都清晰地表明在这些问题上缺乏理智。出售地方并突出它们的特殊品质(退休养老或旅游的胜地、新生活方式社区等等)变得越来越疯狂。

结果是使地方之间为争取资本主义发展而进行的被迫竞争越来越强,而不是越来越弱,同时使资本主义规范之外的地方建设项目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在早期阶段,由于高昂交通成本而形成的特定地方发展的垄断保护容许地方建设较为自由的多样选择。现在,则是为了高度流动的资本或为从投机开发中快速获得利润而保护良好的商业环境。不过,地方之间的竞争不只是吸引生产的问题。它也是吸引消费者(特别是那些富人)的问题,为此它创造了诸如文化中心、惬意的城市或地区风景等等这些令人愉快的设施。对消费景观进行投资、出售地方形象、争夺文化和象征资本的定义、恢复作为消费吸引力的同地方有关的本国传统等等,所有这些都成为地方间竞争的一个部分。顺便一提,我注意到,建设和城市规划领域里的多数后现代生产都正是围绕出售地方进行的,被当作不断深化的商业文化的重要部分。结果,试图标榜自己受欢迎的那些地方最终创造了一种连续的同质性的复制品(Boyer, 1988)。

在此,问题是,人们为什么通过这样一种过程加入地方建设? 当

然，简单的答案是，他们常常并没有加入。争取社会公正再投资(为满足社区需要)，争取表现价值而不是表现货币和交换的“社区”发展，或者反对非工业化、反对通过高速公路建设而掠夺城市，等等，这种斗争在地方建设的历史地理中比比皆是。在这种抵制中，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一样地积极(当然更有效)。18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美学感受性，他们常常试图从与自然和文化的关系出发来设计和保护具有独特品质的地方(像吉尔福德)。这些品质作为它们自己的特殊遗产而得到有力保护。必须防止极度的土地资本积累的破坏。

299

因此，列斐伏尔(Lefebvre, 1991)相当正确地坚持，阶级斗争通过地方性质的不平衡发展被铭刻在每一个空间中。然而，情况常常是，这种抵制并没有阻止通过资本积累而进行的地方建设的整体过程(当投机资本建设或掠夺一个城市或邻里的选择被拒绝时，它会习惯于迅速发现其他一个可以去的地方)。但是，也存在着许多大众与投机行为共谋的情况。共谋的原因通常是强迫与笼络兼而有之。笼络主要是围绕下列三个方面来组织的：其一，分散的产权，这为投机行为提供了群众基础(没有人愿意看到自己的房产价值下跌)；其二，假定从扩张中获得的利润(为地方带来新的就业和经济机会)；其三，亲资本主义说服技术的绝对力量(增长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对你有利的)。因此，劳工组织常常加入而不是反对地方性增长联盟。强迫要么源自地方之间为资本投资和就业而进行的竞争(要么满足资本家的需求，要么出局；要么创造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要么丧失就业机会)，要么更加简单，源自不同政治阵营的政治压制和压迫(阻止媒体运用更加暴力的秘密组织策略，如日本黑帮和美国的黑手党)。

但是，“地方”对我们思想、政治和社会实践的吸引力，不可能简单地归结于这些趋势，即使在许多情况下它们都是强大而有说服力的。一般地讨论城市加速器、增长机器政治学，以及借由多元化实现的文化同质化等问题，几乎不能完整地说明由地方限定的身份。它也不能说明与特殊地方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归属的力量。那么，我们在何处寻求其他的解释呢？

四 海德格尔和作为存在场所的地方

海德格尔说：“地方是存在之真理的场所。”许多作家——特别是那些现象学传统之中的人——都从他那儿获益匪浅，因此研究他的论证是十分有益的。他以这种熟悉的论述如此开宗明义：

300 时间和空间中的一切距离都在缩小。……不过，这种对一切距离的匆忙消除并不带来任何切近；因为切近并不在于距离之短。在路程上离我们最近的东西，通过电影的图像，通过收音机的声响，也可能离我们最远。在路程上十分疏远的东西，也可能离我们最近。……一切都被冲入这种千篇一律的无距离状态之中，都搅在一起了。……这个令人惊恐、使人不安的东西是什么呢？它以万物如何在场的方式自行显示并且自行遮蔽，也即以这样的方式：尽管有种种对距离的克服，存在者的切近却仍杳无影踪。（Heidegger, 1971:165）^①

当社会生活的时空坐标变得不稳定时，“时空压缩”的恐怖感觉便产生了对身份（被理解为与地方的同一）丧失的担心。因为所有的人都“由于他们居于物之中而在空间中生存下去”，并因此永久受物之中不断改变的空间关系的威胁，所以这种恐惧无处不在。此外，物理上的切近并不必然带来理解，或者有能力欣赏甚至占用一个“物”（或者另一个人）。海德格尔承认，空间关系的变化是商品化和市场交换的产物，并且提出了一个与马克思非常接近的观点：

^① 此处及下述两段海德格尔引文参考了孙周兴的译文。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译者注

技术领域的对象特点迅速、无情并完全地扩展到整个大地。它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安置全部可生产的物；而且它也通过市场把生产的产物运来运去。在自作主张的生产中，人的人性和物的物性都融解成一个市场的被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这个市场价值不仅遍布作为世界市场的整个大地，而且如求意志的意志(the will to will)那样，以存在的本质进行交易，并因此使万物屈从于计算的交易，这种交易最顽强地统治着那些不需要数字的领域。(Heidegger, 1971:114—115)

然而，海德格尔却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对这一切做出反应。他把注意力从世界市场那里收回，转而设法去揭示现象学意义上的人类生存之真理。他聚焦的概念是“居”(dwelling)。他通过描述一个黑森林小屋说明了这个概念：

在这里，使天、地、神、人纯一地进入物中的迫切能力把这座房屋安置起来了。它把院落安排在朝南避风的山坡上，在牧场之间靠近水源的地方。它给院落一个宽阔地伸展的木板屋顶，这个屋顶以适当的倾斜度足以承荷冬日积雪的重压，并且深深地下伸，保护着房屋使之免受漫漫冬夜的狂风的损害。它没有忘记公用桌子后面的圣坛，它在房屋里为摇篮和棺材——在那里被叫做死亡之树——留出了地方，并且因此为同一屋顶下的老老少少预先勾勒了他们的时代进程的特征。建造了这个农家院落的是一种手工艺，这种手工艺本身起源于栖居，依然需要运用作为物的器械和框架。(Heidegger, 1971:160)

居是在人与物之间实现一种精神统一的能力。由此可以断定，“只有拥有居的能力，我们才会筑(build)”³⁰¹。实际上，筑“或许甚至拒绝居自身的本质，它们纯粹为了自己的原因而被追逐和获得”。尽管一种

狭义的无家可归的感觉可能仅仅通过建造居所就能得到缓解，但还是存在着更深的无家可归的危机，这可以在现代世界中观察到；许多人丧失了他们的根基、他们与故土的联系。甚至那些身体占据一个位置的人也可能因现代交流手段(如收音机和电视)的袭击而变得无家可归(无所寄托)。“今天，人的根基、本地性在核心处受到了威胁”。如果我们丧失了居的能力，那么我们就失去了自己的根基，发现自己切断了同所有精神养料之源的联系。存在之贫困是不可估量的(转引自 Birringer: 243)。海德格尔主张(Heidegger, 1966:47—48)，任何本真的艺术品的繁荣都取决于它在本土中的根基。“我们是植物——无论我们是否喜欢承认这一点——必须具有源自大地的根，以便在天空中开花和结果。”被剥夺了这种根基，艺术就被还原为对它先前自身的无意义的拙劣模仿。因此，难题在于恢复可生存的家园，在其中建立充满意义的根基。地方建设应该就是恢复根基、恢复居的艺术。

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追问”激发了理解地方建设之社会过程的特殊方法。他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地方“藉以在我们的记忆和情感中通过反复遭遇和复杂联系而得以建造”的那种方式(Relph, 1989:26—29)。他强调“地方经验如何必然地在时间上深化并在记忆中提升”。他创造了“一种新的方法来谈论和关心我们人类本质和环境”，所以“只有当所有技术和物质问题被解决时，对地方和大地的爱才不会成为一种被放纵的额外情感。它们是在世中的一部分，并因此先于所有的技术问题”。这提出了与自然关系的整个问题。地方和环境的意义与政治学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地方实质上是存在的真理之场所(Buell, 1995)。

不过，海德格尔的论点也存在某些难题。像多数大哲学家一样，他的建议依然保留了特别的暧昧性，所以，他的评论者往往在解释他的可能意思时大做文章。例如，在高度工业化、现代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世界中，“居”的条件可能是什么？既然我们不可能回到黑森林的小屋，那么我们能回到什么地方呢？再如，地方(以及地方中的自然)经验的本真性(根)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难题。多威评论道，从一开始，

本真性难题自身就是现代的问题。只有当现代工业化把我们同生产过程割裂开来，我们遭遇到作为已完成商品的环境时，本真性问题才出现(Dovey, 1989:43)。段义孚主张，在一个地方扎根，是一种不同于拥有或培养地方感的经验。“一个真正有根的社群可能拥有圣地和纪念碑，但它不太可能用博物馆和协会来保存过去”(Tuan, 1977:198)。在今天，人们常常自觉地且有意识地努力唤起一种地方感和往昔感。但这里面包含着一种危险。对本真性的追逐创造了一些传统和一种商业化的遗产文化。麦康纳指出，现代性的最终胜利并非是非现代世界的消失，而是它的人为保存和重构(MacCannell, 1976:8)。

然而，人们似乎广泛地接受了海德格尔的如下主张：居和根的本真性正在由于技术、理性主义、大规模生产和大众价值的扩散而遭到破坏。瑞夫指出，由于纯粹组织化的权力和市场渗透的深度，地方正被破坏，变得“不真实”，甚至“没有固定的位置”(Relph, 1976)。对此所做出的反应是建构一种地方政治，它被视为一条通往本真存在之福地的政治道路。柯克帕特里克·塞尔在一份左倾杂志《民族》上写道：“唯一提供救赎希望的政治幻象必须立足于对地方的理解、在地方中扎根、对地方的深层义务以及把地方重新神圣化。”(Kirkpatrick Sale, 1990)

这使得进一步深究下述问题成为可能，为什么地方在当代世界中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而非相反。海德格尔的主张，以及其后许多作家从他那里吸收的，是有可能抵抗或拒绝地方建设之任何简单的资本主义(或现代主义)逻辑。由此可以推断，技术合理性、商品化、市场价值和资本积累不断增强的对社会生活(或者如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许多作家所称“生活世界”)的渗透，加之时空压缩，将激发一些抵抗，这些抵抗越来越强地聚集于地方(在这个词的最广泛意义上来理解)的替代性建造上。在许多激进生态运动中，社群的本真意义或者与自然的本真关系正是这种敏感性的最前沿问题。甚至雷蒙德·威廉斯也把地方视为不只是“事件的场所……而是常常被广泛地否认的历史的物质化”(Raymond Williams, 1979a:276)。我在第一章中已述，他的小说揭示了对

地方的政治和情感意义，这是一个既与资本积累共谋又对其进行抵抗的场所。在海德格尔的论证中，确实存在着值得仔细探讨的充分可信性，即使如我将表明的那样，就其最初形式来说，存在着拒绝它的充分理由。

五 地方作为环境特色的场所

303 在召唤物以切近在场的过程中，海德格尔以地方中的亲密的感性交互作用直接培养了对与自然非异化关系的想象。布耶尔评论道，不直接面对地方的观念就想探讨环境问题，这几乎不可能(Beull, 1995)。在多数文学作品中，也存在着一种感人并持久的信念，即“通过重新唤醒地方感觉，我们或许能够重新激活对环境的关注”，以及“乡土之地的美好感觉的再度复苏能促使人们从精神上关注保护生态多样性和地方唯一性”(Liilburne, 1989:30, 110)。这种信念不仅可以在神学作品中发现(Liilburne, 198; Brueggemann, 1977)，而且广泛存在于生态政治之生物区域主义、社群主义和无政府社会主义的形式之中(参阅本书第八章)。它亦在环境正义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参阅本书第十三章)。地方是多数环境政治的首选地带。某些最激烈的反资本主义地方建设之政治经济学的运动就关注对特殊地方环境保护或破坏。

大多数此类运动都依靠一种信念，即不可能通过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就获得对“自然”的深层经验的理解。某些自然史经典——如吉尔伯特·怀特的《塞尔博恩自然史》——证明了这种深层的乡土知识的重要性。启蒙运动以来，涌现出许多在生态上敏感的有关特殊地方的作品，其中一些特别优美并极富感染力，把与自然的特殊地方的忠诚关系美学化成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地方特殊品质的再现成为一种工具，揭示另一种美学来替代永不停息的商品和货币之空间流的美学。这需要非常熟悉当地的动植物群、土壤品质、地质状况等等，以及复杂的人类居住历史、环境变迁、人类劳动在土地尤其是人造环境

中的嵌入。

然而，生态情感和地方之间的联系值得进一步批评性探究。许多地方化的记述——梭罗关于瓦尔登湖的研究便是典型例子——只是产生了有限的自然知识，包含了小规模上运行的那些生态过程。更广泛的生态过程是在不可能直接体验并因此处于现象范围之外的规模上发生的，要理解它们，这些知识是不够的。此外，把地方视为一种有特权的（要不然就是排外性的）生态敏感性地点，这种行为以一种无中介的、非常直接的方式依赖作为“万物尺度”的人类身体。身体及其环境之间的感性交互作用确实带来了广泛的心理和社会意义。但困难在于，作为嵌在自然之中的有机体，我们的关系远远地延伸到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链条之中，条达及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只要“与自然的疏远”在当代社会是一个得到广泛承认的问题，那么地方就会作为某种潜在非异化的与环境直接感性交互作用的地点而获得应有的力量。但它隐藏在商品拜物教之中，并且最终使人类身体、自我、人类感觉的领域都拜物教化，成为全部存在的地点。

304

然而，在生态—环境运动中发现的大多数“战斗的特殊主义”都依靠某种地方化的生态关系的亲密感。违背这些关系的完整性（例如，通过资本主义发展或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常常激发地方性抗议，这些抗议可以向外建立一种更加普遍的生态政治（参阅本书第十三章）。

六 作为集体记忆地点的地方

如果认识不到地方、记忆和身份之间的密切联系，就难以深究有关地方的广泛文献：

地方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空间，在那里，某些事情发生了，今天仍然被记着，它们在代与代之间提供了连续性和同一性；地方是产生重要话语的空间，这些话语建立了身份、定义了天职、预想了

命运；地方是这样一种空间，在其中，我们交换誓言、做出承诺并提出要求。（Brueggemann, 转引自 Liilburne, 1989:26）

这就是巴什拉在《空间诗学》中提出的强烈主张之一。这种观点值得我们遵循，因为它为理解与记忆有关的地方的重要性提供了有力的现象学基础。

在由记忆建构的过去剧场里，舞台背景维持着主要角色的个性。有时我们认为很了解时间中的自己，但这时我们所知道的却只是对人的稳定性空间的固恋——不想消失的人，甚至在过去，当他开始研究逝去之物时，他也希望时间“停止”飞逝。

所有真正有人居住的空间都承载着家的观念的本质。[在此]记忆和想象联系在一起，相互深化对方。在价值的秩序中，它们共同构成记忆和意象的社区。因此，房屋并不是在叙事的线索里，也不在我们自己故事的讲述中被日复一日地体验。通过梦想，对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居住地相互渗透并保留了昔日的财富。……房屋是整合人类思想、记忆和梦想的最伟大力量之一。……离开它，人类将变成一盘散沙。

305

但是，这种地方感只局限于作为家的房屋吗？或者说，它延伸至更广泛的作为家园——德国人所言的“家”（Heimat）——的地方感吗？爱德加·雷茨——1984年《故乡》这部电影的导演（无可争论地，那是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电影）——说，“家”这个词“总是同一种强烈的感觉，主要是记忆和渴望联系在一起”。莫莱利和罗宾评论道，家涉及“保存文化和身份的‘基础’”，并且“维持文化的边界和归属”（Morley and Robins, 1993:8）。同样，恰恰因为围绕地方建立起来的记忆不可能轻易地同局外人分享，所以它似乎仅仅指向一种排他性的民族主义和社群主义政治。

以那些术语来讲便是，以一种纯粹否定的角度来描述某些更加根本的东西。例如，巴索对西部阿帕契族的研究表明：“地理特色数百年来给人民提供了一种不可缺少的记忆之柱，其历史的道德教义依赖于此。”(Basso, 1984)景观中的地方永恒性，加上描述它们的历史叙事，提供了使文化身份永恒化的工具。巴索求助于巴赫金的“时空体”概念(参阅本书第十章)，他写道：

人们会觉得，阿帕契人把景观看成是智慧宝库，严厉而仁慈的传统守护神，永远警觉的盟友，个体和整个社群努力实践一套独属于他们的社会生活水平。在西部阿帕契人为自己建筑的世界里，景观的特点成了这种生活方式的象征，也是为这种生活方式而建，成了文化及其人民永久的品德的象征。

在此，在象征维度上，我们遇到了社会和环境之间辩证法的特殊变体，这种辩证法相互以对话来具体地说明自己。通过以一种特殊方式来思考和理解自己与物质世界的关系，美洲土著居民进行道德性的想象活动，建立了一种对物质世界的理解，同时也就建立了对自身的理解。由此观之，失去土地便等于失去身份，而现代化、资本积累和空间整合的过程将极大地破坏这种特殊的文化身份标记。

但是，过去的记忆也是未来的希望。如玛丽·戈登所写：

希望与记忆之间存在着联系。没有记忆的人不可能期待什么。因此，时间意味着虚无。(Mary Gordon, 1995:47)

因此，在从记忆到希望、从过去到未来的旅途中，保护或建立地方感是一项积极的因素。重建地方能够揭示隐秘的记忆，这些记忆为不同未来提供了前景。建筑学所称的“批判性区域主义”——如其通常所为，援引了地方的本土传统和形象——被视为抵抗商品流和货币化的政治之基础。“战斗的特殊主义”抓住了地方的性质，激活了环境与社会之

间的纽带，并试图使建构时空的社会过程服从于根本不同的目标。当身份发生改变，以及迈向未来的政治轨迹被重新定义时，某些记忆会被压制，而另一些则从阴影中被援救出来。巴什拉指出：“想象把我们同过去以及现实分离开来，它面向未来”（Bachelard, 1964: xxx）。因此，想象的地方，乌托邦思想以及无数人的欲望，都在启发政治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借助以想象、话语以及物质的、社会的和制度的形式建构地方的实践，时间呈现出自己的空间意义。但是，是否存在着地方建构的原则，它把过去时间同未来时间联系起来，同时又承认记忆、环境经验和在大地上居住能力的重要性？这是通过场所精神(*genius loci*)这个概念所揭示的主题。

七 探寻场所精神

柯克帕特里克·塞尔要求“把地方重新神圣化”，这暗示着地方存在的时空世界如何完全不同于资本积累所给定的那个时空世界。神话的、宗教的、集体记忆的以及国家和地区身份的世界是时空构造，它们构成了与众不同的地方形式，并反过来被其构造(如圣地、礼拜之地、故事中的偶像等)。表现为与众不同的信仰、价值、想象和社会—制度实践的地方长期以来一直在物质上和话语上被建构。使地方构造过程永久存在，这种研究一直持续到今天。许多传统制度，如宗教和民族制度，至关重要地依赖整个象征性地方的网络的存在，以保存它们的力量并表现它们的社会意义。作为一种永恒，地方成为象征性的，并使人想起那些通过时空实践建构的价值(如声望、权威、身份和权力)。

许多建筑师通过海德格尔的途径来研究这个过程。他们试图通过场所精神概念来获得多少有点神秘的地方性质。诺伯格-舒尔茨写道：

场所精神是一个罗马概念。根据古罗马的信仰，每一个“独

立的”存在都具有自己的精神特色，它的守护神。这种神使人和地方具有生命，伴随着它们从出生到死亡，并决定着它们的个性或本质……因此，**精神**表明一个东西是什么，或者它“想成为”什么……[古代人]认识到，同他生活其中的地方的**精神**保持一致具有极大的生存重要性。在过去，生存取决于同地方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保持一种“良好的”关系。(Norberg-Schulz, 1980:18)

在详细分析这一观点时，诺伯格-舒尔茨直接借用了海德格尔的“居”这个概念：

当一个人居住时，他同时被定位在空间中，并且受某种环境特点的影响。两个相关的心理功能或许可以称为“方向”和“认同”。为获得一个存在的立足之地，人们必须能够确定自己的方位；他必须要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但是他亦必须参与到环境之中，即他必须知道自己如何在某个地方立足。

因此，居首先需要“对环境的认同”，由此推断，建筑物、建筑和城市设计之“存在的目标”便是“揭示隐含在特定环境中的意义”。这样来思考并非主张环境决定论，也不是主张一种静态的地方概念：

地方的结构并非固定的、永恒的状态。通常，地方会发生变化，有时是迅速地变化。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场所精神**必须变化或丧失……首先，我们可以指出，任何地方都应该具有接受不同“内容”的“能力”，当然具有某种限制。只适合某种特定目标的地方不久就会变得无用。其次，一个地方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解释”，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保护和保存**场所精神**实际上意味着，在一个不断更新的历史语境中使它的本质具体化。我们或许也可以说，一个地方的历史应该成为它的“自我实现”。人类行动

揭示了最初作为可能性的东西……(Norberg-Schulz, 1980:18)

揭示地方的可能性是威廉斯著作的通常主题(参阅本书第一章)。求助“自我实现”应该也使我们意识到与“深度生态学”立场的某种相似性(参阅本书第六章)。诺伯格-舒尔茨也求助过程哲学以及辩证理论(本书第二章中概括的那种)。他对地方动态的详细考察使得这些观点清晰起来:

308

我们的例子表明,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意图必须以再现场所精神的形式具体化。要不然,地方将丧失其同一性……因此,我们认识到,城市必须被视为**单个地方**,而不是“盲目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可以在其中自由驰骋的抽象空间。维护**场所精神**并不意味着复制旧有模式。它意味着以一种不断更新的方式决定地方的同一性,并解释它。只有那样,我们才可以谈论活生生的传统,通过把它与本土建立的一套规范联系起来,这一传统使得变化充满意义。我们也许会再次想起怀特海的格言,“过程的艺术是在变化中保持秩序,在秩序中实现变化”。活生生的传统对生活有用,因为它符合这些话。它并不把“自由”理解为独断专行,而是将其理解为创造性参与。(Norberg-Schulz, 1980:182)

诺伯格-舒尔茨对**场所精神**的解释参照了大量已经探讨过的主题。建筑物把与环境的关系“内在化”,把与社会的、象征的、精神的、生物的以及物理的关系在地方中集合起来,以便提供某种同一性。他断言,“由地方集合起来的意义构成了它的**场所精神**”。在建构作为“永恒性”的地方时,创造性干预是“自我实现”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像在怀特海的过程和变化哲学中理解的那样。因此,地方的瓦解实际上是同一性的丧失。它暗示同环境和自我的根本性精神异化,需要采取补救措施,不论它是对作为独断专行的“自由”的限制,还是对由于担心冒犯**场所精神**所采取行动的限制。尽管在诺伯格-舒尔茨的著作中这

些高贵而夸张的情感是指向雅典卫城或圣彼德广场的，但它们可以在诸如巴尔的摩的吉尔福德这样极为普通的环境中观察到。

乍一看，有许多证据可以支持诺伯格-舒尔茨的观点。它对深度生态学家、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等多种群体具有广泛的吸引力。辩证语言，加上把关系内在化的强烈倾向，表明了同我提出的那些论点的潜在一致性。但是，我先前称为“莱布尼茨奇想”的那种危险到处都很明显。例如，建筑学自身内部的某些争论就表明了这一点。罗西便抱怨场所这个概念：

我们一直想抓住只会逃逸和消失的那些轮廓。这些轮廓描绘了纪念碑、城市、建筑物的独特性，并因此描绘了独特性概念及其界限，它的开始和结束之处。他们追溯建筑及其场所——艺术之地——的关系，并因此追溯到它同场所本身的联系和对场所的精确表述，场所作为一种独特的人工物，是由它的时间和空间、它的地形维度和它的形式、它作为一连串古代和近代事件的场所、它的记忆所决定的。所有这些难题主要加强属于集体特性；它们迫使我们在人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上暂停片刻，并因此注意生态和心理之间的关系。（Rossi, 1982:103—107）

至少，罗西情愿在独特性和普遍性之间的交集之上，从集体认同角度来了解场所精神。此外，罗西以一种更明显的建构主义心境采纳了诺伯格-舒尔茨必然承认的意义流动性，用它来表示以一种更加开放的方式揭示可能性的能力。罗西以“集体性”概念替代了压迫性的和同质化的“人”的概念，同时承认“建造城市人造物的历史一直都是统治阶级建筑学的历史”，并且“纪念碑”（城市语境中同一性的关键要素）是象征性地和集体地建造出来的记忆场所。但是罗西仍然坚持某种根本的永恒观念。

309

神话不断产生和消失，从一个地方慢慢地流传到另一个地

方；每一代的叙述都不一样，并在从祖先那里继承下的财产中增添新的要素；但是在这种不断变化的现实背后，存在一种永恒的现实：它以某种方式试图逃脱时间的行动。我们必须承认，这种现实的真正基础在宗教传统之中……我相信，就其集体本质和基本特点来说，仪式是保存神话的一种要素，这种重要性使其成为一个关键性手段，用以理解纪念碑意义，以及理解城市之建立和城市语境中观念传播的含义。我认为纪念碑有特别的重要性，尽管它们在城市动态中的重要性或许有时会消失……如果仪式是永恒之物，保存了神话要素，那么纪念碑也是这样，因为，就在证实神话的时刻，纪念碑使仪式形式成为可能。（Rossi, 1982:24）

罗西的理论开启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谁的同性和怎样的集体性？如果集体记忆在一个地方获得某种例证，如果集体记忆对于某个社会秩序的永恒（或者对于某种期待的另一种未来的显现）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全部有关**场所精神**的本质主义理论都消失了，代之以竞争性定义的争论地带。在研究围绕雅典卫城的竞争性论述和想象时，洛卡奇（Loukaki, 1967）实施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步骤。就“谁的精神定义哪个场所的性质”而进行的政治权力斗争贯穿于希腊历史，在这种斗争面前，建筑师、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围绕“如何理解**场所精神**”的话语争论就渐渐消退了。如洛卡奇表明的那样，那种争论不只是围绕着正确地解释过去以及这种或那种集体记忆的本真性进行的，而且也是围绕全部的未来希望进行的。解放有关过去的不同想象也就是解放有关未来可能性的想象。**场所精神**易引起争论，既是在理论上（有关它的意义），又是具体的（有关如何理解一个特定地方）。因此，缺乏积极的政治争论便只能被理解为某种霸权统治的征兆。例如，使雅典卫城如此有趣的东西是，不仅仅存在着基于阶级、民族情感和场所的竞争性主张，而且存在着来自外部力量（诸如德国、英国和美国）的竞争性主张，那些外部力量把雅典卫城当作西方文明起源的象征加以利用，而不是将其尊为植根于希腊地缘政治和政治经济斗争历史之中的活生生的纪念

碑。雅典卫城承载的负担是，它同时“属于”完全不同的想象的共同体。它“真正”属于谁，这个问题并没有直接的理论答案：它通过政治争论和斗争而得以规定，因此是相对不稳定的规定。

八 作为共同体场所的地方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创造了“想象的共同体”这个短语，它与地方观点和实践的另一个维度联系在一起。同地方概念一样，“共同体”这个词的历史也是令人不安和含糊不清的。这两个词相互纠缠，甚至造成了更加复杂的意义层次。但是，必须做一些澄清，因为地方从居住该处的人们的集体活动中获得了极大的永恒性和与众不同的特点。在一个有限的领域中，人们通过他们的活动改造土地，建立与众不同的制度、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附属于地方的集体记忆与归属想象联系在一起。通过实践，“想象的共同体”获得某种现实。那类实践既源自面对面的交流(例如，在本书第五章中对齐泽克有关东欧民族主义分析的讨论)，又源自个体之间的想象的和话语的联系(在我们时代以“印刷和图像资本主义”作为中介)。“界定”空间和创造特殊地方的永恒性，这些实际的和话语的实践同样是一种集体事务，各种竞争性行政、军事和社会实践都在其中发生。这对于如吉尔福德那样的有限共同体和民族国家同样是真实的。

这种划界活动的影响几乎总是局部的(一个城市或邻里从何处开始又在何处结束)，并且构成空间的社会生态过程确保所有地方(甚至那些受到严格控制的领土疆界)在某种程度上是开放的。这正是怀特海有关任何永恒性的观点，而且，在当代社会生态生活中，发生作用的多种流和过程的异质性确保所有地方都处于一种永恒的流动状态(通常受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条件限制，某些地方比其他地方更具流动性，某些地方比其他地方更加永久，更加坚固)。

那么，如何同时经验地和规范地探索那些在地域上受到限制的共同

体呢？下面便是桑德尔的理解：

311

构成性的自我理解包含的主体比单个个体更宽泛，就这一点而言，无论一个家庭、部落、城市、民族，还是人群，他们都在这一范围内定义了构成性意义上的共同体。形成这样一种共同体的东西不只是一种仁爱精神或共同体价值的普及，甚至某种“共享的最终目标”，而且是一种共同的话语技巧以及固有实践和理解的背景，在其中人们的不透明性被减少，如果不是最终消除的话。（Sandel, 1982:172—173）

与齐泽克对共同体和民族问题的分析相比（参阅本书第五章），对“共同话语和固有实践”的强调提供了一个相当不同的入口。它定义了某些公共领域的共同性，在其中，公民道德、公共责任等诸如此类的观点能够得到定义。但是，大量批评指出，这实际上仍是有关公共道德和市民生活的启蒙观点。例如，扬（Young, 1990）既批判这样一种普遍主义带来的压抑的同质性，又批判“对话语中统一性或整体性的欲求产生边界、分裂和排他”的方式。实际上，扬强烈谴责了在当前占据中心舞台的、常常狭隘的、以地方为基础的、秘密的社群主义形式。这样一种社群的概念“常常暗示着对时间和空间间距的否定”，主张“在多元性语境中成员之间直接交流”。但是，她主张：“认为直接关系是比通过时间和距离中介的关系更纯粹、更本真的社会关系，这没有任何概念根据。”这是理解地方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尽管价值形式的主要结构，以及异化和统治的主要结构是由国家权力和资本循环规定的，但并不能由此断定：任何中介关系都必然是异化的，而唯有地方的亲密性才是“本真的”社会—生态关系所在。通过“把面对面直接交流的社会设定成理想，社群主义理论家制造了未来‘本真的’社会和我们生活其中的‘非本真’社会之间的二元论，后者只体现为异化、官僚化和堕落”。扬对海德格尔传统的批判是非常激烈的。“种族主义、种性沙文主义和阶级贬值……部分地是由对社群

的渴望发展起来的”。她论证(吉尔福德之例很好地说明了这个论点),在今日美国,“对某些群体的积极认同常常是通过首先把其他群体定义成他者、没有价值的不完整的人而获得的”。

此外,这种外部压迫也在内部压抑中得到反映。扬的论证出发点在于她自己体验到许多激进群体的强迫性同质性。值得记住的是,福柯“歇斯底里与地方联系在一起”(转引自 Kristeva: 191)。不过,这个问题要广泛得多:存在着相当不同的共同体定义,它们具有模糊的和不一致的在场方式。例如,福柯不仅强调了那些处于最严格监禁之中的密闭社群——监狱、全景监狱、医院、学校和工厂,而且强调了那些控制地带,它们生产完全被封闭和囚禁在压迫性规训权力机制之中的温驯身体。这正是塞内特(Sennett, 1970)在其《无序的用途》一书中仔细分析的那种共同体,他极为敏锐地把这种共同体剖析成许多当代城市生活之根本上压迫性和压制性特点。在此,地方作为社会控制的封闭地带产生作用,它一旦获得其特殊的永恒性便很难打破(或摆脱)。而且有些利益集团卷入了这种地方的建立和维持。例如,在美国,几个孤立的种族社群(没有与社会其他部分沟通的语言、没有合法地位、没有市民同化和市民权利)为无数的血汗工厂提供温驯的身体,那些血汗工厂是由同样在种族上独特的资本主义阶级来管理的。由资本主义阶级提倡的社群团结——受到种族团结和宗教团结意识形态的强烈支持——是建立在最恶劣剥削形式上的资本积累的确定手段。最近报道的在纽约和洛杉矶涉及限制和囚禁劳工的血汗工厂,其意义便在于此 [Lii(1995)和 Kwong(1987)秘密研究了在纽约唐人街如何通过鼓吹种族团结来组织剥削的]。

这样做的结果是在社群主义观点内部形成了二元论。一方面,压迫和社会控制在一个包含所有剥削的封闭地方中生产温驯的身体,而在另一个极端,社群主义力量的动员则能够成为震撼世界的革命性“战斗的特殊主义”的基础。对于这种相对立的趋势,扬提出了理想主义的解决方案:用一种被定义为“向未同化的他性开放”的“非压迫性的城市”来替代面对面社群的理想。尽管这个术语是以城市化的实际动态

天真地说明的，但其指向的方向——以某种全面的统一性来展示差异和多元性——是有趣的。它试图指望那些积极的城市生活经验，在其中，全部差异都得到体现、协商和容忍。实际上，它假设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观念在一种全新的激进政治学中沟通的可能性。沟通的桥梁会是什么样的，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社群主义对共同话语和固有实践的强调在证明如下问题时具有优点：社群和地方不可能在话语领域中“通过它们的虚假/本真，而只能通过它们被想象的类型”得以区分(Anderson, 1983)。这一结论根本不同于“本真的”和“非本真的”社群或地方之间的某种容易定义的差异观点。如果马克思(Marx, 1967:177—178)是对的，并且想象和再现总是先于生产，那么海德格尔的观点(就像桑德尔、巴赫金、普林斯·查尔斯、埃特泽尔尼或其他什么人的观点)就变成只是一种有待实现的可能的地方想象。海德格尔也许求助于一种深远的过去和表面上看起来深奥的质朴语言的永恒性，但是他也承认，回到由黑森林小屋组成的世界是不可能的，因此有必要以国家社会主义许诺的方式奋力向前，建造一种适合于那时那地的新型“本真的”共同体。然而，悖反性地，正是海德格尔所反感的那些条件使得对一个想象的本真共同体的追寻成为政治可能性，并因此向作为权力关系和社会斗争表现的社会构架开放了“本真性”的定义。

九 海德格尔反对马克思：划分差异

诺伯格-舒尔茨(Norberg-Schulz, 1980:168)主张，马克思主义无法拒绝对地方之神秘性质这个问题的研究。他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完整理解‘居’这个问题，也没有能够克服”人类异化，这种异化源自“人丧失了与构成其环境的自然和人工物的同一性”。因为这种丧失也“源于地方的丧失”，可以断定，马克思主义没能察觉地方的多样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丰富意义(包括与环境的亲密关系)，这便成为它最严

重的政治债务之一。因此，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两种传统在对地方的理解上就存在着明显差异。不过，这种差异在原则上是不可协调的吗？或者说，是否在差异内部存在着某种统一性？

对于马克思来说，对物质社会实践世界的分析，对货币循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分析，定义了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普遍评价的时空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地方必然作为构造性因素存在于资本积累的历史地理之中。但是，这种时空世界也为我们“类存在物”定义了同样普遍的道德、经济和政治责任的领域。作为“类存在物”，尽管我们的特点是异化和剥削，但不得通过阶级斗争的全球政治—经济战略来拯救。这并非意味着直接上手的经验世界是不相干的。但是，我们从与所接触之物和直接遭遇之过程的感性互动中所学到的东西，与我们为了理解那种在全球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而需要知道的东西并非一致。这便是马克思试图以其“商品拜物教”主题所捕捉的区别。他认为，我们直接体验到的东西并不足以理解我们世界的政治经济现实。但是，他又认为，直接经验是如此真实以至于使我们永远相信它就是全部存在，并且把我们对于存在、道德责任和政治义务的理解限制在它的短视框架中。马克思试图超越，并且如其早期著作清晰表明的那样，试图借助某种政治学建构“类存在物”的意义，在那种政治学中，个体只能通过同地球上的其他人自由地联合才能实现自己的完整个性。众所周知，这是含糊的、不确定的修辞，但它暗示着，我们不能走回头路；我们不能拒绝社会性的世界，那个世界是通过把所有人都和地方都内在地联系起来并置于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之中而得以实现的；我们将设法在这个成就的基础上以社会建构性的方式来改造它。例如，必须改变通过资本主义发展逻辑而建立起来的地方网络，并将之用于进步目标，而不是拒绝或破坏它。但是，地方建设现在与货币、商品、资本和交换的普遍主义串通一气（直接地或间接地），它不以任何方式挑战异化。在此，通过环境变革的特别方式展现出来的社会关系开始发挥作用，使地方的生产成为巩固由资本主义推动的社会关系、制度和政治—经济实践体制的因素。

314

不幸的是，国际主义的工人阶级政治学常常是从特殊地方经验的物质世界中抽象出来的。它丧失了可信性和吸引力，因为倡导普遍研究就排除了对环境、背景、集体记忆、社区、神话和人工形式之特性的敏感性。清晰阐明一条批评路线来反对只立足于上述问题的政治学，这是一回事，而如雷蒙德·威廉斯有说服力地论证的那样，仅仅把地方政治学塑造成麻木的幻想，则是另一回事。

在另一个极端上，除了直接感性的和沉思的经验世界，海德格尔完全拒绝任何意义的道德责任。他拒绝通过国际劳动分工来研究商品的、货币的、技术的和生产的世界。他把自己的视野限定在非常狭小的经验世界，以此来追问物之经验的先天和内在的性质。他坚持居之经验的不可还原性以及地方和环境的特异性。这样，他否定了将早餐摆放到他的餐桌上的那些过程的相关性，强调现代生活之本真共同体的丧失、根的丧失和居的丧失。前者是总的否定行为，而后者则激起了许多人的强烈共鸣。瑞夫说：“如果地方实际上是人类在世中生存的根本方面，如果它们是个体和群体之安全与身份的源泉，那么，体验和维持重要地方的手段就没有丧失，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Relph, 1976:96）

315 难题在于，这样一种情感很容易使人屈从于那样一种解释和政治学，它既是排他性的又是褊狭的，是沉思的而非行动的，是社群主义的，甚至是强烈民族主义的（因此海德格尔重视纳粹主义）。海德格尔拒绝把与他者（物或人）的中介性社会关系（经由市场或其他媒介）视为任何本真性的表现。实际上，这种做法把中介性关系理解成对身份和任何真正自我感的威胁，同时彻底地拒绝了任何促成或暗含无根性的东西（这是否解释了他反对犹太人的历史散居和无根性？）。此外，经验在边界之外就变得不可表达，因为本真的艺术和真正的美学意义只能产生于强烈的地方之根。如我们所见，这是西部阿帕契人的情况。然而，鉴于他认为语言支配着社会生活，这种排他性视野甚至就更加明显。地方成为不可表达的他性的地方。在现代主义往往追求的那种美学世界或可传达意义的世界中，不存在任何相互联系，甚至在同生产和交换

的物质世界保持强大联系的背景中，情况也一样。从这一点出发，并不难理解，为什么后现代思想往往把海德格尔作为“解释性共同体”、碎片化的语言游戏等观点的先驱。也不难理解，后现代主义之粗俗的和商业的一面如何利用这些情感，把本土当成市场、模仿本真，并发明遗产、传统，甚至已经商业化的“根”。然而，奇怪的是，仍然存在着与马克思的另外一种共性。海德格尔坚持把本真的共同体看作通过居住而在物质上和物理上植根于特殊的地方，而不是在话语中、在后现代主义修辞中如此频繁地发生的那种独自建构的社群。在第一种分析中，海德格尔只是致力于至关重要的生产要素，把它作为与世界感性交往的优先要素，这一点与马克思一样。

但是，如果我是对的，并且现代主义(如当前通常解释的那样)和后现代主义在漫长的现代性历史中是辩证地产生的对立面(Harvey, 1989a, 339)，那么我们就应该将这些论点视为包含他者的对立面，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对马克思来说，潜在的压迫、误解和剥削是在空间上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纯粹以地方为本的政治学的后果。对海德格尔来说，以地方为本的居住经验的现象学现实主义只是从那个世界得到的暂时的喘息。马克思认为，拜物教中的经验充分真实却又是表面的和误认的；而海德格尔则将同样的商品交换和技术理性世界看作必须受到批判的日常生活之非本真性根源。这种对难题根源的共同定义(尽管马克思明确定义它是资本主义特有的问题，而海德格尔则明确定义它是现代主义的问题——也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共有的)为重建对地方的更深刻理解提供了共同的基础。那么，当我们把差异看作是辩证的对立面时，那又会如何呢？

简单的答案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普遍紧张的世界中，这是地方层次上(强烈意识到地方的环境质量问题的)感性的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包括统治和压迫关系)，与另一个意识维度之间的对立，在另一个意识维度中，我们或多或少地承认，我们和其他千百万人(例如，那些在把早餐送上我们餐桌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起着作用的人)之间存在着物质的和社会的联系。更规范地说，在支撑一个地方的空间关系之外来理

解在那个地方发生的事，并不只是撇开在特定地方发生的事来理解空间关系。无论如何，这正是本章开头所概括的那种抽象的地方理论所告诉我们的东西。尽管那种理论或许听起来像老生常谈，或者有那么一点正确性，但其观念风格却对政治思维和实践产生了难以预料的后果。

十 通过社会—空间实践建造地方

地方被建构和体验为物质的、生态的人造物，以及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它们是想象、信仰、渴望、欲望(特别是关于“家”之观点的心理推拉力的)焦点。它们是话语活动的热切焦点，充满了象征的和再现的意义，并且是制度化的社会和政治经济权力的独特产物。这个社会过程不同要素之间的辩证相互作用(参阅表 4.1)是复杂的和难以理解的。但是，正是所有这些要素在共同社会过程之流中的聚合方式最终决定着地方建设、维持和破坏的冲突(以及常常内在矛盾的)过程。这或许使人相当沮丧，但它却是以内在统一的方式来解决地方建设之社会过程中异常复杂性的唯一方式。让我们以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纽约的时代广场是一次纯粹的地产和商业投机产物，那是在 19 世纪 90 年代围绕创造一个新的娱乐区而进行的投机。在 20 世纪早期，迁到广场的《纽约时报》赋予其“时代”这个名字(毕竟，它最大的竞争对手《纽约先驱报》坐落在远离市中心的先驱广场)。作为促销手段，《纽约时报》组织了一个盛大的新年焰火庆祝晚会，最后还搞了低俗的舞会。成千上万的人，不仅在那一天而且在全年来这里消遣，观察他人，上馆子吃饭，了解流行时尚，探听各类谈资或各种消息，从商业到房地产再到最新娱乐、时尚趋势和名人私生活。广场自身不久便成为吸引大众的广告投放中心。简言之，时代广场创建了一个表
317 象，它涵盖了地方建设政治经济学中与商业、华而不实、促销和投机有关的一切。它与来自黑森林的那种“本真的”的居相距甚远，至少在表面上，确实应该把它看作最假的，或者用文化批评家偏爱的术语来

说，是大地上的“伪地方”或“非地方”。然而，它不久便成为纽约市的象征中心，并且直到20世纪50年代衰落之前（主要是在电视的影响下），对于许多纽约人，甚至许多美国人来说，它一直是归属感和社群感的焦点。时代广场成为象征之地，在这里，每一个人聚集在一起庆祝、哀悼或表达他们集体的愤怒、快乐和恐惧。它是以政治经济模式生产出来并加以控制的，但却被平民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加以挪用。它变成了再现一种独特想象的本真之地，即使作为物质社会实践的空间，它具有纯粹投机和商品化景观的全部特点。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时代广场是作为现代纽约都市的标志崛起的，这个都市具有五个区和不断蔓延的郊区。它的崛起与异常繁荣的地产投机、大规模运输系统的出现完全一致，后一因素改变了人与人之间在城市里的整个空间关系本质（1901年地铁通到时代广场），并与新的国际和国内交流体系（特别是无线电）、信息和货币流以及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时尚和娱乐成为大众消费物品等方面的发展相一致。这是一个如科恩记录的快速“时空压缩”阶段，甚至许多纽约人似乎丧失了他们的身份感。迅速的城市增长带来的压力使得纽约人“一直在不停地忙碌”，也永久性地破坏了脆弱的移民和邻里制度，这种制度有时会在快速变迁过程中带来某种安全和稳定感。在它的繁荣年代里，时代广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公共空间，在其中，所有社会阶级都可以混杂在一起，作为一个无阶级的（或者说多阶级、多种族性，甚至多民族的）地方，它能够成为社群感的凝聚点，那种社群承认差异而又颂扬统一。妓女与贵族并肩，各类移民共享美景，而金钱民主似乎操控了这一切。但是，在这种情形中，社群并非由面对面的交流来塑造的。它是由共同出现在那种景观面前的行动所塑造的，是一个毫无廉耻的货币共同体和万物商品化的景观。纽约的时代广场确实再现了货币共同体，但它也表现了数百万纽约人心中相当不同的共同体观念，正因为它是集体记忆中唯一的象征意义和地方，所以直到今天，纽约人仍然在为这个特殊公共空间的改造和恢复竞争着设计计划。或许，由于它过于象征，人们没能注意到，时代广场的再生是由它的迪斯尼化开始的。

318 同样的故事可以从完全相反的方向来讲述。探寻本真性共同体，特别是作为那种价值——不同于通常在资本主义的、物质主义的和高度金钱化的文化中发现的价值——表现的共同体，常常激发根据替代性想象直接建设共同体和地方的尝试。然而，所有仍然继续的那些探索（那是非常小的部分）都几乎毫无例外地迁就金钱、商品化和资本积累的力量，以及现代技术。残存下来的也表现出一种介入和重新介入不断变迁的空间关系的能力。这既适用于像伊朗发生的原教旨主义伊斯兰革命（它正身处困境：如何重新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又不会看起来公然服从撒旦）这样的剧变，也符合无数社群主义运动：它们从资本主义中分离出来，不料在许多情况下却变成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最前沿——诸如在美国定居的法国的伊加利亚人（参阅 Johnson, 1974），19 世纪上半叶在纽约州西部兴起的自治主义和地方建设之特别浪潮（包括摩门教徒、震颤派教徒和早期女权主义者）；扩散到远至巴塔哥尼亚和西伯利亚的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运动，它们甚至激发了格迪斯和霍华德的新城镇运动（可以在吉尔福德看到他们的影响）。地方建设的全部历史暗示着，文化政治学往往源于地方建设的灵感，就如同对利润和投机获益的欲望一样。然而，这两者之间的相互纠缠无所不在，并且在某种情形中，文化政治学似乎更像一种政治经济目标，而非自身目标的工具。

菲茨杰拉德在《小山上的城市》中提供了美国背景下这种交集的迷人画面。对同性恋社区占据并继而控制旧金山的卡斯特罗区的研究、对林奇伯格和森城的杰利·弗尔韦尔宗教帝国的研究、对佛罗里达退休社区的研究，所有这些研究都以不同的方式说明了资本积累的文化政治学。然而，到目前为止，菲茨杰拉德的最奇怪之处是对拉杰尼希社区（Rajneeshpuram）的研究。这个社区在 1981 年成立于俄勒冈州人口稀少且半干旱的牧场区，是拉杰尼希（Bhagwan Shree Rajneesh）门徒们一个“自给自足”的公社，从生活方式的观点来看，它具有“新时代”（New Age）社区的所有象征，可是它还具有如下的特点：金钱的强大用途、高科技和世界性的国际主义，后者建立在拉杰尼希多年来培植

的信徒之网络上。据菲茨杰拉德的描述，这个牧场花费了150万美元，而且在2年之内拉杰尼希在俄勒冈花费了6000多万美元，成功地修建了全新的定居点，有飞机跑道、巨大的水库、发电站、灌溉的水田、住宅群，和能够维持3000多人永久生活以及数以万计人临时膳宿的设施规模。拉杰尼希看不起甘地和特罗莎修女，因为他们关注的是穷人。金钱是更好生活的手段。他辩论，“宗教是富人的奢侈品”，并以其21辆劳斯莱斯来佐证。但是，公社需要居住在那里的人每天至少进行12个小时的强迫劳役，而且公社还汇聚了一些教育程度高并常常是有技术才能的人，这些人在一个不分社会等级关系的公开氛围中工作，表面上快乐并满足地创造着个人发展的人类潜能能够实现的地方。然而，公社的排他政治是很强大的。在内部，它被表现并想象成精神和物质衰败的海洋中一个具有德行和真实的岛屿。外人看它是嵌入美国乡村中心的一个致癌异物。根据菲茨杰拉德描述，公社的解散、拉杰尼希的流放、一些领导人物的被捕——这些人在几年的时间内使公社从个人解放和发展的朝圣地变成了一个武装营地（从事各种暴力行为，如毒害各种各样的官员、将沙门氏菌传入隔壁社区的供水系统）——几乎没有降低那些曾经经历过公社生活的人对它的深厚感情。它提供了一个地方、一个家，尽管是暂时的，以及一系列的个人体验，为此人们心存感激。它满足了一种需要，实现了各种欲望，允许幻想以令人难忘的方式存在。但是，它还展示了所有形式的对内部差异的不宽容，以及非常微妙的等级制和排他性政治。扬正确地担心这种政治是社群主义政治学的最终后果。至于它短暂的成功，因为它具有低工资劳动营的全部特征，这些劳动营由道德热情和开创者提供劳斯莱斯所维持。努力生产地方和社会身份的本真性的文化政治学被收编和运用于狭隘的金融利益，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教训很简单。每一个要在当代世界建立差异的人都不得不与金钱的中介权力周旋。毕竟，那是全球的和普遍的社会权力，它们可以被不同的个体加以运用（因此，它为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以及大量的集体运动提供了基础），并且任何试图在地方中塑造独特身份的“解释的”

或“政治的”社群都必须迁就它。实际上，在许多情形中(如菲茨杰拉德调查的那种情形)，对于通过建造地方来揭示差异这种行动来讲，拥有足够的金钱力量都是必要条件。在这一点上，拉杰尼希有关“宗教是富人的奢侈品”这个评论过于贴切而令人不安。简言之，正是金钱力量的普遍性和社会性允许各种他性独立地生存或存在下去。那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对(如果我们有那种办法，为什么不像詹克斯或利奥塔建议的那样做一个折衷派呢)。但是，它确实迫使我们考虑当代世界中差异和他性的生产与政治经济权力的组织和分配之间的关系。这些例子表明，一般来说，文化政治学(特别是对情感社群的探究)和政治经济权力在地方建设的社会过程中纠缠在一起。不可能离开一个来研究另一个。

十一 地方和权力

写下“地方权力”这个术语，就好像地方(本地、地区、邻里、国家等等)拥有因果权力，这就涉嫌拜物教的泛化；除非，我们把自己严格地限制在作为一种社会过程的地方定义中。后一情况下，问题会变得更加清晰：为什么、通过什么手段，以及在什么意义上，社会存在物个别地，以及更重要地，集体地投入地方的永恒(本地、地区、国家、社群或其他什么地方)，使之成为制度化的社会权力之地，并因此如何以及出于何种目的来使用那种权力？

权力细分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任何经济运行的关键。在资本主义之中，不仅存在着无产阶级(被物化为“人力资源”，就好像它们或多或少地可以替代汽油或木材)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巨大分工，而且存在着多重的以及更具细微差别的等级制分工，这些分工不可避免地产生于详细的、社会的和地域的劳动分工(例如，生产线上的工人、工头、经理、服务业工人、设计师等)，以及那些使资本家分成派系的分工(金融、土地、生产、商业、管理、法律、科学、军队和警察权力等等不同

的利益集团)。那种可能在资本主义秩序之前产生的差异——如种族、语言、性别、种性、宗教、和前资本主义的社会阶级形式——被社会体系吸收、改造和重构，社会体系试图通过对自然的支配、对劳动力的剥削，以及复杂的意识形态、社会控制和国家调节体系来确保资本积累。例如，资产阶级把人类的某些部分(如妇女和“土著”)描绘成自然的一部分，他们富有情感并因此具有混乱、“非理性”、野蛮的倾向，这种策略把那部分人归为在资本主义总的计划中需要控制的要素。结果是把性别和种族压迫(以及抵抗)改造成前所未闻的形式(戈德堡的《种族主义文化》就是恰如其分的例子)。此外，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动态确保：这种改造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地理中绝对不是事件，而是持续的并常常矛盾的运动。尽管种族隔离暂时行得通，但是不难发现公司资本主义如何在发展的某些阶段上变得和它敌对。被压迫者的直接斗争，或者其他被剥夺权力的社会集团对地方建设的政治学的积极参与，在那种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作用。非殖民化的漫长历史和为民族解放所进行的斗争占据了国际舞台，但是，被打上种族标记的少数民族和妇女试图建构替代性的生活和工作之地时，这些斗争则具有很多局部表现。

321

在所有这些情形中，一个安全之地的建构在获得或抵抗政治权力的斗争中具有根本性意义。安德森说明了语言多样性通过“印刷资本主义”转变成为现代国家提供基础的民族之“想象的共同体”，这是一个有益的例子。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这一点。生活在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如吉尔福德或危地马拉)、那些要求创造制度化的社会和政治权力之地的人，他们都必须找到或发明一种足以实现某种水平的社会结合、团结和制度化秩序的形象。世界上有许多地方(想一想非洲的许多国家)，都被(殖民势力)任意地开拓成政治和社会权力之地，但是，在那里，支持实体的想象性共同体仍然尚待建造。因此，我们必须在贯穿社会过程全部要素的所有社会秩序领域内解释不断变化着的地方生产的意义。我们不只是需要理解地方如何获得物质属性(如资本主义可利用一系列生产力，或可利用来维持特殊文化形式和生活质量的一系列使用价值)。例如，对地方进行估价和划分等级主要是通过话语和再现

行为发生的，这些行为与坚定不移的信仰、价值和欲望相联系。对地方的通俗理解是通过详细解释常常异质的世界的心理地图得以组织的，那些地图中的每一张都带有各种个人和集体的希望和恐惧。在我们的思想中，城市中的贫民区不可能类似于迈阿密的金色海岸。精神分析理论教导我们，再现领域并非必然就是它看起来的那样：存在着地方倾向的各种各样(错误)再现。如果个体的身份是由幻想建构的，那么人类赋予地方的身份会很远吗？

幻想、欲望、恐惧和渴望表现在实际的行为中，就这一点而言，对地方的再现具有实质性后果。例如，地方的评估图式便是对各种决策者有利的事情。城市之地被用于金融抵押时，居住在那里的人便被当成无用之物一笔勾销，非洲许多地方正是以同样的方式被描述成无希望之地。因此，地方建设的物质活动便实现了退化和抛弃的预言。同样地，城市之地被描述成“可疑的”或“危险的”，再次导致把幻想转化为现实的公共和私人行为模式。其他地方则被描绘成“本真的”或“美好的”，证明了人类的力量：从环境中塑造永恒性，从而例证了他们周边世界具有强大的文化和道德意义。简言之，地方(重新)建造的政治经济的和象征的可能性极大地受到地方再现的评价方式的影响。

因此，围绕再现的话语斗争是激烈的，对于地方建设活动的重要性，就像砖头水泥那样。在此，积极的和消极的因素是并存的。贬低其他地方往往成为某一地方坚持自己的活力和原始能力的方式。围绕地方形象和反形象的激烈竞争是行动的一个领域，在其中，地方的文化政治学、地方发展的政治经济体系以及地方社会权力意识的积累频繁地以难以分辨的方式融合在一起。

出于同样的原因，象征之地的创造并非命中注定，而是一种辛苦的耕耘和斗争，因为地方能够凭想象存在。宗教在世俗社会中作为主要制度成功地生存下来部分是通过对象征之地的成功创造、保护和培育。但是，想象并不那么容易被操纵和驯化，以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目标。人们能够并且确实以他们自己的经验和传统来定义纪念碑。烈士们倒下的地方(如拉雪兹神父公墓中的公社社员墙)长久地激发了工

人阶级运动的想象。如果地方是集体记忆的场所，那么社会认同和把那种认同动员到政治团结结构型中的能力则高度依赖地方建设和维持的过程。

物质性、再现和想象并非各自独立的世界。任何一个领域都不可能特别优先于其他领域，即使全部活动形式的最终意义只会刻写在日常生活的社会实践中(参阅本书第四章)。通过地方建设过程而进行的政治动员同样归功于再现的、象征的领域和物质活动(Lefebvre, 1991)。但是，地方建设的不同要素之间常常产生分裂和矛盾。即使一个地方的人们的日常实践极少表现出共同性，甚至表现出完全的政治矛盾，但对这个地方的忠诚却具有强大的政治意义。例如，1871年，汇集起来产生巴黎公社起义的各种力量就是非常不同的，但它们全都围绕对它们称为巴黎这个地方的共同忠诚而团结起来，并且全都同意解放巴黎是至关重要的目标。不夸张地说，像“纽约人”这样一个术语能够对居住在那里的数百万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有意义，这个事实恰恰证明了这样一种政治力量的有效性，它能够通过在心灵以及大地上建造地方而被动员和实施。

323

因此，存在一种辩证地包含物质、再现和象征等多种活动的地方建设政治学，那些活动以个体投资到地方并因此根据这种投资而集体地获得力量的方式发现自己的特点。投资的东西可能是血、汗、眼泪和体力(在建设一个切实的地方产品的劳动中培养出某种情感)。或者它也可能是情感忠诚的话语建构，这种忠诚是在保护地方特殊形象、环境和本地传统，或者在庆祝并成为某个特别地方象征的新的艺术作品和建筑中形成的。

把这种过程浪漫化是危险的。地方在信仰、价值、理想和宗派的同质性的意象中建构，再加上一种强大的集体记忆和空间排他性权力，它能够成为世界舞台上特别强大的演员。结果是把社群团结和压抑的辩证法转化成为暴力和压迫的困境。并且，如经常争论的那样，如果一个发生内讧的地方将会瓦解，那么维持那种为政治学提供基础的永恒性便成为目标自身，无论最终的结果怎样自我毁灭。它确实必定是自我毁灭，

因为，如埃里克·沃尔夫中肯地指出的那样，建设地方和建造想象的共同体的所有企图都“必须认识到那种凌驾在独立情形之上的过程，在这些过程的发展中，穿过、超越并改造它们”（Eric Wolf, 1982:17）。

324 不同地方的生产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持续着，在其中，不管什么样的政治、社会和生态后果，“为积累而积累”的积累不会减弱。尽管政治权力的非中心化会快速地发展下去（即使无数自治运动威胁着大规模的非中心化），但同时存在着强有力的经济和话语权力的再集中运动，特别是在跨国公司、金融机构和媒体之中。后一种力量的运行意味空前规模的对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地方的破坏、入侵和重构。不断变化的生产、消费、信息流和交流的物质实践，加上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空间关系和时间范围的彻底重组，这些都强有力地威胁着实际地方的生存能力（像考利这个地方或者整个国家）。地方重建的当代必然性给空间实践以及地方得以再现并成为表象的那种方式带来了困境。正是在这个语境中，根据想象的共同体重建地方的热潮越来越容易理解，这些热潮甚至包括建设表象之地（新的景观和消费主义纪念碑，等等），或者锻造想象的共同体，防御资本主义积累的新型物质和社会实践。但是，内含在新型社群主义政治中的排他性围墙的建筑（诸如为吉尔福德提出的建议），尽管它可能干预生产、消费、交换和再生产的关系，但相对于普遍化的金钱权力来说，它总是容易穿过的。同时，当地方越来越具有排他性时，它们也就越来越不能发展一种影响货币流和资本积累的集体能力，更不必说控制这些东西的能力了。

这个状况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如我在其他地方证明的那样（Harvery, 1989a），相比于指挥空间，反资本主义运动更擅长组织和支配“它们的”地方。后现代政治强调的“他性”和“地区抵抗”确实能够在众多特殊的地方兴旺。但是，尽管这些运动为能够获得全球野心的“战斗的特殊主义”形成了潜在的基础，但听之任之，它们很容易被资本力量所控制，资本在普遍而又分裂的空间中能够调整积累。嵌入在地方中的“战斗的特殊主义”潜力冒着倒退到地方主义政治的风险。如布耶尔评论的那样，我们总是需要面对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

保持地方感的活力和敏感性，而不是让其陷入某种惬意的种族中心神龛中的教条似麻木状态”（Buell, 1995:261）。应该承认，受地方限制的特殊主义并不必然产生战斗的政治。它们往往容易成为政治消极性之地，或者是同占统治地位社会秩序合作与共谋之地。

回想一下，这是雷蒙德·威廉斯在其大部分政治生涯中与之奋斗的首要难题。《为曼诺德而战》中的一个角色这样说：

整个公共政策……都企图重建文化、社会体系和经济秩序，这些东西实际上达到了它们的目的，达到了它们寿命的极限。于是我在此就可以观察这种双重必然性：帝国的、输出的和分裂的秩序正在终结；所有残存的社会力量和全部政治形式，都为重构和重建它而战斗不止，通过一次次危机，这种战斗在一种恢复熟悉世界的不可能的尝试中不断深化。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双重的必然性：他们将失败，他们将不会再做其他努力。（Raymond Williams, 1979b:181）

那么，有无什么办法来摆脱那种必然性呢？

十二 结论

像时间和空间一样，地方是社会建构，并且必须这样来解读和理解。关于人类状况之平实的和比喻的地理学，有很多方法来研究它的唯物主义历史，这些研究清晰地揭示了历史—地理差异的生产。对那种过程的理解使得人们有可能获得一种明确的前提，来批评孤立主义的社群主义政治之空想以及对任何类型的解放政治之不可避免的麻木。

325

地方(重新)建设的政治—经济可能性被地方再现的评价方式大大地歪曲了。例如，丹尼尔·贝尔所称“文化大众”（那些在高等教育、出

版、杂志、广播媒体、戏剧、博物馆等领域工作的人，他们加工并影响着对严肃文化产品的接受。 Daniel Bell, 1976:20)中独立政治学的最有力方面之一，就是相当有力地聚焦于社群、民族和地方的意义和性质。地方身份和地方传统的塑造尤其局限于这些工人的范围(从小说家和电影制作人到旅行小册子的作者)，并且这种塑造行动采取了很强的制度形式(从保持地方语言和地方历史意义生动性的大学，到博物馆和文化事件等等)。当文化大众断绝与无产阶级运动的任何强大联系，并试图避免直接从属于资本主义文化时，它就已经变得与地方的文化政治学更加密不可分。因此，过去二十多年来，产生了大量有关那一主题的著作(例如， Agnew and Duncan, 1989; Davis at al., 1990; Lilburne, 1989; Pred, 1990; Probyn, 1990; Tindall, 1991)，并在文化大众中兴起了一系列与以地方为中心的文化运动相契合的政治行动。文化大众越是揭示自己的内在价值，它就越倾向与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结盟，即使它在根本上是谄媚的，是全球化的资本积累文化的有偿代理人。结果产生了矛盾，这个矛盾只能部分地解决：把在地理上嵌入的和具有地方特点的差异当成国际旅游商品出售。诸如 GATT、NAFTA 以及欧盟这些意欲推动资本积累的制度安排，当它们甚至在资本主义心脏地带激起地区性抵抗时，矛盾就更深了。政党分裂了，而在英国工党和法国勒庞法西斯主义运动之间却产生了奇特的利益和谐。

具有地方限制的政治的再度觉醒明显具有其险恶的一面。给予其他地方一个固定不变的形象是媒体最恶毒的杀戮形式之一(人们只要去读《太阳报》那样的伦敦庸俗小报对法国的描述，就会明白这一点)。以排他性的和老生常谈的方式来定义“他者”是通往自我定义的第一步。重新发现地方，如海德格尔例子所表明的，对于建构任何类型的进步政治来说，危险与机会一样多。如萨义德在其《东方学》(Said, 1978)中示范的那样，解构和后现代冲动确实提供了一种工具，
326 可以用来反对令人震惊的对其他地方的模式化，但是，在文化大众的总体工作中，存在着巨大的公共视角、再现和政治学的困难，这是急需正视的。

地方政治、草根政治、地方身份和民族政治、地区和城市政治，长久地伴随着我们。它在资本主义不平衡地理发展之中也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在文化大众的修辞中，以及通过这种修辞进而在政治学修辞中，重新发现作为话语对象的地方，此时重要的是它的意义而不是这样的事实，即世界已经以某种方式发生变化，从而使地方的政治经济学或者文化政治学在当前比过去更为重要。然而，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感觉，它认为后者的主张也是正确的。面对时空压缩的激烈较量，以及最近几年我们所遭受的所有重建运动的激烈较量，地方安全已经受到威胁，世界地图被重新绘制，成为保持资本积累正常运行的孤注一掷的投机冒险的组成部分。这种安全的丧失促进了对替代方案的研究，其中之一便是在地方创造既是想象的又切实可行的社群。如何创造何种类型的地方，这个问题对于经济和政治的生存都势在必行。和巴尔的摩、谢菲尔德、里尔等城市的市长们聊一聊，你就会发现，这正是他们在最近几年所专注的事情。也正是在这里，文化大众的政治学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因为，如马克思主张的，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劳动过程的终点得到一个结果，这是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想象力的产物，那么，我们怎样想象未来的社群和地方，以及如何谈论它们，这些问题就成我们可能未来图景的一部分。在某些人的想象中存在并激发很多人想象力的拉杰尼希，在人类潜在运动之中，它就吸引了一些人，努力使它成为一种曾经短暂存在过的地方。像这个例子一样，即使在想象力和现实之间存在着错位，在前进的道路上会出现许多无意识后果，但是，如何想象地方的未来以及我们如何认真严肃地关注它，这个问题一直都在议事日程上。

未来地方取决于我们的创造。但是，我们创造它们，不能不以多重方式把自己的斗争铭刻在空间、地方和环境之中。那一过程正在发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作用。由前人传到我们手上的地方——物质的、再现的和象征的——也是通过社会斗争和努力而建造的，他们创造物质的、象征的和想象的地方以适合自己特殊的和竞争性的需要。对这种过程——空间、地方和环境之社会的和政治的辩证过程——的更好

理解对我们如何创造替代性未来具有极大的教益。重新解读历史地理差异之生产的更新能力，便是解放未来地方建构可能性的至关重要的预备步骤。在物质上、象征上和比喻上把地方解放出来，这是任何进步的社会生态政治学之必然组成部分。

第四部分 正义、差异和政治学



第四部分前言

争取解放和自我实现的斗争，争取人身自由、独立自主和正义的斗争，解放空间和释放时间、解放地方的斗争（最典型地体现在民族自我解放的斗争中），甚至诸如地球优先(Earth First)这种生态组织的辞藻中出现的“把自然从人类控制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所有这些斗争在人类历史地理进化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启蒙运动使围绕这些信仰和话语主题的众多人类情感和欲求变得明确以后。如伊格尔顿(Eagleton, 1990:363)所言，我们的历史地理“充满着人类对正义和福利的欲求，大声疾呼最后的审判”。但是，这种被称为正义的性质是什么呢？在过去，又有多少企图创造一个正义社会的努力最终变成苛政或衍化为暴力、腐败和非正义呢？正义有可能不是特定时间内特定地方中的权力斗争的结果吗？

下面是从托尼·希勒曼以纳瓦霍乡村为背景写出的小说《神圣的小丑》(1993)中摘出来的一个段落，让我们来看一看它的意义吧。部落警察切说：

“我们所说的正义，就是报应。说实在的，那是一种宗教观念。我们会说，部落警察就是某种信徒。他尊重他的人民的传统。他们被灌输了一种不同的正义观念。在他听到诸如‘罪有应得’或者‘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之前，他是一个大人物。他现在听到的不是那些东西，而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报应。如果你伤害了某个人，那么就应与他的家人们坐下来商量伤害有多深，如何补偿。

这就是恢复霍佐的方式。^①你使两家人和睦友好。这同标准的美国正义并没有多少不同。不过，现在不一样了。如果某个人卑鄙地伤害你……那他将是霍佐之外的人。人们不会对你说，他应该受到惩罚。他应该接受教育。与他的世界恢复平衡，重新使事物美好起来……当然，是在内心。回到和谐。这个假想出来的警察，那就是他从小受到的教育。不要把价值建立在惩罚上，而要建立在教育上。如果你是这个警察，那么你现在要做什么呢？”

330

珍妮特说：“当你面对这个问题时，很难运用常规的大众法律教条来解决问题。”

“或许景观就是部分答案，”切说。“或许它使答案有点不同。”

景观(参照本书第十章)承担着记忆的功能，充满了特殊意义，美洲土著居民的集体身份感和价值典型地依赖它；上面这个例子表明了某种正义观念，它具有与众不同的性质、完整性和意义。正义和报应是两种非常不同的观念。这是否意味着，永远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正义观念呢？

对此，历史地理证据给出了一个明确答案。像空间、时间和自然一样，“正义”是一组社会地构成的信仰、话语和制度，它表现了社会关系和竞争性权力构型与特定时间内调节和安排地方的物质社会实践之间的密切联系。一种特殊的话语性正义观念一旦建立起来，它在社会过程全部环节中的踪迹就成客观事实，涵盖其范围之内的所有人。一个正义体系一旦制度化，它就成为一种“永恒”，社会过程的所有方面都与之相关。

然而，赞成一种特殊的社会正义定义总是暗示着诉诸某种更高标准，从而确定一种社会正义理论比另一种更加公正(这是切的问题)。于是，论据的无限退缩就显得突出，就如在其他方面相对轻松地把社会

^① Hozho, 纳瓦霍语, “安乐”、“和谐”之意。——译者注

正义解构为意义那样，无论什么个人或集团(考虑到他们的多重身份和作用)都会在特定时刻发现意义表达具有实用的、工具性的、情感上的、政治上的或意识形态上的用处。

有两种方法适用于那种论证。第一种，观察多重正义概念如何深嵌于语言之中，这就导致维特根斯坦提出的意义理论：

句子的种类有多少呢？……有**无数种**：我们称之为“符号”、“字词”和“句子”的无数种不同用法。这种多样性并非某种固定的东西，一旦给定就一成不变，而是如我们可能说的那样，新语言种类、新的语言游戏总是不断形成，而其他的则陈旧过时，被人遗忘……在此，“**语言游戏**”一词意欲强调下述事实：**讲**一种语言是行为或者生活形式的一部分……我们如何学习这个词的意义(例如，“好”)？从何种范例来学？在何种语言游戏中？那么，我们将很容易看到，词必须具有一个意义的“家族”。

从这种视角看，社会正义并不是在意义上而是在意义的“家族”上具有普遍的共识，那种家族只能通过它们深嵌于其中的某一特殊语言游戏才能理解。但是，请注意有关维特根斯坦理论的两件事情。首先，331意义“家族”暗示着某种相互联系，并且假定我们应该注意这些关系的性质。其次，每一种语言游戏都与说话者特殊的社会的、交流的、经验的和感性的世界相关联。结果使我们理解了有关文化、语言或话语的相对主义，尽管这种理解是基于主体的物质环境的。因此，我们也应该仔细地关注这些物质环境。

第二种方法，承认正义话语的相对主义，但坚持话语是社会权力的表现，且意义“家族”从不同社会形态之中和之间的权力关系中获得自己的相互联系。对这种观念的最简化理解是，把社会正义解释成在任何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之霸权话语中的嵌入性。这将回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色拉叙马霍斯说：

每一个统治者都制定对自己有利益的法律，平民政府制定民主法律，独裁政府制定独裁法律，依此类推。他们制定了法律就明告诉大家：凡是对政府有利的对百姓就是正义的；谁不遵守，他就是犯罪，又有不正义之名。因此，我的意思是，在任何国家里，所谓正义就是当时政府的利益。^①

柏拉图提出这个论点是为了反驳它，但是并不接受柏拉图唯心主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却将其复兴为一种深刻的历史力量。例如，恩格斯写道：

衡量什么算自然法和什么不算自然法的尺度，则是法本身的最抽象的表现，即**公平**。……于法的发展就只不过是使获得法的表现的人类生活状态一再接近于公平理想，即接近于**永恒公平**。而这个公平则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在普鲁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怜的行政区域条例也是对永恒公平的破坏。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加以判断的各种情况很简单，公正、不公正、公平、法理感这一类说法甚至应用于社会事物也不致引起什么误会，可是在经济关系方面的科学研究中，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说法却会造成一种不可救药的混乱，就好像在现代化学中试图保留燃素说的术语会引起混乱一样。^②

^① 译文参照《理想国》，郭斌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9页。——译者注

^② 本处译文取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212页。其中，“公正”一词与我们在本书中采纳的“正义”一词是同一个词的不同译法。——译者注

由此得出结论，在理解强加到概念之中的特殊意义时，无论何种论证，其“立场”或“观点”都是相关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如我们所见，这种情感在后现代文学中进一步发展了。但是，恩格斯的论述具有歧义。尽管正义观念或许因所涉时空和个人而变化，但是“不致引起什么误会”地接受一种特殊的观念却能为政治行动提供有力的动员话语（例如，在法国大革命中）。

此外，把一些特殊意义投射到不同世界空间中，就好像它们具有普遍的意义，这种做法已经对全球历史地理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我们发现“战斗的特殊主义”的一种形式，它因产生了各种各样显著影响而逐渐具有普遍意义。例如，联合国宪章昭示了一种普遍人权宣言；大赦国际追求一种普世政治学，市场契约的国际惯例强调无论资本主义和商品交换在何处进行都必须遵守市场的自然正义。公正、公平和正义观念在我们的词汇中已经牢牢地确立自己地位，如果不求助它们，我们似乎便无法做出任何政治决定。

正义问题径直落入了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的张力之中，并因此不可能（在政治上、理论上和经验上）安稳地居于两极中的任何一极。婉转一点说，结果是很奇怪的。正义似乎成了调节人类事务绝不可缺少的基本概念（例如，用第八章的语言来说，把竞争、适应、合作和环境变迁的“自然法则”翻译成人类行为的集体形式）。然而，除了作为特殊时空中专制权力的任意后果，人们并不认为基本概念有什么基础。虽然像空间、时间、地点和环境一样，正义也是社会地建构和生产出来的，但是似乎并不存在什么简单方法来弥合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系统性和任意性、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的鸿沟。

但是，谈论一种替代性的社会秩序就是揭示一种可能的世界，在其中，正义得以解释并制度化的替代性方法也是可能的。我们把可能世界的观念归功于莱布尼茨，如我们在第十章所说明的，他借助这种观念创立时空相关性理论。在此，有一种类似的东西有助于理解关系性正义理论的作用。空间形式的乌托邦理想（经常被理解为正义社会的标志）像牛顿提出的任何东西一样都是绝对的（且专制的）（并且，在空间的

绝对性质问题上，托马斯·莫尔爵士和牛顿使用了相似的语言，注意到这点是非常有意思的)。同样，有关正义本质的话语绝对主义也是专制主义的。那么，怎样的乌托邦理想是可能的呢？或者更直接地说，有关正义社会的人类想象力怎样才能反资本主义政治中发挥积极作用呢？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马勒(Maler, 1995)非常巧妙地将之作为中心主题带回到对反资本主义政治和反资本主义修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之中。

在下文，我将从相关的和辩证的社会过程视角来讨论这个难题。我希望达到的结果是，有可能把探寻正义的动员力量作为一种原则性方法而不只是一种范例或机会来运用，借助于那种方法，我们来探讨调节人类关系和我们集体行为的必要性，以便在一个既定的生态、历史和地理条件下实现某种特殊目标。但是，理解特殊正义观念在特殊过程中的嵌入性对此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尽管切实可行的空间、时间、地方和自然概念并不比正义概念更重要，但是我们却必须首要地关注它们通过社会实践得以建构的方式。如我希望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清楚地表明，过程乌托邦理想看起来完全不同于形式乌托邦。辩证的/相关的观点之含义是，我们应该用可自由支配的全部知识来追求前者，而必须把后者作为一种自我否定抛弃掉。

第十二章

阶级关系、社会正义和差异的政治地理学

脱离具体的物质环境和政治方案，要说清有关身份、多元文化主义、³³⁴“他性”和差异的政治，这是很困难的。所以，在今日美国主导的特定物质环境中，我将在一个特定难题——探寻“在社会上正义的”社会秩序——的语境中来讨论这些问题。

一 北卡罗来纳州的哈姆雷特

北卡罗来纳州的哈姆雷特(大约六千人口)，有一家鸡肉加工厂，是帝国食品公司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办的。在低成本的工业化管理条件下，鸡肉产品是大规模生产的，它在今天是宗大买卖。对于多数美国穷人(他们受到近 20 年收入不断下降的打击)来说，鸡肉是主要的蛋白质来源，而且对健康的关注甚至使富人也热衷于鸡肉菜肴。鸡肉消费因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翻了一番，相当于牛肉消费，并且随即就超过了后者。生意越做越大，产业地位也就越来越牢。家庭作坊式企业几乎一夜之间成了巨大的农业综合产业，在其中，20 家公司控制了四分之三以上产量，现在一年市价就超过 200 亿美元。鸡肉产业以一个巨大的弧形发展着，从马里兰州的东海岸，穿过卡罗来纳州，横跨南方腹地，一直到得克萨斯的锅柄地区。众所周知，在这个“烤鸡地带”，农

业收益被工业所支配，而且在一些州——阿肯色州就是最好的例子——工业是重要的雇主和财富来源。这样的经济实力，就不可能不考虑其政治影响。在阿肯色州，时任州长的克林顿第一次连任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反对 Tyson 食品公司，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鸡肉生产商。他再次当选为州长，甚至在某些人看来甚至入主白宫，都极大地依赖于白手起家的烘烤界之王 Don Tyson 的妥协，或者说，讨论。除了每星期宰杀 2 900 万只鸡(是位列第二的 ConAgra 的两倍)，以及拥有一个位列《财富》500 强之 100 位的公司(Frantz, 1994)，这位 Don Tyson 主要就是因为给克林顿政府中权势人物提供可疑的资助和建议而出名的。

烤鸡业的普遍工作条件对健康绝对不利。沙门氏菌污染是一种地方性危险，污染问题也很普遍，对生产条件的描述很可能会激起那些只对动物权利略微敏感的人的愤怒。烤鸡产业的附属业是鸡肉加工业，约 250 个工厂内雇佣 15 万名工人，它们主要位于非常小的城镇或贯穿于“烤鸡地带”的乡村环境中。虽然这个行业已经采取某些措施使加工过程对鸡来说更加人道一些，但它并没有对工人做些什么。

1991 年 9 月 3 日，也就是美国庆祝它的“劳工节”的第二天，帝国食品公司在哈姆雷特的工厂失火。工厂的多数出口是锁着的，全部 200 名工人中有 25 名死亡，还有 56 名身受重伤。

按照任何发达工业国家的标准，这是一起巨大的行业事故。而且，正如为数不多的调查此事的记者之一斯特拉克(Struck, 1991)所发现的，它还揭示了“在美国南方盛行着最新的苦力产业”这个非常残酷的事实。工人一开始拿最低工资(每小时 4.25 美元)，后来提高到每小时 5.6 美元，按税后收入来计，每周不到 200 美元，这是一个带着孩子的单亲家庭位于贫困线之下的工资水平。但是，在哈姆雷特，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其他就业机会。正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任何一种工作都好于没有工作”，在这个特殊小镇上，就像许多“烤鸡地带”的其他地方，这个工厂是至关重要的经济资源。因此，那些在地理位置上相对偏僻的乡村小镇上的人很容易就成为寻求廉价的、无组织的、易于调教的劳动力的企业的捕获对象(参见 Toth, 1993)。斯特拉克是这样继

续他的报道的：

帝国食品公司的工人们描述的工作条件是低人一等的，没有福利，没有安全措施。雇员们说，挨骂是家常便饭，在生产线上时只允许有一次上厕所的机会，只有一天医生准许的休息。任何的违规都会被记录下来，当作是一次“事故”，而一个工人有5次事故就会被开除。36岁布伦达·麦克唐戈尔德(Brenda Macdougald)已在这个工厂干了2年，他说：“工头从不把你当回事，他们想要你做的全部就是把鸡肉弄出来。”痛苦的阿方索·安德森(Alfonso Anderson)说，“他们把工人当作狗一样”。他27岁的妻子佩琪(Peggy)在那次火灾中遇难。尽管不满意，但她还是在那里工作了11年。他强忍着泪水说道：“在那里，为了保住工作，你必须忍气吞声。”

336

长期以来，北卡罗来纳州就习惯于公开鼓吹低工资、友好的商业氛围和“工作权”立法，这使海湾边的这些联盟一直都是吸引此类制造业的诱饵。从整体上来看，家禽业每年给北卡罗来纳增加的经济收入估计超过15亿美元。在北卡罗来纳，“友好的商业氛围”被转换成不执行有关职业卫生和安全的法规。北卡罗来纳“只有14名卫生检查员和27名安全检查员，对照联邦标准(114名)，它的比例全国最低”。按照国会要求，联邦职员应该去补充这一缺口，但在这些年没有人去视察北卡罗来纳州的工厂。因此，哈姆雷特的这家工厂在开办11年来就没有被检查过。“这里没有灭火器，没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没有安全出口的门”。虽然火灾很普遍，职业伤害率差不多也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但这个州的其他工厂很少被检查，更不用说被列入违规之列。

这一事件迫使我们反思。首先，这是一个现代的(也就是最近建立的)产业，对它的工作条件的描述可以很轻易地插入卡尔·马克思《资本论》(出版于1867年)“工作日”那一章，而不会让人注意到有多

大差别。这对于“自由市场胜利论”无疑是不祥的预兆。这种“胜利论”在我们把目光转向东方时经常会看到，同样也可以很轻易地在西方获得，在新设产业的工作条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与19世纪的英国之间可以划一个可怕的等式。至于事件本身，在美国最显著的对照是三角女式衬衣公司1911年的大火，在这次火灾中，有146名职工死亡。这导致了10多万人走上百老汇大街进行抗议，后来成为争取更好工作保护的劳工运动的著名事件。然而，正如戴维森(Davidson, 1991)所指出的，“尽管颁布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法律、法规和条例来保护工人，但大多数帝国公司的工人还是像纽约的女工们那样死掉了：绝望地敲打着封锁起来的防火门”。

337 第二个反思就是，我们应当密切关注美国乡村和小城镇的产业结构发展，因为在于，过去10年左右时间中农业就业率的降低(更不用说一系列农场破产)已经产生了一个相对孤立的产业后备大军(再次强调，这类事情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相当彻底地描述过——比如，在第25章第5部分)，他们比城市同行更容易受到剥削。长期以来，对工人进行空间分散和地理隔绝是美国工业劳动力控制的主要机制之一(像在鸡肉加工和肉类包装这样的产业中，这个程式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同样也被运用于电子和其他据称超现代的产业中)。但是，在工业组织、灵活选址和解除管制方面进行的改革此时变成了强制剥削的一个完全明显的形式，在组织形式上，已经是前福特制的而非后福特制的。对北卡罗来纳州的影响造成了下面两者之间的鲜明对比：一方面是吹嘘过头的和研究过度的高科技信息公司“三角园研究区”，另一方面是距其1小时左右路程的根本不同的并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稀疏的乡村鸡肉加工厂。

这引起了第三种反思，通过近20年来非工业化和工业重组来分化“传统”(也就是说，蓝领的及加入工会的)工人阶级权力形式的许多力量和机构。乡村地区许多新工作的分散和创造有利于资本主义对劳工的控制，他们容易找到非工会的和顺从的劳动力。中心城市的制造部门——它们更容易表达组织化的不满或政治管制——已变为高失业区(像芝加哥、纽约、洛杉矶和巴尔的摩这样的城市目睹了其传统的蓝领

制造业工作在过去 20 年中被削减了一半)或无组织的血汗工厂类的工业区。市中心的非金融区——它在过去成了关注的焦点——因此越来越成为失业和压迫(导致近期洛杉矶暴乱的那类事)的中心,而不是典型的劳动剥削和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产物。

但是,在这里我要集中关注的直接事情是:对于这个巨大的事件,政治反应普遍缺乏。因为虽然三角女式衬衣公司的火灾在 20 世纪初的纽约激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但是 20 世纪末在北卡罗来纳的哈姆雷特发生的火灾却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媒体或政治的关注,即使一些劳动团体和政治组织(如杰克逊的彩虹联盟)确实设法对它予以关注,却把它当作是伦理和道德的一个突发事件。与之形成有趣对比的是 1991 年 9 月克拉伦斯·托马斯最高法院提名听证会,这成了大量政治动乱和行动以及媒体辩论的主要焦点。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听证会聚焦于专业的而非工人阶级语境中的种族和性别关系的严肃问题。把北卡罗来纳哈姆雷特事件与洛杉矶事件进行对比也是有用的。洛杉矶事件中,在高速公路上鞭打罗德尼·金以及涉案警员未被判定有罪所表现出来的压迫触发了一场实际上的城市穷人暴动,而乡村工厂由于剥削而导致的 25 人死亡却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一点反应。

338

当我们知道,哈姆雷特火灾死亡的 25 人中,有 18 名妇女和 12 名黑人,这时候,对比甚至更加意味深长。很明显,这并不是整个“烤鸡地带”上罕见的冰业结构轮廓图,虽然拉美裔人群很典型地替代了非洲裔美国人,尤其是在得克萨斯的锅柄地区。在这种情形中,穿超越种族和性别界线的共性很明显是阶级共性,并且我们不难发现直接意味:简单的、传统的阶级政治形式本来既可以保护白人男子的利益,也可以保护妇女和少数派的利益。而且,这继而会提出一些重要的问题:到底什么样的政治,何种社会正义,以及怎样的伦理和道德责任,足以保护那些被剥削的人,而不管他们的种族和性别。我在此探究的论点是,正是具有剥削性质的原始的阶级政治才创造了这样的情境,在其中,一个事件(火灾)可能才产生上述那种结果。斯特拉克推测,北卡罗来纳的哈姆雷特事件是“一个注定要发生的事件”。

首先来看一看美国工作场所安全和制定规章实践及实施的一般历史。围绕着诸如三角女式衬衫公司火灾事件所引发的工人斗争极为重要地把职业安全和保健置入 20 世纪 20 年代的政治议程之中。在不放弃商业利益的前提下,努力满足某些最低限度的要求,这就是罗斯福新政联盟(包括工会)的一个根本特点。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取得了控制劳动场所内阶级斗争(包括安全方面冲突)的权力,以及确定法律条件的力量,在这些法律条件下,工会(常常直接承担健康和安​​全事务)得以建立。但是,直到 1970 年,受民主党控制的国会才将自新政以来积累的一些零碎法规合并到职业安全与保健管理总署(OSHA)的组织内,使之真正有权规范劳动场所中的商业实践。应当指出的是,这次立法是一揽子改革的一部分,包括建立环境保护局(EPA)、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以及矿山安全健康管理署,所有这些都表明了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受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已做好很大的准备来制定法律,以扩大国家干预经济权力(尽管总统是共和党的)。

339 我认为,认清是什么条件导致民主党制定这种具有干预主义特点的法律是很重要的。作为一个政党,民主党从新政以来就试图同化工人阶级利益团体,而绝非代表它们,更不用说成为它们的一个积极工具。事实上,这项立法并不是阶级和派别联盟的政治成果,虽然它产生了新政,但却是在那十年快结束时出现的。在那十年中,政治已经从普遍计划(像社会保障)转向了特定目标的计划:帮助复兴市中心区(如模范城和联邦资助的住房计划)、照顾老人或特别贫困的人(如医疗保险制度和公共医疗补助制),以及面向最贫困群体实行头脑启迪运动和平权法案。这种从普遍主义向特殊团体定位的转向不可避免地制造了各个团体之间的紧张,助长了分裂而不是巩固了宽泛意义上的进步的阶级联盟。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出现的每一部法规都迎合了不同团体的需要(工会、环境主义者、消费者维权团体等)。然而,实际效果却是制成了一个相当普遍的威胁:许多特殊利益集团的经济干预,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职业安全与保健管理总署——对生产领域的干预。

当然，后者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领域。因为虽然它被接受了，甚至是被最顽固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接受，但是国家的根本作用总是确保市场的正常运行和尊重私有财产权，正如马克思(Marx, 1967)很早以前就指出的，对产生秘密利润的“隐蔽场所”进行干预总是会受到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根深蒂固的反抗。踏上商业特权这片神圣的土地会引发直接的政治反应。埃兹奥(Edsall, 1984)很早就发现了其方向：

20世纪70年代，商业改善了它充当一个阶级的能力，隐藏其竞争本能，以利于立法领域的联合和合作。……在对抗诸如消费者保护法和劳动法改革这些法令时，以及利于税收、调控和反托拉斯立法颁布时，商业政治策略的决定性主题成为共同利益，而不再是个别公司寻求特殊的利益。

在充当一个阶级时，商业在20世纪70和80年代越来越运用其金融权力和影响(尤其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有效地把共和党作为自己的阶级工具，并形成—个联盟来反对所有形式的政府干预(那些对它自己有利的除外)和福利国家(体现在政府开支和课税上)。这在里根政府任期的政策创新中达到了顶点，这些创新措施集中于：

一种全面的动力，缩减联邦对工业、环境、劳动场所、卫生保健，以及买卖关系进行调控的范围和内容。里根政府解除管制的动力是通过如下方式得以实现的：急剧削减导致执行能力减弱的预算；任命反管制的以工业为导向的代理人员；最后，授予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史无前例的权威来拖延主要的管制、强制对调控建议进行重要的修改，并通过长期的成本效益分析来有效地破坏大范围的调控积极性。(Edsall, 1984:217)

共和党在这段时间内自愿成为“其主导阶层的选民”的代表，这与

民主党的“在意识形态上摇摆不定”态度形成对比。民主党态度源自“这样的事实，即它与各种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是散漫性的，这些团体——妇女、黑人、劳工、老人、拉美裔人、城市政治组织——中没有一个明显地强于其他团体”（Edsall, 1984: 235）。而且，民主党人对“大企业”捐款的依赖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也特别容易受到商业利益集团的直接影响。

结果足可预料。一个相对有凝聚力的阶级力量遭遇到一个几乎不能以阶级术语来设想其利益的分散反对派，结果几乎没有任何疑问。像国家劳工关系管理委员会(NLRB)和职业安全与保健管理总署(OSHA)这样的机构就被削弱或转向以适应商业而不是劳动议程。例如，穆迪(Moody, 1988: 120 和第 6 章)指出，1983 年，NLRB 对一项不公正的劳动行为做出裁定平均要 627 天，如果涉及解雇，而这个被解雇的人在这段时间内无以为生，那么就会是一个难以忍受的等待时间。正是这种完全不理睬法律的这种政治和行政气氛，支配着劳动权利和职业安全和保健，为北卡罗来纳的哈姆雷特“随时会发生事故”创造条件。

没能表达 1911 年纽约三角女式衬衫公司火灾之后的那类政治愤怒也值得进行评论。一个相对遥远的乡村背景中发生的类似事件为大众的现场政治反应(如百老汇大街上的抗议示威)直接提出了后勤问题，它说明了资本主义地理分散策略——把远离政治化中心城市位置作为劳动控制的手段——的有效性。实现普遍化的政治反应的唯一一个不同途径在于广泛的媒体关注和公开辩论——的确，鉴于现代通讯技术，这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但是，此刻，在 1991 年情境中盛行的两个其他因素开始发挥作用。首先，政治问题的媒体传播条件发生了变化，鞭打罗德里·金和肥皂剧式克拉伦斯·托马斯听证会的图像视频比北卡罗来纳火灾后果的静止画面更加有力(我们将在第十三章中再次遇到这个问题)。其次，不仅是可能会从事这项事业的工人阶级机构大为削弱，既表现在对媒体做出反应的能力上，又表现在利用媒体的能力上，而且任何类型工人阶级政治的观念同样采取了守势(甚至在某些“激进”领域内就是完全值得怀疑的)，即使过去二十年来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和日益受限的共和党一

直在发动一场针对最贫困的弱势人口的毫不留情的和全面的阶级战争。

工人阶级政治在美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的削弱可以追溯到很多原因，不能在这里详细展开，但是一个推波助澜的因素就是围绕特殊问题的“进步”政治越来越分裂，以及那些所谓新社会运动的兴起。这些运动聚焦于性别、种族、种族划分、生态、性、多元文化主义、社群等等方面，它们常常成为传统阶级政治的实用而有效的替代方案。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对这些政治会表现出彻头彻尾的敌意。

在此指出这一点是有启发性的：据我所知，所有与这些新社会运动有关联的机构，没有一个认为从政治上介入在北卡罗来纳的哈姆雷特所发生的事情是适当的。尽管在北卡罗来纳火灾中死亡的主要是妇女，继续忍受“烤鸡地带”巨大剥削的也主要是妇女，但妇女组织却陷于性骚扰问题，并正在动员起来反对克拉伦斯·托马斯的任命。而且，除了彩虹联盟和杰西·杰克逊，非洲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美国人)的组织也很奇怪地对这件事保持沉默，一些生态学者(特别是动物权利保护派)表现出的对小鸡的同情反而多于对工人的同情。因此，媒体的普遍腔调就是渲染“事故”的恐怖，但却根本不去探究其起源，当然也就不会把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共和党、北卡罗来纳州或职业安全与保健管理总署的失误指定为这一起谋杀性玩忽职守事件的同谋。

二 正义的后现代死亡

根据正义最常识性的含义，我们大部分人将会承认，在哈姆雷特工厂中男人、女人、少数民族的工作条件在社会上是不公义的。然而，做出这样一种断言就需要假设：关于我们做什么或者社会正义的概念应该意味着什么，存在着某些普遍接受的标准；还要假设：除了正常的的不确定性，把这样一个强大原则应用于北卡罗来纳的情境，并不存在任何的障碍。但是，在“后现代”时期，“普遍性”是这样一个受到怀疑和质疑的词，甚至是完全敌意。普遍真理既容易发现又可作为政治经济

行动指南加以应用，这一信仰在当代常常会被视为“启蒙计划”的首要罪孽，也被视为据称由它创造的“总体化的”和“同质化的”现代主义的首要罪孽。

后现代对普遍主义的批判使社会正义这一概念的应用成问题。而且还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对这一概念的质疑不仅是适当的而且是必须的——太多殖民地人民饱受西方帝国主义特殊正义的折磨，太多非洲裔美国人在白人正义的掌心中遭受苦难，太多妇女忍受着父权秩序所强加的正义，太多工人忍受着资本家所强加的正义——这使得正义概念绝不成问题。但是，这是否意味着，这个概念是无用的，或者说把在北卡罗来纳哈姆雷特所发生的事件称为“不公正”并不比地方性的和偶然性的抱怨更有力量？

各种各样唯心主义的和哲学的解释进一步增加了这一概念的运用难度，这些解释在漫长的西方思想史中附加到这个概念之上。存在着多种竞争的社会正义理论，它们各有千秋。比如，平等主义观点就遇上了这样的问题，即“再没有比平等对待不平等之事更加不平等的了”（例如，平权法案的先决条件对美国机会平等的教义所作的修改就认识到了那一问题的历史力量）。实证法理论（凡是法律说的都是公正的）、功利主义观点（最大多数的最大好处）、社会契约和自然权利观点，连同对正义的各种直觉主义的相对剥夺和其他解释，所有这些都竞相吸引我们的注意，给我们留下了那个猜不透的难题：究竟哪一种社会正义理论最具有社会公正性？

某些特殊形式的社会正义的支持者们可能会渴望普遍主义，对他们来说，社会正义很早就被证实是一套相当异质的概念。而且，在确定在细节上有特殊差别的话语（假设它们是关于社会正义的或别的事情的）如何产生以及成为权力作用的一部分时，“情境性”、“他性”和“位置性”（通常首先是从阶级、性别、种族、种族划分、性偏好，和社群角度来理解，虽然在一些陈述中甚至这些范畴还被猜疑）也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评估某个事件，如帝国食品公司工厂的火灾，并不存在可以直接依赖的作为规范概念的普遍正义。只存在着特定的、竞争的、分

裂的和异质的正义观念和话语，它们产生于特殊情境。

解构和后现代批评的任务就是去揭示所有有关社会正义的话语如何隐藏着权力关系。这是恩格斯推理方式的后现代扩充(参阅本书第四部分前言)，怀特(White, 1991: 115—6)充分描述了其结果。后现代主义者主张：

我们过于心安理得地使“公正”一词依附认知的、伦理的和政治的安排，最好把这些东西理解为权力现象，从而压迫、忽略、排斥及惩罚他人。在揭示有关正义的主张时，后现代思想家们暗示，他们的工作服务于某个更加有效但却不确定的正义观念。人们在德里达有关“解构是正义”的主张中看到这一点，但也在他“人们既不能直接谈论正义也不能体验正义”的警告中看到这一点。在回应对他者的责任感时，人们服从正义，不过却感到这项任务具有无限的、开放的特点。

然而，这个结果却产生了“一个相当简单的两极世界：为正义而奋斗的解构主义者和其他的后现代主义者，以及倡导不公平秩序的传统伦理学家和政治理论家”。这反过来又为后现代论证带来了严重的两难困境。

一方面，其认识论方案就是降低从理论上正义和美好生活说明总体性和普遍性的全部努力的重要性；但是另一方面，其实际方案却有效地抵制着社会理性化过程的总体化和普遍化危险。简而言之，当代社会大量不公正的根源被视为普遍的和系统的；尽管如此，这种回应却使它自己不能在类似层次上运用正义理论来规范地面对这个困难，这个正义理论提供了普遍有效的实质性原则。因此，后现代反思就好像要放弃能够指挥一场成功战斗的标准武器。

在导致北卡罗来纳哈姆雷特事件的环境中，我们恰好可以发现这种困难。当企业把自己组织成一个阶级来攻击政府调控和福利国家时（以其支配性的社会理性和公正的再分配观念），它的名义是，对私有产权的调控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对企业家在自发市场中通过打拼而获得的成果进行课税是不公平的。长期以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理论家（亚当·斯密以降）一直论证，竞争性地组织起来的、限定价格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企业家有权抓牢凭借自己努力而得到的利润——能够最好地实现公正的赏罚。那么，就没有必要在理论上、政治上或社会上争论正义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因为凡是市场的结果都是公正的。例如，生产的每种“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将会依据它们对生产的贡献而获得其边际利润率和公正的报酬。政府的作用应该限制在确保市场自由地发挥功能（如通过抑制垄断力量）以及确保它们“恰当地组织起来”（这也许会包括对市场失灵的弥补，诸如环境污染和健康危害这些无法估价的外部性。参阅本书第十三章）。

当然，把这种正义概念解构为特殊政治经济权力的表现，这并不需要费多少口舌（例如，Carlson, 1992）。然而，就如美国过去数十年众多“抗税”所表明的，这样一种立场已经获得了广泛的或许霸权的接受。从这一观点来看，北卡罗来纳事件可以被解释成基本上公正的制度中的一个不幸事故，也许还要加上管理失误。这个制度：（1）提供了就业机会，不然就没人按照当地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决定的标准获得收入；（2）使商店里充满了穷人在很大程度上也能买得起的便宜蛋白质（和前苏联形成对照）。只要这种市场公正赏罚的学说是意识形态霸权的，那么北卡罗来纳一案中的抗议将会被最小化，并仅仅局限于调查是谁把门锁了起来，谁应该赔偿受害者。在帝国食品一案中，在一个“令人惊讶的”辩诉协议中，业主埃梅特·罗承担了全部责任，承认 25 项过失杀人罪指控，以换取免于对工厂两名管理者的犯罪控告，其中一名就是他的儿子。罗名义上被判刑 20 年，但 65 岁的他有望三年后获释。起诉人之一说：“我确信对锁门措施负有责任的人正在坐牢。”辩护律师同样对辩诉协议满意，竭力称赞老业主“牺牲自己拯救家庭”的做法

(《纽约时报》，1992年9月15日)。公司本身因为州政府征收80多万美元的罚金而破产，这使得对受害者的赔偿问题在一年多时间内陷入混乱。1992年11月，就在克林顿竞选胜利之后，原先以工作条件如此之差，以破产业主应该独自负责为由拒绝赔付的保险公司最终同意支付1610万美元赔偿金，(律师拿走他们的那一份后)在80多户有伤亡的家庭中进行分割。

对哈姆雷特案件做出的温和且完全合法的反应，以及它的处理风格可以被看作一个信号，暗示着市场导向的正义观念在当今美国如何占据着统治地位。就是这种通过市场心理和市场正义来调停问题的占统治地位的方式，又使人想到了在上海发生的类似案例。麦子文(Mai Ziwen)， “一个台湾商人，他在上海开办了一个福州纺织品仓库，61名工人因被锁在大楼里而在一次火灾中死亡”^①。他获得了两年缓刑的“宽大”处理，表面上是因为他“表现出了悔悟”，并“配合火灾的事后处理”。但人们普遍认为那是因为中国——在类似自由市场雇佣劳动条件下努力吸引外资(哪怕是来自台湾地区的投资)——极不愿意因为任何严厉处罚措施而给外来投资者发出错误信号(Sommer, 1994)。在此重要的不是对犯罪的宽大处理(虽然这种处理有多方面的考虑因素)，而是那种令人震惊的方式，在考虑减罪条件之前，作用于工人的体系暴力变成了个人犯罪和疏忽问题。

345

用于反对这种市场正义的明显话语是工人权利话语，它们调动所有阶级斗争辞令来反对剥削、赢利，和对工人权利的剥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类问题上都不会回避任何有关权利和正义的言论。虽然他们清楚地认识到，由于时空条件和个人情况的差异，这些概念具有不同的意义，但正如马克思(Marx, 1976: 235)以劳资之间围绕工作日长度的斗争案例证明的那样，阶级关系的迫切需要必然会产生“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

^① 此处原文叙述有误，应该指的是1993年福州马尾高福纺织公司特大火灾。——译者注

在这样的平等权利(资本家的权利和工人的权利)之间,“力量起决定作用”。在这里,真正问题不是依据某种普遍的正义原则在各种对抗性要求之间进行仲裁,而是特定情境下应用特殊正义和权利概念的阶级斗争。在北卡罗来纳案例中,假如在合理的经济保险和安全条件下工人权利及其合理报酬得到充分尊重,那么这个事件几乎肯定不会发生。并且,如果所有工人(连同失业者)被给予相同的权利,假如鸡肉加工业(以及其他产业)中过高的利润率得到抑制,那么穷人得到这种相对低价的蛋白质来源的重要性就会被大大降低。

然而,难题在于,工人阶级关于权利和正义的言语与它的资本主义对等物一样容易受到批判和解构。正因为对阶级的集中关注不能也不会直截了当地承认异质性和差异的存在,例如,基于种族、性别、性特征、年龄、能力、文化、场所、种族划分、宗教、社区、消费偏好、团体关系等等方面的异质性和差异,人们认为,专门关注阶级会掩盖、排斥、剥夺、压制,甚至压迫所有类型的“他者”。对所有这些多重他性的无尽责任使得难于(甚至不可能)以单一制度化话语来回应北卡罗来纳发生的事件,在对抗“烤鸡地带”中起作用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粗暴正义时,这种话语也许是最为有效的。

346 此时,我们遭遇社会正义话语的一种情境,它十分契合在回应北卡罗来纳火灾时表现出来的政治无能。政治和话语相互分裂到这种地步以至于反应被禁止。结果显得双倍的不公正:不仅男人和女人,白人和黑人死于一场本可预防的事件,而且我们同时被剥夺了任何可以用来谴责或认定责任方的标准的正义原则。

三 社会正义的复苏

对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解社会正义所陷入的僵局,存在着大量不满的迹象。并且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策略,试图恢复关于正义论证的动员力量。它们不是诉诸有限但却普遍的原则,就是更加雄心勃

勃地试图在所谓现代主义的普遍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解构所产生的分裂的特殊性之间建造一座桥梁。例如,我发现,沃尔泽(Walzer, 1983)试图把正义概念多元化为平等,以便尊重他者的文化创造;派福(Peffer, 1990)试图构造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相一致的社会正义原则,并且以此作为某种马克思主义派别的矫正方法,这一派别把全部正义和权利问题都视作有害的资产阶级陷阱。于是,在多方向上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势头,要恢复对社会正义的关注,并重新阐明创造一个适当地正义的社会之价值和制度的必要条件。

我认为,在一个无限异质和开放的世界中“从事正义事业”(do justice),在一开始就承认后结构主义这一根本目标的严肃性是很重要的。它们拒绝在异质情境中严格运用普遍原则,其理由并非不重要。首先,以德里达(Derrida, 1992a:35)为例,正如他正确地坚持的,任何制度化的正义体制的基石都在于不受法律支配的暴力要素:

全部革命情形,全部革命话语,左派的或右派的……通过宣称新法律正在建立之中或将要建立而证明求助于暴力是正当的。当这个即将到来的法律继而回溯性地使那个可能会违反正义感的暴力合法化时,它的未来事先就证明了自己是正当的。所有这些情形的基础产生于这样一个我们因此可以称作革命的情境之中。它开创了一项新法律,它总是以暴力达成这点。

暴力——正如马克思所表明的,它永远是“历史的助产婆”——的痕迹曾经在社会秩序上留下了它的污点,并且,德里达在某种程度上坚持认为,这痕迹将永远伴随着我们,永远不可能被抹掉。这进一步让我们警觉 20 世纪许多社会运动的某些不恰当做法,它们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所以它们自身的行动不可能不公正。这一警告甚至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任何普遍的社会正义原则,它的应用必然伴随着某种不公正。但是,另一方面,因实施暴力而无限悔过,对无限异质情境之中单一规则叠置的质疑,坚持正义可能意义的开放性,在这一道路的尽

347

头，充其量只是一个无用的世界，而从糟糕情形来说，则是一个相当丑陋的世界，在其中，剥夺者或压迫者（如帝国食品公司）的需求被看作与其受害者（那些死者）的需求是同样“公正”的。我们建立正义行动——在其中，“剥夺者被剥夺了”——犹豫不决，就是因为暴力因素会永远留下其痕迹（直到被下一步的暴力行动所消除）。我们拒绝制度化的法律专制，因为它形成一个顽固的“永恒性”，阻止社会变革的流动性。而且，我们把物还原为流，拒绝思考那些“永恒性”的结构——它们可以给社会存在以秩序并给社会生成以方向。承认无限异质性和无限制性在一个松散过程和无限复杂流的世界中的重要性，直接与对后结构主义的指控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后结构主义是一种“随波逐流”的思考方式，认为道德或伦理原则没有什么特别用途。怀特（White, 1991: 133）说：“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必须具有这种思想：应该抑制一些东西，而不是无原则地鼓励所有的他性的表现形式。”这假定了某种普遍的权利或正义原则。

怀特进一步声称，某些后结构主义的建设性文本默认了这样一个难题。曾经激烈主张我们永远不可能把“规训机制”从权利原则中分离开来的福柯（Foucault, 1980: 107—108），最后提出了“新型权利”的可能性，“这种新的权利形式必须是反规训的，但同时又不受主权原则束缚”。在《后现代状况》中，利奥塔同样明确赞成创造一种“质朴的”但非“非一致同意的”正义观念。德里达（Derrida, 1992a）则为伦理深感忧虑，不过，“新型权利”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们什么也没有说。

因此，出现了试图复兴社会正义普通原则的冲动，同时又关注对排斥“他者”的普遍化理论的后结构主义批判，如下四场特别辩论值得仔细研究。

1. 摆脱局部

大多数的后结构主义批判干预往往把他们的激进化政治学局限在社会交互作用上，这些交互作用发生在“这样一个范围之中，在那里，权力和金钱的系统规则占据统治地位”（White, 1991: 107）。它们阐述的

抵抗政治学通常适用小规模的抵抗社区、被边缘化的团体、异常的话语，或仅仅适用于称为“生活世界”的个人生活区域。这种“生活世界”完全不同于与合理化的、商品化的、专家治国论的因而也是异化的当代资本主义组织，并且是对其潜在的抵抗。看到这个文献，很难不使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改革的或革命变革的目标已经在总体上被抛弃了，甚至不再是讨论主题，更不用说把它作为政治组织的焦点。当问题最终涉及对政治经济体制批判时[当然，除了对这种体制的解构，就像德里达(Derrida, 1992b)在货币和交换研究中所为]，大多数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们的明显沉默或许最恰当地表明了他们不再思考这一系列的问题。正如福柯这类人似乎暗示的那样，人们能够期待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无数的局部化斗争或许会对资本主义总体运行产生某种集体影响。

出于对这种政治学的不满，一些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Fraser, 1989; Young, 1990a, b)则努力超越人情社群主义的世界，拓宽斗争的区域，并进入围绕福利国家政策、公共事务和政治组织的斗争。在弗雷泽那里，这些斗争是借由“团结的伦理”，而在扬那里则是通过清晰阐明社会正义标准来进行的。

扬(Young, 1990a:312)抱怨说，反击“在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霸权性的异化和个人主义”，这种企图使女性主义团体“在亲密感和互相认同的渴望推动下”去建设一种完美的社区，“它产生边界、分裂和排他”，同时又使团体内部差异均质化并压制它们。为了表明它们的压抑性质，她用解构工具来反对这种理想社区(参阅本书第十一章)。不过，她和德里达保持着一定距离，因为在她看来，“提出替代性概念”而不是满足于“解构就是公正”这个观念，这“既是可能的又是必需的”。她论证的第一步就是主张，应该把个人看成“异质的和去中心的”。就其成员拥有单一身份来说，没有一个社会团体能够真正地统一。在此基础上，扬努力在公共领域内构造某种行为规范。社会正义的概念“需要的不是融化差异，而是这样一些机构，它们无压迫地促进团体差异的再生产，并尊重它们”(Young, 1990a:47)。我们必须拒绝

“包含在启蒙理性之共和理想中的普遍性概念”，因为它试图“抑制城市公众之通俗的和语言的异质性”（Young, 1990a:108）。“在开放的和可以进入的公共空间和论坛中，人们期望碰到不同的人，他们的社会眼光、经验和关系是不同的”。

她诉诸的理想就是“向未同化的他者开放”。这就必然赞成不同团体的独特文化和个性、多种集体身份，这些东西本身在社会生活的流动和转型中不断地被建构和解构。但是，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重要问题。在现代大型城市社会中，穿越时空组成那种社会的多重中介关系就像无中介的面对面关系一样重要、一样“真实”。对于一个政治上负责的人来说，了解并从政治上回应所有那些每日把早餐放在我们餐桌上的人同样重要，即使市场交换向我们隐瞒了那些生产者的生命状况（参阅本书第八章）。当我们吃鸡肉的时候，我们就与死于北卡罗来内哈姆雷特的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些人产生了联系。通过市场功能和国家权力，个人之间建立了中介性联系。而且，我们必须定义能够穿越并借由这些多重中介发挥作用的正义概念。但这是后现代主义和社群主义通常回避的政治领域。

因此，扬提出一个与当代社会正义概念相关的“概念和条件”的“家族”（顺便一提，这是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她确定了“压迫的五副面孔”：**剥削**（劳动成果从一个群体向另一群体的转移，比如说，工人把剩余价值让渡给资本家，或者，在家庭中，女人将劳动果实交给男人）、**边缘化**（不让某些人参与有益的社会生活，从而“潜在地使他们遭受残酷的物质剥削，甚至灭绝”）、**无权力**（缺乏“权威、身份和自我感”，这就会使得一个人恭敬地听从他人）、**文化帝国主义**（行为以及各种文化表现形式的模式化，“被压迫群体发现自己的社会生活经验和解释几乎不能在主流文化中有任何表现，但那同一个文化却将它的经验和生活的解释强加给被压迫群体”）、**暴力**（随意的、无缘无故的攻击，这些攻击除了破坏、羞辱或摧毁人，“没有任何目的”）。

这样一种多维度的社会正义概念是有益的，尽管它有点像是传统自由主义的宽容观念在一个比惯常更广泛的社会事务范围上的纯粹延伸。

它警告我们，与多重压迫作斗争的政治行为具有漫长的“社会和政治边界”。它还强调不公正经验的异质性——在工作场所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一些人在家庭中却能压迫别人，这些被压迫的受害者转而可能会用文化帝国主义来对付他们的邻居。然而，在许多情形中，诸如北卡罗纳哈姆雷特情形，多重形式的压迫是结合在一起的。

很不幸，扬暂时未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即不公正的这些不同维度为何及怎样以在特定地方和时间互相交叉。她也避开了这些问题，如何在政治上和话语上用一种正义话语来消除并阻碍对另一话语的关注。很明显，虽然掩盖剥削问题——这一问题在陷入性别、种族和文化困境的帝国食品公司火灾案中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支配了安尼塔·希尔或者罗德尼·金的案子——不是扬的意图，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北卡罗来纳火灾事件的政治影响却正是这个效果。

但是，在扬理想主义的正义社会观念盔甲之下存在许多的裂缝：

在确认差异时面临的危险就是，执行集团意识政策将会恢复耻辱和排他。在过去，用集团意识政策把不同的人区分开来，并阻止他们分享统治集团权利和特权的机会……集团意识政策不能用来证明在行使一般的政治和公民权利时排斥或歧视一个集团的成员是正当的。民主的文化多元主义因此就需要一个双重的权利体系：一个更加普遍的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权利体系，和一个更加特殊的集团意识政策和权利的体系。（Young, 1990a:174）

那么，普遍性的双重含意就变得很明显：“每个人参与并被包括进道德和社会生活中，这种意义上的普遍性并不意味着采纳普遍认为的远远抛下特殊联系、感情、承诺和欲望这种意义上的普遍性”（Young, 1990a: 105）。但是请注意：普遍性不再被草率地拒绝。它被重新置入（也许“重新偷偷带进”会是一个更准确的表达方式）与特殊性、位置性和集团差异的辩证关系中。但是，是什么构成了这种普遍性；谁将决定它会如何被详细说明，以及它在哪些方面真正不同于自由主义理论和

启蒙运动所一直坚持的东西？扬没有给这些问题提供任何答案，但是，很明显，在社会正义问题上需要对它们进行澄清。

2. 不要把地理基石浪漫化

有关“承认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那些激烈辩论已经用另一种方式提出了这些问题。在此，我从沃尔泽(Walzer, 1983: 314)的“彻底的特殊主义”理论表述开始讨论。那一理论认为，“分配正义的每种实质性解释都是局部的”。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是：

351

文化生产的创造物；我们创造充满意义的世界，并居住于其中。既然没有办法依据人们对社会美德的理解对这些世界进行秩序安排，那么我们就应该通过尊重他们的特定创造物来公平对待现实的人们。他们通过坚持相互间的社会美德的意义来主张正义、抵抗专制。正义深植于对地方、荣誉、工作和各类事物的独特理解中，这些理解构成了一种共享的生活方式。藐视这些理解就(总是)会行事不公。

在我看来，这似乎就是雷蒙德·威廉斯通过望远镜的另一端所发现的“战斗的特殊主义”的命题。唯一被认可的普遍性形式是无限尊重建立在历史地(和地理地)产生的共享生活方式之上的特殊性，每一生活方式都有自己的独特“情感结构”。因为这些结构常常(尽管不是独特地)涉及地方的构造过程，我们发现自己至少被邀请参加一场地理上分裂的正义观念的真正盛宴，这些观念常常通过国家制度、立宪和法律以及风俗仪式呈现出区域性表达方式。但是，这一需要现在是为了平等地尊重所有形式的文化成就而存在。然而，加特曼(Gutman, 1994: 5)指出：“这种对文化特殊性——及至所有个人——的政治承认的需求与一种普遍性形式相一致，它认为由个人所评估的文化和文化语境蕴含在他们的基本利益之中。”

为了承认文化特殊性而提出的这些论证现在得到了充分的重新审

理。现在，许多人会接受泰勒(Taylor, 1994:60—61)的判断，即“被权利自由主义奉为圭臬的平等尊重的政治学”已经被历史地证明是与“差异格格不入的，因为，(1)它坚持统一运用定义这些权利的规则，毫无例外；(2)它怀疑集体目标”。因此，它不能对合理需求做出回应以支持集体目标、文化生存、特殊意义的生态栖息地保护等。它对不同文化传统的完全不同的正义和“公正报应”观念也缺乏敏感性。

但是，正如我在第十一章论证的，存在一个不利方面。首先，“拒绝所有可能的评价标准”削弱了相等价值的判断，其程度等同于它削弱了次等价值的判断。因此，它在此一举了那些理应支持的尊重特殊性的论点目标(Wolfe, 1974: 78)。如果我们听信沃尔泽的这一论调，那么推翻奴隶制的、种族隔离制的、法西斯主义的、或等级制社会的文化成就如同否认土著美国人或越南农民的自决权一样是不公正的。比如，在帝国食品公司火灾事件之后，美国劳工联合会—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即刻请求联邦政府收回对北卡罗来纳雇主的管理权，它就会被指控为不公正，因为根据北卡罗来纳的宣传文献，它是以其特殊的反工会的商业方式而自豪的。

这个困难使泰勒(同时还有沃尔兹)把这种观念重新表述为文化成就平等的假设，只有根据进一步的检验，才能决定它是否成立。但是这假定了两件事情。第一，特定的文化条件何时是不能接受的，存在着某种普遍的判断标准。第二，在拥有需要被评估的独特“成就”的地方，存在着叫做“文化”的有效实体。这公然违背了地方和社区构造的历史—地理过程，并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文化就像个人一样是相关性地(及“对话地”)被构造的，而且有很多是能够渗透的。不承认这些文化构造/分解的过程，并建立一种“特殊主义的正义理论”来说明作为物化之物的文化，这就是鼓吹一种实际上使地方的地理结构永远固定化的政治。结果既可能是压迫性的，又将会是功能失常的。还存在着第三个异议：根据假设价值来保护一种文化形式(或实践)，这种实质性需求会是压迫性的，且对那些并不分享其价值的人是不公正的。个人和小集团也许并不希望他们的文化特性得到承认，因为那种特性恰恰

352

就是他们希望逃避的社会牢笼。例如，在我们的社会中，妇女并不缺乏承认或赞许；相反，问题在于他们得到承认或赞美的特殊方式。在这里，取消而不是重视这些范畴（特别是那些具有“实在论”寓意的种族、种族划分和性别的范畴）的解构主义要求就有意义了。很不幸，缺乏任何可能得到重视和承认（哪怕是暂时地）的文化或社会范畴，就像设想一种文化成就建立在石头上的历史地理学一样，它们都是有害的。

这种理想主义政治论点的难题在于，它不能理解地方和文化是如何建构、维持和瓦解的。过程和文化实体如何在地方中相互作用，这个根本性的辩证问题被回避了。保护所谓人类文化成就制高点的文化“永恒性”，这种政治斗争发生在历史紧要关头——此时，流和过程通过时空压缩迅速转向，威胁所有已经形成的地方特性——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泰勒(Taylor, 1994, 63)所言，如果所有社会“都在文化上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同时也变得越来越能够渗透”，并且，如沃尔夫(Wolf, 1982; 17)所言，如果建构地方及建立想象共同体的全部努力都考虑“这些过程——它们超出可分离的情形，在这些情形中运动，并穿越和改变它们”，那么就不能以沃尔泽最初所设想的彻底方式特殊地看待对社会正义的探讨。

3. 规模政治

对于这个问题来说，还存在着另一个维度，它可以追溯到多重时空性和价值结构的生产。为了回应雷蒙德·威廉斯(参见本书第一章)，
353 我们假设，如果我们属于什么样的“永恒”永远是一个矛盾，或者，如果我们采取一种更加生态学的观点来，生物群落观念(如利奥波德所为。参见本书第七章)，那么我们必须不可避免地承认我们存在于其间的地方(永恒)的等级制组织。邻里、城市、区域、国家和全球是在相当不同的时空规模上发生的相当不同的社会生态交互作用过程。个人在所有这些过程中获得成员资格。社群主义者必须确定一个规模，限定他们关注的范围，绘制边界。例如，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1995)追求一种政治学，在其中，在“国际市民

社会”发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世界共同体”试图“建立一个更加牢固的国际规范的结构”，表达由“公共责任感”所传达出来的“某种共同价值”。另一方面，美国的民兵运动将之视为背叛建国原则的表现，但它从修辞上来说一样是社群主义的。埃特泽尔尼(Etzioni, 1993)称赞新社群主义是经济和社会问题之政治解决方案(“没有道德上的清规戒律和压迫”)的基础时，把自己的论证限制在合众国之联合纽带之上。但是，就如生态—环境问题清晰表明的那样(参见本书第八章和第十三章)，忠诚和价值(包括社会正义方面的)冲突源自不同规模。当代对本土的强调——虽然增强了某些敏感性——完全消除了他者，并因此削减而非解放了政治斗争和行动的领域。虽然我们每个人在物之秩序中都有某个“位置”(或“一些位置”)，但无论多么努力，我们永远不会是纯粹的“地方的”存在。而且，虽然在特定规模上确定的“永恒”的成员资格或许对我们每个人比对其他人更加重要，但是，我们获得的这种认同很少单一到不会产生冲突的忠诚。

从一个时空规模到另一个时空规模，或穿越空间、语言、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国家、法人实体和制度等等的交流是不容易的。这就是吸引哈贝马斯的状况，他是目前为止对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的特殊主义进行最坦率批评的评论家，并且也是普遍主义论点的强大倡导者。虽然哈贝马斯从来没有试图提炼普遍的原则，但他确实主张在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内进行的自由且无拘束的交往应遵循以过程为基础的“元规范”。他的目标就是要使交往行动民主化，从而成为强有力的道德原则的载体，例如有关正义的那些原则。霍威尔(Howell, 1994: 422)认为他的论据是：

对我们规范定位的最激烈的反驳，促进了复兴的民主政治生活的发展；它将规范标准放回到政治理论中，超出了社群范围，超出了特殊的利益和特定的社会语境。它恢复了一种普遍主义，这个普遍主义至少在原则上可以历史地和地理地拓展。它既避免后现代政治道德标准的相对主义，又避免紧密联合的社群主义政

354

治哲学的地方主义；它又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契约论的规范理论。……

在这里，哈贝马斯相信“普遍主义可以历史地和地理地拓展”的方式是一个难题。就他偶然提及的物质环境来说，他把交往行动的难题看作语言学的话语难题，因此，他没能很好地理解话语“环节”（回到第四章中的语言）如何使权力的、物质实践的、想象力的、制度的和社会关系的效果内在化，所有这些东西在快速多样化的具有时空性和评估制度的世界中都起着作用。霍威尔(Howell, 1994: 423)正确地批评哈贝马斯“没能充分考虑细分的政治空间这个现实”，但他也没有将这种批判进行到底：简言之，哈贝马斯完全不知道时空性和“地方”如何被生产出来的，也不明白这个过程如何与交往行动以及评价过程是一体的。哈贝马斯提出的理想是：以过程为基础来理解正义的规范和价值如何更加普遍化，甚至是以某种强有力的“战斗的特殊主义”为基础。

4. “情境化知识”的情境化

有人主张，在异质的差异世界中，全部知识(包括社会正义和社会需要观念)都是“情境的”，第四个辩论便关注这种主张的意味。“情境性”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在我看来，对这个概念的“庸俗”理解差不多完全与个人经历联系在一起：因为个人生活史的特殊性，我以自己的方式发现、解释、代表并理解这个世界。语言游戏和话语的分离被强调，而且差异被当作是在经历上，有时甚至是在制度上、社会上、历史上和地理上确定的。它自行发生，就好像没有人甚至能够摆脱掉个人历史的束缚，或者把成为“他人”的全部条件内在化。按照这种理解，我们甚至不能学习另一门语言。它不可避免地与其拒绝的那种排他政治学联系在一起。而且，它经常地被当作一种修辞工具，要么用来增强个人解释世界的所谓真实性和道德权威，要么用来否认其他解释的准确性(“因为她是一个来自农村的黑人妇女，所以她不可能对纽约白人资产阶级的生活状况说出任何真实的东西”，更普遍的是，

“因为他是一个异性恋的西方白人男性，所以他一定局限于世界如何运转的某种见解”）。当然，个人经历确实关系重大，当某个具有特权的人（像我自己）自称代表他人讲话或者甚至谈论他人时，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产生了。正如斯皮伐克(Spivak, 1988)所揭示的，这就是当代社会科学和哲学所要面对的难题。但是，对情境性进行相对主义的、本质主义的和非辩证的理解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困境。例如，因为我不是工人阶级，不是妇女，也不是黑人（就此而言，我也没有在那次火灾中被烧死），我就不能谈论由经验得来的北卡罗来纳火灾的恐怖。同样，有稳定收入的白人职业女性不可能代表任何处境与其不同的妇女说话。事实上，无人能够有权利或义务代表“他人”说话，更不用说反抗“他者”的压迫。

然而，我们还可以诉诸一种更加深刻也更加辩证的“情境性”的意义。它的第一种形式，我认为是比较弱的形式，出现在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的寓言中。在黑格尔看来，情境性不是分离的且不相干的差异，而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辩证的权力关系。两者都需要他者，且两者都把与他者的关系内化到自己同一性中了。研究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时，马克思挪用、改造并加强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于是，他对资产阶级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长期批判就成了某种手段，用以定义从无产阶级视角定位的替代性的下层人民的和颠覆性的科学。像哈拉维(Haraway, 1990)和哈索克(Hartsock, 1987)这样的女性主义作家就是以类似方式来研究性别差异，并建立自己女性主义理论。

这样一个辩证概念弥漫在德里达的个人主体观点之中。作为一个人，那种主体没有固定的身份，但他是大量异质的和未必连续的冲动和欲望。与世界多种形式的交互作用把个人建构为“一种不能被充分理解的差异的游戏”(Young, 1990b:232)。“他性”必然以对话形式在自我之中被内化(Taylor, 1994:32)。于是，“情境性”便被解除了它与可辨认身份的个人及其经历之间的机械联系，自身也被情境化为差异的游戏。当我吃肯德基炸鸡时，我就处在商品生产链的一环上，这个商品生产链恰恰又回到了北卡罗来纳的哈姆雷特。当我与女儿相互

影响时，我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性别身份建构游戏中，这些性别身份只有从性别化社会过程来看才会有意义，而这些社会过程同样又承载着历史—地理构造的重负。当我控制自己不用诱饵来消灭吞噬我所养育的每一朵花的鼻涕虫时，我就使自己处在存在的生态链上，这种生态链与我由于担心全球变暖而试图节约使用能源时所借助的生态链有着完全不同的时空性。

356 个人是异质性地构成的主体，他们依靠与高度多样化的世界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使“他性”内在化。如果像我们在前面论证的那样，个人是相关地(或者用泰勒偏爱的“对话地”。Taylor, 1994:32)建构的实体，那么不理解那些被内在化的关系就对个人进行定义是无意义的。这便导致斯皮伐克(Spivak, 1988: 294, 308)对他者之政治代表困境的回应，它在德里达的号召之上：使“我们心中属于他者声音的内部声音精神错乱”。

很不幸，这并没有彻底解决那个难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都直接源自对时空性和身份(个性化)的辩证研究，那在第十章中已经讨论。第一，我们面临的“莱布尼茨式奇想”之风险，以及全部相关的自以为是(参见本书第三章和第十章)。作为个人，即使我们在某种意义上被当作包含了万物的单子，我们也没有办法把万物平等地内在化，或增强我们的知性从而代表全部事物说话。如果我们不是单子实体，而是通过对话建构出来的个人，是由我们作为创造性存在物嵌入其中的某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态交互作用过程生产出来并“形成个性”的，并且我们因此对这些过程很敏感，那么我们代表他人所说的一切就至关重要地取决于：(1)我们主要同什么人或什么东西进行感性接触和交流；(2)我们如何及为何从事改造活动而非其他活动。确实，“使我们心中属于他者声音的内部声音精神错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环节。但是，我们所说的话仍然取决于这个感觉的、物质的和交流的世界，我们的想象、欲望、话语和实践都是在其中形成的。

第二，正如利科(Ricoeur, 1991)所言，自我感和身份感部分地通过我们用以描述自己与世界暂时关系的叙事手段来建立，并因此呈现相对

持久的结构。虽然身份并不依靠同一性或本质，但根据我们讲述自身历史和地理——简言之，我们在物之秩序中的位置——的故事，它确实获得了持久性和永恒性。虽然身份使他性内在化了，但它仍然为起作用的“他性”的（常常是空间的）领域以及他者与特殊自我感之间的关系划定界限，并使这两者相对持久。例如，白人可能会通过与黑人的特殊关系的历史发展来建构他们的身份，确实，两个集团都可能运用另一集团来建构他们自己。正如盖茨(Gates, 1992)近期指出的那样，美国历史之中白人和黑人身份的相互纠缠，对于詹姆斯·鲍德温的种族关系概念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当代文化之中的多数种族思维方式恰恰就存在于这样一个内在化过程中。因此，要结束种族主义就需要结束那个过程，而不是结束它所制造的话语范畴。

尽管如此，我们可以从这种辩证的视角来更好地理解哈索克(Hartsock, 1987)的主张：“关注情境化知识的认识论”可以“揭示并澄清政治联盟和团结的理论基础”，同时它又“为由于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的拒绝所引起的顽固敌视”提供“重要的替代方案”。我们必须密切关注这些“为不同集团互相理解并形成联盟提供基础的相似性”。哈索克拒绝这个问题的后现代阐述，他认为我们与统治话语的周旋恰恰是因为我们不能从复杂的权力关系作用中脱身。“庸俗”理解情境性的后现代主义派别不能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权力的统治路线周旋，并因此通常把自己边缘化。但是，因为混乱的身份阻碍了定向行动能力，把万物还原为无差异的多样性和无限流的后现代主义派别同样也遇到了难题。凯米内(Kaminer, 1995)指出：

身份政治的孩子们如何……有步骤地解构他们自身。索尼娅·D·柯里—约翰逊解释道，“作为一个有教养的、已婚的、一夫一妻制的、女权主义的、基督教的美国黑人母亲，我遭受着剧烈的多样性状态的折磨”。有时这些解释是很可悲的，“我不只是一个妇女或一个美国黑人，”谢丽尔·格林说，“我同时也是一个身有明显残疾的人，而且我知道自己的信仰和经历与白种无残疾妇

女的、美国无残疾黑人的以及许多有残疾的男人和女人的相冲突,这种意识塑造了我。我在某种程度上与所有这些团体产生共鸣,然而,有时候我感觉到来自他们每个人的轻蔑和排斥。”

在庸俗的本质主义观点和变化多端的认同之潜在无限流动性之间,必定存在着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无论多么偶然)充分的永恒性,它为政治行动指明方向(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那意味着优先考虑那些重要的身份。这类似于我在《后现代性状况》中所得出的结论(Harvey, 1989a: 117):

虽然(后现代主义)通过承认他者声音的真实性而打开了一个激进的前景,但后现代主义思想却立即用不透明的他性、这种或那种语言游戏的特异性来隔离在那些他者声音,切断它们获得更普遍的权力资源之机会。它由此剥夺了那些声音(妇女、种族和少数族群、被殖民人群、失业者、年轻人等声音)在不平衡的权力关系世界中的力量。我们也许不能理解国际银行家阴谋集团的语言游戏,但是从权力关系的观点来看,它不会与同样不可理解的黑人语言不相上下。

358 坚持互相排斥的话语——它们是狭隘的或多样的情境性的定义所造成的——我们将会对北卡罗来纳火灾最明显的含意视而不见:即使工人阶级政治并没有明确承认种族和性别的重要性,但它追求的也可能是保护而不是压迫和排斥性别和种族利益。女权主义运动——被强有力地灌输于美国的职业中以回应北卡罗来纳发生的事件,同时又围绕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被动员起来——的失败,要么暗示严密解释的情境性观点比许多人愿意承认的具有更实际的政治优势,要么默默地安排了情境性的次序,使那些在北卡罗来纳“他者”身上发生的事情不管怎样看起来远没有在道德声望上非常可疑的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重要。在这

上他们未必不对，因为正如哈拉维(Haraway, 1990: 202—203)所指出的：要紧的不是差异，而是重大的差异：

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时，我们冒着陷入无限差异的风险，冒着放弃那种令人困惑的建立局部且真实联系的任务的风险。一些差异是有趣的，有些差异是统治世界历史体系的支柱。认识论致力于认识的差异。

但是，使我们可能认识这种差异的“认识论”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如何去追求它呢？它又会产生何种政治呢？

四 阶级关系、社会正义和差异政治学

许多根本不同的线索通过一般结论汇聚起来。一方面，我们发现有一条社会正义的论证路线，它经过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达到这种认识：某些(非特定的)普遍是必须的，某类认识论(非特定的)对于确定差异和异质性在何时、何地及如何具有重大意义是需要的。另一方面，我们处在一种政治—经济的情境之中，如北卡罗来纳惨案所刻画的，这种情境表明进步政治在面对阶级压迫时看似瘫痪。那么，我们要如何把这种理论和政治张力的两极联系起来呢？

探讨一下帝国食品公司工厂火灾的明显教训：在那些阶级而非特殊身份首要意义的情境中，有效的工人阶级政治学应该能更好地保护男人和女人、白人和黑人的权利。这个结论值得进一步讨论。

我要定义“工人阶级政治”这个用语，因为它的全部含义并没有被普遍理解。我坚持认为，归根结底，阶级不是物、实体或“永恒”（虽然在特定的条件下它确实会呈现这样一种形式），而是过程。但它是怎样的过程呢？马克思似乎相关性地把阶级规定为掌握(或不掌握)生产工具。我更愿意把阶级定义为与资本积累过程有关的情境性或位置

359

性。我们所有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在嵌入这种过程的条件下生活着。但是那些过程常常是根本不同的、混乱的，也在根本不同的时空规模上发挥作用，所以与这些过程相联系的个人位置也可能像它一样混乱且复杂。当一个想到自己的养老金和保险时，他便处在完全不同于考虑自己劳动力的出售或作为商品购买者角色的情境中。我们每个人都具有涉及不同资本循环的多重角色，但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一致的阶级政治是不可能的或不需要的。它所表明的是，阶级政治发挥作用所需要的那些“永恒”（制度、社会关系、话语、想象力、物质实践和权力关系）的形成本身是个过程，它需要时间、劝说和大量的艰苦劳动和诡计。瓦解过程总是发挥着作用，挑战对资本积累施加政治压力那些特殊“永恒”。这就是阶级过程所包含的全部内容。某些“永恒”（诸如工会）在特定时间和地方形成，多少都会对某一空间内的资本积累过程暂时产生影响。但是，鉴于自己相对于资本积累的情境，每一代人都要回答的问题是：争取形成某种而不是另外一种“永恒”，把它们视为改造（或彻底改变）资本积累社会生态过程道路中的必要驿站，这样做为什么有意义？

现在，我把这一定义应用到女权主义政治学中。林恩·西格尔（Segal, 1991）最近指出，过去 20 年来，“尽管在美国存在着世界上最大的、最有影响的和最猛烈的女权主义运动，但相比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美国妇女性别相对劣势的全面变化却最小”。在美国，由“最受尊敬的、最赚钱的职业”妇女所取得的进步完全被其他人日益增加的挫折、贫穷和无依靠的生活所完全抵消。例如，穷困的女性化（北卡罗来纳的哈姆雷特就是典型）已经成为美国过去 20 年来最令人吃惊的社会转向之一，是共和党对福利国家和工人阶级权益进行阶级战争的直接受害者。西格尔继续说：“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期越长和工会力量越强的国家中，男女工资差别和职业隔离（既是纵向的又是横向的）就越小，福利服务的扩展就越大。”鉴于这些社会民主国家的妇女已实现了非常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女权主义者似乎很奇怪地忽视了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党派和隶属工会的工人的传统目标”，即使这样的制度作为女权主义

追求目标的工具有着明显的缺点和局限 [例如, 弗雷泽(Fraser, 1989) 对许多福利国家政策固有的性别偏见做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论证]。然而, 西格尔继续说: “每当一些妇女所取得的进步很明显地被其他妇女所严酷地经历的日益增加的贫穷(与之并列的是他们阶级和集团的男人们的失业)所遮蔽时, 反对而不是依靠更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来提出妇女的特定利益似乎是不当的。”当然, 除非以非常狭隘的职业和阶级偏见来理解“妇女的利益”, 或者把它看作“在那个巨大的身份舞台上上演的无休止的自我探索戏剧的一部分”(Segal, 1991:90—91)。

在这里, 西格尔的研究类似于哈索克对“政治联盟和团结之基础”的关注。这要求我们识别“那些为不同集团互相理解和结成联盟提供基础的相似性”。扬同样把她运用的普遍性标准与“相似性永远不是相同性”这种观念联系起来。因此, 差异永远不可能被刻画成“绝对的他性, 关系或共性的一种完全缺乏”。就如他性和差异本身的生产那样, 用来衡量差异和他性的相似性也需要仔细探查(政治上的和理论上的)。离开了一方, 任何一方都不能成立。发现相似性的基础(而不是去假定同一性)就是去揭示表面上看来根本不同的集团之间联盟结构的基础。

但是在当今世界, 相似性很大程度上存在于后结构主义理论中经常被边缘化的政治—经济行动的领域, 因为正是从商品、货币、市场交换、资本积累等方面, 我们发现自己分享着一个相似性的世界, 它的特点同样愈益表现为同质性和同一性。反对那种同一性的激进后结构主义(以及它在某些工人阶级政治形式中的镜像)为近期的辩论定了调子, 但结果就是把各种差异之间政治和道德的团结和相似性这个婴儿, 连同资本主义强加的普遍性和同一性观念那冰冷的洗澡水一起抛掉。只有批判性重新探讨政治经济以及相对于资本积累的情境性, 我们才有希望重新建立社会正义的观念, 将之作为应该为之斗争的东西, 将之作为在各个不同地方建立政治团结的道德规范的关键价值。

因此, 虽然正义观念“不仅随着时间和空间”而变化, “而且也随着所涉人员”而不同(如恩格斯所言),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个事实——

它的特殊观念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不被误解地接受”——的政治力量。虽然抽象地研究社会正义理想总会“完全被弄糊涂”，但它仍然能够在政治行动中发挥强大的动员话语功能（就如恩格斯谈及法国革命的例子时所认定的）。就我们在资本积累动态中的位置来说，我们当然能够发现大量利用它的空间。

但是，20年来，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几乎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基础来“没有误解地”接受任何特殊的社会正义规范，与此同时却在日常生活中竭尽全力使所有人相信：任何对市场自由的调控或任何标准的税收都是不公正的，“阶级”政治是一个时代错误。因此，授权被想象为（如像约翰·梅耶和纽特·金格里奇这样的保守政治家所坦率承认的）在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口袋中留下尽可能多的钱；自由和正义依赖最大化的市场选择；权利被解释成不受任何政府干预的消费者主权。也许，过去这20年的后现代辩论所错失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这样一种方式：右翼和反动分子藉此对市场正义和权利的定义在创造产生北卡罗来纳火灾结果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发挥着革命性的作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资本主义已经作为市场进入迄今为止受保护的中国空间，它既带来了就业条件，也带来了围绕哈姆雷特事件的话语态度，我认为注意这一点是特别有益的。

在这样的环境下，为进步政治的目标开拓正义和权利地形看来是一项急迫的理论和政治任务。但是，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必须回到那种“认识论”，它帮助我们辨别重要他者和非重要他者、差异和情境性之间的差别，它还有助于在相似性而不是同一性基础上促进联盟的形成。我自己的认识论停留在历史和地理唯物主义的一个现代化形式上，它形成了一个元理论框架，不仅研究被理解为权力关系的差异如何通过社会行动得以生产，而且研究它们在某些地方和情境中如何获得特殊意义。从这个观点来看，一方面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对有关社会正义的普遍命题进行哲学的、语言学的和逻辑的批判是正确的，同时另一方面又承认在某些情境中（如当代美国）求助于社会正义的公认力量是政治行动的基础。因此，努力把特殊的正义话语引入到霸权立场之中，

这种斗争是相互冲突的社会集团之间围绕意识形态霸权而进行的广泛斗争的一部分。

五 结论

362

综上所述，我们面临的重要的分析、理论和政治任务包括如下方面：

1. 绝对不能回避普遍性，那些试图这样做(如许多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表述中的情况)的人最终只能是掩盖而不是消灭这一条件。但是，普遍性必须以它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来解释。它们互相定义，从而使普遍性标准总是易于通过差异的特殊性进行协商。此外，必须把普遍性看作一个具有细微差别的构造，它嵌于在完全不同的时空规模上运行的过程中。它因此使这些规模间的矛盾内在化，从而确保永远不会有某个无法还原的原则(或者，如列温廷和莱文斯在他们探讨辩证法时所言，对于研究来说，“根本没有根基”。参见本书第二章)。在此，研究政治—经济过程——社会实际上借此成为一个辩证统一体——是很有用的。例如，货币拥有价值尺度和交换手段的普遍属性，同时它又为市场行为领域中广泛的高度分散化的和特殊主义的决策提供可能。这反过来又规定了货币的普遍性的内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参见前文第268和328页)，货币也是一种高度分裂的具有多种用途的形式，这些用途涉及相当不同的时空过程。正是货币这种辩证的力量使右翼派别有能力主张基于市场调节的个人自由和公正赏罚。虽然不公正的起源很简单——个人对货币所代表的社会权力的挪用和积累制造了大规模的且不断扩大的社会不平等——但我们必须重视在货币这种情形中普遍性—特殊性辩证法的难以捉摸的力量。进步政治学的任务就是去发现一个同样强大的、动态的和有说服力的方式，使不同规模的普遍和特殊在从受压迫者立场出发定义社会正义的动力上联系起来。

2. 对身份和“他性”的尊重必须由这种认识来调和：虽然全部他者

可能都是他者，但“某些他者却不只是他者”，而且在任何社会中，都必须实施某种排他原则。如何判定这种排他原则，这与那种普遍条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条件防止各个集团把他们的意愿压迫性地强加到他者的头上。然而，不能自上而下以等级的方式来强加这种消极的自由(从摆脱他者约束的意义上来看)：正是因为根本不同的要求得以设计的方式(例如，富人要求把无家可归者从公共空间中驱除出去，从而使无家可归者的压抑景观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它必须易于进行持续的谈判。当我们试图谈论“积极自由”(有关解放的、教育的、人类潜能的实现、文化成就的追求等方面)，认为它们是可以接受的集体规划，并决定哪些是值得要的或不值得要的，这时候，将面临更加严重的困难。例如，如果我们把道德规范还原为进化论生物学的一个问题(参见第七章中引用的威尔逊陈述)，那有什么可以阻止强奸犯声称遗传基因是一种永恒的权利这种自由呢？我们通常反驳这种主张，理由是它包含强制，但正如德里达所强调的，既然所有的法律制度都是建立在暴力之上的，那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原则性的专制，它拒绝把特殊的他性包含进对我们文明社会的理解中。

3. 我们必须根据辩论或辩论者的情境或位置批判性地评价全部有关社会行动的主张(或者社会正义的观念)。但同样重要的是承认，发展这种情境化知识的个人本身并不是均质的实体，而是大量异质的冲动，有许多来源于自身之中“多重他性”的内在化。这种主体观念使情境性(他们的位置)本身成为异质的和有差异的，高度依赖在相当不同的时空规模上运行的社会过程。最后，它是不同规模上的情境性(位置)的社会构造，而且在那种社会构造中，不管个人如何深地嵌在资本积累的宏观过程中，个人政治选择、承诺和忠诚还是极大地发挥作用。

4. “能够辨别”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差异或“他性”的“能够表述差异的认识论”是这种认识论，它能够理解情境性、位置、他性、差异、政治身份等诸如此类之建构的社会过程。在这里，我们达到了在我看来似乎最重要的认识论要点：身份建构的社会过程与身份政治的状况之间的关系。如果尊重无家可归者(或者是种族或性别上受压迫的人)的

状况并不意味着尊重制造无家可归(或者是种族或性别的压迫)的社会过程,那么身份政治肯定是在双重标准上运行的。试图消灭产生问题的过程的政治,只是试图使那些不同身份一旦建立就充分发挥作用的政治,这两者看起来是极为不同的。

这里存在着一个我们在第一章中就已经遇到过的奇特而又困难的张力。无家可归者、种族上受压迫的人、经济上被剥夺的人、受暴力困扰的妇女、工人、受殖民统治的人,这些身份都产生于嵌在社会过程中的某种条件(物质的、话语的、心理的,等等)。我在第一章中论证过的那种自我感和身份感的永恒性或许取决于产生它的那些过程的永恒性。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即使在自己居住的最可怕的贫民窟拆除后获得了新的住房,穷人们也会经常“为失去的家悲伤”。甚至工人阶级运动也可能试图使产生它们的那些压迫条件持续下去或回归,同样,那些在男性暴力条件下获得自我感的妇女也许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那些狂暴男人的身边。正如许多女权主义者论证以及许多妇女表明的那样,打破这个模式,从那种依附中走出来是有可能的。但第一步就是要承认而不是否认这个问题。虽然在改变了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拥有了新的政治身份,但工人阶级运动同样希望保留他们的革命冲动。但这这是一个长期的艰苦过程,需要大量谨慎细致的工作。一个政治计划要想成功地对抗各种形式的压迫,它就必须勇敢面对这样一个实际困难:那种压迫的部分受害者丧失了同一性。而且,还存在着一些诡异的情形,正是由于其相对的持久性,同一性一旦获得,就可能找出其自身生存所必须的条件(包括压迫)。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仅仅追求作为自在目标(而不是打破使压迫内在化的身份的根本斗争)的身份政治也许首先会使产生特定身份的特定过程永久地持续下去而不是去挑战它。学术界围绕身份政治展开的意识形态辩论甚至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回忆一下斯皮伐克(Spivak, 1988: 280)对法国后结构主义者的评论:

[他们]危险地忘记了[他们的]全部过度决定的研究都是为

了动态的经济地位,这种地位要求无情地打乱既定的利益、动机(欲望)和(知识的)权力。在今天,把那种混乱作为一个根本发现,使我们诊断经济学……作为一台过时的分析机器,它很有可能会延续那种混乱的作用,并在无意中有助于确保“一个新的霸权关系的平衡”。

不能在政治上回应北卡罗来纳哈姆雷特事件,以及缺乏有说服力的对抗它的社会正义话语,我们能够从中得出的最好教训或许就是这一点。因为,如果近些年在美国由共和党和资产阶级发动的阶级战争的历史和地理过程已经使贫困女性化、种族压迫加速,并使生命的生态条件进一步恶化,那么看起来,一种更加统一的政治可能源自阻止那种过程的决定,而不是来自主要反思其局部和孤立后果的身份政治。

365

第十三章

正义的环境

资产阶级对于污染问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把它们移来移去。

——改编自弗雷德里希·恩格斯

一 争取环境正义的运动

1992年9月8日的《经济学家》刊载了一份泄密的世界银行内部备忘录(日期为1991年12月12日)。这份备忘录出自于劳伦斯·萨默斯之手，他是一位享有相当声誉的哈佛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的外甥，肯尼思·阿罗的女婿，两位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也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经常咨询的顾问，当时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后来在克林顿政府担任了主管贸易的副国务卿。他写道：

私下里讲，世界银行难道不应该鼓励将更多污染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中去吗？我可以想到三条理由：

(1) 损害健康的污染之成本测定取决于从增加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中放弃的收益。从这个观点来看，特定数量的损害健康的污染应发生在成本最低的国家，那将是工资最低的国家。我认为把大量有毒废物倾倒在最低工资国家，这背后的经济逻辑学是完美的，我们应该勇敢面对。

(2) 因为最初污染增加的成本可能非常低,所以污染成本可能是非线性的。我总是在想,非洲人口稀少的国家污染极为不足;与洛杉矶或墨西哥城相比,他们的(空气污染)可能相当无效率地低。只不过因下述令人遗憾的事实阻碍着世界用出售空气污染和废物的方式来提高福利,即这么多的污染是由非贸易产业(运输、发电)形成的,而且固体废弃物的单位运输成本非常高。

(3) 出于美学和健康理由而产生的对洁净环境的需求很可能具有很高的收入弹性。在人们生下来就会得前列腺癌的国家里,对引起前列腺癌极小诱因的关注很明显要大大高于5岁以下人口死亡率是千分之二百的国家。同样,大多数对工业大气排放的关注涉及颗粒物的可见度。这些排放对健康的直接影响也许很小。很明显,对体现美学的污染问题的货物进行交易,这是能够提高福利的。虽然生产是流动的,但对美好空气的消费是不可交易的。

绿色和平组织华盛顿办事处将这一备忘录的副本传真到世界各地。环保团体有机会大干一番了(参见 Bullard, 1993; Pepper, 1993)。世界银行已经因为对环境问题漠不关心而饱受批评,此时它非常警觉,它试图以出版其1992年有关“发展和环境”的报告来影响里约热内卢的环境峰会。巴西的环境大臣说萨默斯的推论是“绝对合乎逻辑但完全疯狂的”。《人物杂志》在其“地球日”这专辑中把萨默斯显著地列为“地球的八大敌人”之一,甚至《金融时报》认为是“把地球从经济学家的手中挽救出来”的时候了(Rich, 1993:246—250)。然而,《经济学家》发表评论认为,他的经济逻辑确实是“完美的”。

萨默斯备忘录看起来似乎支持“毒性殖民主义”或“毒性帝国主义”。然而,这个备忘录的最后一段却指出,所有这些论证的难题是,它们“可以颠倒过来,并或多或少有效地用来反对银行的每一项建议”。这使人想到,萨默斯本人并不支持这种观点,而是向那些沉浸

在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同事们指出他们自己思维模式的逻辑结果。虽然这有点为萨默斯开脱的嫌疑，但它却把备忘录所提出的问题扩大到有关环境和经济问题的整个话语模式。

因此，能提出何种异议呢？首先，争论的阶级情境是显而易见的。富人团体，包括最专业的经济学家[根据 Uchitelle(1995)，美国经济学家 1994 年平均每周收入 889 美元]，不会被迫在家门口接受有毒废物，反之，儿童护理工(周收入 158 美元)、看门人和清洁工(周收入 293 美元)，以及缝纫机操作工(周收入 316 美元)并没有相同的选择范围。这个逻辑同样很少关注分配正义的问题，除了在最狭隘的意义上，即有毒物贸易就是要为所有人“提高福利”。这就假设了提高穷人收入的一个方法就是付钱给他们，让他们吸收毒素(主要是由富人造成的)。应该注意的是，任何负面的健康影响都将降临在那些根本没有能力应对它们的人身上。因为大多数穷人和被剥夺权力的人都是有色人种，所以这种影响就是种族上的歧视。而且，既然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那么就存在着一个象征性维度，一种被植入到整个建议中的“文化帝国主义”——我们不正是假设只有无价值的人才会消化这些垃圾吗？在这种情况下，把有种族印记的他者与污染、污损、不纯及堕落联系在一起，这样，诬蔑“他者”就成为政治等式的一部分。正如道格拉斯(Douglas, 1984: 3)所主张的，如果“把某些污染当成是表达对社会秩序一般看法的类比”，并且如果“污染信念能够用于对身份地位诉求与反诉求的对话中”，那么，关于污染是“不恰当事件”的主张就不能与关于“不恰当的人”的不纯和危险这种主张相分离。

368

“垃圾”，特别是有害垃圾为什么以及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当然，这个问题从没有在萨默斯这类人的讨论中提及过。然而，正如考摩纳(Commoner, 1990)和其他人一起反复强调的，预防无疑应该优先于对任何副作用的处理和补救。但是，提出那个问题需要将话语转移到更加充满政治色彩的批评地带，批评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生产及消费方式的普遍特性。

把萨默斯所提出的“完美的经济逻辑”解构成特定种类的政治经济

权力及其偏见行为的典型话语，这并不困难，然而不幸的是，它差不多就是对通常实事的描述。市场机制就那样“自然地”运行。离有毒设施过近，财产就会贬值，而且那就是穷人和下层人民总体上由贫困所迫而生活的地方。在低收入地区建立有毒设施并不会对财产价值产生多大影响，所以任何有毒设施“最优的”最低成本的选址，策略都指向穷人所住的地方。而且，一小笔用于补偿负面影响的迁移款对穷人来说也许是重要的，也因此是更易于接受的，但很大程度上与富人无关，这就引出了我很久以前所谈论的“神秘的悖论”：“富人不大可能‘不惜一切代价’放弃怡人的环境，反之，根本没有能力承受损失的穷人则很有可能为了一笔微不足道的钱而牺牲它”。通常，如果低收入的、被剥夺权力的，且边缘化的“他者”所生活的地方同样也是更强政治性组织和虚弱政治抵抗的地带，那么有毒设施选址的符号的、政治的，及经济的逻辑则完全会以萨默斯备忘录所设想的方式进行。

369 结果在美国有毒垃圾填埋处选址的最佳标志之一就是低收入群和有色人种居住的地理集中区。有毒垃圾穿越美国绝大多数的南部和西部而倾倒在土著印第安人专用地或有色人种社区(非洲裔黑人或拉美裔黑人)，这些都有充分的材料来证明(Bryant & Mohai, 1992; Bullard, 1990, 1993, 1994; Hoffrichter, 1993)。更值得注意的是发生在他们之间的投标战争。比如，不同的土著美国人团体之间或欠发达国家之间为了换取货币收入而进行的竞相接纳垃圾的投标大战。虽然这种行为发生在专制政权或军人政权中也许更容易理解，在那里，政府捞取全部好处，却让老百姓承担所有的代价，但是，人们不会不知道，合理的民主辩论形成了有利于有毒垃圾设施接受的政治共识，因为这在一方面将会带来难得的收入和就业。例如，在阿拉巴马州的“黑人带”地区，桑特尔县危险垃圾填埋问题在政治上受到了激烈的争论：那些因为拒绝这一设施而在工作上和收入上受损最大的人与试图关闭这些设施的中产阶级及通常由白人组成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意见冲突(参见 Bailey 等人, 1993)。同样冲突还发生在密西西比州(Schneider, 1993)。资本主义制度下垃圾产生和循环的政治经济制度具体表现了萨默斯的逻辑，包括

它的某些内在社会矛盾。

然而，那种逻辑的行动却触发了激烈的抵抗。在美国，支持环境正义及反对环境种族主义的运动已经成了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这是一种长期酝酿的政治运动，它最近的再生得益于两个特别的事件。第一个事件是1977年著名的拉夫运河案。当时，在纽约布法罗市一个被填实的运河之上所建造的房子中发现建筑物地下室充满了有害液体，这种液体对居住在那里的孩子会造成严重的健康影响(Gibbs, 1982; Levine, 1982; Szasz, 1994)。这就导致了“住房有害垃圾公民净化机构”(Citizen's Clearing House for Hazardous Waste)组织的形成。根据泰勒的说法(Taylor, 1993)，这一组织在全国7 000多个社区及基层团体有影响。第二个事件由1982年北卡罗来纳州沃伦县的抗议运动引起。当时，一个主要由美国黑人组成的社区被选来填埋聚氯联二苯污染的土壤。抗议运动的气势(逮捕了很多知名的民权人物)以及各种组织的广泛加入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不久被称为“环境种族主义”的东西上。1991年，一个非常分散且高度地方性的运动围绕着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有色人环境领导人峰会(First National People of Color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Summit)聚集起来。在那里，它批准了一项宣言，以17条之多的不同条款清楚地阐明了环境正义(参见Grossman, 1994)。我仅精选一些：

环境正义

肯定大地母亲的神圣性、生态一致性以及所有物种之间的相互依赖，有权免受生态破坏。

为了人类和其他生物所生存的星球能够持续发展，授权合乎道德地、平衡地且负责任地使用土地和可再生资源。 370

要求停止生产所有毒素、有毒垃圾及放射性材料，所有过去及现在的生产者必须严格地对生产地的人们负责任，帮助他们解毒和防止事故。

确认对城市和乡村生态政策的需要，以与自然协调的方式清

理和重建城市和乡村地区，尊重所有社区的文化完整性，并为所有人提供公平获得各种资源的机会。

反对跨国公司的破坏性经营……对土地、人民和文化，以及其他生命形式进行军事占领、镇压和剥削。

要求我们个人在私人消费时，尽量少消耗大地母亲的资源，少制造垃圾；要有意识地决心挑战我们的生活方式，变更优先顺序，以确保当代人及子孙后代的自然世界的健康。

稍后我会回头来讨论这些原则，虽然不难发现许多专业人士认为它们就像萨默斯的备忘录一样“荒唐”，同时还缺乏基本的、更不用说“完美的”逻辑。为争取环境正义而进行的战斗的地方性斗争共同促进了这些论题，它们引发了足够的国家政治动荡，从而迫使美国环保署解决环境公正的问题，即使是在最顽固的里根—布什执政期间。美国环保署1992年的报告勉强承认，少数民族和低收入人口确实不公平地受到环境危害的影响，但它又声称缺乏足够确凿的证据来证实实际存在着歧视（除了在铅中毒案例中）。然而，1994年2月，克林顿政府——为了回应环境保护主义者、少数民族及穷人选民——向所有联邦调查机构颁布了一项总行政命令，要求各项方案不会对穷人和少数民族造成不公平的环境伤害。这就意味着，必须公正地提出低收入群体和少数民族社群对环境的要求，且环境问题可以根据公民权利来裁定。

那一措施并没能平息环境正义运动中的很多人，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认识到陷入这样一个法律—政治的沼泽中将是死神之吻。近十年来几乎没有增加新的有毒垃圾选址，原因恰恰与这种事实有关，即反对这些选址的运动都是在“渠道”之外组织的。同样因为这个原因，环境正义运动经常与主要环境团体（比如地球之友、西拉俱乐部、美国环保协会等——通常被称为“十大”）发生争执。这里的分歧反映了阶级、种族和性别，也反映了激烈的地方政治（参照本书第十一章）与更加抽象的主流环境运动的政治相对。“有色人种”和工人阶级中的妇女特别积极地与特殊地方的草根运动，在这些特殊地方中，“十大”在成员上，

尤其是在组织上受控于白人、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大部分集中在政治权力的中心(例如，华盛顿特区)。洛伊丝·吉布斯，最早的拉夫运河抗议运动的组织者，回忆她把这些团体组织到一起时的努力：

这是极为滑稽的……草根大众们坐在房间的一头喝酒、抽烟，而环境保护主义者则坐在房间的另一头喝酸奶。我们想讨论受害人的赔偿问题。他们则想讨论苯含量和科学不确定性问题。很多时候几乎都是争吵。我们希望来自“十大”的人看到这些当地人就会易于支持草根的立场，但结果却不是那回事。他们对现状的立场老于世故。他们的方法就是问：我支持什么能够赢得立法胜利？我们的方法则是问：什么在道德上是正确的？如果某件事情在道德上是错误的，那我们不会为了赢得胜利而去支持它。(引用于 Greider, 1993:214)

有人以开玩笑的方式来描述这种在忠诚和成员资格上的差别：

公民净化机构——“典型成员：放弃教会唱诗班而组织毒性物堆放的抗议运动”，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典型成员：安杜佛 ’63，耶鲁 ’67，哈佛法学院 ’70，五角大楼反战游行 ’68，’69，’70”。环保协会——“典型成员：拥有绿色良知和红色 Miata 跑车的律师……”(Greider, 1993:214)

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形式的合作都不存在——例如，绿色和平组织就曾帮助“洛杉矶中南部相关市民”(Concerned Citizens of South Central Los Angeles)这个组织(最初由妇女所组织)抵抗 LANCER 大规模燃烧的焚化炉(计划服务全市 140 万的人)在穷人及少数民族居住的社区中落户(Blumberg and Gottlieb, 1989:第 6 章)。然而，环境正义运动还是保持了它非常独立的“战斗的特殊主义”(参见本书第一章)。它拒绝

政府和“资产阶级的”收编企图，也拒绝融入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对资本循环决定的环境危害的完美经济逻辑的抵制运动。

372 二 合谋和不满的话语

正如我在第七、八两章论证的，近年来，“环境问题”制造了各种各样敌对且互相排斥的话语。确实，存在着许多共同的基础。大多数人——当然，除了那些只为嘲笑全部观念才参加讨论的人——承认，存在着——一类可以恰当地称作“环境的”难题，而且多数人也承认实际或潜在危机。大多数人还主张，这些问题源自我们与外在于我们的、叫做“自然”的某物发生联系的特殊方式，认为必须要采取某种改良甚至革命措施，从而使我们处于某种更加“可持续的”或“和谐的”发展轨道。除此之外，话语的多样性也变得令人迷惑(参见本书第八章)。现在我要深入地研究一下事情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特别关注那些包含在有关环境正义话语中的政治和环境观点。这样做时，我将会积极运用在第四章所构建的框架：在那里，我认为话语不会独立于信仰、社会关系、制度结构、物质实践，或权力关系而存在。话语使来自所有那些领域的影响内在化，同时又交互地进入社会过程的所有其他环节，虽然它们绝非纯粹镜像。

这种理解的优点就在于，它使我不仅能把有关环境正义的话语当作哲学和伦理的争论，而且还能够从产生这一话语并在其中变得内在化的“环境的”条件(信仰、制度、社会物质实践，以及政治经济权力的关系和形式)来观察。它还允许对有关环境正义的话语在社会过程的其他环节如何“运作”(影响信仰、想象、机构、实践、权力关系，等等)做进一步分析。

我在第八章中揭示全部环境—生态学的争论都是有关社会的争论，并因此复杂地折射出其他领域的各种斗争。例如，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就产生于对民族同一性话语(边境的作用以及在美国国民

性形成过程中与荒野的冲突)、宗教(盯着因猎捕而死的美洲狮的眼睛而产生的顿悟)和达尔文科学的融合。加勒特·哈丁的“公地悲剧”就是通过融合达尔文思想、报酬递减的数学逻辑,以及个人化的、效用最大化的、私有财产民主的政治经济学建立起来的。动物权利理论家们接受有关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浮夸言辞,并试图将之延伸到有感觉能力的生命,或者如里根喜欢称呼的“生命的主体”。生态现代化理论缔造了生产效率的教条与生态集合体高效又公平的活动方式之间的联合。生态女权运动在传统自由人道主义与认为妇女由于养育而亲近自然的观点之间建立了强大联系。这些合成话语中的每一个都独特地与信仰、制度、物质社会实践、社会关系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化政治—经济权力的现成体系保持着共谋或对抗关系。这是它们特有的功效:它们提出定义社会过程不同环节中各种关系的难题,并极大地揭示出社会行动全部领域中社会冲突的模式。

373

例如,我们现在就来探讨使萨默斯处理有毒垃圾的观点成为可能的普遍内容。在这里,强调它是新古典主义经济逻辑的典型表现,这是不够的。它本身是一组吸引人的特殊隐喻,在其中,人们可以设想在资源匮乏条件下进行提高福利的垃圾交易。因为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需要回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与占统治地位政治经济权力相比,为什么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是如此易于接受的话语?新古典主义经济话语被赋予特权,这对信仰、制度的机能、社会关系、物质实践等,会有什么影响?在此,虽然可以找到充分的事实来解释经济思想的新古典主义方式对所有这些领域的深入渗透,但我并不打算直接回答这些问题。相反,我将密切地观察环境—生态话语的主导形式,以便洞察为什么它们会拥有特殊地位,以及鉴于它们的特性及其对公共想象和公共机构的广泛理解,它们如何创建一套环境条件,而迫使环境正义运动在其中以非常特殊的方式清楚阐明其对立意见(在某种程度上,塑造其实践)。根据这些问题,我将在下面概括20世纪晚期有关环境话语的主导形式。

三 环境管理的“标准观点”

资本主义频繁地遇到环境问题。在过去两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人们发展出各种制度、科学理解、公共政策以及调控行动来处理这些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行动已汇集成我称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环境管理的“标准观点”。

以标准观点来看，对付环境问题的一般方法就是仅仅在“事后”干预。这个策略部分来自这种信念，即一般的环境关注根本不可能妨碍“进步”（更准确地说，是资本积累），如果需要，任何“事后”的环境难题都可有效地克服。这并非暗示物种灭绝或栖息地破坏导致的那类不可逆问题，而且实际上存在着“补救技术”来应付任何问题。这种“事后”强调意味着环境问题在根本上被当作能够一件件（而且常常是一个地方接一个地方的）地处理的“事件”——“错误”和“失误”的结果（常常是由于疏忽）。此外，特殊场所的环境治理和“最后环节”解决方案（如，土壤补救、烟囱清洗器的安装、汽车催化式排气净化器，等等）总是优先于预防或主动干预。

在标准观点之中有时得到承认的唯一普遍问题就是所谓“市场失灵”，这种情况是因公司（或者其他经济实体，如政府和家庭）可以通过自由使用环境来获得资源或处理垃圾而把成本“外部化”。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发展起来的公司理论有效地解释了这个问题：在市场失灵情形下，单个公司攫取渔业这样的公共资源（哈丁提出的著名的“公地悲剧”）、污染、使工人面临有毒物的危险、使消费者面临环境的退化，这些在经济上都是合理的。于是，政府任务便是制定一个调控框架，要么强迫公司把外部成本内部化（创造一个更加完善的市场，把所有真正的成本计算在内，包括那些由环境退化产生的成本），要么颁布一些标准，规定公司（或者其他实体）必须处理好资源管理、职业安全和卫生、环境影响等等问题。同样，政府的任务还包括：提供公共物品和

公共基础设施，它们必须有利于公共健康和卫生条件。就像进步时代（参见 Hays, 1959）和新政时期早期阶段的情形，又周期性地产生了这种观念：政府必须大力干预以确保对国家资源的正确保护和有效管理，从而为了国家管理的资本积累的阶级战略而挑战私有财产的权利。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在所谓科斯定理的庇护下也设计了一个维护私有财产的方案，认为污染者和任何受害方都应同样被当作是作恶者，因为后者的存在限制了前者排放污染物的财产权。

在标准观点之下，全部政府干预和环境管理的逻辑工具典型地受到两种重要因素的限制。首先，只有充分证明市场失灵造成了严重损失，并且最好是当损失能够量化（比如，以货币计算）时，才应该进行干预。这就要求揭示问题关联性的强大科学证据，如工作场所接触到石棉与 20 年后患上癌症之间的联系，或者发电站的放射与百英里之外湖水的酸化之间的联系。而且，需要仔细测量污染和资源损耗的成本，375因为第二个约束认为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着一个零和均衡。过度顾虑后者就不必要地放弃前者的利益。这是货币化成本效益分析的领域，这种分析现在对于塑造标准观点中的环境政治学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阐明这些交易的实质就需要特别地综合工程学和经济学专门知识，还要加上对生态过程的科学理解。环境问题向专家话语领域的转换允许环境政治学和调节行为的内在化，主要是在国家机构的包围之中，或者更松散地，处在社团和国家的研发财政的影响之下。在政府和公司的双重影响下，这必然导致对官僚政治—专家政治理性的运用。一般来说，民主政治的争斗不利于产生适当的、理性的及明智的调节行为。首选策略——除了在某些明快的政府决策期间——就是经常根据特别的和**就事论事**原则在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协商出解决方案。

在标准观点之中，没有人从根本上挑战私有财产和利益最大化的基本权利。对环境正义的关注（如果它们真的存在）严格地服从于对经济效益、持续增长和资本积累的关注。资本积累（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

来说是根本的，这个观点绝对不会受到挑战。人类广泛地改造环境的被默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把标准观点转化成与傲慢的支配自然论点同谋的教条)。唯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最好地为资本积累、经济效益和增长来管理环境。从这一立场来看，应该阻止(假设没有制造一些严重的障碍来阻止进一步的积累)消极的外部效应(包括健康和福利方面的)，而且对于资源的适当保护和审慎使用应该给予认真关注。倘若此框架成立，那么标准观点之内的生态问题通常会被认为是民族国家大事，在某些情况下权力会移交到低一级的政府部门。这样，国家政治学和文化传统(比如，有关荒野或森林重要性的问题)在影响标准观点的制订以及将之呈现于不同国家甚至不同地区的方式上典型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当前最流行的经济学术语来说，社会化的且常常地方性的对环境质量的特殊偏好，可以作为消费者偏好的特别表现而加以考虑。

376

一连串强大且有说服力的话语被嵌入(有时甚至都不知道)这种标准观点及其相关实践、制度、信仰和权力中。环境经济学、环境工程学、环境法、规划和政策分析，以及其他广泛的科学努力，都从不同角度广泛地支持它。正是因为它们之中并没有暗含着对于资本积累霸权的任何挑战，这样的话语恰好能够被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权力接受。因此，国家和公司就提供财政和后勤支持来促进这种环境话语，并使之成为与众不同的权力话语。

这并不是说在标准观点之中没有争论。实际上围绕下列问题仍然存在大量的争论：环境变化和社会后果之间联系的科学证据、破坏的程度和范围、责任的认定，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或公正)之间交易所在之处，不同消费者的环境质量偏好的权衡和表达，环境的最终范围(有关贴现率和时间偏好的作品非常多)，以及国家调控的限度等。这个全面的话语框架内的激烈辩论常常排斥对那些更广泛问题的一般性讨论，更不用说完全不同的替代方案了。但是，这些辩论有时会产生矛盾，这些矛盾为向根本不同思维方式的话语转向铺垫了道路。例如，虽然萨默斯备忘录的明显目的是要唤醒他的一些同事更强烈地意识到如何在标准观点之内磋商环境公正和市场力量，然而它随后却变成了一个象

征，可以把它的震撼性价值当成是对替代性环境正义话语的迫切要求。

标准观点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历史。首先是 19 世纪城市背景中广泛的公共卫生措施，接着是现今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许多地方进行的改善空气和水的质量的努力，如果没有这些成就的实质性记录，那就不会有标准观点的制订。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它很久以前就被丢弃了。从好的方面说，甚至一些表面上消极的特性也会有积极的一面；比如，特别的且分散的方法有时会允许对消费者偏好有一定程度的局部的、特殊的敏感，并且在环境干预时有相当大的弹性。不过，很明显，标准方法的有效性还是有明显的界限，在年来，它的某些突出的内在矛盾已开始孕育看待环境问题的替代视野。

四 生态现代化

377

作为构建社会和生态变化辩证法思想的一种方式，“生态现代化”（参见 Hajer, 1995）论题早已周期性出现。在美国，它早在进步时代（当时，平肖的名字主导着讨论）就已经流行，20 世纪 30 年代重新出现在土壤保护运动和国家资源规划局这样的机构中（Hays, 1987）。近些年，有迹象表明环境压力集团和某些政治—经济权力的制度化构型都在采纳/征用它。

生态现代化依赖同时促进了这样一个信念，即经济行为系统地危害了环境（“自然”的失调），因此社会应该对于环境调节和生态控制采取一种主动的姿态。预防比补救更可取。这就意味着，应该用一套更加系统的政治、制度安排以及调控实践来取代专门的、分裂的，及官僚的国家调控方法。不能指望未来对自己负责，有必要设计从长远看来对可持续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来说是好的策略，这种说法有道理。这个表达的关键词是“可持续性”。而且，即使它可能的意义存在着争论（反对者使用各种各样修辞手段，使这个术语变得没有意义，或者使它变得温和，因为没有人可能会赞成“非可持续性”），这个概念仍然处

于生态现代化政治学的中心地位。因此，后代人的权利和恰当的时间视野问题就成了讨论的焦点，不像标准观点典型地认为的那样是市场力量的事情。

多种证据证明这种重点的转向是正确的。例如，以标准观点来看，不可逆性问题变得更加显著，不仅关于生物多样性，而且关于整个栖息地的消失、资源耗竭、土壤荒漠化、森林减少，诸如此类。对深层次环境风险的强调，伴随着这样一种不断提高的认识：人类行为的无意识生态后果是影响深远的、长久的，并具潜在破坏性。贝克(Beck, 1992)认为我们生活在“风险社会”中(主要是日益加速且似乎失控的科技革命的结果)，这个观点已被证明是对此话语有益而重要补充，从而定义了生态现代化的风险最小化的政治学。而且，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专门的及事后的行为会产生一些失衡的和无效的后果。

378 在促进话语从标准观点向生态现代化的转变中，科学家的作用是重要的[参见 Liffin(1994)和 Hajer(1995)的个案研究]。正是科学揭示了全球问题(酸雨、全球变暖和臭氧洞)需要广泛的跨边界的集体行动，从而向封闭的民族国家的官僚理性提出了挑战(法律的、制度的和文化的)。个别科学家拓展了有关生态体系和相互关联的知识，这使我们认识到，人类行为的无意识后果比我们早先认识到的更加广泛、不可逆转和严重。这就使“标准观点”之“一切照常”和“事后”方法看起来越来越不适当。这种科学为许多环境压力集团提供了关键支持，它们许多最初是抱着怀疑和不信任来看待科学理性的。现在，生态现代化主题开始深深地扎根于环境运动的许多分支之中。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结果有点矛盾。一方面，生态现代化为它们和政治—经济权力统治形式之间竞争性友好关系提供了共同的话语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它假设了某种理性，这种理性减弱了更纯粹的道德论证的力量(比较上面引用的路易斯·吉布斯的评论)，并使多数环境运动面临政治笼络的危险。

无论如何，生态现代化论题的一般说服力取决于另一个激进的话语转向。它拒绝以零和来看待环境和经济—增长之间所谓的权衡。人们

越来越重视生态控制的“双赢”例子。鉴于金钱力量，表明生态现代化是利可图的就至关重要了。环境忧虑常常会促成效率(比如说，通过使用更高效的燃料)，且有利于长期保护资本积累的资源基础，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此外，如果污染仅仅只是在标准实践之中被移来移去(从空气到水再到土地)，那么后果就是，不付成本地吸收污染物质的空“污水池”会越来越少，总效率从长期来看就会受到削弱。举一个与“自然”资源相类似的例子，如果消耗发生得太快以致不能考虑到平稳的市场调节和适当的科技改革，那么对经济增长造成重大损失的混乱便可能发生。环境诉讼和环境影响立法也在某种程度上刺激着寻求“双赢”的解决方法，并且，在一些部门，如与职业和消费者安全和健康直接相关的部门，通过给予受损失方特别高的赔偿金(例如在石棉责任案中，这个案件使商家和保险公司——著名的伦敦劳埃德公司集团——陷入破产)也促使人们寻求“双赢”。净化工作的高成本——美国清理有害垃圾场所的“超级基金”的经验也许是最好的例子——也使很多人对预防有了新的认识。

在生态现代化争论中，环境公正(分配正义)发挥着强大作用。这部分由于世界各地发生的环境正义运动和其他各种运动的侵入，这些运动表达了马丁内斯-阿里埃(Martinez-Allier, 1990)所称的“穷人的环境保护论”的思想。撇开这些不谈，合作是需要的，这样才能获得先发制人的环境主动性，所以，环境正义问题就不得不与长期的可持续性探索结合在一起，这在某种程度上实际地适应了当代主要生态问题的国际性需求：主权国家，包括那些贫穷的国家，不得不同意某些环境调控，例如，对碳排放和氟氯化碳(CFC)使用的控制，并且加强预防措施。所以，与中国和印度进行谈判从政治上来说完全不同于密西西比河有害垃圾场选址的谈判。必须设想某种格局，在其中，生态现代化能够同时促成增长和全球的分配公正。这是布伦特兰报告中的中心议题(WCED, 1987)。如果那样，怎么办就成了辩论的中心。话语转向也有很多的迹象，也许被塑造成对分配正义争论性的回应，在其中，经济发展(人类才能和条件的改善)被认为是完全不同于经济增长(货物和服

379

务的产量的增长)。如果能够说服政府采取前一种路径,那么对发达资本主义列强通过经济增长进行资本积累的霸权的挑战就会减弱。

380 这些转向的一个次要结果是,环境管理不再被视为专属政府或民族国家的事务。民族国家,虽然仍然重要,但应该由地方政府以及强大的国际组织来补充。例如,里约会议的一般意义就是给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环境署)更大的权力,并设立地方政府管理环境质量的委托权。在寻求环境管理更好道路中,应该把不同规模的多个政府层次作为伙伴包括进来。这种建立某种权力等级的步骤不言而喻地承认产生环境问题的多种空间规模。虽然在实践上这些问题很少得到真正的解决,但的确可以发现从民族国家向环境问题不同等级的空间规模的话语转向(参见第七章和第八章有关空间调整的更进一步的探讨)。这样,广泛的市民社会的力量(非政府组织,压力集团,社区代理)就会卷入其中。有关“价值”的公开辩论因此就变得更加清楚,并为真正从哲学角度来反思“环境伦理学”提供基础。这样,更开放、民主以及广泛的讨论就成为可能。正是在这个界面上,合并与公开竞争之间的细微边界就被反复跨越,通过法律的、科学的和经济的话语,制度和实践成为一个具有深刻含意和高度竞争的地带。

以这种系统方法描绘生态现代化主题的一般特点时,我既夸大了它的一致性,又夸大了它与标准观点的差异。过去20年良莠不分的环境—生态辩论与这种简单特性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是,公共领域的辩论比以前更易受到生态现代化论点的影响。正如公共话语形成过程常常表明的那样,各种干预和机会已经产生,藉此,环境问题已经极大地激进化。某些激进环境团体已经部分地介入环境现代化论题。它们这样做,有些时候,出于某种策略,因为这为追求其他目标提供了便利的、通常更具说服力的公共论据,另一些时候,则是出于某种更加深沉的信念,它们把它视为迫使资本主义朝向生态健全和全球正义方向发展的唯一方法。有证据表明,在布鲁塞尔新成立的欧洲官僚机构把生态现代化看作一种反对狭隘的国家和公司利益的授权手段。就社会主义者来说,他们将之视为把传统的增长和公正承诺与社会控制下的合理规

划结合起来的方法。例如，可以把考摩纳的《与地球和平共处》(1990)和赖夫的《绿色产品：通往一种生态理性》(1995)解读成这种论题的左翼形式。我将会在结论中回到这种特定的思维方法。

但是，如果缺乏当代政治—经济权力核心地带的重要支持，这种话语就不具有应有的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财富不断增长的势头使中产阶级越来越关心环境的质量和舒适度、“自然”旅游以及环境与健康之间不断加深的利害关系。虽然这给许多环境运动增添了一种难以消除的资产阶级美学和政治学，然而，它还是把环境问题增加到政治议程之中，这样，人们就不能仅仅把它们当作资产阶级时尚的副产品加以抑制。正如海斯(Hays, 1987)指出的那样，在美国，大约1950年之后，与环境问题相比，健康问题变得特别突出，而且尤其不受任何限制。鉴于中产阶级已经承认环境问题对他们自己的生活质量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从景观掠夺、遗产、野生土地保护、空气质量和水质的控制、有毒物的影响、垃圾处理，到消费品调控等等环境问题的系统关注就变得更易于表达。贝克(Beck, 1992)着重强调过 381
难题的这一方面，他主张，当代形式的高环境风险社会的成本已经广泛地延伸到各个阶级身上，并因此把环境问题变成了大众问题(即使资产阶级也会得皮肤癌和白血病)。在许多方面，《增长的极限》(Meadows等人著，出版于1972年)是一个强有力的警告，表明标准观点是不充分的，它受到罗马俱乐部(一个有影响力的银行家和企业家集团)和1987年布伦特兰报告的支持，以重要的方式巩固了生态现代化话语，突出了“可持续性”问题的重要性，是一个得到许多政府官员、实业家、金融家和科学家支持的成果。从那时起，主要的世界机构——例如世界银行，它先前并不关注生态问题，还有一些公司(如IBM公司，甚至孟山都公司)和一些强大的当权派政治家，像玛格丽特·撒切尔和戈尔——都已皈依某一形式的生态现代化论题。甚至，《经济学家》(*Economist*, June 3, 1995:57)的一篇题为“怎样赚大笔的钱，同时又拯救地球”的文章也认为庆祝“绿色组织和企业之间发展中的浪漫史”是合适的。

然而，这个论据却有更加险恶的一面。1973—1975年的大衰退、随后经济增长的减速，以及普遍的结构性的增加，这些都使得人们对增长的自然界限这个观念更加着迷。把自然界限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当成替罪羊，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策略。马克思评论李嘉图时说，当面临危机时，他“求助于有机化学”（参见 Harvey, 1974）。这种特别的思想方式特别把责任推到人口增长上，反反复复地召唤出马尔萨斯的幽灵（参见第六章），因此把大多数生态—环境问题还原为简单的人口问题。这种本质上反动的政治态度与《增长的极限》和布伦特兰报告的立场是相似的，它们都关注资本积累的自然界限（并由此关注就业潜力和世界范围内财富的增加水平）。这样，“可持续发展”修辞就被附加到必须尊重自然界限的增长经济学的理想之中。通过诉诸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世界较贫困地区对更高工资或更快速经济增长的要求被驳斥，并由此把注意力从根深蒂固的阶级和帝国主义特权之更加无常的法则中转移开来。地球绝对没有物质能力维持全球人口都过上像瑞典或瑞士人那样水平的的生活，这个假设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论点，反对全球分享资本主义增长的好处。

382 许多发展中国家中，资本主义现代化和资源管理的显著失败同样也使生态现代化辞令更加吸引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这意味着向生态上更敏感并由此更有效的传统方法的回归。例如，世界银行就喜欢谴责非洲国家政府没有能够在那里实施自己的发展项目，于是就试图分散发展过程，看看由当地人提出的本土方法——妇女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能否起作用，以便偿还恰恰因为世界银行所强加的西方式发展而积累的债务。

最终，许多公司，像 IBM，发现优良的环境技术和更严格的全球环境调控带来了大量的利润。对于努力保持竞争力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强迫实施需要高技术解决方案的强大的环境调控，不仅保证了它们企业的竞争优势，而且还保证了它们开发的环境方面友好型科技有一个强大的出口市场（东欧的环境治理已被证明是特别有利的）。但愿只是少量的公司这样想，不过，它是来自有资产阶级内部影响力的集团的

赞成生态现代化的重要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为了地球利益”和保持地球“健康”的全球环境管理也被主要的国家和公司方便地利用，来主张应由它们对全世界资源进行技术上先进的垄断管理。因此，虽然可以发现大量公司运用了生态现代化修辞(特别是通过“绿色消费主义”)，但对于部分公司资本来说，它们与强调某种技术劳动变革的运动——再加上高度集中的全球环境管理实践——结成联盟还是有正面原因的。现在，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内，仅仅环境治理产业一项就具有大约两千亿的价值，而且它主要取决于恰当的调控，这就形成了一个对调控行动和生态现代化进行控制的重大压力集团(*Economist*, June 3, 1995:57)。

作为话语，生态现代化把冲突内在化了。它具有大众优势，严肃地关注环境—生态问题，特别是搜集环境影响人口的科学证据，但它并不挑战与环境问题对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过，它确实暗示了对私有财产权的严格调控，并且，只要它付诸行动，通过调控，就能实际地抑制不受控制的资本积累的潜能。但是，它也是这样一种话语，容易堕落成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权力的另外一种话语代表。跨国公司可以挪用它使自己的全球掠夺合法化，以管理全部的世界资源。实际上，不是不可能想象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大企业(某些部门)、强势政府(包括世界银行)和权势集团以及高技术的重大科学开始统治世界，甚至比当前更厉害。当前，它们以“可持续性”、生态现代化为名以及对假定很脆弱的地球健康进行适宜的全球管理。这正是萨斯(Sachs, 1993: xv)所担心的转向：

383

当政府、企业和国际机构高举全球生态学旗帜时，环境保护主义的性质也就发生了变化。部分地，生态学——被理解为社会运动的哲学——打算把自己从反对立场的知识变成统治立场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环境保护主义……把自身的激进内容给净化掉了，并被重新塑造成专门的中立知识，直到它能够与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相结合。

在政治光谱的两极都可以发现坚决反对这种重塑的阶级力量。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自由主义右派的反应。

五 “明智利用”和私有财产保护

对某些资本(包括传统小资产阶级这一重要部分)来说,生态现代化是十分讨厌的东西,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扼杀它的强大欲望(包括某种绝非标准观点之极简主义版本)。虽然一些公司对它有好感,但大多数并不如此。到目前为止,最强大的反对源自它对私有产权(特别是原材料和“自然”资源的所有者)的影响。生态现代化的全部思想以及它所假设的有计划的政府主导的或集体性的干预,是自由主义的保守政治派别所诅咒的东西。通过“明智利用”运动,这种运动特别集中在美国西部,它发现了环境正义运动的自由主义等价物,借助于这个等价物,不仅可以攻击生态现代化,而且可以抨击除了标准观点之极简主义版本以外的任何东西。

“明智利用”运动事实上利用了环境激进主义的长期传统——虽然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它利用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传统。“明智利用”这个术语的运用并非机会主义反对政府干预或调控的修辞手法。这个传统来源于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特别是那些通常归之于洛克的理论,以及它们向政治—经济实践的转化,特别是在具有杰斐逊式民主传统的美国。这一论点部分地以不可剥夺的权利为根据:个人把他们的劳动融入土地“使大地肥沃多产”。但它也强有力地基于这种观点,即财产所有者无论如何都具有种种动机来保养和维持生产力的生态条件,这些条件为他们提供生计,并且,如果任凭他们自行其是,他们将更有可能把这些土地以一种改良的而非恶化的状况传给自己的后代。亚瑟·扬,英国18世纪晚期农业事务方面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评论员,这样说道:“在租期一年的情况下,一个人会把花园变成沙漠;而如果租期是14年,那么他就会把沙漠变成花园。”

当然，这正是促使威廉·劳埃德在1833年提出“公地悲剧”命题的那种情感。根据哈丁对那个观点所做的有影响力的重述，一些评论者将之视为对私有财产制度安排的一种辩护，这种制度安排最好地阻止了政府本质上无力阻止的公地滥用。即使哈丁本人并没有遵循这种论证方法，但是，法学专家和理论家却并不难以证明：出于环境理由无偿地剥夺私有财产权是不公正的，确保土地恰当利用的最明智的和最好的组织形式是高度分散的财产所有民主制。冯·哈耶克、诺齐克以及一大批当代经济学家和法学专家(Epstein, 1985)都赞同这一点。

美国的“明智利用”运动源于一个长期的传统：反对联邦政府管制私有财产的权力。西部养牛场利益集团反对联邦政府控制美国西部大片土地而发动的所谓“sage-brush 叛乱”只是那段历史中的一个事件。它诉诸大众常识，有效地利用有影响力的个人不公正传闻，这些深受政府行动为之苦。通过把私有财产权说成是神圣的(加上把“私有化”和“解除管制”说成是社会的善)，明智利用教条聚集了许多来自企业部门的信徒，当与大众基础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产生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Echeverria & Eby, 1995)。例如，随着1994年共和党的胜利，它在美国的国会中就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有足够的证据显示，从1979年里根当选总统时开始，它在法院以及各级政府部门内的势头就已逐渐加强。

“明智利用”运动还有其他两个论据，来进一步强烈地捍卫私有财产不受政府约束。第一个论据是，工作(因此也就是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的权利必须优先于“自然的权利”。“明智利用”运动以零和论据而名噪一时，这种论据把美国西北部斑点鹰的命运与伐木业的就业机会对立起来。第二个论据是，一般土地使用法必然会不公正地对待地方和私人决定。即使与大政府结盟的最高深科学也不能制定出在细节上对全部偶然性充分敏感的规章制度。私有财产的所有者原则上能够比政府官僚和科学家更了解他们自己的事情。在所有这些方面，明智利用运动都有自己的一套有力证据。凯思·谢耐德(Echeverria and Eby, 1995:351)，一个有点名气的环境新闻记者，他认为，恰恰因为它能够

385

怀疑这些年来产生的大多数的境教条，它“也许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环境保护主义中兴起的最重要的且最有趣的运动之一”。因此，虽然这项运动受到公司、产业，或许更重要的，受到商业伐木、牧场经营，以及农业综合企业利益集团的强大支持和资助，但它还充分具有值得严肃对待的民主和大众优势。

反对“明智利用”运动的论据非常强大，甚至对它的主张构成了致命的打击。即使假定私有财产所有者是资产阶级美德的典范，假定他们待在一个地方的时间长到足以使他们深深熟悉当地生产的生态条件（这是一个根本不能用于多数土地开发商、资源开采者以及投机商的假设），基本上也没有理由相信，每一个人都比集体更有见识。甚至更没有理由相信，私营业主的土地范围与生态过程的时空规模之间有什么关系。生态过程多种多样，从微观领域，到有关土地使用、便利设施、资源分配、水和空气的质量这些方面的区域问题，再到生物多样性、气候变暖等全球性问题。既然财产所有权的模式在生态上是混乱的，在社会上是不平衡的，那么就绝对没有什么理由相信，靠它的基本常识就能提供处理环境正义问题所需的全部智慧，更不用说它能考虑到生态上可持续的发展了，即使这种发展以最赤裸的资本主义形式进行的。

六 环境正义和为穷人辩护

环境正义运动提出了一个与标准观点和生态现代化完全不一样的话语。它也与“明智利用”运动有着极大的不同，尽管有理由各不相同。在此讨论的所有话语中，它已经被证明远不会顺从公司或政府的笼络。下列五个方面的问题最为突出：

1. 在防范环境危险时，在太多的情形中，如拉夫运河案，我们都非常确切地感到不平等的存在，补偿并消除这些不平等是多数人迫切要求的实际（主要是健康）问题。把不平等置于环境议程的重要地位，这就直接挑战了那些占统治地位的话语（无论它们是标准的、生态现代化的

还是“明智利用”的变体)。

2. 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权力形式频繁地动员“专门的”和“专业的”话语，不是否认、怀疑就是贬低已知的或强烈感觉到由于不平等地面临有害物质而产生的严重的健康后果。由此产生的对专门及专业话语(以及他们通常赞成的理性形式)的怀疑气氛支持着对用以研究环境危害的替代性理性(如果有必要，甚至是“非理性”)的研究。虽然科学、医学、经济学和法学仍然会是环境正义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们因此不再具有构造全部论据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明智利用”运动和环境正义运动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性。

3. 许多环境团体采纳的聚焦于“自然”命运而不是人类命运的生物中心话语(虽然由于结合了生态现代化的论题而有所修正)激起了它自己的反应。正如泰勒(Taylor, 1992)所指出的：

越来越多的环境组织确实在与生存问题作斗争，他们利用生存主题来寻求其成员的支持，不过当这些问题与濒危物种、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区、受到威胁的景观相关时，那才是生存问题。……这些生存辩论与乡村和城市的贫穷和生活方式问题并没有多少联系。如果发现鸟儿失去了筑巢的地方，那环境保护主义者就会不惜代价、竭尽全力地为它们建立筑巢箱并寻找另外的繁殖地；当鲸鱼搁浅时，大笔的金钱就会被用于为它们提供食物和庇护所；当森林受到威胁时，大量的人就会被动员起来阻止破坏；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环境团体像对待那些问题一样来支持无家可归的人或失业者，他们在那些问题上可是花了大量财力的。这是一个奇怪的悖论：一项运动，它劝说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并担心自然的持续生存(特别是栖息地消失问题)，可它不知怎得竟忘记了人类的生存(尤其是那些已经失去其“栖息地”和“食物来源”的人们)。

环境正义运动因此把人的生存问题，特别是穷人和边缘人的生存问题置于其关注的中心。

4. 受影响最深的人，他们之中处于被边缘化、无权的以及被打上种族烙印的，还包括照顾那些受害(例如，遭受铅涂料毒害或白血病危害)儿童的妇女，他们的地位迫使其他无权的人在主流机构之外寻求授权。一方面是寻求授权和个人自尊，另一方面是环境保护主义的目标，这两者的结合意味着环境正义运动把生态与社会正义目标以非常独特的方式联系起来。这样做，这项运动就具有了与众不同的位置性，由此出发，人们可以衡量各种不同的不公正。正如克劳斯(Krauss 1994: 270)所言：

妇女抗议具有不同的起点，而且她们对环境正义的分析是通过阶级和种族问题入手的。对于白种蓝领妇女来说，对公司国家的批评以及实现真正民主，这些对认识环境正义是重要的。……对于有色人种妇女来说，正是种族与环境，而非阶级与环境之间的联系才刻画了环境正义的定义。非洲裔美国妇女的故事把环境正义与其他的社会正义问题，如工作、住房和犯罪，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环境正义开始意味着有必要解决广泛的种族上的社会不平等。对于本土美国黑人妇女来说，环境正义与土著人的主权有着密切的联系。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些不同的位置性在环境正义运动的内部围绕着阶级、种族、性别和民族身份等问题制造了解释的张力。例如，许多证据表明：即使对社会地位和阶级问题进行控制，有色人种也还是更容易遭受环境危险。布拉德(Bullard, 1993: 21)概括了这些证据并得出结论：不公正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种族问题而不是阶级问题。

5. 同来自于“与垃圾相伴”的缺乏自尊作斗争，赋予这个话语一个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象征视角，并突出了这个问题的种族和歧视方面。最终，这使讨论极大地超越科学证据，比如有关健康影响、成本效益分

析计划表或极为微小的科学证据，被推进到棘手的、多变的和充满道德情感的领域，这些领域包括象征暴力、“文化帝国主义”和个人化反叛。个人化的反叛反对把“污染”以其污秽和堕落之象征意义与危险的社会混乱以及假想的某些团体的种族不纯联系起来。

美国环境正义运动产生的这些条件说明了它的一些主要特点。首先，对某些特殊污染——有毒物和危险的污染物——的集中关注把讨论压到了象征问题上，清楚说明了，就如污染那样，这个问题也是有关“地位的诉求和反诉求”的(Douglas, 1984:3)。这就是使运动具有如此巨大道德力量和道德义愤能量的东西。但是，如萨兹(Szasz, 1994)指出的那样，必然结果是，这项运动严重地依赖污染事件的符号政治学和强有力的媒体肖像。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大城市的高浓度臭氧云相比，纽约州布法罗市拉夫运河某个地下室的有毒物是一个更有影响的问题。虽然后者只牵涉很少一部分人，而前者在整个美国每年夏天都影响到了几百万人。在拉夫运河案例中，有一个可识别的敌人(一个玩忽职守的公司)、一个直接且确凿无误的结果(地下室里肮脏的液体、生病的孩子，和焦虑的母亲)、一个影响公众对政府信任的清晰威胁(教育部无疑是疏忽大意的)、一种要求个人赔偿的法定资格、一种对不明物体的不确定恐惧、一个媒体可能并且一定非常有兴趣地加以利用的戏剧化的极好机会。在臭氧浓度案例中，每一个开车的人都是敌人，政府很少有权力去干涉人们的开车习惯，结果是弥漫的，赔偿要求难以提出，夸张能力受到了限制，这些导致了几乎没有什么媒体报道。由此产生的目标选择上的偏见使评论家有可能指责环境正义运动把重点放错了地方，指责它的政治学是以恐惧的肖像学和政治学为基础的，并指责这项运动更多地与道德义愤而非后果评价的科学有关。这样的批评——同样常常由绿色和平组织提出——经常由某些标准(例如由主流环境保护论者所支持的那些标准)证明是正当的，但恰恰由于那个理由，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离题的。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拒绝从金钱角度进行讨论，这反映了一个直

觉的或经验的认识：为什么表面上公平的市场交换总是会导致最无权的人处在那些有权人的规训之下，为什么成本总是惩罚般地降临到不得不接受金钱规律的人头上，而利润却总是拜访那些享有财富赋予的个人权威的那些人。环境正义运动敏锐地认识到，任何问题一旦按照货币交换的不对称（特别是以成本效益分析）来安排，穷人和边缘人也就输掉了比赛。货币始终是一种社会权力的形式，是规训社会关系的工具，而非中立的、用以计算“提高福利的利益”一般等价物。

这种积极地否认货币计算之中立性的做法也许说明了1991年大会所采纳的环境正义宣言的那种有点中世纪口吻的腔调（当然，尽管是按照当代科技和可能性来制定的）。“母亲大地的神圣、生态的统一和所有物种的相互依赖，以及免于生态破坏的权利”等等这些主张与古列维奇(Gurevich, 1985: 274)对中世纪正义的描述有趣地一致，他写道：

[中世纪的正义]同时是一个道德的和宇宙的原则，人类所有行为都必须服从的原则。任何对这一原则的违背都等同于违背神圣的事物秩序和自然法……社会正义就是：整体的和谐靠它来维持，而且它不会否认任何一个人应得的赏罚。

389 我提出这个类比不是为了削弱，而是为了暗示：虽然这些环境正义的原则是以我们多数人有点陌生的类型制定的，但是有些人对此是熟悉的，他们尚没有受到本顿(Benton, 1993)所称“自由的幻象”的影响。这种幻象采取了以下的形式：

在由政治权力、经济财富、社会地位和文化成就的严重不平等所统治的社会里，平等权利的诺言是骗人的，其结果就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权利仅仅是抽象的，是形式上的权利，在社会生活的现实中几乎不能或事实上根本就不具任何价值。只要社会生活由这些抽象原则来统治，只要这个诺言被误认为它实现了，那么权利和正义话语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神秘化的形式，在迫

使个人接受在它声称要从中解放出来的那种依赖和贫穷条件时，它发挥着因果性的作用。

总的说来，环境正义运动已经看穿了这种虚幻的事态。但这意味着，它必须既要与生态危害的直接形式作斗争，也要与自由幻象及其普遍深入的影响作斗争。这样，一些人实际上导向以倒退的眼光来赞扬中世纪的社会（自然与人类社会相结合的神话般的黄金时代，那时，人类社会如此轻盈地踏在地球上以至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一切都那么美好），另一些人则羡慕那些被边缘化的人，因为他们还没有被完全引入科技上发达的、官僚机构上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之中。

我想说，主张“大地母亲的神圣性”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修辞都是成问题，又有力量。正因为它使得我们能够从道德的绝对、善与恶、对与错的角度来判断问题，所以它是有力量的。通过对神圣的大地母亲的玷污、违背，甚或“强奸”这样的言辞来提出问题，环境正义运动采取了一种不容商量的强烈的道德正直立场，这是法律、科学或其他理性话语所不能比的。它使得我们能够以准宗教语言提出如下广泛主张：恰当的方法是以路易斯·吉布斯的话来问“什么是道德上正确的”，而不是问“什么是法律上、科学上和实际上可能的”？

以社会抗议作为手段，它也使得我们能够阐明集体供给和集体责任的道德经济，反对利润的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分配关系。虽然“道德经济”肯定不是传统农民的经济，但是话语基础以神圣和道德绝对的语言在多种现象之间创造了同族关系，例如围绕城市环境危险的影响进行而进行的各种斗争，对自然本土信仰，以及诸如抱树运动(Guha, 1989:100) 390 或亚马逊的橡胶啄木鸟运动(Hecht & Cockburn, 1990)等这类遍及发展中国家的农民运动。因此，如果有人把“全体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自决的根本权利”作为环境正义的原则之一，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是通过这种话语策略，我们才能够发现环境正义运动与那些更广泛运动之间的联系。前者是在美国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后者则被马丁内斯-阿里埃称为“穷人的环保主义”(Martinez-Allier, 1990)。归根

结底，这些运动不是捍卫生存手段和对“自然”资源——它们正受到商品化、政府接管和私有财产制度安排的威胁——的共同使用，就是关注更加动态的运动（既在原处又可迁移），这些运动是为了回应生态稀缺性、生存威胁以及对长期生活方式的破坏等等事件而出现的（Ghai and Vivian, 1995; Sachs, 1993）。但是，就像环境正义运动一样，象征的维度、争取权力的斗争、争取承认和尊重的斗争，以及更重要的，争取从物质短缺和被他人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斗争，必然发挥强有力的作用，使穷人的环境保护主义聚焦于所有那些意义上的生存问题。

从这个观点出发，人们就不难理解由萨斯发动的对“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现代化”（以其讹误的形式）的激烈批评：

生态党的(Eco-cratic)观点喜欢普遍主义的生态规则，正像发展主义者喜欢普遍主义的经济规则。两者都忽视当地社群管理他们的资源并建造一个有意义社会的权利。保护自然[应该]与下列这些权利密切相关：公有产权、传统认识方式、文化自主、宗教仪式，以及不受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的束缚。（Sachs, 1993）

文化自主和传播的教条以及传统和差异的教条（简言之，受各种限制的忠诚于地方的政治教条。参阅第十一章）仍然带来了一个更加普遍的信息，它使各种力量能够围绕替代性发展（有时甚至是增长）策略结成松散的联盟，那种策略既关注地方和地理差异的多样性，亦同样关注全球市场一体化的必然的同质性。在此起作用的似乎是这样一种转换，从那些由以生态为基础的战斗的特殊主义中学到的理想转移到环境正义的普遍原则。就像其他“战斗的特殊主义”运动（参阅本书第一章），环境正义运动：

试图以一种相当特殊的方式把各种特殊斗争与一种普遍斗争联系起来。作为一项运动，它已经着手实现那些乍看起来很特

别的要求——捍卫和发展某些特殊利益，把它们适当地集合起来，实际上就是普遍利益。（Williams, 1989a:115）

从“不要在我家后院”的政治学到“不要在任何人家后院”的原则，发生在美国的这种转向比其他任何地方更明显地体现了上述联系。

环境哲学和决策常常没能表达这样的正义问题：谁得到帮助而谁不能；谁能提供帮助而谁不能；……为什么工业毒害了某些社区而不是其他社区；为什么某些被污染的社区得到了治理而其他地区却没有；为什么某些社区得到保护而其他社区却没有……草根的环境正义运动……试图摘掉意识形态的眼罩，这些眼罩遮蔽了环境决策中的种族主义和阶级剥削。从这种批判的优势观点来看，不平等的环境保护的解决方案存在于为所有美国人争取正义的斗争中。无论哪种社群，无论贫富、无论黑白，都不应成为生态的“牺牲区”。对有色人种居住区的持续污染说“不”，这是斗争的第一步。然而，从长期来看，我们则必须关注可持续的及公正的环境实践的制度化问题，那种实践既满足人们的需要，同时又不会牺牲土地的生态完整性。如果想要获得成功，我们就必须既是幻想的又是好战的。我们真正的未来就依赖于它。（Bullard, 1993:206）

然而，这并不是环境正义运动准备实现的唯一飞跃。人们已经开始重新定义环境本身（参阅本书第七章），包括“社区生活条件的总体性，空气和水，人人都有一份安全的、具有像样报酬的工作，住房、教育、卫生保健、人道的监狱、公平、公正”（经济和社会正义南方组织委员会，1992；转引自 Szasz, 1994：151）。这就直接回到环境正义和社会正义之间的联系上。它同样也导致对城市环境的思考，因为这里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大多数人现在居住的地方。

七 环境正义和城市

392 现在众所周知的环境运动对城市存在着长期的敌意，这已经产生了一个大得惊人的盲点。城市(几乎一半的世界人口现在居住的地方)通常被描述成制造污染和劫掠地球的制高点，在深层生态学以及主要聚焦于荒地、物类和栖息地保存等“自然”问题上的环境保护主义分支的文献中，城市不是被忽视就是被诋毁。生态主义者可能在理论上主张万物是相互联系的，但他们却因此忽视了实际生态系统的很大一部分或把它们边缘化。如果生物中心的思想是正确的，并且人类活动和生态系统运行之间的边界线必须要取消，那么这就不仅意味着在理解社会生活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生态过程，而且还意味着必须把货币和商品流以及人类的改造活动(例如，建造城市系统中的活动)理解成根本性的生态过程(参阅本书第五章)。

环境正义运动重视那些受着危险生态境遇影响的边缘化人和贫困人口，它直率地承认这些联系。它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特别地符合城市特点。因此，它阐述的原则包括通过治理和重建城市环境来处理环境正义事务的要求。

这样，环境正义运动回过头来与一个被极大忽视的环境政治学方面联系起来。高特莱伯指出：

污染问题不只是新近的话题；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都在以各种各样有意义的方式在认识、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把资源发展及其调整从城市和产业环境中分离开来的历史掩盖了污染和荒地减少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如果我们把环境保护主义的主要和唯一根基看成是为保护或管理城市外的自然的斗争，那么就很难把二战后物质生活方面的变化——石化产品的增加、核时代的出现、生产过剩和大规模消费的趋势——与聚焦于生活质量问

题的新社会运动连接起来。(Gottlieb, 1993:7)

高特莱伯正确地试图把环境保护主义解释成多种社会运动联合体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些社会运动是为了回应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而出现的，它们在二战后强有力地加速发展。他把一整套城市环境问题重新写入环境历史之中(及其霸权话语之中)，这些都是传统解释可能轻易错失的问题。这样，高特莱伯提议，完全相信环境运动的所谓“整体论”，并克服长期存在的诋毁城市、浪漫化乡村的意识形态偏见。

我们可以看一看铅涂料中毒的案例，这是环境正义倡导者们主要关心的问题。几百年来，人们一直知道铅是毒性很高的物质(罗马人非常了解这个问题，铅在20世纪初阿丽丝·汉密尔顿有关工业毒理学的开创性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把含铅涂料用于住宅区所引起的问题到20世纪20年代已经是人所共知)。然而，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铅的使用持续扩大(特别是汽油中含铅的添加剂)，直到1978年，重复的和确定性的研究揭示这些涂料与孩子们严重的脑损伤之间有直接联系之后，含铅涂料才被禁止。但是，在1950年之前几乎被普遍地用于住房的含铅涂料依然是一个严重的环境危险。因为它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住房损坏和维护不好的地区，所以铅涂料问题越来越被(不恰当地)当作是市中心所独有的问题。主要因为那一原因，这个问题并没有像含铅汽油那样成为一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后者因为不分阶级和种族的影响而成为一个迫切问题。所以，早在20世纪60年代，“流行病学是很确定的，它的受害人可以被预知，它对健康的影响能够被识别，医疗业也知道它的治疗方法”，但对此很少或根本就没有什么行动(Gottlieb, 1993:244—50; Phoenix, 1993; Colputura & Sen, 1994; Florini, 1990)。

比如说，在巴尔的摩市，1992年接受检查的大约25 000名6岁以下的孩子中，超过5%的人遭受着中毒之苦，12%的人血液中铅水平超标(见表13.1)。从全国范围来看，所有市中心非洲裔美国人的孩子差不多有一半超标水平的铅的影响，相比较而言，市中心白人的孩子则是

16% (Phoenix, 1993: 78)。如果把种族和收入放在一起考虑的话, 这种歧视性影响甚至会更加令人吃惊(参阅表 13.2)。

394 几乎 20 年都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其理由可以回到萨默斯如此才华横溢地概述的那个恶魔似的经济逻辑: 脱铅的成本要么会使租金上升, 要么会使市中心为穷人提供住房的房东无利可图, 从而加剧本已严重的市中心住房遗弃的问题。无论哪种情形, 结果都是更多的人无家可归, 这暗示着穷人的社会选择: 不是住在含有铅涂料的房子里, 就是住在大街上。现在, 又多了另一个问题——在证明孩子受铅中毒危害影响后, 针对房主的诉讼(部分赔偿金已高达 50 万美元)已经使保险公司拒绝把许多市中心作为保险范围。这导致更多的遗弃住房, 因为房主宁愿使房子闲置, 也不愿有人住了以后如果居住者遭受涂料之害而承担个人责任。政府试图促成某种折中方案, 但协议一次次地失效, 法规在面对孪生悲剧时去了它的效力, “这个孪生悲剧是: 孩子的铅中毒和可住得起的住房的消失”(Wheeler, 1994)。

表 13.1 1992 年巴尔的摩市(主要是穷人和非洲裔美国人)和巴尔的摩县(白人、富人和郊区居民)接受检测的被诊断为铅中毒或血液铅含量上升的孩子的数目

	6 岁以下 接受检测的 孩子	占有所有孩子 的百分比	中毒例	上升水平	1950 年之前 建立的单位 百分比
巴尔的摩市	25 503	37.5	1 295(5%)	2 794(11%)	49
巴尔的摩县	7 600	13.5	69(0.9%)	143(1.8%)	19

资料来源: 《巴尔的摩太阳报》, 1994 年 2 月 27 日。

表 13.2 美国城市中每一百万名 0.5—5 岁的孩子中血液铅水平超过 15 $\mu\text{g}/\text{dl}$ 的百分比估算, 按照 1988 年种族和收入来划分

种族	收 入		
	低于 6 000 美元	6 000—15 000 美元	高于 15 000 美元
黑人	68%	54%	38%
白人	36%	23%	12%

资料来源: Bullard(1994: 20)。

但这种不合理(资本主义的典型特点)是长期存在的。1947年的美国住宅法确认了每个人“在适当的生活环境中拥有体面住房”的权利。紧接在马丁·路德·金被刺事件之后,1968年出版的《国家委员会关于城市问题的报告》(US Government, 1968)不仅痛惜实现这一目标进程的失败,而且特别关注“适当的生活环境”之标准并没有能够确定。为了纠正这一疏忽,总统委员会不仅关注工作环境、种族歧视、穷人的社会基础设施(特别是教育),以及可达性(特别是交通),而且还就更加传统的环境问题插入了一个有力的章节:

除非我们开始对身边的自然环境产生一种新的敬意(respect)——敬重(reverence)也不为过,否则,美国将肯定不能建立一个良好的城市社会……任何人都不能无视掠夺者对我们环境的所作所为,或者对其保持沉默。我们必须对越来越多的如下问题的报告做出反应:烟雾窒息的城市、空气污染警报、社区枯竭、工业逃避、供水缺乏、河流干涸、受化学毒害威胁的鸟类受放射性垃圾伤害的所有生命。

为了寻求住房问题的解决方案,委员会继续指出:

395

在下列这样的环境中,人们是不可能想象良好住宅的:工厂顺风喷涌出粉尘和毒气的地方;地方政府管理糟糕、到处是垃圾和废物的邻里;还有这样的区域,敞开的下水道或有毒槽罐里传播疾病,或者是毗邻河流或池塘,从而毒害或感染在此游泳的人。(US Government, 1968:487—488)

这是一个罕见的历史关头。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形式被迫更密切地关注广泛的环境状况,这些环境状况是美国市中心政治动荡的基础,同时,在不安分的学生运动的帮助和煽动下,中产阶级也把大量审美的、

健康的和环境质量的问题列入政治议程。从巴黎到墨西哥城，从圣巴巴拉到东京，学生运动提出了一些深刻的问题，包括所谓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问题。因此，在那个时候，社会正义和环境正义在城市背景中是互不可分的，是一个大致的共识(Harvey, 1973)。也只是从那时起，环境问题才脱离它的城市基础。

然而，环境正义运动采取了多种不同的努力来复兴并持续这种长期关注。我们可以看一看臭名昭著的芝加哥东南方情形。这里是15万人——主要是非洲裔和拉美裔的美国人——的家园，它又是“50个正在使用或已经关闭的有害垃圾的商业掩埋地、100个工厂的所在地(包括7个化工厂和5个炼钢厂)，以及103个已废弃的有毒垃圾堆存处”。奥托吉尔德花园，这是一个被隔离的黑人社区，“四面八方被全芝加哥最有毒的设施所包围，而且，不必惊奇，它拥有全美最高的癌症发病率”(Bullard, 1994:14—15, 279—280)。这种城市环境危害的严重性很久以前就很明显了。与赫尔大厦住宅区——19世纪90年代由简·亚当斯组织——有关的各种工人那时就认识到，芝加哥的大部分地区简直可以说是城市环境的灾难，如果想要保护公共卫生，并且哪怕是实现一点点的社会正义，都需要对它采取立即的和迅速的补救措施。他们还认识到，正如当代环境正义运动重新发现的，唯一的改进道路就是授权给穷人和工人阶级，使他们能够有力地反对顽抗的、顽固的且常常腐败的公司权力结构(Gottlieb, 1993:59—67)。以当代芝加哥为背景，莎拉·派瑞斯基的小说《血色》最生动细致地捕捉到了这种斗争的性质。

396

但是，在一个迅速城市化的世界中，环境正义和社会正义之间的所有连接问题都不会全部停留在受环境危害不同影响的各社区的边界上。城市化过程比与之相关的环境正义和社会正义问题的层次要多得多。例如，改变城市组织的模式就会同时在不同规模上产生不平衡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构型，并把环境问题以多种方式转移到不同规模。高度地方化的城市烟雾减少了，但却牺牲了地区性的酸沉淀问题。那些上下班远距离往返的中产阶级逃避有毒地带和城市热岛，不料却加剧了全球变暖和大城市范围内夏天的高臭氧浓度。由于采用了包装手段(1945

年以后一个特殊的成长性行业)，城市食品供应的健康和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产生了巨大的塑料制品和废纸处理问题。作为制造臭氧的汽车的解决方案，电池驱动的汽车得到提倡，但那些电池中含有铅。电力促进了城市环境的清洁和健康，但却是以大量的二氧化碳、一氧化二氮和硫排放为代价，这些东西产生了酸沉淀和全球变暖。制冷法减少了食品污染、痢疾和疾病，但是氟氯化碳却严重削弱了臭氧层。

在所有这些问题中，城市化行为带来了一套与众不同的环境问题，并产生了广泛的环境后果，这些后果在相当不同的空间规模上具有不平衡的社会影响。而且，现在世界范围的人口高度集中，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小环境，在其中独特且常常新奇的危险实在太容易盛行。新的疾病出现了，旧的疾病也在重返(Levins, 1994)。麻疹通常只发生在人口超过25万的城市，瘟疫——如1994年严重破坏印度苏拉特市的肺炎和1995年袭击扎伊尔城市集中地区的埃博拉病毒——之所以会这样爆发，部分原因在于当代城市化采取的形式。然而，只是在最近，人们才系统地研究城市化和环境问题之间的关联(Girardet, 1992; McCarney, 1995 提供了更多评论)。在环境和发展问题的复杂梯形层次(地方的、大城市的、区域的、全球的)中，如何采取对社会正义问题敏感的方式来解决那些难题，这几乎还未在任何环境话语中得到反映，更不用说环境正义的话语了。当然，这些问题复杂性将会导致大量的混乱和争论。

但是，在全部有关如何建立环境正义的既实际又潜在的争论中，所有支持者反复回到的基本论据就是社会关系及其公正性的首要地位。考摩纳是这样来概括它的： 397

探究任何环境问题的起源时，人们就会面对一个不能避免的真相——归根结底的原因将在于[人们]相互影响的方式；对自然欠下的债务……不能一个人接一个人地以再生瓶或生态上健全的习性来偿付，而是要以社会正义这枚古老硬币来偿付。(转引自 Sachs, 1993:224)

但那种古老的硬币是什么金属制成的呢？

八 正义的原则和差异的环境

环境话语和社会正义原则之间的对比暗示着它们之间的天然联系。功利主义的正义理论与标准观点有着强大的联系。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很明显并存着这两种话语，这成为调整制度行为、政治行动和物质实践方面最流行和最霸权的思考方式。生态现代化——特别是从它对后代人权利的关注这一方面来看——似乎更符合某种社会契约论，并且我认为，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某些运用罗尔斯社会契约论的努力在近几年开始出现(Wenz, 1988; de-Shalit, 1995)。“明智利用”教条直接运用了自由主义的观点，并且正是从那种联系中获得极大力量。与之相比，环境正义运动经常援引平等主义的原则(有时是个人主义的，但更多时候是社群主义的)，要求更加公正地分配环境利益和负担。

这些显著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立场，每一种都有其对应的生物中心主义的形式。例如，当自由主义观点被延伸到符合所有“生命主体”的权利地带时，它就产生了强大的动物权利的教义(Regan, 1983)。根据物种繁荣和繁殖能力，功利主义可以把权利扩展到尽可能多的物种身上。虽然契约论观点格外重视处于逆境中的物种(濒危物种)的权利，以及栖息地改造的保守方法(只有当它对最弱势的物种有利时才是正当的)，但深度生态学运动的特点却是适用于所有物种(转引自Benton, 1993: 3)和栖息地的彻底平等主义。

正是在这种地形上，我们现在发现一个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辩论围绕着环境伦理学的恰当形式展开了。论据可能是严酷的：例如，与个体有机物的权利相对，对整个生态系统和栖息地的关注，无异于里根理论中的法西斯主义。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判断哪一种社会正义理论在社会上是最公正的。例如，在巴尔的摩市铅涂料中毒案例中，冲突不是发生在公正和不公正的解决方法之间，而是在不同的正义

概念之间。自由主义观点极为重视私有财产所有者的权利(以及他们与住房服务消费者相对的契约立场),所以各派之间争论就是一种私事。功利主义者把这个问题看作应该彻底解决的公共卫生危害事件,它把无法忍受的长期精神伤害的强加于生命(同时却不解决那个看似很小的致命弱点,那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也许与对少数人施加的伤害相一致,特别是当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做成本对于多数人来说难以负担之际)。罗尔斯式契约论者则更倾向于把它看成结果不平等的问题,它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而且大多数受其影响的人无疑并非处在最不利地位。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无知之幕”假设对罗尔斯理论是根本性的)自己在生命中的位置和立场(也就是说,我们是否会处在铅涂料环境中),那么所有参与者大概都会选择完全消除这种危险。平等主义者认为铅危害的不同影响与他们的原则是对立的。但是,涉及补救成本的分配时,平等主义原则就不那么有用了。如果住在清洁环境中的富人没有为他们的环境支付额外成本,那穷人是否应该为治理他们肮脏的环境买单?例如,美国有关清洁水和污水处理的问题,不提供资金的联邦要求将会给不富裕的人居住的老城区强加巨大的财政负担,如果严格地坚持不公平的平等原则,那会使之成为环境正义无法处理的一个难题。

这些理论立场都是有效的。每一种都会遭受哲学批评。本顿因此对动物权利和社会正义理论进行过深刻而敏锐的分析(Benton, 1993),德-萨里特带着同情批评了契约主义理论(De-Shalit, 1995),温斯则研究了可能的环境正义理论的全部范围,最后竟得出这样的结论:“单独运用时,每一个理论都是失败的”(Wenz, 1998)。因此,我们面临着正义理论的多元性,所有的理论都同样地看似有理,又同样地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温斯指出,我们“忍不住在一种情境下使用这种理论,而在另一种情境下又运用那种理论”。在产生冲突的情况下,比如上述铅涂料中毒情况,不同团体会采取不同的正义概念来支持他们的立场(财产所有者会运用自由主义辞令,孩子辩护人则典型地运用契约主义辞令)。对于这种情形,温斯提供的解决方法是,不要在不同的道

399 德判断之间强求一致，也不要指望一种单一性理论适用于不同规模上产生的不同环境问题。但是，这种解决方案所面临的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选择这种而不是那种结合多种原则的特殊方法？有什么可以防止权力行为把某种有关环境正义的多元性话语自吹的弹性歪曲成既定精英和强权人物的物质优势？鉴于说明公正的交易结果的全部理论假设，正如萨默斯所论证的那样，有毒物的交易确实可能提高福利。因此，阶级斗争恰恰就围绕哪种正义原则会占上风而展开（参阅本书第十二章）。

因此，尽管哲学家们可以像老练的体力劳动者清除杂草那样来定义一种更加质朴的环境正义原则，但他们却不可能为与环境实践相关的社会关系、权力、信仰和制度等方面深刻问题规定一个哲学的和话语的答案。马克思坚持“在各种平等权利之间，力量决定一切”。这同样适用于衡量最古老的硬币、最古老的社会正义的多样性流通。因此，“从把社会正义当作是永恒正义和道德准则的问题，到把它当作在整体社会中发挥作用的社会过程中的偶然产物”，这种转变是至关重要的。环境正义运动实践源于权力的不平等，以及那些不平等对边缘人和穷人、对可能会被随意贬低为“他者”或“外人”的那些人产生与众不同的环境后果的方式。它所阐明的正义原则在一个特别的经验世界中根深蒂固，并且把环境目标与争取承认、尊重和授权的斗争结合在一起。

但是，作为被嵌在多重“战斗的特殊主义”之中的一项运动，它必须设法跨越行动和社会关系间那个成问题的界线，成为一种更加普遍的运动。那些行动深深地嵌在地方、局部经验、权力状况和社会关系之中。而且，用威廉斯的话来说，就像工人阶级运动一样，它已被证明“总是没有充分认识到阻挡在路上的相当系统的障碍”（Williams, 1989a: 115）。从切实的团结——感觉像是情感性的和可知的社区中社会联结的模式——转向一套具有普遍意义的更加抽象的概念的转向，包含了从一个抽象层次——附属于地方——转向一些非常不同的抽象层次，后一种抽象层次能够穿越空间，在其中，社群不能以同样直接被认识。而且，从拉夫运河案的经验或沃伦县的战斗中演变出来的原

则未必会传播到环境和社会状况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从特殊到普遍的转向中，有一些东西必定是要失去的。威廉斯指出，最后出现的是：“否定的政治学、差别的政治学、抽象分析的政治学。而且，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它们甚至对于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都是必要的。”就环境正义运动情况来说，不断寻求媒体的关注和事件的肖像学——象征政治学正是围绕它们而建立——承载着它自己的消极影响。

但是，正是在这里，某些寻求权力的环境正义的修辞自身成为了一种不利条件。比如，诉诸“大地母亲的神圣性”无助于仲裁复杂的冲突，这些冲突围绕着如何在那种世界中组织物质生产和分配而产生的，那个世界的形成和发展取决于成熟市场关系和通过资本积累而进行的商品生产。停止生产全部毒素、有害垃圾和放射性材料，如果从字面意思来理解的话，这种要求将被证明对公共卫生和包括穷人在内的大部分人口的福利是灾难性的（绿色和平组织禁止氟使用的类似运动是这种政治矛盾的一个极好例子）。如此强烈地把免于生态破坏的权利作为一种消极权利提出来，以至于它看起来好像排除了以有利于穷人、边缘人和被压迫人的福利的方式来改造地球的积极权利。确实，环境正义运动的确体现了积极的权利，尤其是所有人的“政治、文化和环境自决权”，但是在这里，这项运动的内部矛盾变得很突出。

因此，在这一关头，围绕环境正义和穷人的环境保护主义而松散集合起来的全世界所有那些战斗的特殊主义运动都面临着一个关键的选择。他们要么忽视这些矛盾，继续受制于自己的特殊主义的战线斗争，抵制这里的焚化炉、那里的有毒垃圾堆、其他什么地方世界银行水坝工程，以及另外一个地方的商业采伐；要么就把这些矛盾当作是创造力核心，以此创造一个更加超验的和普遍的政治。如果他们采取后一条道路，那他们就必须找到一种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话语，把对社会正义的解放性探求与没有环境正义就不可能有社会正义（反之亦然）这样一种强烈认识结合在一起。但是，任何这种话语都必须超越在特定地方——多数草根环境激进主义首选的环境——形成的狭隘一致性和特殊亲和性，并采纳能够越过空间、越过多重环境和社会状况的抽象政治

学，那些环境和社会状况在资本主义强烈地按照它自己的目的来塑造的当代世界中构成了差异地理。并且，它必须既要这样做，同时又不抛弃自己的战斗的特殊主义的基础。

401 这些抽象概念不能仅仅依赖于一种致力于保护大地母亲神圣性的道德政治学。它必须处理物质的和制度的问题，包括：如何一般地组织生产和分配，如何对抗全球权力政治的现实，如何不仅仅以分散的、自治的、地方化的和本质上社群主义的方案（在政治光谱的左右两极都可以发现它的辩护者）而是要以更加复杂的政治学来替代资本主义的霸权，这种政治学承认，环境和社会正义必须按照一种理性的行为次序在不同的规模上来寻求。“理性次序”观念的恢复表明，当这样一个运动从其战斗的特殊主义的基础上扩展开来时，除了独自发展一种不被收编和正常的生态现代化视野，它将没有选择。一方面，那意味着把地理差异的对文化自治和传播的渴望，对传统和差异增殖的渴望纳入到更具全球性的政治中，但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探求环境和社会正义的中心而非外围问题。

为了使之发生，环境正义运动必须使生态现代化话语激进化。而且那需要反抗制造环境和社会不公正的基本过程（以及相关的权力结构、社会关系、制度构型、话语和信仰制度）。在此，我回到了《社会主义和城市》（Harvey, 1973: 136—137）提出的论证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当遇到重大困难时，至关重要的不是仅仅试图解决问题本身，而是首先对抗并改造产生问题的过程。那么，像现在，根本性问题就是残酷的资本积累以及嵌入那个过程中的金钱和政治权力的特别不对称。如果要把环境正义运动的话语空间和生态现代化的命题结合在一个激进政治行动的计划中，那就必须既要探究环境改造的替代性模式，又要探究生产、消费和分配的替代性模式。正是因为它必需直接挑战在目前仍然支配着环境改造过程的资本循环和积累，不管人们以什么方式来称呼它，它在根本上都是一种阶级规划，无论人们是否以这样的方式来称呼它。

有迹象表明这样一种转变正在发生。下面便是来自于 CCHH 主办

的《在每个人的后院》杂志中的最近论证：

环境正义是一种以人为本来主张“环境保护主义”的方式，它增加了至关重要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要素……新的**草根环境正义运动(GEJM)**试图寻找与低收入人群和少数民族社区、与有组织的工人、与教会以及与所有代表自由和平等的他人之间的共同点……当我们为环境正义而战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为自己的家园和家庭而战，就是为结束强者和贪婪者统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而战。（转引自 Szasz, 1994:153）

萨兹对这项运动的全面历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当它们从特殊转向普遍时，当它们从自身起源的特殊问题扩大开来并包容一个更具全球性的社会改造议程时，这些运动就表现出更大的历史意义。当它们不仅动员参与者为其自己的利益而战，而且还提供一个更加广泛的激进化经验时，这些运动就表现出更大的历史意义。……有害垃圾运动正在这个方向上形成清晰的姿态。它越来越从更大的社会批判角度来阐述自己的环境使命；它与其他运动的联合起来，并且宣布，最终，它们全都要加入同一个斗争中。它甚至设想了这样的未来：草根环境主义率先重构一种广泛的社会正义运动。（Szasz, 1994）

402

我想，仍然有点着迷于相当传统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那些人将会对此说“阿门”。但是，要超越华丽辞藻、媒体胜利和象征政治学的阶段，把环境正义运动带入一个极有条理的政治组织和实际的革命行动的世界，还有一段漫长而艰难的道路要走。

第十四章

可能的城市世界

一 城市化的历史地理

403 20 世纪初，全球只有 16 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其中多数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大的伦敦也只有不到七百万人口。那时，也只有不超过 7% 的世界人口能够合理地归入“城市”（Berry, 1990）。而到 2000 年，差不多将有 500 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其中最大的，如东京、圣保罗、孟买，可能还有上海（这份名单总是不停地变化），都将拥有二千多万人口，还有 20 多个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城市紧随其后，它们多数分布在所谓发展中国家。^①按目前发展趋势，到 21 世纪早期，世界将有一半多人口生活在城市而不是乡村中。

20 世纪已经成为城市化的世纪。1800 年之前，所有社会形式中，城市集中的规模和数量似乎都受到严格的限制。19 世纪，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打破发展障碍，到 20 世纪下半叶，地方性突破演变成普遍的大规模城市化浪潮。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多数人类的未来主要维系在城市化区域。21 世纪城市的生活质量将决定文明自身的质量。

不过，从当前世界城市状态来看，未来几代将找不到特别适宜的文

^① 本书出版于 1996 年，因此这里的表述仍然是预言性的。——译者注

明形式。目前，每一个城市都受困于各种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常常是不断增长的和在某些时候占主要地位的):集中的贫困、人类的无望、营养不良和慢性病、几近崩溃或者不堪重负的基础设施、无意义的或挥霍的消费主义、生态恶化和过度膨胀的人口、拥挤、似乎染病的经济发展和人类发展、周期性发生的痛苦的社会斗争,从街头的个人暴力到有组织的犯罪(它们往往是城市治理的替代形式),从进行社会控制的警察国家到时不时发生的要求政治经济变革的大规模市民抗议运动(有时是自发的)。因此,对多数人来说,谈论 21 世纪的城市就是一种歹托邦恶梦,在其中,人类致命缺陷中几乎所有最糟糕的东西都在绝望的深渊中集中起来了。

404

在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歹托邦图景已经与长期养成的习性牢牢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有特权尽可能远地逃离城市中心的那些人的习性。受自由汽车文化的推动,许多人渴望挣钱并逃离城市。例如,利物浦的人口从 1961 年到 1991 年下降了 40%,同期巴尔的摩的人口也从近百万下降到 70 万之下。结果不仅产生了无休止的郊区化,即所谓的“边缘城市”,以及杂乱无序地扩展的大都市;而且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每一个乡村都在退缩,成为城市化复杂蛛网的一部分,正是那种蛛网使得“城市”和“乡村”的二分范畴消解了,而我们曾经合理地依据那种范畴来区分世界。财富、人口和权力从中心城市的大量流失导致许多城市急剧衰退到被遗忘的状态。富豪和权贵迁走了,穷人就扔在了后面。此外,最近几年的毁灭性失业(特别是制造业)和老城市的危机重重状况变得太过清晰。曼彻斯特在 20 年中丧失了近 250 000 个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仅谢菲尔德钢铁工业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三次短暂的灾难中就丧失了 40 000 个就业岗位。与此相仿,巴尔的摩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以来也失去了 200 000 个制造业就业机会,而且几乎没有一个美国城市不因为非工业化而陷入相似的灾难之中。

随后一连串事件对许多人来说都是悲剧性的。为服务现今已经倒闭了的制造业而建造的社区处境艰难,被长期结构性失业所折磨。失望、放弃和平衡收支的准法律手段随即发生。当权者争着把责任归咎

于受害者，政治力量周旋于其间(常常是迟钝的)，政客媒体联合体趁机大肆诬蔑下层阶级游手好闲者、不负责任的单身父母和无用的父亲、家庭价值的贬值、福利迷以及许多错误的东西，并且对这些形成僵化看法。如果被边缘化的人碰巧是少数民族或种族特征显著的少数派，就如常见的那样，那么这种诬蔑实际上就是几乎不能掩盖的种族偏见。对这些被边缘化的人来说，唯一有用的反应就是城市暴动，这使现在实际社会状况以及更加显著的种族关系(对于所有在政治上正确的校园修辞来说)比过去几十年更加糟糕。

405 这就是我要讲的城市灾难的普遍故事吗？或者，它是某种局限于老式资本主义工业化特殊遗产的东西，以及反城市的盎格鲁—萨克逊生活方式的文化偏好？例如，整个欧洲大陆的中心城市正发生着一种显著的复兴。并且，这种趋势并不仅仅限于少数几个中心，就像巴黎，它具有久远的资产阶级化过程，这一过程是由法国藉以闻名的“大计划”(grandsprojects)所推动的。从巴塞罗纳到汉堡、从都灵到里尔，人口与财富向市中心的回流显而易见。不过，根据调查，这实际上只表明同样成问题的分割在地理上被颠倒了。正是外围遭受着伤害，正是巴黎和里昂了无生气的郊区成为了骚乱和不满、种族歧视和侵扰、反工业化和社会退化的中心。如果深入研究观察盎格鲁—萨克逊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种种迹象表明，由郊区财富所包围的市中心开始衰退，简单的“甜甜圈”城市形式已经瓦解(20世纪60年代后期更明显)，被一种复杂的棋盘格局替代，那种棋盘格局隔离并保护财产，陷入一种隔离贫穷和衰退的同样困境中。非常著名的格拉斯哥不法“外围地产”夹杂着大量的市郊通勤人口，并且美国许多城市目前正在出现的内郊社会经济问题迫使有钱人或者移居到远处(因此带来了边远乡村的城市化)，或者进入隔离的并常常受到高度保护的地带，以寻求安全。

但是，所有这些都是新事物吗？或者，19世纪晚期的城市化就已经出现类似状况？恐怕答案既是又非。许多歹托邦要素——集中的贫困和人类的无望、营养不良和慢性病、生态恶化和人口过剩、似乎受到侵袭的人类发展和经济发展、绝非偶然的痛苦的社会斗争——对于我们

19 世纪的先人来说实在太熟悉了。马修的《伦敦的劳工和穷人》(1861 年)、布斯的《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1902—1903 年)、梅恩的《伦敦流浪汉的痛苦哭泣》(1883 年)、杰克·伦敦的《深渊中的人民》(1903 年)、雅各布·里斯的《另一半人如何生活》(1890), 这些著作会纠正我们如下观念: 现在的社会状况在显著恶化。在美国, 城市社会变迁的速度和不均匀性——这曾使芝加哥在两代人时间里从一个贸易站发展成拥有 150 万人口的多语言和多文化的商业中心——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特别的事, 或许完全与从那以后发生的任何事一样都是充满压力。实际上, 历史给人的印象是, 至少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当代城市问题与我们的先辈所看到的相比是小巫见大巫, 即使考虑到那个时候揭发丑闻的人和道德学家们有时夸大了恐怖和捏造了暴行。

不过, 在迄今仍未知的大规模城市怠工和不满的水域中游弋时, 资产阶级掌权者在今天似乎做出了不同的反应。这些怠工和不满看起来威胁着它的权力、健康、理智、经济福利以及新发现的有关清洁和秩序的美学感受性。19 世纪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实际上非常重视城市难题, 远比今天更为明显。结果不仅仅涌现了一些深思熟虑的评论: 对“关于城市发展和社会的一般主张”的, 还有关于“新生活方式”关键的城市决定因素的(Lee, 1991:154), 而且迸发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革运动, 这把诸如奥克塔维亚·希尔和简·亚当斯等道德学家带到城市黑暗的中心, 并催生了建筑学家、规划师、社会理论家以及各种政治信仰的评论家, 他们以非凡的热情去寻找解决那个年代大城市问题的理性的, 甚至“城市美化”的方案。奥姆斯塔德、奥斯曼、格迪斯、埃比尼泽·霍华德、丹尼尔·伯纳姆、卡米洛·希特、奥托·瓦格纳、加里亚、雷蒙德·温翁等等, 所有这些人人都像现代城市的救世主那样勇往直前, 充满各种想法: 怎样满足效率、清洁的需求, 至少是在某种意义上的人类需求。尽管类似爱德华·贝拉米(他的《回顾》激发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和克鲁泡特金这类作家的乌托邦和无政府主义梦想注定永远不会实现, 但是他们促进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并成为进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激进计划的有力成分。

406

当然，当代也有很多批评家，他们以解构和福柯的分析技术为武器，或许会以敌视的眼光来回顾这一段历史，将之视为渐进改良主义的典型案例。在他们看来，这种改革掩饰了资本积累和土地投机开发的资本主义计划，它们只是一个面具，隐藏了资产阶级的罪恶、家长制作风、社会控制、监视、政治操纵、处心积虑地剥夺那些边缘化然而难以控制的大众，以及对任何“异类”的排斥。但不能否认的是，总的结果是让城市运行得更好，在 20 世纪多数时候都可以看到这种改善：不仅改善了许多城市精英而且改善了许多城市大众的命运，彻底地改善了基础设施(如供水、能源供应、住房、排污和空气质量)并为组织化的资本积累释放城市空间。与那个时代最好的“水气地方自治的社会主义”对比，人们一定会说，当代对城市衰退的倦怠感(Blasé attitude, 从席美尔那里借来的一个词，表示现代城市生活最强烈的精神属性之一)让人们看到还存在许多需要改善的地方。

407 在此，彼时和此时之间的差别就清晰地显现出来了。因为在 19 世纪末，人类总体进步的观念尽管是由“为积累而积累和为生产而生产”的资本主义激情所驱动，但是，当资本主义工业更加组织化时，当城市化的政治经济通过城市治理重组(伦敦郡议会在 1888 年设立，纽约大城市群在 1898 年设立)而在表面上成为可控时，它至少拥有一种乐观的未来图景。当都市命运更密切地依赖资本积累时，市议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就被整合到资本主义发展的霸权策略中去了。李正确地评论道，“大城市中心体现了现代性和未来”，并“代表着工业、中心化和理性”(Lees, 1991:153)。对于全部民粹主义的以及常常反城市的辞令来说，工业化和城市政治的共同进化(往往是辩证的和对抗的)似乎有条件为城市居民规划一个更加幸福的未来。

与那相比，高度机动的和强制“削减的”公司制造业利益与城市生活之间在当代的分离——最显著地体现在大规模非工业化的悲剧历史中——在我们的先人看来将因此是非同寻常的。公司的敌人主要已经移到城外，公司似乎不再需要城市或者任何特殊的社群。结果就是，城市的命运几乎任由房地产开发商和投机商、商业楼建筑商和金融资本

摆布。资产阶级，尽管它仍然非常担心犯罪、毒品和所有其他侵蚀城市的罪恶，但它现在似乎很乐意建一些小圈子来逃离那些苦海。他们住在城区、郊区和远郊的门控封闭社区中，惬意地逃脱了(或者它相信如此)任何长期的威胁，他们知道，城市抗议可以加以镇压，并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革命，因此感到很安全。由于不再担心即将来临的革命，而那是19世纪资产阶级关注的中心话题，剩下的便是由于媒体灌输的恐怖而偶然产生的战栗，就是在极其舒适的起居室里通过电视实况转播观看城市另一端发生的暴动。最近几年，富人似乎也表现出大量的罪恶感。1962年哈林顿出版的《另一个美国：美利坚合众国的贫困》(以及随后的“反贫困战争”和美国战胜“城市危机”的极大尝试)在今天就不可能产生那种特殊影响。在今天，对智商和犯罪行为从种族差异方面进行的带有偏见的生物学解释成了头条新闻，对具有再分配福利主义意味的事情的完全失望则大行其道。在此，市场自由主义的重新浮现有力地与马尔萨斯主义的复兴联系在一起(参阅本书第六章)。因此，即使一个城市的“社会底层”(这个可怕的术语就是我们祖先经常用的“危险阶级”这个骇人名称的化身)通过犯罪、吸毒、艾滋病及其他办法来摧毁自己，那又怎么样呢？只会在冷漠之上加上轻蔑，相当多资产阶级人士现在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无论如何都是无所谓的，我们在21世纪所能追求是“没有城市的”文明。“城市之死”(如所谓“作者和主体之死”那样)成为当代话语中的重要修辞，它足以成为人类想象力和制度与政治学转变的信号。“城市”和“城市问题”从那些因蔑视和忽视政治而陷入城市衰退大漩涡中的人的政治话语中消失了。当那种态度变得流行时，以下情况就不足为奇了，即：探讨城市问题的创新思维要么聚焦于如何最佳地逃避那些“总是与我们形影不离的”穷人在城市的巨大集中而带来的后果，要么着意于如何使资产阶级利益免于周遭城市衰退的传染并保护它们的安全(参阅本书第十一章)。奥斯卡·纽曼(Oscar Newman, 1972)发明了“可防御的空间”这个术语来解决城市犯罪，他有充分的理由在今天成为美国有关城市设计思想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

408

一些谈论 19 世纪城市化的敏锐评论家非常了解资产阶级改革可能达到的极限。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处理社会经济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1)把它们移来移去；(2)尽可能地掩盖它们。在这一点上，值得回顾下述两段引文：

实际上资产阶级以他们的方式解决住宅问题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问题解决了，但又层出不穷。……最不成样子的小街小巷没有了，资产阶级就因为这种巨大的成功而大肆自我吹擂，但是这种小街小巷又在别处，并且往往是就在紧邻的地方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我们的工人每夜都被圈在里边的这些传染病发源地、极恶劣的洞穴和地窟，并不是在被消灭，而只是在被迁移！同一个经济必然性在一个地方产生了这些东西，在另一个地方也会再产生它们，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①

以及：

除了这个商业区域，整个曼彻斯特本城、索尔福和休尔姆……所有这些地方都形成了一个纯粹的工人区，像一条平均一英里半宽的带子把商业区围绕起来。在这个带形地区的外面，住着高等的和中等的资产阶级，中等的资产阶级住在离工人区不远的整齐的街道上……而高等资产阶级就住得更远，他们住在……带花园的别墅里——在新鲜的对健康有益的乡村空气里，在华丽舒适的住宅里，每一刻钟或半点钟都有到城里去的公共马车从这里经过。最妙的是这些富有的金钱贵族为了走近路到市中心的营业

409

① 此处译文取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94—197 页。——译者注

所去,竟可以通过整个工人区而看不到左右两旁的极其肮脏贫困的地方。因为大街……足以不使那肠胃健壮但神经脆弱的老爷太太们看到这种随他们的富贵豪华而产生的贫困和肮脏……^①

从恩格斯时代以来,虽然技术、社会、政治和制度语境极大地改变了,但是实际状况总体说来却恶化了。路障和围墙、隔离和分离,这些在今天表明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市生活状况的东西几乎不能否认恩格斯所描述的事实。下面看看大卫·威杰里(David Widgery, 1991:219)是如何描述城市种族隔离破坏性后果的,这种隔离是由最近在伦敦东区金丝雀码头为失败了的金融资本建造荒谬的纪念碑所引起的:

曾经环绕码头的防护墙,与其说是拆掉了不如说是重新建造成一系列围墙、障碍、安全门和禁止入内的信号,这些东西试图使工人阶级远离新的无产阶级的雅皮区……撒切尔夫人选择的纪念碑或许成为金丝雀码头商业的圣像,它在撒切尔夫人1990年11月辞职前两周才封顶,但是我看到了在伦敦东区街道上为此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当众发作的精神病人,年轻的妈妈在供应早晚餐的水槽上给她新生宝宝洗澡,那些靠养老金生存的人在破旧的政府公寓里忍受着痛苦和寒冷等死,那些更容易得到毒品而不是教育的阳光少年们,在白粉上浪费生命。

如果这种城市种族隔离看起来古怪,那么就想一想:“3 200 多万的美国人目前生活在一种居住共同体联盟中”,并且“美国 50 个最大城市区半数以上当前出售的住宅,以及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纽约、得克萨斯和华盛顿特区郊区几乎所有新的住宅开发都掌握在一个利益共同体手中,这种共同体是居住共同体联盟的一种形式,其成员是义务

^① 此处译文取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7页。——译者注

的”。如果不仔细研究这种共同体联盟的管制和排他行为，这一切听起来非常天真浪漫。而真的研究，很难不让诺克斯(Knox, 1994:170)得出如下结论：这些联盟构成了“使用权制度网络，它以一种往往等同于契约法西斯主义的方式管制土地的使用和调停共同体的事务”。因而，所有这些似乎都以一种特殊方式改变了制度化了，改变了恩格斯注意到的那种移来移去的区域，以及特殊的限制和隐瞒策略。在此，正如迈克·戴维斯在《水晶之城》(Mike Davis, 1990:224)中评论的那样，反讽的是，“当东欧的围墙倒塌之际，它们却在所有地方[我们城市]竖立起来了”。并且，监禁、远程交流以及建构赛伯空间的现代技术也未必有用。显而易见，城市形态中的社会正义像过去一样捉摸不定，即使对那些仍然贸然关注它的人亦是如此。

但是，与发展中国家惊人的困境相比，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所有这些难题都变得苍白而失去了意义，在圣保罗、墨西哥城、开罗、拉各斯、孟买、加尔各答、首尔以及北京和上海，城市化疯狂地失去了控制。表面上，这里似乎发生了一些不同的事情，甚至不只是质的转变，这些转变是由迅速和大规模的量的城市增长带来的，它们使墨西哥城或圣保罗在一代人中经历的相当于伦敦十代人和芝加哥三代人所经历的。例如，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空气污染和地方化的环境问题比19世纪欧洲和北美城市那些对公共卫生构成威胁的最恶劣状态的影响要更为深远。比我更博识的专家相信，“第三世界大城市的当前情况非常不同于欧洲和美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那些问题”(Sachs, 1988:341)，而且我也倾向于接受那种观点，只不过同时要做一个重要说明：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理解这些差异是如何、为什么及以什么方式产生的，因为我相信，凭借这种理解，我们将更好地理解21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生活的前景。“对历史经验的唯一进步解释在于把它们看作是能够被超越的反模式”，在主张这一点时，萨斯当然绝对正确。但是，超越却不是简单地颠倒或矫正。它涉及从建构未来可能性的力量向大量新可能性的转变，因此前者在我们理解乌托邦的同时一如既往地使城市成为乌托邦欲望和兴奋的一个形象，后者

是这种城市过程所创造。

回到城市在过去如何发展或不发展的历史地理问题，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例如，什么因素限制了城市发展，使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在过去受到局限，以及 19 世纪前后发生了什么使城市化从这些限制中解放出来？

在其基础上，答案相对要简单一些。直到 16 或 17 世纪，城市化受城市及其生产性腹地之间非常特殊的代谢关系所限制，腹地意味着维持城市的剩余提取的可能性（以特定的阶级关系为基础）。无论某些市镇是奢侈品长途贸易的中心，还是一些可以长距离运输基本货物，如谷物、食盐、皮革和木材等，城市的基本供给（食物、水和能源）总是受到相对有限的腹地的有限生产能力的制约。用今天的行话来说，城市必须是“可持续的”，因为它不得不如此。城市粪便和其他垃圾与腹地之间的再循环是可持续的城市化模式的主要因素，这使得中世纪城市对于许多当代生态学家来说似乎是合乎道德的生态地方主义的组织形式 [尽管现在看起来合乎道德的东西在当时肯定散发着腐臭——吉永写道：“一个城市越是散发出臭气，它就越是富有”（Guillerme, 1988: 171）]。有时，城市的腹地通过强迫贸易和征服而大大地拓展（人们会想到北非的小麦对罗马帝国的供给），当然，农业或林业的局部生产收益（某些时候是一种持续到土地耗竭为止的短期现象）以及从不情愿的乡村人口那里榨取剩余产品的可变社会能力使得对城市新增的约束变得灵活而非死板。但是，城市经济安全极为重要地取决于其地方化的代谢支持系统的质量，在那个系统中，地方环境质量（周期性地危害城市人口的各种瘟疫的温床）以及食物、水和能源供应——特别是木柴——极为重要。在这一点上，值得回忆下述这一点：1830 年，像巴黎这样的城市，新鲜的日常用品和蔬菜的供应大多来自相对限制的郊区，要不就得靠它自己就地生产。1800 年之前，地球表面的城市化“步伐”（再一次用现在的行话来说）相对较轻（就城市在政治、科学和文明的历史中可能具有的全部意义来说）：城市相对较轻地行走在维持它们并从生物区域上得以定义的生态系统上。

411

当然，改变这一切的是由早期资本主义的军事和工业联合体所创造的新技术浪潮(被理解为既是硬件又是组织形式的软件)。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必然以打破空间障碍和加速周转时间为目标，那对其无情的资本积累的议程来说是基本的(Harvey, 1982, 1989a, b, 同时参见第9章)。除了它的矛盾外，我们也有必要把握隐藏在
这种独特历史地理背后的系统资本主义原理：

412

- 首先，加快周转时间、加速资本循环，并因此使发展的时间视野革命化，这些冲动支配着资本主义。但是，只能通过长期投资来实现这一点(例如，对人工环境以及生产、消费、交换和通讯等方面复杂精致而稳定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此外，防止危机的主要方法是以长期计划(例如，在萧条期间由国家投资的“公共工程”)来吸收过剩的资本，但这延缓了资本的周转时间。因此，围绕时间视野(当前)聚集了一系列异常的矛盾，在那种时间视野中，不同的资本发挥着各自的职能(例如，金融资本的时间视野很难跟得上长期的城市和环境发展需要)。
- 其次，消除全部空间障碍的冲动支配着资本主义，但只能通过固定空间的生产来实现。因此，资本主义就生产出适应某一特殊历史时刻积累动态的地理景观(空间关系、领土组织以及同“全球”劳动和功能分工联系在一起的地方系统)，其结果是，为适应其后的积累，又不得不破坏和重建那种地理景观。所以，减少空间运动的成本和时间，这一点与为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提供便利条件的固定的物理基础设施的建设相冲突。越来越多的资本被嵌入到空间中被当作土地资本和固定在土地上的资本，创造出“第二自然”以及在地理上组织的资源结构，这越来越限制资本主义在更加便捷运动之中的发展轨迹。当地方制度牢固地接合，当对方(及其特殊品质)的忠诚变成政治行动的重大因素时，这种张力甚至更为突出。领土组织生产

(例如地方和大都市政府体系的形成)过程使领土化、非领土化和再领土化成为资本主义历史地理的一个持续特点。

16世纪以来,几乎所有的塑造世界面貌的创新浪潮,都是围绕交通和通讯革命发生的——19世纪早期的运河、桥梁和收费公路;19世纪中期的铁路、汽船和电报;19世纪晚期的大众客运系统;20世纪早期的汽车、无线电和电话;20世纪50和60年代的喷气飞机和电视;以及最近在电信方面的革命。每一波创新都带来一种彻底的转换,空间以此得以组织,并因此为城市过程打开了全新的可能性。打破对相对有限的生物区的依赖,这为城市增长打开了完全新的可能性图景。例如,克罗农表明,芝加哥在19世纪的快速城市化实现了这种新的可能性,所以当它的代谢生态关系改变时,当它自身在不长的时期内就发展成世界最大城市之一时,它在整个美国中西部和西部的足迹就变得更大了。如普拉特(Platt, 1991)在依据芝加哥研究成果而写的《电子城》一书中精彩地说明的那样,在城市内部,电气化进程使全新的和分散的城市形式建设成为可能。

413

每一轮打破空间和时间障碍的创新都提供了一些新的可能性。仅仅拿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例子——蒸汽机——来说,当它使地方腹地从那些无论是因为食物还是燃料而使用土地的长期冲突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例如,现在学生会很奇怪地发现,杜能在19世纪早期《孤立国》中描述的用以围绕其城市的那种紧密的生产圈竟然专门是林业),它便把城市的能源供给从相对低效和高度地方化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但是,蒸汽机实现那种革命只是在它被应用于交通和通讯领域之后:人们必须解决煤的问题。因此,总体创新以及把这些创新联系起来的协同作用,在打开新的可能性方面过去和现在都是极为重要的。

就这一点来说,表面上微不足道的东西能够在创造城市发展可能性方面大有作为。例如,18世纪军事工程师和数学家把水流作为一种防御形式时认识到,网状结构比直接的管道和水道更为有效。这种认识(以及与之相伴的网络数学研究)一旦运用到19世纪的城市,它就具有

巨大的意义：一定量的水通过管道只能供应不到 5 000 人，但相同量的水围绕一个网状流动却能供应 20 倍的人。对于城市增长可能性，这是一个有用的一般性比喻：一个利用多种腹地、相互联系的且最终全球性的城市网络，它的发展使城市群增长成为可能，其前景是孤岛方式的增长远不能相比的。

再谈另一个阶段的例子，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无数创新(包括必要的数学知识)捆绑在一起创造了一种新的城市化可能性的协同作用，我们已经看到在另一种消灭空间障碍和加速周转时间的张力条件下对空间构型和城市形式的重组。至少在某种意义上，麦克卢汉在 20 世纪 60 年代预言的“地球村”已经成为一种现实。麦克卢汉认为，电视将成为媒介，但实际上可能正是人造卫星的发射预示着突变，开创了卫星通讯的新纪元。但是，在另一些时代，与其说它是一个单项创新，不如说是有重要意义的总体的集束性创新。集装箱运输、飞机运输系统、滚装船、汽车设计以及同样重要的，支撑更大载重的高速公路设计等等，所有这些都助于减少货物在空间流动时的成本和时间，同时自动化信息处理、最优化、控制系统、卫星通讯、便携式电话以及计算机技术，所有这些都推动信息几乎即时的传播、整理和分析，使得微型芯片在理解塑造当代城市生活的力量方面与卫星一样重要。

这些新技术的和组织化的可能性都是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驱动创造出来的，具有霸权的军事—工业—金融利益。因此，我相信，这不仅对于思考是有用的，而且对于认识下列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全都卷进了一个资本主义城市化或不平衡时空发展的全球过程，即使那些国家，它们至少在名义上探索着一条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和非资本主义城市形式。当然，城市化样态和特殊风格变化很大，它们取决于人们计划、反对以及最终实现这些资本主义可能性的方式。但是，可能性的语境无疑是一种资本主义生产。并且，不断打开的新的可能性的意义引发了那种现代主义风格的乌托邦思想，它们探索技术极、多功能极及类似于我在开始引用的那种城市乌托邦意象。

对于我来说，观察这些可能性得以发生的冲突方式时，似乎存在着

两种基本的视角。首先，我们可以根据资本积累的力量来观察城市化（以及城市建设和破坏的吸引力，参阅第九章）。资本在它自己创造的技术可能性的情况下实现了“为积累而积累和为生产而生产”的议程。例如，在最近的历史中，除了资本积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并不关注生物区、生态联合体以及其他东西。举一个典型例子，在美国，通过郊区化及与此相伴的诸如此类方式进行的资本积累（西部巨大的联合水利计划、高速公路体系、建设联合体，更不用说汽车、石油和橡胶产业了）对于美国战后经济的成功是很重要的，即使以摒弃和荒废中心城市产生了阴暗面。在此强调的是，与其说是技术合成，倒不如说是利用那种可能性的技术联合体来积极地实现直接的资本积累机会。这些可能性的耗尽（例如，新汽车市场的相对饱和）使得资本积累更加困难，就如每一个大型跨国汽车生产商现在都认识到的那样。因此，汽车产业现在把中国、印度和拉美的未饱和市场以及蓄意“城市化不足”的前苏联集团当作未来积累的首要地区。但是，那意味着重塑这些地区的城市过程，使之形成环境并不特别友好的（甚至经济并不适宜的）体系，这种体系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支撑着美国的经济增长。尽管那种前景或许会使每一位具有温和生态意识的人脊骨发凉，但是无力进行这种追求将会在每一个跨国汽车公司的会议室里（甚至不是在整个资本主义阶级那里）产生更为严重的恐惧战栗。

415

资本积累在城市化网络的不同地方表现出来的吸引和排斥的特殊辩证法在时空上是不同的，也随所涉的资本派系而变化。金融（货币）资本、商业资本、工业—制造业资本，财产和土地资本，国家资本以及农业综合企业资本——拿最常见的资本主义阶级构型的部门分类来讲（另外的分类是地方资本、国家资本和跨国资本）——具有完全不同的需求，以及完全不同的为资本积累而研究开发城市化网络可能性的方式。张力便在不同的派系中产生，因为它们每一个都具有相当不同的地理运动能力和对地理运动的兴趣——从相对固定于空间的财产、土地和小规模的“地方”资本到跨国金融的即时运动能力，不一而足。我们必须根据全球资本积累动态中的这种内在矛盾来理解现在看到的城市化过程中的大多数

创造性破坏。但是，它的其他部分来自各地方之间(民族国家、地区、城市，甚至更小的地方管辖区域)愈益破坏性的竞争，这些地方发现自己被迫以最低的价钱来出卖自己以吸引高度流动的资本(Harvey, 1989b)。

但是，观察城市化最近历史的另一种视角是依据对资本主义技术创造的可能性的“流行”把握。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关于劳动力为响应资本而发生的巨大历史迁移，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不然就是从一个大洲向另一个大洲。那种描述基本上在19世纪甚至20世纪早期产生了巨大意义(尽管总是存在一些例外，如因为马铃薯饥荒而产生的爱尔兰海外移民潮，这或许受到强制实行的农业资本主义的推动，但几乎不是乡村人口为寻找城市自由就业机会而产生的那种“常规”移民)。但是涌进发展中国家城市的人流在根本上并不与依附于资本积累的就业拉力有联系，或者甚至也不受对传统农民有破坏作用的农业资本主义重组的推力的束缚(尽管存在着许多地方，在那里，这种过程显而易见)。这是流行的利用资本主义生产的可能性的研究，不管资本积累是否正在进行，并且常常面对与其抛弃的差不多甚至更骇人听闻的经济条件。并且，虽然结果之一或许创造了巨大的“非正式经济”，既作为原始资本主义部门又作为更为传统的资本主义剥削和积累形式的温床而发挥作用(参阅Porters, 1989)，但是运动本身几乎不能以某种组织化的资本主义阶级行动的诡计来解释。

亚非人口向欧洲国家以及亚洲和拉美人口向北美的持续流动表现出某种相似特征，在资本主义城市中心产生了某种非常有益的对比。例如，在伦敦圣玛利博教堂的钟声辐射范围内，人们发现国际金融资本流动资金几乎瞬间就可以环游全球一周，与此同时，大量的孟加拉人口(主要是传统意义上的失业人口)涌入资本主义中心地带寻求新的机会，尽管这些机会只是一种强烈种族主义的、日益低的工资、非正式的和临时性工作机会。在此，这种移民运动所创造的产业后备军通过降低工资或许成为资本积累的手段，尽管移民运动自身或许是由寻求劳动力储备的资本所推动的(同时伴随着来自欧洲外围的外来工人和移民潮)，但它确实表现出独特的生命力。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大量自愿或不自愿的移民运动，看起来无论各国实施怎样严厉的移民控制政治都不会停止，在塑造 21 世纪的城市化过程中，这一运动与不受限制的资本运动和资本积累的强大动力差不多同样甚至更重要。源自这种移民运动的政治，尽管并不必然对抗资本积累，但也未必与其相容。它提出了严肃的问题，资本积累的城市化在将来是否像过去一样在任何地方都是霸权性质的，甚至缺乏任何主要的组织化力量时，诸如强大的社会主义或泛宗教(原教旨主义)运动，这些运动通过建构某种替代性城市世界以试图抵抗资本主义城市化形式明显的非正义行为和排他行为。

二 理论的反思

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我反复地陷入那种困境，即设计一种令人满意的语言或概念工具来把握我们遭遇的自然难题。我担心，在一种越来越需要预防性行动而非补救性行动的动态情境中，是否能用去年的概念工具和目标来解决今年的问题。并不只是我一个人担心这个问题，它也不是一种全新的困境。如萨斯对过去城市政治学和政策所做的评论那样：

城市规划专家，就如经济学家和将军一样，总是为他们要赢的最后一战而准备……雅典宪章的社会修辞更像一道屏障，掩盖了它们对新建筑材料、工业化建筑方法以及空间和建筑美学的迷恋，而不是作为一种指针，用来观察街道上的真实人群……在社会和人类需求概念中，大多数战后城市规划专家都表现出同样的天真浪漫、教条主义以及缺乏对人们生活方式经验证据的兴趣，就如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在苏联发生的那些争论的主角。(Sachs, 1988:343)

那么，我们是否重复了凯恩斯很早以前就指出的那种错误：我们特

别倾向于根据某些已故经济学家过时的论见来组织自己的当前生活？

在思考这个难题，并寻求答案的过程中，首先承认，当代城市作为一个物理的人工制品具有多个层次，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形成了我们或许称为重写本的东西，一种复合的景观，它们由不同时代叠加的不同建筑形式组成。在某些情境中，最早层次具有真正的古代起源，它们来源于最古老的文明，这些文明烙印可以在今日城市结构之下观察到。不过，甚至那些相对较新的城市也是由与众不同的层次组成的，这些层次是在不同时段由工业化、殖民征服、新殖民统治、一波又一波移民潮以及地产投机和现代化所造成的那种喧嚣混乱的城市增长积累起来的。我们可以研究一下移民层，它们如何占据了发展中国家快速扩张的城市棚户区，它们如何快速形成了越来越长久和固定占据的物理层次。

在过去 200 年左右的时间里，人口增长、大规模的自愿或被迫的人口格局调整、强大然而矛盾的经济发 展道路，以及把城市增长从早期限制中解放出来的强大的技术变迁，这些原因使多数城市的层次积累更厚和更快。不过，正如詹克斯指出的那样(Jencks, 1993)，城市独特性之一却是越来越凝固不变，越来越僵化，这恰恰因为它们堆积越来越多的物而不是彻底改变面貌并重新开始的那种方式。规划者、建筑学家、城市设计者——简言之“城市规划专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难题：如何在城市重写本上规划和建造下一个层次，既满足未来的需求，又不会过于破坏先前产生的一切。先前产生的东西很重要，因为它是集体记忆、政治身份、强大象征意义的场所，同时它创造了大量的资源，这些资源在进行创造性社会变迁的人工环境之中既是机会又是障碍。在今天，极少有自由创建新城市形式的那种“白板”。

418

但是，探究未来同时又尊重过去的一切，这种普遍责任往往使城市形式的僵化趋势内化成，甚至产生更加僵化的思维方式。正是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马克思的忠告：在危机时刻，我们总是可能请出亡灵，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拜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如果我对发展中国家中正在重塑城市（如首尔或圣保罗）的过程有一种特殊的主导性

印象，那么它只是这样一种印象：在史无前例的规模上，内容超越了形式——社会过程简直使城市形式几乎撑破。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我们如何创造一种城市未来的诗学就成为了根本性问题。

我回到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那个著名段落，那是因为它似乎特别适用于这种情形。马克思评论道，当历史重复自身，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的。发挥一下马克思的比喻，我们如何防止中世纪城市化的现代主义悲喜剧变成 20 世纪晚期后现代主义的笑剧呢？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视角在这一语境中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从这一视角出发，我继续讨论五个对于理解当代城市化具有基础意义的概念问题。

1. 在社会行动领域定位城市

被称为“城市”的“物”是被称为“城市化”的“过程”的产物。辩证方法(参阅本书第二章)指出，(1)过程比物更根本；(2)过程总是由它们创造、维持和消灭的物所中介；(3)创造出来的永恒(包括思维方式、制度、权力结构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和物质对象)往往承担着日常物质存在之固定不变基础的功能。这种思维风格与 19 世纪晚期以及当代大多数建筑学和社会科学都根本性决裂了，在后者那里，尽管也都强调社会关系和过程，但其主导观点一直都是认为，城市是一种物，能够被成功地设计出来，以便控制、维持、改变和加强社会过程。19 世纪的奥姆斯塔德、格迪斯、霍华德、伯纳姆、西托、瓦格纳、温翁等这些人把复杂的社会过程还原为寻找恰当空间形式的事件。借助于这一点，他们确立了 20 世纪的主调(“乌托邦的”)，要么为机械地理解城市形式，如柯布西耶的例子，要么弗兰克·劳埃德·莱特那种较为有机的理解。

所谓“高级现代主义”以及城市困难并不在于其“总体化”视野，419而是把物和空间形式凌驾于社会过程之上的那种长久习惯。它假设能够通过设计物理形式来完成社会规划。如马林(Marin, 1984)指出的那样，这是所有古典形式的乌托邦理想(从托马斯·莫尔爵士开始的)的根

城市主要是城市村落的集合体。詹克斯认为，甚至洛杉矶也可以分成28个区，尽管彼特·霍尔承认所有这些观点听起来有点平庸，但他却可以愉快地主张伦敦实际上是村落的集合（有关这一主题的许多洞见都来自对BBC4台名为“城市阳光/城市阴影”的3档广播节目的访谈，该节目在1993年10月播出）。在英国，查尔斯王子通过强调城市村落是城市再生之地率先表达了这种情感，并因此受到来自不同政治和社会阵营的人的追随，受到来自边缘化的种族人群、贫困人口、四面楚歌的工人阶级以及上层阶级怀旧人士的支持，那些怀旧的上层人士把所有这一切都视为文明的房地产开发形式，包含了人行道餐馆、步行街和劳拉·阿什利商店。当然，庞大而肮脏的工业可能朝什么方向发展（或者，就此而言，巨大的“肮脏而多余的东西”可能存在于何处），这个问题从来都没有清晰的答案。所有这些使城市激动人心的东西——意外的、冲突的、随着对城市未知维度的揭示而产生的激动人心的东西——都将被牢牢地控制，并被写有“行为不轨者请勿入内”的巨大标牌遮挡起来。

无论如何，城市村落观点或社群主义方案既吸引人的又强有力（这可从致力于这一主题的大量论著看出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对某种失去很久的神话般的亲密无间的村落生活的怀旧，不过，那种怀旧忽视了如下事实，大多数平民迁出村庄，正是因为人类精神难以忍受它们，它们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是多余的。另一方面还因为某个被称为“共同体”的神秘社会实体也许能够在城市村落中得到重建，并且我们被反反复复地告知，“共同体精神”或“共同体团结”是将把我们从呆板世界中解救出来的东西，那个世界，社会分崩离析、把任何东西都抓在自己手里的唯物主义盛行、造成全部城市不幸的个体自私和以市场为导向的贪婪大行其道。例如，以基督教为基础的社群概念，成为今天拉美解放神学的至关重要的计划，甚至作为一种解决城市难题的方案带到了巴尔的摩(McDougall, 1993)。

这种理想并没有多大价值，在其中根本就没有什么真理可言。我认为，阻止许多城市骚乱或者总体性社会破裂的唯一东西是那些复杂的网络，它由社会团结、社区组织的力量和奉献，以及数以百计的自愿者

产出一个完全不同于在某种寻求解放、平等和生态上敏感的政治体制下实现的城市形式。替代性的反资本主义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存在，即使它们是追求完全不同利益的不同集团和阶级之间激烈竞争和斗争的主题。因此，问题并非追求某种暧昧不明的预言或强制推行某种经典的乌托邦图式，在那种图式中，僵化的空间性统治着历史和过程。难题在于勇于斗争，争取推进一个社会上更加正义和政治上更加自由的时空生产过程的格局，而非勉强接受由金融资本、世界银行所强加的格局，以及内化在不受控制的资本积累体系中的通常受阶级限制的不平等性。幸运地，后者的权力，无论它们如何具有霸权，也绝不会完全地控制城市化(更不必说，用以思考城市的话语和想象的空间总是相联系的)。强化迅速加快的并常常失控的城市化过程的矛盾，这一做法创造了各种缝隙的空间，在其中，各种自主和解放的可能性都能够繁荣茁壮成长。因此，城市过程中的这些社会运动如何能够动员起来成为一种更加普遍的反资本主义政治，以及在何处实现，这便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我就要讨论这个问题。

2. 城市在全球化世界中的位置

在今天，存在着一种强烈偏好，即认为全球化和市场竞争力量早就决定了城市化的未来。城市可能性被限定在单个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争取地位的纯粹竞争之中。因此，在城市化过程中，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发动为系统转型提供动力的战斗的特殊主义。特别是最近20年来，“全球化”辞令已经变得特别重要，甚至在激进思想中代替了更具政治性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等概念。这种话语转向的意识形态结果特别地剥夺了各种形式的地方、城市甚至国家的政治行动的能力。

然而，全球化过程并非新鲜事。无疑，1492年以降，甚至更早(参考汉撒同盟体系)，资本主义全球化就部分地通过创造城市网络而开始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强调过这个观点。他们写道，现代工业不只是开拓了世界市场，而且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

本态度：他们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固定的空间秩序，通过破坏历史的可能性，并在一个固定的空间框架中遏制全部过程，从而确保社会的稳定性。矫正这种空间决定论的方法不是像后现代主义批评喜欢的那样从整体上放弃城市话题(或者甚至乌托邦的可能性)，而是回到城市化过程的层次，这一过程对于创建遏制它们的物来说是根本性的。过程的乌托邦理想同那种固定空间形式的乌托邦理想看起来非常不同。

这一争论具有解释的和政治的意义。我们是不是把当代生活的困境归咎于资本主义的矛盾、现代性(或者其混乱报应的后现代性)、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创伤，归咎于随着技术和官僚理性而产生的世界之去魅、源自边缘化和异化的社会反常、大规模的人口增长，或者归咎于那种不确定的然而却有力的观念，即认为宗教信仰和相关社会价值在衰落？或者我们是否主张，城市(一个物)或城市化(过程)天生就有某种东西，它为创建当代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过程以及反常现象提供了与众不同的信条、形式和内容？长期以来，我一直主张，理解城市化是理解政治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过程和难题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只有把城市化理解为一种过程(或者，更准确地说，多种过程)，它把各种空间化的永恒性结合成为一种与众不同的混合物，这才是正确的。一个被称为城市的物拥有相对于社会生活的因果力量，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城市化过程创造出来的空间结构的物质嵌入性，与社会过程的流动性——如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处在永久的对立之中。我在第二部分中论证过，通过物质环境的改造来说明社会关系，这种方法使得改变任何一个都特别困难。因此，我们称为城市的物的内在僵化性，再加上计划者脑袋的僵化，实际上阻碍着发展不同城市化过程的可能性。传统时空思维以及实际时空形式的重负像一场恶梦压在思想和生活物质可能性之上。

有关城市的传统思维并没有完全忽视这个难题。奥斯曼和罗伯特·莫斯试图把资本积累过程从旧有时空结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21世纪的城市化问题同样成为定义时空、环境和位置如何在何种社会过程中生产出来并且产生什么样后果的问题。例如，持续的资本积累将生

作用的力量，特别是城市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非同一般的发展。

(1) **金融管制的解除。** 这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的美国，是对滞胀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的被迫反应，该体系曾国际贸易和交换的主导体系。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全球体系，所以这意味着从一个全球体系(主要由美国在政治上控制的体系)向另一种全球体系的转向，后一体系更加地非中心化、同市场更加协调，并且更加依赖货币流动。结果使得资本主义的金融状况在时间和空间上更加不稳定。我注意到，“全球化”这个术语主要是由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的金融出版物推广的，它被描述为这种解除金融管制过程的必然优点，为资本开辟全新领域的进步的和不可避免的东西。它是一个嵌在货币语言中的术语，因此也是一种未及细察其阶级起源和意识形态功能而就进入公共和学术话语的商品。它描述了一种空间状况，在这种状况中，一家新加坡银行能够为巴尔的摩市的地方发展提供金融服务，而几乎不需要任何来自其他层次的领域控制(例如民族国家)作为中介。因此，城市化过程和金融资本之间的联系已经变得更加直接。它不需要其他制度的控制形式作为中介，越来越倾向于在全球进行迅速的且短暂的地理扩散。在意识形态上，它使全部城市位置似乎都必须屈从于自由流动的金融规律。

422

(2) **商品、人员,特别是信息流动的成本和时间渐渐地减少**(参阅上文)。这极大地改变了生产和消费的组织以及需要和需求的定义。在交往领域中,最终的“空间的非物质化”使工业、消费以及诸如此类领域能够进行各种地理调整。然而,这也因此容易过分重视所谓信息革命。它的新颖性使人印象深刻。不过,铁路、电报、汽车、无线电和电话在它们兴盛的时代也同样使人印象深刻。这些较早例子都是有益的,因为每一种东西都以自己方式改变了全球化展开的方式,改变了组织生产和消费、实施政纲的方式,改变了在持续扩大的规模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颠倒为物与物之间社会关系的那种方式。城市化和通过网络穿越空间而实现的城市位置的联系确实因为信息技术的使用而极为迅速地变化着。

“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以至于“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他们继续写道：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如果这还不是对全球化的恰当描述，那就不知道什么是恰当的了。并且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得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全球迫切要求，将之视为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

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要求过去一直并且将来仍然是一个严格的地理事件。“全球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总是内含在资本积累而非最近形成的政治经济条件之中。并非不能说，过程已经变化或者自己趋于一个特殊的甚至“最终”的状态。但是，以过程为基础的定义使我们聚焦于全球化如何已经发生并正在发展。那么，它是怎样的过程呢？更重要地，它在近些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某些主要变化引人注目。描述这些变化就是描述某些在城市化的复杂动态中已经变化的起关键性

^① 此处译文取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276页。——译者注

做得很好——而这意味着那些具有强大劳动纪律的低工资国家常常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因此，劳动力控制便成为全球论点中生死攸关的意识形态问题，再次迫使社会主义主张采取守势。

所有这些量上的变化集中起来所产生的相互作用便足以改变城市化过程。但是，在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领域中，还没有发生革命。如果存在任何真正的质的趋势，那么便是趋向重新主张 19 世纪早期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价值，以及把每个人（以及每一种能够交换的物）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的 21 世纪偏好。结果使得世界大部分人口相对于资本积累来说显得多余，同时又把他们与任何替代性的谋生工具隔绝开来。

在政治上反对全球化主题，这意味着，它否定了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任何一个地方采取有意义行动的可能性（无论它是民族国家还是作为反资本主义动员政治环境的城市）。它非辩证地假定资本流之空间过程的纯粹力量统治着地方。相应地，也有许多人，他们试图张冠李戴。 424

3. 社群主义反应

面对城市生活提出的无数难题和威胁，某些拒绝全球化主题的分析家提出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案——努力把大量看起来失控的城市转变成城市乡村，在那里，据信每个人都彼此之间以礼相待，生活在一种文雅而友善的环境中。就这一点来说，19 世纪晚期有关城市的思想对当代思想和实践产生了特别有害的影响。基本上与托马斯·查尔姆斯牧师在 1812 年左右提出的那种更加传统的资产阶级观点一样，那个时代的乌托邦社会无政府主义对此负有责任。作为英国有影响的作家，查尔姆斯主张把“共同体精神”作为快速城市化地区中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暴力威胁的解决方案。这两种风格的思想融合在帕特里克·格迪斯和埃比尼泽·霍华德的作品之中，并绵延至 20 世纪许多规划实践之中，这意味着社群主义思想具有一个很长的连续性，把这些思想从有关城市过程的全部思想中清除出去异常困难。

赫伯特·甘斯《城市村民》（1962 年）之后的许多当代理论家相信，

(3) **生产和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 结果是生产体系、劳动分工和任务的专门化越来越发生地理分散和分裂, 尽管与此同时, 通过兼并、接管或者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联合生产协议等形式, 公司权力不断地集中。全球电视机、全球汽车成了政治经济生活的日常形象, 所谓“全球城市”亦是如此。一个地方生产的停业与另外一处生产的开业, 变得再熟悉不过的故事——某些大规模生产企业在过去 20 年里迁移了四五次。公司具有更大的权力来支配空间, 使单个地方越来越容易受到它们一时心血来潮的影响, 但是整个城市化网络却易于制造业资本的快速转移和流动。

423

(4) 在过去 30 年中, **世界无产阶级队伍几乎翻了一番。** 这部分因为人口的快速增长, 但也与流动资本使得越来越多的世界人口(包括妇女)作为雇佣劳动力在诸如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非洲以及最近的前苏联集团等地区的流动有关。这一巨大的全球无产阶级中的多数都在严重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条件下劳动。但是, 由于各种大规模的城市集中, 它在地理上被分散了。因此很难把他们组织起来, 即使它的状况表明一种广泛的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有利形势。

(5) **世界的领土化发生了改变。** 国家运行越来越强烈地受到货币资本和金融的调节。结构性调整和财政紧缩已经成为游戏的名称, 国家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收缩成这样一种作用——想方设法改善商业环境, 而这往往意味着更加严厉的对劳动力的规训。在此, “全球化论题”承担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 它打击社会主义者、福利国家拥护者、民族主义者等等。因此, 穷人的福利大部分都被政府对资本的补贴所代替了(阿拉巴马州最近一次性给予梅塞德兹-奔驰公司 2.5 亿美元的补贴, 以便说服它在那里落户)。

(6) 尽管单个国家失去了某种权力, 但地缘政治的民主化却创造了新的机会。对于任一核心权力来讲, 对其他国家施以控制越来越难, 与此同时, 对于某些边缘权力来讲, 介入资本主义竞争游戏却越来越容易。货币权力是一个“平等派和昔尼克派”, 它授予那些支配它的人以力量, 而不管他们是谁, 在哪。有竞争力的国家在全球竞争中能够

组织所组成。那些自愿者组织马不停蹄地工作着，以期在城市化世界中恢复某种尊严和自豪感，而城市化世界则被快速变迁、失业、大规模移民以及所有那些融入后现代性之虚无主义堕落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所造成的极端苦难搞得晕头转向。

不过，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社群总是意味着不同的事。甚至当能够找到某种看起来像它的东西时，也能够常常证明，像万能药一样，它是难题本身的一部分。那些可靠的社群也可能排斥他人，竖起各种他人不得入内的牌子（不然就是有形的围墙）。如扬指出的那样，“种族主义、种族沙文主义以及阶级诋毁……部分地源自对社群的要求”，以至于“对某些群体的积极认同常常在于首先把其他群体定义为他者、没有价值的残废之后才会产生”。如我在第十一章的论证，位置政治学绝非同社会过程没有什么关系，但也不可能把它还原为社群主义者通常支持的那种简单性。

在此，我们遇到一个独特的、有益的且非常重要的例子，它说明，对某个被视为绝对空间中自然实体的理论对象的先验定义如何可能产生误导。错误产生于那种信仰，即“社群”——常常被理解成一种自然发生的实体——确实存在或者可能存在（大量文本说明，“社群”如何在城市化历史中丧失了或者可以发现）。这种信仰还认为，这种具有因果力量的实体能够推动社会变迁。即使把它理解为某种社会地构造的物，社群主义还是吸引了某种神秘的信仰。这种信仰认为：被称为社群的“物”可以作为某种自立的或自主的实体而创造出来，具有因果性和安慰的力量；这种“物”与“他者”或“局外人”老死不相往来而自成一体；这种“物”与其他物的外在关系是偶然的和偶发的而不是固有的和持续的。一种更加辩证的观点强调，像社群那样的实体，虽然不无意义，但不可能离开产生、维持和瓦解它们的社会过程，后者对社会变迁才是根本性的。我并非主张被称为“社群”的时空形式的建立是没有实用意义或价值的。可以建立类似于社群的东西，作为面对逆境的慰藉和生存之源，作为政治授权区以及有边界的空间，在其中，种族主义、等级主义、民族—宗教的排外主义以及强大的内部剥削机制得以

426

发展。但是，通过对物—过程之间关系辩证法的抽象，我们有关社会行动可能性的看法会变得如此受社群修辞的限制以至于往往自我抵消，甚至是自我破坏最初的目标，无论我们多么善意（例如，我们试图引入以基督教为基础的社群理想，将之作为万灵药来解决巴尔的摩市的非裔美国人所经历的那种被剥夺和边缘化问题）。通过把全部问题转化成空间—位置关系的辩证法，将之作为一般城市化过程所固有的全部时空性生产的一个方面，那就会有一些更好方法来理解“社群”和社会过程之间关系。尽管看起来可能过分抽象和复杂，但它并不比那种认为可能在孟买或圣保罗重建罗马“共同体”或中世纪村落的观点更荒唐。后一种观点并不能替代那种更棘手的难题：创造一种异质性政治和贯穿当代城市化生活之多元时空性的公共领域。尽管社群主义的花言巧语或许会给一种纯粹全球主义的无能后果在意识形态上带来安慰，但它也不能获得成功，因为它脱离位置和空间的辩证法，并把矛盾的一方面视为具有因果力量的自我维持的实体。

4. 从城市生态学到城市化的生态学

当代大多数环境—生态运动之普及且常常强大的反城市主义经常转化成这样的观点，即：城市不应该存在，因为它们是掠夺和污染地球上所有神圣美好之物的顶点（参阅本书第十三章）。解决生态困境的根本办法就是回归到乡村化的社群主义。主流反城市主义既是有害的又是奇怪的。差不多就好像是，“自然”作为脱离了人类行动而受到重视和尊敬的東西，它的拜物教概念使所有政治运动对大多数人生活其中的实际生存环境的质量熟视无睹。无论如何，像生态学家那样认为世界万物是互相联系的，然后裁定人工环境和随之而来的城市结构不知怎地又跑到理论和实践的思考范围之外，这是矛盾的。结果就是回避把对城市化过程的理解融入环境—生态的分析中。

在这点上，乍一看 19 世纪的祖先们似乎会告诉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毕竟，在奥姆斯塔德和霍华德的工作中，试图以生产性张力来调解农村和城市，并试图改善审美的敏感性，从而在城市化工业主义

的慢性病和据说比较健康的农村生活的追求之间架起桥梁，这难道不是首要目标吗？否认在这个领域所取得的真实成绩，将是粗鲁无礼的。过去创造的标记——公园制度、花园城市和郊区、林荫大道——现在成了生活传统的一部分，它们确定了许多人（不仅仅是资产阶级）能够并确实仍然欣赏的城市生活的某些品质。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生态学视野——虽然在当时是高贵并创新的——在其定位方面却主要是美学的（并十足资产阶级的），很容易被中产阶级的房地产开发行为征用，并被程序化。而且，不止一个证据表明，城乡之间应有的生产性张力实际上被对乡村和社群的生活形式的怀旧所支配，而那种生活方式，除了在资产阶级试图逃避自己实践的美学和社会效果的丰富想象中，实际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城市思想中的生态学传统，即使算上芒德福和格迪斯这样的一流思想家，对于社会和环境变迁的城市化辩证法也没有说出什么深刻的意义。虽然它的确关注公共卫生和生活环境的问题，但它却未能采纳其他关注工作条件的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思路。它对生态学的理解具有太多的局限而不符合当今情况。

然而，近些年，特别是一些更具管理信念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即“可持续的”城市在环境上更加友好的发展和变迁形式。不过，把城市从环境分析（以及对乡村及其据说通情达理的社区意义的令人倒胃口的怀旧）中分离出来因为过于张扬而让人感到不适。生态学者（与环境正义运动相对照）似乎能提供的最好东西，要么向那一类城市化回归，它受到生态区的代谢性约束，就好像它理应存在于实际上染上瘟疫的且受到污染的中世纪或古代；要么完全把城市融入分散的乡镇或地方性实体，据信，在这些地方，亲近“自然”的某个虚构特性将使我们易于接受有意识的（与强迫的相对）行为的方法，它们将尊重我们身边自然世界的特性（好像把每个人从大城市中倒入农村，这种行为将会以某种方式保证生物多样性、水和空气的质量，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且，在建筑学、城市规划和城市理论领域中，太多充作生态上敏感的东西实际上都与时髦和资产阶级美学没有多大区别，那种资产阶级美学喜欢以一点绿色、少许的水以及一抹天空来提升城市。

428

但是，还存在着更多的生态问题，它们对于我们思考迅速城市化的世界至关重要。困难在于，“环境”（参见本书第二部分）对于不同的人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事情，不仅取决于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忠诚，而且取决于情境、位置性、经济和政治能力等。当美国十大环境团体把全球变暖、酸雨（通过汽车业而直接与城市化联系在一起的问题）、臭氧洞、生物多样性等作为目标时，它们指向某些有全球相关性的严重问题。如何回应那些问题，对城市化过程有深刻的影响。但是，发展中国家大量涌进城市的大众认为，这些几乎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结果人们越来越激烈地抱怨富裕国家在环境议程上强加了自己的偏见。

直接的、家庭层次上的室内空气质量和卫生设施问题常常被忽视，或者只是受到激进环境团体的微不足道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在过去十多年间，绝大多数的国际注意力都集中在“公地”问题上，或者那些预示着全球悲剧的问题上。但是，家中空气和水传播的疾病对孩子死亡率和妇女生命的不利影响，其全球意义并不比热带森林的遭毁这种事情小。而且，就直接的人类条件来说，它们也许也是全世界最急迫的环境问题。当然，对城市穷人来说，有害室内空气和卫生设施缺乏的直接威胁超过了全球变暖——甚至是车辆污染——的不利影响。（Campbell, 1989:173）

虽然坎贝尔补充说：“当然，世界需要在这些和其他领域同时行动”，但努力满足在根本不同层次上规定的不同环境目标的优先性分配及其潜在矛盾结果也许是最有争议的、最未经思考的问题之一，这些问题是与当代迅速城市化相联系的。必须把城市化问题纳入 21 世纪环境—生态问题之中，只要这样说就行了。但是，如何在具有不同生态问题的不同地理规模上进行一体化行动，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仅仅涉及皮毛。虽然环境正义运动有可能把社会正义和生态现代化问题放在一起摩擦从而点燃政治之火，但它过多背上社群主义和宗教神话包袱，

以至于所有解决城市化问题的尝试都有点摇摆不定，更不必说甚至在某些方面的潜在退步。

5. 作为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城市化

一个概念性僵局迫在眉睫。接受全球化语言，就是全部反资本主义运动甚至一般社会民主运动的无能。那种语言拒绝城市发展的相对自主权，破坏城市创造新的城市生活可能性的能力，使人们无法想象在整体上来改变、打破和摧毁资本主义全球化/城市化的轨道。另一方面，社群主义反应，要么是对过去时光有微弱怀旧感的乌托邦，要么就是孤立主义的地方性政治幻象，据说它不属于在全球运动的资本主义积累流的范围。虽然社群主义常常会吸收生态平衡和可持续生态健全之梦想，但它还是削弱了实际面对综合环境问题的能力，因为这些问题出现在完全不同的地理规模上(包括城市化规模上)。

如果“社群”语言和“全球化”语言都被拒绝了，那么还有什么路可走呢？我们发现自己陷于这样的地形，在其中，时空、地方和环境彼此不能分开，也不会被当作历史和地理具体条件外的纯粹抽象概念。因此，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的应用时机已经成熟。这就要求一种转向，从全球化或社群主义的语言转到“不平衡时空发展”(或更简单一点，即“不平衡地理发展”)的语言。

最简单说来，这个概念集中于使社会—生态行动成为可能的具体的历史—地理条件，以及人类改变社会—生态状况的方式。不平衡地理发展概念抓住了：(1)在地方历史地沉淀的社会—生态关系的重写本；(2)多层的以等级安排的社会—生态构型的组合图，以及(3)常常无序的社会—生态流(特别是当代条件下资本和移民的)，这些流随着时间创造、保持和消灭景观的地理差异。城市化是不平衡地理发展在某一等级上的表现。

这不是一种特别新的理解世界方法，但是，过去经验被证明，它是一种难以坚持的思想和政治方法。一而再，甚至当分析家们到达了理解这些关键方法——时空、地方和环境以这些方法通过社会生态过程的

展开而连接起来——的时刻，它们往往也会消失在更简化的且过分单纯的有关社会过程的修辞之中，那一社会过程在空间产生之中并改变外部自然。虽然人们往往承认后一观念的专制(可以想想普兰查斯和吉登斯这样的理论家随便对待这一主题的方式)，但有关不平衡地理发展之生产的唯一重要理论陈述则是由史密斯(Smith, 1990)做出的。并且，尽管他清楚地说明要实现反资本主义运动就必须要进行“非常地理学的”计划，如果要想取得实效，则还有各种政治难题需要克服。

三 政治视角

我在第五章指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人中间都会发现反资本主义的力量(以及，因此出现的积极斗争的潜力)。这意味着，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区不会发现对资本主义不满和愤怒的示威运动。在某些地方，反资本主义运动相当强大地、牢固地建立起来了。地方化的“战斗的特殊主义”随处可见，从密歇根森林的民兵运动(多数具有暴力反抗公司和反资本主义的性质，同时也具有反种族主义和排外的性质)到印度和巴西农民反对世界银行开发计划的运动，以及世界各处都存在的反对贫穷、压迫、剥削和环境恶化的城市社会运动。在资本主义不平衡时空发展的空隙中，存在着真正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不过，尽管这种斗争具有战斗性，但往往却是特殊主义的(某些时候尤其如此)，常常不能超越其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特殊形式。说这些运动是反资本主义的，并不是说它们是亲社会主义的(它们很可能被视为极权主义的、宗教的和新法西斯主义的)。它们缺乏一致和统一的方向。一个领域的政治运动和行动或许会混淆或者阻碍另一个领域的行动，使资本主义分而治之的过程和利益更为容易实现。反资本主义斗争本身是不平衡发展的，需要一种甚至比葛兰西主张的更加敏感的阵地战方法和策略。

431 尽管不平衡的地理和历史发展条件或许为任何一致的和国际的反资本主义斗争带来了特殊困难，但它们同时也为政治组织和行动提供了大

量有利条件——异常变动和不稳定的地形。社会主义的和反资本主义的运动必须利用这些革命可能性。它必须同不平衡时空发展之特别强大的过程保持一致，其中包括城市化进程，它们使得组织化如此不稳定和困难。它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目标——控制国家权力——是不够的，而且，把不同派别统一起来绝非意味着压制社会生态差异。马克思以同样方式发现了这种必要性，即各国工人应该团结起来与他那个时代的全球化过程进行斗争，所以，在理论和政治实践中，社会主义运动必须想方设法使易变的不平衡发展空间与当前资本主义阶级一样具有充足的灵活性。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运动具有可观的历史和地理力量。在理想情况下，通过对反资本主义运动潜力的理论理解，它能够把各种斗争与不同的多重目标综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具有全球目标的更为普遍的反资本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传统对实现这样一种综合工作具有巨大的贡献，部分原因在于，它创造了各种理论工具，人们可以借助它们在多种差异中发现政治共同性，并且识别出压迫和剥削的首要/次级/第三级条件。在此，我重提雷蒙德·威廉斯的相关断言，他指出“捍卫和发展某些适当地结合起来的特殊利益，事实上就是一般利益”，并且强调“适当地结合起来”是要完成的核心任务。

必须展开综合工作，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动态的变化，斗争的领域和地形是不断地变化的。特别是，需要理解不平衡时空发展的生产过程以及当下存在的深刻矛盾，这些矛盾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领域（例如，它伴随着的大量自我破坏、贬值和破产），而且存在于那些越来越容易遭受减员、失业、服务业衰退、工作条件和生活水平恶化、资源体系破坏以及环境质量下降等暴力伤害的人群。超越特殊性，并强调灾害的样态和体系特性，这是至关重要的。在全部政治口号中，“只有联合”仍然是最有力 and 富有洞见的一个。此外，必须把分析拓展至更广泛的多元的和似乎互不相干的问题。诸如艾滋病、全球变暖、地方环境恶化、地方文化传统的破坏等，在本质上都属于阶级问题，而且，在反资本主义阶级斗争中建立的共同体将如何更好地缓解遍布政治

432 行动的压迫状况，这也是要加以揭示的。我强调，这不是呼吁折中主义和多元主义，而是呼吁揭示广泛的反资本主义事务的原始的阶级内容。

例如，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资本主义斗争来说，“全球化”的首要意义在于，工人阶级的相对优先地位与世界其他地区劳动条件相比已经大大地降低了。发达资本主义生活条件已经感受到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力量的全部冲击，这使地方、地区和国民经济前景反复无常（本年度繁荣城镇将成为下年度的萧条地区）。自由市场的证明下述这点是合理的，如果尽可能减少国家干预（并且，尽管通常并不如此，但应该加上垄断权力），那么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为所有的利益服务。结果，在其他地方一样，也像资本主义传统心脏地区，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暴力和创造性破坏（例如，通过生产的地理重组）可能广泛地在丰裕和挥霍性消费的特殊技术中表现出来，那种技术作为一种潜在的渴望瞬间就能传遍世界。在发达资本主义中组织反资本主义的政治地形似乎比先前更肥沃了。

然而，必须重新扎根日常生活的有机条件来展开这项综合工作。这并不必要抛弃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传给我们的抽象概念，但它确实意味着通过沉浸于大众斗争来重新评价这些抽象概念，并使之重新产生效力，某些大众斗争也许在表面上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斗争。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具有自身的僵化趋势，抵制自身被嵌入其中的概念、实践、制度和政治的固定资本，那些固定资本一方面作为卓越的资源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也作为教条阻碍着行动。我们需要辨别，在这些知识和政治的固定资本中，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无用的。而且，对于什么是该抛弃的，什么是应该坚持的，如果没有经常性的痛苦争论，那反倒是令人吃惊的。无论如何，都必须进行辩论。

在此，我仅仅讨论一种战略性观点。马克思主义干预的传统方法一直是通过先锋政党进行。困难也由此产生，因为这经常导致把单一目的、特殊目标、抽象的社会主义目标强加在各种反资本主义运动之上，而后者针对不同的历史地理条件采取了多样化目标。在此，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推力面临创自身对立面的危险。当威廉斯考虑把情感忠

诚的语言——“我们人民”——翻译成抽象政治规划的语言——“无产阶级”——时，正是这个问题如此困扰着他。正是在这种翻译中，否定和抽象的政治同时被发现(参阅本书第一章)。

解放应该意味着开放差异的生产，甚至在差异之中或之间开辟竞争地形，而不是压制它们。真正的而不是商品化的文化差异之生产应该是社会主义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强烈反资本主义的理由之一便是它制造了一种相对同质化资本主义个人。把所有人 and 全部文化差异都还原为共同的商品化基础，这种还原论是强烈反资本主义情绪的焦点。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包容并寻求从那种冷漠的商品化同质性中解放出来。这不是主张一种无拘无束的相对主义或者不受限制的后现代折衷主义，而是主张对共性/差异、一个人的特殊性和其他人的普遍性之间关系进行严肃讨论。必须把社会主义理解成一种政治规划、一种有关社会如何运行的替代性视野、一种有关社会生态关系如何展开的别样洞见、一种有关人类潜能如何实现(尽管是在差异地理学之中)的标新立异想象。

我们迫切需要一种社会主义的先锋运动来表达那种政治学。但是，它不可能是那种强制推行单一目标的老式先锋政党。它也不可能仅仅以德里达那种“终极的后结构幻象”作为武装，那是一种“没有特权、资格和头衔……没有政党、国家、民族共同体的新国际”之幻象。以解放方式来塑造社会生态和政治经济变迁，需要的不只是思想和话语(不管思想和话语有多重要)。那种版本的先锋派——现在盘踞于学院，在那里，潜心于对思想和理想之流不知怎地被想象为本身就是激进的和革命的——失去了实质性优势。

必须创造出组织、制度、学说、计划、形式化的结构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并且，这些政治行动必须牢牢地植根于人类行动得以展开的那些具体的历史和地理条件，并有能力改造它们。在传统的共产党先锋派(列宁的幽灵)和理想化的先锋派(德里达的幽灵)之间存在一个政治组织和斗争的地带，它亟待培育。

一般的地带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性。许多实质性运动应该得到我们的关注，其中一些发生在边缘，另一些深嵌于发达资本主义结构之

中。就如往常那样，困难总是如何找到修辞的和切实可行的工具把各种有分歧的反资本主义力量联合起来。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1996年1月30日，萨帕塔国民解放军呼吁“世界为反对新自由主义和捍卫人道而团结起来”。他们指出，金钱力量到处都“使尊严蒙羞、使诚实受辱，使希望遭损”。他们将新自由主义改名为“历史罪恶”，它使“特权、财富集中，并且豁免了那种使悲惨和不幸民主化的恶行”。他们
434 主张，“全球化”这个名称意味着资本的“现代战争”，这一战争便是“扼杀和遗忘”。这种新自由主义“给我们的是股票市场的价格指数”，而不是人性；“是全球化痛苦而不是尊严；是虚无而不是希望，是国际恐怖而不是生活”。他们最后指出，与这种恐怖的国际相反，“我们必须提出希望的国际”。

现在，我们仔细考察一下这种观念的普遍含义：只要所有那些由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的全球化政治暴力所引起的问题能够在政治上集中起来，那么它的日子确实就屈指可数了。尽管帕萨塔主义的呼吁来自发达资本主义的边缘，然而在我家乡巴尔的摩市为“最低生活工资”而进行的斗争（它也是波及美国许多城市的运动的一个部分）同样地认识到和拒斥了那种骇人听闻的灾难，它们是由新自由主义权利的乌托邦方案和公司权力联合造成的。这种“在所到之处造成巨大灾难的疯狂列车”必须停下来。而且，如伍德通过敏锐分析所做的结论，第一步是从我们当前经济和政治条件中汲取明显的教训：“一种人道的、‘社会的’、真正民主的和公正的资本主义是比社会主义还要不现实的乌托邦。”（Wood, 1995:293）

综合工作，以及把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样化地带发生的多种反资本主义斗争联合起来的工作，必须并驾齐驱地进行。那就是社会主义先锋政治组织所必须关注的事。不过，如果它想有效地展开这项工作，就必须装备概念和观念、理论和想象、基本理解和“能够说得清的认识论”、基本信仰和有说服力的论证。对于我们这些主要在话语和再现领域澄清历史地理教训的人来说，这正是义务所在。我们不可能依赖源自时空距离的诗意，即使我们欣赏它在促进这种或那种社会生态变迁

轨迹发展中的力量和意义。我们需要适合自己时代和地方的诗学，我们需要学习如何使这些诗学在切实可行的情境中发生作用，以便通过集体行动来塑造朝向社会主义目标的历史和地理转型的社会生态过程。这意味着认真对待时空、地方和环境的生产，认真对待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条件，那种条件孕育着特别不同的和广泛的反抗资本主义的运动，也孕育着转型行动的多种可能性。在这些条件中，首要的是由当前城市化过程所决定的特殊的重组中的社会生态秩序。

四 探究可能城市世界的边界

在揭示和探究新城市过程和城市形式的可能性时，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将建议何种姿态呢？如果著名的空间形式乌托邦，那些在山巅上闪闪发光的城市，不只是渴求而且是危险的，是以法则、稳定以及秩序名义进行极权主义压迫的诀窍，那么我们如何才敢思考未来可能的城市世界呢？

435

但是，不去思考它们就是逃避人类社会当前面临的最为重要的社会生态困境。我们已经为那种逃避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城市化已经发生，而且没有他更重要的问题让我们如此揪心。进入 21 世纪再犯同样的错误，不仅对于社会主义计划而且甚至对于资本主义利益，都将是异乎寻常的错误。并且，理解下面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那些在 19 世纪 90 年代英国或者甚至在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和欧洲起作用的东西并不适用于为 21 世纪快速城市化文明而进行斗争的本质完全不同的问题。

要与城市生活达成一致或许需要主动地把新的思考方法吸收进激进政治学。对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辩证的基础性理解告诉我们：崇拜过程的干预是空洞的，崇拜物的干预则是过度丰富。源自对“过程—物”关系的辩证理解的政治与其替代形式完全不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语言对于深嵌于空间、时间、地方和自然生产过程的变革可能性有

许多有益的教导。而且这些教导直接延伸至城市化的研究方法中。因此，我以将要解决的十个关键难题来结束讨论，它们亦是快速城市化世界文明之未来的十大神话。

第一个神话是，城市是反生态的（“非自然的”、“人工的”，或者在某种意义上“处于自然之外”）。相反的观点是，高密度的城市化生活以及富有灵感的城市设计形式是 21 世纪达及生态上更加敏感的文明形式的唯一道路。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通常理解的环境和人造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经济的环境之间的区别是人为的，并且城市和进入其中的万物既是促成生态困难的因素，又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大部分人类都将定居于一种被指定为城市的生活环境之中，这实际是说，环境政治必须非常（如果不是更加）注意环境质量，就如同它对虚构的孤立的和想象的“自然”环境的关注（参阅本书第六章和第十一章）。出于同样的原因，城市政治在根本上必须关注自然变迁的模式，这些模式与某种特殊的人性形式的自我实现模式辩证地关联着。

436 第二个神话是，通过找到正确的空间形式，社会生态变迁之混乱的并经常成问题的形式能够被校正和控制。与之相反的观点是，全部的空间化乌托邦，从托马斯·莫尔经过柯布西耶再到迪斯尼乐园表现出来的乌托邦堕落（它已经体现在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设计中），都不可能抹去历史和过程。解放政治提倡一种生动的过程乌托邦理想，反对僵死的空间化城市形式的乌托邦理想。

第三个神话是纯粹过程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不受物和永恒、空间形式和物质结构的物质性束缚，它能够把人类精神带入一个非物质的世界——虚拟的现实，在其中，自我实现在抽象和理想意义上被理解为一种纯精神活动。与之相反的观点是，想象和物质的、空间形式和时间过程的辩证法建构了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根本的和无法逃避的新陈代谢状态。缺乏存在(being)的生成(becoming)是空洞的理想主义，而缺乏生成的存在是死亡。城市化动力和城市构造存在于一种基本的创造性张力，它为探究不同的物种存在模式提供联系。不同时空秩序和结构的生产是社会过程中的积极因素。我们通过城市化(过程)和城市(物)之

间辩证关系所理解的东西，建构了一种至关重要的社会生态转型观点，并且因此建构了一种根本的反资本主义和亲社会主义斗争的观点。

第四个神话是，解决城市问题的资源和必备工具，依赖于技术、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问题的优先解决。相反的观点是，城市总是倾向创新、创造财富和消费财富，治理城市(被理解为一个地方)总是为大众改善技术和经济的唯一真正道路。由资本主义军事—工业联合体创造的现代技术一而再再而三地城市化打开了明显资本主义导向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以及进步力量对它们的潜在应用必须同处于统治地位的力量(诸如资本积累或民粹主义的应用)区别开来，后者通过那些技术手段实现他们自己的议程。必须以有利于所有人的人类潜能发展的方式彻底地重新定义财富、福利和价值(包括那些影响人口增长和环境质量的价值)。必须探究为多数人服务的社会生态变迁的创造性形式，以与为精选的少数人着想的资本积累相对。

第五个神话^①是，只有让市场力量更自由地发挥作用，城市区域的社会难题才能解决。与此相对的观点是，财富的创造(以及再定义)依赖于社会协作和合作(甚至商业间的合作)而不是某种个体化的达尔主义的生存竞争。因此，追求社会正义便是一种完善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并且在此，至少社群主义思维、价值和国家公共政策具有潜在的创造性作用。

第六个神话是，社会问题只能到了那种程度才是可治的，即：在城市化世界中，市场的非中心化力量能够更加自由地生产空间、地方和自然。与之相反的是，财富创造(以及再定义)取决于(所有经济实体之间，包括商业之间的)社会协作和合作相结合，取决于适应和环境的塑造(空间、地方和自然的生产)，而不只是依靠某种个体化的达尔文主义的生存斗争(参阅本书第八章)。因此，如第十二、十三章所论，无论是改善经济操作，还是使社会生态条件更有利于解决温饱、救助老弱和

437

^① 原文漏掉对第五个神话的评论。这里的内容是根据哈维有关大都市演讲整理的。——译者注

促进和谐，追求社会正义对实现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

第七个神话是，全球化(空间化)的力量如此之强以至于不允许任何地方或特定方案有相对的自主权把城市化过程纳入不同的轨道。因此，该神话主张，只有一场全球革命才能有所作为。相反主张是，空间—地方的辩证法一直都是复杂的事件，全球化实际上只是不平衡地理和历史(时空)发展的过程，它为反资本主义斗争创造了多样性的地形，而那些斗争则需要以这样一种方式综合起来，即：尊重不同的“战斗的特殊主义”的特点(诸如那些在遍及全球的城市社会运动中发现的特点)，同时又包容强大的空间纽带和国际主义的全球社会主义政治。

第八个神话是，社群团结(经常是“地方的”)能够提供控制、管理和减缓城市问题所需要的稳定性和力量，“社群”能够替代公共政治。相反观点认为，就其存在而言，“社群”是一种与产生、维持并最终破坏它的冲突过程相关的不稳定构型；就其确实已获得的永恒来说，“社群”常常是排他的和压迫性的社会形式，既可能成为政治经济难题的万能药，亦可能是城市冲突和衰退的根源。

第九个神话是，针对无序和具有暴力倾向的城市，我们必须重新强调强有力的秩序、权威和集中控制(一种国家机器)——假设其是道德的、政治的、社群主义的、宗教的、物质的或武力的——然而却不要干预市场的基本自由。相反观点是，“市场斯大林主义”(我认为，找到一个恰当的名称是至关重要的)的当代形式是自我矛盾的，并且城市化总是涉及对立、紧张和冲突的创造性形式(包括那些通过市场交换而形成的形式)。源自异质性的张力不可能也不应该被压制。必须以社会地实存的方式来释放它们——即使这意味着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冲突，包括为了集体目标围绕市场过程的社会化而展开必要的社会竞争。多元性、差异、价值的异质性、对立的生活方式以及乱糟糟的移民，无须担心它们会成为无序之源。那些不能顺应多元性、移民运动、新生活方式以及经济政治宗教和价值异质性的城市，要么会因为僵化和停滞而亡，要么会因为暴力冲突而土崩瓦解。定义一种能够把各种各样异质性(包括最需要强调的地理异质性)联系起来而不是压制差异的政治学，

这是 21 世纪城市化的最大挑战之一。

第十个神话是，城市化地区社会关系的任何彻底转变都必须等待某种政治革命(社群主义的、宗教的、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革命将把城市置于十分良好的秩序之中，从而使得那些新的和更适宜的社会关系能够繁荣发展。相反观点是，城市环境中的社会生态关系转型必须是一个持续的社会环境变迁过程。从社会主义视角来看，这意味着一个以城市为基础的漫长革命，这一革命应该把探索和建构替代性的社会过程和空间形式作为长期目标，尽管必须通过短期的和往往是地方为基础的运动和行动来实现它。

以当前的原始材料来建构一种理解城市化世界的必要诗学、一种文明的章程、一种我们物种的轨迹，这需要想象力、政治勇气、高涨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性变革(在思想以及政治方面)。我们需要向祖先学习许多东西，特别是向那些工作在 19 世纪后半叶的先人学习，因为他们的政治和知识勇气不容置疑。他们以某种方式动员自己的想象力，创造了自己的诗学来解决自己的问题，那种方式已经产生了实质性后果——既有好的也有坏的——他们工作的条件在今天要么被取代了，要么正受到消失的威胁。把像这样的生活环境传给下一代人，当下这种辞藻，哪怕只有微不足道的意义，我们也将之归功于上一代人对当前的投资，他们集体地和公开地寻找某种方式，以理解在当代条件实现一种公正和在生态上敏感的城市化过程的可能性。那种讨论不会相信从过去死灰复燃的梦想。它必须创造自己的语言——它自己的诗学——借此来讨论快速城市化的不平衡地理发展的世界之中的可能未来。只有以那种方式，才能思考和想象一种文明的城市化模式的可能性。然而，如何把社会过程中的这种纯粹话语要素转化成力量、物质实践、制度、信仰和社会关系的领域，这才是实际政治开始和话语反思终结的地方。

参考文献

- Abbey, E. (1975) *The monkey wrench gang*, New York.
- Adorno, T. (1973) *Negative dialectics*, New York.
- Agarwal, B. (1992) "The gender and environment debate: Lessons from India," *Feminist Studies*, 18, No. 1, 119–58.
- Agnew, J. and Duncan, J. (eds) (1989) *The power of place: Bringing together the geographical and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s*, Boston.
- Alexander, D. (1990) "Bioregionalism: Science or sensibility," *Environmental Ethics*, 12, 161–73.
- Anderlini, L. and Sabourian, H. (1992) "Some notes on the economics of barter, money and credit," in Humphrey, C. and Hugh-Jones, S. (eds) *Barter, exchange and value*, Cambridge.
-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 Attfield, R. (1991) *The ethic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Athens, Georgia.
- Aurelius, M. (1964) *Meditations*,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 Aveni, A. (1989) *Empires of time: Calendars, clocks, and cultures*, New York.
- Bachelard, G. (1964) *The poetics of space*, Boston, Mass.
- Bailey, C., Faupel, C., and Gundlach, J. (1993)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Alabama's Blackbelt," in Bullard, R. (ed.) *Confronting environmental racism*, Boston, Mass.
- Bakhtin, M. (1981)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Austin, Tex.
- Bakhtin, M. (1984) *Rabelais and his world*, Bloomington, Ind.
- Bakhtin, M. (1990) *Art and answerability*, Austin, Tex.
- Basso, K. (1984) "'Stalking with stories': Names, places, and moral narratives among the Western Apache," *1983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Washington, DC.
- Bateson, P. (1988) "The active role of behavior in evolution," in Ho. M.-W. and Fox, S. (eds) *Evolutionary processes and metaphors*, New York.
- Baudelaire, C. (1981) *Selected writings on art and artists*, London.
-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 Bell Hooks (1990) *Yearning: Race,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 Boston.
- Bell, D. (1976)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 Bell, J. (1989) "Six possible worlds of quantum mechanics," in Allen, S. (ed.) *Possible worlds in humanities, arts and sciences*, Berlin.

- Benedikt, M. (ed.) (1991) *Cyberspace: First steps*, Cambridge, Mass.
- Bennett, J. (1976) *The ecological transition: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human adaptation*, New York.
- Benton, T. (1989) "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 An ecological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 *New Left Review*, 178, 51–86.
- Benton, T. (1992) "Ecology, social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A reply to Reiner Grundmann," *New Left Review*, 194, 55–74.
- Benton, T. (1993) *Natural relations: Ecology, animal rights and social justice*, London.
- Berman, M. (1982)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New York.
- Berry, B. (1990) "Urbanization" in Turner, B. et al. (eds) *The earth as transformed by human action*, Cambridge.
- Bhaskar, R. (1989) *Reclaiming reality*, London.
- Bhaskar, R. (1993) *Dialectic: The pulse of freedom*, London.
- Birch, C. and Cobb, J. (1981) *The liberation of life: From the cell to the community*, Cambridge.
- Bird, J., Curtis, B., Putnam, T., Robertson, G., and Tickner, L. (eds) (1993) *Mapping futures: Local cultures global change*, London.
- Birringer, J. (1989) "Invisible cities/transcultural images," *Performing Arts Journal*, 12, 120–38.
- Black, M. (1962) *Models and metaphors*, Ithaca, NY.
- Blumberg, M. and Gottlieb, R. (1989) *War on waste: Can America win its battle with garbage*, Washington, DC.
- Blumin S. M. (1989) *The emergence of the middle class: Social experience in the American city, 1760–1900*, Cambridge.
- Bohm, D. (1983) *Wholeness and the implicate order*, London.
- Bohm, D. and Peat, F. (1987) *Science, order, and creativity*, London.
- Bookchin, M. (1990a) *Remaking society: Pathways to a green future*, Boston.
- Bookchin, M. (1990b)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ecology: Essays on dialectical naturalism*, Montreal.
- Booth, A. and Jacobs, H. (1990) "Ties that bind: Native American beliefs as a foundation for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Environmental Ethics*, 12, 27–43.
- Borneman, E. (ed.) (1976) *The psychoanalysis of money*, London.
-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London.
- Boyer, C. (1988) "The return of aesthetics to city planning," *Society*, 25, No. 4, 49–56.
- Bramwell, A. (1989) *Ec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history*, New Haven.
- Braudel, F. (1974)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New York.
- Brown, C. (1990) *Leibniz and Strawson: A new essay in descriptive metaphysics*, Munich.
- Brueggemann, W. (1977) *The land: Place as gift, promise, and challenge in biblical faith*, Philadelphia, Pa.
- Bryant, B. and Mohai, P. (1992) *Race and the incidence of environmental hazards*, Boulder, Col.
- Buell, L. (1995)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Cambridge, Mass.
- Bullard, R. (1990) *Dumping in Dixie: Race, class,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Colorado.
- Bullard, R. (ed.) (1993) *Confronting environmental racism: Voices from the grassroots*, Boston, Mass.

- Bullard R. (ed.) (1994) *Unequal protection: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communities of color*, San Francisco, Calif.
- Butzer, K. (1982) *Archaeology as human ecology*, Cambridge.
- Caffentzis, C. (1989) *Clipped coins, abused words, and civil government: John Locke's philosophy of money*, Brooklyn, NY.
- Callicott, J. (1989) *In defense of the land ethic: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Albany, NY.
- Callon, M. (1986)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ollops and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 in Law, J. (ed.) *Power, action and belief*, London.
- Cameron, D. (1992) *Feminism and linguistic theory*, 2nd edn, New York.
- Campbell, T. (1989) "Environmental dilemmas and the urban poor," in Leonard, H. J. (ed.) *Environment and the poor: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a common agenda*, New Brunswick, NJ.
- Capra, F. (1975) *The tao of physics*, Berkeley, Calif.
- Capra, F. (1982) *The turning point: Science, society and the rising culture*, New York.
- Carlson, D. (1992) "On the margins of microeconomics," in Cornell, D., Rosenfeld, M., and Carlson, D. (eds) *Deconstruc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justice*, New York.
- Carlstein, T., Parkes, D., and Thrift, N. (1978) *Timing space and spacing time*, London.
- Carter, E., Donald, J., and Squires, J. (eds) (1993) *Space and place: Theories of identity and location*, London.
- Cassirer, E. (1943) "Newton and Leibniz,"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52, 366–91.
- Cassirer, E. (1968) *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 Princeton, NJ.
- Castells, M. (1989) *The informational c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urban-regional process*, Oxford.
- Clark, J. (1989) "Marx's inorganic body," *Environmental Ethics*, 11, 243–58.
- Coase, R. (1960)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 1–44.
- Coles, R. (1993) "Ecotones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Adorno and Lopez," in Bennett, J. and Chaloupka, W. (eds),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Languag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Minneapolis, Minn.
- Collingwood, R. (1960) *The idea of nature*, Oxford.
- Colpotura, F. and Sen, R. (1994) "PUEBLO fights lead poisoning," in Bullard, R. (eds.) *Unequal protection*, San Francisco, Calif.
-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1995) *Our global neighborhood*, Oxford.
- Commoner, B. (1990) *Making peace with the planet*, New York.
- Cooke, P. (1989) *Localities*, London.
- Cooke, P. (1990) "Locality, structure and agency: A theoretical analysis," *Cultural Anthropology*, 5, 3–15.
- Cott, N. (1977) *The bonds of womanhood: "Women's sphere" in New England, 1780–1935*, New Haven, Conn.
- Cox, K. and Mair, A. (1989) "Levels of abstraction in locality studies," *Antipode*, 21, 121–32.
- Cronon, W. (1983) *Changes in the land: Indians, colonists, 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 New York.
- Cronon, W. (1991)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New York.
- Crosby, A. (1986)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Cambridge.

- Dauncey, G. (1988) *After the crash: The emergence of the rainbow economy*, Basingstoke.
- Davidson, O. G. (1991) "It's still 1911 in America's rural sweatshops," *Baltimore Sun*, Saturday, September 7, 1991, p. 7A.
- Davis, M. (1990) *City of quartz: Excavating the future in Los Angeles*, London.
- David, M. et al. (1990) *Fire in the hearth: The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in America*, London.
- Davison, G. (1993) *The unforgiving minute: How Australia learned to tell the time*, Oxford.
- Dawkins, R. (1989)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 De Certeau,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Calif.
- De-Shalit, A. (1995) *Why posterity matters: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nd future generations*, London.
- Deleuze, G. (1993) *The fold: Leibniz and the baroque*, London.
- Derrida, J. (1992a) "Force of law: 'The mystical foundation of authority'," in Cornell, D., Rosenfeld, M., and Carlson, D. (eds) *Deconstruc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justice*, New York.
- Derrida, J. (1992b) *Given time: 1. Counterfeit money*, Chicago, Ill.
- Derrida, J. (1994) *Specters of Marx*, London.
- Di Michele, L. (1993) "Autobiography and the 'Structure of Feeling' in *Border Country*," in Dworkin, D. and Roman, L. G. (eds) *Views beyond the border country*, London.
- Dickens, P. (1992) *Society and nature: Towards a green social theory*, London.
- Dobson, A. (1990) *Green political thought*, London.
- Douglas, A. (1977) *The feminiz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 Douglas, M. (1984)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 Dovey, K. (1989) "The quest for authenticity and the repl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meaning," in Seamon, D. and Mugerauer, R. (eds) *Dwelling, place and environment: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person and world*, New York.
- Duncan, J. and Ley, D. (1982) "Structural Marxism and human geography: A critical assessment," *Annals,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2, 30-59.
- Duncan, S. and Savage, M. (1989) "Space, scale and locality," *Antipode*, 21, 179-206.
- Durkheim, E. (1915)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London.
- Dworkin, D. and Roman, L. (eds) (1993) *Views beyond the border country: Raymond Williams and cultural politics*. London.
- Eagleton, T. (ed.) (1989) *Raymond Williams: Crit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 Eagleton, T. (1990)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Oxford.
- Eagleton, T. (1995) "Jacques Derrida; Specters of Marx," *Radical Philosophy*, 73, 35-7.
- Easterbrook, G. (1995) *A moment on the earth: The coming age of environmental optimism*, New York.
- Echeverria, J. and Eby, R. (eds) (1995) *Let the people judge: Wise use and the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movement*, Washington, DC.
- Eckersley, R. (1992) *Environment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 Toward an ecocentric approach*, London.
- Edsall, T. (1984) *The new politics of inequality*, New York.
- Elias, N. (1978) *The civilizing process: The history of manners*, Oxford.

- Eliot, G. (1972) *Felix Holt: The radical*,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 Ellen, R. (1982) *Environment, subsistence and system: The ecology of small-scale social formations*, Cambridge.
- Engels, F. (1935) *The housing question*, New York.
- Engels, F. (1940) *The dialectics of nature*, New York.
- Engels, F. (1947) *Anti-Dubring*, London.
- Engels, F. (1952)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Oxford.
- Enzensberger, H.-M. (1974)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logy," *New Left Review*, 84, 3-31.
- Epstein, R. (1985) *Takings: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power of eminent domain*, Cambridge, Mass.
- Etzioni, A. (1993) *The spirit of community: Rights,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communitarian agenda*, New York.
- Fabian, J. (1983)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constructs its object*, New York.
- Ferry, L. (1995) *The new ecological order*, Chicago, Ill.
- Fisher, S. (ed.) (1993) *Fighting back in Appalachia*, Philadelphia, Pa.
- Fitzgerald, F. (1986) *Cities on a hill: A journey through contemporary American cultures*, New York.
- Fitzgerald, J. (1979) *Alfred North Whitehead's early philosophy of space and time*, Washington, DC.
- Florini, K., Krumbharr, G., and Silbergeld, E. (1990) *Legacy of lead: America's continuing epidemic of childhood lead poisoning*, Washington, DC.
- Foltz, B. (1995) *Inhabiting the earth: Heidegger,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the metaphysics of nature*, Atlantic Highlands, NJ.
- Forman, F., with Sowton, C. (eds) (1989) *Taking our time: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emporality*, Oxford.
- Foster, J. B. (1994) *The vulnerable planet: 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New York.
- Foucault, M. (1980) *Power/knowledge*, Hemel Hempstead.
- Foucault, M. (1984) *The Foucault Reader* (edited by P. Rabinov),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 Foucault, M. (1986) "Heterotopias," *Diacritics*, Spring, 22-7.
- Fox, W. (1990) *Toward a transpersonal ecology: Developing new foundations for environmentalism*, Boston, Mass.
- Frantz, D. (1994) "How Tyson became the Chicken King," *New York Times*, Business Section, 1 and 6, Sunday August 28, 1994.
- Fraser, N. (1989) *Unruly practices: Power, discourse and gen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Minneapolis, Minn.
- Fried, M. (1963) "Grieving for a lost home," in Duhl, L. (ed.) *The urban condition*, New York.
- Friedan, B. (1963)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 Friedman, S. (1995) "Beyond white and other: Relationality and narratives of race in feminist discourse," *Signs*, 21, 1-49.
- Fuss, D. (1989) *Essentially speaking: Feminism, nature and difference*, London.
- Gans, H. (1962) *The urban villagers: Group and class in the life of Italian-Americans*, New York.

- Gates, H. (1992) "The welcome table: Remembering James Baldwin," paper delivered to *Wissenschaftliche Jahrestagung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Amerikastudien*, June.
- Gell, A. (1992) *The anthropology of time: Cultural constructions of temporal maps and images*, Oxford.
- Gerratana, V. (1973) "Marx and Darwin," *New Left Review*, 82, 60–82.
- Ghai, D. and Vivian, J. (eds) (1995) *Grassroots environmental action: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ondon.
- Gibbs, L. (1982) *Love Canal: My story*, Albany, NY.
- Gibson, W. (1984) *Neuromancer*, New York.
-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 Gilroy, P. (1987) *There ain't no black in the Union Jack*, London.
- Girardet, H. (1992) *The Gaia atlas of cities*, London.
- Glacken, C. (1967) *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Berkeley, Calif.
- Goldberg, D. (1991) *Racist culture: Philosophy and the politics of meaning*, Oxford.
- Goldsmith, E. (1992) *The way: An ecological world view*, London.
- Goodin, R. (1992) *Green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 Gordon, M. (1995) "My mother is speaking from the desert,"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rch 19, 1995, pp. 47–70.
- Gosselink, J., Odum, E., and Pope, R. (1974) *The value of the tidal marsh*, Baton Rouge, La.
- Gottlieb, R. (1988) *A life of its own: The politics and power of water*, New York.
- Gottlieb, R. (1993) *Forcing the Sp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Washington, DC.
- Goudie, A. (1986) *The human impact*, Oxford.
- Gould, S. (1988) *Time's arrow, time's cycle: Myth and metaphor in the discovery of geological time*,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 Granovetter, M.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481–510.
- Gregory, D. and Urry, J. (eds) (1985) *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 London.
- Greider, W. (1993) *Who will sell the people?* New York.
- Grossman, K. (1994) "The people of color environmental summit," in Bullard, R. (ed.) *Unequal protection*, San Francisco, Calif.
- Grosz, E. (1992) "Bodies-cities," in Colomina, B. (eds.) *Sexuality and space*, Princeton, NJ.
- Grundmann, R. (1991a) "The ecological challenge to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187, 103–20.
- Grundmann, R. (1991b) *Marxism and Ecology*, Oxford.
- Guha, R. (1989) *The unquiet woods: Ecological change and peasant resistance in the Himalayas*, Berkeley, Calif.
- Guillermé, A. (1988) *The age of water: The urban environment in the North of France, A.D. 300–1800*, College Station, Tex.
- Gupta, A. and Ferguson, J. (1992) "Beyond 'culture': space,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Cultural Anthropology*, 7, 6–43.
- Gurevich, A. (1985) *Categories of medieval culture*, London.
- Gutman, A. (ed.) (1994)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rinceton, NJ.
- Habermas, J. (1987)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Oxford.

- Haila, Y. and Levins, R. (1992) *Humanity and nature: Ecology, science and society*, London.
- Hajer, M. (1992) "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review: Choices in design" in Lykke, E. (ed.) *Achieving environmental goals: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review*, London.
- Hajer, M. (1995) *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policy process*, Oxford.
- Hall, E. (1966) *The hidden dimension*, New York.
- Hall, S. (1989) "Politics and letters," in Eagleton, T. (ed.) *Raymond Williams*, Cambridge.
- Hallowell, A. (1955) *Culture and experience*, Philadelphia, Pa.
- Haraway, D. (1989) *Primate visions: Gender, race and nature in the world of modern science*, New York.
- Haraway, D. (1990)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 in Nicholson, L. (ed.) *Feminism/Postmodernism*, London.
- Haraway, D. (1991)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 Hardin, G. (1968)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62, 1243–8.
- Hareven, T. (1982) *Family time and industrial time*, Cambridge.
- Hartsock, N. (1983) *Money, sex and power*, London.
- Hartsock, N. (1987) "Rethinking modernism: minority versus majority theories." *Cultural Critique*, 7, 187–206.
- Harvey, D. (1973)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London.
- Harvey, D. (1974)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the ideology of science," *Economic Geography*, 50, 256–77.
- Harvey, D. (1982)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 Harvey, D. (1985a)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xford.
- Harvey, D. (1985b)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Oxford.
- Harvey, D. (1989a)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 Harvey, D. (1989b) "From managerialism to entrepreneuri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in urban governance in late capitalism," *Geografiska Annaler*, 71B, 3–17.
- Harvey, D. (1989c) *The urban experience*, Baltimore, Md.
- Harvey, D. (1990) "Between space and time: Reflections on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Annals,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0, 418–34.
- Hayden, D. (1981) *The grand domestic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feminist designs for American homes, neighborhoods and cities*, Cambridge.
- Hays, S. (1959) *Conservation and the gospel of efficiency: The progressive conservation movement, 1890–1920*, Cambridge.
- Hays, S. (1987) *Beauty, health and permanence: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5–85*, Cambridge.
- Hayter, T. and Harvey, D. (eds) (1993) *The factory and the city: The story of the Cowley auto workers in Oxford*, Brighton.
- Hecht, S. and Cockburn, A. (1990) *The fate of the forest: Developers, destroyers and defenders of the Amazon*, New York.
- Heidegger, M. (1966) *Discourse on thinking*, New York.
- Heidegger, M. (1971)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New York.
- Heilbroner, R. (1974) *An inquiry into the human prospect*, New York.
- Heim, M. (1991) "The erotic ontology of cyberspace," in Benedikt, M. (ed.) *Cyberspace*, Cambridge, Mass.

- Helgerson, R. (1986) "The land speaks: Cartography, chorography and subversion in Renaissance England," *Representations*, 16, 51–85.
- Hewitt, P. (1974) *Conceptual physics: A new introduction to your environment*, Boston, Mass.
- Hiley, B. and Peat, F. (eds) (1987) *Quantum implications: Essays in honour of David Bohm*, London.
- Hillerman, T. (1993) *Sacred clowns*, New York.
- Hoffrichter, R. (ed.) (1993) *Toxic struggle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Philadelphia, Pa.
- Holquist, M. (1990) "Introduction" to Bakhtin M., *Art and answerability*, Austin, Tex.
- Horkheimer, M. (1947) *The eclipse of reason*, New York.
- Horkheimer, M. and Adorno, T. (1972) *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New York.
- Horvath, R. and Gibson, K. (1984) "Abstraction in Marx's method," *Antipode*, 16, 12–25.
- Howell, P. (1994) "The aspiration towards universality in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geography," *Geoforum*, 25, 413–27.
- Hugh-Jones, C. (1979) *From the Milk River: Spatial and temporal processes in Northwest Amazonia*, Cambridge.
- Humphrey, C. and Hugh-Jones, S. (1992) *Barter, exchange and value: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Cambridge.
- Ingold, T. (1986) *The appropriation of nature: Essays on human ecology and social relations*, Manchester.
- Ingold, T. (1993) "Globes and spheres: the topology of environmentalism," in Milton, K. (ed.) *Environmentalism: The view from anthropology*, London.
- Jacks, G. and Whyte, R. (1939) *Vanishing lands*, New York.
- Jameson, F. (1984)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46, 53–92.
- Jay, M. (1973)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50*, Boston, Mass.
- Jencks, C. (1993) *Heteropolis: Los Angeles, the riots and the strange beauty of hetero-architecture*, London.
- Johnson, C. (1974) *Utopian communism in France: Cabot and the Icarians*, Ithaca, NY.
- Joyce, P. (ed.) (1987) *The historical meanings of work*, Cambridge.
- Kaminer, W. (1995) "Feminism's third wave: What do young women want?"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June 4.
- Kapp, K. (1950) *The social costs of private enterprise*, New York.
- Keith, M. and Pile, S. (eds) (1993) *Place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London.
- Kern, S. (1983) *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1880–1918*, London.
- Knorrr-Cetina, K. (1994) "Primitive classification and postmodernity: towards a sociological notion of fiction,"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1, 1–22.
- Knox, P. (1994) "The stealthy tyranny of community spac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6, 170–3.
- Krauss, C. (1994) "Women of color in the front line," in Bullard, R. (ed.) *Unequal protection*, San Francisco, Calif.
- Kristeva, J. (1986) *The Kristeva reader* (edited by Toril Moi), Oxford.
- Kuhn, T. (1988) "Possible worlds in history of science," in Akken, S. (ed.) *Possible worlds in humanities, arts and sciences*, Berlin.

- Kwong, P. (1987) *The new Chinatown*, New York.
- Landes, D. (1983) *Revolution in time*, Cambridge, Mass.
- Leclerc, I. (1986) *The philosophy of nature*, Washington, DC.
- Lee, D. (1980) "On the Marxian 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Environmental Ethics*, 2, 1-21.
- Lee, K. (1989) *Social philosophy and ecological scarcity*, London.
- Leeds, A. (1994) *Cities, classes, and the social order*, Ithaca, NY.
- Lees, A. (1991) "Berlin and modern urbanity in German discourse, 1845-1945,"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17, 153-80.
- Lefebvre, H. (1974)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London.
- Lefebvre, 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 Leff, E. (1995) *Green production: Towards an environmental rationality*, New York.
- Le Goff, J. (1980) *Time, work and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 Chicago, Ill.
- Le Goff, J. (1988) *Medieval civilization*, Oxford.
- Leibniz, G. (1968) *Leibniz: Philosophical writings*, New York.
- Leibniz, G. (1991) *G. W. Leibniz's Monadology* (edited by N. Rescher), Pittsburgh, Pa.
- Leiss, W. (1974) *The domination of nature*, Boston, Mass.
- Leopold, A. (1968) *A Sand County almanac*, New York.
- Levi-Strauss, C. (1963)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 Levine, A. (1982) *Love Canal: Science, politics and people*, New York.
- Levins, R. and Lewontin, R. (1985) *The dialectical biologist*, Cambridge, Mass.
- Levins, R., Awerbuch, T., Brinkmann, U., Eckardt, L., Epstein, P., Makhoul, N., Albuquerque de Possas, C., Puccia, C., Spielman, A. and Wilson, M. (1994) "The emergence of new diseases," *American Scientist*, January, 52-60.
- Lewontin, R. (1982) "Organism and environment," in Plotkin, H. (ed.) *Learning,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hichester.
- Lewontin, R., Rose, S., and Kamin, L. (1984) *Not in our genes: Biology, ideology, and human nature*, New York.
- Lü, J. (1995) "Life in sweatshop reveals grim conspiracy of the poor," *New York Times*, March 12, p. A1.
- Lilburne, G. (1989) *A sense of place: A Christian theology of the land*, Nashville, Tenn.
- Litfin, K. (1994) *Ozone discourses: Science and politics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New York.
- Lockwood, M. (1989) *Mind, brain and the quantum: The compound "I"*, Oxford.
- Logan, J. and Molotch, H. (1988) *Urban fortun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Berkeley, Calif.
- Lomnitz-Adler, C. (1991) "Concepts for the study of regional culture," *American Ethnologist*, 18, 195-214.
- Losch, A. (1954) *The economics of location*, New Haven, Conn.
- Loukaki, A. (1967) "Whose *genius loci*, competing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acred Rock of the Athenian Acropolis'," *Annals,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forthcoming.
- Lovejoy, A. (1964)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Cambridge, Mass.
- Lovelock, J. (1992) "The earth is not fragile," in Cartledge, B. (ed.) *Monitoring the environment*, Oxford.
- Lowe, V. (1962) *Understanding Whitehead*, Baltimore, Md.
- MacCannell, D. (1976) *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 Maler, H. (1995) *Convoiter l'impossible: L'utopie avec Marx, malgré Marx*, Paris.
- Malthus, T. (1968)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 Malthus, T. (1970)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nd a summary view of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 Marin, L. (1984) *Utopics: Spatial play*, Atlantic Heights, NJ.
- Marsh, G. (1965) *Man and nature*, Cambridge, Mass.
- Martin, E. (1991) "The egg and the sperm: How science has constructed a romance based on stereotypical male-female roles," *Signs*, 16, 485-501.
- Martin, E. (1992) "The end of the body," *American Ethnologist*, 19, 121-40.
- Martin, E. (1994) *Flexible bodies: Tracking immunity in American culture - from the days of polio to the age of AIDS*, Boston, Mass.
- Martin, G. (1964) *Leibniz: Logic and metaphysics*, Manchester.
- Martinez-Allier, J. (1990) "Ecology and the poor: A neglected dimension of Latin American history,"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23, 621-39.
- Marx, K. (1963)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New York.
- Marx, K. (1964)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New York.
- Marx, K. (1967) *Capital* (three volumes), New York.
- Marx, K. (1972) "On the Jewish question," in McClellan, D. (ed.) *Early texts*, Oxford.
- Marx, K. (1973)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 Marx, K. and Engels, F. (1951) *Selected Works*, Volume 1, Moscow.
- Marx, K. and Engels, F. (1952)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Moscow.
- Marx, K. and Engels, F. (1965)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Moscow.
- Marx, K. and Engels, F. (1970) *The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
- Marx, K. and Engels, F. (1975) *Collected works*, Volume 5, New York.
- Massey, D. (1991) "The political place of locality studi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3, 267-81.
- Mauss, M. (1990) *The gift: The form and reasons for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London.
- May, R. (1992) "How many species inhabit the earth?" *Scientific American*, October, 18-24.
- McCarney, P. (1995) "Urban research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Four approaches to the environment of cities," in Stren, E. (ed.) *Urban research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Toronto.
- McCay, B. and Acheson, J. (1987) *The question of the commons: The culture and ecology of human resources*, Tucson, Ariz.
- McCluhan, M. (1966)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 McDougall, H. (1993) *Black Baltimore: A new theory of community*, Philadelphia, Pa.
- McEvoy, A. (1988) "Towards an interactive theory of nature and culture: Ecology, production and cognition in the California fishing industry," in Worster, D. (ed.) *The ends of the earth*, Cambridge.
- Meadows, D., Meadows, D., Rangers, J., and Behrens, W. (1972) *The limits to growth*, New York.
- Merchant, C. (1983) *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New York.
- Merrifield, A. (1993) "Place and space: a Lefebvrian reconcilia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ew Series 18, 516-31.
- Meszaros, I. (1970)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London.

- Meyer, R. (1952) *Leibnitz a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revolution*, Cambridge.
- Mignolo, W. (1994) *The darker side of the Renaissance: Literacy, territoriality and colonization*, Ann Arbor, Mich.
- Mitchell, T. (1991) *Colonizing Egypt*, Cambridge.
- Mitman, G. (1992) *The state of nature: Ecology, community,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1900–1950*, Chicago, Ill.
- Mohanty, C. (1991) "Cartographies of struggle: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in Mohanty, C., Russo, A., and Torres, L. (eds)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
- Moody, K. (1988) *An injury to one*, London.
- Moore, B. (1986) *Space, text and gender*, Cambridge.
- Morley, D. and Robins, K. (1993) "No place like *heimat*: Images of home(land)," in Carter, E., Donald, J., and Squires, J. (eds) *Space and place: Theories of identity and location*, London.
- Mungello, T. (1977) *Leibniz and Confucianism: The search for an accord*, Honolulu, HI.
- Munn, N. (1986) *The fame of Gawa*, Cambridge.
- Naess, A. (1989) *Ecology, community and lifestyle*, Cambridge.
- Nash, R. (1989) *The rights of nature: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Madison, NJ.
- Needham, J. (1954)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 Newman, O. (1972) *Defensible space: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urban design*, New York.
- Norberg-Schulz, C. (1980) *Genius loci: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architecture*, New York.
- Norgaard, R. (1985)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 evolutionary critique and a plea for pluralism,"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2, 382–94.
- O'Connor, J. (1988)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5, No. 1, 1–19.
- O'Riordan, T. (1981) *Environmentalism*, London.
- Ollman, B. (1976) *Alienation: 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 Cambridge.
- Ollman, B. (1990) "Putting dialectics to work: the process of abstraction in Marx's method," *Rethinking Marxism*, 3, No. 1, 26–74.
- Ollman, B. (1993) *Dialect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 Ophuls, W. (1977) *Ec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scarcity: A prologue to a political theory of the steady state*, San Francisco, Calif.
- Osserman, R. (1995) *Poetry of the universe: A mathema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cosmos*, New York.
- Ozouf, M. (1988) *Festival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 Pachlke, R. (1989) *Environmentalism and the future of progressive politics*. New Haven, Conn.
- Palmer, B. (1990) *Descent into discourse: The reifica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writing of social history*, Philadelphia, Pa.
- Parkes, D. and Thrift, N. (1980) *Times, spaces and places: A chronogeographic perspective*, New York.
- Parry, J. and Bloch, M. (eds) (1989) *Money and the morality of exchange*, Cambridge.
- Parsons, H. (ed.) (1977) *Marx and Engels on ecology*, Westport, Conn.
- Pearce, D., Markandya, A., and Barbier, E. (1989) *Blueprint for a green economy*, London.

- Peffer, R. (1990) *Marxism, morality, and social justice*, Princeton, NJ.
- Pepper, D. (1993)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London.
- Perelman, M. (1993) "Marxism and ecology: Marx and resource scarcity,"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4, 65–84.
- Phoenix, J. (1993) "Getting the lead out of the community," in Bullard, R. (ed.) *Unequal protection*, San Francisco, Calif.
- Plato (1965) *The Republic*,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 Platt, H. (1991) *The electric city: Energy and the growth of the Chicago area, 1880–1930*, Chicago, Ill.
- Plumwood, V. (1993) *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London.
- Portes, A., Castells, M., and Benton, L. (1989) *The informal economy: Studies in advanced capitalist and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Baltimore, Md.
- Pred, A. (1984) "Place as historically contingent process: structuration and the time-geography of becoming plac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4, 279–97.
- Pred, A. (1990) *Making histories and constructing human geographies: The local transformation of practice, power relations, and consciousness*, Boulder, Col.
- Probyn, E. (1990) "Travels in the postmodern: making sense of the local," in Nicholson, L. (ed.) *Feminism/postmodernism*, New York.
- Rajan, V. (ed.) (1993) *Rebuilding communities: Experiences and experiments in Europe*, Totnes, Devon.
- Rawls, J.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ss.
- Redclift, M. (198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ondon.
- Regan, T. (1983) *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Berkeley, Calif.
- Relph, E. (1976)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 Relph, E. (1989) "Geographical experiences and being-in-the-world: the phenomenological origins of geography," in Seamon, D. and Mugerauer, R. (eds) *Dwelling, place and environment: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person and world*, New York.
- Rescher, N. (1979) *Leibniz: An introduction to his philosophy*, Totowa, NJ.
- Rescher, N. (1981) *Leibniz's metaphysics of nature*, Dordrecht.
- Rich, B. (1993) *Mortgaging the earth: The World Bank, environmental impoverishment and the crisis of development*, Boston, Mass.
- Ricoeur, P. (1991) "Narrative identity," in Wood, D. (ed.) *On Paul Ricoeur: Narrative and interpretation*, London.
- Roberts, M. (1991) *Living in a man-made world: Gender assumptions in modern housing design*, New York.
- Roediger, D. and Foner, P. (1989) *Our own time: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bor and the working day*, London.
- Roman, L. (1993) "'On the ground' with antiracist pedagogy and Raymond Williams's unfinished project to articulate a socially transformative critical realism," in Dworkin and Roman (eds) *Views beyond the border country*, London.
- Ross, A. (1993) "The Chicago gangster theory of life," *Social Text*, 35, 93–112.
- Ross, K. (1988)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space: Rimbaud and the Paris commune*, Minneapolis, Minn.
- Rossi, A. (1982) *Architecture and the city*, Cambridge, Mass.
- Rousseau, J.-J. (1973)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 London.

- Russell, B. (1900) *A critical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Leibniz*, Cambridge.
- Sachs, I. (1988) "Vulnerability of giant cities and the life lottery" in Dogan, M. and Kasarda, J. (eds) *The metropolis era: Volume I, a world of giant cities*, Newbury Park, Calif.
- Sachs, W. (ed.) (1993) *Global ecology: A new arena of political conflict*, London.
- Sack, R. (1980) *Conceptions of space in social thought: A geographic perspective*, Minneapolis, Minn.
- Sagoff, M. (1988) *The economy of the earth: Philosophy, law, and the environment*, Cambridge.
- Said, E. (1978) *Orientalism*, New York.
- Said, E. (1989) (with Raymond Williams) "Appendix: media, margins and modernity," in Williams, R. *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 London.
- Sale, K. (1985) *Dwellers in the land: The bioregional vision*, San Francisco, Calif.
- Sale, K. (1990) "What Columbus discovered," *The Nation*, October 22, pp. 444–6.
- Sandel, M. (1982)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Cambridge.
- Sapir, E. (1949) *Selected writings of Edward Sapir on languag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Berkeley, Calif.
- Sauer, C. (1956) "The agency of man on earth," in Thomas, W. (ed.)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Chicago, Ill.
- Sayer, A. (1985) "The difference that space makes," in Gregory, D. and Urry, J. (eds) *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 London.
- Schivelbusch, W. (1978) "Railroad space and railroad time," *New German Critique*, 14, 31–40.
- Schmidt, A. (1971) *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 London.
- Schneider, K. (1993) "Plan for toxic dump pits Blacks against Black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3, p. A12.
- Schoenberger, E. (1996) *The cultural crisis of the corporation*, Oxford.
- Segal, L. (1991) "Whose left: Socialism, feminism and the future," *New Left Review*, 185, 81–91.
- Sennett, R. (1970) *The uses of disorder: Personal identity and city life*, New York.
- Shilling, C. (1993) *The body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 Shiva, V. (1989) *Staying alive: Women, ecology and development*, London.
- Shohat, E. (1991) "Imaging terra incognita: The disciplinary gaze of empire," *Public Culture*, 3, No. 2, 41–70.
- Sibley, D. (1995) *Geographies of exclusion*, London.
- Simmel, G. (1978)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London.
- Simmel, G. (1994) "Bridge and door,"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1, 5–10.
- Simon, K. (1981) *The ultimate resource*, Princeton, NJ.
- Smith, N. (1987) "Dangers of the empirical turn," *Antipode*, 19, 59–68.
- Smith, N. (1990) *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2nd edn, Oxford.
- Smith, N. (1992) "Geography, difference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 in Doherty, J., Graham, E., and Malek, M. (eds) *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 Smith, N. and Katz, C. (1993) "Grounding metaphor: Towards a spatialized politics," in Keith, M. and Pile, S. (eds), *Place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London.
- Snedeker, G. (1993) "Between humanism and social theory: The cultural criticism of Raymond Williams," *Rethinking Marxism*, 6, 104–13.

- Sommer, J. (1994) "A dragon let loose on the land: And Shanghai is at the epicenter of China's economic boom," *The Japan Times*, Wednesday October 26, p. 3.
- Soper, K. (1995) *What is nature?*, Oxford.
- Sorokin, P. (1937-41) *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four volumes), New York.
- Spain, D. (1992) *Gendered spaces*, Chapel Hill, NJ.
- Spender, D. (1980) *Man made language*, London.
- Spivak, G. C. (1988)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Nelson, C. and Grossberg, L.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Urbana, Ill.
- Spretnak, C. (1985) "The spiritual dimension of Green politics," in Spretnak, C. and Capra, F. (eds) *Green politics*, London.
- Spretnak, C. and Capra, F. (1985) *Green politics: The global promise*, London.
- Stafford, B. (1991) *Body criticism: Imaging the unseen in Enlightenment art and medicine*, Cambridge, Mass.
- Steiner, G. (1991) *Heidegger*, London.
- Stevens, W. (1993) "Want a room with a view? Idea may be in the gene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30, pp. C1 and C13.
- Stone, A. (1991) "Will the real body please stand up? Boundary stories about virtual cultures," in Benedikt, M. (ed.) *Cyberspace*, Cambridge, Mass.
- Stone, J. (1988) "Imperialism, colonialism and cartography," *Transactions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ew Series 13, 57-64.
- Strathern, M. (1988) *The gender of the gift*, Berkeley, Calif.
- Strawson, P. (1965) *Individuals*, London.
- Struck, D. (1991) "South's poultry plants thrive, feeding on workers' needs," *Baltimore Sun*, Sunday September 8, Section A, pp. 1 and 14.
- Swyngedouw, E. (1989) "The heart of the place: the resurrection of locality in an age of hyperspace," *Geografiska Annaler*, 71.
- Swyngedouw, E. (1992a) "Territori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pace/technology nexus," *Transactions,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ew Series, 17, 417-33.
- Swyngedouw, E. (1992b) "The Mamon quest: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new monetary order, the search for a new spatial scale," in Dunford, M. and Kafkalis, G. (eds) *Cities and regions in the new Europe*, London.
- Szasz, A. (1994) *Ecopopulism: Toxic waste and the movement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Minneapolis, Minn.
- Taylor, C. (1994) *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rinceton, NJ.
- Taylor, D. (1992) "Can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attract and maintain the support of minorities?" in Bryant, B. and Mohai, P. (eds) *Race and the incidence of environmental hazards*, Colorado.
- Taylor, D. (1993) "Environment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inclusion," in Bullard, R. (ed.) *Confronting environmental racism*, Boston, Mass.
- Taylor, W. (ed.) (1991) *Inventing Times Square: Commerce and culture at the crossroads of the world*, New York.
- Thomas, W. (ed.) (1956)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Chicago, Ill.
- Thompson, E. P. (1967) "Time, work 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56-97.
- Timpanaro, S. (1970) *On materialism*, London.
- Tindall, G. (1991) *Countries of the mind: The meaning of place to writers*, London.

- Todes, D. (1989) *Darwin without Malthus: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in Russian evolutionary thought*, Oxford.
- Toffler, A. (1970) *Future shock*, New York.
- Toffler, A. (1980) *The third wave*, New York.
- Toth, J. (1993) "Meanwhile, in the other South," *Business Week*, September 27, p. 48.
- Tuan, Y.-F. (1977)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Minn.
- Turner, B., Clark, W., Kates, R., Richards, J., Mathews, J., and Meyer, W. (eds) (1990) *The earth as transformed by human action: Global and regional changes in the biosphere over the past 300 years*, Cambridge.
- U.S. Government (1968) *Building the American City*,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urban problems to the Congress an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 Uchitelle, L. (1995) "For many, a slower climb up the payroll pecking order," *New York Times Sunday* May 14, p. F.11.
- Veblen, T. (1967) *Absentee ownership*, Boston, Mass.
- Volosinov, V. (1986)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mbridge, Mass.
- Walzer, M. (1983) *Spheres of justice: A defense of pluralism and equality*, Oxford.
- Weale, A. (1992) *The new politics of pollution*, Manchester.
- Weber, M. (1991)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edited by Girth, H. and Wright Mills, C., London.
- Wenz, P. (1988) *Environmental justice*, Albany, NY.
- Wheeler, T. (1994) "Bill may curb lead poisoning's deadly toll," *Baltimore Sun*, February 27.
- White, L. (1967)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 *Science*, 155, 1203-7.
- White, S. K. (1991) *Political theory and postmodernism*, Cambridge.
- Whitehead, A. (1916) "La théorie relationiste de l'espace,"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23, 423-54 [partially translated in Fitzgerald, J. (1979) *Alfred North Whitehead's early philosophy of space and time*, Washington, DC.
- Whitehead, A. (1920) *The concept of nature*, Cambridge.
- Whitehead, A. (1922) *The principle of relativity*, Cambridge.
- Whitehead, A. (1969) *Process and reality*, New York.
- Whitehead, A. (1985)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 Whorf, B. (1976)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 Cambridge, Mass.
- Widgery, D. (1991) *Some lives! A GP's East End*, London.
- Wigley, M. (1992) "Untitled: The housing of gender," in Colomina, B. (ed.) *Sexuality and space*, Princeton, NJ.
- Wilkins, M. H. F. (1987) "Complementarity and the union of opposites," in Hiley, B. and Peat, F. (eds) *Quantum implications*, London.
- Williams, R. (1960) *Border country*, London.
- Williams, R. (1961) "The achievement of Brecht," *Critical Quarterly*, 3, 153-62.
- Williams, R. (1964) *Second generation*, London.
- Williams, R. (1973)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London.
- Williams, R.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 Williams, R. (1978) "Problems of materialism," *New Left Review*, 109, 3-18.
- Williams, R. (1979a) *Politics and letters*, London.
- Williams, R. (1979b) *The fight for Manod*, London.

- Williams, R. (1980) *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London.
- Williams, R. (1983a) *Beyond 2000*, London.
- Williams, R. (1983b) *Keywords*, Oxford.
- Williams, R. (1985) *Loyalties*, London.
- Williams, R. (1989) *People of the Black Mountains: The beginning*, London.
- Williams, R. (1989a) *Resources of hope*, London.
- Williams, R. (1989b) *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 London.
- Williams, R. (1990) *People of the Black Mountains: The eggs of the eagle*, London.
- Wilson, A. (1992) *The culture of nature: North American landscape from Disney to the Exxon Valdez*, Oxford.
- Wilson, E. O. (1978) *On human nature*, Cambridge.
- Wilson, E. O. and Kellert, S. (1993) *The biophilia hypothesis*, Washington, DC.
- Wittfogel, K. (1953) *Oriental despotism*, New Haven.
- Wittgenstein, L. (1967)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Oxford.
- Wolf, E. (1982) *Europe and the peoples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Calif.
- Wolfe, S. (1994) "Comment" in Gutman, A. (ed.) *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rinceton, NJ.
- Wood, E. M. (1995) *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 Renew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mbridge.
-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The Brundtland Report), (1987) *Our common future*, Oxford.
- Worster, D. (1985a) *Rivers of empire: Water, aridity and 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West*, New York.
- Worster, D. (1985b) *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 Cambridge.
- Young, I. (1990a)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 Young, I. (1990b) "The ideal of commu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Nicholson, L. (ed.) *Feminism/Postmodernism*, New York.
- Young, R. (1985) *Darwin's metaphor: Nature's place in Victorian culture*, Cambridge.
- Zapatista Army for National Liberation (1996) "First declaration of La Realidad against Neoliberalism and for Humanity," *La Jornada*, January 30, 1996.
- Zelizer, V. (1994) *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 New York.
- Zerubavel, E. (1985) *Hidden rhythms: Schedules and calendars in social life*, Berkeley, Calif.
- Zimmerman, M. (1988) "Quantum theory, intrinsic value, and pantheism," *Environmental Ethics*, 10, 3-30.
- Zizek, S. (1993) *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 Durham, NC.
- Zola, E. (1891), *Money*, Gloucestershire.
- Zone (1989) *Fragments for a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Urzone, NY.

索引^①

我总是给我自己的书做索引，但在这种情况下，做索引显得特别困难，因为文本本身就已经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了。做索引必然通过参照固定的含意和术语来表现相关的论据流。因此它是一个非常不辩证的手段，对它进行索引的内容有点破坏性。我希望这并不是说索引是无用的。但它确实限制了敏锐的读者确实要运用它的适当性。

（注：只有其观点在文本中被实质性地引用或评价的人的名字才会被编入索引）

- abstraction 抽象, 14, 23—26, 33—34, 36—38, 42—44, 49, 53, 55, 57—62, 65, 110, 183, 216—217, 223, 270, 273, 276—277, 288, 389, 399, 429, 432—433
- adaptation 适应, 178, 185, 190—193, 332, 435
- Adorno, Theodor 西奥多·阿多诺 59, 134—136, 138
- agency 力量, 作用, 48, 53, 55, 75, 92, 96—113, 138, 170, 186, 192, 278, 288—290, 327, 363, 430—435
- Alberti 阿尔贝蒂, 227—228
- Alienation 异化, 21, 25, 60—62, 103, 126—127, 130, 135, 167, 181, 197—201, 270—272, 278, 302—304, 311, 313, 348, 395, 403—404, 419
- Althusser, Louis 路易·阿尔都塞, 46—47
- Anderson, Benedikt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100, 286, 310, 312, 321
- animal rights 动物权利, 341, 397
- anti-capitalism 反资本主义, 5, 23, 108, 178, 324, 332—333, 420, 423, 431—438
- Aurelius, Marcus 马库斯·奥里利乌斯, 10
- authenticity 真实, 本真性, 301—302, 309, 311, 315, 317, 319, 322, 355
- authoritarianism 独裁主义, 177, 180, 202, 330, 432, 435—436
- avant-gardism 先锋派, 433—437

① 这里的页码是原版书页码，即本书的边码。——译者注

- Bachelard, Gaston 加斯頓·巴什拉, 304
- Bacon, Francis 弗朗西斯·培根, 121, 137, 159
- Bakhtin, Mikhail 米哈伊尔·巴赫金, 267, 269—271, 275, 284, 294, 305
- Basso, Keith 基思·巴索, 265, 305
- Baumgarten, Alexander 亚历山大·鲍姆加登, 128—129
- beliefs 信仰, 信念, 2—3, 29, 79—83, 89, 95, 98—100, 121, 133, 138, 211, 221, 306, 316, 321, 323, 330, 372—373, 376, 399, 401
- Bell Hooks 贝尔·胡克斯, 102—104, 282—283
- Benton, Ted 特德·本顿, 139, 140, 146—147, 179, 183, 189, 193, 389, 398
- Bhaskar, Roy 罗伊·巴斯卡尔, 47, 57, 69, 75—76
- biocentrism 生物中心论, 118, 120, 136—137, 140, 386, 392
- biology 生物学, 132, 141—146, 190—193, 211, 274—278, 280—281
- bioregionalism 生物区域主义, 170—172, 184, 201—204, 303, 411—412, 427
- biotic community 生物群落, 168, 170—172, 353
- Birringer, Johannes 约翰尼斯·布林格, 243, 301
- body 身体, 51, 55, 72—73, 79, 86—87, 97, 102, 105, 211, 213, 217, 224, 227, 239, 248—250, 256—257, 261, 269, 274—281, 283, 288, 303—304
- Bohm, David 大卫·波姆, 47—48, 50, 52, 58—59, 73—74, 164
- Bookchin, Murray 穆利·布克金, 56, 180, 188, 313
- bounding 被束缚的, 53, 233, 264, 278, 292—294, 305, 309—312, 353—354, 425—426
- Bourdieu, Pierre 皮埃尔·布迪厄, 210, 212, 217, 275
- Bramwell, Anna 安娜·布拉姆威尔, 171—172
- Brecht, Bertolt 布托尔特·布莱希特, 28, 38, 43, 438
- Brundtland, Gro 格罗·布伦特兰, 148, 151, 182, 379
- Buell, Lawrence 劳伦斯·布耶尔, 301, 303
- built environment 人工环境, 119, 152, 200, 278, 418, 436
- Bullard, Robert 罗伯特·布拉德, 367, 387, 391, 395
- calendar 日历, 207, 212, 215, 240
- Callicott, J. Baird 贝尔德·克里考特, 123, 165—166
- Callon, Michel 迈克尔·卡隆, 192
- Cameron, D. 迪亚兹·卡梅隆, 85—87
- capital 资本, 49—50, 59, 62—8, 73, 92, 106, 113, 200, 262, 271, 290, 291, 314
- capital accumulation 资本积累, 92, 110, 131, 142—143, 145, 154, 179, 184, 187, 195—197, 203, 228, 238, 241—242, 286—290, 295—299, 302, 305—306, 313, 323, 325, 359—360, 363, 373—383, 378, 401, 414—416, 429
- capital circulation 资本循环, 63, 131, 196, 371
-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13, 23, 41—42, 57, 62—68, 93—94, 105, 110, 120, 126, 131—133, 145, 149, 150—157, 173, 190—197, 201—204, 224—226, 232—247, 272—274, 286—290, 295—299, 304, 312, 316, 318, 332—341, 348, 357, 369, 373—376, 394, 406—413, 430—438
- Capra, Fritjof 弗里乔夫·卡普拉, 47, 61, 164

- Cartesianism 笛卡儿哲学, 4, 47—48, 60—62, 64—66, 79, 123, 135, 153, 166, 224, 238, 240, 265, 267, 273—274
- cartography 制图法, 4—5, 239—240, 282—288, 290, 293
- Cassirer, Ernst 恩斯特·卡西尔, 121, 123, 127, 129, 260
- causality 因果性, 7, 49, 54, 60—62, 81—82, 85, 92—95, 97—98, 105, 190, 249, 320, 426
- chicken broiler industry 烤鸡业, 334—341
- chronotope 时间和空间, 时空体, 294, 305
- cities 城市, 49, 51—52, 55, 79, 87, 111, 117, 119, 155, 200, 208, 243, 268, 275, 277—279, 291, 295—299, 317, 326, 391—397, 403—437
- Clarke-Leibniz correspondence 克拉克—莱布尼茨书信集, 249—252
- class 阶级, 19, 29, 34—39, 40—43, 75, 79—81, 85, 98, 100, 103, 117, 122, 159, 171, 180, 225—226, 236, 255, 275, 282, 290, 292—293, 310, 312, 320, 371, 381, 393, 401, 431—433
- class relations 阶级关系, 21—23, 43, 127, 143—149, 185, 343—344, 358—359, 404—406, 410, 415, 420, 431—433
- class struggle 阶级斗争, 19—23, 30—32, 40—44, 57, 65, 106—109, 133, 138, 174—175, 239, 288—290, 336—341, 343, 399, 364, 424, 433—438
- cogredience (compossibility) 同步 (共存性), 254, 259—263, 285, 289—290
- collective memory 集体记忆, 309, 318, 322
- collectivity 集体性, 107, 122, 162, 192, 194, 310—313, 320, 330, 389, 417
- colonialism 殖民主义, 71, 89, 103, 124, 137, 223—224, 240, 255, 256, 266, 282—286, 289, 321, 417
- commodification 商品化, 138, 147, 179, 198—199, 300, 302, 318, 348, 390, 433
- commodities 商品, 50, 62—68, 94, 100, 103, 120, 150, 187, 196, 200, 203, 219, 223, 233—234, 266, 273, 303, 306, 314, 360, 363
- commonality 共同性 (参见 universality), 201, 433
- Commoner, Barry 巴里·考摩纳, 179, 195, 200, 368, 396
- communism 共产主义, 35, 39, 125—126
- communitarianism 社群主义, 125—126, 167, 169—172, 179, 184, 202—203, 222, 231, 303, 305, 311—313, 318—320, 349, 353—354, 397, 400, 424—426, 429, 436—437
- community 社区, 社群, 共同体, 21—22, 24—25, 29—32, 40—43, 101—104, 111, 125, 156—157, 161, 164, 172, 179, 202—203, 208, 217, 234—237, 243, 247, 262, 279, 282, 285—287, 292, 296—299, 310—313, 341, 344, 348, 354, 370, 390—391, 399, 404, 424—426, 436—437
- competition 竞争, 160—161, 190—193, 296—299, 332, 423, 436
- consciousness 意识, 19, 30, 49, 74, 85, 88, 93, 97, 118, 125—131, 158, 198, 200—202, 260, 281, 285
- conservation 保存, 176, 178, 181, 390
- consumption 消费, 62—68, 73, 94, 120, 139, 143, 183, 215, 219, 222, 245—246, 288, 298, 325, 400—401, 412, 422
- contradiction 矛盾, 34, 52—53, 58, 65—66, 92, 94, 105—107, 122—123, 130, 134, 174, 180, 185, 187, 241, 245, 268, 273, 316, 368, 394, 400, 411—412, 415, 419—420, 431

- cooperation 合作, 160—161, 190—193, 332, 435—436
- corporations 公司, 19—23, 30, 67, 177—178, 193, 195, 244, 375, 382—385, 388, 407, 414, 422, 434
- correspondence principle 和谐原理, 105—107, 279
- creative destruction 创造性破坏, 241, 245, 432
- critical theory 批判理论, 2—3, 133—139, 174—175
- Cronon 克罗农, 26—27, 184—185, 187, 203, 222—223, 232—233, 243—244, 264, 285
- cultural politics 文化政治学, 318—320, 325—326
- cultural studies 文化研究, 24, 28
- culture 文化, 24, 29, 34, 42, 44, 67, 79, 84—85, 108, 118, 122, 127—128, 147, 166, 173, 182, 187—189, 215—217, 219, 225, 236, 244, 246, 298—299, 305, 318, 322, 345, 349, 351—352, 375, 419
- cyberspace 赛伯空间, 12—14, 75, 208—209, 245—246, 279—280, 410
- Darwin, Charles 查尔斯·达尔文, 133, 160—161, 165—166, 190
- Dauncey, Guy 盖伊·多恩西, 237—238
- Davis, Mike 迈克·戴维斯, 286, 325
- de Certeau 德塞图, 261—262, 268
- deconstruction 解构, 1—3, 52, 56, 80, 87, 92, 94, 99, 326, 330, 342—345, 348, 406
- deep ecology 深度生态学(参见 Naess), 71, 89, 125, 128, 153—154, 167—169, 307, 391
- defensiblespace, see Newman, Oscar 可防御空间(见 Newman, Oscar)
- deindustrialization 非工业化, 20—22, 241, 296—298, 337, 404—407
- Deleuze, Gilles 吉尔斯·德鲁兹, 75, 104
- Democracy 民主, 171, 177—178, 180, 199, 202, 214, 222, 240, 426
- Derrida, Jacques 雅克·德里达, 7, 8, 12—13, 47, 71—72, 80, 92, 103, 222, 267, 289, 346—348, 356, 433—434
- Descartes, René 勒内·笛卡儿, 61, 70, 121, 123—124, 134, 136, 166, 220, 228, 248, 251, 266
- Desire 欲望, 2, 79—83, 86, 89, 95, 98—100, 102—103, 112, 118, 132, 136, 147, 150—151, 155—156, 163, 204, 274, 288, 306, 316, 319, 321, 322, 329
- Determination 决定, 规定, 92—95, 102—106, 109—111, 200, 268, 276
- devaluation 贬值, 63, 152, 217—218, 222, 296—299, 431
- dialectics 辩证法, 6—10, 12, 24—26, 29—31, 44, 46—68, 69—76, 78—84, 92—95, 105, 107, 110—113, 119, 131—132, 134, 136, 139, 145, 147, 149, 162, 164, 167, 189—193, 201—203, 214, 217—222, 250, 262, 269, 271—272, 277, 290, 294, 305, 307—308, 315, 327, 333, 355, 377, 407, 415, 426—427, 433—438
- difference 差异, 5, 9, 44, 67, 76, 91, 103, 109, 117, 172—175, 183—189, 201—202, 209, 264—274, 279, 284, 287, 290, 295, 311—313, 317—320, 325, 334, 348—353, 358, 360, 363—364, 390, 400—401, 406, 430, 433, 436—437
- disciplinary apparatus 规训机构, 224, 276, 284, 312
- discourse 话语, 8, 44, 56, 77—95, 100—103, 112—113, 118, 130, 137—138, 147, 150, 158, 166, 167, 169, 172—175, 183, 216—217, 221, 228,

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

- 231, 235, 245, 293, 306, 311—312, 321—322, 330—333, 342, 345, 359, 361, 367, 372—373, 376—383, 399, 408, 420, 436—438
- distribution 分配, 62—68, 73—75, 400—401, 412
- diversification 多样化, 161, 181, 190—193, 201—203, 268, 290
- division of labor 劳动分工, 88, 99, 105, 160—161, 211—212, 285, 295—296, 314, 422
- Dobson, Andrew 安德鲁·多布森, 119, 177, 180, 202
- domination of nature 支配自然, 对自然的统治, 121—139, 146, 149, 189, 193, 226, 320—321, 375, 201
- Douglas, Mary 玛丽·道格拉斯, 229, 387
- Dwelling 住所, 居, 214, 299—302, 307, 314
- Eagleton, Terry 特里·伊格尔顿, 8, 24, 128, 249, 276, 329
- Eckersley, Robin 罗宾·埃克尔斯里, 52, 133, 136, 204
- ecofeminism 生态女权主义, 133, 137, 180—181, 373
- ecological conditions 生态条件, 137, 195—199, 207, 231, 333, 383, 388, 403
-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生态现代化, 151, 174, 178, 372, 377—386, 390, 401, 429
- ecological movement 生态运动, 117—119, 121, 135—138, 157, 163, 174—183, 188—189, 195, 289, 302—304, 353, 420
-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s 生态转型, 185—189, 197—204
- ecology 生态学, 13, 22, 32, 40, 52—53, 59, 79, 118, 153, 180, 183—189, 200—204, 223, 265, 303, 308, 316, 341, 414, 426—429, 435—437
-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 376, 378—383, 436
- economics 经济学, 147, 151—157, 229—230, 367—368, 371—376, 393
- economy 经济, 机体, 52—3, 62—68, 166, 172
- ecosocialism 生态社会主义(参见 environmental justice), 193—204
- Elias, Norbert 诺伯特·埃利亚斯, 275—276
- Eliot, George 乔治·埃利奥特, 242
- emancipation 解放, 92, 109, 121—131, 138—139, 197—199, 269, 276, 325, 327, 329—333, 363, 390, 400—401, 420, 433—438
- embeddedness 嵌入, 25, 29, 34, 44—45, 54—57, 118, 211, 359
- Engels 恩格斯, 26, 57, 93, 160, 184, 193, 195, 197, 289, 331—332, 360—361, 343, 345, 408—409, 420—421
-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 121—131, 150, 239, 311, 329, 342, 348, 357
- environment 环境, 2, 5, 7, 11, 25—27, 43, 45, 46—47, 51, 53, 76, 78, 84, 89, 91, 110, 113, 117—204, 213, 261—264, 301, 313, 323, 326, 372, 420, 429—430
- environmental ethics 环境道德规范, 165—173, 179, 380, 397
- environmental history 环境历史, 252—257, 334, 392
- environmental issues 环境问题, 44, 119, 155—157, 178—82, 233, 263, 316, 367, 377, 381—383, 394—395, 426—429, 435—437
- environmental justice 环境正义, 11, 137, 155, 366—402, 427
-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环境管理, 181, 230, 373—376, 382, 427—429

- environmental politics 环境政治学, 117—119, 120, 180—183, 339, 427—429, 435—437
- environmental transformations 环境转变, 47, 59, 131, 137, 194—195, 229—230, 314, 332, 376, 400, 436—438
- environmentalism 环境保护主义, 180—183, 229—230, 353, 369—370
- epistemology 认识论, 47, 57—62, 69, 79, 193, 290, 358, 361, 434
- equality 平等, 5—6, 13, 199, 217, 240
- essentialism 本质主义, 193, 355—356
- esthetic 美学的, 118, 128—131, 135—136, 157, 178—179, 189, 198, 212, 227—228, 244, 247, 249, 276, 298, 301, 315, 380, 395, 406, 427
- ethics 道德准则, 165, 172, 214, 338, 347—348, 353, 370, 372
- ethnicity 种族划分, 108, 203, 246, 320, 345, 357, 404
- evolution 进化, 发展, 190, 275
- exchange 交流, 交换 50, 62—68, 73—75, 198, 234—238, 270, 298, 314—315, 325, 412
- exclusionary behavior 排他行为, 162, 209, 246, 291—293, 297, 315, 319, 323—324, 362, 405, 426—430
- experience 经验, 79, 92—94, 98—99, 103—105, 126, 128, 164, 199, 232, 248—249, 266, 269, 273, 282, 285, 300—304, 309, 313—314
- expert discourses 专家话语, 88, 375, 386—387
- exploitation 剥削, 37, 335—341, 349, 431
-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35, 134—135, 149, 171—172, 199, 202, 315, 397, 430
- feminism 女权运动, 7, 24, 32, 40, 85—86, 89, 97, 133, 137, 159, 187, 193, 282—283, 289, 290, 348, 358—362, 364
- Fernandez-Kelly, Patricia 帕特里夏·费尔南德斯-凯利, 293
- fetishism 拜物教, 7, 33, 90, 94, 100, 197, 209, 220—222, 232—233, 287, 304, 314, 435
- Feuerbach, Ludwig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109, 252
- finance 金融, 66, 148, 201, 241—245, 286, 296, 323, 407, 412, 415—416, 420—424
- Fitzgerald, Frances 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 318—320
- Fitzgerald, Janet 珍妮特·菲茨杰拉德, 256—257
- flows(theory of) 流(之理论), 7, 9, 26, 48—53, 73, 78, 166—169, 227, 256—260, 279, 286—290, 293, 303, 306, 310, 347—348, 352, 433, 435—438
- Forman, Frieda 弗里达·福尔曼, 226—227
- Foster, John Bellamy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180, 194—196
- Foucault, Miche 米歇尔·福柯, 46—47, 80, 83, 90, 95, 96, 102, 108—109, 123, 130, 225, 230, 263, 267, 276, 284, 312, 347—348, 406
- Frankfurt School 法兰克福学派, 133—139, 149
- Fraser, Nancy 南希·弗雷泽, 97, 348, 360
- Freud, Sigmund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136, 155, 312
- gender 性别, 2, 11, 24, 35, 40, 43, 79—81, 85—87, 97, 99, 102—104, 108, 124, 159—160, 171, 180, 203, 209, 212, 215—218, 220, 225—229, 233, 235—236, 255, 266, 275, 282, 290, 320—321, 337—338, 341, 344,

- 355, 357, 371, 387
- genius loci* 场所精神, 306—310
- geography 地理学, 59, 87, 108, 125, 127—128, 169, 214, 231—233, 239, 261, 263, 266, 270, 283, 335—341, 390, 400—401, 405, 421—424
- geopolitics 地缘政治学, 110, 161, 247, 262, 310
- Gibbs, Lois 洛伊丝·吉布斯, 369, 371, 378, 389
- Glacken, Clarence 克拉伦斯·格拉肯, 127, 139
-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1—2, 4, 12, 44, 52, 138, 186—190, 204, 237—238, 239, 246—247, 314, 320, 325, 353, 414, 420—424, 426, 428—429, 432, 436
- Goldberg, David 大卫·古德伯格, 279, 321
- Goldsmith, Edward 爱德华·戈德史密斯, 180, 188, 202
- Goodin, Robert 罗伯特·古丁, 154, 157, 170
- Gottlieb, Robert 罗伯特·哥特列波, 186, 392, 395
- governance 管理, 127, 184, 186, 296—299, 404
- Greider, William 威廉·格雷德, 371
- Grosz, Liz 莉斯·格罗希, 277—278
- Grundmann, Reiner 赖纳·格伦德曼, 126, 143—146, 176, 183, 189, 194, 196—197, 200
- Guha, Ramachandra 拉玛昌德拉·古哈, 187—189
- Gurevich, Aron 阿伦·古列维奇, 210, 212—215, 218, 220, 222, 227, 234, 239, 249, 254, 275, 277, 388
- Haberas, Jurgen 尤根·哈贝马斯, 138, 234, 254, 302, 353—354
- Haila, Yrjo 约里奥·海拉, 179—180, 187, 203
- Hajer, Maarten 马坦·海耶尔, 178, 377
- Hamlet, North Carolina 北卡罗来纳, 哈姆雷特, 334—341, 344—345, 349—350, 358, 361, 364
- Haraway, Donna 唐纳·哈拉维, 65, 136, 159, 193, 267, 272, 276—277, 281, 284—285, 289, 290, 355, 358
- Hardi, Garrett 加勒特·哈地, 177, 254
- Hartsock, Nancy 南希·哈索克, 272, 355—356, 360
- Hausmann, Baron George 乔治·欧斯曼男爵, 230—231
- Hayden, Dolores 多罗丝·海顿, 229, 321
- Hayter, Teresa 特里萨·海特, 19—23, 38, 41—42
- hazardous wastes 有害垃圾, 199, 201, 366—369, 400—401
- health 健康, 118, 316—318, 376, 380, 390—396, 400, 427
- Hegel, G. W. F. 黑格尔, 7, 47—49, 54, 56—57, 72, 109, 136, 149, 256, 269, 273, 355
- hegemony 霸权, 80, 102—103
- Heidegger, Martin 马丁·海德格尔, 7, 47, 85, 98, 134, 168—169, 199, 202, 214, 234, 268—269, 299—302, 306—307, 311—316, 326
- Heim, Michael 迈克尔·海姆, 75, 279
- Heine, Heinrich 亨利希·海涅, 242, 244
- Heraclitus 赫拉克利特, 48, 61, 76
- heterogeneity 异质性, 52, 58, 66, 77, 81, 88—91, 106, 172, 174, 191, 201—202, 218, 233—234, 246, 286, 294, 347, 426, 436—437
- heterotopia 异托邦, 45—46, 230, 263
- Hillerman, Tony 托尼·席勒曼, 329—330
- historical geography 历史地理学, 8, 98,

- 105, 119, 183—189, 192—193, 196, 207—209, 238—242, 294—299, 313, 321, 325, 329—330, 332—333, 351—352, 354, 364, 403—416, 429, 432
-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历史唯物主义, 26, 46, 64—68, 75, 86, 92, 105—113, 136, 139, 189, 193—204, 231—234
- historical-geographical materialism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5—6, 8—9, 14, 27—28, 46, 69, 88, 105—113, 146, 183—189, 201—204, 209, 231—234, 280, 290, 361, 418, 429—430, 432—438
- homogeneity 同质性, 273, 280, 284, 298, 433, 436
- Horkheimer, Max 马克思·霍克海默, 134—135
- Hugh-Jones, Christine 克里斯廷·休-琼斯, 210, 212, 217
- human nature 人性(人的本质), 123, 129—130, 135—137, 138, 165—169, 436—437
- humanization of nature 自然的人化, 121, 125, 146
- Hume, David 大卫·休谟, 51, 123, 124, 165, 166
- idealism 理想主义, 唯心主义, 8, 45, 69, 75—76, 80, 250—253, 256—259, 312, 323, 433
- identity 同一性, 身份, 7, 11, 13, 31, 33, 40—41, 56, 91, 102—103, 108, 170—172, 189, 209, 213, 219, 227—229, 244, 246—248, 264—275, 281, 284, 287—288, 300, 304, 306—310, 313, 315, 317, 320, 322, 326, 330, 334, 356—357, 363—364, 417
- imaginary 想象的, 12, 26, 46, 79, 94, 100, 103, 105, 122, 130—131, 156, 163—164, 174, 200, 213, 284—285, 288, 290, 294, 304—305, 306, 309, 322—324, 326, 327, 354, 359, 372, 408, 420, 435—438
- imagined communities 想象的共同体, 171, 310, 321, 324, 352
-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178, 223—224, 284—285, 381, 417
- individual 个别的, 51, 60—62, 70—72, 75, 79, 112, 167—168, 219—220, 223—224, 239, 286, 315, 322, 372
-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 9, 122, 156, 160, 170, 177, 219, 239, 287, 320
- individuation 个性化, 72—73, 238—239, 257—260, 264—274
- Ingold, Tim 提姆·英格尔德, 37, 158, 161—162, 183, 198
- institutions 机构, 制度, 25, 79—80, 82, 85, 100, 105, 112, 130—131, 138, 147, 155, 166—167, 174, 178, 184, 186, 196, 204, 212, 221, 224, 231, 235, 262, 276, 284—285, 293—294, 306, 310, 314, 317, 321, 330, 348, 359, 372—373, 376, 380, 399, 400, 408, 418, 433
-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工具理性, 118, 121, 124, 135, 138, 155, 167, 199
- internal relations 内部关系, 52—53, 74—75, 80—83, 92—95, 96, 122, 134, 136, 138—139, 167, 219—222, 250—253, 257, 269, 271—272
- internalization 内在化, 38, 52—68, 73—75, 88—91, 92, 105, 164, 190, 208, 212—213, 221—222, 227, 234, 236, 254, 275—276, 278, 286, 294, 308, 355
- intrinsic values 内在价值(参见 values in nature)
- Jacks, Gordon 戈登·杰克斯, 181—182
- Jay, Martin 马丁·杰, 133—134
- justice 正义(参见 environmental justice, social justice), 11, 78, 84, 108, 202, 329—333, 341—365

- justice of the market 市场的正义, 342—345
- Kant, Immanuel 伊曼纽尔·康德, 249, 267, 270, 272
- Kern, Stephen 斯蒂芬·科恩, 244, 246, 317
- Knorr-Cetina, Karin 卡林·诺尔-塞蒂纳, 109
- knowledge system 知识系统, 7, 8, 23, 27—28, 34, 37, 43, 55—62, 81, 84—85, 97, 125, 163—164, 181—182, 195—196, 198—199, 206, 211, 228, 231, 239, 281—282, 284—285, 303, 354—358, 385
- Krauss, Celene 塞莱涅·克劳斯, 387
- Kristeva, Julia 朱莉亚·克里斯蒂娃, 86, 97, 226—227, 312
- labor 劳动, 23, 65, 105—106, 120, 131, 142, 220, 225—226, 231, 238, 241, 271, 287—289, 295—296, 299, 312, 334—431, 423, 432
- Landes, David 大卫·兰德斯, 239—240
- landscape 景观, 79, 87, 118, 128—130, 178, 186, 189, 241, 264—265, 305, 417
- language 语言, 14, 33, 51—52, 69, 78, 82, 83—88, 94, 97—98, 102, 113, 118, 140, 146, 151, 156, 164, 166, 172—175, 189, 190, 208, 211, 216, 221, 274, 275, 285, 315, 320, 330—331, 418, 436—438
- Le Goff, Jacques 雅克·勒高夫, 210, 239—240
- lead paint poisoning 铅涂料中毒, 370, 386, 392—394
- Leeds, Tony 托尼·利兹, 62
- Lefebvre, Henri 亨利·列斐伏尔, 53, 87, 234, 241, 266, 268, 272—274, 276, 284, 299, 323
- Leibniz, G. W. 莱布尼茨, 4, 47, 69—76, 123, 128, 249—56, 259—261, 270—274, 279, 281, 284, 332
- Leibnizian conceit 莱布尼茨的奇想, 69—76, 80, 103—104, 122, 129, 136, 167—169, 213, 279—280, 308, 356
- Leiss, William 威廉·莱斯, 121, 132—134, 189
- Leopold, Aldo 奥尔多·利奥波德, 120, 125, 157, 165—166, 171, 372
- LETSystem, 237—238
- Levins, Richard 理查德·莱文斯, 51—52, 54—55, 58, 60—61, 179—180, 187, 203, 362
- Lewontin, Richard 理查德·莱温廷, 51—52, 54—55, 58, 60—61, 66, 185, 192, 362
- Libertarianism 自由意志论, 383—385, 397—398, 435
- Lilburne, George 乔治·李尔本, 303, 325
- literary theory 文学理论, 6, 46—47, 57—58, 76, 78, 82, 96, 112—113, 210, 245, 267—274, 285, 289
- locality 地点, 23, 32—34, 37, 202—204, 208, 216, 237—238, 246, 285, 320—321, 326, 345, 350—354
- location 位置, 72—73, 101, 103—104, 208, 257, 268, 281, 282—283, 294
- Locke, John 约翰·洛克, 51, 123—124, 131, 153, 220, 383
- Losch, August 奥古斯特·勒施, 56, 58
- Loukaki, Argyro, 309
- Lovejoy, Arthur 阿瑟·诺夫乔伊, 117, 158, 174
- Lovelock, James 詹姆斯·洛夫洛克, 89, 148
- Luther Standing Bear 路德立熊, 188—189
- Malthus, Thomas 托马斯·马尔萨斯,

- 127, 139—149, 160, 177, 193
- managerialism** 管理主义 (参见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120, 176, 178, 195
- maps** 地图, 4—5, 46, 78, 111—112, 239—240, 264, 282—286, 289, 321
- marginality** 边缘性, 92, 100—104, 208, 230, 282—283, 348—349, 386—389, 407, 424, 426, 433—436
- market failure** 市场失灵, 154, 229—231, 374—375
- market system** 市场体制, 13, 79, 89, 124, 126, 128, 150—157, 160, 168, 195, 229, 234, 235—237, 300, 302, 314—315, 325, 332, 339, 343—346, 349, 360, 368, 388, 400—401, 436
- Marsh, George Perkins** 乔治·珀金斯·马什, 119, 183—184
- Martin, Emily** 艾米利·马丁, 159—160, 163, 281
- Marx** 马克思, 7, 9, 13—14, 26, 47—49, 56—58, 61, 62—68, 72—76, 90, 92—95, 96, 98, 105—109, 113, 120—121, 125—127, 130, 136, 139—140, 143—147, 151, 155—157, 160, 168, 184, 189—204, 220—221, 225—226, 232—236, 249—250, 266, 269—271, 276—277, 283, 289, 300, 313—316, 326, 331—333, 336—337, 339, 345, 355, 381, 399, 407, 418, 420—401, 431—432
-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3, 6, 9, 11, 13—14, 21, 42, 47—49, 69, 73—75, 133—139, 146, 157, 183, 193—204, 266, 290, 346, 432—438
- masculinity** 男性, 136—137
- material practices** 物质实践, 79, 83—85, 91—94, 103, 105, 112, 138, 147, 164, 183, 204, 221—222, 231, 233, 238, 276, 284, 294, 306, 313, 330, 354, 359, 372—373
- materialism** 唯物主义, 26, 45, 56—57, 61—68, 207, 211, 218, 252, 260
- materiality** 物质性, 26, 48, 80—81, 130, 207, 224, 252—253, 322—327, 375
- Mauss, Marcel** 马塞尔·莫斯, 220—222
- memory** 记忆, 216, 221, 231, 234, 249, 304—309, 314, 318, 322—323, 417
- Merchant, Caroline** 卡罗琳·麦茵特, 121, 159
- Metabolism** 新陈代谢, 51—53, 145—146, 410—411, 427
- metaphors** 比喻, 5, 9, 45—46, 89, 102—103, 109, 132, 159—164, 207—209, 274—275, 279, 281, 289, 325, 327, 373, 418
- metaphysics** 形而上学, 2—3, 5, 14, 69—70, 75, 89, 158, 208, 224, 250, 254, 260, 267, 279
- Meyer, Rudolph** 鲁道夫·迈耶, 70—71
- migrants** 移民, 262, 415—416
- militant particularism** 战斗的特殊主义, 32—45, 101, 109, 172, 209, 285, 304, 306, 312, 324, 351, 354, 370—371, 390—391, 399, 420, 430
- Mitchell, Tim** 提姆·米切尔, 224
- mode of production** 生产方式, 147, 408, 410, 414
- modernism** 现代主义, 224, 233, 243, 253, 259, 279, 315, 342, 418—419
- modernity** 现代性, 178, 301—302, 305, 381—382, 407, 427
- Mohanty, Chandra** 钱德拉·莫拉蒂, 282, 285
- moment** 因素, 环节, 55—58, 63—68, 73—75, 78—83, 139, 164, 174, 294—295, 372, 438
- monad** 单子, 69—70, 73, 75, 80, 167, 228, 251—255, 274, 279, 283, 356
- money** 货币, 金钱, 11, 31, 49—50, 62—68, 94, 120, 130—131, 150—157,

- 163, 168, 187, 196, 198, 220—222, 232—242, 260, 262, 271, 286—290, 298, 303, 306, 313, 317, 319, 360, 362, 378, 388, 392, 422—423
- monumentality 纪念碑性, 112, 226, 302, 309—310, 325
- moral community 道德共同体, 169—172, 305
- morality 道德, 13, 39, 81, 93, 101, 108, 151, 156, 158, 165, 173, 179, 305, 311—315, 322, 338, 371, 387—391, 400
- multiculturalism 多元文化主义, 334, 341
- multinationals 跨国公司, 297, 323, 370, 414—415
- Munn, Nancy 南希·穆恩, 210, 212, 215—222, 232—233, 238, 249, 277, 286
- Naess, Arne 阿恩·奈斯, 47, 52, 71, 153—154, 167—169, 220, 277
- naming 命名, 216, 221, 264
- nation 国家, 民族, 11, 38, 98—100, 111, 157, 161, 170—172, 179, 208—209, 246, 282, 286, 295, 315, 325—326, 372, 433
- natural law 自然法, 142, 145—147, 149, 159—163, 166, 176, 182, 190—192
- natural limits 自然极限, 139—149, 146—147, 381
- nature 自然, 2, 7, 9, 12, 14, 39, 46—47, 54—55, 71, 76, 78, 84, 89, 91, 117—204, 213, 271, 275, 298, 301, 303, 329—333, 372, 377, 386, 389, 390, 427—428, 434—437
- needs 需要, 118, 122, 124, 130, 136, 143, 145, 298, 319, 370, 391
- Newman, Oscar 奥斯卡·纽曼, 292—293, 408
- Newton, Isaac 艾萨克·牛顿, 4, 49, 70, 123, 135, 153—154, 220, 238, 249, 252, 256—257, 260
- Norberg Schulz, Christian 克里斯汀·诺伯·舒尔兹, 306—309, 313
- novels(fiction) 小说, 24—45, 46, 87, 207, 251, 253, 255, 302, 325
- object of enquiry 研究对象, 425—426
- objectification 客观化, 231, 266, 281
- objectivity 客观性, 211—212, 277, 284—285
-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职业安全与保健, 179, 338, 340, 374
- Ollman, Bertell 伯特尔·奥尔曼, 48, 50, 52, 54, 58, 62, 69, 72—73, 75, 174, 271—272
- ontology 本体论, 47—48, 57—59, 60—62, 69, 79, 99, 108, 155, 157, 193, 250, 271, 272
- organicism 社会有机论, 25, 47, 63
- organism, philosophy of 有机论哲学, 25, 47, 63, 123, 167, 256—260
- otherness 他性, 71, 100—104, 109, 135, 167, 172, 182, 202—203, 209, 213, 216, 233, 261, 264, 269—271, 277, 295, 311—312, 315, 320, 322—324, 324, 326, 334, 345, 347, 354—355, 360, 362—363, 399, 436
- overaccumulation 过度积累, 106, 241—242, 295—299
- overpopulation 人口过剩, 141—149
- Palmer, Bryan 布赖恩·帕默, 85—87
- particularity 特殊性, 9, 170, 201—202, 272, 281, 287, 324, 333, 350—352, 362, 431—438
- parts and wholes 部分与整体, 52—54, 60—62, 153
- passions 激情, 2, 131—133, 155—156
- peasant 农民, 124, 128, 186—188, 235,

- 389, 415
- Perelman, Michael 迈克尔·佩罗曼, 140, 146
- permanences 永恒性, 永恒, 8, 10, 50, 55, 74, 78, 81—82, 99, 105, 108, 260—262, 278, 294, 296, 305—306, 310, 312, 322, 330, 347, 352—353, 359, 418—419
- place 地方, 位置, 2, 5, 11, 12, 14, 25—27, 29—34, 43, 45, 46—47, 76, 78, 84, 91, 102—104, 110, 112—113, 161, 169—170, 179, 202, 208—209, 227, 230, 234—235, 243, 246—247, 257, 261—265, 270, 284—285, 291—327, 329—333, 350—352, 361, 363, 371, 390—391, 399, 412, 415, 420, 426, 429—430, 436—438
- planetary health 行星健康, 195, 204
-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 14, 62—68, 73—75, 94, 121, 124—126, 130—133, 150, 182, 209, 235—237, 244, 281, 317, 322, 325, 348, 373, 404, 419
- political power 政治权力, 156, 177—180, 212, 220—222, 235, 316, 320—327, 437
- political struggle 政治斗争, 201, 265, 433—437
- politics 政治学, 政治, 19—45, 46, 70—71, 75, 77, 79, 89, 92, 107, 120, 122, 172—173, 176—182, 255, 282—290, 321—327, 332, 362—365, 400—401, 406—409, 411, 430—437
- pollution 污染, 22, 117, 195, 366, 368, 378, 392, 403, 410, 428
- population 人口, 141—149
- positionality 位置性, 2, 70, 77, 100—104, 109, 111, 113, 118, 173, 177, 208, 214, 250—251, 254—255, 270, 272, 274, 281—285, 288, 331, 354—359, 361, 363, 387, 428
- positivism 实证主义, 3, 6, 9, 47, 49, 65, 135
- possibility 可能性, 12—15, 23, 25, 28—29, 44, 46, 56—57, 67, 103—105, 110—113, 130, 145, 192, 201, 251—255, 290, 309, 410, 414—417, 420, 429—427, 433—437
- possible worlds 可能的世界, 251—255, 259—260, 290, 332
- 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 1—2, 9, 14, 104, 182, 225, 245, 253, 285, 289, 298, 315, 326, 341—346, 348—349, 354, 357, 361—362, 418—419, 427, 433
- poststructuralism 后结构主义, 1, 8—9, 14, 347—348, 361—362, 433
- Powell, John Wesley 约翰·卫斯里·鲍威尔, 184—185
- power 权力, 11, 56—57, 77, 78, 80, 82—83, 95, 97, 103, 112—113, 126, 130—131, 151, 164, 168, 221—222, 228, 235—236, 239, 265—266, 285, 293—294, 306, 376
- power relations 权力关系, 89, 100, 112, 173—175, 186—187, 193, 196, 204, 220, 222, 231, 249, 270, 297, 282—284, 313, 329—333, 354—355, 356—357, 372—373, 376, 377, 382—384, 418, 435
- prehensive unification, 258—260, 262—264, 268
- private property 私有财产, 144, 153, 156—157, 197—198, 238—239, 339, 374—375, 382—385, 390, 398
- process philosophy 过程哲学, 7, 25, 47—68, 105, 139, 256—260, 307—308, 421—423, 435—437
- processes 过程, 25, 84, 278, 347—348, 352—353, 359, 418, 435—437
- production 生产, 产品, 19—21, 50, 62—68, 73—75, 82, 94, 120—121, 125, 144, 146, 179—180, 231, 239,

- 241, 245—246, 296, 300, 314, 324,
400—401, 412, 422
- production of difference 差异的生产(参
见 difference), 183—189
- production of nature 自然的生产(参见
nature), 127, 184—189, 190—193, 436
- property rights 财产权, 154, 161, 184,
223, 299, 343, 372
-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 77, 98—100,
136, 321
- quantum theory 量子论, 11, 50, 52, 58,
89, 166
- race 种族, 2—3, 79—81, 89—90, 102—
104, 108, 117, 124, 127, 159, 171,
180, 190, 209, 275, 279, 290, 293,
320—321, 337—338, 341, 344, 356—
357, 368, 371, 387, 392, 404, 430
- rationality 合理性, 2, 61, 98, 123,
134—135, 149, 177—178, 233, 239,
302, 375, 380—382, 389, 400, 407
- Rawls, John 约翰·罗尔斯, 397—398
- reason 理性, 70, 122—131, 135, 250
- reductionism 还原论, 25, 51—54, 58—
59, 87, 100, 166, 262
- relational theory 关系理论, 相关理论 4,
6—7, 10, 12, 73, 145, 147, 167, 190—
191, 198—199, 208, 220, 227, 255—
261, 264, 271—272, 290, 293, 302,
333
- relations 关系, 7, 25, 49, 50, 63—68,
214—215, 218—222, 263, 284
- relativism 相对论, 相对主义, 3, 84,
127, 331, 354, 355
- relativity 相对性, 249—250, 251
- religion 宗教, 2—6, 10, 12, 70, 79, 89,
92, 94, 108, 122, 156—158, 198, 209,
213—214, 225, 239, 246, 252—253,
306, 319—320, 322, 345, 372, 419
- Relph, Ted 特德·瑞夫, 301—302, 314
- representation 代表, 表现, 2, 5, 14,
37, 52, 78, 83, 152, 158—159, 189,
212, 228, 240, 244, 247, 275, 279,
284, 316, 318, 321—323, 325
- Rescher, Nicholas 尼古拉斯·雷斯切,
251—253
- residual 残余, 96, 106, 109
- resistance 抵抗, 7, 97, 102—104, 110,
138—139, 168, 224, 228, 265, 287—
290, 298—299, 306, 320, 324, 348,
368, 370—371, 389—390, 404
- resources 资源, 117—118, 124, 138,
141—150, 154—156, 161—162, 174,
177, 182, 219, 229, 295, 297, 374—
375, 377, 381, 385, 390, 412, 417
- revolt of nature 自然的反叛, 134—137
- Ricoeur, Paul 保罗·利科, 47, 356
- risk 风险, 146, 153—154, 377—380,
380—381
- Roberts, Marion 马里恩·罗伯茨, 229
- Roman, Leslie 莱斯利·罗曼, 24
- romanticism 浪漫主义, 157, 187
- Ross, Kirsten 克里斯汀·罗丝, 109,
165, 210, 231
- Rossi, Aldo 阿尔多·罗西, 308—309,
322
- Rousseau, Jean-Jacques 让-雅克·卢梭,
124, 127—129, 162—163
- Sachs, Wolfgang 沃尔夫冈·萨斯, 383,
390
- Said, Edward 爱德华·萨义德, 24,
265, 326
- Saint-Simon, Count 圣西门, 131, 133
- Sale, Kirkpatrick 柯克帕特里克·塞尔,
202, 302, 306, 311—313
- Sayer, Andrew 安德鲁·塞耶尔, 109,
252
- scale 规模, 标准, 41, 51—52, 53,
203—204, 218, 303, 352—354, 359,
362—363, 379, 396, 428—429

- scarcity 短缺, 稀缺, 125, 131, 144—150
- Schivelbusch, Wolfgang 沃尔夫冈·施伊费尔布什, 242
- Schoenberger, Erica 埃瑞克·施恩伯格, 244
- science 科学, 10, 59, 60—62, 70, 79, 88—89, 93, 118, 122—124, 126, 130, 134, 146, 157—169, 177—178, 181—182, 190, 196—198, 250, 257, 276, 281, 283, 285, 289—290, 373—374, 378, 384, 386, 411
- Segal, Lynn 林恩·西格尔, 359—361
- self 自我, 71, 213, 216—218, 219—222, 246, 248—249, 264, 266, 268—271, 284, 286, 290, 304, 315, 364
- self-other relation 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71, 216—218, 220, 266, 268—271
- self-realization 自我实现, 122—131, 136, 139, 167—169, 197—198, 201, 214, 307, 329, 436
- semiotics 符号学, 97, 110, 230
- sense perception 感觉, 255, 315
- senses 感觉, 意义, 135—137, 197—198, 248—249, 253—255, 259—260, 269, 274, 286, 300—305, 313—314, 355
- separation 分离, 258—260, 268
- sexuality 性, 89, 132, 136, 226—229, 266, 282, 290, 341, 344
- Shiva, Vandana 旺达那·希瓦, 137, 180, 187
- Simmel, Georg 格奥尔格·席美尔, 132, 155, 268, 286, 288, 406
- Situatedness 情境性(参见 positionality)
- Smith, Adam 亚当·斯密, 124, 130, 157
- Smith, Neil 尼尔·史密斯, 41, 46, 187, 194, 203—204
- social change 社会变革, 11, 38, 54—55, 63, 66—67, 75, 96—113, 119, 377, 418, 426
- social contract 社会契约, 397—398
- social control 社会控制, 228—230, 235, 311—313, 404, 406—410
- social justice 社会正义, 6, 11, 37, 155, 179—180, 298, 334, 338, 395, 397—402, 410, 429
- social process 社会过程, 78—83, 85—87, 94, 96—113, 139, 152, 164, 174, 209, 231, 247, 290, 294, 306, 320, 322, 333, 372
- social relations 社会关系, 27, 44, 79, 85—87, 92—95, 105, 112—113, 131, 138, 155, 166, 173—175, 180—181, 183—189, 198—200, 212, 215, 220, 228, 231, 233—237, 240, 249, 264, 266, 270, 273—274, 276, 285—286, 289, 294, 306, 310—311, 313—314, 359, 372—373, 399, 418, 422
- social theory 社会理论, 6, 46—47, 51, 76, 78, 96, 110—113, 190—193, 207, 210, 259, 267—274, 289
- socialism 社会主义, 19—23, 29—30, 33, 36, 39—40, 57, 67, 75, 101, 107, 120, 125, 157, 167, 180, 186, 193—194, 303, 316, 360—364, 402, 423, 430—431, 433—438
- socio-ecological processes 社会—生态过程, 6, 9, 14, 25—27, 56, 76, 140, 183—189, 209, 263, 285, 294, 311, 327, 353, 359, 429, 433—438
- Soper, Kate 凯特·索柏, 173
- space 空间, 2, 5, 7—8, 11, 14, 25, 27, 29—31, 33, 43, 45, 46—47, 66, 72—73, 81—82, 84, 87, 110, 112—113, 150, 153—154, 167, 207—209, 210—247, 293—295, 325, 326, 329—333, 406—412, 419, 422, 435—438
- space, absolute 绝对空间, 4, 53, 123, 224, 249, 257, 264, 425
- space, production of 空间的生产, 108—

- 113, 207—209, 210—247, 272—274, 435—437
- space, relational 相关性空间, 53, 69, 220—222
- space relations 空间关系, 240, 295—299, 315—317, 318
- space-time 时空, 2, 4, 9, 13, 46—47, 76, 78, 167, 215—222, 353—354, 359, 363, 415, 420, 429—430, 435—438
- species being 类存在物, 物种, 194, 197—200, 313—314, 434
- spectacle 景观, 317, 325
- speculation 投机, 123, 132—133, 240, 295—299, 316—317, 326, 406, 417
- Spinoza, Benedikt de 本尼迪克特·德·斯宾诺莎, 71, 123, 168
- Spivak, Gayatri 加亚特里·斯皮伐克, 71, 103, 110, 355, 364
- State 州, 国家, 66—67, 71, 79, 82, 86, 94, 123, 152, 161, 177—178, 185, 193, 201, 204, 208, 212—214, 235—236, 239, 262, 271, 304, 311, 320—321, 338—341, 347, 349, 374—378, 390, 423, 430, 432
- Strathern, Marilyn 玛里琳·斯特拉森, 219—220, 277
- Strawson, Peter 彼得·斯特劳森, 72—73, 271—273
- structures of feeling 情感结构, 24—25, 34, 36, 38—40, 43, 84, 102, 145
- struggle(see also class struggle) 斗争(参见阶级斗争), 282, 293, 298—299, 352, 361, 391
- subject 主体, 77, 96, 129, 186, 363
- subjectivity 主观性, 100, 122, 128—129, 212, 226—227, 274
- Summers, Lawrence 劳伦斯·萨默斯, 366—369, 373, 376, 393, 399
- surveillance 监视, 225—231, 262—263
- sustainability 可持续性, 144, 148, 151—152, 174, 176, 182, 186, 196, 229—230, 370, 372, 377, 385, 390, 411, 427
- symbolic order 象征秩序, 97—99, 112, 277, 286, 298
- symbolic politics 象征政治学, 368, 387—391
- symbolism 象征主义, 79, 112, 217, 230, 234, 306—309, 316, 322—323, 327, 417
- Szasz, Andrew 安德鲁·萨兹, 369, 387, 391, 401—402
- Taylor, Charles 查尔斯·泰勒, 351—353, 355
- Taylor, Dorcetta 多塞塔·泰勒, 369, 386
- technological change 技术变革, 13, 124, 149, 245, 295—299, 381—383, 412—418, 436—437
-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技术理性, 198—199, 302
- technology 技术, 126, 134, 141, 146, 179, 195—199, 200—201, 243—245, 257, 280, 286, 302, 435—436
- teleology 目的论, 56—57, 226
- territoriality 领土性, 112, 161—162, 191, 208—209, 223, 239, 241, 295—299, 310, 320, 351—352, 385, 412, 422—423
- theory 理论, 9—10, 24—25, 37, 44—47, 48—49, 53, 55, 57—62, 66, 77, 98, 109, 208, 211, 272, 283, 416—430
- things(entities) 物(实体), 48—56, 72—74, 78, 81, 84, 153, 202—203, 219—222, 233—237, 238, 249, 253, 256—264, 266, 271—274, 278, 294, 300, 321, 352, 418—420, 425—426
- Thompson, Edward 爱德华·汤普森, 225, 266
- Thoreau 梭罗, 128, 303
- time 时间, 2, 5, 7—9, 11, 14, 66, 72—73, 81—82, 84, 91, 113, 153—154,

- 167, 207—209, 210—247, 293—295, 311, 325, 329—333, 422, 435—437
- time, absolute 绝对时间, 4, 53, 123, 224, 249, 257, 264
- time, production of 时间的生产, 207—209, 210—247
- time, relational 相关性时间, 53, 69, 220—222
- time horizon 时间范围, 41, 229—231, 377—383
- time-space compression 时空压缩, 209, 242—247, 299—302, 317, 326
- Timpanaro, Sebastian 塞巴斯蒂安·廷帕纳罗, 164, 193
- Todes, Dan 丹·托迪斯, 160
- Toffler, Alvin 阿尔文·托夫勒, 12—13, 241
- totalities 总体性, 7, 56, 63—68, 107, 129, 271—272
- trade unions 工会, 19—20, 30, 42—43, 337
- tragedy of the commons 公地悲剧, 154, 177, 372, 384
- transformative action 变革行动, 55, 64, 105—113
- truth 真理, 37, 70, 95, 341—347
- Tuan, Yi-fu 段义孚, 210, 302
- Turner, Frederick Jackson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 119, 171
- turnover time of capital 资本周转时间, 241—247, 411—412
- underclass 下层阶级, 292, 404
-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不平衡地理发展, 6, 42, 65, 187, 201, 295—299, 310, 326, 396, 414, 429—437
-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无意识后果, 80, 147, 183—189, 326, 378
- unities 统一, 一致, 66—67, 198, 208, 258, 313, 317—320
- universality 普遍性, 32, 35, 70, 101, 123, 150—151, 157, 203, 288, 290, 304, 309, 314, 319—320, 324, 325, 333, 339, 345, 351—353, 358, 360, 362, 390—391, 400—401, 431, 433—436
- urbanization 城市化, 186—189, 223—224, 239, 242, 276, 307, 312, 389, 391—397, 403—438
- utilitarianism 功利主义, 397—398
- Utopianism 乌托邦思想, 12—14, 56, 81, 125, 127, 131, 133, 140, 149, 230, 279, 306, 332—333, 406, 418—420, 424, 429, 432, 434—438
- value (economic) 价值(经济的), 50, 63—68, 73—75, 145, 220—221, 234—238, 244, 246, 248, 266, 270
- value formation 价值形成, 215—223, 237, 247, 288—289, 311, 354
- value system 价值体系, 244, 266
- values 价值, 4, 10—12, 29, 44, 56—57, 79, 81, 84, 98—100, 118, 148, 173—175, 199, 288—289, 302, 304, 306, 321, 323, 325, 329, 350—354
- values (environmental) 价值(环境的), 57—69, 150—175, 178, 211, 320
- Volosinov, V. N. 沃洛希洛夫, 88, 91—92
- Walzer, Michael 迈克尔·沃尔泽, 346, 350—352
- Weber, Max 马克斯·韦伯, 9, 92, 127—128, 156
- Wenz, Peter 彼得·温斯, 397—398
- White, Stephen, 343, 347—438
- Whitehead, Alfred North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 8, 47, 50, 52, 54—55, 58, 61, 72—74, 123, 138, 248—249, 256—263, 267—268, 284—285, 308, 310
- Whorf-Sapir hypothesis 沃夫-萨皮尔假

- 说, 84—85
- Widery, David 大卫·威杰里, 409
- Wigley, Mark 马克·威格利, 227—228
- Williams, Raymond 雷蒙德·威廉斯, 23—45, 46—47, 51, 57, 59, 88, 90, 96—97, 99, 101—102, 106, 109, 117, 119, 163—164, 171—173, 176, 189, 193, 202, 255, 267, 282—283, 302, 314, 324, 307, 351, 391, 392, 399, 431—432
- Wilson, Edmund O 埃德蒙·威尔逊, 165—166
- wise use movement 有效利用运动, 383—385, 386
- Wittfogel, Karl 卡尔·魏特夫, 184, 193
- Wittgenstein, Ludwig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285, 330—331
- working class 工人阶级, 19—23, 29, 35—36, 40, 58, 100, 102, 120, 124—125, 194, 198—199, 204, 225—226, 314, 336—341, 344, 358—364, 399, 423—424, 432
-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124, 138, 148, 181—182, 285, 366—367, 379, 381—382, 400, 420, 430
- Worster, Donald 唐纳德·沃斯特, 184
- Xenophon 色诺芬, 227
- Young, Iris 艾利斯·杨, 202—203, 311—312, 348—350, 354—355
- Zelizer, Viviana 维维安那·泽尼泽尔, 236
- Zerubavel 伊维塔·泽鲁巴维尔, 230, 240
- Zimmernan, Michael 迈克尔·齐默尔曼, 52, 166
- Zizek, Slavoj 斯拉沃热·齐泽克, 98—100, 310—311
- Zola, mile 埃米尔·左拉, 132—133, 156, 159

译后记

在我国理论界，戴维·哈维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甚至，他可能还会进一步占据某些话语的中心。由于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讨论过哈维著述的总体特征和逻辑结构^①，在此不再重复相关内容，而只是强调其在当代社会理论之中的两个维度，正是由于这两个维度，他实际成为当代不可替代的左派知识分子：其一是对全球层次日益加速的资本积累及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理论干预；其二是在社会理论之中以空间为立足点对元理论的推动，尤其是其把马克思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努力。这两点对于当代中国理论界都有独特的意义。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我较为持续地关注他的理论动向，并欣然接受薛毅教授代表上海高校E文化研究院的委托，承担起翻译这种既不能发挥自己强项又不能计算成果的苦差事。

《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无疑是哈维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②，在其中，他试图为社会批判理论提供一种社会空间分析的元理论框架，这个框架既要把以马克思为中轴的整个辩证法传统的积极意义激活，又充分尊重当代新社会运动和激进思潮提出的多样化问题。更重要的

^① 参阅张一兵等主编《社会理论论丛》，第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如果以其创作过程来计算的话，《地理学中的解释》（1969）、《社会正义与城市》（1973）、《资本的界限》（1982）、《后现代性状况》（1989）、《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1996）、《希望的空间》（2000）、《新自由主义的空间：通往不平地理发展的理论》（2004）等都是哈维不可或缺的代表作。通过这些著作，哈维以地理学（或空间论题）为依托不断开辟新的主题或推动既有社会理论的深化。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他著作并不重要，而是说，这些著作，几乎每一本都有与众不同的东西。

是，他始终立足现代性(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共同构成的社会构型)来回应当代政治。在其论述中，“正义”、“自然”这些古老的话题与“差异地理学”和“差异政治”这些新的动向的时空相关性理论统一起来了，而在全球化背景中的“战斗的特殊主义”和“全球抱负”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处于现代性焦点的“阶级政治”与作为后现代旨趣的“差异”位置则得到有机协调。因此，虽然本书篇幅并不算大，但在主题上无疑却属于“巨著”之列。

对于该著作的评论，在后记中显然是无法展开的。我亦不主张如此。我要交待的是翻译上的一些疑难，就算是事先做一些“推卸责任”工作。虽然翻译工作陆续进行了好几年，但终非译者的分内和专长。更重要的是，恰恰在翻译过程中，我更深刻地领悟了在今天研究碰到的许多一般问题，例如专业上的自信与语言能力的脱节。我甚至怀疑，正是在追随西学过程中，中文在今天的学术领域中遭到实质性冲击。这当然是要我这样不合格的译者来负责的，虽然不是一个。为减轻自己的罪过，在后记中就多强调一些客观原因。

按照哈维自己的介绍，在这本书中，他试图为创造性地理解当代社会历史进程提出某些基本概念。在这样做的时候，一方面，他以灵活的方式运用辩证法思想，另一方面又采纳了某些后现代行话。特别在后一方面，他又对其进行限制，因为他尽管承认那些话语影响着人们的写作和讨论，但并不认同它们。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正如他自己强调的那样，无论是术语的运用还是表述，在通俗性方面都会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对其著作的中译更是如此。这些困难不是语言问题，而是思维方式问题。例如，他广泛地在抽象意义上使用诸如“抽象”、“特殊”、“永恒”等这名词，将之作理解不受特殊立场或话语影响的概念工具，以达到分析上的普遍性。对于翻译来说，直接使用名词，不仅会在中文阅读中产生突兀感，而且有时恰恰会造成不必要的误解。为此，在适当时候，我们会做一些处理以增强可读性。例如。用“抽象观念”、“永恒性”等方式来翻译那些名词。当然，为了照顾其讨论的语境，我们并非总是如此。同时，更重要的是复合词和句子问题。

哈维对辩证法的强调，偏重于相关性问题。这个问题实质上指向这个基本思想：任何研究对象（无论是人、物还是情境）都不是孤立的，它与各种条件之间通过复杂的相互作用而联系在一起。为准确地揭示问题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哈维几乎对自己所涉的全部重要对象都进行了复杂的多层次限定。从形式上看，哈维不仅大量地使用较长的定语从句，而且喜欢采取多维限定的方式来描述对象。比如，objective but socially given conceptions of space and time，即便不不加任何定语，实际上也不会产生误解，但哈维突出表明自身“情境化”的知识立场，强调时空观念具有社会决定的客观属性。正是因为这一点，在许多时候，那些看似重复的定语是不能省略的。因为，它们既表明哈维对流行讨论对象的不同看法，又表明了他试图改变讨论这些问题方式的努力。从他全部研究特点看，无论作为一个反叛的地理学家长期关注地理景观的历史建构及其背后多种冲突力量（生态必然性、历史必然性和主体行动等），还是突出语言和话语要素的作用，都清晰表明了他的这种努力。这便产生了下述典型情况。在表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力量”这样的意思时，他往往会使用诸如 the dominant lines of political-economic power at work under capitalism 这样复杂的形式。通过这些形式，他试图指出，政治与经济联合产生的力量是人类历史不可避免的情况，但它们通过一种具体的权力结构（如资本主义）体现出来的时候并不因此就成为不可更改的固定形式（即他所言的“永恒”），且并不完全成为单一或同质的结构，由此他提醒，这些结构只是暂时的和“占统治地位的”。为了在形式上体现这个特征，我们不得不采取“依葫芦画瓢”的方式来翻译。然而，这不是减轻而是增强了翻译的难度。因为，例如，different possible worlds of spatio-temporality，如果再加上这些术语所描述的情境之动态，例如，the production of different possible worlds of spatio-temporality，翻译出来就不是一般的拗口了。“不同的可能的时空性之世界的生产”，或者“时空世界之不同可能性的生产”，这在中文语境中是不忍卒读的。在总体上，虽然最终方案是尽力贴近中文规范，但在不少地方还是有一些保留。这只能请读者们原谅了。

至于译文所涉主要关键词，我想，通过译名对照和简单解析，基本不会产生理解上的歧义。考虑到部分流行英文关键词并没有统一中译，我提出一些加以讨论。

Abstraction(抽象)，指再现物质世界的思维模型，哈维往往用它指术语、概念和观念等。哈维认为，不同的理论具有不同的性质，它们之间不仅存在解释世界的争论，而且具有实践后果。所以，在他的讨论中会出现诸如 The politics of abstraction(抽象之政治)说法。与之相关的是 theorizing(我直译为“理论化”)，它表明按照某种规则使用概念工具创造理论框架的实践。因诸如“理论化”这样的术语在中文语境中不够通俗，故加以说明。

Agency 与 agent，这是两个在当代社会研究中比较流行的词，它与结构主义思想相关，但一直缺乏标准的中译。在多数翻译中，都译为“代理”和“代理人”。不过，这种翻译可能带来费解，特别是某些特定的组合，如恐怕一般读者很难理解“历史代理”指什么。实际上，这对术语，前者指与主体行动有关的客观社会结构及其过程，后者则是指该过程的承担者。在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标准中译中，后者便被恰当地翻译成“当事人”。我们采用了这种译法，而前者相应对译为“行动”(能动作用)。

Community，这个术语的含义不会产生歧义，只是在今天，由于“社群主义”理论影响，存在着“社区”、“社群”和“共同体”等不同译法。我们依语境进行选择。

Constitute，一般译成“组成”。例如，“物是由复杂的过程或关系组成的”。不过，过程或关系并非物之存在的实体性要素，而是结构性要素。特别是在解构语境中，这是哈维挪用的后现代方法，解构的并非一个对象结构性要素而恰恰是实体性要素，这意味将研究对象视为一种结构的产物(这也是为什么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观点出发必然是建构主义社会理论的原因)。为突出这一特点，我们选择“构造”，以对应于 construct(建构)这个词。

Embeddedness，直译“嵌入性”。这个词，是按照今天流行的后

现代视角构成的一个新词，用其来表示世界多样性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传统辩证法思想普遍联系观念有差别的地方在于，该词强调了联系本身的不可分离特征，即各种要素之间密切联系在一起并不能独立地研究。这是哈维关系视角的显著特点。

Moment，这不是哈维的专门术语，而是来自黑格尔的辩证法。在第四章有关“社会过程的认识图”解释中，他把组成要素都称为 moment，这实际上是按照黑格尔辩证法传统来做的。这个词当然有翻译的难度，除了有关黑格尔的专门文献，涉及黑格尔这个词引用的相关译著很少有将其意准确呈现的。实际上，它包括“要素”（从空间角度来说）和“环节”（从时间序列来说）双重含义，当然无论哪一种含义都不代表孤立的对象。在本文中，我根据语境，在“环节”和“要素”之间择一而行。

Place，是本书的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这个术语具有多义性，这一点哈维自己在第四部分已经详细解释了。简单地说，它指一个具体的空间。不过，由于哈维讨论的不是物理空间，在抽象水平上，它也同时涵盖了“位置”之间，又具有比喻含义。因此，我们根据具体语境并照顾中文习惯译为“位置”、“地方”等，并在可以引起歧义的地方标注原文。

Process(过程)，在一般意义上，这个词是不需要讨论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年的有关辩证思维方式的阐述中，特别是文学和社会理论，采用了许多替代性的比喻，试图把握不同领域研究对象的过程性质。Flow 和 flux 这样词便具有一些独特的重要。在不同的语境中，我们可以按照一般的方式进行翻译，前者强调的是“向前的运动”，可以直译为“流”；后者强调“不停的运动”，可以译成“不息的变迁”等。难题在于，有一些时候，哈维把 Flow 和 flux 与“过程”并列起来，作为关键词。为了简洁之故，我们把 flow 和 flux 统一译为“流”。在涉及区分的时候，权宜地分别称为“潮流”与“洪流”。

Relational，这是哈维最重要概念之一，简译为“相关的”。在传统研究中，在阐述辩证法时，主要涉及“绝对的”与“相对的”(rela-

tive)两种视角, 哈维则发展了“关系”视角。这种视角强调时间和空间之间的联系。术语含义很清晰, 不需要专门的辨析。只是“相关”这个中文词在部分句子中会引发歧义, 故有时我们会灵活处理, 例如以“关系”称之。需要说明的是, 涉及多维限定时, 有时为突出“相关的”而不至于产生歧义, 我们会采取一些灵活的处理。例如, 把 *Relational theory of space-time* 译为“时空相关性理论”。

还有, 其他一些来自他人的术语。例如, *militant Particularism* 这是雷蒙德·威廉斯所创, 它模仿了列宁“战斗的唯物主义”, 故正译为“战斗的特殊主义”。又如, *witnness*, 是怀特海的概念, 我们采用流行的“共与性”译法。再如结构主义偏爱的 *terrain* 一词, 哈维说 *terrain of discussion* 和 *terrain of possibility* 等时, 都是指一种具体的位置, 我们统一“地形”。这些术语就不一一说明了。

最后, 感谢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教授,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任俊萍编辑。

译者

2009年12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

作者 = (美) 戴维·哈维著

页数 = 540

SS号 = 12712921

出版日期 = 2010.11